

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

(供内部参考)

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Gene D. Overstreet
Marshall Windmiller

**COMMUNISM IN
IND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9

(供内部参考)

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7 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 11017·232

1964年10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541 千字

印张 23 1/16

印数 1—4,500 册

定价(10) 3.50 元

612779

出版說明

本书是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学家琴·D. 奥佛斯特里特 (Gene D. Overstreet) 和馬歇尔·温德米勒 (Marshall Windmiller) 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主持的“现代印度研究计划”資助下合写的。所謂“现代印度研究计划”的經費是由福特基金会供給的。

为了提供參考資料，現由北京編譯社根据本书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版譯出。

目 录

| | |
|---------|---|
| 序..... | 3 |
| 志謝..... | 5 |

第 一 編

| | |
|-----------------------------|-----|
| 导論..... | 9 |
| 第一章 印共的双重环境..... | 13 |
| 第二章 印度人加入共产国际..... | 27 |
| 第三章 共产党人企图攫取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 | 58 |
| 第四章 組織先鋒队..... | 76 |
| 第五章 英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作风”..... | 104 |
| 第六章 共产国际改变路綫..... | 128 |
| 第七章 政治上的徬徨..... | 153 |
| 第八章 統一战綫..... | 193 |
| 第九章 帝国主义战争..... | 212 |
| 第十章 人民战争..... | 236 |
| 第十一章 立宪共产主义..... | 275 |
| 第十二章 暴动的根源..... | 311 |
| 第十三章 冒险主义的后果..... | 340 |
| 第十四章 回到立宪共产主义..... | 382 |

第 二 編

| | |
|-------------------|-----|
| 第十五章 党：結構和职能..... | 412 |
|-------------------|-----|

| | |
|------------------------|-----|
| 第十六章 群众組織 | 453 |
| 第十七章 外围組織及同路人 | 507 |
| 第十八章 宣传鼓动工具 | 557 |
| 第十九章 議會斗争舞台 | 583 |
| 第二十章 民族問題和民族团結 | 609 |
| 第二十一章 甘地的挑战 | 633 |
| 第二十二章 結束語: 趋向与前景 | 659 |
| 后記 | 673 |
| 传略 | 688 |
| 主要参考书目 | 715 |
| 譯名对照表 | 730 |

附 表

| | |
|--|-----|
| 表一 組織表 | 414 |
| 表二 印度共产党的党员数目, 1934—1957 年 | 440 |
| 表三 从 1956 年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看印度共产党 | 443 |
| 表四 历届中央委员会 | 445 |
| 表五 全印工会大会年会出席代表 | 466 |
| 表六 全印工会大会领导人 | 469 |
| 表七 全印农民协会历届年会出席代表 1947—1956 年 | 481 |
| 表八 全印农民协会 1954 年和 1956 年年会出席代表及 当时的会员人数 | 483 |
| 表九 全印农民协会各届领导人 | 485 |
| 表十 全印和平理事会的领导人员, 1952—1957 年 | 536 |
| 表十一 印度共产党的中央报纸 | 560 |

序

琴·D·奥佛斯特里特和馬歇尔·溫德米勒合写的这本有关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著作，是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主持的“现代印度研究计划”的襄助下完成的。“现代印度研究计划”制定于1954年春，旨在鼓励对印度的政党、政治领导权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研究活动的经费是由福特基金会供给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则负责提供研究基地，以使该计划中的各项专题研究工作得以进行。

近年以来，在各种观念、制度或政治行动方式中，对世界政治和各国政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反映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那一套观念、制度或政治行动方式了。正在谋求民族独立和社会福利的印度，也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影响。

传播这些思想的主要工具是印度共产党。如果不去研究印共以及它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就不可能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印度历史。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政治学家，他们分析了印度近代史上的这个广泛的领域，着重研究了印度共产党，但对国际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思潮影响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方向的详细情况，也给予了应有的注意。

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有二：从历史出发，以分析方法对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详尽的研究；阐明印度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活动情况。就“现代印度研究计划”的目的而言，本书是一部从全世界和印度一国的角度来研究一个主要印度政党的著

作。它实质上对印度的一个重要政治领导集团进行了探讨，同时它也涉及到四十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问题。

也许有人会单纯地以本书的题材为理由，认为本书存在着问题。但是，本书作者确曾煞费苦心搜罗资料，以保证资料精确无误。凡是研究过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运动的人都会了解，要在缺乏确实材料而当代的见解又被有意识地加以周密掩盖的情况下发现事实真相该是多么困难。

这本内容丰富、叙述周详的著作，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印度政治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和过程。

理查德·L. 帕克

1958年9月于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

国际研究所

南亚研究中心

志 謝

本书作者怀着由衷的愉快心情回忆起在写作本书过程中許多人士所給予的鼓勵和幫助。因而，向他們表示我們的謝忱，也就不僅是一種禮儀上的客套了。

我們感謝加利福尼亞大學“現代印度研究計劃”主任理查德·L. 帕克，他使我們有機會完成本書的調查研究和寫作。本書的完成大半有賴於他的支持，內容方面也根據他的意見有了改進。我們還要向福特基金會表示感激，這不僅因為福特基金會支持了“現代印度研究計劃”，使本書的研究工作得以進行，還由於它前此設置了與本書研究工作無關的獎學金，使我們兩人得以訪問印度，直接觀察印度的政府及其政治情況。

本書是在美國、歐洲以及印度的圖書館和現場進行調查研究所得的結果。奧佛斯特里特在 1953—1955 年僑居印度，溫德米勒則在 1953—1954 年住在印度，隨後在 1955 年又去那里。兩個作者交流了研究方法和資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取長補短的作用。在撰寫初稿時，奧佛斯特里特負責第一、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八、十九、二十各章，以及導論和後記，溫德米勒負責第二、三、四、五、六、七、十四、十六、十七、二十一以及傳略各章。每一章在經過商討後都作了修訂，結束語一章則是由二人合寫的。

引証材料中的標點符號和單字拼法上的明顯錯誤，只要不影響原意，都經作者改正；為求統一，英國拼法已改為美國拼法。印度專有名詞的拼法，則以有關人士最常用的拼法為準。

下列人士閱讀過本書原稿的全部或一部，他們所提的意見對

本书有很大的帮助：罗伯特·C. 諾思、克謝尼婭·尤金、珍妮·德格拉斯、西利格·S. 哈里逊、菲利普·E. 謀斯利以及約翰·H. 考茨基。

在我們进行調查研究的过程中，不少人向我們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議。特別應該提到的是罗伯特·C. 諾思、M. R. 瑪薩尼、菲利普·斯普拉特、珍妮·德格拉斯、S. N. 泰戈尔、息勃那特·班納吉、維奧列特·康諾利、乔安·V. 邦杜兰特以及瑪格丽特·W. 費希尔。

我們还應該特別提一下把一些我們原先无法接触的重要文献資料借給我們使用的人。他們是：西利格·S. 哈里逊、托馬斯·A. 魯希、菲利普·J. 賈菲、J. P. 米特尔等人士。太平洋关系学会允許我們使用該会刊物《太平洋季刊》上发表的資料，我們也願在此致謝。

我們还感謝許多帮助过我們的圖書館人員，其中有国会圖書館的华尔特·H. 毛雷尔，胡佛研究所圖書館的艾內茲·理查逊和弗朗塞斯·比奧勒提，加尔各答国家圖書館的 B. S. 圭薩万，孟买优素福·梅黑腊黎圖書館的閃加尔·謝底，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安娜·H. 李德等。

加利福尼亚大学南亚研究所图书管理員帕特里克·威尔逊為我們找出了許多我們本来认为已經沒有希望找到的文献，并提醒我們注意我們本来很可能忽略过去的重要材料，我們在此特別致謝。

我們还要深深感謝托尼·沃耳卡尼，他為我們校訂了初稿，并在校訂过程中使我們在英語方面受益很深。我們还要特別感謝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編輯部的馬克斯·E. 奈特，他為本书額外作了校訂并編制了索引。

对于其余协助过我們的人士,我們謹此表示謝忱,恕不一一列举。最后还須声明,本书所述的事实是否眞实,所作的全部解释是否正确,完全由我們两人負責。

琴·D. 奥佛斯特里特

馬歇尔·温德米勒

1958年夏于伯克利

我要說，共产党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而它也不是任何武力或暴力所能消灭得了的。共产党是靠武力和暴力滋养壮大起来的。只有依靠真理，依靠深入了解，善于冷靜地来衡量它，并以民主方式采取对策，才能消灭它。这才能使它退出我們的舞台，而它就不会再留在这个舞台上。

霍华德·法斯特在接見馬丁·阿格龙斯基时的談話，載 1958 年 3 月《进步》。

第一編

導 論

凡是研究现存政党的学者，都不仅要考虑这个党本身的性质，同时还要关心它在更广泛的政治环境中所起的作用。他要了解这个党的組織結構、活动方式、人員情况和党綱，也要了解这个党如何影响环境以及如何受环境的影响。

研究共产党的观察家所碰到的，是一种需要加以分析的专门問題，因为这种政党不是在一种环境中，而是在两种环境中起作用的。它既是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一分子，又是本国政治社会的一分子。它同这两种环境相互发生影响；因而它也就陷入各种极为复杂的影响的罗网中。

写作这本关于印度共产党的著作的目的，不仅在于評述印共本身，还在于說明它同这种双重环境的关系。本书的第一編叙述約从 1920 年到 1958 年間印共的发展情况；第二編以最近一个时期为重点，探討印共政策与做法的某些主要方面。全书貫串着作者的这样一种嘗試：叙述印共同它所属的两个政治环境的关系，并衡量这两个政治环境对印共所起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重点放在印共中央組織方面，并不想同时对省(邦)或地方共产党的政策或活动进行全面研究。但作者对印共的这些下級組織也給了一些注意。由于印共反映了国内环境的复杂性，因此这些下級組織在印度具有特殊的意义。邦和地方的印共单位将是今后探討时可以取得丰硕成果的領域。

本书虽然費了不少篇幅談到印度国内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情况，但并没有对这两种环境全面地提出概括的看法。本书不是全面研究印度政治的著作，也不认为印共是印度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因素。

虽然如此，本书作者还是希望，对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所进行的研究，也许多少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印度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印共同这两种环境都有关系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从两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比较的机会。拿印共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进行比较，观察它如何背离共产主义正统，对于我们认识印度政治的某些特点也许是有帮助的。例如，就印度共产党来说，以具有非凡才能的领导为基础的宗派活动，似乎要比在其他国家共产党中更为普遍，我们由此也许可以推断，这是印度政治活动的特点。另一方面，拿印共同其他印度政党作比较，对于我们认识共产党活动的特点也许是有帮助的。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党员普遍忠于一种权威性的意识形态，印共就比其他印度政党更具有亲和力，我们由此也不妨断定，这种亲和力是共产党政治活动的特点。这些论断当然只是一种推测，但却可以当做假说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分析共产党文献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即制订和传达政策的方法，通常都是公众所不熟悉的。分析者基本上必须依靠党的官方文献来取得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这类文献通过老一套的共产主义理论术语来阐述政策。所以说，党的官方刊物似乎是用来掩盖而不是传达共产党政策的。但如果能恰当地解释这种文献，往往也能看出政策的真正内容甚至它的真正动机。

表面看来，共产党理論文献的目的是，提供一个理論輪廓，人們可以凭这个輪廓去了解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做法。实际上，它的主要目的是使某一具体行动方針具有科学正确性的味道，从而动员一般党员和党的追随者去支持那个具体計劃。由于理論著作篇幅极为庞杂，只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传道士才真正熟悉这些著作。因此，这种传道士掌握着影响一般党员的有力工具，而一般党员对于理論以及能够大談其理論的人們的才智也都肃然起敬。不过，共产党也期望每个党员都能从这种理論术语中体会到所提出的行动方針的精神。所以，一个非共产党的分析家也同样可以从精心撰写的理論性文章中理解到政策的真正內容。

而且，一个非共产党人士也往往可以通过研究共产党論战性文章弄清楚政策的真正动机。当具体的行动方針还没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集团或一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取得一致意见以前，公开发行的刊物中就可能出現一場辯論。这种辯論通常总是以抽象的詞句进行的。只要仔細分析这类辯論，就可以推測出爭論問題的实质，认清进行爭論的派別。只要对周围的环境有所了解，就可能推断出共产党世界制訂政策性决定的过程的性质。

但是，为了“翻譯”这种文献，必須首先对这种从意識形态中所提出的两种主要的政策方案有相当清楚的了解。从最根本的角度即战略角度来看，可以看出两种主要的方案是：反帝国主义的战略和反資本主义的战略。按照前一种战略，共产党的目的在于领导社会上的四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去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按照后一种战略，共产党的目的仅仅在于领导三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去反对国内的資本主义。为了追求这些基本战略目的，共产党采取了各

种策略性的方法，包括自上而下的統一战綫和自下而上的統一战綫、革命行动和議会行动、提出广泛的綱領性口号等。

至少直到不久以前，印度共产党的政策一直搖摆在这两种战略之間，某一时期支持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例如 1935—1939 年以及 1945—1947 年），另一时期則在反資本主义的战略下攻击資产階級民族主义（例如在 1928—1934 年或 1948—1950 年）。这两种战略正是我們分析印度共产党政策时必须凭借的主要范畴。但近年以来，有些迹象表明，不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是在印共内部，正在出现第三种战略。1948 年以前的东欧和 1948 年以后的中国，都应用了“人民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論。这些理論是为一个过渡阶段提出的，在这个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要完成資产階級民主革命，并为此后实现社会主义打下基础。适应这个过渡阶段的战略是上文所述的反帝国主义战略的变种，即四大階級联合起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国内的伙伴封建主义和垄断資本主义。但在东欧和中国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傾向：在这个过渡阶段結束以后，仍然保持四个階級的联盟，直到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最后的結果也許会形成一种联合四个階級反对資本主义本身、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新战略。这种战略并不像乍一看时那么荒唐；在亚洲若干不发达国家中，共产党已經說服或迫使企业家階級支持政府提出的包含社会主义因素的綱領。在印度，正如在中国一样，共产党人可以竭力“教育”企业家階級也接受社会主义。但在目前，这种战略还没有明确完善地表达出来。

为了系統地論述印度共产党政策的主要变动，必須精确地了解上述几种基本政策范畴的涵义；因此，本书第一章比較詳尽地探討了这些政策范畴。还要說明的是，尽管本书的作者采用了多少

有些不同的分析方法，但作者在工作中却从約翰·H·考茨基的有关战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近作《莫斯科与印度共产党》一书中得到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关于印共在1947—1953年的情况，应该参阅考茨基教授的著作，其中有更详细的、在某些方面显然与本书不同的报道。

第一章 印共的双重环境

虽然俄国人企图在印度插上俄国国旗的具体阴谋未能得逞，但几世纪以来，作为英帝国轴心的印度却一直是沙皇垂涎的对象。彼得大帝曾经使用各种方法，想同印度大陆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同英国东印度公司抗衡。由于他无法找到一条陆上路线，他最后派出了一支小型远征舰队，这支舰队因为船只不能适应远洋航行，不久便返回俄国。沙皇保罗则同拿破仑串通一气，阴谋对印度发动一次联合军事入侵。保罗派遣了一支顿河哥萨克骑兵，这支队伍没有到达俄国边境，就因得不到地图和供应品而溃散了。^① 1900年，俄国同法国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再度共谋入侵印度。当即决定，一俟铁路修到塔什干，就派出一支三十万人的远征队，但铁路却没有及时修成。^②

因此，当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俄国建立起来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历史先例可以使新政权对印度至少感到兴趣。布尔什维克不

① George Vernadsky, *A History of Russia* (乔治·维尔纳德斯基：《俄国史》), 3d. rev.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104, 137.

② B. H. Sumner, *A Short History of Russia* (B. H. 萨姆纳：《俄国简史》), rev.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9), 422 pp.

久就显露了这种兴趣。他们像早先的沙皇一样，看到那怕是仅仅威胁一下英国在印度的势力，也足以损害英国在全世界的势力。那时，他们就可以通过印度，削弱这一敌人，亦即世界革命的主要障碍和苏联政府本身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印度除了可以充当反英的武器以外，它本身也是革命输出的诱人目标。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悲惨处境，强烈地刺激了布尔什维克早年的革命热情。

一位名叫克尔任切夫的评论家在1919年撰文论述印度前途时，就流露出布尔什维克的想法所特有的那种远谋和狂热。他说，印度是英国殖民地中“最有利可图的”，一旦它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英国人就将失去“巨额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他说，一旦印度起而反对帝国主义，整个殖民地世界就会燃起革命烽火。他说，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南非、埃及、中国、西藏、波斯等地，都会效法印度的榜样。“一言以蔽之”，他最后写道，“印度摆脱英国统治取得解放，将成为一系列亚洲国家进行反帝斗争的信号。”他宣称，英国人是用“野蛮而阴险的手段”征服并统治印度的，现在这个国家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在今后几个月中，革命运动将不断壮大起来。”^①

为了实现这些迫切的愿望，布尔什维克既需要革命计划，也需要一批革命代理人。在罗致先遣代理人的时候，他们不能像在波斯那样干。在波斯，他们曾经和游击队领袖米尔札·古朱克·汗的部队联合起来，对德黑兰的伊朗政府发动军事进攻。在印度次大陆，并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叛乱运动可供他们利用。但就印度而言，布尔什维克可以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失意的印度流亡者中间

^① V. Kerzhentsev, *Angliiskii Imperializm* (克尔任切夫：《英帝国主义》)，(Moscow: Izdatel'stvo vsrossiiskogo tsentral'nogo ispolnitel'nogo komiteta sovetov R. K., K. i K. deputatov, 1919), 32 pp.

找到許多积极的反抗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这些印度团体就曾期待德国支持它們的反英計劃，其中有些团体也曾領到武器和款項，但随着德国的战敗，它們需要从新的来源获得支持。因此，在这些团体和布尔什維克之間，自然就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利害关系。

在这些团体中，最重要的也許就是侨居柏林的一个分子混杂的流亡集团，其中一部分人属于維冷德腊那特·札多巴塔雅和普奔德腊那特·杜达所领导的柏林委员会。另一团体是由瑪痕德腊·勃腊达勃、巴尔加都拉和欧倍都拉赫三人领导的設在喀布尔的“印度临时政府”。在紐約，有自治联盟的一个支部，由拉拉·拉支巴特·腊伊领导；而在加利福尼亚則有卡德尔(起义)党，該党的各种活动曾促成旧金山謀叛案，該党創始人哈尔·达雅耳后来轉移到斯德哥尔摩活动。在伦敦，有好几个有組織的印度团体，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薩布尔季·薩格拉德瓦拉。在日本，有一个以腊什·卑哈利·鮑斯为中心的团体，他是为躲避德里-拉合尔謀叛案的审訊而逃出印度的。而在墨西哥，則有注定要成为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位领导人的印度流亡者 M. N. 罗易。^①

这些团体彼此之間保持着相当密切的接触，但缺乏协作。仇恨和阴谋是它們之間的关系的特征。例如，哈尔·达雅耳在描写侨居柏林的印度人时写道，“他們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互相爭吵和攻訐上面。”正如他所指出的，“他們无事可做，游手好閑，总是要惹事生非。”^②由此可见，要搜罗印度革命的先遣代理人，要动

^① 关于这些流亡团体的資料，請特別參閱《共产主义在印度，1924—1927年》(*Communism in India, 1924—1927*)，(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1927), pp. 322—378.

^② Har Dayal, *Forty-Four Months in Germany and Turkey* (哈尔·达雅耳：《在德国和土耳其的四十四个月》)，(London: P. S. King and Son, Ltd., 1920), p. 68.

員印度人口中形形色色的不滿分子，就首先要求有一个團結這些不滿分子的行動計劃。

当布尔什維克着手为印度制訂革命綱領时，自然会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是他們自己的那一套政治目标和方法，被系統地歸結为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其二是他們对印度形势的估計。因此，在着手研究印共政策和組織的起源以前，我們必須先看一看在 1920 年前后即已形成的两种背景或“环境”，即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基本观念和印度政治社会的基本特征。

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

当列宁和他的同志們首次在苏維埃俄国的新布尔什維克中堅分子中談起印度問題的时候，他們为这项任务提出了一套既灵活又富于教条色彩的有力理論。

列宁在不断解释变化不已的俄国社会形式的一生中，制訂了一套同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則結合在一起的政治战略和策略观念。事实上，这些观念一方面受到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现实情况的影响；至于影响的确切程度，无法在这里解答。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說对于比較广闊的历史輪廓具有一定的“看法”，但列宁則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因此，来自經驗的灵活性就成了他的战略和策略公式的一个显著特点。

但是，不論列宁的思想起源如何，他总是坚持用馬克思主义学說来为自己的思想辯护，并把它納入馬克思主义的总框框里。在这一步一旦完成以后，这些思想多少就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了。由于这种学說被看做是“科学”，因而它的一切原理也就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了。因此，列宁以后的共产党領袖們出于空想的热情，往往把先入为主的观念强加于现实上。至于列宁本

人，在把注意力轉向印度时，他似乎是本着一种既定的解释方式，通过三棱鏡去观察它的。

按照列宁主义的分析，在一定形势下制訂战略和策略，需要遵守一系列的固定步驟。第一个步驟是，判定这个社会所达到的历史阶段。按照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鉄的规律”的基本概念，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研究当时社会的主要經濟因素：当时的技术和生产水平以及当时支配人和生产方式之間的关系的法則。通过这样的研究，就可以确定它是封建社会、資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

在这以后，从邏輯上来說，第二个步驟是，确定不同階級在这个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同样，确定階級的作用也取决于馬克思主义关于各个階級在生产方式演变中所起的作用的基本概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定的階級关系始終是任何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征。

第三个步驟是，确定无产階級針對其他階級所采取的基本方針。无产階級要奋力打倒它的階級敌人，麻痹动搖的階級，取得对階級同盟軍的优势。用共产党的術語来說，它对待不同階級的方针是消灭，中立，取得領導权。这些基本方針就构成全盘的行动方針，亦即战略。

在进行这种分析的过程中，确定历史阶段（或“革命”阶段）显然具有根本性的重大意义，因为特定的战略适用于特定的阶段，而且要在这个阶段中自始至終起作用。因此，当共产党人无休止地爭論某一国家究竟是封建社会还是資本主义社会这类貌似学术性的問題（他們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或理論刊物上經常这样做）时，他們实际上是在辯論两种不同战略的前提。隱藏在看来是无謂的爭論背后的是现实的政治問題。

早在 1905 年，列宁在观察俄国的形势时就預见到两个主要的历史阶段（且不談遙远的第三阶段，即理想的共产主义阶段）：反封建主义的革命阶段和反資本主义的革命阶段。他为这两个阶段提出了两种基本战略，而这两种战略主要在对待資產階級的方針上面彼此不同。甚至直到今天，这两种基本战略仍然是共产党政策的基础。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地方应用它們，并輔之以不同的策略，因而有必要明确說明它們的含义。

列宁所闡述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即他本人直接面临的阶段，是反对当时封建专制政权的政治、經濟和社会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阶段。但令人費解的是，列宁在估价这一时期各个階級的作用时，断言俄国的資產階級不能領導完成它本身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說，大資產階級即壟断資本家一开始就会同专制制度合流，而中產階級則將保持动搖不定的立場，对专制制度时而支持，时而反对。只有下余的三个階級，即无產階級，貧农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才会为全面完成这种革命，彻底消灭封建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但这时，中產階級会支持某种革命行动。所以說，在反封建的历史阶段，共产党人必須全力領導这四个階級。

这种战略要求具有巧妙灵活的方針，当資產階級有“革命”傾向时就联合它，有“反动”傾向时就反对它。由于資產階級終將走向完全反革命的道路，因此这种战略规定只在資產階級本身表示願意的时候可以利用它，但同时也准备采取措施，削弱它的力量，使之在政治上无能为力。列宁把这种方針叫作“中立”資產階級，或“麻痺”它的“不稳定性”。

因此，按列宁的結論，反封建主义的战略是：无產階級必須取得对貧农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領導权，中立資產階級，消灭大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包括农民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①

按照列宁的看法，在第一个历史阶段发展到高潮时，资产阶级必然会同封建专制制度妥协，从而背叛它本阶级的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就有责任联合小资产阶级和贫农阶级一起去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第二种革命，即反资本主义革命过渡。这个新的临时政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将主要通过重新分配土地，消灭农村封建主义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经过这个中间阶段以后，新政权就着手建设社会主义。

在第二个历史阶段中，各阶级间将出现一种根本不同的关系，因而需要一种新的战略。共产党人这时应致力于领导三个阶级：无产阶级、贫农阶级、小资产阶级。在这个阶段，小资产阶级就像资产阶级在前一阶段一样，会成为一个动摇的和不可靠的同盟者。因此，反资本主义的战略的目的必须是，消灭资产阶级，中立小资产阶级（包括中农），并取得对贫农的领导权。

列宁是这样说的：

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贫农阶级〕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②

为了追求这两种主要的战略目标，列宁本人全心全意从事于制订政治策略准则的工作。按照共产党的说法，“战略”是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计画，“策略”是争取革命战役胜利的计画。换言之，战

①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5页。

② 同上。

略规定各階級間全部斗争的性质，而策略則规定这些階級的政治組織之間的个别斗争的性质。因此，战略的意思是指对长期行动目标作出规定，而策略的意思是指采用适当的斗争方式、組織形式和政治口号。^① 所謂斗争方式不外乎总罢工、农民暴动、城市起义，或者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統一战綫。組織形式可以是非法的或合法的共产党、所謂的工农党或“和平”战綫。而适当的口号則可能包含一个溫和的或战斗性的政治綱領。策略在某一阶段內是随着革命运动的消长而改变的。为了实现对某一階級所定的战略目的，共产党可以根据情况，采用多种多样的短期策略。

关于策略問題，列宁的主要論点是，需要作权宜的妥协，需要使策略措施符合当时的政治环境。

这一論点的表现之一就是，列宁坚决主张要把合法的和非法的、直接的和間接的斗争方式結合起来。他肯定地說，共产党人必須抓住一切机会，在群众中間展开工作。凡是可多少給群众一点影响的組織，他們都要公开或隱蔽地参加，不仅要参加工会和农民协会，也要参加議會和其他政治党派。他还說，即使是资产階級的政治組織，只要它有助于加强共产党的力量，就應該毫不猶豫地参加。在共产党本身被迫处于非法地位的时候，共产党人必須尽可能打入国家的机构。

在闡述对付其他政治組織的行动方針时，列宁提出了两种至今仍然有效的主要策略手段：“从上面”的行动和“从下面”的行动。“从上面”的行动就是指同非共产党組織結成正式联盟，列宁还举了社会民主党人同其他政党一同参加的“临时革命政府”作为例証。这种策略意味着通过同另一个組織的領袖的公开合作，对这

^① 这是我們用自己的話来闡述斯大林为战略和策略所下的定义，见《論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3—135頁。

个組織施加压力。列宁认为,只要“实际的机宜”允許,就應該采取这种行动。“从下面”的行动就是指公开攻击非共产党組織;就是指依靠取得另一个組織的組成部分或成員的同情,从內部或外部对这个組織施加压力。他說,我們“在任何場合下”,都必須采取这种行动。①

总之,按照列宁的說法,策略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建立一个公认的无产階級先鋒队的政党。但策略也必須为这样一个目的服务,那就是对其他政治組織施以影响,只要它們願意,尽管它們明天可能成为敌人。列宁始終不渝地強調了这一点。

要想战胜比較强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須极精細、极留心、极謹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資产階級之間以及本国資产階級各集团或各派別之間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暫时的、动搖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②

列宁对于战略和策略所持的见解,反映了俄国政治局面的特点,特別反映了他对俄国資产階級政治力量的藐視。但这些概念却包含在一整套为了普遍应用于全世界而提出的理論中。列宁以后为全世界不发达地区和殖民地(例如印度)提出的战略和策略,大部分都不过是这个既定观念体系的引申而已。③

印度的环境

要想考察 1920 年前后的印度政治形势,必須从研究印度的民

① 《列宁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6 頁。

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2 頁。

③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前述中譯本,第 97 頁。

族主义运动入手,因为印共政策的主要問題,就在于明确它对这支政治力量的态度。

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工具是印度国大党。它是一个无定形的組織,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派別,但在要求独立的共同願望下面統一起来。国大党成立于 1885 年,几十年来一直为一个充滿了外来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稳健领导集团所利用。这个組織的目的,只是想通过宪法手段,使更多的印度人能参加现有的政府机构。它声明效忠于英国統治当局,而且在它的领导人物中还包括許多英国人。所以英国当局对它采取一种容忍的、甚至是同情的态度。

但是,大約从 1900 年开始,国大党的领导集团就由于一种极端主义思想派别的兴起而遇到了反抗。这个派別由鉄拉克和廓什一流人物领导,他們把印度教复兴主义同富于战斗性的政治积极精神揉合在一起。他們想使国大党成为真正的反帝工具。在他們的影响下,1907 年国大党采取了在英帝国内部建立自治政府的目标。

但是,由于国大党本身是一支极端分子和稳健派混在一起的人数不多的知識分子队伍,因此它仍然是一个少数精銳的組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甘地登上印度舞台上以后,国大党才发展成熟,成为具有革命目的的群众运动。甘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使印度广大农村中的无知农民能够和西洋化的少数优秀分子联合起来,从而促进了印度民族主义的发展。甘地出身于吠舍种姓,受过英国教育,本来是可以躋身于小小的自由职业阶层,成为一个成功的律师。他受到企业界和自由职业界名流的尊敬。在他的领导下,国大党依靠这些名流提供的財政援助和专业技能而发展壮大起来。但甘地在思想和个性方面仍然保持着一种“印度精神”,

因而使他在群众中具有无比的号召力：对农民来说，他已成了圣雄，因而国大党也就成了真正的群众性政党。

在另一方面，甘地还发挥了一种极重要的创造性作用。他创制了异常适合于本国环境因素的政治策略。考虑到用武力对抗英国的成功希望极小，甘地便提出了诉诸良知的办法。他利用非暴力运动这一武器，使印度的孱弱发挥了作用。

非暴力运动包括多种反抗英国统治的和平方式，即抵制英货，以绝食对英国当局表示抗议，退出英国机关，破坏英国法律等。这些方法可以通过群众行动或一个领袖的象征行为加以运用。

但是，由于群众行动常常演成民众暴动，因此非暴力运动往往只限于由少数几个选定的牺牲者采取行动。从甘地严格坚持非暴力一点看来，他似乎是既要影响英国，又要向本国人民灌输道德教育。他认为，他的政治方法缔造了一所训练自我克制的学校。的确，他仅仅由于信徒们采取了一次暴力行动，就中止了1919至1920年的第一次大规模不合作运动。

非暴力运动对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和对手的性质都很相宜。由于英国政权允许有很大的公民自由，民族主义运动就可以任意采取和平的政治行动而不必担心遭受残酷的报复。由于外国统治还“允许自由”，国大党就靠有计划的牺牲而发展壮大起来。

而且，事实证明，英国人也还讲点良心。虽然他们没有充分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但也没有使这种要求完全落空，于是民族主义运动得到了逐渐走向自治的机会，因此激进主义没有什么机会抬头。由于和平的政治行动还能产生某种结果，暴力革命的纲领就不能激起群众的极大热情。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甘地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他所持的某些观念事实上是同半封建农村那种因袭守旧的环境相适应的，

因此他能喚起愚昧的农民采取政治行动，但这些观念也是阻碍物质和社会进步的絆脚石。在社会和經濟理論方面，从西方的标准来看，甘地显然是反对现代化的。在他的理想中，印度應該是許多小农村公社的联合体。这些公社由共同文化融为一体，但在經濟和政治上則保持自給自足。在社会政策方面，他反对取消种姓，并坚决主张保留传统的社会特权阶级，不过他也反对賤民地位。在經濟政策問題上，他反对技术进步，声称工业化和都市化是弊多于利的。在許多方面，例如在医药方面，他反对采用西方科学。他也不主张用任何强迫手段来消除經濟上的不平等，主张富者主动变成“保管人”，用他們多余的財產为穷人謀求福利。总之，根据甘地的信条，穷人是更幸运的，因为放弃物质目标是达到精神上完滿境界这一更高目标的先决条件。

看来印度社会里面至少有一部分人——受英国式教育的、逐漸扩大的知識分子阶层——对这种意識形态感到不滿。这个集团虽然并不一定想要擯弃一切传统原則，但他們是在西方观念的哺育下成长的，强烈希望印度的社会和經濟发展能够达到世界工业强国的水平。这个集团代表现代化政府必須采取的态度，而且具备现代化政府不可缺少的技能，因此它对于印度的前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旦英国人在印度退位，知識分子阶层很可能接管政权。

对这个有教养的集团的某些人來說，社会主义思想本来就具有一种吸引力，因为这种思想不仅提供了經濟、社会和政治迅速发展的綱領，而且还是一种有系統的哲学或人生观。对于具有信仰的意志和行动的決心而又反对传统原則的青年男女來說，社会主义是甘地主义以外的另一条道路。

知識青年的苦悶，想在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中发泄出来。一

种形式就是热衷于搞恐怖行动。这种行动出现在一些对英国統治特別不滿的地区，如孟加拉和旁遮普等地。恐怖行动始終是些无足輕重的现象，但却不时发生，通常表现为年輕阴謀者的拙劣暴行。

在鼓动工人和农民方面，左派知識分子还有一个更为有利的政治活动地盘。1920年以前，印度几乎沒有工会或农民組織。尽管国大党曾在这些受压迫的階級中进行工作，并试图从中吸收新党员，但它并没有作出任何系統的努力去建立階級組織，使之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附属机构。事实上，甘地提倡一种階級和平和階級合作的哲学，反对以階級利益打动人的任何做法。因此，那些出于政治野心或个人信念而一心想要提高无产階級或农民的自觉性并帮助他們組織起来的人，就在这方面有了活动的余地。

甘地领导下的国大党是最主要的民族主义代表机构，但还有其他几类人是国大党一时无法吸收的。虽然国大党自称代表全体印度人民，甘地也竭力主张各种宗教友好相处，但是有种种迹象說明，在印度次大陆上居于少数的穆斯林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穆斯林联盟成立于1906年，随后逐渐壮大，越发自有主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鴻沟并未在一个統一的民族主义組織中沟通起来。

不仅如此，民族主义也不是印度唯一的政治现实。印度次大陆分为許多不同的文化-語言区，共有大約十二个主要語言集团。使用这些語言的人，例如孟加拉族、馬拉地族，泰米耳族等，都属于不同的种族。他們之間的差异，早在印度历史上的上古或中古时期就已經存在。因此，全体印度人虽然都要求脫离英国統治，因而在这一方面团結起来，但是在另一方面，就由于在文化上和政治

上忠于各自的亚民族*而分裂了。民族主义运动尚未发展成熟，只有少数人具有真正的印度民族感。这样，民族主义运动在印度政治上就受到了地方分裂主义的挑战。

忠于地区語言的情緒有多种表现方式，它在政治方面的主要表现則是要求根据种族界限来重划邦界。英国人在划分印度行政区时，忽略了这些种族区分，因而一个語言集团竟被分入了四个省。要求按单一語言建省，只是人們强烈期望实现各亚民族自治的一种証明。因此，摆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面前的，是一项棘手而重大的任务：要制訂一个既能滿足全体印度民族的雄心，又能滿足境内各亚民族的願望的宪法方案。

最后，还有另一种因素不容易納入国大党内。英属印度与土邦之間的差別也使印度次大陆以及民族主义运动进一步分裂。英属印度拥有全印人口的四分之三，下余的居住在各土邦——五百六十二个独立小王国，其中有的小至数平方英里，有的像海得拉巴和克什米尔那样大，那样重要。这些土邦受英国批准的专制世袭王朝的統治。在这里，民族主义意識和民族主义組織出現得較晚。国大党的活动只限于英属印度部分，各土邦一般还是未曾开辟的政治活动园地，因此，国大党的敌手可以自由滲入。

总之，在甘地的领导下，国大党已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有实力的民族主义組織，但它并非沒有敌手，也并非沒有可供敌对政治思想利用的弱点。因此在 1920 年，印度国内的环境既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造成了障碍，也为他們造成了机会。共产党人的前途在

* 原文为 Subnations, 暫譯作亚民族, 下同。——譯者

注：关于 1955 年印度国内环境的詳細报道和重要分析，參閱迈龙·魏納：《印度的政党斗争》(Myron Weiner, *Party Politics in Ind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319 pp.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适应那个在多方面都很特殊的环境。

第二章 印度人加入共产国际

1915年4月，一个多年侨居海外而刚刚回国的印度人在馬德拉斯发表演说，帮助英国招募新兵对德作战。他说道，“我发现英帝国具有我所喜爱的某些理想。”在同一个月，另外一个印度人却离开印度去迎接一艘装有德国军火的船只，想把这批军火偷运入境，以便对英国发动革命。这两个人都热切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实行自治，但一个准备帮助印度统治者去抵抗敌人，另一个却勾结那个敌人去击败英国人。

二十七年以后，仍然统治着印度的英国人再度同德国人揪在一起，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上面所说的这两个印度人，为印度独立事业进行了多年的奋斗和牺牲以后，又发现英帝国在危难之中。但这一次，两个人却对调了角色。那个招募过新兵的人，现在发动了一个运动，使印度次大陆陷入一片骚动和混乱。而那个在1915年勾结英国敌人的人，现在却撰写小册子，支持盟国（从而也支持了英国）的战争努力。这两个人就是摩含达斯·加腊莫占德·甘地和馬納卡德腊·納特·罗易。

虽然都以印度独立为指路明星，甘地和罗易却采取了十分不同的路线。两人都游历过西方世界，并且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但显然被西方同化的实际上只有罗易；甘地则仍旧保持着浓厚的印度色彩。1930年以前，罗易运用他从欧洲经验中学得的革命方法，在国外展开斗争；而甘地则用他那些根据现代条件修改的古老观

念，在印度国内进行战斗。罗易企图通过暴力革命取得印度的独立；甘地则领导群众进行有纪律的非暴力行动。

在开始研究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之前，先谈一谈罗易的过去是有好处的，因为在1920年到1928年之间，他不仅从国外指导印度的共产主义活动，而且还向共产国际说明印度的情况，从而在决定共产国际对印度以及其他殖民地地区的战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罗易在共产国际内的地位可以说是升黜倏忽的，而了解一下此中的原因，对于理解印度共产主义运动这一阶段的发展是必要的。

罗易原名那冷德腊·那特·帕达札腊，1886年生于孟加拉的阿尔巴黎阿村。^①像许多孟加拉族的婆罗门一样，他在十几岁就对政治发生兴趣，未滿二十岁时已深深卷入了印度的独立斗争。孟加拉在本世纪初是一个很不平静的地方，恐怖主义者的武器硫酸弹和土制炸弹是热情革命者的标准装备，精良的革命武器是没有的。1914年欧战的爆发，似乎为取得这种武器提供了机会。

对德国人来说，印度为他们提供了大好机会：如果能在印度煽起武装革命，英国人就必须从欧洲前线撤出军队去扑灭革命，同时也不可能再把印度土著部队派往欧洲。考虑到这一点，德国人邀请在加利福尼亚建立过卡德尔党^②的印度革命者哈尔·达雅耳前

① 作者不能确切肯定罗易的出生日期。据罗易的一个表亲说，罗易生于孟加拉历1293年(公元1886—1887年)，一般公认是1886年。见《激进人道主义者》*Radical Humanist* XVIII (Feb. 7, 1954), p. 78.

② 以加利福尼亚警方资料为根据的有关卡德尔党的详细记载，见《第七号报告：加利福尼亚州的非美活动》(*Seventh Report: Un-American Activities in California*)，([Senate] Fact-Finding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Sacramento: California State Printing Office, 1953, pp. 213—246)。并参阅印共出版物：滥提尔·辛格：《卡德尔党英雄，1914—1915年旁遮普革命者的轶事》(Randhir Singh, *The Ghadar Heroes*)，(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5)。

往柏林。当时他正在瑞士。哈尔·达雅耳到德国以后，被邀请主持后来所谓的柏林印度独立委员会。德国人希望靠这个团体把军火私运入印度。

1914年9月，一个德国特工人员在美国购买了八千零八十支斯普临菲耳德牌步枪，两千四百支马枪，四百万发子弹，以及其他各种武器。^① M. N. 罗易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年底，柏林委员会给孟加拉革命者传来口信，通知他们说德国人准备送来武器和款项。^② 接着，一个印度密使就带着口信去柏林，要德国人在离印度最近的中立国爪哇交货。于是在美国的德国特工人员便作出了周密的计划，准备由“小牛”号海轮运送武器。卡德尔党人也参加了这项计划，并指派五名党员随轮护送。这批军火和五个印度人乘“安妮·拉逊”号从圣地亚哥出发，准备同“小牛”号在下加利福尼亚海岸外的一个岛屿那里相会。但这两艘轮船始终没有碰头，因为有一艘未按约定时间到达，另一艘则因不敢逗留而开走了。^③

“小牛”号于1915年4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彼德罗启航。

① Giles Taylor Brown, *The Hindu-Conspiracy and the Neutra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4—1917* (贾尔斯·泰勒·布朗：《印度教徒谋叛案与美国的中立，1914—1917年》),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istory, 1941), p. 32.

② M. N. Roy, "Memoirs" (M. N. 罗易：《回忆录》), *Radical Humanist* (《激进人道主义者》), XVII (Feb. 1, 1953), p. 54. 从1953年2月1日起到1954年9月5日止，罗易的回忆录连续在他所主办的刊物《激进人道主义者》上发表。这篇连载以下称作《罗易回忆录》。

③ Brown, *The Hindu-Conspiracy ...* (布朗：《印度教徒谋叛案与美国的中立，1914—1917年》), pp. 40—52. 并参阅约翰·普赖斯·琼斯和保罗·梅里克·霍利斯特：《德国特务机关在美国》(John Price Jones and Paul Merrick Hollister, *The German Secret Service in America*), (Boston: Small, Maynard and Co, 1918), pp: 264—267.

M. N. 罗易也在这个月离开印度前往爪哇。^①但“小牛”号并未到来，罗易便在6月間返回印度，带回的只是德国人給的一笔錢，而沒有軍火。^②8月間他再度离印去爪哇。这一次见到了“小牛”号，但船上并没有裝載武器。由于不願二次空手回国，罗易决定留在国外。他游历了中国、日本，最后于1915年底抵达旧金山来到美国，伪称是研究基督教神学的印度学者，馬丁神父^③。

M. N. 罗易在美洲

罗易害怕警方拘捕，沒有在旧金山勾留，就前往旧金山以南約三十哩的斯坦福大学。因为他听說那里有一些印度学生，还有一些同情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人。哈尔·达雅耳曾在該校短期任教，罗易一个孟加拉朋友的弟弟、以后成名的印度小說家檀·果巴耳·穆克季迎接了罗易。

罗易在他的回忆录中，除了說起他是在斯坦福大学取名M. N. 罗易的这一点以外，关于这个时期的情况談得很少。但这个时期却是一段重要的插曲，因为罗易是在那时遇到斯坦福大学的年輕毕业生伊夫林并且得到她垂爱的。当罗易約在两个月以后从西海

① Lt.-Col. Sir Cecil Kaye, *Communism in India* (陆军中校塞西耳·凱爵士：《共产主义在印度》)，(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1926), p. 4.

② 一位住在紐約的印度謀叛者占德腊·查格腊卑尔底拍給德国外交部长威美尔曼的一份沒有日期的电报，說明罗易第一次去爪哇时有另外两个印度人陪伴，留在爪哇的一个德国特工人員交給罗易两万五千荷盾。见厄尔·E. 斯珀里的《德国的阴謀詭計》(Earl E. Sperry, *German Plots and Intrigues*)，(Washington, D. C.: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8), p. 52.

③ Kaye, *Communism in India* (凱：《共产主义在印度》)，p. 4，以及 *Roy Memoirs* (《罗易回忆录》)(Feb. 22, 1943), p. 91. 伊夫林·罗易在“美共反对派”的机关刊物上写道：罗易从1915年起，在美国住了一年多。E. R., “M. N. Roy and India Communism” (伊夫林·罗易：《M. N. 罗易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Revolutionary Age* (《革命世紀》)，II (Sept. 28, 1931), p. 3.

岸前往紐約時，伊夫林隨他同去。他們在紐約同印度民族主義者取得聯繫以後，便籌劃前往德國參加柏林印度獨立委員會的工作。

當羅易到達紐約時，該地的印度人領袖是占德腊·查格腊卑尔底博士，一位在1910年前後來到美國的年輕的孟加拉族知識分子。查格腊卑尔底記述道，當他正同著名的德國載貨潛艇“德意志”號的艦長商量把羅易帶往德國時，羅易因伊夫林的父親打電報到紐約告發而被拘捕。據查格腊卑尔底說，伊夫林不顧她父親的反對，在監獄中同羅易結了婚，於是兩人便恢復了自由。^①

羅易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紐約的時候，他成了可敬的印度民族主義者拉拉·拉支巴德·腊伊的密友。這時他開始在美國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中間走動，因為他們自然是同情印度的獨立事業的。羅易說，就在這個時期，他開始在紐約公共圖書館閱讀馬克思著作。但他顯然還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因為他在以後兩年寫的主要著作中，並沒有流露這方面的影響。

如果在美國的印度人同德國特工人員沒有這樣多的瓜葛，他們大概還可以通過募捐和寫宣傳品繼續為印度獨立運動工作。但是，美國很愛護它的中立地位，所以便根據經常從英國情報人員那里得到的密告，對德國的陰謀活動警惕起來。1917年3月7日，在美國參戰前不久，警察逮捕了查格腊卑尔底和在紐約同他聯系的德國人。隨後又進行了幾次逮捕，最後有九十八名德國人和印度

^① Chandra Chakraberty, *New India* (占德腊·查格腊卑尔底:《新印度》), (Calcutta: Vijoyakrishna Bros., n. d. [1951]), p. 34. 羅易在他的回憶錄中並未談到自己的私生活，而且也沒有談到伊夫林——她不僅是他的妻子，而且在1925年分居以前還是他在工作上的重要助手。他把查格腊卑尔底說成是“虛偽的”，“油滑的”，是“一個騙子”，並聲稱當他在紐約時，並不知道“德意志”號這回事。他說查格腊卑尔底並沒有設法讓他乘這條船去德國。見《羅易回憶錄》(*Roy Memoirs*) (April 19, 1953), p. 186.

人因为与著名的印度教徒謀叛案有牽連而被解往旧金山审讯。① 罗易和他的妻子受到警方的訊問，但并未被拘留。② 不久罗易再度被传訊，說他违反移民法。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当时同德国阴谋活动的关系，是有限的或是很隱蔽的。他始終沒有因违反移民法的罪名而受审，因为他和伊夫林逃到墨西哥去了。③

到了墨西哥，罗易馬上就去同德国人联系。德国人认为，罗易不仅在开展印度的革命方面有用处，而且在同美国的印度人保持联系方面也有用处。因此他們給了他很大一笔錢，让他自由支配。罗易曾經提到过一笔五万金比索，④ 一笔五万美元的款項。⑤ 根据他自己的記載，他把这笔錢分給了許多革命同志，数目从二千到一万美元不等。

在墨西哥，罗易“学会了享受美好的生活”。他在回忆录中追忆道，“我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他在墨西哥城的住宅是“一所坐落在豪华的羅馬区的房屋，摆着綠緞罩面的路易十五式的家具。”客厅是“一間长方形房間，临街那边有几扇长窗，很适于改装成新式教堂里面专供私人使用的礼拜堂。”罗易开始騎馬，聘請了一位教授語言和象棋的教師，經常出入时髦的咖啡館，周旋于首都国际社交界的上层人士之間。⑥

他还結識了一些激进的美國人，如查尔斯·弗兰西斯·菲立普斯(別名弗兰克·西曼)、林·A·E·盖耳、迈克尔·戈尔德(別名

① 关于这次审讯的詳尽报道，见布朗：《印度教徒謀叛案与美国的中立，1914—1917年》(Brown, *The Hindu Conspiracy...*), pp. 75—99.

② *New York American* (《紐約美国人报》), March 12, 1917, p. 1.

③ *Roy Memoirs* (《罗易回忆录》), (Feb. 15, 1953), pp. 79—80.

④ 同上, (May 10, 1953), p. 222.

⑤ 同上, p. 224.

⑥ 同上, (May 31, 1953), pp. 258—259; (June 7, 1953), p. 270; (June 14, 1953), pp. 282—283.

欧文·格兰尼契)、卡尔顿·比耳斯、亨利·格里敦坎普等人——其中有几个是逃到墨西哥来躲避兵役的。他开始跟着这些人为墨西哥报刊写稿,并站在墨西哥一边对美国表示不满。墨西哥政府自然同情这些活动,罗易甚至说他成了卡朗札总统的私人顾问。他还用西班牙文出版一些小册子和一本一百八十九页的关于印度的书。这本书是这个时期的典型民族主义论著,内中指出,在英国人来到以前,印度人是富足的,团结的,而且几乎百分之百都是识字的。^①他们今天的贫困、不团结和落后,完全是英国的分裂、统治和剥削政策造成的。尽管从罗易在1919年8月替《盖耳》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②可以看出一些受了社会主义影响的痕迹,但在这本书里却找不到罗易后来接受的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影子。

墨西哥作为指导印度革命的据点是太远了,不久罗易便对这一方面的工作失却信心。“到达墨西哥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同印度完全失去联系。有整整两年,我几乎得不到一点消息,对于国内的情况一无所知。”^③德国一旦战败——这当时已经指日可数——他将得不到对印度革命工作的政治或经济支援。他深信在最近的将来不能对印度的解放事业有所作为,便在墨西哥“全心投入于大有可为的另一种革命活动”。

1919年夏季,在墨西哥城各左派集团中间展开了一个组织全国性社会党的运动。罗易对此极其热心,并开始资助弗朗西斯科·

^① 罗易在该书中写道:“历史告诉我们,在印度教君主统治下的印度人民,几乎都是识字和有教养的。每日读几段经是印度教徒喜爱的课业。因此在那个时期中,印度人民几乎不知道有文盲这回事。教育在印度一向是免费的。”M. N. Roy, *La India: su Pasado, su Presente y su Porvenir*(M. N. 罗易:《印度: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Mexico: 1918), p. 122.

^② M. N. Roy, “Hunger and Revolution in India”(M. N. 罗易:《印度的饥荒与革命》), *Gale's* (《盖耳》杂志), III (Aug. 1919), pp. 9, 25.

^③ *Roy Memoirs* (《罗易回忆录》), (Aug. 30, 1953), p. 414.

塞万提斯·洛佩斯主办的小报《社会主义者》。当墨西哥社会党于1919年8月25日至9月4日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时，罗易承担了各项费用，并和他的妻子主持了多次会议。在会议期间，路易·摩罗内斯的代表资格问题引起了争论。左翼在林·盖耳的领导下，指摘摩罗内斯是塞缪尔·龔帕斯的代理人。为此举行了两次表决，两次都不分胜负。在第三次投票时，罗易以主席的身分投票同意了摩罗内斯的代表资格。从此他就被左翼斥为右派分子。会议结束后不久，盖耳集团举行了一次会后会议，自称为墨西哥共产党。^①

盖耳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记载，在现有材料中最为详尽，但是这些记载却很值得商榷，而且本身也存在着许多矛盾，足以使人对于一些无法同其他资料对证的地方感到怀疑。盖耳告发说，这次会议的发起邀请书是由罗易起草并得到第二国际同意的。他还说：

在会议前两三个月，罗易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即使到开会的时候，也有理由怀疑他是否已经完全信奉社会主义。1919年1月17日他写信给我说：“我本人不是一个激进派，我同任何激进派集团都没有联系，因此我不可能得到他们对任何计划的支持。”^②

盖耳说，代表会议以前，罗易的唯一兴趣在于就印度问题发表演说和写作。在墨西哥和罗易相识的一个美国人卡尔顿·比耳斯曾经写道：

除了希望印度独立以外，他决不是一个激进派，因为他坚决拥护童

① Linn A. F. Gale, "Gompers Dominates Mexican Socialist Conference; Communist Party Organized" (《龔帕斯控制着墨西哥社会党代表会议；共产党的组成》), *Gale's* (《盖耳》杂志), III (Sept., 1919), pp. 7-8, 25.

② 同上, p. 8.

婚、种姓制度以及至今妨碍印度成为独立国家的许多恶劣风习。①

在比耳斯的印象中，罗易是一个印度王公。

9月間，即社会党举行代表会议的月份，一位苏联客人来到墨西哥城。他就是F·格魯岑堡(后来以米哈伊尔·鮑罗廷见称)，一位冒充俄国商务代表的共产国际代理人。鮑罗廷看到墨西哥报纸《墨西哥先驱报》的定期英文版具有社会主义色彩，便访问了该报编辑查尔斯·菲立普斯。菲立普斯把鮑罗廷介绍给罗易，他们两人成了好朋友，鮑罗廷还搬到罗易家里去住。罗易说，“我们相互学习，最初是我得到了好处。他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奥秘传授给我，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钥匙。”②

罗易说，他有一次邀请卡朗札总统吃饭，并把鮑罗廷介绍给他。③结果，卡朗札总统让鮑罗廷利用墨西哥的外交途径同莫斯科联系。此后不久，据罗易说，鮑罗廷告诉他列宁要他到俄国去。卡尔顿·比耳斯回忆道：

我后来发觉，鮑罗廷曾告诉罗易说，如果罗易想在墨西哥建立一个共产党，就得想法自己来充当出席莫斯科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而鮑罗廷则愿意帮助他促进印度的独立。这个机会对于罗易来说，要比他远离革命活动现场闲住在墨西哥好得多了。④

要“建立一个共产党”并不容易，因为盖耳集团已经自命为共产党，对罗易当然不友好。罗易想让社会党改名，但未成功。据比耳斯说，罗易于是“不得不同他的小集团退出社会党，而成立第二个共

① Carleton Beals, *Glass Houses* (卡尔顿·比耳斯:《玻璃房子》)(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38), p. 44.

② *Roy Memoirs* (《罗易回忆录》)(Aug. 9, 1953), p. 379.

③ 同上, (Aug. 23, 1953), p. 402.

④ Beals, *Glass Houses* (比耳斯:《玻璃房子》), p. 50.

产党——六个党员和一只花猫。”^① 这个集团派罗易和菲立普斯为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菲立普斯取道古巴前往莫斯科。罗易和他的妻子则于1919年11月间，用署名V·加西亚先生与夫人的墨西哥外交护照前往西班牙，然后从陆路去柏林。他们在墨西哥留下了三个对立的激进集团，其中两个集团要求别人承认它们是正统的墨西哥共产党。

对于罗易来说，柏林只是前往莫斯科的中途站。在德国得势时指导过流亡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活动的柏林委员会，现在已经失去了主要的力量源泉——德国人的黄金。因此罗易在经过柏林时，满可以相当冷淡地对待柏林的印度人。尽管柏林委员会的首要人物维冷德腊那特·札多巴塔雅当时正在斯德哥尔摩，罗易却会晤了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普奔德腊那特·杜达和詹巴格腊曼·比来。他在回忆录中表示，他用不着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并且由于他们坚持要他说明德国人在墨西哥给他的金钱的去路而感到烦恼。^② 但他对德国共产党人却极感兴趣，他多次出席德国共产党的会议，而且同海因利希·布兰德勒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颇为友好。他写道，“这次经历使我获益非浅，塔尔海默费了很大力气用英语为我翻译会议的发言。……他们对我很友好、热情而尊敬”。^③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墨西哥的盖耳集团也选出了一个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但是没有一个人代表筹得出旅费。结果就把代表资格证书给了

① 同上。

② *Roy Memoirs* (《罗易回忆录》) (Nov. 8, 1953), pp. 534—536.

③ 同上, (Oct. 18, 1953), p. 505.

石本敬吉。石本是一个日本青年，曾在一年前訪問过墨西哥，并曾从紐約来信說他准备到莫斯科去。盖耳把一份关于墨西哥共产主义运动的詳細报告交給石本，希望这份报告送交莫斯科后，能使罗易威信扫地。^①

关于罗易在苏联首都受到的接待，我們只能凭罗易自己在多年后所写的回忆录来了解。他說列宁很热誠，他們曾就殖民地地区的战略和策略問題进行了几次私人談話。石本究竟有沒有去到莫斯科不得而知；如果去了，也看不出他带去的报告对罗易有什么損害。

在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罗易同他的妻子伊夫林十分活跃。罗易并不是大会上的唯一印度人，而且事实上他是代表墨西哥，而不是代表印度的。^②菲立普斯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以別名弗朗克·西曼出现在正式記錄上。印度代表团由阿巴尼·穆克季和一个名阿札腊的人（大概就是M.P.T.阿札腊）組成。穆克季于1914年在孟加拉与罗易結識，大約在罗易第一次去爪哇时，曾被派往日本。^③阿札腊在1908年离开印度，去欧洲和美国旅行。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印度人中，只有罗易因为是墨西哥代表团团长而享有表决权。伊夫林·罗易、穆克季和阿札腊只有发言权。罗易夫妇（他俩以“艾伦”名字参加这次大会）都是殖民地問題委员会成員，罗易代表墨西哥，伊夫

① 报告本文见《墨西哥共产党致第三国际的报告》(Report of Communist Party of Mexico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Gale's* («盖耳»杂志), III (March, 1920), pp. 6—7, 26—27.

② 直到1925年，罗易仍然用墨西哥护照旅行。 *Masses of India* («印度群众»), Nos. 2—3 (Feb.—March, 1925), p. 2.

③ A. K. Hindi, *M. N. Roy, the Man Who Looked Ahead* (A. K. 辛底: «M. N. 罗易: 高瞻远瞩的人») (Ahemedabad: Modern Publishing House, 1938), p. 26.

林代表英屬印度。^①

列宁自己原已写好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政策提纲并已交代表们传阅，但是罗易在回忆录中说，在私人谈话中，列宁对罗易的观点十分赞赏，所以要求罗易为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另拟一份提纲。他还说，列宁曾把罗易的提纲草案提交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并曾声称，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已对自己的提纲发生怀疑。^② 不论是否受命于列宁，罗易的确写过另一份提纲并提交代表大会。罗易的提纲对印度中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作了完全不同的估价，因此与列宁的提纲根本不同。在代表大会的辩论中，两份提纲都作了修改，并且都得到通过。尽管文字上的修改冲淡了两个文件的矛盾，但是那些矛盾仍然能使人在日后作出种种相互抵触的解释。^③

① 关于印度代表团的材料，取自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几种正式记录：*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roceedings*（《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Moscow: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20），500 pp.；*Der Zweite 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Hamburg: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21），pp. 780—788；*Vtoroi kongress kommunisticheskogo internatsionala;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Petrograd: Izdatel'stvo kommunisticheskogo internatsionala, 1921），682 pp.；*Vtoroi kongress kominterna; Protokoly kongressov kommunisticheskogo internatsionala*（《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记录》），（Moscow: Partiinoe Izdatel'stvo, 1934），pp. 619—625。盖耳提到过一个名叫乔斯·艾伦的人在两个“共产党”破裂后担任过墨西哥社会党的国际书记，因此罗易使用“艾伦”这个名字是令人诧异的。见《盖耳杂志》（*Gale's*），III（Sept., 1919），p. 7。

② *Roy Memoirs*（《罗易回忆录》）（Jan. 24, 1954），p. 43。

③ 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修改的罗易提纲，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roceedings*，pp. 114—117）。令人不解的是，在大多数正式文件中转载的罗易提纲都是未经修正的。这个错误直到1934年才发现，这就增加了作出矛盾解释的可能性。见艾伦·S. 惠廷：《1917—1924年苏联的对华政策》Allen S. 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p. 56；

列宁关于殖民地地区的战略

列宁和罗易的主要分歧点体现在列宁提綱草案第 11 节中：

11. 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或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要特別注意以下各点：

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須帮助这些国家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运动；首先是落后民族在殖民地关系或財政关系上所依賴的那个国家的工人，有义务进行最积极的帮助。^①

当时的一家俄国报纸对罗易的論点作了如下报道：

罗易同志得出結論說，必須从民族問題提綱第 11 节中，删去所謂各国共产党必須帮助东方各国的一切資產階級民主解放运动这一段文字。共产国际只能帮助組織和发展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印度共产党只能完全致力于組織广大群众，为其階級利益进行斗争。^②

罗易终于使列宁提綱作了詞句上的修改，但改动极小。最成問題的一节最后通过如下：

11. 在封建制度或宗法制度或宗法农民制度占优势的落后国家或民族中，要注意以下各点：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須积极支持革命解放运动；支持的方式应由共产党——只要有的話——根据现有条件研究决定。^③

根本性的修改在于删去“資產階級民主解放运动”字样而代之

E. H. 卡尔：《1917—1923 年的布尔什維克革命》（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III（London: Macmillan, 1953），p. 252 n.

① 《列宁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29 頁。

②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s reported and interpreted by the official newspapers of Soviet Russia*（《苏俄官方报纸对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道和看法》），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0），p. 43.

③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roceedings*（《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會議記錄》），p. 574.

以“革命解放运动”。在列宁心目中，这显然是字面的改变而不是实质的改变，因为他在辯論时宣称，“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①。按照列宁的說法，这种运动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并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列宁所称的第一个革命“阶段”——它就是“革命性的”。

罗易的战略和策略

罗易同列宁的分歧，即使从他那个經過修改而为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提綱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这个提綱中辯称，在附庸国家中有“两种不同的运动”，而且二者日益分道揚鑣。一种是“以在资产阶级統治下实现政治独立为綱領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另一种是“貧苦无知的农民和工人为摆脱各种剝削而采取的群众行动。”他說，前者力图控制后者，对此共产国际应该設法加以防止。他认为首先必須完成的任务是建立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会把农民和工人組織起来，领导他們进行革命和建立苏維埃共和国。他說，反帝斗争不应该被理解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願望”。

列宁提綱提到殖民地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又說那里的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 这就是說，在殖民地中，目前还没有重要的无产阶级政党。罗易的提綱却持相反的看法：

8. 殖民地解放运动的真正力量已經不限于一小撮资产阶级民主民族主义分子了。在大多数殖民地中，已經存在着力求密切联系劳动群众的、有組織的革命政党。（共产国际同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关系，应该通过这些政党和团体来建立，因为它们們是各該国家工人阶级的先鋒队。）它們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1頁。

* 同上，第129頁。——譯者

今天虽然不很强大，但却反映了群众的願望，而后者将会跟随它們走向革命。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必須同这些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政党合作，并通过它們給整个革命运动以一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

9. 殖民地的革命在最初阶段还不会成为共产主义革命。但如果共产主义先锋队一开始就掌握了领导权，革命群众就不会被导入歧途。^①

总之，列宁和罗易在战略和策略上都有分歧。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在性质上是革命的，因此共产党人应该加以支持。罗易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不是革命的，所以不值得給予支持。列宁希望共产党人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組織合作，因为这些組織是反帝的，而且列宁认为当时并不存在具有任何重要性的无产阶级組織。罗易坚决认为，殖民地有重要的无产阶级政党，因此共产党人应该首先同这些政党合作，而不是同资产阶级的組織合作。这些分歧是根本性的，而且后来看来越来越严重。

罗易为什么要反对列宁

既然罗易作为一个馬克思主义理論家的經驗有限，人們不禁要問：他初次参加国际共产党集会，为什么就那么情不自禁地对苏联最伟大的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理論提綱表示反对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不是简单的。毫无疑问，这主要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亚洲人自然就认为亚洲人要比欧洲人更能了解亚洲的情况；同时他也許还怀着某种不滿，觉得列宁不該妄自为他沒有亲自經驗的广大地区制訂战略。毫无疑问，俄国人把亚洲革命基本上看成是欧洲斗争的附属品，但是罗易和其他亚洲人却往往反对这样強調

^①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roceedings*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會議記錄»), p. 578.

欧洲,因为在他們看来,欧洲就好像是共产国际发誓要与之斗争的帝国主义一样。

罗易的论点虽然是用一些普遍适用于所有殖民地地区的理论词句构成的,但基本上是按照他对印度形势的看法提出的。因为他除了在1915年去旧金山时曾路过远东略事游历以外,他只对印度和墨西哥有直接的了解。另外也可能是因为,像当时的其他许多印度人一样,他所以投向共产国际,并非出于思想信仰,而是因为共产国际能为他在印度的反帝斗争提供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正像以前德国政府所做的那样。

虽然罗易现在是一个共产党人,但仍不失为一个印度人,对于印度他自有一定的看法——即极端主义的看法,这从他早期拥护恐怖主义活动就可以看出。关于他这种极端主义,还可以从他在墨西哥写的那本关于印度的著作中找到更多的证据。这本书的绝大部分读起来很像当时道地的反英小册子,但其中有一个特点,使它与众不同,那就是它强调暴力。“印度决不能靠英国统治者发善心来摆脱英国的统治”;罗易写道,“唯一的方法就是流血革命,不管这种革命在当前形势下显得多么冒险。”^①国大党所采取的温和的议会道路受到了罗易和他的恐怖主义伙伴的蔑视,而且在罗易已经成为共产党人以后,他反对那种实际上信凭国大党比任何其他印度组织都富于革命潜力的战略,当然就不是反常的举动了。他怎么能同他和他的行动派同志看得一钱不值的、纯粹的“讨论会”合作呢?

此外,更加实际的考虑也许起了一部分作用。罗易同资产阶级

^① Roy, *La India: su Pasado...* (罗易:《印度: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pp. 174—175.

級的印度国大党显然并没有什么密切关系，他的接触面几乎只限于孟加拉族和旁遮普族的革命团体，而同后者的关系是通过加利福尼亚的卡德尔党成员建立起来的。何况，正像罗易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他在墨西哥那两年，已经“同印度完全失去联系。”而柏林委员会却同国大党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个委员会的领袖维冷德腊那特·札多巴塔雅是萨洛季尼·乃都的兄弟，乃都又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最有地位的妇女和甘地最亲近的信徒。如果共产国际决定直接支持印度国大党，那么札多巴塔雅就比罗易更有资格充当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假定札多巴塔雅顺从的话，事实证明，他的确是顺从的。

罗易在柏林时可能已经觉察到，札多巴塔雅集团会在这个基础上同共产国际接头。总之，英国刑事调查处后来报道说：1920年10月，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两个月，札多巴塔雅的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意见书，建议把欧洲的所有印度革命者都组织起来。^①

罗易颇有才能，但极为骄傲，他不想充当札多巴塔雅的副手。^②只要共产国际倾向于支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札多巴塔雅就会威胁罗易的领导地位。因此，切身利益可能诱使罗易竭力贬低

① Kaye, *Communism in India* (凯：《共产主义在印度》)，pp. 1—3.

②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结识罗易的英国共产党人 J. T. 麦尔菲对罗易作了这样的描写：他“身材修长，头发乌黑，目光炯炯，是一个漂亮的婆罗门。……他是我所遇见过的印度人中最傲慢的一个。”J. T. Murphy, *New Horizons* (J. T. 麦尔菲：《新天地》)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1941), p. 240. 罗易在他的回忆录中评述这一段话说：“即使说不是傲慢，我确实总是很矜持的。在我初接触到现代观念和现代文化时，这种态度是一种自卑感的表现。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又学会了容忍与谦虚。”*Roy Memoirs* (《罗易回忆录》) (May 3, 1953), p. 210. 一个在这个时期认识罗易、后来叛变了印度共产党人曾经写道：“他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自高自大，脾气暴躁，经常力图把他的意见强加于人。”Abdul Qadir Khan (阿卜杜耳·夸底尔·汗), *The Times* (London), (伦敦《泰晤士报》), Feb. 25, 1930, p. 16.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對共產黨人的價值，而渲染無產階級運動的重要性。

列寧當然無意同資產階級政黨直接合作，但印度國內既沒有共產黨，國外又沒有一個真正印度共產黨人的組織。而且，列寧對印度的情況也有充分了解，他知道，羅易所說的“有組織的革命政黨”要發展成為真正的共產黨，還需要一些時間。據一個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法國共產黨人說：

列寧對他[羅易]作了耐心的解答：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內，印度共產黨將只是一個黨員很少、力量微薄的小黨，不能以自己的綱領和本身的活動贏得相當數量的農民和工人。但是，在要求民族獨立的基礎上，它就有可能動員廣大的群眾——經驗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而且只有在那種鬥爭的過程中，印度共產黨才能建立並發展它的組織，使之達到在一旦民族要求得到滿足時可以向印度資產階級發動進攻的地步。^①

不論列寧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對印度情況的分析，使札多巴塔雅比羅易更有理由成為領導共產國際對印工作的人選。

但是要在共產國際中爭取一個重要地位，羅易具有若干有利條件。第一，他同米哈伊爾·鮑羅廷友好，而且得到他的支持。第二，首先來到莫斯科的是羅易；而且柏林的革命者在德國戰敗而停止了對他們的經濟支援後陷入混亂狀態，這時還沒有恢復過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條件，羅易是一個能干的辯論家，又有一個同樣能干的妻子。他對於馬克思主義和印度情況的了解，足以讓俄國人相信他是一個具有良好理論基礎的共產黨人，善於敏銳地分析印度的革命潛力。在關於殖民地問題的辯論中，他得到了表

^① Alfred Rosmer, "In Moscow in Lenin's Days: 1920—1921" (艾爾弗雷德·羅斯默：《在列寧時期的莫斯科：1920—1921年》),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新國際》), XXI (Summer, 1955), p. 109.

现这两种才能的大好机会。而且作为迫使伟大的列宁作出让步的人，他无疑也树立了相当的威信。

但是，尽管罗易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十分出人头地，他并没有立即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正式记录表明，罗易同荷兰代表斯尼弗力(以后在中国叫作馬林)曾力促代表大会增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亚洲代表名额(当时那里只有一个亚洲人，即片山潜)，但罗易却说他沒有接受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位，不过并没有拒絕在推选中被选入共产国际最高决策机构即掌握大权的五人“小型政治局”。^①正式记录并没有证实这一点，但的确记载：罗易在1922年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1924年成为有表决权的正式委员，同时还参加了主席团。

罗易在共产国际组织中迟迟不得势的原因可能有二。第一种原因关系到英苏关系的微妙情况，这是由于英国指责俄国人干预印度引起的。不让罗易进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可能就是为了不冒犯英国外交部。另一种可能性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俄国人可能并不十分想通过罗易来贯彻他们在印度的全部工作。这样一种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在札多巴塔雅提出了组织旅居欧洲的印度革命者的建议后，俄国人曾请他到莫斯科去详谈这项计划。他在莫斯科见到了列宁，列宁答应支持他的建议，条件是，札多巴塔雅能够拿出印度一些主要革命人物签署的某种委任状。因此他返回柏林，去为他的领导身分准备证件。1921年2月，俄国人叫他

^① *Roy Memoirs* (《罗易回忆录》) (Feb. 28, 1954), p. 98. 关于罗易是否是这个机构的成员，作者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珍妮·德格腊斯列举了“小型政治局”五个成员的名字，但并未提到罗易。Jane Degra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Documents* (珍妮·德格腊斯：《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43年》)，I (London: Oxford, 1956), p. 453.

让所有有組織的印度团体都推派代表随他到莫斯科去。札多巴塔雅要求推迟到4月，但到了3月，他已經把一批印度人聚集在柏林。于是一位苏联代表就来到柏林，并从柏林帶了一份同情的报告返回莫斯科。接着莫斯科就給札多巴塔雅寄来一笔錢，让他的代表团能到俄国首都来。^① 在談到他們这次的訪問以前，有必要先看一看 M. N. 罗易在莫斯科同札多巴塔雅进行談判期間的活动。

M. N. 罗易到塔什干去的使命

按照《罗易回忆录》的記載，共产国际执委会小型政治局的最初計劃之一是，为亚洲詳細拟訂一套革命战略。政治局通过两项決議：其一，在巴庫召开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其二，在塔什干成立共产国际中亚細亚局。罗易写道，他反对召开巴庫代表大会的主张，他把这次大会說成是“对于時間、精力和物质资源的毫无意义的浪費。”^② 但他却急于看到中亚細亚局建立起来并开始工作。由于全神貫注在这个計劃上，他拒絕出席巴庫代表大会，并建議由阿巴尼·穆克季前往参加。^③ 中亚細亚局終於成立，由罗易、格奥尔基·薩法罗夫和 M. 索科尔尼科夫組成，由后者担任主席。^④ 罗易极想去塔什干，并想从塔什干的印度流亡者中間招募一支解放印度的队伍。这些印度人都是哈里发反英运动分子。这个泛伊斯兰运动兴起的原因，是因为穆斯林反对那个摧毁了土耳其哈里发制度*的色佛尔和約。在本世紀二十年代，这个运动在印度

① Kaye, *Communism in India*(凱:《共产主义在印度》), pp. 1—2.

② *Roy Memoirs* (《罗易回忆录》)(Feb. 28, 1954), p. 98.

③ 关于巴庫代表大会的詳情，见卡尔:《1917—1923年的布尔什維克革命》(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III, pp. 260—268.

④ *Roy Memoirs* (《罗易回忆录》)(Feb. 28, 1954), p. 98.

* 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继承人的尊称。

穆斯林中間深入人心，并且因为得到甘地的支持，一度导致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間的罕见的合作。

作为抗議行动的一部分，千百个印度穆斯林都变成香客离开了印度，希望或者参加土耳其穆斯塔发·基馬尔·帕夏的軍隊，或者只是在一个由穆斯林統治的国家里安居下来。許多人因为阿富汗国王曾經答应給以热情的招待，就到阿富汗去了。但是后来发现招待并不很周到，他們就变成了一帮貧困潦倒的人。罗易希望其中的許多人会到塔什干来組織一支解放軍。

罗易从莫斯科帶了两車厢的武器、一些金块和印度币到塔什干去。^①他把一些印度人(从印度軍隊中开小差出来的巴檀族)、波斯人和其他一些中东人組成了他所說的紅軍第一国际旅。

罗易到了塔什干不久，就听說土庫曼叛軍俘擄了一队印度香客，并对他們很残暴。于是一支紅軍分遣队就被派往那个地区，設法把五十人左右的一批香客，以答应接受軍事訓練为条件带回到塔什干来。当时邵加德·烏斯瑪尼也在其中，这个人后来在开展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正是烏斯瑪尼为我們留下了关于塔什干情况的詳細記錄。^②他說，当他到了塔什干时，他发现当地有两派“职业革命者”。一派由 M. N. 罗易領導，包括阿巴尼·穆克季和穆罕默德·阿里。另一派的首領是阿卜杜耳·腊勃，他得到了 M. P. T. 阿札腊和卡黎耳·貝(土耳其恩維尔帕夏的舅父)的支持。在烏斯瑪尼手下的那批香客中，有的人，包括烏斯瑪尼在內，参加了罗易一派，有的人参加了腊勃一派，其余則形

① 同上，(March 21, 1954), p. 138.

② 见邵加德·烏斯瑪尼：《从白沙瓦到莫斯科》(Shaukat Usmani, *Peshawar to Moscow*)(Benares: Swarajya Publishing House, 1927)，及所著《两次会见斯大林》(*I Met Stalin Twice*)(Bombay: K. Kurian, 1953)。

成一个“中立”派。

罗易开始用共产主义理论来教导他这一派。他回忆道，“道理十分清楚，对这批移民做工作要想取得一些成绩，首先应该把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从狂热之徒中分化出来。因此，我首先着手对受过教育的少数人进行政治教育。”^①有的人依然无动于衷；另外一些人显然感应强烈，开始以他们过去献身于哈里发反英运动的狂热献身于共产主义。各个派别之间经常不断发生争吵。这些新的共产主义皈依者打算组织一个“印度共产党”。罗易声称，他虽然不赞成这个主张，但只好同意。穆罕默德·沙菲赫成为这个党的第一任书记，乌斯玛尼也在党内起了积极作用。

罗易在塔什干的工作得到了他的妻子伊夫林的帮助。罗易的一个共产主义门徒阿卜杜耳·夸底尔·汗后来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但常为《泰晤士报》撰写有关这方面活动的稿件。在谈到伊夫林当时所起的作用时追忆道：

就他的 [M. N. 罗易的] 真诚的共产主义信念而言，其中有绝大部分是从他那个有才华的加利福尼亚妻子伊夫林·罗易那里来的。她是已故的拉拉·拉支巴德·腊伊的旧友和同事，对于进一步彻底解放印度妇女这一类问题极为热心，迫切期望她还没有亲自了解的那个国家能爆发革命。但是后来，她对国外那批印度革命者逐渐感到厌倦，对他们目标从不一致，彼此猜嫉，不能合作等深感不满。^②

这所设在塔什干“印度馆”内的学校只开办了短短一段时间，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印度人在这里受过训练。有一位熟悉当时情形的作者断定是三十六人，看来也不会再多多少。^③ 鉴于那里的争

① *Roy Memoirs* (《罗易回忆录》)(May 2, 1954), pp. 210—211.

② *The Times* (London)(伦敦《泰晤士报》), Feb. 25, 1930, p. 16.

③ Saumyendranath Tagor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India* (扫莫盈德腊那特·泰戈尔：《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

吵和宗派活动，很难說取得了什么重要成就。許多学生要求学习飞行，結果就让几个人接受了訓練，虽然很难想像这样做的目的何在。1921年初，当罗易被召前往莫斯科时，他把他的三个学生邵加德·烏斯瑪尼、阿卜杜耳·馬季德、阿卜杜耳·加比尔·塞赫賴帶到莫斯科去接受进一步的政治訓練。阿巴尼·穆克季則被留下来主持塔什干的工作。

罗易的敌手訪問莫斯科

罗易被召去莫斯科参加欧洲印度革命者的會議，札多巴塔雅集团也受到邀請。俄国人显然想利用这次會議，在印度建立起有力的宣传和組織机构。札多巴塔雅一派沒有如期到达，因此在他們来到以前，罗易获有充裕的时间同俄国人討論形势，并报告他在塔什干的活动。根据英国刑事調查处的資料，罗易认为札多巴塔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支持民族主义者是违背共产主义原則的。难道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殖民地提綱沒有对这一点提出过告誡嗎？

札多巴塔雅于5月間到达莫斯科，同来的有普奔德腊那特·杜达、那黎尼·古普塔、G. A. K. 卢哈尼和一个名叫坎果季的馬哈拉施特拉族人。代表团中还有阿格納絲·史沫特萊，她同札多巴塔雅已經合作了一段时间。在罗易看来，她是这个集团的“动力”。^① 罗易认为，正是她在卢哈尼的协助下，草拟了一份同罗易向

(Calcutta: Red Front Press, 1944), p. 3. 罗伯特·C. 諾思在加尔各答发现了这部罕见的著作并打下了一份副本。諾思先生曾把这份副本提供本书作者参考，謹此表示深切感謝。这本书提供了別处未见的詳細材料，但是由于該书对 M. N. 罗易持有很深的成见，里面还有几处同事实不符，因此在参考时必须慎重。

① 邵加德·烏斯瑪尼說，M. P. T. 阿札腊和阿卜杜耳·腊勃当时也在莫斯科。*Peshawar to Moscow* (《从白沙瓦到莫斯科》)，p. 153.

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补充提綱”相抗衡的文件，这个集团就把这一文件作为它在莫斯科进行爭論的依据。按照罗易的記載，有三个来自柏林的印度人会见了列宁，列宁把他們介紹給当时任共产国际总書記的卡尔·拉狄克。拉狄克建議他們把提綱提交即将召开而他們可以作为列席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听取他們的論点，但他們显然并没有得到賞識，在代表大会上也沒有发生什么影响。因此罗易宣称，他已被认为共产国际在印度的唯一代理人。伊夫林·罗易从莫斯科給巴黎的一个人写信报道她丈夫的胜利时說：

一切工作都将由已在此地成立的共产党負責处理。这里要成立一个局来推动我們的工作，还要为我們那些願意接受訓練的人設立一所干部学校。这所大学已經開課，我們有十七个学生登記入学。学习時間是三个月，因为他們已經在我們这里受过一些初步訓練。……所有的民族主义者现在都得向別处去求援了，因为共产国际不能支援民族主义事业，除非通过共产党的媒介。我們將以全部力量在这个国家[印度]建立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利用那些我們尚未吸收的真正共产主义者作为基本干部。党的总部將設在此地，还要出版一种刊物。^①

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后，札多巴塔雅集团被遣返柏林，只有一个人，即那黎尼·古普塔留在莫斯科，并参加了罗易集团。

印度政治的激进化

在1920到1921年間，当共产国际正在莫斯科拟定对印政策时，印度的政治舞台也呈现了越来越浓厚的激进色彩。战后立即

^① Kaye, *Communism in India* (凱:《共产主义在印度》), pp. 6—7. 关于伊夫林·罗易在莫斯科为十七名印度学生開設訓練班的情况，见欧內斯丁·伊凡斯:《从莫斯科向东看》(Ernestine Evans, “Looking East from Moscow”), *Asia*, (《亚細亚》), XXII (Dec., 1922), pp. 972—976.

出现的工会运动，在1920年7月由于全印工会大会的成立而达到高潮。当时全印工会大会的主席是拉拉·拉支巴德·腊伊，一位可尊敬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罗易在纽约时的朋友。印度民族主义者这时开始对苏联的消息感到兴趣。在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的书架上也逐渐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最重要的是甘地在这个时期发动了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巨大的反对英国统治的浪潮。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一个精神萎靡不振、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民族忽然昂首挺腰参加全国有纪律的联合行动了。”当时的“空气仍然很紧张，充满了革命的可能性。”*

后来，正当千百万甘地信徒的脚步震撼了印度大地时，北方邦的一个小镇乔利乔腊那里发生了一个事件。1922年2月4日，一群暴徒焚毁了警察所，打死了若干名警察。这并不是第一个暴力行动事件，这类事件已在印度某些地区发生过多次。但这一次是圣雄的良心所不能允许的，于是他就在运动可能演变成为全面革命的时刻，停止了整个运动。这个决定使群众感到困惑，使国大党的领导集团也很愤慨。尼赫鲁追述道，“和平抵抗停止了，不合作运动消沉下去。”**

甘地关于停止不合作运动的决定虽然使群众的政治活动暂时停止了，但是引起许多人对圣雄的领导以及对脱离英国取得独立的方式展开了争论。这种争论助长了形成一种促进传播新理论和新思想的学术空气。

1921年春，一个名叫什利巴德·阿莫利德·丹吉的印度青年学生出版了一本题为《甘地和列宁》的小册子。它把两位领袖作

* 《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第85—90页。——译者

** 同上，第91页。——译者

了一番評比，結果把甘地排在第二位。丹吉的小冊子引起了一位關心解放事業而在孟買開面粉廠的富商濫卓達斯·帕萬·羅德瓦拉的注意。羅德瓦拉設法會見了這位作者，對於這個青年的才智十分賞識，因此決定資助丹吉進一步研究馬克思主義。在此後的幾年間，羅德瓦拉成了丹吉的監護人，他們共同建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圖書館，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譯本，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者對印度事務的看法。^① 羅德瓦拉的判斷並沒有錯，因為丹吉最後終於成為印度共產黨的最高領袖，今天還在政治局中保持着他多年來所占有的地位。

羅易同印度共產黨人的接觸

羅易自信已得到共產國際的充分支持，便着手同丹吉那樣的印度激進分子進行聯繫。最初的計劃之一是，訓練一批可以派到印度去開展宣傳組織工作的印度人。若干塔什干學生被送往俄國，就學於1921年4月在莫斯科成立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伊夫林·羅易在上文所引的信中說，這批學生共計十七人。

1921年9月，邵加德·烏斯瑪尼決定返回印度。這顯然是他自己的主張，也是使羅易感到不安的主張，因為羅易對他大概並不信任。羅易一心想讓他自己選定的代理人首先抵達印度，便派那黎尼·古普塔帶着二百英鎊和有關指示到印度去組織共產黨，同甘地和哈里發運動建立聯繫，並組織一些印度領袖人物到莫斯科去受訓練。^② 古普塔於1921年11月到達科倫坡，隨即前往加爾各

① Indulal Yajnik, *Life of Ranchoddas Bhavan Lotvala* (因都拉耳·雅支尼格:《濫卓達斯·帕萬·羅德瓦拉傳》) (Bombay: Atmaram Dixit, 1952), pp. 51-52.

② Kaye, *Communism in India* (凱:《共產主義在印度》), pp. 7-8.

答，并在那里同穆札法尔·艾哈迈德——罗易旧日的恐怖主义同志中的领导人之一——取得联系。古普塔显然沒有訪問任何其他城市，就在1922年3月間，装成一个駛离加尔各答的班輪上的水手，离开了印度。^① 烏斯瑪尼到的地方却比較多，并在1922年4月間訪問过孟买。^②

M. N. 罗易的第一部著作

烏斯瑪尼和古普塔在印度时，罗易正在莫斯科忙于写作。他按照自己对资产阶級民族主义者的作用的分析，开始收集材料去写一篇关于印度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有根有据的报告。罗易在他的回忆录中說，列宁建議他把这篇报告扩充为一本书。罗易同意这个意见，并且得到刚从塔什干回国的阿巴尼·穆克季的合作。这本书在1921年秋季写成，书名是《过渡中的印度》，在他和他的妻子于1922年4月回到柏林后在該地出版。^③

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过渡中的印度》是一本鼓动人心的分析著作，是一部有力的宣传作品。它和大部分共产党文献一样，并沒有注明統計数据的来源，而这些数据有許多是錯誤的。罗易把这方面的責任推到穆克季身上，特别是第一章，因为在这一章里，錯誤的数据給人造成一种夸大了印度資本主义的发展程度的印象。^④

① 泰戈尔說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India*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 p. 5), 古普塔在孟买訪問过 S. A. 丹吉, 但是派有密探严密監視古普塔的凱中校并沒有提到这一点。

② Kaye, *Communism in India* (凱:《共产主义在印度》), p. 15.

③ M. N. Roy, *India in Transition* (M. N. 罗易:《过渡中的印度》) (Geneva: J. B. Target, 1922)。該书的出版人和出版地点是假的。

④ *Roy Memoirs* (《罗易回忆录》) (Aug. 22, 1954), p. 398.

当时共产党人中间的普遍看法是，印度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属于封建性质的，这本书一开头就驳斥了这种见解。书中说，印度的重要政治因素就是业已巩固的新兴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只能有限度地分享印度不断工业化所提供的经济机会，所以已经展开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兴起的同时，群众越来越贫困，这就大大激发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帝国主义者唯恐资产阶级和群众联合起来，摧毁英国的控制；为了防止这种联合，他们已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资产阶级作了让步，力图削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斗争的基础。这些让步使资产阶级发生了动摇：一方面，资产阶级想要分享剥削群众的权利，同时又认识到，它所以能够同英国讨价还价大半是由于它能表达群众日渐增长的革命情绪。因此它必须同群众保持一种领导关系。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又害怕群众越来越大的政治力量，最后会威胁到它本身的存在。因此可以预料，它会同帝国主义妥协，而不扮演任何革命角色。

罗易这部著作的最严重缺点，在于低估了圣雄甘地的政治潜力。罗易说，“甘地主义马上就要垮台，这预示着反动势力行将崩溃并将从这个政治运动中完全绝迹。”他把甘地主义说成是“反动势力最剧烈、最绝望的表现。”^①

罗易在柏林的活动

在那个时候，柏林可以说是许多侨居欧洲的印度人的总部，是一处交结来往的好地方，无怪罗易和他的妻子要回到柏林去建立一个指导印度革命的基地。但是他们在柏林又遇到札多巴塔雅的

^① Roy, *India in Transition* (罗易:《过渡中的印度》), p. 205.

挑战。札多巴塔雅虽然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但决没有放弃从共产国际取得支援的打算。当时在柏林的还有巴尔加都拉，他是大战期间德国人在喀布尔建立的印度瑪痕德腊·勃腊达勃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这时巴尔加都拉又同札多巴塔雅携手合作。后者于1921年12月成立了印度新闻局，以便进行宣传 and 革命活动。这个局设有两个委员会，一个委员会负责指导革命工作，另一个委员会完全由宣布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组成，负责在印度建立共产党。他们计划在1922年3月举行代表会议，札多巴塔雅想在这次会议上夺取罗易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他们还在印度报纸上登了召开代表会议的启事。

但在1922年初，巴尔加都拉已经组成印度独立党。根据英国刑事调查处的说法，从热那亚会议回国路经柏林的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同意支持这个新团体，条件是札多巴塔雅不得参加。^① 这样看来，尽管罗易在到达柏林时肯定是共产国际对印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但是舞台上还有其他一些竞争者，而且这些人还受到俄国人的鼓励和资助。不管苏联支持敌对集团是有意識的还是出于官僚政治的顛預无能，这样做总是无助于促进柏林的印度人和睦相处，因为那些人自从哈尔·达雅耳时期以来，一直酷嗜猜嫉和无端爭吵。

那黎尼·古普塔于1922年春返回欧洲后，曾和阿巴尼·穆克季及刚从美国来的S. N. 卡尔一同查問了罗易的錢款事务。这一行动大概引起了罗易对他们们的不满。穆克季和卡尔终于同罗易鬧翻，而投向了札多巴塔雅一边，但后者又被普奔德腊那特·杜达所抛弃。

^① Kaye, *Communism in India* (凱:《共产主义在印度》), p. 75.

尽管有这些糾葛，罗易在 1922 年間还是在柏林做了許多事情。因为手头錢款很充裕，他就办了一种名为《印度独立先鋒》的双月刊。这一刊物在 1928 年以前一直以不同的名称，极有规律地按期出版（见本书 560 頁表）。罗易在印度海員的帮助下，开始把共产国际的《国际新聞通訊》和《印度独立先鋒》寄往印度。印度的英国当局在 1922 年 5 月間发现了这些刊物。《印度独立先鋒》非常成功，从而提高了罗易在印度和莫斯科的威信。根据英国刑事調查处的說法，加尔各答的《甘露市場报》也是受到《印度独立先鋒》影响的报刊之一，其他还有加尔各答的《自力》，阿拉哈巴德的《独立》以及馬德拉斯邦貢土尔城的《新世紀》等报刊。伊夫林·罗易固然也用散底·堆維的笔名为《印度独立先鋒》写了許多文章，但絕大部分材料都出于罗易之手。他們两人也为《国际新聞通訊》撰稿。7 月，罗易出版了英文版的《过渡中的印度》，8 月該书已在印度出现。^①

派往印度的共产党密使

出版共产党宣传品并将其私运入印度，这只是罗易必須作的工作的一半，更重要的任务是在印度国内設立一个能够分发这些材料和着手建立共产党的机构。那黎尼·古普塔和仍然留在印度的邵加德·烏斯瑪尼都沒有多大成就。罗易对他們两人显然都不大信任。事实上我們不妨說，他不信任柏林的任何一个印度人，因为在 1922 年 8 月，他曾写信給英国共产党，問他們能不能派两个欧洲人到印度去，一个到加尔各答，另一个到孟买。为此罗易答应出錢——虽然不足以維持他們的“欧洲生活标准”。^②

① 同上，p. 36.

② 同上，p. 21.

英国共产党只能派出一名密使，即查尔斯·艾希利，他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作家，最近因为搞罢工活动曾在美国坐了牢，1922年2月获释后被驅逐到英国。按照計劃，他应到孟买和加尔各答同罗易已經写信联系过的丹吉和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取得联系，并組織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印度代表团。英国当局发觉了艾希利的使命，所以在他1922年9月19日到达孟买时，馬上被逮捕，并且得到通知說要把他押解出境。在等待办理押解手續期間，他設法同丹吉以及孟买的其他左派人士取得联系并传达了口信。9月23日，他被送到一艘駛往馬賽的船上。^①

艾希利未能完成使命还不是唯一的挫折。經罗易帮助在塔什干和莫斯科受到訓練的大部分香客，都在通过印度边境回国时，被英国当局逮捕。其中許多人供称，他們同共产党人合作，只是为了混飯吃和返回印度。只有一个人即邵加德·烏斯瑪尼作了不少工作。他在联合邦(现为北方邦)組織了一些共产主义者。

还有其他一些小的共产主义者小組分散在国内各地。在馬德拉斯，有一个以辛加腊威卢·捷底阿尔为中心的小組。辛加腊威卢·捷底阿尔是个年长的国大党人，懂得一点馬克思主义。S. A. 丹吉是孟买小組的領袖，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則在加尔各答負責。拉合尔的領導人是庫拉莫·侯賽因，他原是白沙瓦市爱德华茲传道会学院的教授，1922年3月訪問过喀布尔。在那里，罗易曾通过一个名叫庫西·馬霍默德的学生同他联系过。

在这五个小組中，孟买小組最为重要，这主要是由于S. A. 丹吉具有組織能力，而他的保护人R. B. 罗德瓦拉又富有資財。罗德瓦拉不仅拿出十万卢比来設立一个馬克思主义书籍出版公司，

① 同上，pp. 22—23.

还为研究馬克思主义的人開設了一家旅館和一个圖書館,并“資助了願意全力从事劳工工作的同志。”^①新成立的这个出版公司接办了一家有声望的馬拉地文日报《印度之光》,按照“激进分子和极端分子的方針”加以經營。1922年8月間,又出版了一种英文周刊《社会主义者》,由S. A. 丹吉主編。

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在孟加拉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庫拉莫·侯賽因在拉合尔創辦了一种名为《革命》的烏尔都文报纸。为此,侯賽因在喀布尔从罗易的代理人或者是从苏联大使館方面得到了六千卢比。回到印度后,他又收到了一万六千卢比。^②

因此,到1922年秋季,M. N. 罗易的确有理由宣称,共产主义运动已在印度建立了立足点。但是,印度的共产主义者为数不多,又非常分散,絕大部分都对馬克思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战略只有最初步的了解。罗易的貢獻在于从組織和思想方面把他們团結起来,并使他們同共产国际直接发生了关系。共产主义运动并不巩固,也沒有經過严格的鍛炼,但它存在着潜力。印度政府認識到这一点,便开始加紧鎮压共产党人的一切活动。

第三章 共产党人企图攫取 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

到了1922年秋天,在海外工作的M. N. 罗易已經把印度国内

① Yajnik, *Life of Ranchoddas Bhavan Lotvala* (雅支尼格:《濫卓达斯·帕万·罗德瓦拉传》), p. 54.

② Kaye, *Communism in India*(凱:《共产主义在印度》), p. 13. 这是1923年5月8日英国致苏联政府照会中开列的侯賽因的开支。照会全文见《泰晤士报》(*The Times*), May 9, 1923, p. 11.

可以构成一个全国性組織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在大城市中已經有了五个小的共产主义者小组。因此，现在有必要分析一下罗易为这些小组所拟訂的战略以及他向这些小组提出的用来推动印度革命的方法。这种分析将会証明，尽管共产国际对印度的政策是，控制印度国大党从而取得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但是罗易却一直反对这种政策，并竭力促使共产国际放弃这种政策。当这种企图失败以后，罗易为了让共产国际相信他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不得不設法在国大党内树立影响。但是与此同时，他没有一天不在共产国际面前破坏国大党的威信，希望共产国际会修改它的政策。

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說的，罗易第一次在共产国际内对印度国大党这一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組織进行攻击，是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当时他和列宁展开著名的論爭。在这次爭論中，罗易主张共产国际应该通过一些小的“有組織的革命政党”来进行工作。这在印度，他所指的显然就是孟加拉的划时代党和研究小组这类恐怖主义集团。但是到了1921年12月，罗易显然已經打算影响——至少是在表面上打算影响他曾經强烈反对过的资产阶级的国大党了。他为在阿默达巴德举行的国大党第三十六届年会准备了一篇宣言，他在宣言中承认，国大党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他要求国大党采取一个开明的經濟綱領，致力于提高貧苦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① 宣言称声，只有通过改善群众的經濟情况，国大党才有希望在爭取独立的斗争中得到群众的支持，从而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这就是罗易在次年发表的許多論著的中心内容。

^① M. N. Roy and Evelyn Roy, *One Year of Non-Cöoperation; from Ahmedabad to Gaya* (M. N. 罗易和伊夫林·罗易:《不合作运动的一年:从阿默达巴德到加雅》), (Calcutta: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23), p. 11.

控制印度国大党的策略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印度国大党，正如它从中产生的印度社会一样，是一个由許多具有极不相同的观念和目标的集团与个人組成的混合体。罗易以正确的眼光把国大党看作是“进行民族斗争的传统机构”^①，而不是組織严密的政党。国大党内存在着許多集团，竞相爭夺整个組織的控制权，有組織的派系早在罗易开始筹划他的策略手段时，就已經确立了。

从罗易在1922年夏秋两季在《前卫》（《印度独立先鋒》在1922年10月以后改用了这个名称，以避免警方的干涉）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已經可以看出他的計劃。这个計劃有两个主要内容：第一，已經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印度人要在国大党内組成一个反对派集团，并設法夺取领导权。第二，通过《前卫》向一些具有开明社会观点的国大党人进行宣传，使他們改信共产主义。罗易在他针对国大党人写的文章中常常使用“我們”和“我們的”字样，这表明他並沒有把这家报纸看作是只供共产党人閱讀的机关报。

他首先宣称，“作为一个政治組織来看，国大党今天已經死去。它的尸体或則需要埋葬，或則需要注入新的生命使之复活。”^② 罗易认为，造成这种垂危境况的原因，在于缺乏明确的經濟綱領。他說道，“一个政党如果沒有綱領，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在这种情

① *King-Emperor vs. Nalina Bhushan Das Gupta, Muhammad Shaukat Usmani, Muzaffar Ahmad, and Shripat Amrit Dange, in the High Court of Judicature at Allahabad, Criminal Side* (《英王兼印度帝国皇帝控告那黎那·普閃·达斯·古普塔、木哈瑪德·邵加德·烏斯瑪尼、穆札法尔·艾哈迈德、什利巴德·阿莫利德·丹吉案。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刑事庭》) (Allahabad: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ess [1924?]) Exhibit No. 5. 这个文件在下文引用时称作《康波尔謀叛案証件汇编》。

② *The Advance Guard* (《前卫》), I (Oct. 1, 1922), p. 1.

况下，它不可能指望任何社会力量給它以有意識的支持。”

如果国大党要成为一个政党，它就必須以构成当前印度社会的三个主要階級中的某一階級作为自己的基础。它要么是地主的政党，要么是上中层有产階級的政党，要么就是被剝削的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它的綱領要表明它代表哪一个階級。^①

然而到现在为止，国大党还没有宣布自己代表哪一个社会階級。这又该怎么办呢？答案是明确的：

……主张群众行动的革命派別，应该在国大党内組成一个反对派集团。……这个反对派集团終将发展成为注定要領導最后斗争的人民革命政党，所以它应该提出一个旨在把正在衰退的群众热情重新激发起来的綱領，从而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②

罗易在1922年11月2日給S.A.丹吉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信，他在信中透露了他的計劃的中心内容，并說明了印共应起的作用。这个反对派集团应该是一个由各种真正革命力量組成的合法的群众性政党。它应该取一个不致使人对共产主义产生恐怖心理的“不刺耳的”名称，但是它的政治方向应该由“唯一能保护劳动大众利益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来掌握。不管怎样，非法的共产党仍应同这个合法組織并存。^③

虽然罗易說印度的独立斗争已經“被犹豫的中产階級所抛弃，被妥协的上层階級所出卖，”但他十分清楚，共产国际的方針要求他在国大党内作工作。因此他写道，他建議成立的新的群众性政党“絕不能同国大党决裂，不过要設法取得它的領導权。”^④ 这属于罗

① 同上，(Nov.1, 1922)，p. 3. 黑体字系原有。

② 同上，(Dec.1, 1922)，p. 2. 黑体字系原有。

③ Cawnpore Case Evidence (《康波尔謀叛案証件汇编》)，Exhibit No. 5.

④ 同上，Exhibit No. 7c

易計劃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的内容就是，設法影响那些具有开明观点、因而会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国大党人。

在罗易企图施加影响的国大党人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季达·濫占·达斯。他是一个重要的孟加拉族政治家，1921年当选而未就任的国大党主席。这位开明的人道主义者，深刻了解印度群众的貧困，迫切想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他认为，民族主义运动应该增进人民的經濟福利，而不应单单鼓吹让印度的少数优秀分子取得更多参加政府的机会。1921年12月10日，即阿默达巴德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他因从事民族主义活动，被英国当局逮捕并监禁，旋于1922年7月获释。

毫无疑问，罗易很想把达斯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或同路人，因为在1922和1923年間，罗易曾直接寄文章和写信給他。英国当局当时已认为他們两人有直接来往，不过从未提出过达斯写給罗易的任何信件。^①根据现有的有限的証据，还不能断定罗易是否对达斯真正起了重大的直接影响，但我們知道，罗易在孟加拉的代理人同达斯有过接触，并把罗易的著作送給他閱讀。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达斯在某些演說中发表的意见，同《印度独立先鋒》上的文章頗有类似之处。例如，1922年11月1日达斯曾在台拉登举行的一次政治會議上說道：

自由主义者害怕革命。所謂革命，只不过是我們总称之为演进的那种发展的一部分。……而真正的革命則意味着彻底的变革，我們就是要彻底变革。遺憾的是，我們的大多数不合作主义者却仍然迷恋議会政府。

^① 李頓伯爵所著《学者与象》(Earl of Lytton, *Pundits and Elephants*), (London: Peter Davies, 1942)一书第65頁对达斯进行了恶評,并指責他同恐怖主义分子有过直接联系。

我不要那种只为中产階級服务的自治。……我要的是为群众而不是为階級服务的自治。我是不为資產階級操心的。他們能有几个人呢？①

罗易对另一个国大党人也感到兴趣。这个人单名叫薩莫布尔那南德，他在联合省国大党組織內很活动，后来在1954年跃居該邦(北方邦)首席部长的职位。邵加德·烏斯瑪尼于1922年10月写信向罗易介紹了薩莫布尔那南德的情况。烏斯瑪尼說道：“因为他是国大党圈子里有影响的人物，所以答应把宣传品和书籍交給他最可靠的朋友传閱。这正是我們要他做的工作。”②就在同一个月，薩莫布尔那南德发表了一个“关于国大党綱領”的备忘录。根据罗易在《前卫》上发表的有关評論，这个备忘录显然包含了罗易的若干观点。罗易把这个文件称作是“将来领导我們运动的一个真正革命者所发出的明确呼声，”罗易还因为薩莫布尔那南德引用了列宁的話而表示贊許。③ 烏斯瑪尼在1923年2月再度写信給罗易向他介紹薩莫布尔那南德的情况：

薩莫布尔那南德不是社会主义者，更不是共产主义者。他是一个非常单纯而又主张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但我信任他，他也答应帮助我們推动工作。他是多情善感的人，但决不像[瑪尼·拉耳]沙赫或任何其他入那样。我有充分的理由要把他推荐給你——我已經給了他大量宣传品和若干革命理論书籍。他似乎越来越接近我們的路綫，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我党一个积极热情的党员。④

罗易希望施加影响的第三个国大党人是辛加腊威卢·捷底阿

① *The Tribune* (Lahore)(拉合尔《論壇》), Nov. 4, 1922, p. 3.

② Sir Cecil Kaye, *Communism in India*(塞西耳·凱爵士：《共产主义在印度》)(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1926), p. 30.

③ *The Advance Guard* (《前卫》), I (Jan. 1, 1923), p. 1.

④ *Cawnpore Case Evidence* (《康波尔謀叛案証件汇编》), Exhibit No.

尔。他在国大党内有相当地位，而且事实表明他已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同罗易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并在国大党人中间积极散发罗易的宣传品。

看来，罗易和他的代理人，由于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并想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作用，过高估计了他们对 C.R. 达斯和薩莫布尔那南德的直接影响。其实这时社会主义理论已经从各个方面传入印度，某些杰出的国大党人可能已经涉猎了这种理论。罗易那枝多产的笔也对传播这些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

罗易的“纲领”

国大党决定于 1922 年 12 月 26 日在加雅举行第三十七届年会。这将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因为几个月来的情况表明，甘地和 C.R. 达斯之间的摊牌已是在所难免。罗易也正打算在这次会议上，用他“为印度国大党提出的纲领”来考验国大党的领导集团。

在加雅代表大会前几个月，甘地的追随者和达斯的追随者显然已就不合作运动所应采取的形式问题，在印度全国普遍展开了辩论。这种辩论开始于 1921 年 2 月，当时甘地因为不合作运动在乔利乔腊事件中采取了暴力形式，便停止了这个运动。辩论的焦点最后集中在蒙塔古—契尔姆斯福德改革方案所规定的、新立法会议的即将到来的选举上。甘地竭力主张抵制选举，不同立法会议打交道。达斯则力主国大党参加选举，并加入立法会议，以期达到通过政府一级的不合作运动来破坏立法会议这一明确目的。这个问题需要在加雅代表大会上解决。

当国大党在 1922 年夏秋两季忙于辩论时，罗易就已在《前卫》上的文章中指出，国大党需要有一个断然表明“它代表哪一阶级”

的明确綱領。因此就难怪罗易要在加雅會議前夕，通过《前卫》提出一个内容广泛的綱領来。他說这个綱領如能被接受，国大党就将同“被剝削的工人和农民”站在一起。

这个“綱領”是一个很全面的文件，它要求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給人民以普选权，取消地主土地占有制，公用事业国有化，給劳动者以結社的充分权利，保証各企业部門的最低工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企业分紅制，实行免費义务教育，取消常备軍以及“武装全国人民来保卫国家的自由。”^①这一期的《前卫》有千百份运入了印度，以备分发给出席加雅會議的代表。英国当局截获了五百四十份，但承认一大部分漏了网。

說明为什么需要有一个綱領的文章以及綱領本身两者都給人一种印象，仿佛罗易认为国大党至少会接受他的某些思想。但他在11月2日写給丹吉的信証明，其实并非如此。因为罗易告訴丹吉說，他打算替加雅會議起草一个綱領时，曾經作过这样的解释：

这种策略的目的已毋須向你說明。我們要使这个运动摆脱反动领导集团的控制。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考驗一下当前的领导集团。我們想提出的是这样一个綱領，它要求贊同的人持有一定的革命观点。因此，可以断言，现有的国大党决不会接受这个綱領。而他們如果不接受，就会暴露出他們的真面目。这样，我們就可以发出成立一个新的群众政党的号召，这个政党要有自己的领导和自己的綱領——它以攫取国大党这一民族斗争的传统机构的领导权为目的。^②

这封信說明，罗易早已看穿国大党的“真面目”，并且深知国大党会拒絕他的綱領。他想把他的綱領当作石蕊試紙来确实証明国大党不是紅色的。用这种方法揭露反动领导，是經季諾維也夫等

① *The Advance Guard* (《前卫》), I (Dec. 1, 1922), p. 1.

② *Cawnpore Case Evidence* (《康波尔謀叛案証件汇编》), Exhibit No. 5.

人多次討論、而为共产党人所贊許的策略。罗易也許希望这种做法能为建立“一个新的群众性政党”打开道路，但他不久以后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說表明，他还希望通过揭露国大党的“真面目”，來說服共产国际，使它不要那样強調攫取国大党的領導权。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从1922年11月7日到12月3日，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举行。这次代表大会至少邀請了五个印度人，即罗易、丹吉（由查尔斯·艾希利亲自轉达）、那黎尼·古普塔、季腊·濫占·达斯（C.R. 达斯之子）和激进国大党人苏帕斯·占德腊·鮑斯。罗易在寄給后两个人的邀請书中，要求他們带着印度国大党或其他合法团体的証件。最后只有罗易出席了大会，因此他享有印度仅有的一票表决权。^①

共产国际領導人在演說中談到印度时表示，他們对罗易过去的工作一直是滿意的。共产国际主席季諾維也夫在開幕詞中說道：

我們在印度已經取得了可貴的成績。我可以轉告代表大会，我們的同志在过去几个月中是很成功的。罗易同志和他的一批朋友现在出版着一种刊物，这种刊物的任务是为我們在印度的工作鋪平道路。我們的同志們已經把印度国内的共产主义者团結起来。他們已經打入了新聞

^① Kaye, *Communism in India* (凱：《共产主义在印度》)，pp. 27—28. 还有四个印度人會被邀請，資格审查委員會的报告可以証实此事，參閱《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节本》(*Four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bridged Report ...*,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3?], p. 291)。根据报道，散多格·辛格和腊丹·辛格曾代表加利福尼亚卡德尔党出席了这次大会，但并无正式文件足以証实。英国刑事調查处报告，卓丁·米德腊曾出席大会，见《共产主义在印度，1924—1927年》(*Communism in India, 1924—27*)，p. 358.

界，他們已經打入工会。我认为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①

卡尔·拉狄克說得比較慎重：

在印度，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思想意識的中心。我不能不說羅易在過去一年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績，他在他那部優秀著作和他那個機關刊物里，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闡明了印度的情況，沒有一個東方國家的共產黨作過這樣的工作，這肯定是值得共產國際給以支持的。但是必須承認，在偉大的印度工會運動以及無數次震動全國的罷工中，我們還做得很不夠。我們還不懂得利用英國君主不得不給予我們的權利。羅易同志在印度受到的歡迎表明，那里存在着一些合法的機會。但是我們甚至還沒有採取作為一個實際的工人政黨所應採取的初步步驟。所有這一切意味着：“到提珀雷里的道路是一條漫長的道路。”^②

羅易本人在代表大會全體會議上只發表了一次演說，為他和其他亞洲代表所擬訂的殖民地問題提綱草案進行辯護。^③ 羅易按照老一套的列寧主義路線論證說，資本主義競爭的性質表明，在帝國主義和當地的一部分資產階級之間，存在着一種具有革命意義的潛在矛盾。為了證明這一點，羅易根據土耳其新近的發展得出了幾點結論：

除非資產階級已經出現並成為社會的領導力量，否則，儘管有一切革命的可能性，民族鬥爭也不能展開。所以，在所有這些國家中，民族鬥爭已隨着資產階級的發展，而相應地加強了。從這個觀點出發，儘管我們知道一向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妥協的殖民地資產階級是危險的，我們也必須永遠在原則上支持他們。既然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民族運動在客觀上是革命的，我們就應該加以支持。但是，不能認為這種客觀力量是

① *Fourth Congress* ... (《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報告節本》), p. 26.

② 同上, p. 224. (最後一句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從提珀雷里出征的愛爾蘭士兵愛唱的一首歌曲的首句。——譯者)

③ 同上, pp. 208—211. 這是簡略的報道，全文載《前衛》(*Advance Guard*), I (Jan. 15, 1923), pp. 2—3.

无条件革命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当资产阶级举起叛旗，反对落后的、过时的社会形式时，它是一种革命因素；那就是说，当斗争基本上是反对封建秩序的时候，资产阶级是领导着人民的。这时，资产阶级可以说是革命的先锋队。^①

这样看来，罗易已表明自己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民主”阶段的任务的基本论点。他甚至进一步使用了列宁通常只留给共产党用的“先锋队”称号。但极值得注意的是，罗易着重指出了资产阶级有资格被称作革命因素的种种情况。“当资产阶级举起叛旗，反对落后的过时的社会形式时，”它是革命的；“那就是说，当斗争基本上是反对封建秩序的时候，资产阶级是领导着人民的。”罗易是否相信印度的情况真是这样的呢？这可以从他当时刚出版的《过渡中的印度》一书的第一句话得到答复：“同一一般的想法相反，印度并非处在封建制度下。”^②两个月以前，他还在《劳工月刊》上写道：“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反对旧的社会生产秩序。”^③

在这篇演讲的后半部分，罗易重复了《过渡中的印度》一书的论点：比如，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殖民地国家里（如印度），一部分资产阶级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中是有其既得利益的。根据这个论点，这部分人害怕推翻外国统治后可能引起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因而情愿抑制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来保卫他们的经济利益。

罗易在他的演说中告诫说，资产阶级“走到一定的地步，就要阻止革命。”他又说：

① *The Advance Guard* (《前卫》), I (Jan. 15, 1923), p. 3.

② M. N. Roy, *India in Transition* (M. N. 罗易:《过渡中的印度》) (Geneva: J. B. Target, 1922), p. 17.

③ M. N. Roy, “The Empire and the Revolution” (M. N. 罗易:《帝国与革命》), *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 III (Oct., 1922), p. 224.

……这些人有朝一日必定出卖民族主义运动，而成为反革命力量。除非我們准备从政治上鍛炼其他在客观上更富有革命性的社会力量，来代替他們并取得領導权，否則民族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在目前是很成問題的。^①

罗易辯称，共产党能在殖民地国家中存在，就証明

那里有一些社会因素要求成立政党——不是資產阶级的政党，而是能表达并反映人民群众，即农民和工人的要求、利益和願望的政党，这种政党不同于那种单纯帮助本地資產阶级进行經濟发展和政治扩张的民族主义运动。……我們必須在这些国家中发展我們的党，以便領導[反帝統一战綫]組織。^②

罗易有时把印度国大党領導集团和一般党员区分开。例如，他有一次說，乔利乔腊事件証明国大党的一般党员是革命的；而他們同意中止不合作运动，据他的解释，則表明他們屈服于反动的領導。他认为国大党是在資產阶级控制下的，所以，总的来看，它是資產阶级的工具。因此，罗易談到印度資產阶级的作用时，实际是在談国大党及其政策。实际上，国大党和資產阶级这两个名詞，在罗易这段时期的論著中几乎已經成为同义詞了。

因此，罗易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对共产国际說：至少在印度，資產阶级(即国大党)是沒有多少、甚至是完全沒有革命作用的，共产国际應該支持“其他社会力量”。

罗易沒有能使共产国际相信他的分析是正确的。最后通过的东方問題提綱說，共产国际“支持一切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③ 虽

① *The Advance Guard*(《前卫》), I (Jan. 15, 1923), p. 3.

② 同上。

③ *Resolutions and Theses of the Four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決議及提綱汇编》)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3?]), p. 55.

然共产国际沒有采納罗易的論点，却繼續支持他对印度革命运动的領導。罗易在他提交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秘密报告中說，9月5日在孟买举行的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員會已經向共产国际申請了十二万英鎊的補助金，其中三万五千鎊是党的經費，七万鎊支援劳工組織，一万五千鎊办《社会主义者》杂志。罗易大談什么“中央委員會”，是十分言过其实的，因为印度共产党人的組織程度還沒有达到有一个中央委員會的地步。实际上，他們还在为誰該做領導的問題爭吵着，完全沒有取得一致意見的希望。不管共产国际是否了解这种情况，殖民地問題委員會以十八票对三票全額批准了这笔補助金。^①此外，罗易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員會候补委員的事实也足証明共产国际对他的支持。

加雅代表大会

英国当局显然已对罗易宣传品的传播感到担忧，因为他們已經采取了特別的警戒措施，在一些輸入港口拦截他的出版物，并且像上文所說的那樣，已經沒收了好几百份載有罗易的綱領的1922年12月号的《前卫》杂志。但在12月21日，即加雅代表大会召开前五日，路透社却把罗易的整个綱領拍发给印度国内所有向它訂稿的报社，并竭力把这个綱領說成是一个布尔什維克的作品。

既然大家都知道罗易所写的东西在印度是被禁止的，这就难怪印度某些世故較深的民族主义者漸漸产生了疑問：为什么半官方的路透社竟要把罗易的綱領这样广泛地加以宣传呢。答案似乎相当清楚，而且当时有几家报纸实际上也指了出来：路透社公布这个綱領只是为了把它貼上布尔什維克的标签。即便在这样早的时

^① Kaye, *Communism in India* (凱：《共产主义在印度》), p. 53.

候，許多國大黨人已經把布尔什維主義看作是危險的象徵了，在羅易建議他的革命黨要取一個“不刺耳的”名稱時，他就已經看到了這一事實。因此，英國人想把這個綱領污蔑為“布尔什維克陰謀”，从而使綱領中的思想和提倡這種思想的印度領袖都威信掃地。感到最窘的就是 C. R. 達斯和其他一些進步的國大黨領袖，因為羅易力圖把他們和他的計劃拉在一起。^①

出席加雅代表大會的共產黨人有 S. A. 丹吉、辛加腊威卢·捷底阿尔、瑪尼·拉耳·沙赫。代表大會結束以前，阿巴尼·穆克季作為在柏林同羅易競爭的印度獨立黨的密使，從歐洲來到印度。他的使命就是，爭取代表大會的承認。英國當局認為，他這次旅行是共產黨資助的，雖然奧托·庫西寧曾在 10 月間秘密發表聲明說，共產國際和他既沒有關係也不信任他。^② 既然穆克季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打擊羅易的威信，他的來到當然不可能增進加雅的共產黨人的團結和作用。看來受了他影響的主要是瑪尼·拉耳，他們兩人聯合發表了一個聲明。^③

在加雅代表大會上，共產黨人顯然遭到了失敗。羅易的綱領遭到普遍的反對，而共產黨人首先指靠的 C. R. 達斯，不僅從他原先的社會主義者立場上後退，而且還每每使用一種反布尔什維克的語調。他雖然在主席就職演說中表示反對“把權力集中在中產階級手中，”但他卻沒有提起他先前提出的為了群眾的自治的主張。

① 這是羅易本人的看法。關於整個事件的詳盡報道以及當時報刊的許多評論，見羅易夫婦著的《不合作運動的一年：從阿默達巴德到加雅》(Roy and Roy, *One Year of Non-coöperation...*), Chapter XI.

② Cawnpore Case Evidence (《康波爾謀叛案証件匯編》), Exhibit No. 10b. 凱在《共產主義在印度》(*Communism in India*, p. 135)一書中說道，穆克季在莫斯科一直呆到 1924 年 10 月。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儘管庫西寧發表了聲明，共產國際同他還是有關係的。

③ Kaye, *Communism in India* (凱：《共產主義在印度》), p. 77.

而且，在敦促国大党把工人和农民組織起来的时候，他警告說：“如果国大党不能尽到它的責任，你們就一定会看到，工人和农民离开你們，离开爭取自治的事业，而在国内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組織，最后把階級斗争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战争推上和平革命的舞台。”^①不消說，这显然是指共产党人。

在圣雄和达斯的摊牌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甘地的品格，而不是論点的是非。达斯失敗了，国大党决定抵制选举，也不参加新的立法會議。然而，达斯却得到充分的支持，使他有勇气同摩底拉耳·尼赫魯（賈瓦哈拉尔·尼赫魯的父亲）一起，在国大党内成立了他自己的党。这个新的組織，即自治党，参加了选举并取得了一些成就。

罗易当初虽然希望国大党会由于拒絕他的綱領而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但他絕沒有想到他反而会丧失仅有的一点影响。不过，看来这就是他的策略的实际結果。达斯从社会主义立場后退了，罗易的綱領，遭到普遍反对，在这两方面，路透社的电訊无疑都起了重大作用。这个事例也說明了帮助一小撮聪明的英国人使用了多么高明的手段才統治三亿印度人几乎达二百年之久。但是，导致共产党在加雅代表大会上失敗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罗易的策略方針，其中的关键就是暴力問題。

暴力和非暴力

罗易的著述表明，促使他投向共产国际怀抱的因素之一，可能是共产党对暴力的态度。共产党的理論贊成暴力，而暴力又是同罗易参加孟加拉族恐怖主义組織的經歷相协调的。但是，这种理

^① P. C. Ray, *Life and Times of C. R. Das* (P. C. 雷：《C. R. 达斯的一生和他的时代》)(London: Oxford, 1927), p. 288.

論反对个人恐怖行动,主张有組織的、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因此就使他在思想意識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罗易认为暴力斗争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从罗易早在墨西哥时期所写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而且,《印度独立先锋》几乎没有一期不发表要求实行暴力革命的呼声。例如在1922年6月那一期上,罗易写道:“凭借暴力和残酷手段来維持的政府,只能用暴力和残酷手段来推翻。”^① 虽然从政治上的权宜观点来看,罗易应该放低他的調子,以表示尊重甘地派的非暴力理想,但他却从正面发动了一场反对非暴力革命的宣传战。他在1922年12月間写道:

我們反复說过,而且现在仍然要說,过早地采取暴力策略,可能会有利于敌人。但是,不管印度的情况可能是多么“特殊和异常”,如果认为真有所謂“非暴力革命”这种东西,那是完全錯誤的。对于非暴力的迷信,是同反革命精神分不开的。不想印度发生革命的人,才会把希望寄托在非暴力的方法上。純粹的非暴力方法同立宪运动沒有区别,世界上还没有人用立宪的方法发动过一次革命。^②

說明罗易的观点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共产国际致加雅印度国大党年会的賀电(由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書記亨伯特·德罗士签署)。这个經罗易亲笔改过的文告的打字副本,被印度英国当局所截获。罗易随后在《前卫》上发表了全文,其中包括这样一些重要的段落:

英国在印度的統治是依靠武力建立并依靠武力維持的,所以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够和才会推翻它。但凡有办法,我們是不主张使用暴力的。但是为了自卫,印度人民必須采取暴力手段,否則,建筑在暴力基础上的外国統治就不可能結束。印度人民正在进行这种伟大的革命斗争。共

^① *The Vanguard of Indian Independence*(《印度独立先锋》),I(June 15, 1922),p. 5.

^② *The Advance Guard* (《前卫》),I(Dec. 1, 1922),p. 2. 黑体字系原有。

产国际全心全意同他們站在一起。

印度人民在經濟、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发展，要求印度完全脱离帝国主义英国。实现这种独立是革命民族主义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既不能通过协商，也不能通过和平手段。^①

因此，象征着非暴力的圣雄甘地就成了罗易詛咒的对象，特别是在甘地的 1920 年不合作运动有可能演变为全面革命的时候突然着令停止以后，很难设想还会有其他事情更能使一个共产党人感到痛心的了。关于这件事，罗易咬牙切齿地写道：

他們[政府]在近三个月来所害怕并准备加以扑灭的民族起义，已在甘地先生本人的努力下，被制止和击潰了。他的不可救药的和平主义以及他对群众力量的畏惧，可以被用来防止起义的爆发。政府用各种镇压方式都无法作到的，圣雄却用他那种絕望的号召作到了。……拘捕、拷問、鞭撻、监禁、屠杀、罰款、迫害等手段都无法阻挡的斗争——一个飢餓的民族为了挽救自己免遭彻底毁灭而进行的盲目斗争——甘地先生用爱和非暴力这种简单的魔法，就使之无能为力并平息下来。……国大党由于否定了自己的追随者的革命行动，已經实行自杀。一个强大的革命运动已經在甘地主义的祭坛上作了牺牲。^②

《印度独立先鋒》在 1922 年发表了一系列論甘地的文章。这些文章沒有忘記指出圣雄的崇高品质以及他在团结群众方面的重大贡献，但是文章攻击了他的社会理論，并在总的方面指責他是印度社会的反动利益或传统利益的护卫。伊夫林·罗易写的几篇文章，对甘地的政治作用作了具有說服力的、多少是现实的評价。（参閱第 21 章。）其实，罗易攻击甘地主义的文章如果不是过分強調暴

① “To the All India National Congress, Gaya, India”（《致印度加雅印度国大党代表大会》），同上，（Jan. 1, 1923），p. 3.

② Roy and Roy, *One Year of Non-coöperation...*（罗易夫妇著：《不合作运动的一年：从阿默达巴德到加雅》），pp. 40—41.

力，其中有許多內容本來是能夠閱讀這些文章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接受的，這些文章本來也是能夠對國大黨的政策產生重大影響的。但國大黨內全都是具有身分的中產階級人物和知識分子，對他們來說走向戰場的主張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對他們宣傳暴力就會失卻他們的信任，並會摧毀人們對激進經濟思想的同情。羅易對暴力的態度當然是 C.R. 达斯同他疏遠起來的一個重要的原因。C.R. 达斯在加雅代表大會上發表主席就職演說時曾經說：

我不能不承認，印度國內外都存在着這樣一種見解，認為非暴力是一種不能實現的理想的抽象觀念，因此實現自治的唯一辦法就是使用武力和暴力。我從沒有懷疑過持有這種觀點的人的勇氣、犧牲精神和愛國思想。我知道，其中有些人一直在為他們認為是正確的事業吃苦受難。但請允許我指出，原則問題姑且不談，歷史已經一再證明，用武力和暴力進行的革命是毫無結果的。我也是在原則上主張非暴力的人。^①

达斯並不是唯一一個因為羅易強調暴力而被嚇跑的人。即使是羅易自己的人，如辛加腊威卢，也不得不在加雅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表示擁護非暴力行動。他說：“我們在國外的共產黨同志一直反對這種方法，”這顯然指的是羅易。“我告訴他們，我們採取這種方法是出於實際需要，而且我也贊成這種方法。所以說，他們在方法問題上具有根本不同的意見。”^②

當然，C. R. 达斯和辛加腊威卢很可能只不過是狡猾的政客，善於在甘地的非凡領導才能所造成的新的輿論空氣中看風駛舵。不管他們自己對非暴力行動的看法如何，他們可能斷定，現在反對這種做法是不明智的。羅易當時處在遠離現場的不利地位。他大

① Ray, *Life and Times of C. R. Das* (雷：《C. R. 达斯的一生和他的時代》), pp. 267—268.

② *The Vanguard* (《印度獨立先鋒》), II (April 15, 1923), p. 3.

大低估了甘地及其思想的影响，也許还犯了从表面领会达斯和辛加腊威卢的言論的錯誤。

無論如何，这一点是清楚的：罗易既然采取了如此鮮明的主张暴力的立場，就使自己 and 共产党人在一个对甘地來說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問題上，同甘地对立起来。可以肯定地說，不合作运动确实激发起群众的极大热情，使他們可能采取暴力行动。这一点已为乔利乔腊等事件所証实。而且，有許多国大党人，虽然在口头上支持圣雄的理想，但肯定是打算听任暴力行动自然发展的。但是，宣揚暴力的好处和必要性，或是同宣传暴力的人联合起来，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一点是罗易沒有認識到的。

但我們也不应忽略这样一种可能性：罗易主张暴力的目的，在于故意恐吓国大党人，促使他們攻击布尔什維主义。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和他从来的希望也是不相违背的，因为他一向就希望把改良主义者和革命党人区别开来，尤其是希望証明，照当时的組成成分來說，国大党絕對不是革命的。不論罗易这样作的原因何在，他在这个时期这样大喊大嚷地主张暴力，就疏远了一般国大党人，从而使共产党人不能利用那个爱好和平、身纏腰布的瘦小人物所激发起来的革命力量。

第四章 組織先鋒队

甘地在加雅的胜利，对 M.N. 罗易和印度共产党人來說，是一次严重的打击。罗易的計劃失敗了。他在《国际新聞通訊》^①中承

① M. N. Roy,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M. N. 罗易：《印度国民大会党》), *Inprecor* (《国际新聞通訊》), III (March 1, 1923), p. 127.

认：“我們原想加强左翼的力量，結果反而吓坏了左翼。”他又說：“这毕竟是一次收获，”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疏远了潜在的同情者，却成功地“揭露了”国大党领导集团的不革命的真面目。

这时，罗易的策略目标更加清楚了。他依然主张在国大党内組織一个革命的政党，并且照旧希望 C. R. 达斯领导这个政党。但是，他所强調的，不再是夺取国大党，而是建立一个同时在国大党内外进行工作并将在最后夺取民族革命运动的绝对领导权的印度共产党。

1923年2月15日出版的那期《前卫》，再一次易名为《先锋》，而且在封面上端第一次出现了“印度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等字样。这一期的第一篇文章是一篇社論，題名为“我們自己”。社論首先对国大党作了评价，接着概述新政策：

尽管国大党一心要爭取群众的支持，尽管它有提高被压迫者地位的善意的計劃，但是，作为一个团体來說，它将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机构。在爭取民族自由的革命斗争中，它永远不能领导工人和农民……。因此，組織一个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就成了一項必要的任务。历史要求印度共产党承担这项任务……。只有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群众才能組織起来，投入民族斗争，也就是为爭取解放而掀起的伟大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因此，那些真诚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和幸福的人们，必須参加共产党，这是工人和农民的领导者，这是民族革命的先鋒队……。我們將作为国大党的一部分而进行斗争；我們將通过毫无顾忌的批評、有力的鼓动和持續的宣传，推动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投入斗争；我們將同每一个在客观上反对帝国主义統治的社会力量进行合作；同时，我們將同每一个政党并肩站在一起，只要它对外国統治进行斗争。①

从文字来看，这篇文章似乎意味着一种转变。过去，罗易曾建

① “Ourselves”（《我們自己》），*Vanguard of Independence*（《印度独立先锋》），II（Feb. 15, 1923），pp. 1—2。黑体字系作者所加。

議用一个“不刺耳的”名称，成立一个群众性政党，与非法的共产党并存，并接受其控制。但在这里，他似乎在暗示共产党本身要成为这个群众性組織。

在同一期《先鋒》上发表的一封“致季达·濫占·达斯及其追随者的公开信”中，罗易写道：“在国大党中，只容許三个政党并存。那里已經有了两个党。你要么成立第三党，也就是在政治上代表劳动群众的党，要么就不加入。”按照罗易的看法，其他两个党都是改良主义者和反动派的工具。根据这篇文章，我們有理由說，罗易建議达斯領導一个新的革命政党。然而，这个达斯正是罗易认为是一个“唯情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的那个达斯。1923年3月8日，罗易还在一封致丹吉的信中說，这个达斯的思想像甘地主义一样有害。^①至少直到1923年6月，罗易还在繼續設法拉攏达斯。当时，罗易在严密部署但照样无效的保密措施下，从柏林再次写信給达斯，請他前来欧洲，并且表示願意向他提供經濟援助。罗易在这封信中說，达斯可以“团結国大党内外现有的全部革命分子，从而为成立革命的群众政党締造一个开端。这个党是当前迫切需要的，只有它才能拯救国大党。”^②

就一个共产党人來說，向一位自己实际上并不尊敬的資产階級領袖獻媚討好，还是罕见的。但是，对罗易來說，在国大党内取得一个立足点，是非办不可的事，因为这正是共产国际要他做的。罗易不顾一切的心情，显然可以从一件发生在1923年初的小事中看出。罗易收到一位名叫拜达那特·比斯瓦斯的人的来信，信笺上面印有“孟加拉工会联合会”等字样。这个人表示，如果罗易願

① Cawnpore Case Evidence(《康波尔謀叛案証件汇编》), Exhibit No. 21, p. 6.

② 同上, Exhibit No. 19, p. 38.

意寄去必需的費用，他願與羅易合作，前往歐洲。羅易早已從穆札法爾·艾哈邁德那里獲悉比斯瓦斯是警方的奸細。雖然如此，他仍然於1923年2月18日寫信給艾哈邁德說：

拜達那特·比斯瓦斯希望作為孟加拉工會聯合會和全印工會大會的代表前來此間。但如不供給旅費，他就無法前來。我記得你曾來信談過他的情況。但是，由於其他種種原因，有必要讓他或其組織的其他人員前來。我必須設法——不管用什麼手段——打入所有這些組織中。當然，落入政府奸細的手中，是一無好處的。但是，還沒有理由認為拜達那特或他的同事是政府的奸細。責任應該由那些忝居高位、正在公布人名单的大人物來負。這些小腳色充其量只是想當領袖而已……。我要拜達那特前來此間。^①

1923年3月21日，艾哈邁德回信說：

你必須知道，我並不是毫無所知就寫信通知你什麼事情的。毫無疑問，拜達那特·比斯瓦斯是一名老資格的奸細。正如你警告我們提防穆克季一樣，我們有責任提醒你提防這種人。至於你是否重視我們的意見，那是你的事。是什麼原因使你受了蒙騙呢？是因為看到了孟加拉工會聯合會這個名稱嗎？“孟加拉工會聯合會”僅僅意味著一個印在信箋上的空頭銜和橡皮戳而已。除此以外，它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個機構怎麼能有代表呢？我屢次寫信告訴你，這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會都是政府的組織……如果錢有着落，我們會派出可靠的人。不要由於不了解而犯錯誤。……老兄，望慎重將事。如果你不加選擇地同任何人通信聯繫，一切事情都會弄糟。^②

至於比斯瓦斯實際上是不是奸細，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羅易駐加爾各答最幹練的代理人說他是奸細。羅易既對自己在印度北部的這位最傑出的組織者的忠告毫不重視，就難以鼓舞他的情緒。羅易甘願這樣做，正說明他多么重視把一位民族主義領袖請

① 同上，Exhibit No. 146, p. 9.

② 同上，Exhibit No. 152, pp. 15—16.

到欧洲去。

联络上的困难

联络工具的不足，大大妨碍了罗易的工作。消息传递得很慢，而且他的交通員都不是最准确的报告者或最深入的分析者。1923年的印度政治是复杂的，难以理解的。除此之外，还应加上阿巴尼·穆克季暗中破坏罗易地位的活动。这些活动进一步加重了宗派活动和混乱。但是，最重要的也许还是英国刑事调查处惊人的工作效率。印度政府情报局局长在若干年后谈到罗易时说：

在过去若干年间，他同印度的“接綫人”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他的通信也大都都是我们阅读过的。对于人员的行踪、金钱和文件的往来方面，这是一个极其准确的情报的可靠来源，而且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利用从这里得来的情报来击败我们的敌人。^①

英国当局曾几次截取汇款，以致引起汇款人和收款人之间的互不信任。英国刑事调查处在这个时期的记录，肯定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说明富于想像力的警察机构可以多么有效地控制一个谋叛的组织。很明显，共产党人之间的所作所为，很少不或迟或早为刑事调查处所获悉的。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罗易曾设法使自己寄往印度的信件全部通过 R.C.L. 沙尔玛之手，他是印度东海岸法国领地本地治里的一位居民。罗易以为寄往法国领地的信件不会受到英国当局的检查，并且以为沙尔玛会设法通过信差把信件偷偷带往印度。事实证明这种设想是错误的，不管是否通过法国的合作，罗易的信件都没有逃过英国当局的检查网。

^① *Communism in India, 1924-27* («共产主义在印度，1924—1927年») (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1927), p. 127.

除了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和 S. A. 丹吉之外,罗易在印度的接綫人都是些能力很差的脚色。沙尔瑪根本就不是充当罗易与印度之間的主要联络人的理想人物。他在 1923 年 1 月开始为罗易工作以前,曾向英国人自荐,願意充当告密者。他甚至願意前往阿富汗,汇报那里的活动情况。“由于他生性不走正道,”印度政府情报局局长几年以后說,“我們沒有雇用他。现在[1927 年],他已深深陷入 M.N. 罗易那一伙中,但无疑他会以相当低廉的代价出卖罗易。”^①

罗易在同馬德拉斯的辛加腊威卢通信时运气比較好一些,因为后者可以利用受尊重的《印度教徒报》作为掩护地址,从而使信件免遭截获。但該报經理部終于发觉了这件事,并于 1923 年 8 月 25 日发表了一項声明,断絕了他們的通信。^②

在印度所遇到的組織方面的困难

加雅大会以后,罗易希望完成兩項基本工作。第一,他希望全印度的共产党人聚首一堂成立一个全印組織。第二,他希望印度共产党人有一个小代表团前往欧洲,参加一次會議。

1923 年 2 月,为筹备罗易所建議的全印會議,辛加腊威卢发表了一項宣言。他希望使自己新近在馬德拉斯成立的劳工人民党成为新的全国性組織的核心。在收到这项宣言的人士中,有联合省的瑪尼·拉耳·沙赫。他曾在斐济群島代表印度移民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新近才回到印度。他在回到印度以后,又卷入了工会工作,并同許多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接触,其中有罗易的敌人

① Sir Cecil Kaye, *Communism in India* (塞西耳·凱爵士:《共产主义在印度》)(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1926), p. 91.

② 同上, p. 103.

阿巴尼·穆克季。

在瑪尼·拉耳收到辛加腊威卢的宣言以后，他同阿巴尼·穆克季略加修改，然后于3月作为自己的文件重新发出去。他们把这个文件分别寄给丹吉、庫拉莫·侯赛因，甚至还寄给了罗易和辛加腊威卢。4月间，侯赛因为了响应这个宣言，发出一纸传阅文件，号召1923年6月30日在勒克瑙举行会议，“以便组织瑪尼·拉耳博士宣言中所说的党”。^①当辛加腊威卢看到所发生的情况时，他便在致罗易和侯赛因的信中提出了抗议。“你所说的瑪尼·拉耳的宣言，”他对侯赛因说，“正是我们原先草拟出来的宣言草案。”他还抱怨说，他自己发出的要求召开会议号召，事实上遭到了散居印度各地的共产党人的漠视。例如，S.A.丹吉甚至没有答复辛加腊威卢的信件。

在欧洲，罗易收到了瑪尼·拉耳的宣言，同时辨认出这是从辛加腊威卢那里剽窃来的。他也发觉了这是阿巴尼·穆克季搞的鬼，他知道穆克季正在印度活动，要从自己的手中夺取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因此，毫不奇怪，他立刻揭发瑪尼·拉耳的文件是“伪造的”，并全力支持辛加腊威卢。他还写信给丹吉，要求他“火速与辛加腊威卢取得联系，不要拖延……。我确信，他是最适宜于充当合法政党名义领袖的人选。”他这样告诉丹吉，“他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极其难得的门径，以便打入国大党的队伍中。通过他，我们可以掌握[国大党的]劳工小组委员会。”^②

由于希望消除混乱，使印度的共产党人能在辛加腊威卢的领导下举行会议，罗易发出了一份备忘录，日期是1923年6月5日，

① 同上，p. 79.

② Cawnpore Case Evidence(《康波尔谋叛案证件汇编》)，Exhibit No. 23, pp. 9—11.

供与会者参考。

备忘录表明，罗易重新提出了他原先的关于建立两个政党的主张，即建立名为工农党的群众性政党和非法的共产党。共产党将是“合法的群众性政党的非法工具”，共产党全体党员当然是工农党的党员。^①罗易敦促新的工农党派一个代表团到共产国际来。工农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是不可能的，因为工农党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但是，兄弟般的关系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在战略方面，罗易说，“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期间”，新的政党应设法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建立“工作联盟”，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努力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施加压力，使这一运动能够发挥它的“革命意义”。这个文件没有特别谈到国大党或夺取该党的必要性。

在策略方面，罗易表明他从加雅会议的经验中吸取到教训。他说，共产党人应该“在自己的宣传中不提暴力对非暴力的争论。”“为了不违背我们的纲领，这是我们所能采取的最明智的策略行动。”但同时他又认为，被剥削者的解放，“是不可能通过和平的与非暴力的手段来完成的。”

后来，全印会议并没有举行，主要的原因是印度共产党人之间的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立正是柏林所存在的情况的反映，在那里，札多巴塔雅仍念念不忘取代罗易在共产国际中的位置。如果当初在玛尼·拉耳的帮助下，穆克季能够召开一次会议，那就会是札多巴塔雅的胜利。如果辛加腊威卢召开会议成功，那就是罗易的胜利了。但是，双方都失败了；有数年之久，印度共产党人都无法组成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全国性组织。

① 同上, Exhibit No. 13, p. 29.

有趣的是，罗易沒有看到辛加腊威卢的宣言就支持他，但是，按照英国刑事調查处的說法，辛加腊威卢的确寄給他一份宣言。^① 上述事件发生六个月后，罗易写信給印度的一位同志說，他是根据听到的情况而表示贊成这一宣言的，当很久以后他实际看到这篇宣言时，才发觉这个文件像瑪尼·拉耳的宣言一样糟。他对該文件譴責布尔什維克党人和外国代理人一节特別不滿，因为这些話会为新政党从共产国际取得經費造成困难。^②

1923年6月，罗易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体會議；他的寄給工农党會議的备忘录，大概就是在那里写的。我們并不清楚，罗易是否在这次全体會議上說服执行委员会不再企图夺取国大党，但是他显然促使該委员会同意了工农党應該单独存在。这一点可以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拟議中的工农党會議的賀电中推断出来。这封电报所注日期是1923年6月24日，由科拉罗夫签署，电文是：

显然，承担絕大部分帝国主义剝削重担的工人和农民，不能繼續做資产階級民族主义的附庸而唯命是从，……工人階級必須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掌握領導权。^③

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並沒有接受罗易对資产階級的看法，因为电报接着說：

印度的資产階級是个革命因素，因为从客观上来說，这个階級的利益和帝国主义有冲突。爭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是一种革命运动。在領導这一运动时，只要資产階級的政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帝国主义展开斗

① Kaye, *Communism in India* (凱:《共产主义在印度》), p. 84.

② 同上, p. 85.

③ Cawnpore Case Evidence (《康波尔謀叛案証件汇编》), Exhibit No. 15, p. 32.

爭，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就必须同它們合作，并給予全力的支持。①

政府針對共产党人所采取的措施

如上所述，政府已經針對共产主义运动采取了法律行动，在白沙瓦謀叛案中，就逮捕和审訊过九名归国的“朝圣香客”。警察当局为此一直在寻找邵加德·烏斯瑪尼。1923年5月31日，烏斯瑪尼前往邮局領取罗易汇来的二十五英鎊汇款时，終於被捕。毫无疑问，这一行动使其他主要共产党人惊惶不安。不久以后，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和庫拉莫·侯賽因也被逮捕和拘留起来。

这几次逮捕使得共产党人的銳气一蹶不振。显然，当局正在迅速采取行动。1923年7月，当局加强了检查工作，結果在孟买截获的6月1日的《先鋒》不下一千四百八十五份，6月15日的同一刊物达一千一百二十四份。②監視工作也更加严密了，以至丹吉在7月写信給罗易說，他现在成了“公开組織者”，因为他受到极其严密的監視，无法組織任何非法的机构。他又說：“在周围的人中，絕對找不到組織非法机构的人选。”“甘地主义已經破坏了保密的心理和要素。”③

在1923年的下半年，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处于瘫痪和瓦解状态。罗易承认自己的工作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但是最大的

① 同上，p. 33.

② Kaye, *Communism in India* (凱：《共产主义在印度》)，p. 99.

③ 《康波尔謀叛案証件汇编》，No. 24, p. 11. 談到1921年的民族主义运动，尼赫魯在自传中写道：“再也沒有人为避免同当局发生糾紛而窃窃私語或使用婉轉的合法辞句了。我們談論我們的感受，而且从屋頂上大声地說出来。有什么后果值得我們担心呢？監獄嗎？我們但願走进監獄，那会进一步帮助我們的事業。一向包围我們、跟踪我們的无数奸細和秘密情报人員，都成了可怜的家伙，因为再也沒有可供他們刺探的秘密了。我們全部的牌始終都攤在桌面上。”見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著：《走向自由》(Jawaharlal Nehru, *Toward Freedom*) (New York: John Day, 1941), p. 69.

失望情緒，却是他的妻子伊夫林流露出来的。1923年7月，她写信給孟加拉的一位革命人士說，英国的暴政方針，一定給了上层階級很大的影响，以致“使少数上层分子发起疯来，一心一意要采取想入非非的流血行动。这会使白人意气沮丧……。让动乱发生吧，即使动乱也比人民无生无息地活着要好些”^①。

到1923年12月，本地沼里的法国当局显然已經同英国人全面合作了，因为在这个月份里，他們查禁了《先鋒》和《国际新聞通訊》，并沒收了一整箱写明寄給沙尔瑪的共产党印刷品。沙尔瑪表示，如果条件具备，他願意前往欧洲。于是，罗易派出自己的代理人息巴息前去本地沼里，为沙尔瑪带去款項和一份前往波斯的护照。但是，息巴息刚刚到达，法国当局就立刻命令他离境，同时把沙尔瑪拘留在一个距海港不太远的一个小村落中。^②从此，罗易同印度的主要聯絡綫便被割断了。

1924年1月，印度政府拟就一份关于共产党人在印度的活动的訴訟事实摘要，送請法律顧問就訴訟問題提出建議。这份摘要提到了謀叛案中的所有成員，从罗易一直到那些用提供自己的住址来掩护积极活动的共产党人的人員，并詳細記述了以下人員的活动：罗易、穆札法尔·艾哈迈德、邵加德·烏斯瑪尼、庫拉莫·侯賽因、S.A.丹吉、辛加腊威卢·捷底阿尔、R.C.L.沙尔瑪、那黎尼·古普塔、S.D.哈桑、M.P.T.威拉俞塔莫（辛加腊威卢在馬德拉斯的伙伴）、薩莫布尔那南德、瑪尼·拉耳以及薩达·帕格达（在联合省活动）。政府法律顧問建議对前八人起訴，而沒有就其余五人表示意见。意味深长的是，阿巴尼·穆克季沒有受到起訴处分，并于1924年3月回到欧洲。英国人相信，穆克季到印度来是“得到

^① Kaye, *Communism in India* (凱：《共产主义在印度》), p. 97.

^② 同上, p. 108.

共产国际的秘密批准的”，他后来的莫斯科之行似乎証实了这一点。^①此外，他們也知道，穆克季正在进行反对罗易的活动。因此，他們很可能认为，让他行动自由，給罗易制造麻烦，会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更大的損害。根据英国刑事調查处的材料，穆克季使罗易感到十分头痛，以致罗易表示，如果他回到柏林来，他就决心把他暗杀掉。^②

康波尔謀叛案

1924年2月27日，在康波尔提起訴訟，指控罗易、古普塔、艾哈迈德、烏斯瑪尼、丹吉、侯賽因、沙尔瑪以及辛加腊威卢等被告“阴謀在整个英属印度建立一个叫做共产国际的革命組織的分部，目的是剝夺英王对英属印度的統治权”。^③然而，当审訊于1924年4月开始时，只有四名被告出庭，即古普塔、烏斯瑪尼、丹吉和艾哈迈德。罗易和沙尔瑪不在国内，无法逮捕归案。侯賽因成了告密人，因而对他撤消訴訟。辛加腊威卢經証明病势严重，无法从馬德拉斯前来出庭，所以免于起訴。

康波尔謀叛案的审訊于4月份开始，到1924年5月20日結束。丹吉承认，他曾經同罗易通信，但坚持并没有同意罗易的綱領，也沒有参加謀叛活动。其他被告則否认了一切，但是不利于他們的証据——包括他們的亲笔信件——是不容推翻的，因而定罪

① 同上，p. 121.

② 同上，p. 90. 塞西耳·凱也許根据罗易写給那黎尼·古普塔的一封信——注有柏林，1923年8月等字样——而推論得过分了。在这封信中，罗易說：“那个无賴现在何处？仍然在国内嗎？如果他来这里，我将为他举行祭礼。”(Cawnpore Case Evidence[《康波尔謀叛案証件汇编》]，Exhibit No. 54, p. 5)。在康波尔謀叛案被告律师的反复詰問下，凱否认曾雇用阿巴尼·穆克季。

③ Cawnpore Case Evidence(《康波尔謀叛案証件汇编》)，Introduction(引言)，p. 5.

并不是难事。他們被判四年徒刑。这次审讯的后果是，共产主义运动陷入瘫痪，因为审讯使影响最大的共产党领袖脱离了政治舞台，并以起诉和监禁吓住了潜在的后继者。

意味深长的是，在康波尔謀叛案上訴到高等法院以后，高等法院两位法官在一份 1924 年 11 月 10 日交下的冗长判决书中，把这一阴谋說成是“荒唐的和难以置信的”，因而实际上也就是承认，这一阴谋对国家安全始終沒有构成真正的威胁。^①然而，被告曾經“抱着最严肃的精神”从事活动，因此上訴无效。^②罗易对这一案件的反应是对被告表示輕蔑。“可怜的家伙，”他在 1924 年 11 月写道，“如果他們能够提出比較出色的辯护，四年监禁才是值得的。我們必須拥有比这班人更高明的共产党員和辯护委员会。他們真是地地道道的傻瓜！……如果被告席上的人好一些，律师席上的人不那么愚蠢，康波尔一案可以成为我們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③

罗易在欧洲所遇到的困难

在印度当局用法律去对付印度的共产党人时，罗易在欧洲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1923 年 9 月，他察觉到，德国人很可能要他离境。于是，他开始周游欧洲，訪問苏黎世、馬賽、巴黎、热那亚和

① 这项判决书见于 L. F. 腊希布鲁克·威廉斯所著《1924—1925 年的印度》(L. F. Rushbrook Williams, *India in 1924—25*) (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1925), p. 100. 1927 年印度情报局局长 D. 皮特里也认为，在康波尔謀叛案以前，共产党人并没有作出什么事来。皮特里說：“我們可以承认……罗易的‘非法政党’始終未能干出許多越軌的事来，而且，事实上，到該党的活动因康波尔起诉而中断时，該党干出来的事并不多。”*Communism in India, 1924—27* (《共产主义在印度，1924—1927 年》), p. 70.

② Williams, *India in 1924—25* (威廉斯：《1924—1925 年的印度》), p. 100.

③ *Communism in India, 1924—27* (《共产主义在印度，1924—1927 年》), p. 96.

阿姆斯特丹，目的在于寻找一个适当的地点設立总部并出版《先鋒》。他也謀求兄弟共产党的支援，請它們設法使自己的出版物越过英国的检查网。对他來說，英国检查制的效率是极其明显的。

当德国人果眞在1924年1月驅逐他时，他便前往苏黎世，并在那里出版《先鋒》。不过，这一办法显然只維持了两个月。該刊物于1924年3月1日出版的那一期，大概就是在苏黎世出版的最后一期，因为苏黎世中央图书馆說該刊物的合訂本到那一期止已經齐备。^① 罗易从苏黎世写了一封信（所注日期是1924年2月20日）給英国首相腊姆齐·麦克唐納，詢問是否能赦免他早期的恐怖主义罪行，准許他回到印度。这是康波尔謀叛案以前的事，因为，当罗易接获这一案件的消息时，他必然会認識到，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已經沒有返回印度的机会了。

根据英国刑事調查处的材料，罗易大概在出版了3月1日这一期的《先鋒》以后，便把总部从苏黎世搬到法国的安訥西去了。显然，他前往莫斯科期間，伊夫林在法国繼續出版《先鋒》杂志。因为同一資料来源还引用了罗易1924年3月从莫斯科写給伊夫林的一封信。罗易在信中說，共产国际已决定增加对“近东部”的經濟援助。他又說：“可以到手的經費簡直是无限的。”^②

在其后三个月中的某一时期，罗易的总部再度迁移，这次是搬到巴黎。至于罗易本人有沒有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前从莫斯科回到法国，我們并不清楚。但是，看来大致可以肯定，从3

① 塞西耳·凱爵士說，罗易的一位代理人保罗·森夫后来又在馬賽印行《先鋒》。1952年，一位作者曾在紐約公共图书馆參閱《先鋒》1924年的合訂本。他提請該館管理人員注意这本合訂本的破旧情况，并建議把这部有价值的珍貴刊物攝成显微胶卷。但是該館並沒有攝制，而且連原刊物也“撤銷”了。

② *Communism in India, 1924—27*（《共产主义在印度，1924—1927年》），p. 78.

月到6月这段期間，他並沒有留在莫斯科，因为英国刑事調查处报告說，他曾在1924年6月6日訪問柏林，由此前往莫斯科。此外，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具体地报告說，沒有印度代表参加6月12日的會議。^①不过，阿巴尼·穆克季确曾于1924年3月間到达巴黎。我們虽然无从得知他在那里停留了多久或会晤了什么人，但可以想像，不管他就印度革命运动說了些什么，都不会有利于罗易。英国刑事調查处后来报告說，穆克季于1924年8月在柏林，同年10月在莫斯科，两次都沒有同罗易晤面。^②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尽管穆克季也許在巴黎进行过中伤罗易的活动，尽管札多巴塔雅在柏林对罗易采取不友好的态度，罗易在共产国际的威信显然絲毫沒有受到損害，因为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开会时，他被选为执行委员会的正式委員和該委员会主席团的候补委員。^③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开会前不久，执行委员会曾发出一份詳細的报告，要共产国际各支部討論。这篇报告中关于印度的建議，仅限于說明印度共产党的任务：

在革命的基础上，恢复已被大资产階級放弃的民族解放运动；組織一个全国性的人民政党，其中应包括城市小资产階級、貧困的知識分子、小職員、要反抗的农民和先进的工人；建立一个无产階級的政党。

印度共产党必須把工会运动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它必須在階級基础上改組工会运动，必須把全部异己分子从这一运动中清除出去。^④

① *Inprecor*(《国际新聞通訊》),IV(June 18, 1924),p. 341.

② Kaye, *Communism in India*(凱:《共产主义在印度》),p. 135.

③ *Inprecor* (《国际新聞通訊》),IV(Aug. 12, 1924),p. 614.

④ *From the Fourth to the Fifth World Congress* (《从第四次到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4),p. 68.

這項慎重的建議沒有說明“全國性的人民政黨”究竟應該在國大黨內還是國大黨外建立；執行委員會的這份報告也沒有提到共產國際應該同印度國大黨這樣的民族主義組織建立什麼樣的關係。這個問題在四年以前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就已經提出來了，而且，即使從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正式報告中也顯然可以看出，它仍然是熱烈辯論的主題。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第五次代表大會前夕擬就的一項關於該委員會的報告的決議中，提出了它對這一問題的看法。這項決議率直地說，執行委員會應該同“民族解放運動”建立“直接的聯繫”。^① 從後來的發展來看，就印度而言，這項決議的意圖似乎顯然是要執行委員會和印度國大黨之間建立直接的關係。但是，羅易卻完全反對這一點。他在第二十一屆會議上對共產國際代表說：

我必須首先指出，在關於執行委員會報告的決議中，有一句話同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提綱不相符。我的修改意見遭到否決[顯然是在殖民地委員會]，理由是說它與同一個提綱不相符。但是，我想證明，同提綱不相符的正是這個決議。當我們根據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所發生的事件來考慮這個決議時，它是完全錯誤的。決議說，為了贏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必須“直接進一步發展執行委員會同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直接聯繫”。的確，我們必須始終同這些民族運動保持聯繫，但是，決議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些聯繫並不總是成功的。^②

接着羅易引証了列寧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提綱。提綱說，共產國際應該支持殖民地的革命運動。

唯一的目的是在於團結未來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各單位，教育它們，使

① 原草案無法弄到，但羅易在自己的發言中卻引用了這些話，而且這些話也出現在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最後決議中。

② *Inprecor*(《國際新聞通訊》),IV(July 25, 1924),p. 518.

它們認識到自己的具体任务，即对本民族中的資產階級民主傾向展开斗争的任务。①

罗易最后說，“如果这是我們的任务”，

那么，我們就必须同群众保持直接的联系，但是，決議却說，我們必須同民族解放运动保持直接的联系。这类运动包括各种各样的階級和目标。如果我們墨守这条籠統的公式，我們將永远无法前进。我們以前的失败就是由于理論上的混乱。②

代表大会最后通过的決議仍然包括罗易力图删掉的那句話。決議的主要段落如下：

18. 除了爭取农民群众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支持之外，执行委员会在其指示中始終強調，必須爭取那些为解放殖民地各民族和东方各民族而斗争的革命运动，使这些运动成为資本主义国家中革命无产階級的同盟軍。这不仅需要扩大执行委员会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之間的直接联系，也需要帝国主义各国支部同各該国殖民地之間建立非常密切的联系，同时，还首先需要各国資產階級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展开不断的斗争。在这方面，各地的活动还非常軟弱无力。③

罗易很可能看到这项決議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因为決議号召同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建立他本人无法建立的直接联系。由于命令各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各該国殖民地的政治运动建立“非常密切的联系”，決議事实上提出双重威胁。因为，这实际上等于指示英国共产党更全面地参与印度共产党的事务，而这一点也很可能产生損害罗易的地位的后果。

罗易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中的处境，要比他在前几次代表大会中的处境困难得多，因为決議所隐含的威胁迫使他比过去更大胆

① 同上。

② 同上。

③ *Inprecor*(《国际新聞通訊》), IV(Aug. 29, 1924), p. 647.

地說明自己的立場。

尽管罗易对大家的意见作了让步，例如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资产阶级叫做“革命的先鋒队”了，但他同共产国际战略之間的基本分歧还是极其明显地暴露出来，致使殖民地問題委员会主席曼努伊里斯基起来指責罗易有偏差。曼努伊里斯基在致全体會議的报告中說：

委员会中出现了某些偏差。正如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样，罗易夸大殖民地中的社会运动 [共产党和亲共产党力量]，而忽視民族运动……。他竟然說，民族运动已經丧失了作为被压迫国家各阶级統一战綫的性质，新的时期正在开始，阶级斗争正在輸入殖民地。……在殖民地問題上，罗易反映了罗莎·卢森堡的虛无主义。真理是，应该正确权衡社会运动和民族运动的輕重。自决权能违背革命的利益嗎？如果罗易以这种方式提出問題，我們就可以同他討論。^①

罗易沒有在印度“爭取到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革命运动”。不但国大党不重視他，就是他自己的組織也实际上被康波尔謀叛案和塞西耳·凱爵士精明干练的警察工作破坏了。毫無疑問，罗易本来希望工农党会发展成一种能打动共产国际的組織。但是他甚至都沒有能够召开一次會議。至于共产国际的人員在多大程度上了解罗易的失敗，那是一件难以断言的事。不过，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辯論的确說明，大会中有不少人对印度革命运动的进展表示不滿。这次大会指派了一个专门委员会（除了其他委員外，还有罗易、曼努伊里斯基、斯大林和片山潜）去审查殖民地問題，并准备拟定詳細建議。

在其后的三年中，罗易所以能保全他在共产国际中的高位，显

^① 同上，(Aug. 12, 1924), p. 608. 这几句話並沒有出现在英国共产党所发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摘要报告中。

然不是由于他对印度革命的貢獻。

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會議

罗易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回到法国，于 1924 年 8 月到达巴黎。对罗易來說，这一年下余几个月的收获也不大。11 月，他接到了康波尔謀叛案上訴失敗的消息；同月，他怀着絕望的心情写信給一位印度同志說：“我們实际上同各方面断絕联系已有数月之久了，必須立刻用一切办法来恢复联系。”^① 最大的打击是在 1925 年 1 月 30 日来到的，这一天，罗易和他的妻子在巴黎被捕。伊夫林旋被释放，并准予留在法国，而罗易則被解往卢森堡。不过，他沒有在那里停留很久，因为到了 3 月 21 日，他已在莫斯科参加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會議了。

第五次全体會議开会时，會議面临两个关于印度的重要問題，都沒有在去年夏季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得到解决。第一个問題是共产国际对印度国大党的态度；第二个問題是执行委员会應該同这个党保持什么方式的“直接联系”。殖民地問題委员会主席是美国代表“多尔西”；他向全体會議提出的报告，是闡明委员会所商定的方針的唯一公开发表的材料。多尔西說：

代表們的报告說明，在印度，革命运动目前正处于过渡阶段，它正在寻找适合印度真正的根本性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的新方式和新策略。过去甘地的非暴力和不合作运动已經垮台，继之而起的是自治党及其議會阻挠政策。这个党已瀕临垮台的边缘，目前正在瓦解为一个介乎资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群众运动之間的小小的中間派。印度的群众对自治綱領并不滿意。他們要求摆脱英国政府。

殖民地問題委员会建議在印度实行下列政策：“委员会认为，目前共

^① Kaye, *Communism in India* (凱：《共产主义在印度》), p. 139.

产党人有必要繼續在国大党和自治党的左翼中展开工作。一切民族主义組織应该組成一个群众的革命政党，即全印反帝联盟。印度共产党人提出并加以宣传的建立人民党的口号——它的綱領的要点是：脱离英帝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普选和废除封建制是正确的。”

委员会在自己的決議中指示印度共产党人致力于爭取农民群众的領導权，鼓励組織和合并工会，領導工会的一切斗争。^①

从这段引文显然可以看出，罗易的战略理論再一次遭到否决。共产国际仍然认为資产階級是革命的，仍然希望同印度国大党合作。然而，这次全体會議的确贊同組織一个“群众的革命政党”，不过，會議指出，这个政党应由“一切民族主义組織”組成。而在印度組織工农党的微弱活动，同这一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英国共产党的影响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問題的決議曾指出，“在帝国主义各国[共产国际]支部应同各該国殖民地之間”，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1925年初，英国共产党开始根据这一指示采取行动，成立了一个殖民地委员会，并派遣另一位使者——佩西·E. 格拉丁——前往印度，考察革命形势。罗易反对此行。格拉丁于1925年1月30日抵达印度，訪問了几个大城市，于4月10日离去。他回到英国时，向英国共产党报告說，“印度根本沒有共产党团体。”^②

1925年春，許多海外团体想要指导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罗易既被法国驅逐，只得逗留在柏林。他这次被驅逐，用他自己的話

① *Inprecor* (《国际新聞通訊》), V (April 18, 1925), p. 513.

② *Communist Papers* (《共产党文件》), Parliamentary Publications, 1926, Vol. XXIII (Accounts and Papers, Vol. 8), Command 2682 (London: HMSO, 1926), p. 84.

來說，“对我影响很大，打乱了我們的工作。”^① 他的妻子伊夫林仍然留在巴黎工作，有一小批印度人帮助她，其中最重要的是 G. A. K. 卢哈尼和穆罕默德·息巴息。除了出版《先鋒》（于 1925 年 1 月 1 日改名为《印度群众》）之外，伊夫林还同某些法国知識分子一道工作。这些人以昂利·巴比塞为首，組成一个支持印度委员会。这个团体做了一些有利于印度独立的宣传工作，但是没有能够使得对罗易的驅逐令得到撤銷。^② 在英国，英国共产党殖民地委员会（有时称为殖民地部）和印度局（約由十二名印度左翼分子組成，其中大多数是住在伦敦的学生），都集中精力从事印度事务。薩布尔吉·薩格拉德瓦拉也积极从事英国共产党和印度局的工作，他是一位祆教徒，1922 年被选入英国議會。既有这么多团体对印度革命运动感兴趣，就必然要发生摩擦。

英国共产党在这段时期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计划在欧洲召开一次东方会议，并邀請殖民地地区的代表参加。1925 年 6 月，札曼·拉耳、G. 果斯瓦米和 N.M. 卓什——三位溫和的印度工会工作者——前往日內瓦参加国际劳工組織会议。当他們路过伦敦时，英国共产党人邀請他們参加东方会议。他們表示同意，并提出另外二十五位可以邀請参加会议的印度人士。^③

为了討論拟議中的东方会议和消除由于过多的共产党团体关心印度而造成的混乱，英国共产党邀請了一小批欧洲共产党人于 1925 年 7 月 11、12 日在阿姆斯特丹集会。出席的有 M.N. 罗易、伊夫林·罗易、斯尼弗力、格特魯德·海斯勒、汗（印度局）、格拉丁、N.J. 烏帕达雅雅（他为英国共产党在伦敦組織印度海員）以及英

^① *Communism in India, 1924—27*（《共产主义在印度，1924—1927 年》），p. 102.

^② 同上。第 92 頁說，支持印度委员会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建立了直接联系。

^③ *Communist Papers*（《共产党文件》），p. 77.

国共产党的克萊門斯·杜德和 R. W. 罗布逊。^① 罗布逊就阿姆斯特丹會議写成了一份詳尽的报告，后来当英国警察当局查抄英国共产党总部时被搜出，連同其他查获文件发表在英国一份特許公布的材料中。

罗布逊的报告指出，在印度事务的指导权問題上，罗易同英国共产党之間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罗易过去曾向共产国际抱怨說，在組織印度的革命方面，英国共产党人做得不够，而在阿姆斯特丹，他却抗議他們做得太多。格拉丁的印度之行激怒了罗易。此外，印度局声称，交由英国共产党轉送罗易的信件，曾被拆封窜改，这尤其使他怨恨英国共产党人。他对东方會議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筹备，也感到憤慨。

罗布逊說过：英国共产党應該有权控制在英国殖民地进行的工作。罗易直接向这句话提出非难，他說：“这有帝国主义的味道。”伊夫林·罗易对此表示同意。^②他还宣称，有証明文件足以說明印度共产党团体的确存在，但又說，在格拉丁离开印度以前，他們沒能决定是否向他暴露自己。

不过，罗易和英国共产党之間的矛盾在几个月內就显然得到了解决，双方都感到滿意。从现有文件中看不出矛盾是如何解决的。許多年以后，那位在密拉特謀叛案中准备起訴书的法官，根据作証文件推断說，在阿姆斯特丹會議以后，罗易曾前往莫斯科，同共产国际殖民地局进行磋商。莫斯科在 1925 年 9 月 25 日写給英

① 密拉特刑事法庭的推事认为“R. W. 罗布逊”是格雷姆·波拉德的假名。密拉特(联合省)地方法庭。[密拉特共产党謀叛案。司法长官付审令。](Meerut: Saraswati Press, 1929), p. 96. 下文簡称密拉特付审令。

② *Communist Papers* («共产党文件»), p. 83.

国共产党的信中，扼要說明了罗易在印度革命运动中的地位。^①

莫斯科的决定并没有划出明确的权力界限，但的确曾暗示英国共产党，不应撇开罗易而独断独行。决定还指示罗易和其他在欧洲的印度共产党人成立印度共产党外国局，使該局成为印度組織的一个实际部分。莫斯科的决定当时显然还建議罗易訪問英国，以便直接同英国共产党和寄居那里的印度共产党人一起工作。不过，罗易始終沒有这样做，因为在康波尔謀叛案以后，如果他进入英国領土，英国当局必然会逮捕他。

緩和罗易同英共之間的摩擦的另一个因素是克萊門斯·杜德的努力。显然，他有时訪問欧洲大陆，并同罗易建立了友誼。事实上，他后来成了罗易所領導的印度共产党外国局的委員，同时繼續保持英国共产党黨員的身分。^②看来，罗易已經認識到，为了吸收海員作信差和向印度汇錢，他需要英国共产党的帮助。因此，在决

① 本书作者未能找到密拉特案件所用的全部文件汇编，因而无从研究这一案件的主要文件——P字2385号文件原文。正如許多其他文件一样，这一文件只好根据散见于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和付审令全文里的零散引文来推测。在这个案件的資料中，有一个地方有显著的出入，这或許是由于排印上的錯誤造成的。汇编各卷中这类錯誤甚多。付审令沒有提P字2385号文件的日期，但說它是在阿姆斯特丹會議以后拟就的，这就應該在1925年(第97頁)，而刑事法庭判决书則說文件的日期是1924年(第69頁)。从这一时期一些事件的前后关系来看，付审令的說法似乎是正确的。然而，在一本正式的印度共产党党史中却出现了一种相反的说法。“在这次會議[阿姆斯特丹]中，M. N. 罗易为殖民地局辯护的态度受到了批評。會議通过決議說，在印度組織政党的任务應該交給英国共产党。从此以后，英国共产党便开始过問印共的事务。”(Chalasanani Vasudeva Rao, *Bharatha Communist Party Nirvaana Charitra* [札拉薩尼·瓦苏堆瓦·腊欧：《印度共产党成立經過》，Vijayawada: Praja Sakti Press, 1943]), p. 26.

② 见《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Meerut Sessions Judgment)第69頁。罗易后来对杜德表示失望，这件事說明，在这个时候，他是信任杜德的。罗易在《囚徒日記片断：獄中來函》(*Fragments of a Prison's Diary; Letters from jail*) (Bombay: Indian Renaissance Assn., 1943) 第10頁中写道，“我相信他是个正直的人”。

定印度政策时，他无法剥夺他們的全部权力。密拉特謀叛案的法官在评价罗易这段时期的作用时说：

罗易肯定想把印度共产党活动的控制权或指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总想批评英国共产党的活动，說他們事前对問題并没有充分了解。看来，共产国际也部分地接受了这种看法。^①

现有的证据都支持这个結論。

在印度組織共产党的进一步嘗試

1924年，在康波尔謀叛案后不久，联合省的一位名叫薩达·帕格达的人决定組織一个合法的共产党。他根据康波尔一案推断，鼓吹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不合法的，只要不从事政府认为叛逆的活动，共产党是可以存在的。1924年間，帕格达的政党并没有引起人們多大的注意，但是到了1925年年中，共产党的活动又开始加强了。7月，那黎尼·古普塔被释出獄；9月，穆札法尔·艾哈迈德也因为健康不良获释。他們立刻恢复了組織工作。由于在他們坐牢时，他們的同志并没有做什么工作，他們自然对帕格达的政党感到兴趣。帕格达计划在1925年12月——正是国大党举行年会的期間——在康波尔召开一次共产党會議，大概是艾哈迈德把这项消息通知了罗易。10月，《印度群众》刊登了孟买的一則电讯說：“要断言該‘共产党’最后会采取什么形式，在綱領和行动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还为期过早。”^②

《印度群众》刊登的文章表明，罗易对帕格达集团感到兴趣；他派卓丁·米德腊回到印度，表面上是为了多了解一些有关这个团

① Meerut Sessions Judgment(《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 pp. 69—70.

② “New Political Parties”(《新政党》), *Masses of India*(《印度群众》), I(Oct., 1925), p. 15.

体的情形。不过，罗易很可能仅仅是为了摆脱米德腊；他认为米德腊既愚蠢又无用。^① 如果事实是这样，那就不是一个聪明的步骤了，因为米德腊显然会给印度共产党人构成一种印象，使人以为罗易对印度革命运动的经济援助本来可以远远超过他实际提供的数目。

当帕格达的“印度共产党”于1925年12月26日举行会议时，S.A. 丹吉和邵加德·乌斯玛尼还在狱中。但是，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已经获释。他出席了会议，同他一起出席会议的还有：马德拉斯的C.K. 伊因加尔，孟买的K.N. 卓格雷加尔、S.V. 卡堆、R.S. 宁勃加尔和J. P. 贝尔圭尔霍达以及拉合尔的阿卜杜耳·马季德。^② 所有这些都属于罗易的组织，或同罗易有直接联系，或通过丹吉、艾哈迈德或辛加腊威卢同他有联系。贝尔圭尔霍达实际上是警方的奸细，但直到1929年才发觉。^③

作为接待委员会主席，帕格达吸收了冒拉那·哈腊德·摩哈尼——著名的国大党员、穆斯林联盟主席、前一天在康波尔举行的全印哈里发大会的接待委员会主席。摩哈尼之所以出名，是由于他恰恰同甘地的比较温和的要求相反，主张国大党应宣布以完全独立为目标。会议主席是辛加腊威卢·捷底阿尔，即罗易过去希望作为打入国大党的媒介之一。

会议一开始就不顺利。当时国大党不允许会议在国大党年会的专用会场（帐篷式的围场）中举行。不过，又找到了另一个开会

① Cawnpore Case Evidence («康波尔谋叛案证件汇编»), Exhibit No. 28 B, p. 20.

② Meerut Sessions Judgment («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 p. 343.

③ 根据扫莫盈德那特·泰戈尔所著《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Saumy-yendranath Tagor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India*) (罗伯特·C. 诺思打字本) 一书的菲利普·斯普拉特的手注。

地点；約有五百人参加會議，其中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大概不怎么了解开会的意义。^①在向代表致辞时，摩哈尼和辛加腊威卢两人都特別強調这个党与共产国际无关。“我們的組織是純印度的組織。”“我們同其他国家所有类似政党的关系、特别是同第三国际的关系，只限于同情和思想上接近。”^②

辛加腊威卢說得甚至更加具体：

印度的共产主义并不是布尔什維主义，因为布尔什維主义是俄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所采用的共产主义的一种形式。我們不是俄国人。印度并不需要布尔什維克和布尔什維主义……。我們同世界共产党人一致，而不是同布尔什維克一致。^③

艾哈迈德和来自孟买的共产党人，知道这条路綫是不正确的，必須予以駁斥。

党的执行委员会于1925年12月28日举行會議；委员会由下列人士組成：卓格雷加尔、卡堆、宁勃加尔、艾哈迈德、阿卜杜耳·馬季德、貝尔圭尔霍达和伊因加尔。貝尔圭尔霍达和卡堆被选为总书记；艾哈迈德和伊因加尔分別被指派为自己那一区的書記。^④有关这次會議的現有文件沒有提到帕格达，他很可能根本沒有参加这次會議，因为他大約是在这个时候同共产党人鬧翻的。罗易在《印度群众》中猛烈地攻击帕格达，他接到关于这一會議的詳細报告时，严厉地批評摩哈尼和辛加腊威卢的发言，給他們两人扣上“幼稚”的帽子，他写道：

① J. Coatman, *India in 1925—26* (J. 寇特曼著：《1925—1926年的印度》) (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1926), pp. 195—196.

② 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25* (米德腊編：《1925年印度年鉴》), II, 367.

③ 同上, p. 371.

④ Meerut Sessions Judgment (《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 p. 343.

有人說，印度工人階級將獨立於國際無產階級運動之外，要在爭取民族自由的鬥爭中單獨承擔它的歷史任務，來解救自己。再也沒有比這類話更不符合共產主義精神的了。那些持有和宣傳這種觀點的人，遠遠不是共產主義者，他們是印度工人階級的真正敵人。^①

當帕格達集團籌備康波爾會議時，在孟加拉也展開了別的組織活動。1925年11月1日，在著名的革命詩人夸西·納茲魯耳·伊斯拉莫的領導下，在加爾各答組成了“印度國民大會勞工自治黨”。1926年間積極參與該黨活動的掃莫盈德那特·泰戈爾暗示，穆札法爾·艾哈邁德是該黨的創始人之一。^②該黨的正式黨史在最初的組織者中沒有提到艾哈邁德的名字，但確曾指出，1926年8月，他任該黨正式機關報的編輯。^③

這個新政黨要組織工人和農民，以謀求印度的獨立；要為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在議會中進行鬥爭，該黨黨員可以自由參加自治黨。關於這個新組織的消息是在1926年2月傳到歐洲的，因為，羅易主辦的刊物在這個月份說：“《印度群眾》歡迎勞工自治黨的成立，祝賀該黨發起人在力圖擺脫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時所表現的革命勇氣。”^④不過，這家刊物又承認，它還不知道，該黨的队伍是由哪些人組成的，也不知道該黨的政綱怎樣。

1926年2月6日，全孟加拉佃農會議在克里希納加爾舉行；

① “The Indian Communists an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印度共產黨人和共產國際》), *Masses of India* (《印度群眾》), II (March, 1926), p. 6.

② Tagor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India* (泰戈爾: 《印度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發展》), p. 6.

③ *A Call to Action* (《行動的號召》) (Calcutta: Workers' and Peasants' Party of Bengal, 1928), p. 49.

④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向正確方向邁進的一步》), *Masses of India* (《印度群眾》), II (Feb., 1926), p. 3.

會議決定成立孟加拉農工黨，并由該黨合并勞工自治黨。^① 該黨的領導集團主要是由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的，在 1926 年間，黨員的總人數只有四十名左右。新的孟加拉農工黨繼續出版《犁》（勞工自治黨 1925 年 12 月 16 日在孟加拉創刊的周刊），但在發行了十五期以後，由于缺乏經費，于 1926 年 4 月 15 日便停刊了。^②

由此可見，尽管印度共產主義運動的活動相當多，但在 1926 年前半年，它的規模依然是很小的。組織工作既不完善，一般也沒有成效可言。互相疑忌和經費缺乏，看來是主要障礙。英國刑事調查處報告說，共產黨人在 1 月份決定向羅易要經費，打算按是否寄來經費來決定同羅易的關係。^③ 經費沒有寄來。因此，1926 年 4 月在加爾各答舉行的一次非正式集會上，終於大家对羅易表示了莫大的憤怒。^④ 与会者決定寫一封措辭強硬的信給羅易，于是，米德腊·卓丁寫信給羅易在欧洲的主要副手息巴息說：

你們沒有体会我們在这里的困难……。老板[羅易]及其家屬过着王公般的生活，而这里的弟兄們——真誠的工人——却在挨餓。你們這些偽君子都毫無誠意，你們簡直是剝削者。你們的行為已造成一種非常不利于你們的不良氣氛，以至除了少數人之外，我們所有在旁遮普、聯合省、孟買和孟加拉的人現在都对你們喪失了信心。^⑤

正是在這個時候，羅易和伊夫林決定結束兩人之間的關係。在 1925 或 1926 年的某時，他們永遠分離了。究竟是在哪一天和

① *A Call to Action* (《行動的號召》), p. 46. 這個黨最後成為孟加拉工农黨 (Bengal WPP)。

② 同上, p. 49.

③ *Communism in India, 1924—27* (《共產主義在印度, 1924—1927 年》), p. 10.

④ 同上, p. 107.

⑤ 同上, 省略號是原有的。又見第 109 頁, 這裡暗示還寄出另一封譴責羅易的信。

出于什么原因，人們并不清楚，但他俩曾經因为罗易被逐出法国而分离过一个时期。英国刑事調查处认为，她是在1925年8月前后回到美国的；一篇官方报告暗示，直到1927年，还知道她的下落。^① 1925年以后，她的名字或假名——散底·堆維——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有关印度共产主义的文件或印刷品中。^② 毫无疑问，她的离去是罗易政治上的一个重大損失。她不仅为《印度群众》和《国际新聞通訊》写过許多篇文章，也为吸引昂利·巴比塞和其他法国知識分子参加印度独立事业做过許多工作。

在1924—1925年間，罗易在印度的势力急剧下降，与此同时，英国共产党开始指导印度共产党的事务。

第五章 英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作风”

当印度的共产党人在为了誰来领导新政党的問題爭吵不休时，欧洲的共产党人則繼續竞相夺取从海外指导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特权。在阿姆斯特丹會議之后，M. N. 罗易和英国共产党之間，显然保持一种互不甘心的休战状态，但是到了1926年初，双方在战略和策略問題上，再一次发生了公开的分歧。由于罗易和英国共产党人都繼續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自己主办的刊物和共产国际的正式出版物上），印度的共产党人便遇到了互相矛盾的意见，这对解决他們的策略和领导問題来說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使問題

① 同上，pp. 153, 366.

② 不要把伊夫林·罗易同埃伦（戈特肖克）·罗易混淆起来。后者在1929年遇上罗易，1936年在印度获释出獄后同他結了婚，在他去世以前，始終同他保持夫妻关系。

更加复杂的是，罗易和英国共产党都不得不遵从共产国际的正式路线去制定自己对印度的建议；罗易比英国共产党更感到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他始终没有接受共产党人应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合作这一普遍流行的战略。他自己的观点同共产国际正式政策之间的矛盾，常常反映在他的著作中，例如，1925年他为共产国际某一出版物写道：

从客观上说，印度的资产阶级是个革命因素；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革命任务，而且更糟的是，他们显然倾向于反革命，说得更恰当一些，倾向于反动。^①

罗易同英国共产党意见不同和意见相同之处，在1926年出版的两本书中，表现得最清楚。第一本是罗易著的《印度政治的未来》，其中的某些部分曾于1926年4月发表在他所主办的刊物《印度群众》中。第二本是克莱门斯·杜德的兄弟R.帕姆·杜德所写的《现代印度》。R.帕姆·杜德由于出版了这本书，儼然成了印度共产党人的顾问，直到今天，他还继续以这种身分拥有莫大的影响。这两本书都想成为研究问题的指南，都力图对影响印度的阶级力量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同时也都概述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

M. N. 罗易的《印度政治的未来》

在这本书中，罗易重新提出他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批判，同时指出“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群众。”^②他说，“大资产阶

① M. N. Roy, "Anti-Imperialist Struggle in India" (M. N. 罗易：《印度的反帝斗争》),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共产国际》), No. 6 [n. d.], p. 84.

② M. N. Roy, *The Future of Indian Politics* (M. N. 罗易：《印度政治的未来》) (London: R. Bishop, 1926), p. 78.

級实际上已置身于爭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之外。”

实际上，資產階級集團力圖同帝國主義的治安力量結成一條統一戰綫，以確保國內不致爆發任何革命。依然裝作從事議會斗争的中產階級，正陷入政治破產的絕境……。因此，印度政治（民族解放）的未來，將取決於現在和將來始終反對帝國主義的社會力量，它們就是在“帝國之內實行自治的崇高理想”盛行一時的新時代，也決不停止反對帝國主義。這些社會力量由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小商人、工匠、雇員、學生、小知識分子等等）組成。^①

羅易說，既然民族主義運動的整個社會基礎已經改變，新的階級聯盟就成為必要的了：

領導權和組織形式二者自然將取決於運動的社會性質。此後組成民族解放運動的社會成分將是小知識分子、工匠、小商人、農民以及無產階級。在印度社會的現有條件下，所有這些人都屬於被壓迫和被剝削的階級。民族解放運動將在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斗争基礎上掀起。此後，印度爭取民族自由的斗争，就成了接近於最後階段的階級斗争。^②

在這樣論述了戰略之後，羅易便轉而申述策略，特別是涉及組織形式的策略：“為了很好地承擔自己的政治任務，無產階級當然要有自己的政黨——共產黨。但是在黨內，無產階級的民主同盟者卻沒有存在的余地。”^③因而，他說，無產階級的“民主同盟者”，必須成為一個廣泛組織的一部分；這個組織要促使不同階級的革命分子一起投入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斗争中。羅易說：“如何把這些民族革命的力量組成一個民主的政黨，是印度革命者當前的迫切問題。”^④但是他又坦率地說：“沒有一個現有的民族主義政黨能

① 同上，p. 90.

② 同上，p. 95.

③ 同上，p. 98.

④ 同上，pp. 7—8.

够适合这个要求。”罗易心目中的民主政党是一个排除资产阶级分子的新国大党：

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必须由人民的政党来领导，这个政党的组织必须广泛到足以包容一切民族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将参加这个政党，但是，不论从名义上说还是从实质上说，它将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政党里，无产阶级将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站在一起，作为最先进的民主阶级。^①

总之，《印度政治的未来》论证说，印度现有的政治组织都不是革命的，当前迫切的需要是组织一个新的群众性政党，来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为独立进行斗争。

R. 帕姆·杜德的《现代印度》

杜德的《现代印度》一书中的意见，虽然在许多方面与《印度政治的未来》一书的意见相同，但有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在战略问题上，杜德就不那么轻易地把资产阶级当作不革命的而一笔抹煞。他说，“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是许多社会阶层的斗争，是工人、农民、下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斗争，甚至是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斗争。”^② 在策略问题上，两书的分歧甚至更大。杜德说，“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在现有的运动和组织中，展开一场澄清问题的斗争。在国大党和自治党内，左翼民族主义分子应该团结在一个符合民心的民族纲领的周围。”^③ 与罗易不同，杜德并没有号召立即组织一个新的群众性政党来代替国大党。他主张等待事态的发展。他

① 同上，p. 114.

② R. Palme Dutt, *Modern India* (R. 帕姆·杜德：《现代印度》)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7), p. 129. 本书作者未能找到这本书的印度版本。杜德在英国版本的序言中说，原文经过了修订。

③ 同上，p. 148.

說，“当时机到来的时候，新的力量就不得不去寻找它的組織形式和表达意见的形式。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形式，是否通过国大党和自治党这种现有形式，还是把这两者和其他成分結合起来，則是无关紧要的事。”^① 在罗易看来是“当前的迫切問題”的事，对杜德來說，則成了“无关紧要的事”。

《现代印度》一书，原来是 1926 年春在印度出版的。当次年該书英国版本出现时，上面附有一篇作者于 1926 年 12 月 1 日写的序言；序言暗示杜德已比較接近罗易的战略观点：

印度資產階級是今天的反革命势力；他們虽然希望独立，但是他們更害怕继民族独立之后必然掀起的社会革命，因此，他們同帝国主义者妥协，都变成了帝国的支持者。^②

至于策略：

只有一个以工农为基础并拥有一个代表群众利益的政治和社会綱領的新民族运动，才能带来新生命。发起这一运动的条件已經成熟了。^③

到了 1926 年年底，不論在战略或策略問題上，罗易同英国共产党之間似乎再也沒有任何重大分歧了。

致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声明书

12 月初，伦敦多里特印刷所（印刷罗易的《印度政治的未来》一书的同一家商号）发行了印度共产党《致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声明书》。^④ 从文件本身中看不出它是由誰拟就的。居住在欧洲的共产

① 同上，p. 148—149.

② 同上，p. 17.

③ 同上，p. 18.

④ *A Manifesto to the All India National Congress*（《致印度国民大会

党人，只有罗易、克萊門斯·杜德和穆罕默德·息巴息有权代表印度共产党发言。不过，这时罗易正在莫斯科，而且据推测，他至少从1926年11月22日就已经在那里，因为当时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全体會議正在开会。当然，声明书很可能是經他的批准早就拟就的。^①

就呼吁国大党采取一个激进的綱領一点來說，声明书同罗易四年前为加雅會議所草拟的文件相同。这說明，正像前一份文件一样，声明书也許是在坚决相信国大党会拒絕这个綱領从而暴露其資產階級方向的設想下提出的。不过，并不像加雅声明书那样有确凿的証据証明这一点。

1926年的声明书說，国大党正处于低潮，“只是在名义上存在着而已，”糾合在国大党内的各党派之間並沒有“什么基本区别”。文件強調，必須把該党“置于一个共和人民党的鼓舞影响之下”。声明书沒有詳談这个人民党的組織問題，也沒有說它應該設在国大党内还是独立于該党之外。但是，由于坚持必須把国大党“置于”一个人民党的“影响之下”，声明书也就表明了这个文件的起草者还不准备吩咐印度共产党人同甘地和尼赫魯的政党完全断絕关系。

派往印度的共产党密使

在罗易同英国共产党还没有在战略与策略問題上取得真正的協議以前，英国共产党就已开始认真地接收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

党的声明书》)(London: Dorrit Press, [n. d., 1926?])。声明书所注的日期是1926年12月1日；英国博物館所保存的声明书副本是在1926年12月13日得到的。

① 《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Meerut Sessions Judgment)第89頁暗示，声明书是在印度拟就的。

指导权。1926年4月30日，苏格兰煤矿工人、英国共产党党员乔治·艾利逊到达孟买。^①他在这个时期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是由红色工会国际派往印度的，目的在于推动工会组织。^②他在印度显然仅仅从事工会活动，直到1926年11月才受到当局的注意，这时，通过被截获的信件，查明他同已知的共产党人有联系。^③1927年1月22日，艾利逊的假护照（是用当纳德·坎贝尔的假名领取的），在加尔各答警察的一次查抄中被发觉。当局第二天便逮捕了艾利逊，随即判罪收监，最后把他逐出印度。

在艾利逊被捕前一个月，英国共产党又派了另一位使者前往印度。他就是在剑桥读书时期加入共产党的二十四岁的党员菲利普·斯普拉特。“我并不是作为专家而被派往印度的，”斯普拉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谦虚地说，“我之所以被选中是由于警察当局不知道我，我所要做的是信差和汇报者的工作。”^④在离开英国以前，斯普拉特被秘密带去会见共产国际驻伦敦代表俄国人彼得罗夫斯基。他的唯一指示是，斯普拉特应该写一本有关中国的小册子，敦促印度学习国民党的榜样。1926年12月，克莱门斯·杜德把斯普拉特带到巴黎，在那里会见了罗易的主要副手穆罕默德·息巴息。斯普拉特在巴黎逗留了几天之后，表面上作为伦敦一家外文书店的代表，取道马赛，前往印度。他于1926年12月30日到达孟买，立刻成了一位远远超过“信差和汇报者”的人物。

斯普拉特回忆说，他的使命是同穆札法尔·艾哈迈德、S.V.卡堆等印度共产党人取得联系，指示他们组织一个能够合法掩护

① Meerut Sessions Judgment(《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 p. 92.

② Philip Spratt, *Blowing Up India* (菲利普·斯普拉特:《炸毁印度》)(Calcutta: Prachi Prakashan, 1955), p. 32.

③ Meerut Sessions Judgment (《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 p. 93.

④ Spratt, *Blowing Up India* (斯普拉特:《炸毁印度》), p. 29.

共产党活动的工农党。^① 1929年密拉特謀叛案曾經引証的文件表明，斯普拉特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把共产党人放在国大党組織內的領導职位上。他在发給为成立孟买工农党而召开的會議的一个指示中，列举了新政党的主要任务：“(1)取得国大党各委员会中的代表权；(2)促使职工大会接受綱領并推选我們的代表；(3)支持“紡織”文件；(4)增加党员；(5)发起‘不干涉中国运动’。”随后他又說：“应该尽快地在孟买成立由国大党委员会、自治党、工会、工农党等組成的統一战綫委员会。”^② 1927年2月8日召开了會議，孟买工农党在会上正式成立。^③

1927年1月14日，另一位共产党訪問者到达了印度。他是薩布尔季·薩格拉德瓦拉，一位居住在伦敦的印度人。作为共产党候选人，他由一个工人阶级选区被选入英国議會。关于薩格拉德瓦拉进行这次訪問的动机，我們并不清楚，但是他不可能是英国共产党派去的。斯普拉特在叙述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认为，杜德兄弟和薩格拉德瓦拉之間，因为都想对印度共产党人树立威信。可能有某种对立的情緒；斯普拉特还忆起，在他前往印度以前，克萊門斯·杜德曾帶他去见薩格拉德瓦拉，当时杜德曾流露出“也許是輕視也許是不喜欢薩格拉德瓦拉的神气”。^④

就在薩格拉德瓦拉离开英国前往印度的前后，印度共产党人——包括加尔各答的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在孟买举行會議并拟定計劃，准备于3月間在拉合尔召开一次共产党會議。他們决

① 同上。

② *Meerut Sessions Judgment*(《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 p. 97.

③ 同上, p. 98. 并請參閱《密拉特謀叛案証件汇编》(*Meerut Conspiracy Case Evidence*), Exhibit No. p. 420.

④ *Spratt, Blowing Up India*(斯普拉特:《炸毁印度》), p. 36. 并請參閱《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Meerut Sessions Judgment*), pp. 102—103.

定邀請薩格拉德瓦拉主持這次會議。但是薩格拉德瓦拉並沒有為印度共產黨人所動，他不僅謝絕了他們的邀請，而且還在一封向新聞界發表的信中批評了他們。這種作法激起了很大的反感，同時也產生了很壞的宣傳效果，因而共產黨人決定取消拉合爾會議。^①然而，到了3月，薩格拉德瓦拉改變了態度，因為他把印度共產黨人邀請到德里來，彌合了同他們的分歧。當時在德里決定，1927年5月29日在孟買舉行大會，並在大會上通過黨章，選舉執行委員會。^②

總的說來，薩格拉德瓦拉的這次旅行，是他個人的一个勝利。他訪問了印度的好幾個地區，所到之處吸引了大批群眾。報紙詳盡地報道了他的演說，加爾各答還正式歡迎他，這是不久前該市認為不宜給予來訪的總督的一種禮遇。薩格拉德瓦拉還會見了聖雄甘地，並撰寫長篇公開信，力圖使甘地相信他自己的經濟理論是反動的，充當宗教領袖只會使人腐化。薩格拉德瓦拉指責說，甘地由於扮演了聖雄的角色，“正在破壞這些村民今後一兩代的情緒和心理。”薩格拉德瓦拉還說，“從政治上來說，您的這番事業是有害的，據我看來，從人道主義的觀點來說，其腐化作用也正是一場道德上的災難。”^③

不過，薩格拉德瓦拉對甘地的公開攻擊，卻引起很多公眾的不滿，到他準備離開印度時，他的聲望已大大降低。等到他最後在1927年4月9日登輪返回英國時，孟買市政府已拒絕他發表告別辭。正如在他以前和以後的共產黨人一樣，薩格拉德瓦拉發覺，馬

① Meerut Sessions Judgment (《密拉特刑事法庭判決書》，p. 103.)

② 同上，p. 151.

③ Shapurji Saklatvala, *Is India Different?* (薩布尔季·薩格拉德瓦拉：《印度是個例外嗎？》)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7), p. 17.

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毕竟还不是圣雄那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复兴主义的对手。

这段时期的另一位共产党使者是法澤耳·伊拉希（別名古尔班），他是一位在莫斯科受过训练的“朝圣香客”，也是罗易在欧洲最信任的同志之一。他所以被派往印度，显然是为了在英国共产党加紧活动的时候前去照顾罗易的利益。印度当局事先就已获悉伊拉希的使命，等他在1926年12月末抵印时，就立刻把他置于监视之下。^①看来，乔治·艾利逊的被捕使他大为不安，结果他固然访问了加尔各答、馬德拉斯、德里和孟买的共产党人，却没有什麼成績。他终于在1927年4月5日被捕，在白沙瓦按印度刑法第121-A款被起诉，并被判处五年徒刑。^②

1927年5月31日，共产党人在孟买举行会议。大部分重要的印度共产党人都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5月24日才获释的S. A. 丹吉。^③ S. V. 卡堆当选为总书记；穆札法尔·艾哈迈德、K. S. 伊因加尔和S. A. 丹吉被选入主席团。^④

在孟买会议上，提出了参加共产国际的问题。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宣称：“印度共产党盼望共产国际以及世界各地共产党对印共在国内的工作给予指导。”^⑤在现有的文件中还没有迹象说明，印度共产党人有要求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意图。但是从菲利普·斯普拉特、卡堆、米腊吉卡以及其他显然忠于共产国际的共产党人

① *Communism in India, 1924—27* (《共产主义在印度，1924—1927年》) (Calcutta: Govt. of Indian Press, 1927), p. 114.

② 同上。

③ Meerut Committal Order (《密拉特司法长官付审令》), p. 198. 并請參閱 S. A. 丹吉著：《人間地獄》(S. A. Dange, *Hell Found*) (Calcutta: Vanguard Literature Co., [n.d.]).

④ Meerut Sessions Judgment (《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 p. 155.

⑤ 同上。

士居于领导地位这一事实来看,要使印共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似乎不致遇到任何重大的反对。很可能,在孟买开会的共产党人顾虑政府再提出公訴,因而要避免让政府捉住任何把柄来指控他們是国际阴谋机构的成員。这也似乎是丹吉在获释时宣布自己是一个“印度共产党人”而不是“布尔什維克”的原因。丹吉这番話遭到罗易的刊物《印度群众》的攻击;这家刊物反对任何暗示有所謂共产主义的印度变种的说法。“一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7月份的《印度群众》說,“否則它就不可能是共产主义的,就可能蜕变成任何东西……。要寻求特殊的印度共产主义是荒謬的。一个印度人只要自称是共产党人,就必須是世界其他地区那样的共产党人。”^①可以肯定,印度共产党领导人本来就贊同这种說法,《印度群众》认为需要刊登这一譴責,正說明它的編輯完全不了解印度局势。^②

1927年間,印度共产党人加强了活动,这大部分应归功于菲利普·斯普拉特的工作。他是一个能干而具有献身精神的工作者,为工会和党的工作带来了新的力量。他提高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迫切需要的效率,因而,保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严密起来,来自欧洲的钱也比较順利地汇到。到了9月,英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党员本杰明·F·布莱德雷和斯普拉特到一起工作。布莱德雷冒充工程师,名义上代表他兄弟的商号——克萊布特許下水道陶管公司——駐在印度。英国共产党似乎沒有估計到,这种公司的名称即

① “An Indian Communist?” (《是一个印度共产党人嗎?》), *Masses of India* (《印度群众》), III (July, 1927), pp. 1—2.

② 罗易否认在1927年头八个月中該刊物是由自己負責的。见M. N. 罗易所著《我們的分歧》(M. N. Roy, *Our Differences*) (Calcutta: Saraswaty Library, 1938), p. 28.

令不致引起怀疑,也难免由于可笑而引起注意。^① 布莱德雷和斯普拉特两人竟成了印度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通过艾哈迈德、米拉吉卡和卡堆进行工作。斯普拉特回忆说,“我们并没有成立一个集团的意图,我们只不过是同那些我们认为无条件忠于共产国际、能够保守秘密、在金钱上相当可靠的党员集聚在一起。”^② 在斯普拉特和布莱德雷的领导下,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以印度人自己无法取得的速度开展起来。

罗易离开了印度政治舞台

几乎就在英国共产党派遣斯普拉特前往印度的同时,共产国际派遣罗易衔命前往中国。因此,在1927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即当斯普拉特和布莱德雷正在组织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时,罗易却远远离开印度政治舞台,与印度的事务完全失去联系。由于他离开欧洲,英国共产党人便得以放手过问印度共产党事务。此外,由于英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时取得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控制权,所以值得我们对罗易出使中国的来龙去脉进行一番研究。

1926年秋的某时,罗易离开柏林,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1月22日到12月16日举行的第七次全体会议。^③ 中国是全体会议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正如往常一样,总的分歧还是集中在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上,而这一次,则具体集中在资产阶

① Meerut Sessions Judgment (《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 p. 162.

② 引自扫莫盈德腊那特·泰戈尔所著《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Saumyendranath Tagor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India*) (罗伯特·O. 诺思打字本)一书的菲利普·斯普拉特的手注。

③ 《国际新闻通讯》(*Inprecor*, VI [Oct. 28, 1926], p. 1221) 报道罗易于1926年10月23日到达莫斯科。

級的国民党的作用上。^①

蔣介石率軍北上，正在中国大部分土地上巩固国民党政权。中国共产党人是国民党的一部分，他們联合国民党的左翼反对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人还在农村組織农民，为自己打下强大的群众基础，但是他們的活動却多少失去控制，并发生了自发的暴动。在暴动中农民要求沒收土地，把土地交給耕种者。可是，由于土地占有阶级控制了国民党，并且通过它的軍官控制了国民党的軍隊，因而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支持农民革命，就几乎肯定会面临被开除出国民党的危險。

出席第七次全体會議的中国共产党代表，連同代表共产国际到过中国的委員以及大多数其他代表，都主张同国民党繼續保持良好的关系，但罗易却不同意。罗易在二十年后才发表的一部著述中回忆說：

只有我一个人主张一种不同的观点：中国革命已經到了紧要关头，必須打开一条新的出路，不应该把同国民党結成的同盟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採納了我的观点。斯大林本人在开始时曾反对这个观点，但是他被說服了。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提綱是我草拟的。在这以后，我立刻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新代表团的团长，动身前往中国。^②

这一时期的正式文件仅仅証实了罗易所謂他不信任中国资产阶级

① 关于第七次全体會議就中国問題所进行的辯論的詳細說明，請參閱罗伯特·C. 諾思所著《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Robert C. North,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91—92. 这里所談的中国政治形势，主要以諾思的这本书为依据。

② M. N. Ro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M. N. 罗易: 《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Calcutta: Renaissance Publishers, 1946), p. 538n. 在会见罗伯特·C. 諾思时，罗易对布勃諾夫和布哈林的合作表示感謝。见諾思: 《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North,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p. 90,

一点。罗易 1926 年 11 月 30 日在全体会议的发言中说：

这时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是尽可能同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暂时妥协。如果由民族资产阶级来决定革命的进展和策略，那么，革命就会由于帝国主义的这个新政策而遭到破坏和削弱。因此，事情很明显，当我们谈起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时，我们不得不把大资产阶级抛开……。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离开革命已经愈来愈远；而且，随着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愈来愈强，资产阶级上层离开革命也必然会愈来愈远，结果会同帝国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反对革命的中国。^①

如果罗易是在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等同起来（看来有理由认为他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是真反对把国民党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很明显，这种看法没有受到中国问题委员会的重视，因为该委员会主席谭平山在对全体会议的报告中说：

委员会一致反对俄国反对派所提出的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的要求。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今后应该更巩固起来。^②

而且全体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正是罗易自称是由他草拟的那个决议）本身也说：

主张共产党必须脱离国民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国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它的性质和前景，都要求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并加紧他们的工作。^③

这正是派遣罗易前往中国去帮助执行的政策的主要精神。

等到罗易于 1927 年初到达中国时，事态发展得非常快，中国共产党人已面临一个崭新的局面。蒋介石在完成了北伐以后，同

① *Inprecor*（《国际新闻通讯》），VI(Dec. 30, 1926), p. 1604.

② 同上，VII(Jan. 27, 1927), p. 174.

③ 同上，(Feb. 3, 1927), p. 233.

国民党左翼破裂，4月間开始以暴力对待共产党人，在上海街头屠杀他們。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受到控制武汉的国民党左翼的欢迎，这部分国民党的領袖汪精卫主张出师討蔣。与此同时，武汉地区的农民起义日漸增加，这使得武汉国民党領導人大为不安，因为其中許多人虽然思想左傾，却属于地主階級。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严重局面：他們是要領導农民发动一場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来反对武汉国民党，从而夺取这一地区的控制权呢？还是應該支持后者出师，进行拟議中的反蔣討伐呢？

罗易自称，他敦促中国共产党人支持农民革命，但是，同时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駐在中国的鮑罗廷，則主张支持武汉的領袖們出师討蔣。罗易向莫斯科提出了这个問題。6月1日，他收到斯大林发来的电报，明确地指示他同时采取上述两种方針。鮑罗廷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显然在罗易之上，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意暫緩进行革命，支持武汉国民党。但是已經太迟了。汪精卫已对共产党人起了疑心，把他們从武汉国民党中清洗出去，并同蔣介石言归于好。

有人认为，汪精卫的背叛应由罗易負責；由罗易的責任問題而引起的爭論則集中在斯大林的电报上。在指示罗易和鮑罗廷既支持农民革命又支持武汉国民党时，斯大林說得很清楚，对武汉集团的支持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計。斯大林說，“国民党的領導集团必須更換，必須由那些已在农民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領導人来补充……。必須立刻清除不可靠的將領。”^①

罗易让汪精卫看了这封电报；姑不論汪精卫是否以为电报也把自己当作“不可靠的將領”之一，反正他立刻向共产党人翻了臉，

^① 引自諾思：《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North,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第106頁。諾思曾注明这份电报有不同的譯文。

同蔣介石携起手来。

指責罗易的人說，他必然事先就知道汪精卫的反应是什么，让汪精卫看电报是个大錯。不过，按照罗易的說法，汪精卫已經怀疑共产党人准备支持农民革命而背叛他。罗易辯白說，他之所以让汪精卫看电报，是为了竭尽最后努力以挽回汪精卫的信任。^①

罗易沒有完成他赴华的使命，但是錯誤并不在他。錯誤在于共产国际所奉行的政策，即不惜削弱中国共产党以維系同国民党的联盟。可以肯定，中国的事态演变似乎証实了罗易同列宁辯論以后所一直坚持的論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是靠不住的，他們必然会背叛革命。罗易本来滿可以为自己的預见进行辯护。

罗易极力反对共产国际在中国所执行的政策，这一事实引起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在所有人中指派他去执行这一政策呢？他本人想回印度，而不想去中国。斯大林答应他，如果他胜利完成派往中国的使命，然后就派他去印度。他只是在得到这一許諾后才接受了这个使命。^②那么，为什么还要派他去呢？罗易接受这次使命的时候，恰好是英国共产党为取得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权而积极活动的时候。这一事实表明，罗易之所以被派往中国，可能是为了把他調离欧洲，从而使他无法参与印度事务。这个时期内的另一件事，即1927年2月在布魯塞尔举行的被压迫民族大会，足以証实这个假說。

被压迫民族大会

正如在第四章所提到的，英国共产党打算在1925年初就召开

① 同上，p. 107.

② 根据罗易的一位陪同他前往中国的朋友的談話，但此人要求作者不宣布他的姓名。

一次东方会议，并得到了三位温和派的印度工会工作者的合作。这三人是扎曼·拉耳、G. 果斯瓦米和 N. M. 卓什。当罗易同英国共产党人在阿姆斯特丹会议上讨论东方会议时，他极力反对这一想法，并对英国人干涉印度事务表示愤懑。英国共产党人 R. W. 罗布逊在他向阿姆斯特丹会议提出的报告中，曾叙述罗易的态度：

罗易曾要求就东方会议的安排以及我们同果斯瓦米、扎曼·拉耳、底勃·辛格和卓什的关系提出报告。于是，我报告了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其中与印度有关的主要是向某些印度人士发出约二十封邀请书。上述四人以及霍尼曼[即《孟买纪事报》编辑和印度民族主义的坚强支持者盖·霍尼曼]在邀请书上签了字。罗易抱怨说，没有见到有关这件事的主要材料，又说，他并没有收到报告。卓什曾在巴黎通知他，所有上述四人已接到前往俄国的邀请，萨格拉德瓦拉是居间人……。共产国际认为，除了真正的革命人士之外，并无需同这些人取得联系……。

罗易还问，英共有没有想到应就发出邀请书这件事同他商量，是否完全了解这四个人的历史？又问，我们是否应当信赖他们？接着，他便抨击这四个人的历史，伊夫林·罗易也这样做。……

他[罗易]比这四人中的任何一位都更了解印度的情况，但是我们并没有同他商量。我们奉行的是一种错误的政策。罗易希望，当这四位民族主义领袖在莫斯科时，他自己也在那里。他对东方会议的结局抱悲观，他不相信我们能得到真正的革命者。他认为我们通过扎曼·拉耳和其余三人所能接触到的人，都将是无用的。他并不反对他们前往莫斯科，但希望知道他们的出发日期。他认为会议必然毫无成效，他希望把他这种看法当作一项意见记录下来；同时他表示，如果英共认为有任何价值的話，他愿毫无保留地同英共合作。^①

罗布逊还报告了伊夫林·罗易的谈话：当扎曼·拉耳路过巴

^① *Communist Papers*(《共产党文件》), Parl. Pubs. 1926, Vol. XXIII (Accounts and Papers, vol. 8), Cmd. 2682(London: HMSO, 1926), pp. 85—86.

黎时，他曾拒絕同她会面。总之，这个文件表明，罗易同上述四人的关系不睦。他們是当时印度工会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同时也是国大党左翼的主要成员。由此可见，罗易过去对这四人所表示的敌对态度，足以进一步证明这样的假說：他所以被派往中国，是为了清除障碍；同样，他就召开东方会议是否会取得成效所发表的言論也足以证明这一假說。

因为，只有罗易一个人反对召开东方会议，而且，共产国际无疑是贊同这个计划的。早在1926年3月，也就是在罗易被派往中国前九个月，季諾維也夫曾对执行委员会一次扩大全体會議說：

过去几年間，我們已經能够依靠若干非共产党組織……。目前有进一步成立这类組織的可能性……。

反对战争的团体、东方民族反对殖民者的暴行和压迫的組織，是一种同情的新型的群众性組織，它們即将在许多国家引起我們的注意。①

当罗易远在莫斯科和中国时，召开东方会议的計劃正在进行中，約在1926年年底，已向印度許多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和工会工作者发出邀請书。在参加筹备工作的人士中有罗易在柏林的老对头扎多巴塔雅。

从1927年2月10日到15日，会议——这时已改称为被压迫民族大会——在布魯塞尔举行，参加者有来自三十七个国家的一百七十五名代表。②毫无疑问，会议根本就是在共产党的鼓动下召开的，經会议討論而产生的組織——反帝国主义联盟——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一个外围。

就印度來說，布魯塞尔会议是富有意义的，因为賈瓦哈拉尔·

① *Inprecor*(《国际新聞通訊》), VI(April 8, 1926), p. 402.

② 见《劳工月刊》(*Labour Monthly*, IX, March, 1927, pp. 179—185); 又见《民族》(*Nation*, CXXIV, April 13, 1927, pp. 397—398)所刊登的罗杰·鮑德溫的报告。

尼赫魯以印度国大党正式代表的身分参加了會議。尼赫魯于 1926 年 3 月离开印度，陪同他的生病的妻子前往瑞士，因为在瑞士她可以得到特別治疗。尼赫魯在自传中說：

1926 年快要完的时候，我恰好在柏林。在那里听說不久要在布魯塞尔举行被压迫民族大会。我很喜欢召开这种會議，我写信回国，建議印度国大党正式参加布魯塞尔大会。印度国大党批准了我的建議，并且委派我为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①

尼赫魯还提到他同扎多巴塔雅的会晤，后者后来成了反帝国主义联盟的三位書記之一。尼赫魯以十分爱慕和尊敬的心情談到他。尼赫魯說：“他是一个能干可亲的人，平常一般人叫他恰托。”尼赫魯又說，“在我所会见的少数人[印度流亡者]中間，在認識上給我好印象的只有 V. 扎多巴塔雅和 M. N. 罗易两个人。”^②

尼赫魯同意在反帝联盟执行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并繼續任职到 1931 年。密拉特謀叛案的記錄表明，在这段时期中，扎多巴塔雅常常写信給尼赫魯。其中的一些信件被当局截获，始終沒有寄到尼赫魯手中，但他回忆說，他能“用通訊的方法在远处跟它[反帝联盟]保持联系。”^③

所有这些情况——英国共产党控制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努力，共产国际对布魯塞尔會議的重視，罗易反对这次會議的明显立場，他对同意参加會議的重要印度人士所抱的敌对态度，扎多巴塔雅在筹备會議时所起的作用，以及选择罗易去帮助推行共产国际对中国政策的失当，都有力地表明，罗易之所以被派往中国，是为

① 《尼赫魯自传》，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82 頁。

② 同上，第 173—174 頁。尼赫魯只是在 1927 年夏季往莫斯科作“三、四天”訪問时，同罗易“匆匆地談了半个钟头”。同上，第 174 頁。

③ 同上，第 186 頁。

了阻止他在印度共产党事务中起应有的作用，不让他在他的对手为他所不贊同的人們組織的一次會議上露面。

扫莫盈德腊那特·泰戈尔在莫斯科

英共所以能够这样輕易地把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領導权拿过去，一部分原因是印度共产党人普遍对罗易不滿。正如第四章所述，印度共产党人对罗易領導的不滿情緒，早在 1926 年春就已开始发展起来。1927 年 4 月，孟加拉工农党的一位領導人扫莫盈德腊那特·泰戈尔离开印度前往莫斯科，目的在于同共产国际建立直接联系。泰戈尔于 6 月到达莫斯科，这时罗易仍在中国。他在到达后不久就同共产国际的財務主任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晤談。泰戈尔曾以第三者的身分記述这次会见：

当时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書記皮亚特尼茨基邀請泰戈尔，并同他就印度共产党人的工作进行了一次长談。从談話中显然可以看出，M. N. 罗易曾在共产国际面前把印度共产党的活动描繪成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皮亚特尼茨基原以为印度当时有几百名共产党人。当泰戈尔把印度当时的共产党人实际人数（不超过十二人）告訴皮亚特尼茨基时，他大吃一惊。他說，这簡直是难以置信的，因为，罗易曾报告說，印度有几百名共产党人。泰戈尔回答說，罗易也許把这些共产党人藏在喜馬拉雅山里了，因为，在印度既听不到他們，也看不到他們。从泰戈尔同皮亚特尼茨基的談話中还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曾交給 M. N. 罗易大批錢款，用来支援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泰戈尔对皮亚特尼茨基說，印度根本就沒有收到过錢，由于缺乏錢和宣传品，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从皮亚特尼茨基的談話中还显然可以看出，为滿足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需要，曾將大批款項撥給 M. N. 罗易支配。

当泰戈尔到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并同皮亚特尼茨基进行上述談話时，M. N. 罗易仍远在中国。在泰戈尔到莫斯科約一个多月以后，他才从中国回到莫斯科。

从泰戈尔同罗易举行的几次谈话中不难看出，罗易已经意识到有露出馬脚的危險，强烈地希望早日返回印度。^①

泰戈尔对罗易的两項指責——私吞經費和夸大印度共产党机构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为英国刑事調查处的材料所証实。一份在1927年写就的詳尽情报写道：印度共产党人的詳細名单落入英国特工人員手中，警方查对了每一个人，发现全部名单都是捏造的。报告最后說：

总之，对这些名单进行全盘考核后，我們发生了一个疑問：罗易究竟对莫斯科誠实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說，他同莫斯科打交道时是否老老实实，或者說，他是否虚报了在印度已建立起远远超过实际存在的組織，从而向莫斯科騙取生活費(大概費用額数很大)。^②

至于泰戈尔所謂“曾將大批款項撥給 M. N. 罗易支配”一点，也得到了英国刑事調查处的証实。上述材料引証了共产国际为印度工作分批拨付的几笔款項——1922年7月：十二万英鎊；1922年11月：十二万英鎊；1923年2月：二千英鎊。^③但是，必須指出，这项情报的准确性和完备性并不是沒有問題的。此外，其中也沒有說明，在共产国际为印度工作所拨的款項有多少是由罗易本人支取的。大批款項是經由駐喀布尔的苏联大使館送往印度的。据推測，該使館单独进行工作，与住在柏林的罗易无关。另一方面，看来罗易也不可能不掌握大量金錢，因为他毕竟是印度共产主义

① Saumyendranath Tagor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India* (扫莫盈德腊那特·泰戈尔：《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 ([Calcutta]: Red Front Press, 1944), pp. 10—11.

② *Communism in India, 1924—27* (《共产主义在印度，1924—1927年》), p. 77.

③ Sir Cecil Kaye, *Communism in India* (塞西耳·凱爵士：《共产主义在印度》) (Delhi: Govt. of Indian Press, 1926), pp. 16, 53, 69.

运动組織工作的負責人，而且在共产国际中担任高級职位，再者，我們也應該記得，前面已經指出，他在1924年3月曾写信給伊夫林·罗易說“已能动用的經費几乎是无限的”。^①

同样无需怀疑的是，实际送到印度共产党人手中的錢数是相当少的。这笔錢里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私囊，始終沒有用在革命活动上。但是，尽管印度共产党人这一方面也有私吞行为，他們当然还是要把他們經濟困难的責任，推到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和同共产国际的聯絡人罗易身上。

虽然說，罗易作为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也許應該对印度共产党人的經濟困难負責，但是，根据现有的証据指控他侵吞經費，却是有欠公允的。他在西欧的工作无疑耗費很大。他的出版活动要花許多錢；他不得不到許多地方去。此外，作为一个流浪国外的革命者，他还或許不得不用大量金錢行賄，这不仅是为了把他的刊物运往印度，同时也是为了保障自己的行动自由。不过，如果共产国际确实曾把大批金錢交給罗易支配的話，泰戈尔向皮亚特尼茨基所作的汇报无疑会損害他的声誉。

罗易回到欧洲

罗易在1927年8月8日前后离开汉口，想必不久就到达了莫斯科。他在那里会见了泰戈尔，同时获悉泰戈尔对他的指責。他还听到俄国共产党內激烈斗争的詳細情况，这个斗争当时正在高潮。苏联共产党七月全会站在斯大林一边；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則全面退却。罗易沒有久留俄国首都，1927年10月3日启程前往柏林。在同一个月內，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被开除出苏联共产

^① *Communism in India, 1924—27* (《共产主义在印度，1924—1927年》)，p. 78.

党。

在过去，罗易和托洛茨基至少在一件事上意见是一致的：反对以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为基础的任何战略。^① 因此，托洛茨基，正像罗易一样，反对中共同国民党结盟。当这个联盟终于演变成一场灾难时，托洛茨基就立刻加以利用，力图证明斯大林不足信任。

罗易回到了柏林，深知在中国所遭到的大失败已证明自己的主张正确，但是，要这样说，就会在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而后者则已被开除出俄国共产党。罗易选择了支持斯大林及其政策的道路。他在重拾编辑工作后不久，《印度群众》就刊登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文章说：“全面支持武汉国民党，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以及共产党人参加民族主义的革命政府，都是……完全正确和绝对必要的策略。”^② 而且，为了彻底阐明这一点，罗易把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汇编成书；这本书后来在莫斯科用俄语出版。罗易在该书的序言中说：

俄国共产党的反对派及其在其他国家的支持者说，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采取的一项错误的和“机会主义的”政策造成的。我们可以消除这些疑团，并指出这一指责是不合理的……。支持国民党的政

① 托洛茨基在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报告时，曾提到印度和资产阶级的作用；本书第三、四章也随时引证了罗易针对资产阶级所发表的言论。请比较两者的意见。参阅列昂·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的头五年》(Leon Trotsky,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Pioneer Publishers, 1945) 第 223 页。作者略略翻阅了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所收藏的托洛茨基文件，并没有发现关于罗易或罗易同托洛茨基的关系的材料。由于缺乏时间，没能彻底查阅这一大批书信和文件。

②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Masses of India*(《印度群众》), III(Nov., 1927), p. 14.

策，即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在革命最初阶段同它合作的政策，究竟是不是正确的政策？我們將……回答這個問題。

这一政策得到的一切結果都表明，有必要作出絕對肯定的答案……。当封建——资产階級分子轉过头来反对革命的时候，把国民党左翼当作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反动派（包括叛逆的资产階級）的斗争工具而予以支持，就更有必要了。^①

正像斯大林一样，罗易把造成 1927 年革命失敗的全部过错都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彻底洗清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责任。

关于罗易同托洛茨基的关系，罗易的回忆录中載有頗具启发性的議論。他把托洛茨基說成是“一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除了列宁以外，从来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影响；他也不总是从政治信仰出发，而是抱有政治机会主义。”罗易說：“我始終无法同他保持友好关系。”“他用狂妄自大的外衣来掩护自己所造成的孤立。”但是，在进行了这番严厉的批評以后，罗易又說：

在許多严重的問題上，我虽然并不同意他的看法，他的个性却更吸引了我，我是把他当作一个单枪匹马同老布尔什維克领导人的强大集团进行斗争的人而同情他的。我的这种态度引起托洛茨基的誤解，把我当作他的支持者之一。就我來說，我感到他对我的态度不像对其他人那么冷淡，老实說，倒相当亲热……。最后，我不得不使托洛茨基失望，在他一生最危急的时刻拒絕支持他。对我來說，这不是一个个人选择的問題，这是一个政治問題，我不得不根据原則作出抉择。^②

从罗易过去就殖民地問題所发表的文章和演說来看，托洛茨基誤把罗易当作自己的支持者（如果他的确是这样的話），当然是可以原諒的。罗易很可能既遭到列昂·托洛茨基这样一个心理复

① M. N. Roy, *Kitaiskaia Revoliutsia* (M. N. 罗易:《中国的革命》)(Moscow-Leningrad: State Publishing House, 1920), pp. 3—10.

② *Roy Memoirs*(《罗易回忆录》)(Aug. 8, 1954), p. 379.

杂的人的冷遇，而又为他所吸引。不过，这并不足以解释，在一場决定俄国和共产党历史的整个路綫的斗争中，为什么罗易沒有支持自己一貫看法的主要鼓吹者。罗易在証明自己忠于斯大林时，竟毫无保留地放弃了自己过去的主张；这一点需要更全面的解释，单凭他的回忆录的記載是不够的。

第六章 共产国际改变路綫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一次严重的失敗。遵照斯大林的命令，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支持，竟达到忽視自己在农村中的政治基础的地步。由于受到这一政策的削弱，当国民党轉过头来反对他們时，他們几乎被消灭。中国的不幸事态的演变，对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莫大的影响。

对許多关心印度的共产党人來說，中国的事件引起了一些問題。印度国大党的階級立場不是同国民党相同嗎？如果是这样，要是共产党人支持国大党，他們不是会冒有像中国同志那样被出卖的危險嗎？

对这个問題作肯定答复的人士之一是 M. N. 罗易。但是，就罗易來說，这当然不是什么新想法。若干年来，他就反对支持国大党。如果印度和中国之間可以画等号，那么，就可以援引中国的事件来支持反国大党的策略。不过，这里不得不面对这个問題：罗易在建議印度共产党人不要接近国大党时，絕不能暗示，中国共产党人由于接近国民党而鑄成大錯。因为，不管实情如何，指出这一点就等于指責斯大林而同意托洛茨基。前者正紅运当头，后者則日趨沒落。

在罗易回到柏林以后，《印度群众》立刻刊出了一篇文章——《中国革命的教训》，大概是罗易写的。这篇文章小心翼翼地避不批评支持国民党的政策，但得出关于印度的明确的结论：

中国这些革命事件和反革命事件的教训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本质上是反革命的；如果民族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是农民革命；不但是大资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尽管发表激烈的言论）也不能够而且不愿意领导农民革命；当小资产阶级得到工人和农民的支持而掌握政权时，它不会同工人阶级分享和捍卫这个政权，而是把政权交给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通过它自己的独立政党（共产党）进行斗争，是取得民族革命胜利的唯一保障。^①

按照罗易的定义，印度国大党基本上是一个由小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资产阶级组织，因此，上面这番话不过是他反对同国大党发生任何关系的老论点的另一种说法罢了。

非殖民地化的理论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定于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在大会以前的讨论和大会本身的辩论中，印度问题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分歧既是战略性的，也是策略性的，而且都集中在所谓非殖民地化的理论上。这是一个后来同M. N. 罗易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系统的提法。由于这一理论在1928年的讨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有必要澄清当时围绕这一理论的部分混乱说法，因为这种混乱说法模糊了这出戏的参加者的作用。

罗易关于这个理论的起源的说法是这样的：

当我远在中国时（1927年），印度的一位新同志[泰戈尔]来到莫斯科。他在报告中强调，应迅速发展印度的现代工业……。布哈林在总结关于印

^① “The Less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中国革命的教训》），*Masses of India*（《印度群众》），III（Sept.-Oct., 1927），pp. 19—20.

度代表报告的辯論时建議，为研究这一問題而成立的委员会，应就这种“非殖民地化”的过程提出报告。（他是第一个使用这个字眼的人，而且显然是从一种暫定的和相对的意义上来使用的。）

在我[从中国]回来后，就让我在委员会所做准备工作的基础上草拟一項決議草案。这个由我起草、始終沒有正式通过的決議（不是因为严重的反对意見，而是因为对这一問題的兴趣漸減），后来竟成了攻击我的主要武器。因为，后来每逢需要找出証据来支持那項以某种不得而知的罪名对我秘密作出的裁判时，总是从这个文件中去寻找我的全部异端邪說。^①

至于這項決議，罗易說，他“是在莫斯科写的，后来就把它留在那里。”^② 不过，他必然帶了一份副本到柏林去，因为，他說，他在1929年致共产国际的一封公开信中，曾广泛地引証了这一決議。^③ 他所引証的这份材料的大部分，后来又出现在一篇刊登在1927年11月份《印度群众》中的文章里，我們似乎有理由推断，这篇文章如果确实不是決議本身，也是根据決議写的。因此，我們可以把这篇文章看作是非殖民地化理論的第一个最权威性的解释。

这个理論本身并不新奇，但是罗易用来闡明理論的政治-經濟論点却是新奇的。他断言，由于工业化程度的增长，印度已产生了一个从事制造业的资产階級。这个階級见到，在剝削群众方面，它正同帝国主义竞争。随着这个新階級的成长，它要求帝国主义者让步，而且为了占上风，就揚言要同群众站在一边。这就造成了一个使帝国主义者震惊的革命形势。随着它的革命潜力的增长，帝国主义者作出了让步。这样，新兴的资产階級便更接近于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从而出现了“非殖民地化”一說。此外，资产階級

① M. N. Roy, *Our Differences* (M. N. 罗易: 《我們的分歧》) (Calcutta: Saraswati Library, 1938), pp. 29, 30, 31.

② 同上, p. v.

③ 同上, pp. 32—33.

愈来愈同帝国主义者携起手来剥削群众；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让步，资产阶级会打击群众的革命热情，帮助帝国主义保持其立足点。罗易說：“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新經濟政策加剧了阶级分化，使阶级斗争达到成熟阶段；在这种形势面前，以资本主义的矛盾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斗争便失去了重要性。”^①

事实上，上述这些话只不过是稍稍不同的方式来阐述罗易一贯的论点，即资产阶级不是一个革命因素，不能把它看作是革命的同盟军。下列引文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国大党要在即将召开的年会中与英帝国主义讲和……。资产阶级并不是单单退出民族革命就算完事；它的退出只不过是同英帝国主义一道明确地反对民族革命的前奏罢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已分裂成六七个党派，所有这些党派都反对进行反帝的革命斗争……。它[资产阶级]不再是一支革命力量了。不但从印度内部的情况来看，就是从世界目前的局势来看，印度资产阶级也是站在反革命那一边的。它不能、事实上也没有领导或参加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印度民族革命已经渡过了资产阶级阶段。它所必须实现的纲领从客观上和历史上来看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但是，印度民族革命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民族革命只有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的藩篱才能获胜，而且也必然会获胜。^②

这一理论含有一些重要的策略成分。罗易说过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已“分裂成六七个党派，所有这些党派都反对进行反帝的革命斗争”；他在说这句话时，不仅指的是印度国大党，甚至也指参加该党的比较激进的派系。从非殖民地化理论的角度出发，唯一正确的策略必然是反对这些资产阶级党派，因为任何其他路线

^① “The Role of the Bourgeoisie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作用》), *Masses of India* (《印度群众》), III (Nov., 1927), p. 7.

^② 同上, p. 5—8.

都会帮助印度资产阶级增加它从剥削群众中得来的那一份。

M. N. 罗易的议会信件

既然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前的辩论中以及在大会的讨论中，都同样涉及到战略和策略问题，因而有必要在这里简略地谈谈罗易为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提出、而后来又同他的非殖民地化理论联系在一起的策略。这些策略是在1927年12月30日致印度共产党人的一封信中提出的；这封信后来就叫做所谓“议会信件”，因为被截获的一份副本曾在印度立法议会宣读，并记录在案。^①

议会信件就策略所提出的主要意见，涉及到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形式，即工农党和共产党应该怎样组织，两党应该同罗易和国际共产主义保持什么关系。罗易主张两党继续存在：印共应该是非法的；工农党应该是合法的。他说，“共产党只有不准备发动反对英王的战争，才能合法地在印度存在，这也就是说，只有牺牲印共存在的理由，才能取得合法的地位。”^②与此相反，工农党应该是一个合法的政党，作为“团结所有被剥削的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园地。”罗易又说：“共产党人应该加入工农党，而且，由于他们是工人阶级的自觉的先锋队，必然会成为工农党的推动力。”^③信件在谈到目前形势时提出警告说：

工农党的目前组织形式阻碍了这个党的发展。它太公开地同共产

① 本书作者未能获得议会信件的全文，但在密拉特审讯文件和报刊中已找到相当详尽的引文，足以看出信件的中心论点。见《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Meerut Sessions Judgment), pp. 186—189; 《密拉特司法长官付审令》(Meerut Committal Order), pp. 66—69; 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 (London), Sept. 25, 1928; 《政治家》(*Statesman*) (Calcutta), Aug. 18, 1928.

② Meerut Sessions Judgment(《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 p. 186.

③ 同上, p. 187.

党联系在一起了。这种现象使得许多愿意加入工农党的革命分子都疏远工农党……。大家都知道，几乎所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都是工农党的领导人。当然，事实上应该是这样，但我们却由于公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而毫无必要地露了马脚。必须尽快地纠正这种错误。①

其次，罗易论述了参加国际组织的问题。他说，工农党应该参加反帝联盟，这样，它就会取得它所需要的“关系和援助”，却“不致被指责为同莫斯科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印共必须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罗易又说，“印共实际上已被看作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我们的印度党还没有正式提出这种要求。”②

最后，罗易透露他自己曾同英共争夺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权。他说：

在柏林和巴黎的中心是照料印度事务的共产国际机构。印共应通过这些中心而不是通过伦敦同共产国际保持关系。任何前来印度的英国同志，都要在印共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下，同该委员会协同一致，在那里工作。除非他持有共产国际的委托书，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并不享有优越的权利。到今天，还没有向印度派出过这样的代表。因此，你们当可了解情况……。侨居国外的印度共产党人是印共的党员，同时也自然是工农党的党员。我们希望国内的同志这样看待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看作只是个经济代理人为你们服务的局外人。作为国内和国际上同一个党的党员，我们必须步调一致。③

罗易说，这种步调一致应该通过印共国外局来实现，该局的存在已经得到印度共产党人以前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承认。国外局应有委员三人，即罗易、克莱门斯·杜德和穆罕默德·息巴息；该局应作为共产国际指导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进行工作。

① Meerut Committal Order (《密拉特司法长官付审令》), pp. 66—67.

② Meerut Sessions Judgment (《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 p. 188.

③ 同上, p. 189.

很明显，罗易发出議會信件的主要目的，在于重新取得他离开欧洲前去中国期間愈来愈陷入英共影响之下的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权。这封信包含着对斯普拉特和布萊德雷的露骨的攻击。后两人实际上已經成了印共的真正领导人，他們同伦敦同胞的关系远比同罗易的关系接近。信件也批評了扫莫盈德腊那特·泰戈尔，他的俄国之行对罗易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毫无任何帮助。

罗易最后的莫斯科之行

罗易在重申他应享有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之后，决定前去参加定于1928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會議。尽管他曾受到扫莫盈德腊那特的攻击，他仍然有理由相信，他会遇到热誠的欢迎，因为，他把斯大林看作是私人朋友，既是朋友，就应该感謝他在中国問題上所給予的支持。^① 罗易同布哈林的私人关系也很好，布哈林是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同斯大林关系密切。最后，罗易仍然是执行委员会的委員，这个机构从来还没有指責过他。

罗易于1928年2月4日到达莫斯科，立刻着手了解复杂的政治形势。^② 他同自己离开莫斯科后一直留在那里的海因茲·奈依曼討論中国問題；他写信給一位西欧朋友說：“我們听到了有关中国問題的比較正确的消息，……这里举行过一次由全体‘专家’参加的非正式會議来討論这个問題。”

^① 罗易这一时期的两位亲密朋友（1926年在莫斯科結識罗易）曾对本书的作者之一說，罗易和斯大林之間的友誼是真摯的，但却不記得曾见过他們两人在一起。关于他两人之間的友誼，本书作者除了从罗易本人之外未能从任何直接了解情况的人那里获得証明。

^② 这段关于罗易为参加第九次全体會議前往莫斯科的叙述，是以当时他写給一位西欧朋友的信件为依据的。这些信件的收藏人（不願宣布姓名）曾慨然允許作者加以研究，因而对这段时期提供了額外材料。

罗易参加了2月9日举行的全体會議第一次會議，并在第二天写道，會議“大有拖长之势”。2月22日，他就寢时感到耳痛，后来竟发展成重病，显然是乳突炎。他在医生的护理下，躺在床上，未能参加全体會議的一切會議。他在一封信中抱怨說，他同會議失去了联系，“只向我传达重要的政治事件”。他又在3月6日写道：“誰告訴你我现在面临政治困难？根本沒有这回事。”

罗易留在莫斯科的时间远远超过他离开柏林时原来計劃的四个星期。这时，他的朋友已十分担心他的健康状况和政治处境。其中之一考虑是否應該前往莫斯科，看看有什么好办法，于是把这个想法告訴了罗易。罗易在3月18日回信說：“我不像过去那样喜欢这个地方。”“我不贊成你甘冒受牽連的危險到这里来的想法。”随后，他又在信末附有一句很能說明問題的話：“从你写給——的信中获悉你打算到这里来。这些計劃是对的，如果你决定要来，望加以考虑。”

这表示罗易已陷入严重的困难，于是他的这位朋友便从柏林动身前往莫斯科。此人在到达苏联首都以后，发现罗易的健康状况非常坏，怀疑有关方面沒有給予——也許是蓄意地——适当的医疗。某些身居要职的俄国人对罗易仍然友好，在他們的帮助下弄到了出境簽證。接着是一段戏剧性的插曲：罗易被領出医院，匆匆赶往飞机场，那里已用假名訂了两个座位。^①一切都很順利，罗易平安到达柏林，在适当的医疗下，終于完全恢复健康。

关于战略和策略的爭論

富于諷刺意味的是，正好在罗易逃离莫斯科的那个月份里，共

^① 德俄联营的德俄航空公司，当时在莫斯科和柏林之間經營航运业务。

产国际开始轉而采取罗易对资产阶级所持的看法。那一月(1928年3月)《国际新聞通訊》发表了尤金·瓦尔加所写的一篇文章,說明俄国在印度問題上的立場。瓦尔加論点的出发点是,罗易及其支持者夸大了印度工业化的程度。英国近年来的政策是抑制印度工业化的趋势。在大战期間,英国出于一时的权宜之計曾容許印度工业化有所发展。从这个前題出发,瓦尔加得出了与资产阶级在印度政治中的作用这一重要問題有关的某些結論。他說,印度资产阶级是站在反对英国的立場上的,但他們所进行的斗争是“为了改善他們在英帝国中的地位”,因而不是“反对英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① 领导民族主义斗争的将是印度无产阶级。瓦尔加既然說印度资产阶级并未参与反对英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他也就是取消了共产党人同资产阶级結盟的唯一理由。这正是 M. N. 罗易一直在說的話。共产国际正在轉向罗易的立場。^②

当瓦尔加的理論在共产国际印度問題委员会(于1928年3月和4月开会)中提出討論时,遭到該委员会英国委員和印度委員的反对。^③ 这时,英共对印度共产党人的影响已經超过罗易,它在1928年6月份《劳工月刊》上发表的由帕姆·杜德执笔的长篇論文中公开表示它不同意这一趋势在发展中。

① E. Varga,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1927" (E. 瓦尔加:《1927年第四季度的經濟和經濟政策》), *Inprecor* (《国际新聞通訊》), VIII (March 14, 1928), p. 294.

② 罗易沒有改变看法,这一事实可以从1928年4月份的《印度群众》所刊载的一篇文章中看出。这篇文章說:“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资产阶级及其从右到左的全体分子,正在离开民族革命斗争的主流。国大党的领导人……一直在設法压制群众的革命性,打击他們的革命热情。”“The Significance of Third February” (《第三个二月的重要意义》), *Masses of India* (《印度群众》), IV (April, 1928), p. 9.

③ 见 R. 佩季·阿諾特追溯这一討論的历史的演說。載于《国际新聞通訊》(*Inprecor*), VIII (Oct. 30, 1928), p. 1421.

杜德承认,英国对印度工业化所执行的政策,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他說:“我們今天所面临的情况是,这一政策的发展已显著地停頓下来。”“他們談到民族运动时所使用的語气,是公然的漠視和輕蔑。他們的態度也显著地强硬起来,根本不願对印度資产阶級让步和調合。”^① 不过,杜德坚持,这并不等于說根本就沒有工业化。他說,“英国对印度工业化所采取的政策的整体性质,是把工业化置于**英国控制之下**。”^②

最后他又說:

从目前情况的种种迹象来看,我們可以相信我們的判断,即印度資本主义和工业正在不断发展,伴随这一发展而来的是政治革命化的影响。特别是可以相信,在农业危机日益加剧的同时,产业无产阶級在人数上和觉悟上都有所壮大。^③

就主要問題即对印度国大党采取什么态度的問題來說,以上关于印度工业化的程度是否在增长的討論,可以說已經离題了。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和大会期間就非殖民地化理論所展开的辯論中,真正的問題往往被埋沒在詭辯的泥沼中,只是偶尔才可以发现,例如杜德在自己的文章中說了这样一段話:

总之,在所有的基本問題上,印度資产阶級从不合作运动解体以来所扮演的角色,已朝着愈来愈明显的反革命方向发展……。但在这个投降的总框框里,也同时出现了近来日趋尖銳的摩擦和对立现象……。由此可见,資产阶級在民族斗爭中的作用还没有消失无余,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还可能扩大。但是,由于資产阶級既害怕又敌視任何更广泛的群众革命运动,它的作用在规模上永远是有限度的,因而对真正的反帝斗爭是

① R. Palme Dutt, "Notes of the Month" (R. 帕姆·杜德:《每月評論》), *Labour Monthly*(《劳工月刊》), X(June, 1928), p. 326.

② 同上, p. 331. 黑体字系原有。

③ 同上, p. 334.

非常危險的。在独立的领导下，尽量利用资产阶级的反抗（如对西蒙委员会的抵制）所提供的机会，已成为群众运动的一项任务。^①

換句話說，尽管资产阶级正在向反革命方向转变，它仍然可以起一种革命的作用。杜德也表示，他特别信任小资产阶级：

如果我们转过来看一看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各种成分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基层队伍，[对帝国主义的]反抗的激烈化，就更加明显了。在这里，随着甘地和不合作运动的垮台所带来的幻灭，随着目前时期的经济困难，革命化的实际过程正在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中进行着。^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印度问题的看法

1928年7月，即杜德的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一份五百零八页的报告，作为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的讨论的基础。^③这份报告除了详述了组织方面的活动以外，还在各章中分别说明了世界各大国的状况。看来，关于印度的那一部分，似乎是3、4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印度问题委员会的讨论结果。在谈到印度资产阶级时，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说：

资产阶级为了靠近群众，为了利用他们的革命倾向为本阶级的改良主义政策服务，已改进了它在1919到1922年间所采用的方法和口号。它已考虑到广大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在这种更高的发展阶段，资产阶级政党已经不能再以民族革命斗争的领导人自居，硬要领导群众了。除非同时致力于革命行动，它们再也不能用革命的独立口号来影响群众了。资产阶级总是力图用独立的口号，把由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构成的民族主义左翼分子，置于资产阶级领导人的影响之下。

① 同上，pp. 334—335.

② 同上，p. 335.

③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Between the Fifth and the Sixth Congresses*（《第五次和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之间的共产国际》），（London: CPGB, 1928）.

資產階級正在試圖通過對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領導權，同無產階級和農民的上層建立聯繫，希望把它們拉入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去……。民族主義左翼在組織上同資產階級政黨是不可分的，在政治上又受這些政黨的領導，因此，它和它的口號——獨立、社會平等和社會主義——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用來打入廣大勞動群眾中去並篡奪對他們的領導權的工具了。^①

杜德看來一直認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可以起革命的作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文件則強調小資產階級的不可信賴性。它說資產階級會設法支配小資產階級，並把它當作工具去控制群眾。這一切表面上沒有實際意義的爭吵實際上卻是圍繞着印度工農黨的未來進行的。這一點執行委員會曾加以明確說明：

工農黨的主要弱點是，在實踐中，它是作為國大黨的左翼而不是作為獨立的政黨而行動的。工農黨只有從資產階級政客的影響下徹底解放出來，並變成無產階級領導的工人階級和一切被剝削群眾的聯盟，才能發展成為一個群眾性的民族革命鬥爭的政黨。另一方面，工農黨應否代替共產黨的問題根本不存在，組織共產黨是絕對必要的。^②

由此可見，問題的中心是：共產國際是應該贊助工農黨呢？還是應該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組織共產黨上？工農黨的領導主要是小資產階級。如果小資產階級不足信賴，會受資產階級的影響，那麼，工農黨就不可能是真正革命的。此外，如果共產國際支持工農黨，就可能犯支持小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的錯誤。這是一條根本違反馬克思主義而使正統的共產黨人厭惡的方針。^③

① 同上，pp. 468—469.

② 同上，p. 476.

③ “薩符達爾”（“Savdar”）正是以這個方式，在所寫的《印度革命運動同中國事變的關係》（“Revoliutsionnyie dvizhenie Indii v sviazi s sobyitiami v Kitae”）一文中提出這個問題的。見《革命的東方》（*Revoliutsionnyi Vostok*），No. 2（1927），pp. 96—107.

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印度代表

1928年7月17日到9月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印度代表，共有六人。如果把克莱门斯·杜德计算在内，则印度代表有七人，因为《国际新闻通讯》在报道他的发言时说代表印度。《国际新闻通讯》广泛报道了大会的辩论，所发表的印度与会者的姓名是：息甘堆尔·苏尔、那腊延、马赫茂德、腊查、马祖德和卢哈尼。事实上，息甘堆尔·苏尔就是邵加德·乌斯玛尼，那腊延就是扫莫盈德腊那特·泰戈尔。泰戈尔所列举的代表团名单是邵加德·乌斯玛尼、克莱门斯·杜德、G.A.K. 卢哈尼、穆罕默德·沙菲赫和他本人。^①泰戈尔说，哈比勃·阿默德·那西姆被推为参加同时在莫斯科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印度代表团享有表决权和发言权各三票。在这里所作的分析中，只要我们认为肯定无疑，我们就用真名来称呼各位与会者。^②

应该谈谈印度代表团的合法性问题。泰戈尔是在1927年年中到莫斯科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持有“孟加拉工农党的一封委托书，因为这时印度还没有共产党”。但菲利普·斯普拉特则驳斥

^① Saumyendranath Tagor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India* (扫莫盈德腊那特·泰戈尔：《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 ([Calcutta?]: Red Front Press, 1944), p. 14.

^② 辩论中使用的化名：

息甘堆尔·苏尔
那腊延
杜德
卢哈尼
马赫茂德
腊查(有时作腊苏尔)
马祖德

真名：

邵加德·乌斯玛尼
扫莫盈德腊那特·泰戈尔
克莱门斯·杜德
G.A.K. 卢哈尼
穆罕默德·沙菲赫(?)
(?)
哈比勃·阿默德·那西姆(?)

这种說法。他說：

当时印度共产党是存在的，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就是一名党员，但印度共产党到1927年才开始工作。我始终不十分了解穆札法尔同泰戈尔的关系。穆札法尔是个非常重视共产党的正确性和威望的人。我不相信他把泰戈尔看作是个党员。但是，他是派遣泰戈尔前往莫斯科去的当事人之一，当时对泰戈尔很友好。^①

必须注意的是，泰戈尔是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年离开印度的，而且，他说，他所持有的是工农党的委托书而不是印度共产党的委托书。印共在他离开后才举行第一次重要会议。

烏斯瑪尼的証件就更成問題了。按照泰戈尔的說法，烏斯瑪尼于1928年4月前往孟买。他在那里曾因党的工作同本杰明·布莱德雷发生爭执，此后不久，决定前往莫斯科参加第六次代表大会。泰戈尔說：

烏斯瑪尼把自己前往莫斯科的打算通知了党内同志。善耍手腕的丹吉暗中支持他的计划，但表示无法给予公开支持。三人小集团——卡堆、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和卓格雷加尔——在斯普拉特和布莱德雷这两个实际负责人的支持下，竭力说服烏斯瑪尼，要他放弃去莫斯科的计划。当他们发现说服对他不起作用时，便拒绝发给他共产党委托书。^②

烏斯瑪尼有没有在首途前往莫斯科之前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呢？关于这一点，斯普拉特的說法不同：

① 引自泰戈尔所著《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一书上的菲利普·斯普拉特的手注。

② 泰戈尔說：“烏斯瑪尼強調，必須把更多的力量集中在組織党的工作上，而不是集中在工会上。而特为工会工作派来印度的布莱德雷，則无法听任任何人贬低他的工作的重要性。”Tagor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泰戈尔：《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 p. 13.

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在 1928 年夏召开。邵加德·烏斯瑪尼沒有通知我們，便徑行決定參加這次大會；他取道伊朗前往，並帶了三個人同行……。我是首先從發自倫敦的一封電報中獲悉他們的冒失行動的；電報問我烏斯瑪尼是否代表黨。我作了否定的回答；這個回答當然是真實的。^①

泰戈爾証實了印度共產黨人沒有發給烏斯瑪尼黨的委託書這一事實。他說：“其間，共产国际接到印共的一封信，說明烏斯瑪尼根本不代表黨，只代表他自己。”^②

由此顯然可見，印度代表中誰也沒有代表印度共產黨人說話的權限。根據泰戈爾自己的証言，他只代表工農黨，而不代表共產黨。盧哈尼是在歐洲同羅易建立關係的，簡直不可能在 1928 年弄到正式的委託書。克萊門斯·杜德的情況也是一樣，他是羅易所領導的印共國外局的委員，但又是英共黨員。烏斯瑪尼，大概也包括他的三位同伴，則公然為印度共產黨人所否認。^③ 由此可見，烏斯瑪尼被選入這次代表大會的主席團，自然就成了極其有趣的事了。這一情況有兩種可能的解釋。最令人信服的解釋（下面將談到）說這是因為在一場辯論中，烏斯瑪尼站在俄國人一邊，反對英共在工農黨這一重要問題上的主張。另一解釋說，這是因為剛做了一任印度國大黨主席的 S. 斯利尼瓦薩·伊因加爾出現在莫斯科。

伊因加爾、賈瓦哈爾·尼赫魯和蘇帕斯·占德拉·鮑斯，同是國大黨左翼的領袖。1927 年，伊因加爾曾在馬德拉斯提出抵制

^① Philip Spratt, *Blowing Up India* (菲利普·斯普拉特：《炸毀印度》) (Calcutta: Prachi Prakashan, 1955), p. 41.

^② Tagor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泰戈爾：《印度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發展》), p. 14.

^③ 斯普拉特說，烏斯瑪尼的三位同伴被拘留在蘇聯，最後以間諜的罪名被槍殺。Spratt, *Blowing Up India* (斯普拉特：《炸毀印度》), p. 42.

西蒙委員會的提案；作为中央立法議会的委員，他还提出了抗議英国利用印度軍隊保护它在中国的租借地的提案。烏斯瑪尼在1953年写文章談到的伊因加尔的情况頗值得玩味：

1927年8月，我[从監獄]被释放出来。許多革命人士要求我再去莫斯科，謀求共产国际的帮助。我在出国以前，曾同国内主要政治工作者举行了重要的討論。关于我同他們会晤的情况，应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時間內保守秘密。其中許多人現在已經死去了，另外一些人則在次大陆的各个部分担任重要职务。他們甚至不允許我发表这些談話的要点……。这时[1928年夏]莫斯科有两位著名的訪問者，即著名的法国作家昂利·巴比塞（巴黎的支持印度委員會委員）和斯利尼瓦薩·伊因加尔先生。行前，我曾在德里同重要的領導人士交談。在这些談話中，伊因加尔先生占有重要地位。但我不久便获悉他訪問莫斯科的使命失敗了。我知道这是必然要失敗的。我曾同布哈林談过好几次，他根本就不主張給予印度革命人士以任何援助，我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当时，斯利尼瓦薩·伊因加尔先生想要同斯大林会晤，他曾問我是否願意同往，我拒絕了。最后，他把我們的伟大詩人的侄孙扫莫盈德腊那特·泰戈尔帶去作譯員。我知道去見斯大林要求給印度以軍事援助是无用的；結果完全沒有出乎我的預料。①

烏斯瑪尼数次談到，自己有心在苏联的帮助下，在印度发动游击战，还暗示伊因加尔赴苏的“使命”也是为了类似的目的。但是，伊因加尔的傳記作者並沒有証实这一点，只說，他前往俄国是“为了观察共产主义的实践”。不过，这位傳記作者又說，“同印度农民极其相似的苦难深重的俄国农民，正从事一次英雄的伟大实验，这不可能不在斯利尼瓦薩·伊因加尔先生敏感的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因而，他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社会主义。”②

① Shaukat Usmani, *I met Stalin Twice* (邵加德·烏斯瑪尼：《两次会见斯大林》(Bombay: K. Kurian, 1953), pp. 22, 27.

② K. R. Srinivasa Iyengar, *S. Srinivasa Iyengar: The Story of a*

伊因加尔是在他的同僚賈瓦哈拉尔·尼赫魯訪問俄国一年后訪問俄国的。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不足以就烏斯瑪尼的証言所提的問題——印度民族主义領導人是不是可能謀求苏联支援——作出推測。不过，看来可能是，通过伊因加尔，邵加德·烏斯瑪尼能够表示自己同印度国大党有密切的关系，从而在俄国人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尽管俄国人这时正要給国大党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殖民地問題上的辯論

俄国在印度問題上的立場，首先表现在共产国际总書記布哈林的报告中。他論証說，要說印度資產階級会起一分一秒的革命作用，那都是不可設想的。它可能策动反对英帝国主义，但这毕竟远远不同于中国資產階級所发动的反帝武装斗争。布哈林对自治党人特別有意见，但没有攻击“各个小資產階級政党和恐怖主义組織”。^①

布哈林的分析比較簡短。关于各殖民地革命运动的主要报告是由奥托·威廉·庫西宁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数星期前把这项任务交給了他。不管是对这个总的問題，还是对印度，庫西宁显然都沒有專門的知識。他在代表大会上所宣讀的报告主要集中在印度問題上。庫西宁問道：“我們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別論述印度的情况呢？当然，首先是因为印度在各殖民地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因为殖民地垄断組織的階級性质在印度特別显著，也因为我认为印度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发生严重的革命危机。”^②

Decade of Indian Politics (K. R. 斯利尼瓦薩·伊因加尔：《S. 斯利尼瓦薩·伊因加尔：印度政治的十年》)(Mangalore: Basel Mission Press, 1939), p. 64.

① *Inprecor*(《国际新聞通訊》), VIII(July 30, 1928), p. 734.

② O. V. Kuusine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Colonies" (O. V. 庫西宁：《殖民地革命运动》), *Inprecor*(《国际新聞通訊》), VIII(Oct. 4, 1928), p. 1225.

庫西宁的报告相当于一次“三階級战略”的說明。他利用瓦尔加和执行委员会早已論証过的論点，首先攻击关于印度的工业化和随之出現的非殖民地化的理論。接着，他便申述資产階級的作用：

的确，民族資产階級在正掀起一場喧嚣的叫嚷。但重要的是认清印度資产階級的政治性质及其所奉行的**民族改良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就像資产階級是資产階級一样显而易见。印度資产階級的政策是不革命的，这也是十分清楚的。^①

庫西宁在小資产階級問題上的立場不够明确，但他承认，“城市小資产階級以及相当一部分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能够在民族运动中起重要作用。”^②应当注意，他这句话是針對“民族运动”而不是針對革命說的。

接下去，庫西宁談到了工农党的問題。他說：

有一个时候，某些同志认为用“工农党”来代替这种組織形式[如共产党]是适当的。现在比过去更加清楚，不应提倡这种政党，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工农党很容易变成小資产階級政党，脱离共产党人，从而无法帮助它們同群众建立联系。如果认为这种政党可以代替真正的共产党，那将是严重的錯誤。我們主张同农民結成联盟，但我們不贊成各階級的融合。^③

反对庫西宁这一见解的人主要是英国代表团的成員。看到代表大会前夕所发生的爭論，人們就会預料到这一步。除了 J. T. 麦尔菲以外，整个英国代表团采取了坚决反对庫西宁提綱的立場，而且坚持到底。他們坚决认为，纵使印度的工业化是在英国控制

① 同上，p. 1229. 黑体字系原有。

② 同上。

③ 同上，pp. 1230—1231.

之下,但仍在繼續发展中,不承认这一事实,就意味着低估工人階級的作用。他們說,既然无产階級是工业化的产物,如果不承认印度工业也在增长,怎么能說印度的无产階級在增长呢?①

有关工业化的辯論,比起資产階級的作用問題还是个次要問題。克萊門斯·杜德扼要地指出了英共的观点,他說:“印度資产階級是一支反革命力量,但这并不等于說,即使在发展群众革命时,我們也不能利用它。”② 这个关于資产階級的問題,牽涉到共产党人对待印度国大党的态度。对英共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工农党的問題。关于這個問題,杜德說:

我要指出的一点是,不能用一句話就把工农党這個問題否定掉……。在印度的目前发展阶段中,工农党的特点是,它形成一条重要的路綫,而共产党人正在通过这条路綫寻找接近群众的道路。③

由此可见,在工农党的問題上,显然意见分歧。俄国人想取消它;英国人想保留它。我們應該在这里再探討一下印度代表对这个重要問題所持的态度。

在印度代表中,烏斯瑪尼和泰戈尔是积极参加辯論的人。在工农党这个关键問題上,烏斯瑪尼、腊查和馬祖德站在俄国人的一边。烏斯瑪尼同意那个实际上要求取消工农党的提綱草案,他說:“工农党所以存在,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錯誤策略和指示。”④ 腊查补充說:“我們必須批評共产国际所奉行的政策,它一面着手組織工农党,一面完全忽視組織印度共产党的工作。这种作法就像把馬

① 见发表在《国际新聞通訊》(*Inprecor*, VIII, Oct. 17, 1928, p. 1320)上的貝奈特的发言及其在打斷馬祖德发言时所說的一句諷刺話:“工业沒有发展,但无产階級却增长了,是嗎?”同上(Nov. 8, 1928), p. 1465.

② 同上,(Oct. 30, 1928), p. 1425.

③ 同上。

④ *Inprecor*(《国际新聞通訊》), VIII(Nov. 8, 1928), p. 1473.

車放在馬的前面一樣荒唐。這種政策必須加以改正。”^①

與此相反，泰戈爾則根據新戰略，力圖為保留工農黨這一策略進行辯護。他論證說：

據我看來，某些同志被惡夢吓壞了，這種惡夢是他們自己的異想天開的想法——工農黨將代替共產黨——所引起的。始終沒有人說過工農黨將代替共產黨。

國內那些無產階級化了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有時候比無產階級本身更無產階級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城市小資產階級必定要在殖民地的革命運動中起作用。我們應該用什麼組織形式來體現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反帝陣綫呢？我們能讓這種小資產階級分子來淹沒共產黨嗎？不能。另一方面，印度共產黨應該利用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我認為，這個反帝陣綫顯然只能採取工農黨這一組織形式，它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由城市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分子組成的……。我們已經從改良主義的領導人手中把一些工會爭取過來，還組織起農會。但是現在却有人要我們取消所有這些工人和農民的組織。這純粹是學究式的教條主義，列寧曾多次提醒我們反對這類東西。^②

雖然泰戈爾在這個策略問題上的立場同英共一致，但是，如果根據這一點來斷定他同意英共過問印度事務，那就錯了。事實上，他特別反對綱領草案中的一句話，因為他認為這句話的涵義是“印度無產階級運動應在英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他說：“誰也不否認，在英帝國主義的有機結構中，印度和英國是緊密連結在一起的；出於同一原因，英印兩國共產黨也是有機地連結在一起的，目的是為了在兩國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但是，這種關係決不意味著殖民地的黨要服從帝國主義宗主國黨的領導。”^③ 從烏斯瑪尼攻擊英國立場的語調看來，他顯然也不喜歡英共領導印共的作法。

① 同上，p. 1454.

② 同上(Oct. 30, 1928), p. 1391.

③ 同上(Sept. 25, 1928), p. 1203.

从印度的实况出发，毫无疑问，工农党是有一些潜力的，取消该党就等于取消当时在次大陆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有效的工具。泰戈尔所持的立场是易于理解的，因为他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代表的是工农党，这牵涉到他本人的利益。他没有参加印共，甚至还宣称印共不存在。

但是，烏斯瑪尼反对工农党就难于理解了，除非他要帮俄国人的忙，希望取罗易而代之。他说：“在这里逗留过十年左右的人都没有能够妥善应付这个局面。”^①这句话显然是指罗易说的。烏斯瑪尼在1953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发表了自己对这段时期的回忆，提到自己被选入主席团的情形。他说：“怀着出乎意料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因为我不应该享有这份荣誉），我被推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席位，坐在斯大林下首的第三个位子上。”^②

烏斯瑪尼说，他不应该享有担任主席团委员的荣誉，他的确道破了真情，因为，严格说来，他连参加代表大会的资格都没有，更不必提担任重要职务了。他说他“被推上主席团的席位”，他大概也同样说的是真话；再结合他颂扬斯大林（这正是他1953年发行小册子的目的）这一点来看，可以设想，推他就席位的正是斯大林。斯大林也许考虑到，烏斯瑪尼同伊因加尔和印度国大党的关系也许是有用的。但是，可以肯定无疑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斯大林在要求共产国际采取一种新的战略时需要支持。这个新战略就是瓦尔加的几篇文章加以道破、但又遭到英共强烈反对的左派战略。英国代表根据他们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所取得的经验，提出自己的论点。斯大林也许认为，在反对英国代表时，一个刚从印度来的印度人会是个颇有帮助的同盟者。烏斯瑪尼果然成了这样的同盟者，

① 同上(Oct. 4, 1928), p. 1248.

② Usmani, *I met Stalin Twice* (烏斯瑪尼:《两次会见斯大林》), p. 23.

他攻击英国同志异常激烈，在辯論中某一个时候，竟厉声斥責他們的論点“不过是公然为帝国主义辯护！”^①

俄国人显然一心要把“非殖民地化”变成一个丑恶的名辞。为此，他們赋予这个名辞以一种肯定不是出于罗易本意的含意，即帝国主义自动停止剝削。

也許是为了避免表面上同罗易站在一边，英国代表团接受了俄国人所捏造的定义，严厉譴責非殖民地化。然而，实际上，英国人已部分地接受了罗易的策略，而俄国人則正处于采用罗易的战略的过程中。

这种用含意不明的吓唬人的字眼进行的討論，根本不足以使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成为以誠相见的政治辯論的典范。我們不难理解，某些与会者怎样在辯証法的浓雾中迷失了方向。俄国代表罗明那則曾坦率地就提綱草案提出意见：“我必須說，某一声明我讀了四次，但还是不能理解它，而提綱是为了那些了解情况远远不及我們这些大会代表的人們写的。”^②

G. A. K. 卢哈尼针对非殖民地化問題提出了最坦率的意见，他对代表大会說：

庫西宁同志在介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运动提綱草案的发言中，曾就所謂“印度非殖民地化”的理論作了說明。我认为有必要声明，我同这个理論沒有任何关系。他和某些参加这次討論的同志就这个問題所作的发言中，完全歪曲和誤解了我們之中的某些人当初临时使用“非殖民地化”一詞所要表达的意思。我着重指出，我們使用这个名辞是临时性的；我們一直在这个名辞上加上引号。我根本不承认庫西宁同志对这个名辞的用法所作的解释。

为了澄清圍繞这个观点的起源而产生的混乱，我认为說明某些情况

① *Inprecor*(《国际新聞通訊》), VIII(Nov. 8, 1928), p. 1474.

② 同上, p. 1461.

是必要的。大約一年以前，在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印度同志曾就印度的形势作了一次报告。在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到印度的殖民地化或非殖民地化。不过，讨论报告的结果，曾指派一个特别委员会去研究印度形势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非殖民地化问题。“非殖民地化”一词就包括在我可以称之为该委员会的参考名辞之内。就我所知，这是第一次在印度问题上使用“非殖民地化”这个名辞。该委员会致力于研究提出的问题。有关的材料也提交该委员会，其中体现某种观点。委员会举行过几次讨论。我记得委员会本身并没有严重的意见分歧。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这个观点是作为一般基础而被接受的。委员会的材料，不論是原稿还是印刷文件，在过去的九个月中一直可以看到。这批材料包括目前讨论的印度问题的大部分题材。我不可能在这里提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或这个观点属于左派还是属于右派的问题，同时我也无法针对这次多少带有片面性的讨论表示个人的意见。不过，我希望你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这个观点不是按原来方式向你们提出来的，而是遭到了歪曲。因此，你们并不了解我们自己对这个观点的提法。我必须对这种争论方式提出强烈的抗议，因为，说得客气一些，这对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说，对那些由于持有某种观点而受到批评的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①

新的殖民地问题提纲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最后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虽然曾向英国的观点作了一些让步，但基本上还是忠于俄国的观点，而且浓厚地反映了中国的经验。提纲体现了一种三阶级战略，这个战略以印度革命已进入农民革命阶段这一暗含的假定为基础。按照提纲的说法，由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衰退，英帝国主义已经能够“再一次采用阻碍印度工业发展的政策。”^② 提纲确定

^① 同上，p. 1472.

^② “Theses o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Colonies and Semi-Colonies”（《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提纲》），*Inprecor*（《国际新闻通讯》），VIII（Dec. 12, 1928），p. 1660.

貧苦农民和小資產階級是无产階級的同盟軍，宣称“貧困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生气勃勃的革命力量的影响。”^① 在革命的階級敌人中，有“商业資產階級”，它“直接为帝国主义資本服务”，就像中国的买办資產階級一样。提綱宣称，代表本国工业利益的資產階級本身則支持民族运动，但它表现出“一种动摇和妥协的傾向，可以称之为民族改良主义。”^② 这种含混不清的說法实际上是說：資產階級已不再是革命的了；虽然它还可能有一些残余的反帝国主义的冲动，但在农民革命中就得把它当作敌人。提綱以及随之制定的共产党政策的主旨，都在于全面攻击資產階級敌人。

共产党人对待資產階級的策略應該怎样呢？應該反对同資產階級結成任何联盟，虽然在“明确的反帝斗争中”，可以同資產階級达成“临时協議”、进行“临时合作”。“不論在政治上还是在組織上，”共产党都應該“以最明确的方式，同一切小資產階級团体和政党划清界綫。”^③ 共产党人應該在自己的一切活动中批評“小資產階級党派的三心二意和搖摆不定”，其中也包括印度国大党的左翼。

在最重要的实际問題上，即在組織形式的問題上，殖民地問題提綱遵循了俄国的观点：

性质特殊的工农党，不管多么具有革命性，在特定时期总是易于轉变成一般的小資產階級政党，因此，共产党人不宜于組織这种政党。共产党决不能在两个階級融合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組織；同样，共产党也不能把在这种基础上組織其他政党当作自己的任务，这种基础正是小資產階級党派的特点……。团结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所有共产主义小組和

① 同上，p. 1665.

② 同上。

③ 同上，p. 1668.

共产主义者，組織一个单一的、非法的、独立的和集中的党，是印度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①

提綱更进一步明确了第五次代表大会赋予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提綱宣称：

共产国际有义务对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建党任务給予绝对特殊的注意。在这方面，帝国主义各国的共产党負有特别重大責任。这不仅要求它們协助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綫，准确分析組織和鼓动方面的經驗，而且要求它們有系統地教育党的队伍，出版不低于一定数量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并把文献譯成各殖民地国家的文字，最积极地协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事經濟和社会問題的研究和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創辦党报等等。^②

虽然关于新路綫的辯論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又繼續了一个时期，但这次大会毕竟是在印度实行新战略的开始。共产国际改变了长期执行的支持资产阶級民族主义的政策，轉而执行反对资产阶級民族主义的政策。非殖民地化理論是和 M. N. 罗易的名字分不开的，这一理論所受到的抨击，往往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共产国际的新路綫，实质上正是罗易从 1920 年以来一直大力宣揚的路綫。只是在具体的策略問題上，共产国际与罗易不同。共产国际主张取消工农党；罗易和英共的主张則相反。罗易和英共主张两党并存，由非法的印共去控制合法的工农党；毫無疑問，在当时的法律和政治条件下，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工农党毕竟是一个活动正在开展的組織，它的建立耗費了大量時間和金錢。在取消工农党时所遇到的困难(我們将在下面談到)，正足以証明它具有一定的政治潛力。但是，不管什么路綫对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

① 同上, pp. 1671, 1673.

② 同上, p. 1670.

最有利，俄国的观点还是占了上风，共产国际停止了它对工农党的支持。

第七章 政治上的徬徨

1928年，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问题大肆进行含糊的辩证的争论时，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也由于印度群众的日益动荡不安和政治觉悟的日益提高，以及新进青年群众领袖要求社会和經濟改革的激进思想，而开始活跃起来。

在这些领袖中，以賈瓦哈拉尔·尼赫魯最为重要。他当时显然是同情左翼的。他在欧洲时，就在共产国际发起的反帝联盟担任工作；訪問苏联回来以后，对俄国的实验以及一般的社会主义思想又表示极为钦佩。

在1927年12月举行的国大党馬德拉斯会议中，尼赫魯一跃而为该党的激进派领袖；由于他的努力，该党左翼获得了重大胜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通过了要求印度完全独立的决议。尼赫魯在自传中写道：“我向工作委员会提出了一批决议案——关于独立、战争危机、跟反帝联盟建立联系等问题的决议案。工作委员会几乎全部接受了我所提出的决议案，并且把它写成工作委员会的正式决议”^①由于提出这些决议案，尼赫魯实现了反帝联盟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例如关于“战争危机”的决议案就暗示英国企图侵略苏联。

尼赫魯写道，他的决议案“几乎全体一致通过”，但是他“心里

^① 《尼赫魯自传》，世界知識社1956年版，第189頁。

却感到不安，我认为人们也许没有认识这些决议的真正意义，或者曲解了这些决议”。^① 要求印度独立的决议显然就是这样的，因为马德拉斯会议刚一结束，这项决议的意义就成了严重的争论问题，使国大党不久便陷于分裂。

参加马德拉斯会议的共产党人有菲利普·斯普拉特、R. S. 宁勃加尔、K. N. 卓格雷加尔和其他几人。他们当然都支持尼赫鲁关于战争危机的决议案和关于国大党参加反帝联盟的建议。但是，他们对会议并没有起什么影响，这无疑是由于尼赫鲁处于卓越地位之故。他们自己提出的关于向苏联祝贺俄国革命周年纪念的决议案遭到否决；他们关于举行抗议性罢工罢市反对西蒙委员会预定的访问的号召也没有得到国大党的批准。1927年11月，印度政府宣布成立以约翰·西蒙爵士为首的印度特别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来印度调查1919年蒙塔古—契尔姆斯福德改革方案的实施情况，然后汇报英国议会，以便进一步改进印度的政府体制。政府没有任命印度人参加这个委员会，这件事引起了广泛的愤慨，使抵制西蒙委员会的运动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在国大党马德拉斯会议上，前一年担任主席的S. 斯利尼瓦萨·伊因加尔提出抵制该委员会的提案。国大党接受了这个提案，但是我们在前面提到，共产党人主张采取更直接的行动的提案并没有通过。

可是，当西蒙委员会于1928年2月到达孟买时，全国各地已举行罢市，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还发生暴动。在这一年中，西蒙委员会始终是一种刺激因素，它使群众日益提高的政治觉悟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下来；并且像个楔子一样，使愿意同意最后取得自治领地位的保守派和要求完全独立的激进派越离越远。

① 同上。

尼赫魯在馬德拉斯會議的勝利說明知識分子日益激進，群眾對西蒙委員會的敵視則說明群眾日益跃跃欲试。其他階層也露出了這種跡象。在舉行反西蒙罷市的那個月里，孟買邦的農民發動了包括抗稅在內的非暴力運動，並在好幾個月中得到全國的注意和支持。由於這個運動，農民拒不繳納的捐稅終於減少了；這就說明，組織起來的農民是一支潛在的政治力量。

產業工人的日益動蕩不安，也在1928—1929年的風起雲湧的罷工中深刻地表現出來。這一年發生了二百零三次罷工，而前一年只有一百二十九次；參加者達五十萬零六千八百五十一人以上，損失的工作日達三千一百六十四萬七千四百零四個之多。^①孟買紡織工人的總罷工具有極大的重要意義，這次罷工從1928年4月26日持續到10月6日，使五十家紡織廠關了門。共產黨人在孟買的罷工中起了積極的領導作用，但許多非共產黨工會運動者也參加了領導工作。

印度政治愈來愈激進化的另一跡象表現在民族主義者對於公共安全法案的反應上。該法案系印度政府於1928年9月向中央立法議會提出的，它是一種為把外國煽動家趕出印度提供合法手段的反共措施。誰也不會懷疑，這個法案的具體對象就是英國共產黨人菲利普·斯普拉特和本杰明·布萊德雷，因為他們是當時的印度共產主義運動的實際領袖，並在組織工會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②

① *India in 1928—29*（《1928—1929年的印度》）（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1930）, p. 7.

② 從工業與勞工部長A. C. 麥克沃特斯的演說看來，這個法案顯然是針對工會運動的。演說載於《立法議會辯論記錄》，[官方報告]（*Legislative Assembl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1928, Vol III (Simla: Government of India, 1929), p. 676.

尽管政府企图把共产党人說成是洪水猛兽，但各色民族主义者却强烈反对这个法案。拉拉·拉支巴德·腊伊說，这个法案的目的是“要把想来印度調查工人状况的人吓跑”。N. M. 卓什补充說，“这个法案所針对的，并不完全是共产党人，也并不完全是共产主义学說”。^① 在辯論中，S. 斯利尼瓦薩·伊因加尔、賈瓦哈拉尔·尼赫魯的保守派父亲摩底拉耳·尼赫魯和右翼国大党人瑪檀·摩含·瑪拉維雅也积极反对这项措施。这个法案終被击败了。

中央立法議會关于这个法案的辯論表明，印度資產階級政治家深知共产党宣传的性质，也深知共产党鄙視他們这个階級，那么，他們为什么不願意袖手旁观，让这个主要想把共产党人赶下印度舞台的法案获得通过呢？

这可能有許多原因。正如这些資產階級政治家的言論所表明的，他們害怕这个法案成为进一步限制政治自由，包括限制他們自己的政治自由的措施。另外，尼赫魯和伊因加尔訪問俄国之后所发表的贊揚言論，在一定程度上喚起了对苏联的同情。而且，有些民族主义者显然认为，如果共产党人使英国人头痛，就很可以把他們看作有用的同盟者。

总之，民族主义政治家准备不計較共产党人公开表示的敌意，甚至坚决保卫共产党人，使之不受政府的迫害——这說明印共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环境該是多么有利。印度社会的每个阶层都在騷动中并且开始反抗；左派在国大党中获得胜利；像尼赫魯这样重要的領袖已經傾向社会主义思想，并在共产国际发起的組織中进行活动；对苏联的兴趣和感情日益增长——这一切对于那些打算

① 同上，pp. 643, 671.

最終把持民族主义运动的共产党鼓动家來說都是有利的条件。然而，印共大約总有两年沒能利用这种形势，这主要是由于理論混乱和指导矛盾的原故。当他們終於接到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时，共产国际却要求他們进攻他們的假定同盟者；解散唯一已經开始引导工人农民的不滿情緒的組織工农党；并使自己孤立于不滿和反抗情緒的汇流——具有最大潜在价值的民族主义运动——之外。

“爭取印度独立联盟”

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可能同盟者中，最有希望的一个就是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爭取印度独立联盟。这个联盟是由于人們在国大党馬德拉斯會議上誤会了尼赫魯提出的独立決議案的含义而产生的。馬德拉斯會議通过这个議案之后，便决定召开各党派的會議，为独立的印度起草宪法。因此，許多民族主义組織的代表便于1928年2月在德里集会。事情馬上变得很清楚：印度完全独立的主张遭到許多人反对，而自治領地位却是許多人宁願接受的目标。問題又因为印回教派之爭而复杂化，所以直到5月才成立了以摩底拉耳·尼赫魯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小組委员会。

后来叫作尼赫魯报告的小組委员会的草案，主张接受自治領的地位，而不主张完全独立。这种主张馬上导致了民族主义队伍的分裂。刚刚訪苏回来的S.斯利尼瓦薩·伊因加尔发表声明說，“如果印度接受自治領地位，就等于自杀。”接着他就同賈瓦哈拉尔·尼赫魯和苏帕斯·占德腊·鮑斯一道成立了爭取印度独立联盟。該联盟于1928年11月3日在德里举行第一次會議。会上宣布的章程草案规定，联盟的目标是“爭取实现印度的完全独立，并在社会平等經濟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建設印度社会”。賈瓦哈拉尔·尼赫魯談到这个新政党時說，“它是一个具有明确政策和綱領的永

久性組織。它願意同其他一切志同道合的組織進行合作”。^① 當時還有人打算讓這個聯盟參加反帝聯盟。

現在很難斷定該聯盟和共產主義運動在意識形態的傾向方面究竟相容到什麼程度——事實上當時必定是相容的。不過我們至少知道：它的領袖是激進而具有戰鬥精神的，他們以一些同情的態度來看待蘇聯，並且接受了許多社會主義理論。另一方面，他們並不是由於具有共同的意識形態，而是由於共同不能忍耐甘地對待獨立的态度而結合在一起的；他們宣傳社會主義沒有像要求獨立那麼堅強熱烈。尼赫魯的費邊主義的溫和思想，可以從報紙發表他在國大黨全國委員會上的一次演說的報道中看出：

他信仰純粹的社會主義，但目前不願向國大黨提出這種主義，因為理解的人還不多。可是，國大黨為了自己存在下去而全盤接受社會主義綱領的一天，總要到來。^②

尼赫魯的話有先見之明，因為這“一天”確實已經“到來”了——雖然直到 1955 年才到來。

爭取印度獨立聯盟代表着富有戰鬥性的國大黨的左派，但這仍然是不穩定的。它可能跟隨尼赫魯走向獨立和社會主義，也可能跟隨蘇帕斯·占德腊·鮑斯在比較獨裁的政體下走向獨立。印度共產黨人以頗大的興趣注視着這個新組織，看它究竟走那條道路。

① Nripendra Nath 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28* (恩利奔德腊·那特·米德腊編：《1928 年印度年鑑》)(Calcutta: The Annual Register Office, 1929), II, 6, 513.

② *The Tribune* (Lahore) (拉合爾《論壇》), Nov. 6, 1928, p. 2.

印共与共产国际

1928年，印共在組織工农党方面花了很多精力，而且还在繼續組織新的工农党。同年9月28日，在莱亚普尔为旁遮普邦組織了一个新的支部；10月14日，在密拉特成立了北方邦工农党。^①孟买和孟加拉邦已經有了工农党；10月宣布准备召开工农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②大会于12月21日至24日在加尔各答举行，由索含·辛格·卓什担任主席。^③

在大会通过的提綱中，領導工农党的共产党人指出，现在必須以全力加强这个“公开的”、合法的群众組織。提綱沒有提到印共，却宣布工农党是“有正确政策、能团結和領導国内所有群众革命力量的唯一組織”。^④提綱还說，以前，工农党作为国大党的左翼在全民运动中进行工作是适当的。可是现在，形势既然已經改变，工农党就必须准备“扮演完全独立的角色”。提綱詳細規定了工农党同国大党的关系：

国大党在……若干時間內，还会維持它的混合性，成为一个沒有明确的信念、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松散組織。但是它有小資產階級的追隨者，包括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士在內，有些还具有潛在的革命性。在这种情况下，当工农党仍然比較薄弱而且尚未在国内組織起来的时候，它必須遵循传统的政策，在国大党内建立党团，以便进行宣传鼓动，揭露国大党的反动領導，为工农党吸收其中的革命分子。但是，这种政策只是暫时的。工农党不可能有控制或把持国大党的意图；它在国大

① *Meerut Sessions Judgment* (《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 p. 211.

② *The Tribune(Lahore)*(拉合尔《論壇》), Oct. 27, 1928, p. 3.

③ 其他与会者的姓名见同上, Dec. 23, 1928, p. 9.

④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India, thesis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Party of India"(《印度政治形势；印度工农党提綱》), *Labor Monthly* (《劳工月刊》) XI(March, 1929), p. 159.

党内的党员纯粹是起一种批评的作用。因此，党员不准在国大党组织中任职（除非经工农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特許）。工农党的目的只能是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以求尽早排除在国大党内进行鼓动工作的必要性。^①

不仅对国大党采取这种温和态度有违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立场，而且召开工农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件事本身也直接有违于解散工农党的指示。造成这种重大分歧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共产国际传达指示不及时和有错误。据菲利普·斯普拉特回忆，“在1928年12月，G.M.阿提加利从欧洲回到印度以前”，即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结束了三个多月以后，印度共产党人“一直没有得到直接指示”。^②斯普拉特以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没有认真执行新路线为理由来解释这种耽搁：

到1928年，共产国际除了作为俄共各派别勾心斗角的场所之外，已经不再起什么作用了；当年向左转的动向也同世界政治没有关系，它只不过是这种派别争吵的结果而已。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官僚机构可能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认为，印共采取新路线还是旧路线，都是无关重要的。这样，他们自然就不特别劳神去通知我们了。^③

据斯普拉特说，尽管如此，他和印共其他领导人“从报纸的简短报道中已经意识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他说，安排了工农党代表大会之后，

我就去撰写那篇印出的长篇决议（即“提纲”）和那篇报告。在这些文件中，我把路线多少改动了一点。虽然我的努力因为大会中发生了更加惊人的事件而显得黯然失色，但是我还是为自己庆幸，因为我的眼光相当敏锐，能够看出共产国际的动向。^④

① 同上 p. 160.

② Philip Spratt, *Blowing Up India* (菲利普·斯普拉特：《炸毁印度》) (Calcutta: Prachi Prakashan, 1955), p. 42.

③ 同上, p. 43.

④ 同上。

在加尔各答會議的第三天，印度共产党人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寄給工农党的一封信，信中明确禁止同爭取印度独立联盟結成任何同盟：

在恐怖統治和血腥鎮压日益加剧的时期，妨害你們对英帝国主义及其封建同盟者进行胜利的、有組織的斗争的**主要障碍**，就是**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影响**。……对于組織群众、建立工农的革命联盟和树立无产阶级对这个联盟的领导权來說，最大的危险不仅在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本身，而且也来自“优秀的”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組織和集团**，因为它们事实上已經受了前者即“爭取印度独立联盟”的影响。……虽然这个联盟自吹自擂的綱領許下了无数諾言，但它的特点却是混乱不堪，廢話連篇，你們的代表大会務必摆脱这种性质。①

尽管这个明白的指示要他們脱离爭取印度独立联盟，但有些与会者仍然主张同該联盟合作。K.N.卓格雷加尔、D.R.滕格底和S.古瑪腊南达甚至提出了这样的提案。②虽然提案被否决了，但大会所通过的提綱却是他們观点的重大胜利，并意味着拒絕共产国际的指示。提綱說：

虽然爭取印度独立联盟的成員不純，但它有明确的政策和綱領。它实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組織，它的政策是工农党政策的伪善的翻版。它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止群众运动的独立发展。工农党党员不能加入該联盟，因为这样做会在群众面前使該联盟获得它所沒有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工农党只能在統一战綫中，在該联盟为独立进行宣传的基础上同它合作。这种宣传虽然帶有华而不实的性质，但在客观上还有点价值。尽管如此，仍有必要不断揭露該联盟的綱領和政策的錯誤，揭露它的资产阶级本质、甚至法西斯性质，和它終于要起的反革命作用。③

① 信上的日期是1928年12月2日，见《密拉特审判案証件》(Meerut Case Evidence), Exhibit No. P 334. 黑体字系原有。

② 同上, Exhibit No. P 465.

③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India...” (《印度政治形势；印度工农党提綱》), p. 160.

由此可见，工农党一方面打算批評爭取印度独立联盟，并揭露其“反革命作用”，一方面还想同它合作，因为它的宣传“在客观上有点价值”。显然，工农党并不像共产国际那样认为該联盟的綱領完全是“混乱不堪、廢話連篇”。

令人奇怪的是，印度共产党人为什么实际上无视共产国际的来信，而从阿提加利那里接到共产国际指示后又为什么不馬上解散工农党。或許他們知道，共产国际內部在基本战略和策略方面还有分歧，布哈林和斯大林正在爭夺权力——这场斗争过了六个月才得到解决。还必须記住，通过斯普拉特和布莱德雷来领导印共的英共，当时还在反对工农党的新路線。事实上，克萊門斯·杜德在1928年11月底，即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閉幕将近二个月之后，曾写信給 P.C. 約希說，“我希望你能把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吸收到工农党里来。”^①

另一方面，罗易在中国革命惨败后所持的立場却是印度共产党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这时热烈支持斯大林关于同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合作的主张，但是又反对——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强烈——同印度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合作（參閱第六章）。

在此后的六个月中，印度共产党人不断接到英共和罗易的建議，但是他們的建議不但自相矛盾和互相矛盾，而且也 and 共产国际的路綫相抵触。

来自国外的互相矛盾的建議

1929年3月，英共在《劳工月刊》上发表工农党提綱，表示默

^① Meerut Case Evidence (《密拉特审判案証件》), Exhibit No. P 345.

許印共支持工农党，但又在該提綱前面加了如下的按語：

这个決議會使人感到极大兴趣，不仅因为它对印度形势做了估計，还因为它对工农党的政治任务和政策做了权威性的闡述。要批評工农党的观点的某些方面是很容易的，因为这种观点显然沒有考虑到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印度問題的重要討論，尤其是印度的工业化以及像工农党这样一个以联合不同階級为基础的政党所固有的危險等問題方面。这件事情只能使我們英国人更有必要对印度那里正在发展的重要运动給以充分注意。^①

我們不妨猜想，这一要求重視印度形势发展的忠告，既是針對英国同志而发的，也是針對俄国同志而发的。

英共领导人 R. 佩季·阿諾特在 1929 年发表的一本小册子中，隱隱反对共产国际对工农党的政策。他在这本小册子里說，

这[工农党]是两个階級的政党。……作为一种組織形式，它被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殖民地問題提綱明白斥为共产党人不应該企图建立的政党。但是，这次工农代表大会、大会中的演說以及大会的决定和決議，都使人清楚地感到，印度第一次有了真正觉悟的群众运动，无产階級真正开始觉醒。不錯，这只不过是一小撮人。但是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演說語調中，可以听到弦外之音，可以听到滾滾的雷声和广大群众前进的脚步声。^②

不过，英共也并不贊成同爭取印度独立联盟結成任何同盟，这一点倒是符合共产国际路綫的。克萊門斯·杜德在 1929 年 1 月的《劳工月刊》中写道，这个联盟不代表革命的社会主义，而代表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他还說，这个联盟实际上是“对工农党的

①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India...” (《印度政治形势：印度工农党提綱》), p. 159.

② R. Page Arnot, *How Britain Rules India* (R. 佩季·阿諾特：《英国怎样統治印度》), (London, CPGB, 1929); p. 30.

挑战,它企图帮助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对眼看要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群众,重新加以控制。”^①

总而言之,英共建议印度共产党人继续组织工农党,但不要与争取印度独立联盟结盟。

罗易在1928年和1929年初的观点,不但不符合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且自相矛盾,最后还和他先前的整个立场完全背道而驰。使人更糊涂的是,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竟发表了他的许多文章。

1928年8月,当共产国际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罗易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先是支持瓦尔加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左派的文件,后来又支持杜德和英共(参阅本书第135—139页)。在文章的前一部分,他似乎拥护左派关于印度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的观点。他说,“民族主义运动中出现阶级分化,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群众由于资产阶级领导集团的背叛而同它决裂的可能性,仍然是很渺茫的”。^②他还说,小资产阶级“大体上仍处于不可靠的改良主义资产阶级领袖的控制和影响之下”^③——这是同瓦尔加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文件的观点一致的。可是他接着又说“由于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行动的开展,小资产阶级激进民族主义者现在分裂成为两个越离越远的流派。一个趋向于同工农党中的工人阶级结成革命同盟;另一个在苏帕斯·占德腊·鲍斯领导下迅速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他结束这篇文

① Clemens Dutt, “The India League for Independence” (克莱门斯·杜德:《争取印度独立联盟》), *Labour Monthly*(《劳工月刊》), XI(Jan., 1929), p. 27.

② M. N. Roy,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M. N. 罗易:《印度宪法》), *Inprecor*(《国际新闻通讯》), VIII(Aug. 24, 1928), p. 954.

③ 同上, p. 955.

章說：“这种階級力量的重新划分，是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反帝斗争的先决条件”。^①

罗易采取了騎墙的态度。他在文章中，先說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階級分化”是渺茫的，最后却描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階級力量的重新划分”。他在文章开始时断言，小資产階級“大体上仍处于資产階級領袖的影响和控制之下”，而在将近結束时又指出，一部分小資产階級趋向于同工人階級結成革命同盟。这样看来，瓦尔加这方面是对的，杜德那方面也是对的。罗易并没有在这篇文章中明确表示倒向任何一方。但是四个月后的选择就明确了。

在1928年12月号的《国际新聞通訊》中分析印度国大党时，罗易談到民族主义运动的“激进化”和“小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基层反抗資产階級領袖那种妥协的改良主义政策”。他接着还說，如果小資产階級民族主义群众的反抗得不到更富革命性的階級的領導，右翼領袖将恢复他們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并使运动的激进化过程暂时受到阻碍。^②在1929年2月号的《国际新聞通訊》中，罗易又發揮他的論点說，让小資产階級处于无产階級影响之下是可能的。他說，“如果无产階級不作出让步，并为实现民族主义革命綱領而同他們結成战斗的同盟，小資产階級就未必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③罗易不仅准备对小資产階級让步，甚至还批評工农党沒有支持爭取印度独立联盟。他說，“当小資产階級左翼激进派正在試图把資产階級領導人逐出民族主义运动領導集团的时候，

① 同上。

② M. N. Roy,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M. N. 罗易: 《印度国大党》), *Inprecor* (《国际新聞通訊》), VIII(Dec. 27, 1928), p. 1733.

③ M. N. Roy, “The Conference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Party of India” (M. N. 罗易: 《印度工农党代表大会》), *Inprecor* (《国际新聞通訊》), IX(Feb. 1, 1929), p. 93.

他們沒有得到支持；相反的，他們還像大資本和地主的代表一樣被譴責為工人農民的敵人。”^①

總之，羅易過去在共產國際的全部歷史中，一向是個左派，而現在卻站在共產國際和英共的右邊了。瓦爾加在 1928 年春季發表的文章表明，共產國際正在向左轉。杜德的回答卻表明，當時控制着印度共產主義運動的英共並不願採取左派的策略。在辯論過程中，羅易採取騎牆的態度。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左派取得了勝利，但沒有擊敗右翼，也沒有封住他們的嘴；而英共則仍然主張印度採取右派的策略。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結束後，羅易開始右傾。到 1929 年初，他對爭取印度獨立聯盟的支持，事實上使他站到了英共的右邊。

羅易為什麼改變立場，是耐人尋味的。如果把這件事情完全說成是羅易在共產國際當時進行的權力鬥爭中看風使舵，以圖挽救自己的地位，那是不公正的。無疑，他是因為看到印度事態的迅速發展，看到越來越多的跡象說明國大黨在尼赫魯領導的左翼獲得勝利之後，已在發揮“客觀上的革命”作用，所以受到了影響。的確，羅易對 1928 年後的印度形勢的分析，比共產國際的分析更符合政治現實。

還令人奇怪的是，雖然共產國際在 1928 年夏季就採取了富於戰鬥性的左派政策，但是羅易的右派文章在 1929 年 2 月以前竟還能在《國際新聞通訊》上發表。必須記住：斯大林同布哈林和右翼的鬥爭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後還持續了一年多。羅易早在 1921 年就和布哈林友好，^②而布哈林在 1929 年 2 月以前還擔任《真理報》的編輯，4 月以前還擔任共產國際領導人，直到 11 月才

① 同上，p. 94.

② Roy *Memoirs*（《羅易回憶錄》），(July 11, 1954), p. 330.

被逐出苏共政治局。在 1928 年全年和 1929 年的头几个月中，极左派的敌人还在担任苏共和共产国际的重要职务。

罗易和 G.M. 阿提加利一直是友好的，他在 1929 年 2 月 27 日从柏林写信给阿提加利说，“你知道，我很幸运，我对我们工作所负的行政责任已被解除，因此我不能对你们有什么重大的实际帮助，也无法知道国内的人为什么会闹到这个地步”^①无疑，他这里指的是他以前在共产国际中主管印度的活动。但是，阿提加利的回答表明，罗易在印度还有点威信，而且在共产国际中失宠的印度共产党人不只是他一个人。阿提加利在 1929 年 3 月 15 日的一封信中写道，乌斯玛尼“叫我告诉你，‘你的人’在那里毫无理由地攻击他。但共产国际把他和你都推翻了。他对你没有意见。这里没有人对你进行反宣传。”^②

印共的改组

虽然印度共产党人在工农党代表大会上无视共产国际关于争取印度独立联盟的信件；也没有修改工农党提纲来顺应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新路线，但在执行共产国际关于组织问题的政策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努力。1928 年 12 月 27—29 日，紧接着工农党代表大会以后，工农党领导人组成了印度共产党，并在加尔各答召开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新路线，并在三天后成立了新的印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由 S.S.米腊吉卡、S.A.丹吉、R.S.宁勃加尔、K.N.卓格雷加尔、S.V.卡堆、穆札法尔·艾哈迈德、阿卜杜耳·哈黎莫、向苏耳·胡达、阿卜杜耳·马季德和索含·辛格·卓什组成。卡堆被选为总书记，执行委员决定申请正式参加共产国

① Meerut Sessions Judgement(《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 p. 243.

② 同上, p. 245.

际。^①

这次会议仅存的记录是一位与会者所写而后来为警察所缴获的笔记。笔记中的两段摘录表明，印度共产党人当时决没有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提纲。

共产国际的提纲经过了讨论，会议决定接受这个提纲作为工作的基础。成立公开政党的可能性应该加以探索。^②

讨论提纲。[想必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殖民地问题提纲]。对于这个提纲的看法是，应该把它当作一个基础，然后参照印度的情况加以修改。成立公开政党的可能性应该加以探索。^③

印共不但要照自己的意见修改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殖民地问题提纲，而且在党的组织问题上也显然还不准备履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因为“公开的党”恰恰同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号召建立的“非法的、独立的、集中的政党”相反。再说，工农党早就是印共的“公开的”党了。这件事表明，印共可能还在抱住罗易以前的建议不放，打算在维持一个公开的、合法的群众性政党的同时，还维持一个非法的、精锐的共产党。

同共产国际政策有这种分歧的原因不得而知。这可能是由于罗易和英共所写的互相矛盾的文章和信件使印度共产党人有点不知所措，也不知道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殖民地问题提纲是否就是这个问题的定论。另一方面，他们同海外共产党人的联系也很差。迟至1929年3月14日，斯普拉特还写信给英国的杜德说，“附带提一句，我应该说，我实际上还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英共事务的消

① 同上，p. 234.

② 同上。

③ 同上。

息,甚至也沒有得到任何关于共产国际的重要报导”^①。

印共于 1929 年 3 月 17—19 日在孟买再度开会。这次会议仅存的纪录,仍然是警察所缴获的片断的笔记。笔记表明,当时印共还没有决定解散工农党;赞成保留工农党的人主要有米腊吉卡和烏斯瑪尼——鉴于烏斯瑪尼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所起的突出作用,这个事实就值得注意了。这似乎证实了阿提加利信中暗示的事情,即烏斯瑪尼已失宠于共产国际。

孟买会议决定改组印共,使之成为“全部共产主义工作的基础”,同时保留工农党。可是,意味深长的是,在筹划下次会议时,竟把“保留工农党的危险”列为议程第一項。^②

但在会议尚未举行以前,印度政府便给了印度共产党人一个沉重的打击,旨在使印共从此一蹶不振;这样一来,工农党的问题实际上就全都解决了。

密拉特謀叛案

1929 年 3 月 20 日,即印共举行孟买会议的次日,印度政府逮捕了三十一名共产党人和工会工作者,并把他們解到密拉特(北方邦)审判,罪名是阴谋推翻英王兼印度帝国皇帝对印度的统治权。印共领导人几乎全部落网;有八个被告是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还有一个是全印工会大会以前的主席。

被告得到印度各派民族主义者的同情;由 M. A. 安薩利博士和賈瓦哈拉尔·尼赫魯等人組成的辯护委员会随即成立。尼赫魯还写信給英国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書記瓦尔特·西特林說:

我願意指出,这次审判是和总的形势分不开的,必須把它看作印度

① 同上,p.242.

② 同上,p.246.

政府对工人运动所发动的进攻的一个方面。……

人們大叫大嚷，說印度有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毫無疑問，印度是有一些共产党人的。但同样肯定的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叫嚷无非是为了掩飾印度政府的累累罪行而已。^①

說明密拉特案的被告得到支持的另一件事是，圣雄甘地亲自訪問監獄，并給他們以鼓励。^②

审判拖了三年半之久，当局传訊了三百二十名証人，提出了三千件証物，总共花了大約一百五十万卢比的审訊費。^③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P.C.約希曾申請释放，以便参加律师考試，但未获准。不过后来把他解到阿拉哈巴德監獄，讓他在獄里参加考試。据斯普拉特說，各被告所受的待遇還不錯。他們几乎在不經检查的情况下得到了书报，当局甚至向他們提供了违禁的共产主义书籍，使他們能够准备答辯。这样，他們就能够繼續研究馬克思主义，并向其他犯人灌輸共产主义思想。

在娱乐方面，密拉特的被告可以下棋，打乒乓球、板球和排球；而且据斯普拉特說，一般都“生活得很好”。^④但是牢獄生活，大部分時間都是令人厭煩的，起初，政府檢察官 J. 兰德福·詹姆士的雄辯才华还带来一点生气。及至他在审判初期去世之后，整个审判就变得极其枯燥了。在密拉特这个尘埃飞揚、炎热如蒸的小市鎮中，每天只有吊式电扇的单調的轉动和 D. R. 滕格底“关于他

① *The Meerut Trial, Facts of the Case*(《密拉特审判，案情真像》)(London: National Meerut Prisoners' Defense Committee; 1929), p. 10.

② Lester Hutchinson, *Conspiracy at Meerut* (累斯特·哈欽森：《密拉特阴谋》)(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5), p. 107. 哈欽森是密拉特謀叛案的被告之一，他是在其他被告入獄之后被捕的。

③ Meerut Committal Order(《密拉特司法长官付审令》), pp. 12 ff.

④ Spratt, *Blowing Up India*(斯普拉特：《炸毀印度》), p. 48.

的便秘問題”^①的冗长讲话打破酷热的法庭的沉寂，此外就再沒有提神的東西了。

1933年1月16日宣判。穆札法尔·艾哈迈德被判处无期徒刑；丹吉、卡堆、卓格雷加尔、宁勃加尔和斯普拉特各被判处徒刑十二年；布莱德雷、米腊吉卡和烏斯瑪尼各十年；最輕的是三年。^②可是，大多数都在上訴后得到减刑；到1933年底，密拉特案的謀叛者几乎全部获释了。

很明显，印共当时的确图謀推翻英王兼印度帝国皇帝对英属印度的統治权，既然是这样，就很难解释印度政府为什么认为有必要这样大张旗鼓地控告共产党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判明一个十分简单的案子。印度共产党人断言，根本的原因在于英国1929年的大选。一个共产党的历史家說，“密拉特审判是鮑尔溫的保守党政府制造的，其目的在于渲染所謂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主义危險’”。^③这种解释看来是牵强的；但是，密拉特被告銀鑄入獄，肯定使印共的組織机器，尤其是在工会运动中的机器受到某种程度的破坏。工农党由于领导人被捕，实际上陷于解体状态，虽然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內偶尔还在这里或那里有些活动。

可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密拉特审判对于实现共产党在印度的目标，似乎也是有好处的。監獄当局的寬大，使密拉特案的犯人能够指导獄外同志；斯普拉特还追述說，他們还能在獄中成立“等

① Hutchinson, *Conspiracy at Meerut* (哈欽森：《密拉特陰謀》) p. 165.

② Meerut Sessions Judgement(《密拉特刑事法庭判決書》), p. 675.

③ N. Somin, "Meerut Trial in India and the Colonial Policy of the Labourites"(N. 索民：《印度密拉特审判与工党殖民政策》), *Communist* (《共产主义者》), III(July-Aug., 1950), p. 67.

于是党的办公室的机构”。^①新的领导人，特别是 S. V. 堆什班堆、R. D. 帕腊德瓦支和 B. T. 兰纳迪夫，都挺身而出为建党而努力。

更重要的是，围绕密拉特审判的宣传和协助辩护的显要人物，都为印共造成了难得的宣传机会，而且印度共产党人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斯普拉特追忆道：

总而言之，法庭揭露我们的秘密工作方法只能使人们钦佩我们：我们所做的都是大多数青年人所要做的。……我们在法庭中有机会发表政治言论，而且得到报刊的广泛刊登。有几篇发言长得足以印成一本小书；毫无疑问，凡是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话几乎都说了。^②

密拉特审判使共产党人变成了殉道者，而殉道者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事实上哈罗德·拉斯基就是这样写的：

密拉特审判案可以同美国的蒙尼案、萨科-万泽第案、法国的德雷福斯案、德国国会纵火案等作为最重要的案子相提并论。^③

扫莫盈德腊那特·泰戈尔说过，菲利普·斯普拉特也同意：密拉特审判案“为共产主义在印度打下了稳固的基础”。^④

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采取攻势

在密拉特审判拖延不决的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说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具有革命的潜力。尼赫鲁和其他左翼领袖所传播

① Spratt, *Blowing Up India* (斯普拉特：《炸毁印度》)，p. 53.

② 同上，pp. 51—52.

③ Preface to Hutchinson, *Conspiracy at Meerut* (哈钦森：《密拉特阴谋》序言)，p. 8.

④ Saumyendranath Tagor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India* (扫莫盈德腊那特·泰戈尔：《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Calcutta]: Red Front Press, 1944), p. 21.

的社会主义思想已在印度有知識的中坚人物中流行起来；参加工会运动的工人越来越受共产主义和冒牌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支配；由于全国日益高涨的动蕩不安，恐怖行动不时爆发。

在这个时期的恐怖行动中有一件最为轰动一时。1929年4月8日，旁遮普邦一个名叫帕加德·辛格的年輕恐怖主义者向中央立法議会的議員席投擲了一顆炸彈。他被捕后，經過审讯，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服刑期間，他因在被捕前杀害了一个英国官員而再度受审。在这件事情上，他又被判罪，于是在1931年3月23日被絞死。这个案件激起了印度所有民族主义者的深切同情，印度国大党还在卡拉奇會議中通过了一項譴責这一絞刑的決議。^①

帕加德·辛格并非共产党人，不过他在監獄中显然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他受审时对法庭作的供述中，他号召国人进行一次建立“无产階級政权”的革命。^②他由于殉节而变成了印度的民族英雄；最近，1955年，一部記述他的平生事迹的电影还吸引了广大的印度观众。现任印共总書記阿約艾·高士是他的一个同志，也是这次謀杀案中的一个被告。主要因为这一关系，印共試圖把帕加德·辛格說成是印共的英雄，并出版了两种关于他的平生和思想的小册子。^③

1930年4月18日，孟加拉的革命者在一次类似的恐怖行动中袭击了吉大港軍械庫；这件事情虽然没有引起重大的革命行动，

① *Congress Bulletin*(《国大党公报》)No. I(April 10, 1931).

② 全文见米德腊編《1929年印度年鉴》(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29*), I, 78.

③ 参閱阿約艾·高士：《帕加德·辛格和他的同志們》(Ajoy Ghosh, *Bhagat Singh and his Comrades*),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6); 和果巴耳·塔古尔：《帕加德·辛格和他的思想》(Gopal Thakur, *Bhagat Singh, the man and his ideas*),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3).

但当局宣布了戒严令，并派出军队去镇压继之而起的暴动。^①

可是，在这个时期的印度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发展乃是甘地所提倡的著名的不合作运动。自从国大党在 1928 年通过独立决议以后，甘地对该党的政策已经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了，因此印度政府漠视甘地的势力，拒不接受他在 1930 年 1 月宣布的十一项计划。甘地发现局势已陷于僵局，便组织一批非暴力运动的成员来发动不合作运动，破坏政府垄断食盐生产的法令。甘地和他的一群追随者越过古季腊特到达海岸；在全国众目睽睽之下用海水煮盐来正式破坏这项法令。不久以后甘地被捕；这时候，罢工和示威在全国各地纷纷爆发，结果有四万到六万示威的民族主义者被拘禁和逮捕。

1929—1931 年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对共产党人——即使不是对共产主义——表示同情，并且越来越激烈，同时又散布着一种欢迎激进主义的气氛，因此运动看来已成为共产党人举手可摘的桃子。可是，到 1929 年底，共产国际终于给印共发出了明确的指示。指示没有考虑到印度的实际情况，反而强迫印共抛弃印度民族主义这块肥沃的土壤，使自己离开印度政治生活的泉源。

共产国际的路綫明确起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 1929 年 7 月 3 日到 19 日在莫斯科举行第十次全体会议；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巩固了他的领导地位。所有反对第六次代表大会左派路綫的人都被打了下去；共产国际沿着极左派路綫急转直下。像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一样，奥托·庫

^① 如果要看共产党人关于这件事的叙述，可参阅加耳巴那·杜德：《吉大港军械库袭击者，回忆录》(Kalpana Dutt, *Chittagong Armoury Raiders, Reminiscences*),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5).

西宁是共产国际对印度政策的发言人。在他向全会作的报告中，他談到印度說：

我們在印度的最大弱点是，我們至今还没有成立一个足够巩固的共产党。許多印度共产党人在“工农党”的队伍中进行工作。我們曾建議他們設法誘導这些党进行改組，并采用另一种組織形式，以求符合列宁主义的原則。可是，这些党的双重階級性还不是最坏的东西，最坏的是还没有在农民中間进行任何实际革命工作。^①

另一个俄国代表 P. 舒宾哀叹說，工农党的“解散”过程比应有的緩慢得多。他指出“工农党的特征就是，在它生命已經停息的时候还不肯死去，紧紧抱住它們賴以生存的躯壳，妨碍了建全的組織形式的发展”。^②

第十次全会的討論情况到 8、9 月間才在《国际新聞通訊》上发表，不过关于會議情况的报告可能在正式发表之前就送到印度了。无论如何，到 1930 年 1 月时，印度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已不能再有任何怀疑了，因为《国际新聞通訊》在当月发表了青年共产国际致印度青年、工人和农民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的語調非常强硬而坦率。信里說“国大党……事实上妨碍了革命运动。……它在很久以前就出卖了印度群众，它无力領導群众的反英帝国主义斗争。……你們要断絕同国大党和独立联盟[即爭取印度独立联盟]的关系”。这封信建議，“要揭露它們的虛伪和背信。要揭露它們作为英帝国主义帮凶的真面目。要把叛徒和花言巧語的人赶出你們的队伍”^③这封信还号召印度青年組織罢工并帮助农

① O. V. Kuusine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Task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O. V. 庫西宁:《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Inprecor*(《国际新聞通訊》), IX (Aug. 20, 1929), p. 847.

② *Inprecor*(《国际新聞通訊》), IX (Sept. 17, 1929), p. 1097.

③ "Open Letter from The Y. C. I. to the All-Indian Youth Congress

民夺取土地。

现在,印共的路綫已經明确而权威性地规定下来:它应该消除工农党的一切残余,同一切资产阶级分子断絕关系,对甘地、尼赫魯和印度国大党发动全面进攻。

M. N. 罗易被开除出共产国际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之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M. N. 罗易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一直站在‘神圣的絞架’前面”。^①第十次全会宣布,罗易在共产国际中再也没有地位了。印度尼西亚代表木索对全会說,“罗易已经不是我們的同志了。他倒是甘地的同志,至少是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的同志”。^②罗易还受到他从前的同事 G. A. K. 卢哈尼的譴責;卢哈尼可耻地放弃了自己第六次代表大会所持的直率立場,而跟着占上风的斯大林跑了。^③(参閱本书第 149—150 頁)

可是,尽管罗易在第十次全会中遭到譴責,他并没有被正式开除,至少共产国际的报刊没有发表他被开除的消息。直到 1929 年 12 月,《国际新聞通訊》才登了下述声明: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決議(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第 9 节),并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1928 年 12 月 19 日关于布兰德勒組織的追随者不得作为共产国际成員的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宣布,罗易由于为布兰德勒的报纸写文章,并

and to All Young Workers and Peasants of India”(《青年共产国际致全印青年大会和印度全体工农青年的公开信》),*Inprecor*(《国际新聞通訊》), X(Jan. 9, 1930), p. 25.

① M. N. Roy, *Our Difference* (M. N. 罗易:《我们的分歧》), (Calcutta: Saraswaty Library, 1938), p. 25.

② *Inprecor*(《国际新聞通訊》), IX(Aug. 21, 1929), p. 887.

③ *Inprecor*(《国际新聞通訊》), IX, (Sept. 11, 1929), pp. 1039—1040.

支持布兰德勒的組織，而自絕于共产国际的队伍，应被认为已經开除出共产国际。①

許多年来，罗易同共产国际的决裂，一直是人們議論的問題。他自己对事情的真相是这样說的：

我是某种內部傾軋的牺牲品，关于这种傾軋的来龙去脉，现在最好还是不公开写出来。英共想要控制印共的願望同这件事大有关系。俄共內部的斗争同我的遭遇也有关系。这里可以举出一件事来談談。印度代表团出席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还是共产国际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以前，即使再三努力，真正的印度共产党人也到不了莫斯科去。第一次出席共产国际的这个印度代表团的目的是，显然是为了按照預定計劃来攻击我。这个詭秘的代表团为了証实几个事前飞到印度訪問的英国共产党人的报告，曾对第六次代表大会說，我是一个在印度完全沒人知道的人物，同革命运动完全沒有关系，可是，耐人寻味的是，印度代表团中只有一个人被允許回国。据說其余的人当时就被认为是英国間諜，并被当作間諜处理了。回国的那个人从此也再不过問政治了。②

可以肯定无疑地說，至少有一个印度代表团成員扫莫盈德腊那特·泰戈尔譴責了罗易，不过似乎不像罗易所指責的那是“預定計劃”的結果。正如第四章所說明的，印度方面确实对罗易的領導有所不滿，但是出席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印度代表团似乎並沒有帶着任何具体指示来到莫斯科(參閱第 139—142 頁)。泰戈尔一向是罗易的严厉批評者。后来他在說明罗易被开除的原因時說：

罗易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显然不是因为同斯大林主义有任何政治分歧。罗易这个野心家一向奉承当权人物。他过去一向是斯大林最恭順的代理人，现在仍然是一个斯大林分子，他盼望有朝一日时来運轉，斯大林会恢复他以前的地位。罗易只是在被共产国际开除之后才参加了德国的布兰德勒反对派。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使这次开除具有政治

① *Inprecor*(《国际新聞通訊》), IX(Dec. 13, 1929), p. 1470.

② Roy, *Our Differences*(罗易:《我們的分歧》), p. ii.

色彩。^①

泰戈尔断言，罗易被开除的原因是：不守纪律，有非同志式的行为，伪造文件，侵吞公款。

像泰戈尔那样，说罗易和斯大林主义没有政治分歧是不正确的。上面说过，共产国际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向左转时，罗易却向右转了；虽然共产国际采取的战略同罗易鼓吹多年的战略很接近，但罗易自己却抛弃了这种战略。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政治分歧是罗易被开除的唯一原因。从1920年到1928年当罗易还是左派的时候，虽然他同公认的战略有着根本性的分歧，但共产国际仍抱着非常容忍的态度，甚至还把他安置在最高决策机关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再说，在共产国际改变了路线以后，罗易虽然又产生了偏向（这次是右倾），但是足足过了一年才被开除。这就说明，如果政策上的分歧的确是他被开除的一个原因的话，也不是唯一原因。

虽然在第十次全会上有人指责罗易曾为海因利希·布兰德勒所领导的共产主义反对派集团的刊物写文章，但是作者一直找不到所说的那种布兰德勒派报刊（《民权报》）。在这个时期中，布兰德勒出版的主要报纸是《逆流》，但是《逆流》在1929年9月罗易开始写《共产国际的危机》这一长篇连载文章之前，并没有登载过罗易的任何文章。

毫无疑问，早在1928年2月当罗易在第九次全会后离开苏联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和俄国领导人的关系发生了问题。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一定还认为自己有可能重新得宠，并且会得到饶恕。所以直到第十次全会证明他的处境至少是暂时绝望了以后，

^① Tagor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泰戈尔: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 p. 18.

他才公开向共产国际的政策发动攻击。

其次，泰戈尔把罗易描写为“恭顺”的人，这显然是很不中肯的。罗易 1920 年同列宁的辩论，他在争论中所用的语调和他的同辈对他的性格的评价都说明他是高傲而难于制服的，不是恭顺的。但是，罗易忠于斯大林，彻底支持斯大林，甚至知道支持他对中国形势的错误分析，就意味着否认自己比较正确的判断和先前公开发表的见解，也在所不惜。他对斯大林有着始终不渝的忠诚，这一点在他 1936 年 1 月从印度监狱写出的一封信中充分流露出来：

你要知道，我私下里毕竟还是敬佩我过去那位朋友的，他经常为我們的种族亲缘而自豪，并且把我叫作“金子”。现在他把我看得连“黄铜”都不值了。不过，我有一个弱点，那就是给人以他应得的公平对待。而照我的评价，他的优点很多。由于这个弱点，我曾经在魏玛受到公开的责骂。^①

美国共产党前领导人贾埃·洛夫斯通撤职后在劳联和今天的劳联和产联的国际事务中积极进行了多年的反共工作——追述道：

罗易是一个极其忠诚的斯大林分子。斯大林在许多方面对他有极大的支配力。由于罗易对斯大林的态度，我和他在被开除以后的许多年中仍然保持着严重的分歧。罗易以中国 1927 年的溃败责难中国共产党，是本着忠于共产国际、克里姆林宫和斯大林的精神才这样做的。^②

当斯大林在 1953 年逝世时，罗易在他所办的刊物《激进人道主义者》中写道，斯大林是“当代最被人仇视、畏惧和诽谤的人物”。他又说：

伟大的人物从来都不是天使。伟大总是以美德换来的。斯大林也是这样的。无疑，他应在历史的伟大人物中享有应有的地位。……我们

^① M. N. Roy, *Fragments of a Prisoner's Diary* (M. N. 罗易：《囚徒日记片断》)，III (Bombay: Rajaram Panday, 1943), p. 168.

^② 贾埃·洛夫斯通致马歇尔·温德米勒的信，日期是 1956 年 7 月 23 日。

主张，应该对当代这位最受诽谤的人物做出公正的评价。他应该享有公正的评价；因为如果他不是谨慎和英明，不是对革命的必然性抱有狂热的信心，战争可能早已摧毁这个文明世界了。如果关于斯大林逝世的、措辞宽厚的讣告没有替他洗刷掉准备对民主世界发动战争的罪名，那么，这些讣告就是虚伪的和不现实的。……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军事家。……他无疑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并且必定会以这种身分载入史册。^①

罗易在被开除以后的许多年中显然还希望他的新战略路线会被共产国际采用，他本人会得到辩白，并在共产国际中重新得到一席之地。当共产国际终于在1935年后放弃极左路线并恢复统一战线战略的时候，罗易出版了一本书，表明“现在已经不再有分歧了”。他说“可是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印共仍然进行着反对我的运动”。^②

彻底评价罗易在共产国际的复杂经历，或者考查他的动机和品质，都不属于本书范围，也不是作者根据手头材料办得到的。他和共产国际分道扬镳的原因也无法具体说明。可能像泰戈尔所说那样，共产国际所以不信任罗易，是因为他在财务方面有已经证实或未经证实的侵吞行为，或者因为他在报告中夸大了在印度的成就。但鉴于泰戈尔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利害关系以及他个人对罗易所抱的明显的恶感，不能只拿他的话来当作证据。何况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中，财务上的侵吞行为和报告中的虚夸是司空见惯的。这种过失并不足以构成开除一个能干而又忠实的斯大林分子的理由。关于罗易被开除的问题，贾埃·洛夫斯通写道：

在共产国际中，无人不在报告中大事夸张自己所领导的组织的进

① M. N. Roy, "The Death of Stalin" (M. N. 罗易: 《斯大林之死》), *Radical Humanist* (《激进人道主义者》), XVII (March 15, 1953), pp. 121, 132.

② Roy, *Our Differences* (罗易: 《我们的分歧》) p. iv.

展。不仅在印度和中国方面是如此，在英国和法国方面也是如此。……远东的共产党领导人誰也不能对所花的錢拿出或交上收据。……这些“革命家”认为，在原則上要把會計工作蔑視为资产阶级的工具。……如果上述指控有任何严重的意义，莫斯科一定会在开除罗易以后的几年中大叫大嚷。作为斯大林一伙人的攻击目标，我本来是首当其冲的，我应该听到这种废话。但是我完全想不起来了。①

鉴于这一切复杂的情形，必須等到档案材料公开之后才能給罗易在共产国际中的事业做出定論；尽管斯大林已被涂黑，这部分档案仍然是共产党的禁地。

极左路綫

在1932年5月以前的将近三年里，共产国际对印度的政策一直坚定地遵循着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所制定的极左战略，而印共則忠实地追随着共产国际的领导。在这个时期中，《国际新聞通訊》和共产国际其他刊物上出现了若干論印度的文章。其中大多数都是关于印度方面的斗争的新聞报道，并且着重叙述那些似乎可以証明共产国际战略的正确性的事件，而不提那些不能作为証明的事情。維冷德腊那特·札多巴塔雅在《国际新聞通訊》上发表文章时，儼然像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的印度問題专家，尽管他的議論并没有什么理論上或战略上的重要性。《国际新聞通訊》还刊登了卡尔·拉狄克关于印度問題的一系列論文，这些論文由于权威性地闡明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綫而具有重要性，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战略或策略方針。

共产国际在这个时期的文章有下列几个主要特点：(1)都把甘地、尼赫魯、鮑斯和国大党当作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东西猛烈加以

① 賈埃·洛夫斯通致馬歇尔·溫德米勒的信，日期是1956年7月23日。

反对；(2)力称甘地和国大党在群众心目中已經一錢不值；(3)一再指示組織强大的非法共产党。

共产国际在这个时期給印共的指示，显然受到中国經驗的深刻影响。斯大林曾經以左傾罪名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共产国际，现在却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殖民地資產階級作用的論点，并把他对中国事变的新分析当作了印度政策的模型。他沒有考虑到两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截然不同。卡尔·拉狄克在1930年6月这样論証說：

当工人和农民开始真正的革命斗爭时，民族改良主义者必然要站到壁垒的那一边。……在中国事变发生之后，如果对这一点还有絲毫怀疑，如果我們和群众都不准备好应付民族改良主义者的必然叛变，那就意味着不負責任地和犯罪地听任工人和农民陷于失敗。^①

次月，《国际新聞通訊》又刊載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致印度工人的一封信，这封信更机械地把中印两国等同起来。

甘地領導下的印度民族主义政党和中国国民党一样。它們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我們对甘地不能抱絲毫幻想。相反地，我們必須反对他，以便保証革命的胜利。^②

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这个极左傾时期(1928—1934年)中，最重要的文件就是1930年12月在《国际新聞通訊》上发表的《印度共产党行动綱領草案》。这个文件並沒有表明出自何人之手，不过据說是印度共产党人写的；他們希望这个文件能够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以便外国同志評論和批評。有人确实提出了一些次要

^① Karl Radek, "Problems of the Revolution in India" (卡尔·拉狄克：《印度革命問題》), *Inprecor* (《国际新聞通訊》), X, (June 26, 1930), p. 545.

^② "Solidarity with the Working Masses of India" (《声援印度的劳动群众》), *Inprecor* (《国际新聞通訊》), X (July 31, 1930), p. 666.

的批評，但都沒有觸及戰略和策略上的重要問題。這個綱領草案在印度共產黨人中得到廣泛流傳，並且在一年半的時間里經常被共產國際的刊物說成是對印度共產主義運動的首要指示。

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左傾文件。它對印度國大黨的態度，一點也不含糊：

印度革命勝利的最大威脅在於：我國廣大人民群眾對國大黨還抱有幻想，而不知國大黨是力圖破壞我國勞動群眾基本利益的資本家的階級組織。^①

該綱領號召“對民族改良主義‘左派’進行無情的鬥爭”，並指出暴力是主要的策略武器。它說，“勝利的道路不是採取個人恐怖行動的方法，而是讓工人階級、農民、城市貧民和印度士兵中最廣大的群眾，在印度共產黨的旗幟周圍和領導下，進行鬥爭和發動革命的武裝起義。”該綱領列舉了革命現階段的各項主要目標，其中包括：

無償地沒收地主、統治王公、教會、英國政府、官吏和高利貸者的土地、林場和其他財產，交給勞動農民使用。廢除奴隸契約和農民對高利貸者和銀行所欠的一切債務。^②

比這個政策更能激起印度社會所有政治活動分子的敵意的政策是難以想像的。這個政策的矛頭針對着印度共產黨人所由來的各個階層，或許也是最同情印度共產黨人的階層。綱領草案是一篇宣布同民族主義運動主流斷絕關係的宣言。

此外，印度共產黨人本身的分歧日益加劇，這就使得印共在共產國際所造成的孤立局面中僅能發揮的一點作用很快就消滅了。

① “Draft Platform of Action of the C. P. of India”（《印度共產黨行動綱領草案》），*Inprecor*（《國際新聞通訊》），X（Dec. 18, 1930），p. 1218.

② 同上，p. 1219.

当老共产党人试图从密拉特监狱中指挥印共工作的时候，新的领袖们也在工会运动中积极活动着。在新的领袖中，主要有加尔各答的阿卜杜耳·哈黎莫，孟买的 S.V. 堆什班堆、舒哈息尼·南比阿尔夫人和 B.T. 兰纳迪夫。可是，哈黎莫和堆什班堆都是温和派，他们不顾共产国际关于建立非法党的指示，主张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① 另一方面，兰纳迪夫却是一个左派，主张采取符合共产国际那条战斗路线的策略。哈黎莫和堆什班堆满足于出版工人日报和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而兰纳迪夫却要煽动罢工和示威。孟买的党组织分为两个集团，而他们钩心斗角的主要场所——工会运动，也因为派别活动而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在这个时期，维冷德腊那特·札多巴塔雅和克莱门斯·杜德也在柏林成立了一个书记处，企图以这个机构来指导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纳粹上台以后，他们就把这个机构迁到巴黎，后来又迁到伦敦。^② 与此同时，罗易也试图把欧洲的印度共产党人组织成一个共产党，而由他自己领导；同他合作的人包括孙达尔·卡巴底和达雅勃·赛克。后者并以 A.K. 辛底为笔名替罗易写了一部传记。

罗易回到印度

1930年中，罗易开始积极努力来恢复他在印度共产党人中间的领导地位，希望借此同斯大林实行和解；这样一来印共的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但是，他采用的策略直接违背了印共的正式政策——并且直接违背了他在共产国际任职时所主张的政策。以前他反对同国大党发生任何关系，现在又着手同它合作——尽管这个

① *India and Communism* («印度与共产主义») (Simla: Government of India, 1933), p. 161.

② 同上, p.172.

政策比共产国际所宣布的政策要现实得多。可笑的是，他过去主张印共在国大党之外进行工作来攫夺这个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权，而现在却试图在国大党内进行工作来恢复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权。

为了策动这件事，他派达雅勃·赛克和孙达尔·卡巴底带一篇宣言到印度。这篇致“印度劳动群众的革命先锋队”的宣言说，“在印度，走向共产主义的途径在于民族革命”。又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印共“必须通过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国大党、青年联盟、学生组织和志愿军——进行工作。”^①

达雅勃·赛克在1930年8月到达印度；他同优素福·梅黑腊黎、C.G. 沙赫和V.B. 卡尔尼格等许多左派分子进行接触，并说这个宣言得到了六十五个国大党员的签名。^②他不久被捕；拘禁了一个短时期之后获释。孙达尔·卡巴底则回到了欧洲。

罗易显然不能通过使者取得什么成就，因此他决定亲自出马。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因为密拉特案的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而且是当局通缉的人。此外，鉴于某些共产党领导人对他的敌视，他可能遭到被出卖的重大危险。他凭一张伪造的护照于1930年12月来到孟买。在此后的七个月中，他在无人发觉的情况下在工会中进行工作，促进了在国大党中扩大影响这一目的的实现。

至于罗易在实现这一目的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就，现在还不清楚。他应尼赫鲁邀请，参加了1931年3月举行的国大党卡拉奇会议；会议中最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通过了一项关于基本权利的决议。这个决议鲜明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尼赫鲁在自传中也说，国大党由于通过这个决议而“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跨了一步——

① 同上，p. 163.

② 见达雅勃·赛克1956年1月在伦敦对马歇尔·温德米勒发表的谈话。

很短的一步，因为这个決議主张将重要的工业及服务性的事业收归国有，并实行其他各种方案，以減輕貧苦人們的重担，相应地增加富有的人們的負擔。”^①

虽然許多人认为罗易是这个決議的起草人，^② 但尼赫魯說这个決議是他亲自起草的，而且在提交国大党之前还征得了甘地的同意。尼赫魯說：罗易在卡拉奇會議前不久曾到他阿拉哈巴德的住所来拜訪，后来又在卡拉奇会晤了五分钟。他說，他为罗易的“惊人的智力”所吸引，而且对罗易“孑然一身，为所有的人所抛弃”表示同情。但是，他力称罗易和卡拉奇決議“毫无关系”。^③

不管罗易对卡拉奇會議起了什么作用，如果有作用的話——他在积极活动的七个月中，确实对工会运动和激进政治起了巨大影响。他在警察大力緝捕下从事地下工作，竟能使工会运动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放弃极左傾向，而在他领导下采取比較溫和的政策。他写了很多文章，还向德国和美国共产党反对派的刊物投稿。英国刑事調查处把其中的一篇称作“对现实事物的銳利判断”^④，而且对他的一般活动也作了这种不相当的贊揚。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尽管警察不断追踪，罗易仍在落网以前的七个月中作了不少有害的事情。他的理論在孟买和联合邦，后来还在加尔各答及其四周，受到許多人的拥护。他作了认真的、也决不是沒有成效的努力来向国大党灌輸他的观点，他还受到印度各地的若干国大党領袖的欢迎，而且是衷心的欢迎。甚至甘地先生也知道他潜伏在卡拉奇的国大党篷帳中。就才智而論，罗易这个一貫的现实主义者，远远胜过印共其他任何領袖人，只有 G. M. 阿提加利博士可能是例外。罗易之所以不断

① 《尼赫魯自传》，世界知識社 1956 年版，第 302 頁。

② *India and Communism*（《印度与共产主义》），p. 165.

③ 《尼赫魯自传》，世界知識社 1956 年版，第 304 頁。

④ *India and Communism*（《印度与共产主义》），p. 164.

鼓吹“放弃灾难性的极左政策”，归根到底是指望这种主张比堆什班堆的空洞叫嚣更能为共产主义运动赢得众多的追随者。^①

至于罗易可能取得如何的成就，则永远无法知道，因为他在1931年7月被捕，并因为是原先的康波尔謀叛案的被告而在康波尔被控，1932年1月9日被判处十二年徒刑。这一判决因上訴而減輕，于是他在1936年11月20日获释。英国刑事調查处的文件說，“对他的判决，为資本主义、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从政治舞台上除去了一个危险的敌人，并使整个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又受了一次打击”。^②

来自共产国际的密使

共产国际在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对印度政策采取了坚定的路綫之后，就派了若干密使到印度次大陆。他們的到来所以值得一提，主要是因为它能說明英国刑事調查处的工作效率：这些密使除了两个之外，都在未能取得任何重要成就之前便就被捕和驅逐出境了。未被捕的一个共产国际代理人来到印度是当局知道的，但他設法隱匿了六个月，并且显然在1930年离开了印度。^③

勃累莫·拉耳·辛格在莫斯科列宁研究院毕业后来到印度，并和密拉特案的人犯取得联系；但后来因为警察的威胁而回到莫斯科。有两个美国共产党人威廉·N·克威特和哈利·薩默斯用伪造的护照来到印度，他們显然是送款来資助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1930年9月他們被捕并被驅逐出境。^④ 1931年，罗易以前的

① 同上，p. 168.

② 同上。

③ 同上，p. 175.

④ 同上。

一个同事穆罕默德·息巴息试图跟随麦加的穆斯林香客混进印度。可是，他到达麦加时，香客們已經出发，所以只好返回莫斯科。^① 另一个美国人亨利·G·林德比較順利。他在1931年带着資助印共的款項到达印度，并会见了孟买的印共领导人，但后来也被捕和驅逐出境。

在所有的密使中，最有成績的是阿米尔·海达尔·汗，他伪装海員，于1931年3月到馬德拉斯。他小心謹慎地进行工作，终于在三个重要的紡織厂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組，組織了青年工人联盟，至少送了一个同志到莫斯科受特別訓練。他还和孟买的两派共产党人保持联系，每一派都企图得到他的支持。他被当局扣上了“最危險的人”的帽子，于1932年5月7日被捕，經過审讯，被判处二年半徒刑。1934年获释后，他立即恢复政治活动，結果又被捕入獄。

关于在这个时期来到印度的許多共产国际密使的成就，其最有效的总结可以在现有的最好情报材料，即英国刑事調查处所作的报告中找到：

当然不能說莫斯科派到印度的所有密使都已成为当局所注意的目标，但是，确实值得庆幸的是，許多密使都沒有逃过警察的警惕眼睛。除了阿米尔·海达尔·汗之外，沒有一个取得任何实际成就。这有种种原因；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当局能够采取預防行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代理人品质低劣；而且由于命运的播弄，那些不会最有效地花钱的人持有大量款項，而阿米尔·海达尔·汗这样精力充沛的热心分子却陷于貧困，致使他的远大計劃不能实现。据悉，密拉特案的罪犯們已經就这一問題向莫斯科提出意见，并特別要求以后要派英国公民来。因此，如果共产国际在这方面重蹈复轍，它就只能怪自己了。^②

① 同上，p. 176.

② 同上，p. 179.

印共的一部半官方党史說，1930年，共产国际的一个代理人曾协助印度共产党人在密拉特搜捕之后进行改組。根据該书，这个代理人曾试图在孟买組織印共地下中央委员会，并同加尔各答的印共党员进行了一些接触。^①这本书还暗示，他在印度活动到1933年，最后还帶了一份关于印度方面的活动的詳尽报告回到欧洲。如果确有其事，他无疑是一个能干的阴谋家，因为英国当局对他的活动竟一无所知。^②

来自海外的其他互相矛盾的建議

到1931年，密拉特獄中的人开始重視当时的策略路綫的灾难性后果。菲利普·斯普拉特追忆道，“我們不滿意当时的所作所为，但没有把我們的攻击指向真正应当負責的人，即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当局。”^③他們反而責备獄外的领导人，尤其是在孟买互相攻訐的兰納迪夫派和堆什班堆派。斯普拉特說，約希知道造成这种困难的真正原因，而且当时就表示过他的怀疑。斯普拉特还认为，丹吉可能也知道共产国际的策略路綫是愚蠢的，不过这时他已經因为獄中的爭吵而被开除出党了。总之，密拉特獄里的党领导深知必須改变策略，因而就此作出分析，提供共产国际参考。据英国刑事調查处报告說，这样的文件至少有三个已經从監獄中偷帶出来，至于是否全部送达共产国际，則不得而知。密拉特方面的领导人曾在一個文件中，吁請共产国际发表一封公开信，来分析印共的

① Chalasani Vasudeva Rao, *Bharathu Communist Party Nirmaana Charithrea* (札拉薩尼·瓦苏堆瓦·脂欧：《印度共产党成立經過》)，(Vijayawada: Praja Sakti Press, 1943), p. 65.

② 斯普拉特談到另一个俄国代理人在印度度过了很長的时间而未被英国刑事調查处发觉。见(《炸毀印度》)，p. 40.

③ 同上，p. 53.

錯誤，調解孟买的敌对集团之間的分歧。共产国际于1932年6月在《国际新聞通訊》上发表了“致印度共产党人的公开信”，由中国、英国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署名，这是一个离奇的文件，它事实上譴責了印度共产党人，說他們不應該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建議該党立即在各方面径自前进。

公开信一开始就說，爭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已經发展到一个“轉折点”。这似乎意味着战略上的改变，但文件又沒有指出阶级力量的結合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已发生了变化。它說，印度资产阶级“仍在推行其同英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妥协而叛卖革命群众的政策。”^①但是，尽管有这样的叛卖，“资产阶级的国大党……一向能在广大工人群众中間維持它的影响”。印共的任务應該是，“使国大党和一切‘左翼’民族改良主义者在劳动群众中孤立起来”。这个药方和以前的一样。

但是公开信接着又說，印度共产党人所犯的最大錯誤在于“站在印度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之外”。这种“自我孤立的錯誤”在“共产党队伍中造成了混乱”，共产党人的补救方法必須是“极其积极地投身于爭取独立的斗争中”。按照公开信的建議，“印度共产党人必須在示威行动和劳动人民与帝国主义的冲突等一切活动中站在最前列。”^②但是在这样的時候，必須遵循一种“对国大党，尤其是‘左翼’民族改良主义者进行坚决、猛烈、明确和**毫不妥协**的斗争和揭露”的政策，應該“猛烈地、毫不留情地揭露国大党及其‘左翼’，并与之斗争”。^③

① “Open Letter to the Indian Communist”(《致印度共产党的公开信》), *Communist International*(《共产国际》), IX(June 1, 1932), p. 347.

② 同上, p. 350. 黑体字系原有。

③ 同上, p. 351.

印度共产党人要站在“一切”反帝活动的最前列，就必须站在甘地领导的国大党示威行动的最前列。如何能在对国大党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同时完成这个任务，公开信却没有说明。现在回想起来，很难相信这样一个文件竟会得到认真的对待。

公开信还提出了关于组织形式的建议。它承认，印共当时还是由几个“薄弱的团体组成的，这些团体往往脱离群众，各自为政，在政治上不团结，在某些地方没有和民族改良主义划清界限”。因此，公开信说，“高举为建立一个全印共产党而奋斗的旗帜是绝对必要的。……^①党的领导机构和党组织的核心必须处在非法状态。”把党的公开和秘密机构混合起来是极其危险的，“必须采取措施来保全和加强党组织的密谋[原文如此]核心”。应该发行合法和非法的报刊，必须在党的各级委员会领导下组织合法的外围组织，不过这种组织“决不能危及非法的党小组的存在”。

大约在公开信发表一年之后，印度政府开始释放密拉特的人犯。G. M. 阿提加利是第一批获释者之一。1933年11月，他前往加尔各答，并在那里组织了印共临时中央委员会核心，其中包括S. G. 巴德加尔、P. C. 约希和阿卜杜耳·哈黎莫。^②当月的《国际新闻通讯》发表了致印共的第二封公开信，这次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单独发出的。

这封信在组织形式方面的建议与第一封公开信相同。它说，“首要的决定性问题，是组织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群众性的印度共产党”。^③这个党应该像苏联共产党一样，是“布尔什维克式组织和

① 同上，p. 356，黑体字系原有。

② *India and Communism*（《印度与共产主义》），pp. 188—189.

③ “Open Letter to the Indian Communists from C. C. of the C. P. of China”，（《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印度共产党人的公开信》），*Inprecor*（《国际新闻通讯》），XIII（Nov, 24, 1933），p. 1153. 黑体字系原有。

铁的纪律的典范……它不是一个温和的党，而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英勇的和革命的党”。中国同志提醒說，“建立印度共产党的工作进展迟緩，我們为之愈益不安”。这封公开信欢迎阿提加利所組織的临时中央委员会，认为它是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了一步。

虽然信件本身的說法有点自相矛盾，但这两封信最重要的分歧在有关工会工作的指示方面。例如，一方面批評印共在工会中所作的工作是宗派主义的，一方面又建議印共鼓动更多的政治罢工。第二封信又說，同左翼民族改良主义者作斗争，“并不意味着拒絕在改良主义的工会中作工作……甚且也不意味着拒絕紅色工会同群众性的民族改良主义工会合并。”这种主张参加和联合改良主义工会的建議，似乎和第一封公开信的立場相反，不过由于这两封信本身就有矛盾，这一点还难以肯定。例如，第一封信說，“一些同志试图同甘达耳加尔[一个主要的改良主义工会领导人]实行团结，这种立場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它又說，“繼續采取自絕于工人集会和受改良主义者影响的群众性工会的作法，是非常錯誤的。”

第二封公开信主张印度共产党人加入改良主义工会，这就是摆脱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开始的极左路綫的第一步。本来印度共产党行动綱領草案号召对改良主义作斗争，现在第二封公开信却主张印度共产党人同他們联合。

这两封信都企图歪曲现实来符合教条。这几个外国共产党不能不承认人人都清楚的一个事实：甘地打动了印度群众的心弦并享有他們的信任；而且凡是重要的政治活动都离不开印度国大党。可是，要承认这位主张非暴力的宗教先知和这个资产阶级政党有这么大的威信，却不是外国共产党能够体面而公开办到的。因此，它們必須用馬列主义的詞句来掩飾，而且必須把事实說得仿佛是无关重要和暫时的。它們也不能承认甘地和国大党会繼續享有群

众的支持。因此，这些兄弟党的建議实质上就是劝印共攻击群众所爱戴的領袖和领导群众斗争的組織，以求得群众的支持。印共有心听从这种显然无益的劝告，以致在政治方面又徬徨了四年之久。但是几年以后，即 1943 年，一个印共的官方評論家却这样評論这两封信：“它們帮助我們了解党的迫切任务。它們帮助克服我們的弱点，帮助建立一个适合印度环境的共产党。”^①

国际无产阶级团結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这种愚蠢的忠誠之上的。

第八章 統一战綫

1934 年年中，在世界經濟与世界政治研究所的一次會議上，苏联的巴維尔·米夫院士对印度的形势做了乐观的估計。他說，殖民地危机正在加深，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行动正在进入高潮。他說，印度无产阶级“正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提出挑战并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印度共产党“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②

印共的实际情况并不像米夫所描写那样动人。印共当时确实正在发展，但是幅度很小：党员人数在 1934 年中大約从二十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人。^③ 它刚刚从密拉特审判所造成的瓦解状况中开

① Rao, *Bharatha Communist Party*.. (腊欧:《印度共产党成立經過》), p. 71.

② *Kolonial'nyi Problemy, Sbornik 3—4* (《殖民地問題論文汇编, 3—4》), (Moscow: Institut mirovogo khoziaistva i mirovoi politiki, kolonial'nyi sektor, 1935), pp. 6, 7.

③ *India and Communism*(《印度与共产主义》), (Simla: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1935), p. 208.

始复元，并且面对着許多巨大的困难。1934年7月，它被宣布为非法——这一禁令直到1942年才解除。紅色工会大会、工人出版社、孟买和馬德拉斯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和共产党的其他附属机构也被宣布为非法。印度共产党就像它的临时章程所說的那樣，成了一个“純粹地下的組織”。^①

密拉特案的被告获释出獄后不久，其中許多人因为企图恢复富于战斗性的工会活动而再度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人只能在短时期內任职。在一年的時間中，总書記 G. M. 阿提加利由 S. V. 卡堆接替，接着卡堆又由 S. S. 米腊吉卡接替。中央委员会无法組成，党也沒有出版公开或秘密的定期刊物。

不过，当时的形势有一个有助于印共恢复元气的因素，即国际共产运动中出現了一个新的趋势，要求“緩和”自从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盛行一时的左傾路綫。左傾路綫給印共带来了孤立和衰微的后果。但是，1933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公开信，指示印度同志摆脱孤立局面；在工会方面，他們必須滲入“改良主义的”組織，甚至同它合作。1933年年初，印共就已經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开始促使自己的紅色工会大会和非共产党领导的全印工会大会之間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下一个合乎邏輯的步驟就是滲入“改良主义的”政治組織，并同它合作。苏联当局同意这个步驟；米夫在莫斯科所发表的讲话中說，在所有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應該同各种“民族革命”力量保持联系，而《国际新聞通訊》在这个时期前后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也

^① “Draft of the Provisional Statutes of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印度共产党临时章程草案》), *Inprecor* (《国际新聞通訊》), XIV (May 11, 1934), p. 775. 后来印共把这个文件編入1952年10月16日出版的《参考文件》(Information Document)第6期中。

号召印度同志增进同国大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普通党员之间的好关系，并利用反帝联盟作为桥梁，同其他左派力量进行合作。^①总之，就是应把印共在工会方面已经开始运用的统一战线策略推广到政治方面。1934年底，印共就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了第一个试验性行动，同新成立的国民大会社会党建立起初步联系。

国民大会社会党是1934年作为国大内的一个集团而成立的，自成立之日起，就对左派团结的主张表示共鸣。其最重要的领导人札雅勃腊加什·那腊延在美国求学时就已经是个共产党员，后来他虽然抛弃了布尔什维主义，但仍然愿意把印度共产党人看成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殷切地希望把所有马克思主义组织团结在国民大会社会党的旗帜之下。

如果印共能进一步放弃1928年以来形成它的方针特征的极端主义的话，那么，它面前的确有极好的机会来同国民大会社会党和印度其他政治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同盟。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3年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根本的大事就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崛起于法西斯德国。苏联领导为了应付这一威胁，逐步放弃它的“僵硬”的左倾路线，指望借以寻求新的同盟者。这种“缓和”过程，在1935年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宣布新政策时达到顶点。

为使殖民地各国的共产党能够尽它们的一份力量来动员更大

^① V. Basak, "A Few Remarks on the Indian Communist Movement" (V. 巴薩格:《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几点意见》), *Inprecor*(《国际新闻通讯》), XIV (June 1, 1934), pp. 845—849; L. M., "The Situation in India" (L. M.:《印度形势》), *Inprecor*(《国际新闻通讯》), XIV (June 8, 1934), p. 878.

的力量牽制歐洲各資產階級政府，這些共產黨必須重新回到列寧主義強調的反帝戰略目標上來。因此，它們必須重新同本國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進行合作。於是，就為殖民地和歐洲的共產黨重新提出了四階級戰略。

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關於殖民地政策的主要發言人是中國領導人王明。他在这次代表大會閉幕後不久，就準備了一份闡明殖民地國家的路線的一般聲明。^① 這條路線的要點包含在他就中國和巴西問題發表的意見中。王明說，中國共產黨人從軍閥、民族改良主義者和其他一切反帝力量中尋求暫時的同盟者來反對反動的國民黨領導。他說，中國共產黨“在爭取民族和社會解放的鬥爭中是全中國人民的黨。” 它的目標是在它的領導下把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

王明說，在巴西，共產黨人實行了相似的战略，他們同某些民族資產階級分子進行合作來反對帝國主義。但是，在策略上，中國和巴西的情況有所不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策略是建立一個把四個階級聯合在自己隊伍中的黨，而巴西共產黨人則是設法建立一個廣泛的反帝聯盟，由代表四個階級的各种政治集團組成。

王明說，印度共產黨人應當同時運用中國和巴西的經驗。這個建議的主旨是：印度共產黨人一方面必須爭取所有四個階級的擁護來擴大和加強印度共產黨，另一方面還必須在一個廣泛的反帝組織中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各集團聯合起來。這就意味着印度共產黨人必須滲入民族主義運動，直接喚起它的普通成員的同情，

^① Wang Ming,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Colonial Countries* (王明：《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 1935), 64 pp. 這是王明 1935 年 8 月 7 日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做報告的修訂補充本。只涉及中國問題的原報告，載于 *Inprecor* (《國際新聞通訊》)，XV (November 11, 1935), pp. 1488—1493.

同时在另一方面，至少要同民族主义运动的某些领导人物加强联合行动。换言之，印共必须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策略——即一方面颠覆民族主义的领导集团，同时又同它进行合作的策略。

王明严厉指责印共以往没有积极参加反帝斗争。他说，“我们的印度同志长期以来受左倾宗派主义错误的害；他们没有参加国大党或国大党所属各团体所组织的一切群众示威。”他又说，但是他们又未能像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那样有效地进行工作，因为他们力量太弱，无力组织“一个真正强大的群众性反帝运动。”

王明还明确地提醒印度人说，他们有必要订制一个能够引起广泛响应的纲领。他说，“我们的印度同志可以作为一个不实行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典型。”因为他们以往试图在一个要求发动“总罢工”以便成立“工农苏维埃共和国”的纲领的基础上来建立统一战线。

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也说明了共产国际对印度的政策。但季米特洛夫的说法和王明多少有所不同。季米特洛夫说，印共应该一方面保持独立，一方面“在印度国大党所属的各组织中积极进行工作，以便在这些组织中形成民族革命派，继续开展民族解放运动。”^①他着重指出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必要性——这个策略就是在国大党中进行工作，以便动员左翼去影响国大党的领导，并最后把它赶走。

一言以蔽之，这个建议似乎意味着，印共应联合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一派（被认为是真正反帝的左翼或“改良主义”派）而打击另

^① 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 1950 年版，第 135—136 页。

一派(被认为是代表本国反动势力的右翼甘地主义领导集团)。因此,共产国际沒有要求在印度全面实施反帝战略;沒有坚持同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合作,共产党人可以保持某种战斗性。

印共自己沒有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它的两个代表 S. V. 堆什班堆和 S. S. 米腊吉卡在前往莫斯科途中在新加坡被捕。^①在他們不在場的情况下,参加莫斯科會議的英共领导人又照例充当了印共指导者的角色。事实上,他們沒有等到共产国际的建議传达到印度,馬上就負起实施这个新政策的責任。当时,国民大会社会党的創始人之一米諾·R. 瑪薩尼恰巧在莫斯科。据他說,英共领导人——哈里·波立特、帕姆·R. 杜德、本·布莱德雷——同他会见,并提出印共和国国民大会社会党結成联盟的問題。瑪薩尼建議印共自动解散,以便有可能組成一个統一的社会党。他还說,这样的党不应加入共产国际。^②就在这个时候,談判破裂了,但这已經造成一个开端。

于是,英共领导人就着手进行向印共解释和传达共产国际新路線的工作。杜德和布莱德雷替印度同志准备了一个正式声明——这就是发表在《国际新聞通訊》上的“杜德—布莱德雷提綱。”^③这个提綱照例是以論战的語調开始,断言印度国大党“这时已經放弃其领导(反帝)斗争的努力了”。但是,提綱进而又提出了

① “Comrade S. V. Deshpande” (《S. V. 堆什班堆同志》), *New Age* (Monthly) (《新世紀》月刊), II (June, 1953), p. 2.

② M. R. Masani, “The Communist Party in India” (M. R. 瑪薩尼:《印度的共产党》), *Pacific Affairs* (《太平洋季刊》), XXIV (March, 1951), pp. 21—22 (脚注)。

③ R. Palme Dutt and Ben Bradley, “The Anti-Imperialist People’s Front” (R. 帕姆·杜德与本·布莱德雷:《反帝人民陣綫》), *Inprecor* (《国际新聞通訊》), XVI (Feb. 29, 1936), pp. 297—300.

整个文件所依据的假设——即认为国大党是由两派组成的，其中只有一派是反动的。1935年之前，杜德和布莱德雷认为国大党中只有“左翼民族改良主义派”，而现在却发现了一个进步派，这一派迫切要求实行“与帝国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路线，力求实现一个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思想的日益增长的影响的纲领”。这里有着统一战线适当的盟友。

在详细论及组织印度“反帝人民阵线”的方法时，杜德和布莱德雷的论述完全集中于国大党。他们问道，国大党事实上不已经是“印度人民进行民族斗争的统一战线吗？”在此以前，这个问题是印度共产党人连想也想不到的，而现在却可以给予“肯定”的回答了。杜德和布莱德雷说，国大党在团结广大印度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方面，已经做了“巨大的工作”。事实上，他们认为，国大党代表着民族斗争的“群众大军”。这样，国大党岂不是可以作为反帝人民阵线的包罗无遗的机构吗？

国大党能够在组织反帝人民阵线的工作中起巨大的和卓越的作用。如果它的组织和纲领进一步改变的话，它甚至可能成为实现反帝人民阵线的组织形式；因为重要的是事实而不是名称。^①

杜德和布莱德雷承认国大党能够成为真正的反帝统一战线，接着就在声明的其余部分完全不谈其他可能性，而集中讨论如何“改造”国大党的问题。认为这就是印共的任务。

按照杜德和布莱德雷的意见，这种改造要求进行四个方面的改革：国大党必须同意“集体入党”，即允许群众组织集体加入国大党；党章必须民主化，以便取消集中控制；它必须采取明确的反帝纲领，并要求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建立“民主的”政府；最后，它必

① 同上，p. 298.

須廢除非暴力的“教條”。顯然，第一項改革是實現其餘改革的關鍵，因為接納工會之類的群眾組織入黨，就會大大加強左翼。但左翼一定得實現空前的團結；因此，印度共產黨人必須同敵對的激進集團實行和解。杜德和布萊德雷在提綱中明白指出，國大黨中的左翼將通過國民大會社會黨這一橋梁來達到團結。

國民大會社會黨人、工會工作者、共產黨人和左翼國大黨人應該能夠全部在一個最低綱領的基本精神上團結起來；這個綱領是：為爭取徹底獨立而進行反帝鬥爭；組織群眾並開展群眾鬥爭；爭取改變國大黨的黨章、政策、組織和領導以實現這些目的。在這方面，國民大會社會黨作為現有的國大黨內一切激進分子的聯盟，可以起特別重要的作用。必須盡一切努力在國民大會社會黨內闡明綱領和策略方面的問題，這是最重要的。

杜德和布萊德雷當時估計，在國大黨中，國民大會社會黨“已經是擁有大約三分之一人數的有實力的少數派了，而且已經是可能的多數派了。”他們顯然斷定，如果再加上各群眾組織和共產黨人，左翼力量無疑會構成多數派。因此，他們就把篡奪國大黨的目標以及對實現這個目標的樂觀估計明白地宣布出來。

雖然杜德和布萊德雷在提綱中不斷對國大黨中“資產階級”的甘地派領導進行系統的攻击，但是他們的敵意在整個文件中都是含蓄的。他們要求印共反對非暴力，這種要求自然只能是直接反對甘地派的領導。但是，反對甘地派的領導並不意味着反對國大黨黨員中的全部資產階級分子。杜德和布萊德雷幾次提出反帝人民陣綫應該建立在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基础上；但是他們小心翼翼地強調印共暫時應該保持和擴大國大黨的范围，而不要驅逐國大黨的任何成員——這就是說，不要驅逐資產階級。

總之，杜德和布萊德雷提綱遵循季米特洛夫的原則，號召印共

联合国大党左翼来进攻右翼领导。这意味着与国民大会社会党结成联盟(即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并渗入整个印度国大党(即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印度同志必须设法使国大党全国领导在它的普通党员中孤立起来;必须把国大党变成更有革命性的反帝工具。

共产党—国民大会社会党联盟

1936年1月,国民大会社会党在密拉特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根据该党总书记札雅勃腊加什·那腊延的建议,国民大会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接受共产党人加入该党。决议说明入党必须个别申请,并经执行委员会决定,方为有效。因为当时印共是非法的,这种决定必须保守秘密。

除了英国人曾经在莫斯科提出过建议之外,印共和国民大会社会党联盟的结成,系出自社会党人的倡议。那腊延在几年后发表的著作中说,印度共产党人并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请求或建议;事实上,虽然印共派了一个友好代表出席密拉特会议,但印共对国民大会社会党的正式态度仍然是冷淡的,如果不是敌视的话。那腊延说,国民大会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是单方面做出的,它相信,印共的“重要成员”是可以改正对统一战线所抱的态度的。^①

根据这个时期印共的材料,印度共产党人是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路线的。当他们在1月间接到杜德—布莱德雷提纲付印前的副本时,还倾向于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而“没有认真对待它。”^②许多党员看不起这种加入“资产阶级”的国大党或

① Jaya Prakash Narayan, *Towards Struggle*(札雅·勃腊加什·那腊延:《走向斗争》),(Bombay: Padma Publications Ltd., 1946), p. 170.

② Chalasani Vasudeva Rao, *Bharatha Communist Party Nirmaana Charithrea*(札拉萨尼·瓦苏堆瓦·欧腊:《印度共产党成立经过》),(Vijayawada: Praja Sakti Press, 1943), pp. 116—117.

同受人藐視的社会党人合作的主张。在他們看来，同这些集团結成反帝陣綫的想法，簡直是一种异端。直到3月——即国民大会社会党单方面邀請印共参加之后两个月——前一年成立的印共新的中央委员会才开始正式注意杜德—布萊德雷建議，并考虑实行的方式方法。而这个委员会还必须同印共左派分子对于这个新路綫的普遍反感进行斗争。

因此，从整体上来說，印共迟迟沒有起来拥护統一战綫，而且要是沒有坚强的中央领导的話，各派本来可能会在新路綫問題上进行无休止的爭吵。幸而，他們有一个可能的领导人。这就是P. C. 約希。因为P. C. 約希沒有参加党内任何派別。^①他被选为总书记；在他的坚强而能干的领导下，印共终于抓住了国民大会社会党硬塞給它的机会。

根据約希的命令，共产党人开始申請加入国民大会社会党。他們还着手建立組織机构以迎接新任务：开始出版秘密刊物《共产主义者》，并建立党的“党团”系統，这些党团将在国民大会社会党、国大党本身，以及共产党人当时可以自由参加的工会和农会等其他群众組織中，作为有紀律的单位进行工作。

就人們所知，国民大会社会党或印度共产党都沒有发表过关于国民大会社会党接納的共产党人的估計数字。那腊延曾說过，这个数字是“很大的”，但是他也得不到精确的材料，因为有的人是“秘密”参加的，即不說出他們的共产党党籍。此外，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事实上不經過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批准手續，便被接納为党

^① Deven and Bal Krishna, "Talks With Comrade R. Palme Dutt and Other Impressions Gained Abroad by Deven and Bal Krishna" (堆文与巴耳·格利什那：《堆文与巴耳·格利什那同 R. 帕姆·杜德同志的談話及在国外获得的印象》), *PHQ Open Forum* (《总部党组公开論壇》), (Jan. 6, 1951), p. 3.

員。这样，印共显然就随心所欲地渗入了国民大会社会党。其結果为研究这种联盟策略的活动提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实例。

到 1936 年下半年，国民大会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开始接到許多报告，說共产党党团正在瓦解該党的組織，使該党党员改奉共产主义，阴谋篡夺国民大会社会党的地方組織，或者在工会之类的群众組織中同社会党人进行对抗。該执行委员会的反映只不过是提醒一下自己的各省委員会加以注意而已。这种警告有时根本无济于事，因为国民大会社会党某些省的組織已經落入共产党人或其同情者手中。在印度南部，国民大会社会党的工作主要是由国民大会社会党書記兼喀拉拉省組織领导人 E. M. S. 南布迪里巴德领导的；南布迪里巴德在 1936 年底把泰米耳納德的組織交給 P. 腊瑪木尔底和 P. 捷瓦南达莫领导，^①而这三个人在很短时期内就都公开拥护共产主义了。安得拉的省組織則落入著名的共产党人 P. 孙达腊雅的控制之下。通过这些领导人的影响，所有省的党組織就逐漸变成了共产党的分支机构。在印度北部的工人集中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共产党人公开地或秘密地篡夺了国民大会社会党所属各单位的领导权。例如，孟买的一个負責工人組織的重要机构就被共产党人索黎·巴德黎瓦拉所控制，巴德黎瓦拉后来成为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

1937 年初，国民大会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認識到印共的分裂活动。不过該委员会也只是把“打击这种派別活动的政策……必要时可采取紀律行动”重申了一下而已。^②

① “Party News”(《党内消息》), *Congress Socialist*(《国民大会社会党人》), I(Dec. 26, 1936), p. 38.

② *All-India Congress Socialist Party Circular Letter Number 4 to Provincial Secretaries*(《全印国民大会社会党致各省書記的第四号通知》), (Patna, March 31, 1937), p. 2. (党内通知)

这样，印共几乎从与国民大会社会党联合之日起，就利用了成功的渗透。不过，与此同时，在政策方面，两党在反对国大党领导的共同目标上，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合作。社会党人对印共的温和纲领，很容易广泛地表示赞同，因为这个纲领只限于反帝反封建。印共忠实地奉行共产国际关于采取温和政策的指示——《国际新闻通讯》连篇累牍地反复申述这项指示，并说明“任何痛恨外国压迫和同情人民苦难的人”都应该能够同印共一致行动。^①

事实上，当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往往倒是因为印共太右倾了。例如，在3月号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篇社论中，印共宣布支持“印度资本家反对英国金融资本统治的斗争。”社论说，所有四个阶级的利益都集中表现在反帝问题上。^②对于社会党人来说，这是背叛马克思主义。

争论的主要根源是印共政治局1937年2月通过的一项决议，这个决议是一篇四阶级战略的正式宣言。它说，反帝阵线不仅应该包括国大党、国民大会社会党、印度共产党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群众组织，“甚至还应该包括印度工商业者的某些组织。”^③这个决议被印共领导称赞为党的政策的“里程碑”，但它在国民大会社会党中却激起了愤怒。社会党人谴责共产党人是修正主义者，共产党人则斥社会党人是“左倾宗派主义者”。^④

为了反驳国民大会社会党的指控而替自己辩护，印共不得不发表几个长篇的解释性声明，陈述自己对印度资产阶级的立场。^⑤

① “The United National Front” (《民族统一战线》), *Inprecor* (《国际新闻通讯》), XVI (Nov. 7, 1936) p. 1342.

② *Communist* (《共产主义者》), I (March, 1937), p. 18.

③ 同上, p. 5.

④ 同上, I (April, 1937), p. 25.

⑤ 同上, I (June, 1937), pp. 16—26.

印共在这些声明中承认，二月決議不仅在激进派中，甚至在印共党内也引起混乱。为了緩和这种局势，他們說这个決議并不意味着放弃反对資本主义的斗争，只不过是把这个斗争推迟一下。但是，他們仍然沒有放弃暂时爭取資產階級同情的任务；有一篇声明主张統一战綫應該容納一切階級，“包括印度資產階級很大一部分，而排除少数亲帝国主义的資產階級上层分子及大地主和王公。”^①

但是，尽管发生了这些意識形态上的分歧，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仍然在經濟和社会政策等具体問題上找到了共同基础。国民大会社会党领导人瑪士·黎瑪耶在数年后发表的一个文件中說，印共与国民大会社会党“工作得协调一致”。他說，大約在1937年初，印共似乎更加接近了社会党人的观点。^②在这个时候，两党締結了所謂“勒克瑙協議”。按照社会党人的解释，这个協議意味着两党最后要合并为一个組織。当时如果它們这一級的合作能够充分实现的話，印度左翼是很可能对国大党的綱領和国大党本身的发展施加极其有力的影响的。

但是，事实証明，組織方面和理論方面的对抗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因而勒克瑙協議始終沒有能够实行。各种指責、反指責反映出日益增长的摩擦，其中組織方面的糾紛是結怨的主要根源。到1937年6月，共产党人抗議国民大会社会党“驅逐异端分子”的措施。他們說，任何敢于批判該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人，都被斥为“分裂分子”，并有被开除的危險。他們說，事实上，新請求入党的共产党人已經不再为国民大会社会党所接納了。于是，他們就加

① 同上，p. 25.

② Madhu Limaye, *Communist Party: Facts and Fiction* (瑪士·黎瑪耶：《共产党：事实与捏造》)，(Hyderabad: Chetana Prakashan Ltd., 1951), p. 31.

强了反对社会党人的論战，并宣称“統一行动事实上已不可能了。”^①

几个月后，印共关于它的党员已不再为国民大会社会党所接納的說法成为事实。当全国执行委员会在8月开会时，一份落入社会党人手里的据說是印共的文件提交委员会討論。根据那腊延关于这一段插曲的叙述，該文件明确声称印共是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印度共产党人决不能容忍在战场上有一个对手。那腊延說，这个文件的暴露在社会党人中間引起“痛心的震惊和巨大的憤慨。”全国执行委员会最后认为勒克瑙協議已經成为廢紙，并一致决定停止接納共产党人为党员。但是，它决定不开除已經加入国民大会社会党的共产党人；那腊延承认，这是一个“錯誤的决定”。^②

印度共产党对这种侮辱的反映是声辯他們一向忠于勒克瑙協議。为了証明他們的忠誠，他們建議两党立即合并。据那腊延說，社会党人拒絕了这个建議，认为这个建議显然缺乏誠意。他說，两方面的关系“一步步恶化”。国民大会社会党已感到自己由于共产党的分裂活动和自己未能断然采取行动而“日益瘫痪”。^③

1938年初，米諾·R·瑪薩尼——国民大会社会党書記之一，当时是共产党的死对头——获得印共另一秘密文件，其中叙述了篡夺国民大会社会党各組織的适当方法。他公布了这个文件，并竭力要求对共产党人采取行动。^④但全国执行委员会仍然畏首畏

① *Communist* (《共产主义者》), I (June, 1937) p. 34.

② Jaya Prakash Narayan, *Towards Struggle* (札雅·勃腊加什·那腊延: 《走向斗争》), pp. 172—174.

③ 同上, p. 174.

④ M. R. Masani,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 R. 瑪薩尼: 《印度共产党》), (London: Derek Verschoyle, 1954), pp. 69—70.

尾，不敢做出決定。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几乎夺取了全国执行委员会本身。在国民大会社会党拉合尔会议上，那腊延提出一份执行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其中共产党人占有三分之一席位。但是，这仍不能使他們滿足，他們还詭計多端地提出一份保證他們能在执行委员会占多数的候选人名单。会议以极其微弱的多数通过了那腊延的名单。^①

在拉合尔会议以后，两个党只是在极有限的行动范围内保持着合作，而且这种合作主要是那腊延和 P. C. 約希个人之間所訂的一項工作協議的結果。那腊延以莫大毅力試圖保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間的一点点團結。他和約希繼續交換意見，并就一些政治問題发表联合声明。但这时，在国民大会社会党内部，主动权显然已經轉入共产党人手里了。

到 1939 年初，共产党已經由于渗入国民大会社会党而获得巨大好处，因为这不但使他們有机会篡夺該党各地組織，而且也使他們有可能去影响該党在印度拥有的群众。印共有了重大的发展，在这三年期間，黨員增加了好几倍。^② 它已建立起严密的組織机构，并拥有了大量的刊物。但最重要的好处則是打入了印度国大党本身。

渗入国大党

由于国民大会社会党是印度国大党的一个組成部分，因此，国民大会社会党黨員的資格使共产党人得以打入这个民族主义組織

① 同上，p. 71.

② 1939 年的黨員数字未能找到，但这个时期黨員的增加可以由 1934 年只有一百五十人，而 1942 年即增至五千人这一事实推測出来。1942 年的数字见 P. C. 約希：《向中央委员会的报告》(P. C. Joshi, "Report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People's War*(《人民战争》), I(Oct, 4, 1942), p. 5.

的一切单位，从乡村基层单位到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本身。由此而获得的联系群众的机会，其重要性实在难以估计，“国大党人”的称号使共产党人获得空前的声望和影响。

为了实行以反对甘地派全国领导为目的的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策略，首先需要进行基层活动，以便在国大党普通党员中培植势力。这种活动有助于印共实现发展党员的计划，但是这种活动的目的还在于在国大党最高级机构中取得代表权。印共的这种努力非常成功，以致共产党人在1939年宣称他们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中拥有二十个席位。^①他们在该委员会中不断提出暴力对非暴力的问题，显然是要迫使甘地表示意见并且列入记录——好像他们满有信心地认为这份记录会使甘地垮台。例如，共产党人在国大党费兹浦尔会议中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办法是提出一项修正案，硬说自治“只能通过对帝国主义进行毫不妥协的群众性革命斗争”来取得。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修正案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的一百二十八票中，得到四十五票；在国大党费兹浦尔会议的七百一十三票中，得到二百六十二票。^②从这一事实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左翼在国大党中的力量。

共产党人不但顽强地奉行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策略，而且毫不妥协地公开声明这一点。用在费兹浦尔会议上散发的一本小册子的话来说，这个党的政策，目的在于“使国大党普通党员中的积极分子脱离反动的、甘地主义的‘建设纲领’。”^③

不过，这个政策日益使印共陷入“反帝人民阵线”所固有的两难局面中，因为这个政策要求印共以团结民族主义运动为目的，而

① 帕姆·杜德：《今日印度》。世界知识社1954年版，下册第140页。

② *Communist*（《共产主义者》），I（Feb., 1937），p. 2.

③ 同上，p. 7.

同时又要設法篡夺这个运动。这两个目标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印共越来越不得不考虑究竟要牺牲那一个目标的問題——发动一个維護国大党团結的运动呢，还是发动一个反对甘地和民族主义领导的运动。

在这种困难中的一个明显的問題上，印共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丹吉选择了牺牲团結的道路。丹吉当时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全印工会大会的主席，同时又是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員。在 1937 年的选举中，全印工会大会支持大部分国大党候选人，但是在孟买，这两个組織却为各自的候选人竞选。丹吉公开支持全印工会大会提出的候选人，国大党领导用紀律行动来威胁他。他回答說，“我决定同工会大会站在一起，拥护工人和全国性斗争，”他表示必要时将退出国大党。^①

不久以后，印共自己也不得不作出抉择来解决这种困难。这个抉择极为重要，以致引起了政策上的根本变化。

印共选择了团結

到 1938 年底，国大党中的左翼力量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激进派尚未找到推翻占支配地位的甘地派领导的武器。但是，在 1939 年初国大党选举主席时，他們得到了一个夺取优势，并向甘地派保守集团的支配地位提出挑战的机会。

著名的中左派领导人苏帕斯·占德腊·鲍斯是候选人之一，爭取連任国大党主席。甘地宣称，他认为如果鲍斯連任，就等于对他投不信任票——这就形成了对垒的局面。左翼支持鲍斯，鲍斯

^① S. A. Dange, *Statement to Pt. Jawaharlal Nehru* (S. A. 丹吉:《致賈瓦哈拉尔·尼赫鲁先生的声明》), (Bombay: The New Manohar P. Press, 1937), p. 19.

在选举中获胜。但是当甘地派进行挑战，拒不在鲍斯领导的国大党最重要的机构工作委员会中工作时，左翼显然只能以分裂国大党为代价来篡夺国大党。他们面临着最后的抉择——左翼的领导权还是国大党的团结。当甘地对鲍斯的问题，在1939年3月国大党特里普拉会议上达到了摊牌阶段的时候，社会党人以弃权来正式宣告中立；共产党人则选择了在甘地领导下的团结。

印共在它的正式机关刊物《民族阵线》上解释它的立场时说，反帝运动的利益“不要求一党一派的排他性的领导，而要求在甘地指导下的**统一领导**。”^① 印共说，这并不意味着它放弃对甘地派领导的批评；而只意味着它承认甘地对反帝运动有着“最大的号召力”。事实上，这个决定意味着印度共产党人当时必须放弃目的在于反对国大党右翼领导的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策略，而实行一种同国大党右翼领导进行合作的比较温和的政策。

这种政策的转变，自然在印度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中间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阿约艾·高士在《民族阵线》上的一篇文章中承认，共产党人宣布信任甘地自然会被解释为“放弃了我們迄今为止所主张的路线。”他承认，这个决定“在我們的支持者的队伍中已经引起巨大的混乱，并且显然已经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

难道特里普拉会议不是意味着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整个左翼的破产吗？难道共产党人不是在整个会议中奉行了一种尾巴主义的政策吗？难道他们不是着了团结思想的魔，因而想得到一切人的谅解，但最后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谅解吗？难道他们不是在团结的热望下处处动摇不定，放弃了他们的整个政治路线，甚至根本原则吗？这就是人们正在提出的问题。^②

① *National Front* (《民族阵线》), II(March 19, 1939), p. 96. 黑体字系原有。

② 同上, p. 101.

但是，尽管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存在着明显的混乱，印共领导在选择了甘地领导下的团结之后，便厚着脸皮开始接受由这种团结出发而得出的全部推论。新路线要求对甘地做出截然不同的重新估价，这种估价不久就出现了。

S.G. 薩尔堆賽在 1939 年 4 月号《民族陣綫》上解释說，共产党人所以向甘地伸出“合作之手”，是因为他在目前情况下起着“进步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左翼人士显然不仅不需要，而且也不应该对甘地和甘地派领导继续抱过去的态度。他们过去已经充分揭露了甘地主义的缺点。随着他们掌握了新的力量，他们甚至可以把甘地主义同新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机已经到来。……

这就要求我们对甘地主义的一切积极方面，特别是它在 1919 年到 1920 年间英勇反帝阶段的积极方面，进行十分切实的研究和强调。……这就是我们必须复兴、发扬光大和加以充实的甘地主义。①

印共的新政策，自然还要求缓和和对国大党右翼的攻击。这时它虽然对右翼领导的“动摇”态度表示不满，但又否认有任何推翻它的意图。《新世纪》解释說，“把右翼而不是把帝国主义当作攻击的目标”是错误的。印共这时不要破坏右翼领导了，而只要努力去影响它了，因为印共相信“可以把整个民族力量，包括改良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内，都争取过来参加反帝斗争。”②《民族陣綫》则宣称，“必须抵抗右翼的进攻，但不能用发动反攻的办法来赶走他们。”③

这种新政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削弱工会的战斗精神。印共宣称，它的劳工政策应当以努力“取得国大党各级委员会的合

① 同上，(April 30, 1939), p. 189.

② *New Age*(《新世纪》), V(May, 1939), p. 501.

③ *National Front*(《民族陣綫》), II(June 18, 1939), p. 309.

作和支持”为基础。它說，任何把左傾的立場强加給非共产党的工运领导的傾向，“都完全是一种分裂活动”。“把工人斗争孤立起来的老传统必須結束”，必須“从贏得社会同情和国大党的支持出发”来考虑罢工的策略。^①

如果人們寻找印共政策明显轉变的原因的話，仿佛是国际方面的因素起了支配作用。由于反苏战争的危机日益严重，印共这时必須集中攻击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这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既然英国的张伯伦政府被看做是法西斯主义的盟友，印共就必须牺牲一切来加强印度的反英运动。像印度共产党人所說的那样，要击败法西斯主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击败张伯伦政府。因此，同印度一切反帝力量——包括甘地派的国大党领导在內——結成同盟，乃是当务之急。

印度共产党人在做出合作的决定的时候，又一次受到他們的英国同志的指导，这也是很明显的。在国大党特里普拉會議期間，哈里·波立特代表英共向印度发出的賀詞說，“我們认为，在印度，最重要的問題是一切民族力量在印度国大党领导下团結起来。”^②

当 1939 年国际形势朝着高潮发展时，印共竭力执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即令有可能削弱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在所不惜。

第九章 帝国主义战争

1939 年 8 月的德苏条約急剧地改变了印共政策的国际基础。

① *New Age*(《新世紀》), V(May, 1939), pp. 512—513.

② *National Front*(《民族陣綫》), II(March 19, 1939), p. 103.

随着这个条约的签订，苏联摆脱了欧洲敌国的威胁，得到了暂时的喘息机会，而且还获得了大片新领土。社会主义祖国对酝酿着的战争，已经可以泰然处之，因为现在这个战争将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西欧各国很可能要互相摧毁了。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受的压力暂时减轻，印度共产党人及其国际指导人就得对印度形势进行重新估计了。

当时的局势在某些方面是令人鼓舞的。从表面上看，印共虽然还是非法的，但它在过去五年中，已经从差不多是默默无闻而变得相当强大；它的影响仍然不大，但同早年比较起来似乎确已不可轻视了。而且，整个左翼这时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已经取得某种重要地位：在国大党中，苏帕斯·占德腊·鲍斯所领导的前进集团已经联合了包括国民大会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内的其他激进集团，建立了左翼团结委员会；左翼尽管还是少数派，但其组织日益严密，影响日益增长，

印共在这几年中所取得的进展，只是印度全国政治觉悟迅速提高、政治活动迅速发展的一个方面。这还表现在政治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形式的多种多样上。例如，国大党党员人数增加了十倍——从1936年的五十万人增加到1939年的五百万人，^①而且在印度政治生活中已成为重要得多的因素。其他政治组织的力量也有了同样的发展，这表现在穆斯林联盟的壮大上面。像尼赫鲁在论述这个时期时所說那样，这个联盟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群众支持，而开始发展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②

① R. C. Majumdar, et al., *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 (R. C. 瑪琼达尔等著：《高等印度史》)，(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Ltd., 1953), p. 989.

②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第513—514页。

最后，政治觉悟提高的表现还在于民族主义的鼓动工作和組織已經蔓延到一个新的領域，即土邦之中。民族主义运动在以前的各个阶段一般只限于英属印度，但是到了 1939 年，一个群众性的“土邦人民运动”已經在土邦王公的管区内发展起来。国大党虽然鼓励这种运动，但尚未正式加以吸收。

这个时期印度政治力量的壮大和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实施 1935 年的印度政府組織法的結果。这个組織法扩大了选举权，提高了省政府的自治权，并在不影响最后的权力的枢紐——印度总督——的条件下，鼓励政治辯論和政治活动，因而促进了各种各样政治組織的发展。照尼赫魯的說法，“心理上的变化很大，好像是一股电流传遍了农村。”^①

共产党人可以指望从这片大好政治形势中得到好处，并且可以以滿意的眼光希望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好轉。但是在他們看来，还有甚至更坚实的根据值得乐观，因为自从 1934 年以来，階級觉悟迅速提高，階級組織也已迅速壮大。据共产党人后来的材料，这时工会活动已进入“新高潮”；在此期間，登記的工会从 1934 年的一百九十一一个增加到 1938 年的二百九十六个。^② 农民的階級觉悟也提高了，而以全印农民协会的組成为高峰；到了 1939 年，这个組織已經能够宣称农民运动^③“有了惊人的觉醒和壮大”夸耀一番，并能自称拥有八十万會員了。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印共可能已經认为印度的形势是值得乐观的，而且証实了統一战綫政策的明智。至于这个政策在战争爆发后是否还要保留，自然要看未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而

① 同上，第 488 頁。

② R. 帕姆·杜德：《今日印度》，世界知識社 1954 年版，下册，第 137 頁。

③ 同上，上册，第 269 頁。（譯文略有出入——譯者）

定。只要苏联保持中立,这场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共产党的战略就得同时反对英德帝国主义。就印度而言,这就意味着要继续执行联合一切反帝阶级来反对主要的敌人——英国人的战略;而策略则应继续取决于印度各政党对帝国主义的态度。

对印度参加迫在眉睫的战争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是影响印共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一个严重问题。在1938年和1939年中,国大党越来越频繁地宣布它反对参战;它在1938年说,只要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印度仍然被置于殖民地附属国地位,英德两国之间的战争就是印度不能参加的“帝国主义”战争。国大党宣称,“不得到印度人民明白的赞同”,印度不会参加任何战争。^①1939年初,国大党又进了一步;它说,它一方面同情西欧民主国家,但一方面“同样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②

但是,当战争真的爆发以后,国大党又多少改变了立场。9月中旬,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尔达举行会议,原则上拒绝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进行合作,但又不就当前形势作出任何决定。它请英国政府宣布它对印度的意图,而且要求包括对印度未来独立的保证,并立即“尽量”履行这一保证。^③这样,国大党就不再要求以英国无条件放弃权力作为印度参战的先决条件了,它只用了立即改变现状的字眼,没有明确说明用什么代价印度才愿合作。

国民大会社会党和鲍斯的前进集团,都甚至更加激烈地反对印度在任何情况下参战。1939年年中,大多数国民大会社会党人的意见是彻底地、无条件地反对印度参加任何欧洲战争——即使

① N. V. Rajkumar, ed., *The Background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N. V. 腊季古玛尔编:《印度对外政策的背景》)(New Delhi: All-India Congress Committee, n. d. [1952]), pp. 55—56.

② 同上, p. 58.

③ 同上, pp. 61—67.

給印度以独立，也是如此。他們并号召如果英国企图把印度拖入战争，就立即展开群众性行动。但是，当战争真的爆发之后，国民大会社会党却接受了国大党的为进一步谈判留有余地的立场。另一方面，鮑斯馬上就表示他决心立即发动全国性的争取独立的斗争，而不管国大党参加与否。

英国政府对战争爆发的最初反映是表示无意向印度的愿望让步。9月3日印度总督宣布印度参战，并发布关于紧急权力的命令。直到10月中旬，白厅才通过印度总督表明它对印度的意图；当时，它仅仅允许要在战后同印度领袖重开谈判。同时，它建议成立一个代表印度舆论的协商机构，以便印度能对战时政策有某些发言权。甘地说这个建议“十分令人失望”。^①

共产国际路线的抬头

由于将来的发展无法断定，印度共产党有两种选择。它可以继续同国大党的甘地派领导结为自上而下的联盟，努力加强它的反战方针；它也可以放弃这种联盟策略，抓住国大党动摇不定所造成的机会，设法领导一个更加积极的运动来同时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和战争。1939—1940年的事态说明，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当局累次提出警告，印共却越来越转而采取后一路线。

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中，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发言人在论述印度问题时，明白要求继续采取统一战线策略。^② 不晓得是由于

① Nripendra Nath Mitra, ed., *The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39* (恩利奔德腊·那特·米德腊编:《1939年印度年鉴》)(Calcutta: The Annual Register Office, 1940), II, 32.

② 以下关于这个时期国际共产党人对印度问题的见解的扼要叙述，是以下面的文件为根据的: V. 布谢维奇:《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与工人阶级的斗争》(V. Bushevich, "Natsional'no-osvoboditel'noe dvizhenie v Indii i bor'ba rabochego

无知还是出自故意曲解，他們竟称贊国大党决心要“利用战争危机来取得完全的民族独立”，并且在执行这个政策时得到“一切群众組織”的支持。同时，他們譴責穆斯林联盟、自由党和印度王公們支持战争，并称他們是“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因此，他們声称国大党是“领导反帝斗争的反帝陣綫組織”。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言人說，国大党是由两个主要派別組成的：即代表尼赫魯领导的“进步民主群众”的左翼，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右翼。但是，他們說，虽然右翼准备和帝国主义妥协——即以支持战争来换取英国的局部让步——不过从整体来看，国大党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因此，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文章，主要是强调进一步巩固和团结国大党的必要性。换言之，印共应该同国大党领导联合起来。

这条路綫意味着他們希望国大党左翼力量——包括共产党人在內——会不断壮大，将来能够篡夺这个民族主义組織。这种希望又意味着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十分注意印度的阶级觉悟的提高和阶级活动的发展。他們說，1937年以后的几年，是印度民族运动“高涨”的时期；印度工人阶级变成了“影响越来越大的”和“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苏联的一篇文章引用了印度警察的一份报告来証

klassa”), *Mirovoe Khoziaistvo*…《世界經濟……》，(Nov.) 1939, pp. 133—153; A. 季亚科夫：《印度各土邦的群众运动》(A. Dyakov, “Massovoe dvizhenie v Indiiskikh kniazhestvakh”), *Mirovoe Khoziaistvo*…《世界經濟……》，(Oct.) 1939, pp. 121—134; S. 麦耳曼：《为爭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印度》(S. Mel’man, “Indiia v bor’be za svoiu natsional’nuu nezavisimost”), *Mirovoe Khoziaistvo*…《世界經濟……》，(Sept.) 1939, pp. 92—104; S. 麦耳曼：《斯大林与民族、殖民地問題》(S. Mel’man, “Stalin i natsional’no-kolonial’nyi vopros”), *Mirovoe Khoziaistvo*…《世界經濟……》，(Nov. 1939,) pp. 48—64; 和 D. 勃洛达勃：《印度与帝国主义战争》(D. Protap, “Indiia i imperialisticheskaia voina”),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 《共产国际》，1939, pp. 43—50.

明印度工人政治觉悟的提高；这篇文章說，这份报告透露：孟加拉的工人最近举行了五一节、反战日、列宁日、十一月决議日、巴勒斯坦日、西班牙日、薩格拉德瓦拉日、苏帕斯·鮑斯日和政治犯日等紀念活动。另一个代言人說，印共已躋身于国大党的“领导行列”，而且是“很重要的力量”了。

除了強調团結国大党之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当局自然十分強調团結国大党激进派的必要性。他們号召共产党人、国民大会社会党人和鮑斯的追随者(通过左翼团結委员会)三方面进行合作。他們說鮑斯是“左翼民族主义者”，并且认为甘地派击败鮑斯只是暫时的。

这个时期俄国和共产国际对印度形势的看法的实质，或許可以从俄国的一篇文章中得到最好的說明。这篇文章叙述了印度工人阶级为反对国大党控制的省政府所頒布的某一项法律而在孟买举行示威的情形。据这篇俄国的文章說，“示威者的基本口号是要求修改这项法律，而同时又对作为反帝斗争的领导者的国大党表示信任。”^① 这里所描述的政策——因而也就是印度共产党人的正确道路——就是：在国大党内进行工作，同时在不违背团結的情况下，对当权的领导加紧施加压力。

既然事实上国大党并不像俄国評論家所描繪的那样积极反对战争(假定这些評論家也了解这一点)，人們不禁要問：他們为什么那样竭力坚持要印度共产党人繼續支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呢？这个时期英国共产党人所写的一些文章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原因，这个原因与苏联的战略利益直接有关。英共非正式机关刊物《劳工月刊》刊载的一篇文章說，英国的作战計劃包括利用伊朗和

^① S. Mel'man, "Indiia v bor'be..." (S. 麦耳曼：《为爭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印度》), p. 93.

印度作为基地来进行对苏战争。因此,这个次大陆会变成一个“至为重要的‘跳板’。”^①事实上,这种看法不仅在战争爆发后就立即出现,而且直到德国进攻苏联前一个月,R.帕姆·杜德还说,苏联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在于德国和英国这两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集结”在它的边境周围。^②英共的发言人显然认为英国有可能通过印度进攻俄国;这种可能性,要求印度本身不给英国人任何支持和合作。因此,印度共产党人有责任支持或鼓励印度一切反战力量,包括动摇不定的国大党在内。

印共预期要发生革命

如上节所述,俄国和共产国际的代言人明白表示,虽然印共应该设法对国大党领导施加更大的影响,但其主要任务则是维护统一战线,并把团结反战放在第一位。但是,考察一下这个时期印共的政策和活动,就会发现它越来越背离了联盟策略,而采取自下而上的策略,不仅对国大党內的一切其他政治领导,而且对左翼人士中的一切其他政治领导都进行了攻击。显然,它终于选择了追求领导权的道路,甚至牺牲团结也在所不惜。

战争爆发后,印共立即要求把战争转变为革命——这个列宁主义的经典性论点由于在当时共产国际的论著中不再提到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印共的这个要求是它的日趋激进的路线的关键,1939年10月印共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正式决议中,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③这个决议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宣称英国政府无意让它

^① Michael Carritt, “India Before the Storm” (迈克尔·卡里特:《暴风雨前的印度》), *Labor Monthly*(《劳工月刊》), XXII(May, 1940), pp. 294—295.

^② R. Palme Dutt, “Notes of the Month” (R.帕姆·杜德:《每月评论》), *Labor Monthly*(《劳工月刊》), XXIII(May, 1941), pp. 209—210.

^③ 以下所引这个决议的文句,都是从印共后来发表的摘要中引用的,摘要见P.

的殖民地独立。英国的目的是在国内支持反动派，在殖民地加紧剥削；因此，決議說，印度人民的任务是“用革命手段利用战争危机，以求实现民族独立”。決議断言“夺取政权是可以立即实现的目标”，并公开号召“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

但是，这个決議承认，单靠印共不可能掀起争取自由的群众斗争；因而党的目的是要在全国人民中，特别是在国大党人中间造成一种“足以推动国大党本身走向斗争”的深入的反战情绪。这个決議虽然指责国大党领袖们想同英国达成卖国的妥协，并且說必須对他们进行“尖锐的批评”和“无情的揭露”，但又重申暂时仍有必要在国大党内进行工作。

这里，印共就表明它的意图在于利用国大党作为工具来达到自己的革命目的。这种策略在这个时期印共发表的另一声明中，讲得更明白。这篇声明說，党必須“掌握主动来准备通过国大党各委员会进行斗争”，必須把国大党所领导的非暴力运动转变为“群众起义”。^①它承认要作到这一点需要假以时日，并且要取决于党是否能在国大党组织中坚守阵地。但同时又认为其他任何政治组织非經国大党許可，都不应该发动任何群众性行动，因为这“会变成冒险，会分裂民族运动和分散我们的力量。”因此，印共的声明谴责国民大会社会党和前进集团，据說它們未經国大党許可就计划

C. 約希：《共产党人对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指控的回答》（P. C. Joshi, *Communist Reply to Congress Working Committee's Charge*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5], pp. 35—39）。作者未找到該決議的原本。因为印共合法刊物《民族陣綫》（*National Front*）在战争开始后就被禁止出版了。

① 引文见 M. 謬尼·雷迪：《印度的学生运动》（M. Muni Reddy, *The Student Movement in India*）（Lucknow: K. S. R. Acharya, 1947），pp. 9—11, Part II。据說此項声明系印共孟加拉委员会发表的；事实上，該委员会可能只是翻印了政治局的決議，因为 M. 謬尼·雷迪所引的摘要和作者所得到的这个決議的摘要内容相符，而且其中有一句話相同。

发动群众行动。

印共在1940年1月的独立日宣言中所宣布的新政策，实际上是以响亮的声音号召起义。该宣言把世界形势描绘为“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危机”，并说欧洲的广大群众“已经高举起革命的红旗”。

世界正处在大变革的边缘。旧秩序正在我们面前摇摇欲坠和土崩瓦解。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者作茧自缚，已无法脱身，正在企图用屠杀千百万人，洗劫整个整个的国家和陷本国人民于无尽苦难之中的方法来寻找出路。……民主、自由与和平已经开始同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力量进行决斗。人类的命运系于这场斗争的成败。

旧世界正在崩溃。新世界正在战争和饥饿的惨祸中诞生。我们正在经历着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①

按照这个宣言的说法，印度局势也处于澎湃的大规模动乱和革命暗潮中。它说，“英国已不再是这个局势的主宰，不再是我们命运的主宰了。我们现在已能够发动一次帝国主义无力抗拒的进攻，”这场斗争“将吸引我国千百万同胞参加对这个帝国主义堡垒的有组织的进攻”。

但是这个宣言却宣布印共忠于作为全国斗争机构的国大党，并强调印共同国大党是一体的。它说，“让我们国大党人认识到我们正处于胜利的前夕吧！”不过，印共同时又表示它打算号召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群众示威，举行集会和组织进军，以便对国大党领导施加群众性的压力。

这种在国大党党内制造革命压力的作法，给印共带来了某些危险。既然它尚未准备抛弃国大党，它也就不能无限制地利用它所谓的革命形势。而其他左翼政党——国民大会社会党和前进集

^① 这个宣言发表在《世界新闻评论》(World News and Views), XX(March 16, 1940), pp. 166—167.

团——也可能認識到这个机会，并且由于它們可以自由退出国大党，因而会从印共手里夺走革命主动权。面对着这种可怕的可能性，可以預料，印共可能在努力排挤保守的国大党领导的同时，竭尽全力削弱其他一切左翼集团和領袖。下一年的事态表明，事实上这就是印共所遵循的路綫。

印共同激进的盟友决裂

1939年12月底，国民大会社会党领导人 J. P. 那腊延向党組織和党员发出一份《战时通报》說，共产党人在过去几个星期中“千方百计地”破坏国民大会社会党党内的团结。^①他說，共产党人散布謊言，誣蔑党的政策；他們指責党采取打算不經国大党許可就发动不合作运动的“冒险主义”計劃，企图以此在党员中“制造混乱，甚至挑起叛乱。”他說，其实国民大会社会党的政策和印共的政策相同，都是推动国大党本身去采取更坚决的行动。

按照那腊延的說法，印共“已經彻底[撕下了]假面具，变成它以前曾与之合作的国民大会社会党和其他一切进步組織的死敌了。”^②因此，国民大会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在1940年3月的腊姆加尔會議上，决定开除全部加入該党的共产党员。但是，这个决定为时已晚，因为到这时共产党人已經篡夺了国民大会社会党的很大一部分，全国执行委员会要采取行动，就不是开除一小撮党员的問題，而是解散很大一部分党組織的問題了。全部南印党組織（安得拉、泰米耳·納德和喀拉拉三个支部）已逐步落入那些以公

^① J. P. Narayan, *War Circular Number 2* (J. P. 那腊延：《战时通报，第二号》) (Lucknow: All-India Congress Socialist Party, 1939), 5 pp. 这是一份致各省党的書記和党员的油印的党内通报。

^② Jaya Prakash Narayan, *Towards Struggle* (札雅·勃腊加什·那腊延：《走向斗争》) (Bombay: Padma Publications Ltd., 1946), p. 179.

开或秘密的共产党人身份出现的当地领导人的影响之下，实际上集体投向共产党。而且发现国民大会社会党许多党员，甚至包括全国执行委员会若干委员在内，前些时候即已秘密加入了印共。用国民大会社会党的一个领导人的话来说，这个党“简直完蛋了”。^①

那腊延在评价该党和共产党结盟的经验时写道，“最好是彻底抛弃与共产党团结这种不确切的提法。”他说，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同印共进行合作是注定要失败的。印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不可能同其他政党有真正的团结，除非这个政党也隶属于共产国际。他说，无论如何，“团结这个字用错了。”^②

共产党人就这样不顾苏联关于团结一切左翼力量的指示，使自己同国民大会社会党的关系恶化到这种地步，以致这两个集团终于发生破裂。大约与此同时，他们同苏帕斯·鲍斯也决裂了。在左翼团结委员会 1939 年 12 月的一次会议上，他们拒不收回先前提出的攻击前进集团是“反革命”的指责，因而这个委员会就分裂了^③。双方在鲍斯所把持的国大党孟加拉委员会中勉强地继续合作了几个月，但当这个单位因反抗甘地的领导而于 3 月初受到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停止活动处分时，共产党人就退出这个单位，参加了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所建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共产党人并拒绝参加前进集团 3 月底召开的反妥协会议，至此，双方就彻底决裂了。

① Madhu Limaye, *Communist Party: Facts and Fiction* (马士·黎玛耶:《共产党:事实与捏造》), (Hyderabad: Chetana Prakashan Ltd., 1951), p. 38.

② Jaya Prakash Narayan, *Towards Struggle* (札雅·勃腊加什·那腊延:《走向斗争》), pp. 182—183.

③ 苏帕斯·占德腊·鲍斯:《1935—1942 年印度的斗争》(Subhas Chandra Bose, *The Indian Struggle, 1935—1942*), 引文见息达·腊莫·果耳:《内达季与印度共产党》(Sita Ram Goel, *Netaji and the CPI*), (Calcutta: Society for Defence of Freedom in Asia, 1955), pp. 5—6.

鮑斯在叙述这一事件时说，共产党人只不过是利用左翼团结委员会作为“扩大该党影响”的讲坛而已，同时他们还进行“不可饶恕的宣传活动”来反对前进集团。他最后说，“今天他们已无耻之极”。^①于是，共产党人又弄得同以前的一个盟友疏远了。

但是，印共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面对着一个耐人寻味的难题。在鮑斯和国大党孟加拉委员会反抗当权的国大党领导的时候，印共不能不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因为它不能一方面支持鮑斯所提出的要国大党“更换领导”的主张，而同时又不抛弃同国大党进行合作的假面具。这也就是说，共产党人不能一方面履行苏联所发出的“团结左翼”的指示，而同时又不违反在国大党中进行工作的指示。

但是，如上所述，印共希望削弱其他一切左翼领袖是有其原因的。印共总书记 P. C. 约希在谴责鮑斯的时候就透露出，同前进集团分裂是降低对手威信的努力之一——必须防止这个对手抓住机会，以激进的纲领取得群众的支持。

工人、农民和学生已经采用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群众行动。他们已经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前进集团企图拉拢这些运动支持它的非暴力运动和政治方针的活动，应当看成是资产阶级影响渗入广大群众，因此应该加以反对。在工人阶级、农民和工读学生面前，不应该把前进集团当作过左的组织来反对，而应该把它当作资产阶级进行分裂活动的代理人来反对。^②

印共同其他左翼集团决裂之后，又发动了反对当时的国大党

① 同上，pp. 6, 8.

② P. C. 约希：《政党和政治斗争真相》(P. C. Joshi, *Unmasked Parties and Politics*)，引文见息达·腊莫·果耳：《内达季与印度共产党》(Sita Ram Goel, *Netaji and the CPI*)，pp. 9—14. 按照果耳的说法，印共 1940 年 3 月所发行的这本小册子是对其他各派政党的“严厉谴责”。它显然表示印共同敌对政治集团的争论已达到最高峰。

领导的运动。在这个时期的另一政策声明中，P. C. 約希宣称，真正的民族斗争——即“无情的爆炸性斗争”——已成为“切合实际的办法”，他并谴责国大党中坚人物未能领导这一斗争。

由于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居于最高领导地位，我们现在就没有什么民族斗争。今后的方向，显然是使民族阵线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并在统一战线中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以便发展斗争的力量，使民族斗争成为必不可免并**压倒和孤立懦弱的资产阶级**。①

像同国民大会社会党以及前进集团的决裂一样，这个运动也是在3月间达到高潮的。在国大党腊姆加尔会议上，印共以“无产者的道路”这个令人瞩目的题目，发表了一个新的政策声明②。该声明要求印度“以革命的手段来利用战争危机”，并说，走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将是“在大企业中进行政治总罢工，同时发动全国性的抗租抗税行动。”下一步，民族运动就会进入“新的和更高的阶段——武装起义的阶段”。按照“无产者的道路”的说法，这个即将来临的斗争的主要内容，就是“城乡地区的武装民兵队伍袭击兵营和警察所，捣毁政府机关，对政府的武装部队进行最大规模的猛烈攻击”。

既然印共不可能设想希望甘地派领导改变主张，转而奉行这种政策，那么它的目的显然在于宣传它的革命政策，以便尽早排挤掉这个领导。按照当时报纸对国大党腊姆加尔会议的报道，印共的两个代表 K. M. 阿什腊弗和 V. D. 季达雷对国大党的主要决议

① 同上，p. 13. 黑体字系原有。

② 作者没有得到这个声明的原本，但其简短摘要曾由内政部长雷金纳德·马克斯威尔爵士于1941年2月12日在新德里对中央立法议会讲话时加以引用。见1941年《立法议会辩论记录：官方报告》(Legislative Assembl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1941, Vol. I, No. 2 (12 Feb. 1941), (Delhi: Manager of Publications, 1941), pp. 122—123.

提出一項修正案，要求“立即发动斗争”，并譴責任何同英国妥协的論調。^① 这个修正案被否决了。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大会社会党人投票贊成国大党这个主要決議案，从而进一步証明它并没有像共产党人早些时候所說的那样正式打算采取“冒险主义”的行动。

“无产者的道路”这篇声明的发表，以及声明中赤裸裸的正統的无产阶级革命主张，給正在从事农民运动的共产党人造成了严重困难。在执行自上而下的策略的情况下，这些共产党人一向在全印农民协会中同非共产党人合作，并且在表面上接受了該协会提出的“农工政权”的口号，即农民和工人将来在理想的国家中地位将是平等的。印共的新声明显然使非共产党人认为：这意味着印共现在放弃了它标榜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平等的主张，而且用当时全印农民协会副主席 N.G. 兰加的話來說，印共正在要求通过“純粹的无产者的道路来实现自由。”^②

此外，按照兰加所說，后来，出席 3 月間在帕拉薩举行的全印农民协会年会的共产党代表，曾設法阻止該会通过一个提出农民应“在印度政府中享有最高地位”的決議案。既然当时报纸报道說这个決議案是一致通过的，那么，共产党人的反对显然沒有达到投反对票的地步。^③

一般來說，全印农民协会政策的其他方面都是和印共的立場一致的，因为該协会譴責战争和国大党的緩期进行全面民族斗争的决定。因此，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之間的合作，仍然在这个农民組織中勉强維持着。

① *The Tribune* (Lahore), (拉合尔《論壇》), March 21, 1940, p. 9.

② N. G. Ranga, *Kisans and Communists* (N. G. 兰加: 《农民与共产党》) (Bombay: Pratibha Pubs., n. d.), p. 8.

③ *The Statesman* (Calcutta) (加尔各答《政治家》), March 29, 1940, p. 11.

“无产者的道路”号召“在大企业中进行政治总罢工”，作为走向武装起义的步骤之一；3月初，印共曾在孟买组织纺织业工人总罢工，以此来说明这个号召意味着什么。这次罢工虽然没有引起暴力行动，但却使孟买地区大部分纺织厂陷于停顿，参加罢工的工人最多时达到十五万人。^①共产党人在纺织工人工会和其他劳工组织中的若干左翼同盟者的合作下，表明自己能够瓦解一个大工业中心，从而至少能够部分地把他们提出的全面进攻英国人的方案化为行动。

对印共的镇压

英国官方对印共的这些声明和行动的反映是异常激烈的。这种反应就是对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采取空前有力的镇压，只是它不及康波尔审判和密拉特审判那样聳人听闻罢了。1940年3月初，在纺织工人开始罢工以后，印度报纸上立即开始出现孟买著名工人领袖——主要是S.A.丹吉、B.T.兰纳迪夫、S.S.米腊吉卡、S.V.巴鲁雷加尔和A.S.K.伊因加尔——被捕的消息。数日后，逮捕又扩及国内其他各地，萨札德·札喜尔和S.V.卡堆也被监禁起来。3月15日——正当国大党腊姆加尔会议刚刚开始的时候——报纸上刊载了一项公告说，中央政府宣布决心“根据印度国防条例，下令拘押共产党的主要领袖”。公告宣称，共产党人“利用颠覆性的宣传和其他有组织的方式，阴谋危害印度国内和平，并阻挠人力和物力的供应以妨碍战争的顺利进行。”^②不出两星期，据报道，其他著名共产党人，包括R.S.宁勃加尔和S.G.巴德加尔，也

^① Nripendra Nath Mitra ed., *The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40* (恩利奔德腊·那特·米德腊编：《1940年印度年鉴》), I, 47.

^② *The Hindu (Madras)* (马德拉斯《印度教徒报》), March 15, 1940, p. 9.

被捕入獄。連 J.P. 那腊延、N.G. 兰加、腊胡耳·散格利达雅那和斯瓦米·薩哈札南达·薩腊斯瓦提那样的非共产党人也均被捕。紡織工人工会、全印农民协会、全印工会大会的大批干部以及其他左翼領袖，不出一个月就都退出了印度的政治舞台。以后几个月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捕就不得而知了，但到了 1941 年 2 月，內政部长宣布政府拘留了四百八十名“公认的共产党人或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暴力群众革命計劃的人。”內政部长雷金納德·馬克斯威尔爵士說，“已把印度共产党組織的中央領導人物”关进監獄，使“共产党机构陷于瘫痪。”^①

雷金納德爵士还宣布，共产党員所以被拘留不仅是因为他們有嫌疑——其实根据印度国防条例，单凭这一条就可以拘留——而且是因为具体掌握了他們的活動情况。本来可以对他們进行像密拉特和康波尔謀叛案那样的审讯，但这样做势必会“泄漏机密情报”，并且要进行长期的审讯，而在战时这两者都是不能設想的。

印共显然由于奉行激进政策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由于政府的鎮压措施，共产党所受的打击，显然比其他政党更严重，因为据雷金納德爵士的声明透露，这四百八十名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占当时根据印度国防条例所拘留的人犯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印共事后也承认，它当时的确陷于瘫痪状态。一部半官方的党史在論述这一时期时說，由于对地下活动准备不足，“遂使党的大多数重要領袖遭到逮捕”，“使党的組織受到极大的破坏。”^② 这份带有自我批評意味的报告表明，政府把印共的領導人一网打尽，是完全出乎他

^① *Legislative Assembly Debates*... («立法議會辯論記錄；官方報告»), p. 121.

^② Chalasani Vasudeva Rao, *Bharatha Communist Party Nirmaana Charithrea* (札拉薩尼·瓦苏堆瓦·腊欧：《印度共产党成立經過》), (Vijaya-wada: Praja Sakti Press, 1943), pp. 129, 151.

們意料的；印共当时并没有建立秘密小组或有效的联络方法，事实上，在它鼓吹激进政策的那几个月里，它的活动甚至比以前统一战线时期还要公开。它当时显然没有认识到，政府在战时是不会容忍这样挑衅的。

因此，印共在欧战初起时所奉行的政策——也就是引起了印共称之为“冒险主义”后果的政策——远远超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局的著作中所规定的范围。如果有人怀疑，印共当时的路线没有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批准，那么，到了1940年5月，共产国际发表了印共在1月发表的独立日宣言的“节本”以后，这种怀疑就都消失了。^①这份删节本事实上完全篡改了印共的宣言，通过对某些整段文字和其他一些删改，阉割了宣言中的革命的核心。

印共宣言的共产国际版本删掉了前引的印共认为世界革命已在进行中的那三段文字，宣言原来宣称，欧洲的广大群众已“高举革命的红旗”，共产国际的版本只说他们已“高举起斗争的旗帜”——在共产党的术语中，这是一句很温和的话，并没有真正的革命内容。

共产国际把宣称英国人已不再是印度局势的主宰以及印度“正处在胜利的前夕”等词句都删掉了。宣言原来宣称即将到来的斗争将“吸引我国千百万同胞参加对帝国主义堡垒的有组织的进攻”，共产国际的版本则仅宣称斗争将“把我国千百万人引向胜利。”宣言中号召印度的工人、农民和学生组织进军和示威的那一段，也被删掉了。最后，原来有一句话谈到斗争的阻碍是“教派组织”所造成的——这其实是暗中批评印度其他政治力量，共产国际把这句话改为“在各种宗教组织的招牌下活动的帝国主义代理人”

^① “Vozzvanie Kompartii Indii” (《印度共产党宣言》), *Kommunisticheski Internatsional* (《共产国际》), No. 5, 1940, pp. 127—128.

——从而就把罪名加到了帝国主义身上而不是国内反动派身上。

这样故意篡改的目的显然是警告印共无论在国际形势方面还是在国内形势方面都不要过高估计革命的形势。

同一期的《共产国际》还发表了 D. 勃洛达勃的一篇文章，从该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观点和印共观点的不同之处。^① 勃洛达勃也提到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具有“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尖锐的性质，”但是引人注目的是，他非但不谈迫在眉睫的革命，反而大谈其印度的进步势力越来越认识到结成“一个民族统一战线与英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必要性。他虽然也提到国大党领导人中“某些妥协的倾向”，但是并没有对这些领导人进行猛烈攻击。

英共在其关于印度的各项声明中，似乎也在警告印共。总的说来，他们并不支持印共关于革命就在眼前的看法；反之，却强调在政治上团结起来的必要性。有一篇文章特别劝导印共要“克服左派的宗派分歧”——言外之意就是敦促印共同社会党和前进集团团结起来。^②

国际路线的调整(1940—1941年)

但是到 1940 年年中，国际共产主义当局好像终于要适应印共当前的路线似的，又开始用比较激进的词句讨论起印度的局势来。共产国际改变方针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 6 月；当时共产国际的一篇文章列举了印共当前的任务，把打破“群众对甘地主义的幻想”也列为任务之一。^③ 这样一来，在共产党声明中很久以来一直没提

^① D. Protap, “Indiiskii narod protiv imperialisticheskoi voiny” (D. 勃洛达勃：《印度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同上，pp. 60—65.

^② Michael Carritt, “India Before the Storm” (迈克尔·卡里特：《暴风雨前的印度》)，p. 299.

^③ “O nekotorykh voprosakh raboty kompartii v usloviakh voiny”

起的一个主题,又重新提出了。

共产国际转而采取左的方针的另一证明是,一个月以后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权威性的文章,苏联的高级代言人之一科查利安茨在文中从各个方面批准了印共的日益激进的路线。^①他宣称印度,特别是加尔各答的局势实际上已等于“接近战争”,从而就肯定了印共关于革命即将来临的见解;他援引了(从而也就是批准了)印共的一项暗示要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革命的声明;他还提到共产党所领导的那些没有得到国大党支持的罢工,特别赞扬了这些在国大党控制范围以外的行动。

此外,在这篇文章中,共产国际还对国大党开始大肆攻击。以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局只满足于指出国大党领导人有同帝国主义妥协的趋势,现在科查利安茨还攻击了它的国内政策,他说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国大党日益倾向于保护印度资本家自私的利益,并且说它实际上是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

科查利安茨毫不隐讳地赞成印共放弃苏帕斯·鲍斯。他声称前进集团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他还赞扬了印共对“极左倾的宗派主义”的攻击,这显然是指社会党而言。他虽然再三说印共必须同国大党保持团结,但是显然要求印共发动更猛烈的攻势,以削弱资产阶级国大领导人的作用,消灭其他左派敌对分子,从而夺取民族主义运动。

因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通过这篇文章,一般地而又具体地批准了印共的路线。共产国际放弃了前一年那种谨慎而

(《论战争时期共产党工作的几个问题》),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 (《共产国际》), No 6, 1940, p. 114.

① G. Kochar'iants, "Voina i natsional'no-osvoboditel'noe dvizhenie Indiiskogo naroda" (科查利安茨:《战争与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Bolshevik* (《布尔什维克》), July, 1940, pp. 59—76.

較消极的态度，公开支持印共想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企图。

印共的孤立

共产国际刚向印共的立場靠攏，印共又更加左傾起来。

1940年10月，印共发表一項声明，指控甘地派的领导人“名誉扫地”和“伪善”，并譴責他們破坏民族斗争，“阴谋求得适当的妥协。”此外，在这項声明中，印共不仅攻击国大党中的“右翼”，而且把国大党中以前某些“激进的”同盟者，包括尼赫魯在內，也列在敌人之列；印共說，尼赫魯的作用是“对共产党人狂吠，用革命的詞藻来粉飾工作委員會的決議”^①。

印共所以这样叫嚷是由一件事引起的，这件事說明了印共的政策使它同其他国大党人疏远到何等程度。9月間，在国大党全国委員會的孟买會議辯論有关战时政策的主要決議时，七名共产党人坚决反对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只有他們投票反对正式決議，因此，据印共的那項声明說，尼赫魯“几乎是狂怒地”，要求把他們的名字記錄下来。第二天，这些名字就遍见于印度全国各报纸上了。^②

1940年年終，印共又在另一活动領域中采取了最后一項左傾的步驟：它在学生运动中完全放弃了自上而下的策略。几年以来，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在全印学生联合会中一向是合作的，但是1940年12月，該組織在那格浦尔會議上，却在是否接受甘地关于学生不参預政治的建議問題上发生了分裂。左派分子在学生运动

① “Bombay A.I.C.C. and After”（《国大党全国委員會孟买會議及以后情况》），*Communist*（《共产主义者》），II (Oct.) 1940, pp. 1—3. 該期《共产主义者》本书作者手头只有一本，且仅有前三頁。

② 同上，p. 3.

中的印共代表领导下反对甘地的影响，但据印共事后追述說，退出会場的乃是拥护甘地的右派分子。^① 无论如何，这次分裂是彻底的，甘地派集团和左派集团同时举行了对台戏的会议。在这次的反抗中，印共政策的激进倾向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是由著名的共产党员 K. M. 阿什腊弗博士和喜冷·穆克吉教授主持的这次左派学生会会议所以极为重要，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党人第一次隐约提到了一项关于民族问题的新政策，这一问题以后对于印共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印度人民的宗教和语言的混杂，导致了当代印度政治中两大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关系问题和语言邦问题，这二者都围绕着一个基本问题，即应该如何给印度的“民族”下定义的问题。整个印度是一个民族呢？还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独立的民族，各自有权作为不同的国家独立存在呢？像孟加拉族和泰米耳族那样的语言集团又该如何呢？难道它们也是独立的民族，各自有权在一个邦联组织中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甚至独立存在吗？以前，在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中，代表差不多一切政治集团和文化背景的印度领袖，为了共同目的把他们在国内问题上的分歧搁在一边，但是现在由于获得独立的日期益愈临近，这些国内问题——尤其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争的问题——就变得更加迫切了。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末有了惊人发展的穆斯林联盟，于1940年3月第一次提出了穆斯林人民另外组成国家的要求，从而对国大党自命为全国性的“民族”组织的权利提出了明确的挑战。

在这以前，印共一直把印度当作一个联合起来为争取自由而

^① Ramen Banerji, *This is the A.I.S.F.* (腊门·班纳季：《这就是全印学生联合会》)，(Bombay: All-India Students' Federation, 1945), pp. 22—30.

斗争的统一的“民族”。既然为了策略的原故要同国大党合作，就必须假定国大党是代表全印人民的；因此印共也曾谴责穆斯林联盟是反动的教派组织。苏联的代言人在欧战爆发后也特别蔑视这一联盟，并严斥它所提出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治的要求是一种“政治上破了产的和反动的主张。”^① 1940年12月，季亚科夫和布谢维奇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穆斯林联盟破坏“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阵线。”他们以赞许的口吻谈到反对该联盟的穆斯林团体最近举行的一次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号召全体穆斯林支持国大党。^②

但就在这个月里，印共在左派学生会议的正式决议中宣称，国大党未能解决教派问题，未能把印度所有的宗教集团团结起来。印共和穆斯林联盟一样，采取了重大的步骤，对国大党代表印度全国的权利提出了挑战。这个新路线体现在一项具体的政治建议中：决议宣称，将来的印度应当是“地方邦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自愿组成的联邦”。印共现在非但不提印度是一个由印度人民联合组成的统一的国家，反而暗示说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③

但是，在这时提出这项政策，显然为时过早，结果只能使印共陷于窘境；因此，印共立即设法弥补所引起的后果。印共后来在详细说明民族政策的起源时也承认，这次会议“试图提出一项正确的政策，但结果搞得一塌糊涂，”因此印共“不得不随即纠正错误。”^④

① D. Protap, "Indiiskii narod protiv imperialisticheskoi voiny" (勃洛达勃：《印度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p. 64.

② V. Bushevich and A. Dyakov, "Indiia i vtoraiia imperialisticheskaiia voina" (《印度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Mirovoe Khoziaistvo...* (《世界经济...》)，No. 12 (Dec.)，1940，pp. 53—68.

③ Mitra ed., *The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40* (米德腊编：《1940年印度年鉴》)，II，415. 黑体字系作者所加。

④ G. M. Adhikari, *Pakistan and Indian National Unity* (G. M.

印共当时力图在学生运动中恢复統一战綫；分裂刚一个月，一个叫做“全印学生联合会(法魯奇集团)”的共产党新学生联合会，就向甘地派学生团体提出了重新联合的建議。但是这两派的领导人在調解分歧的方法問題上未能达成協議，虽然这一問題甚至还提到許多全国性的領袖人物——包括甘地——那里去。学生运动始終未能重新联合起来。

在 1941 年上半年，共产党对印度的政策一直是稳定的。俄国和英共的刊物都沒有就这个問題发表任何重要声明；也沒有任何迹象表明，当时已多少預料到即将发生的两件大事——苏联参战和共产党随后改变全球政策。^①

結 束 語

印共所以采取日益激进的策略，恐怕主要是为了适应它自己心目中的印度国内形势，而不是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印共力图利用国内形势中的革命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真的还是假的；而国际领导人实际上則坚持 1938 年以来一直奉行着的溫和方針。直到 1940 年年中，即拖了很长一段時間以后，印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物的意见才終于一致，而調整的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

这种調整也許是对苏联国际地位的改变的必然反应。当时法国已經淪陷，苏联的战略地位全面恶化，因此苏联的利益所要求的，就不是进一步削弱英国，而是向国外寻求真正的支援了。所

阿提加利：《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民族团結》，(London: Labour Monthly, n. d. [1943]), p. 26.

① Harry Pollitt, "India—A Call to the British People" (哈里·波立特：《印度——向英国人民的号召》，*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 XXIII (June, 1941), p. 265.

以，苏联当时可能是有意在印度加强有别于反帝运动的共产主义运动，因而就慫恿印共努力加强它自己的地位而不要支持国大党。

无论如何，共产党人认为印度革命就在眼前的预料已经落空，这不仅是由于印度国内发生的事件，也是由于“红鬍子行动计划”，即希特勒向苏联边境进军的计划。

第十章 人民战争

由于纳粹德国入侵俄国，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决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的主要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不得不离开它的中立地位，同法国、英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起，投入争取生存的斗争。可笑的是，苏联挑拨资本主义世界内訌达几十年之久以后，现在竟同一个资本主义联盟并肩作战，去反对另一个资本主义联盟。

德国对俄国的进攻激起了印度许多民族主义领袖的愤慨。这一点表现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一项正式决议中。决议说：

苏联一向体现着某些人道、文化和社会准则，这些准则对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工作委员会认为，假如战争的灾难使这种努力和成就遭到破坏，那将是个悲剧。工作委员会对苏联人民在保卫祖国和自由方面所表现的那种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勇气概表示钦佩，并向他们致以热烈的慰问。^①

根据尼赫鲁后来的记述，民族主义领袖对俄国的处境“感到震惊”，

^① N. V. Rajkumar ed., *The Background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N. V. 腊季古玛尔编：《印度对外政策的背景》)，(New Delhi: All-India Congress Committee, n.d. [1952]), p. 85.

并怀着“忧急的心情”注視事态的发展。①

英国也許希望国际事态的新发展会改变国大党领导集团对战争的态度。但是,不管对俄国的同情是多么热烈,它毕竟沒有凌駕印度民族主义事业之上;尼赫魯說,“民族主义者的立場,英印对立的問題,还是照旧未变。”② 因此,不管这个次大陆外面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印度的一般輿論还是专心致力于爭取自由,因为这是高于一切的民族主义目标。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应

在苏联参战以后的几个月里,俄英两国的共产党杂志都沒有提到印度方面的政策問題。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策的总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保卫苏联是当时的唯一战略目标,对俄国胜利所作的貢獻是评价共产党策略的唯一根据。

同年7、8月間英国共产党刊物《劳工月刊》上刊登的一些文章直言不諱地道出了这个新方針的基本根据。一个特別坦率的作家向英国同志解释說,不能机械地搬用变战争为革命这个传统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目标。

很明显,同苏联作战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階級首先要关心的,是挫敗和推翻本国政府,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另一方面,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階級首先要关心的,則是保卫苏联,因为苏联的失敗将不仅是对各国无产階級的重大打击,而且也是对全人类的重大打击。无产階級的任何行动都必須从属于爭取苏联胜利这个最高目标,因为苏联的胜利意味着各国人民事业大大向前推进一步。③

① 尼赫魯:《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識社 1958 年版,第 585 頁。

② 同上,第 586 頁。

③ “Quaestor,” “Leading the World Against Hitler,” (“會計官”,《领导世界反对希特勒》), *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 XXIII (Aug., 1941), pp. 361—362.

在苏联的利益自然决定他国“人民”的利益这一基本假设下，接受这个“最高目标”不消说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正如这位英国作者所说的，“英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与苏联的利益暂时是一致的，因而它与英国人民的利益暂时也是一致的。”如果他的主张需要进一步澄清的话，那么，他在回答下面这个问题时就作了说明，即这种主张是否意味着英国共产党人就是某个“外国”的代理人。他答道，“不，决不是。对工人和老百姓来说，苏联并不是外国。”^①

印度问题终于在9月间被提出来。俄英两国共产党的声明指出，尽管印度处于殖民地的地位，只要英帝国政府同苏联并肩作战，印度共产党就应该支持英帝国政府。可见上述共产党观点的冷酷逻辑，没有经过什么重要修改，就应用到印度方面了。

俄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在9月号上刊登了I. 列明的一篇文章，题为《英帝国在当前战争中的作用》^②。这是《布尔什维克》在整个战争时期发表的唯一一篇关于英国殖民地，也可以说是专门关于印度的文章，其目的显然是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里，列明认为，整个来说英帝国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国家人民的伟大联盟中同苏联一起居于最高地位。”他丝毫也没有暗示印度应该以独立自主作为参加“民主国家人民”联盟的条件；事实上他在谈到印度时总是把印度归在自治领一类里，似乎是要把印度还不是一个自由国家这一事实掩饰过去。他断定印度在这场战争中可以起“重大的作用”，并且暗示说，印度人民实际上是极想完成这项任务的。

① 同上。黑体字系作者所加。

② I. Lemin, "Rol' Britanskoi imperii v sovremennoi voine" (I. 列明: 《英帝国在当前战争中的作用》), *Bolshevik* (《布尔什维克》), (Sept., 1941), pp. 27—37.

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激起了印度人民的无比愤慨；他们知道这会增加印度本身所受的威胁，因为德国法西斯主义总是把进攻乌克兰和高加索看作是进一步进攻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的前奏。

列明一语道破了问题的所在；他指出印度还没有为了战争充分动员它的力量，接着末了说，“动员这些力量参加反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工作，做得越深入越好。”

在战争期间，苏联整个出版界始终没有再谈印度问题。有一本论述英帝国一般情况的参考书，以相当平铺直叙的笔调综述了印度的历史，而没有像平常那样对英帝国主义大事攻击。作者在书的末尾还作出完全不真实的论断说，“印度的广大人民群众准备积极支持英国政府的军事措施。”^①

至于具体应当怎样做，则留待英国共产党去说明。R. 帕姆·杜德在9月号的《劳工月刊》上曾经单刀直入地对印度共产党人说，他们对战争的支持应该是无条件的，而且不应该以获得独立为前提。

印度人民、爱尔兰人民以及所有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像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一样，是和反法西斯主义各国人民的胜利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利益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统治者可能答应或作出什么让步。^②

接着杜德又要求英国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作出某些让步。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因为他的唯一具体建议也是为了“减少”印度参战的“障碍”；他只是建议政府释放尼赫鲁和其他政治

① *Britanskaia Imperia* (《英帝国》), (Moscow: Gosudarstvennyi Institut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1943), p. 227.

② R. Palme Dutt, "Notes of the Month" (R. 帕姆·杜德: 《每月评论》), *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 XXIII (Sept., 1941), p. 381.

犯，并与“国大党直接进行谈判”。由于他没有提出谈判的具体条件，他的要求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杜德的文章甚至没有暗示这场战争对印度的革命意义。总之，他建议印度共产党人撇开所有其它目标，只管动员印度的人力物力来为英国统治者服务，以便争取苏联的胜利。

印度共产党内的争论

在1941年6月以后的几个月中，国际和国内情况显然把印共推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这是极罕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局发出通知说，印共必须支持这场战争，不管印度能否获得自由。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则要求自由，不管有没有战争；在印度，凡是主张在反帝斗争中暂时投降的政党都有被人摈弃的危险或遭到更大的危险。

当时印度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共产党。在1940至1941年被捕的印共领导核心被关在阿季米尔—梅尔瓦腊的德奥利拘留营。在拘留营外，还有一个由P. C. 约希领导的、组织涣散的地下党。印共的这两个派别几乎完全互相隔绝，因而在苏联参战以后便按各自的见解重新审查印共的政策。他们分别考虑的结果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也可以说是恰恰相反的政策。

德奥利拘留营中的印共的忠实信徒，包括印共的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如S. A. 丹吉、穆札法尔·艾哈迈德、S. S. 米腊吉卡，其中也包括B. T. 兰纳迪夫和阿约艾·高士等年轻领导人。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批人听到侵略苏联的消息以后立即有什么反应，但是他们的激动心情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随后想必展开了热烈辩论，在辩论中有人认为印度应当全力支持英国的战争努力，因为这样做当时有助于保卫苏联，这种意见显然占了上风。不管怎样，提出

“人民战争”这一口号的所谓德奥利提綱的观点就是这样。这个提綱从監獄里偷偷帶給了地下党。^①

这个决定一定酝酿了几个月的時間，因为一直到10月才开始有一些隱隱約約提到这个决定的文章出现在党的秘密报刊上。这个决定可能使德奥利的共产党人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因为他们們无疑受到了拘留营中許多国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巨大压力。迟至11月，至少还有一些共产党人在拘留营中同一批民族主义难友一道参加了反对英国当局的絕食斗争，这一行动似乎說明，他們不是不同意德奥利提綱，就是力求不与民族主义队伍完全分离。^②

在那些贊同德奥利提綱的人中間，根深蒂固的国际主义忠誠显然占了上风。他們最后的看法和苏英两国共产党当局提出的看法是大致相同的。他們也許是自发地作出了这个决定，但是他們从《劳工月刊》或其它杂志上对新方針的了解，也很可能起了促进作用。英国当局可能也知道向共产党犯人提供这种情报的好处。

獄外印度共产主义分子的反应形成一个鮮明的对照。他們最初的反应和民族主义者当时的方針是密切吻合的。地下党显然比德奥利那批人更多地适应了国内环境的要求。地下党宣称，这场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争取苏联的胜利，而且还要争取“全世界人民的胜利”——簡而言之，不仅要从法西斯主义下解放出来，而且还要从旧秩序中解放出来。根据印共政治局7月的一项決議，印度党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战争”。

共产党宣称，在苏联现在进行的这场正义战争中，印度人民只能通过一种方式予以帮助，那就是为了从帝国主义桎梏中获得解放而进行更

① 根据印度一个前印共党员的談話。

② 关于絕食斗争的情况，见馬德拉斯的《印度教徒报》，(*The Hindu [Madras]*), for 1941, Nov. 6, p. 6; 10, p. 2; 12, p. 8; and 24, p. 2.

有力的斗争。我们对英国政府及其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仍旧未变。我们一定要继续，不，一定要加强反对这两者的斗争。在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它将断然在这场战争中以及在印度和各个殖民地中放弃帝国主义目的——掌握政权以前，我们的政策决不会改变。我们只有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才能向苏联提供真正的帮助。①

除了声称不管有没有战争也要继续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以外，地下印度共产党还要求英共掀起一场反对丘吉尔政府的革命。印共政治局在谈到印共政策的含意时说：

这不意味着，我们安然自得地相信英美的援助会带来苏联的胜利和一个新世界，而意味着我们要为揭露英美统治者的帝国主义战争目的、为孤立他们并动员人民夺取政权而进行不懈的斗争。②

迟至10月底，地下党的成员还对德奥利的共产党人的观点发动了一次直接的抨击。这个党的一项声明说，那些主张支持英国战争努力的人是“帝国主义政策的追随者”并且是“帝国主义谎言的应声虫”。

依靠人民，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帝国主义者，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政策的精髓。……有人说我们可以用支援英国政府的战争努力的方法援助苏联或为人民赢得这场战争，他们是虚伪的国际主义者，是欺骗人民的骗子手。③

在这期间（6月到11月），地下印度共产党的言论已见诸行

① *Soviet-German War: Statement of the Politburo, July, 1941* (《苏德战争：政治局1941年7月声明》), (no place, no publisher, 1941), (mimeographed), p. 6. 这段引文还可以从阿札腊·那冷德腊·堆瓦的《社会主义与民族革命》(Acharya Narendra Deva, *Socialism an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Bombay: Padma Pub. Ltd., 1946, pp. 152—153) 一书中找到。

② *Communist* (《共产党人》), III (Aug., 1941), p. 3.

③ 引自阿札腊·那冷德腊·堆瓦：《社会主义与民族革命》(Acharya Narendra Deva, *Socialism an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p. 153.

动，他們在各方面从事活动，力求把民族运动推向暴动。在农民运动中，共产党人以极大的热情敦促农民协会采取更富有战斗性的行动，这种热情后来被 N. G. 兰加称之为“疯狂”。^① 10 月，他們使农民协会执行和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国大党没有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积极斗争。^② 搞学生运动的共产党人也同样热情，全印学生联合会共产党一翼的领袖法鲁奇，因发表反英的煽动性演说于 9 月间被捕。^③ 在 11 月初举行的马德拉斯学生会第二次年会上，共产党人要求学生发动争取自由的全国性斗争；^④ 在 11 月底举行的旁遮普学生会的一次会议上，喜冷·穆克吉博士说，印度人民必须“竭尽全力来赢得国家的自由”。^⑤

11 月和 12 月间，对马德拉斯和丁尼未利这两个谋叛案下了判决；共产党被告被判处的罪名是图谋采取危害政府行动或散发有害文件。这些罪行是在 1941 年 6 月以前犯下的；但是，报纸在报道法庭审讯时并没有说被告们已经像德奥利的犯人那样放弃了反英的目的。^⑥

至于地下印度共产党在什么时候或用什么方法得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印度规定的新路线，则不清楚。如果该党在 9 月间（英共和俄国的杂志刊载有关文章的期间）就已经知道这个消息，那么，它在 10 月和 11 月间的行动便是对上述国际指令的公然藐视。

① N. G. Ranga, *Kisans and Communists* («N. G. 兰加：农民与共产党») (Bombay: Pratibha Pub., n. d.), p. 11.

② 同上，pp. 10—11.

③ *The Hindu* (Madras) (马德拉斯《印度教徒报》), Dec. 1, 1941, p. 2.

④ 同上，Nov. 4, 1941, p. 6.

⑤ 同上，Dec. 1, 1941, p. 4.

⑥ 关于马德拉斯谋叛案的记述，见 1941 年马德拉斯的《印度教徒报》(*The Hindu* [Madras]), especially Oct. 8, p. 2; 10, p. 11; and 26, p. 2; and Nov. 20, p. 8)。关于丁尼未利谋叛案，见同上报 (Dec. 20, 1941, p. 12)。

但是，当时的情况可能使他們不能馬上得到这个消息；战时状态也許耽誤了国外的通訊。然而不管怎样，地下党过于涣散，不能一下子就改变方向。

根据一篇在印度普遍为人相信的报道，印共是从英共的哈里·波立特的一封信里正式得知这条新路線的，而这封信是在英国当局的默許下于11月或12月送交德奥利的共产党人的。^①有一件事虽然不一定有什么意义，但值得注意：馬克辛·李維諾夫在前往华盛顿就任外交职务的途中，曾于11月底在印度两城市作了短暫的逗留。^②

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地下党显然到11月就开始怀疑它所坚守的反帝政策了。根据N. G. 兰加的说法，从事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在11月曾向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会那格普尔会议提出了“人民战争”的論点。但是，他們还不打算把这个論点强加于人，于是接受了这样一个決議：只有在印度取得独立以后，这场战争才会变为“人民战争”。^③

但过了一个月，地下党就完全放弃了反帝立場。12月15日，政治局正式採納了“人民战争”的政策。对此，政治局的決議解释说：

我党是讲求实际的党；在新的形势下，我党的任务不仅在于发展新的斗争形式，还在于提出适合于这个新阶段、适合于民族运动的新形式

① 见 M. R. 瑪薩尼：《印度的共产党》(M. R. Masani,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London: Derek Verschoyle, 1954), p. 80. N. G. 兰加在《农民与共产党》(*Kisans and Communists*, p. 13) 一书中把这点說成是当时流传的“許多故事”之一。此事无据可查。

② *The Hindu* (Madras)(馬德拉斯《印度教徒报》), for 1941, Nov. 27, p. 6; Nov. 28, p. 6.

③ Ranga, *Kisans and Communists* (兰加：《农民与共产党》), p. 16.

的新口号。指导我党一切实际政治活动的主要口号是：“让印度人民在人民战争中发挥人民的作用。”^①

印共终于正式同国际共产主义取得了一致的步调。印共在危机时期制定政策的经过十分清楚地说明，国际和国内力量都对印共的行动具有影响，而国际力量最后取得了优势。当印共暂时失去了莫斯科和伦敦的领导时，全党在必须作出抉择时出现了两种反应。一派主要由该党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工作人员组成，他们认清并接受要忠于国际大家庭就不能不采取的一条路线，尽管采取这条路线在国内简直意味着政治自杀。他们大概觉得这个决定比较好办，因为他们呆在牢里，还不需要马上负起执行的责任。另一派由若干年轻领导人和少数党员群众组成，他们坚持一种比较符合国内舆论的政策。在某一时期，这一派指控那一派脱离印度的现实。^②但这毕竟是个异端，不能持久。最后，在取得坚定的国际领导之后，印共全党还是不顾国内的影响和利益，而接受了国际大家庭的要求。

应该指出，日本当时已经参战的事实并没有被印共用来为自己的新路线进行辩解。但是，后来当日本的军事进攻把战火扩大到印度本土上来的时候，“人民战争”的路线当然就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了。

共产党人自己后来对这些事件的解释证明，印共有一度是受了印度现实影响的，但它终于否认了现实。

① 引自 P. C. 约希：《共产党人对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指控的回答》（P. C. Joshi, *Communist Reply to Congress Working Committee's Charges*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p. 45. 黑体字系原有。

② Madhu Limaye, *Communist Party: Facts and Fiction* (瑪士·黎瑪耶：《共产党：事实与捏造》，(Hyderabad: Chetana Prakashan Ltd., 1951), p. 44.

为什么这个共产党花了六个月的時間才明白这场战争对印度說来也是一場人民战争呢？这要归因于非共产主义的左傾民族主义观点。这也要归因于人民的反英态度对共产党人的影响。印度人民及其政党已同英国进行了五十年的斗争。他們认为，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就是反英的斗争。因此，他們不相信支持一个和英国人結盟的集团就能取得独立。人民认为，支援战争努力就意味着加强英国政府，而削弱争取独立的斗争。这种反英的观点对共产党人也产生了影响。他們用了六个月的時間才摆脱了这种民族主义的传统影响，像个共产党人那样去思索，并为争取独立的斗争提出了一个适应新情况的新綱領。^①

作为这段叙述的收場白，我們可以写上这样一段話：馬德拉斯謀叛案中的共产党被告坚决反对“人民战争”这一新方針，而且显然又坚持了至少六个月之久。他們终于在 1942 年中改变了态度，据說这是由于某一犯人的姊妹直接进行干預的結果。当时她刚从伦敦回来，并且同 R. 帕姆·杜德和哈里·波立特談过話。^② 这种不願意采納新方針的现象在印共内部无疑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由于党組織的亲 and 力的功劳，这种现象大体上得到了克服。

印共拥护“人民战争”

现在，印共以真正惊人的适应能力着手糾集力量，以推行其反法西斯的新战略。P. C. 約希充分施展了他那种善于非常激动人心甚至富于情感的詞句来提出一項政策的本領，竭力宣传“人民战争”的方針。他的第一个重大努力便是 1942 年 2 月的一篇政策声明。^③ 为了使这个新方針稍能适合印度人的口味，他不得不越出英

① Chalasani Vasudeva Rao, *Bharatha Communist Party Nirmaana Charithrea* (札拉薩尼·瓦苏堆瓦·腊歌：《印度共产党成立經過》)，(Vijayawada: Praja Sakti Press, 1943), pp. 167—168.

② 根据印度某一前印共黨員的談話。

③ 这篇声明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印度发行。作者沒能找到文件的原版，所以利

国或俄国声明中的死框框，而保证印度在支持这场战争的过程中会获得自由。为了支持这项诺言，他提出了两个主要论点：(1) 苏联的领导 and 典范本身就是全世界从战前的秩序中解放出来的保证；(2) 为了进行这场战争而在印度国内建立的民族团结，将迫使英国给印度以自由。

约希的第一个论点实际上是说，苏联会在盟国阵营中占支配地位，并会在这场战争进程中强行实现革命的目标。他说，在苏联的鼓舞下，

全世界人民都在并肩携手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他们要摧毁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及其同盟者，粉碎产生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灾难的世界帝国主义制度，并代之以一个自由人民的世界。

约希断言，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力量的对比正朝着有利于进步力量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种“革命形势”。人们本来可以合理地推断，约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推翻英美两国政府是共产党的战争战略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他的意思并不是这样。为了规避这种不愉快的含意，他宣称，罗斯福政府和丘吉尔政府“或多或少是进步的”，足以充当“世界人民联合阵线手中的工具”。如果撇开那些革命词藻，他这番话的要旨其实就是要人相信，苏联的影响和英国国内的群众压力将迫使丘吉

用了各种翻印版本。最长的一种翻版（因此可能是最完全的一种版本）收在印共同年出版的、G. M. 阿提加利所编的《从和平阵线到人民战争》(G. M. Adhikari ed., *From Peace Front to People's War*)(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2, pp. 347—377) 这一文献里。另一种版本是英国共产党翻印的 P. O. 约希著《印度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政策和工作》(P. O. Joshi, *The Indian Communist Party*)(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42, 33 pp.)。约希在《共产党人对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指控的回答》(*Communist Reply to...*, pp. 45—58) 一书中也节录了原来的文件。除另行注释外，这里的引文都采用阿提加利所编文献中的版本。

尔政府准予印度独立。

这个論点可能对印度的听众沒有說服力，因此，約希又用另一个前提来补充这个論点。那就是，印度人民可以在团结抗战的行动中获得向英帝国主义政府爭得自由的力量。他說，如果一切爱国的党派和团体都联合起来，他們就能够把这场战争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論点后来又提炼为“实现民族团结，以求保障国防和成立全国性政府”这一口号——这就是战争期間印共政策的主要論調。

約希在竭力宣传“人民战争”的战略以后，又轉到贯彻这一战略的策略問題上来。他的主要建議极值得注意；如今，他已不像战前年代那样，号召在国大党内实行团结了，他现在把国大党降低到和穆斯林联盟同等的地位，并要求这两个組織进行合作。約希把民族团结解释为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团结，从而郑重而正式地表达了印共内部先前酝酿的一种倾向，即不再把国大党当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言人。

約希在明确澄清这个新立場的同时，又把穆斯林联盟說成是“我国第二个最大教派的首要政治組織”^①他实际上承认了印度政治的教派基础，并把国大党降低到这个次大陆的印度教徒的发言人的地位。他說，把穆斯林联盟斥为反动組織是“錯誤和不现实的”；他还說，国大党自己也要和穆斯林联盟一起，对教派不和負“一些責任”。他把国大党的甘地方向譴責为“否定的观点、消极的政策和卑屈的做法”，但又称贊了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进步分子”。

① 以下关于約希的二月声明的引文摘自英国共产党翻印的 P. O. 約希：《印度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政策和工作》(P. O. Joshi, *The Indian Communist Party*)。

为了使双方团结起来，約希要求国大党作出必要的让步。他宣称，国大党必须“勇敢地同意穆斯林联盟的分治要求”——这想必是说，国大党必须接受穆斯林联盟 1940 年提出的关于把这个次大陆划分为两个主权国家的要求。作为第一步，他呼吁国大党在印度各省政府中主动同穆斯林联盟组织联合内阁。

在谈到民族团结应该依据的政治纲领的一般特点时，約希着重提出了印度各政党重新加入省政府的建议：

有人說我們必須先获得自由才能进行自由之战，我們的意見則不同。……我們主張立即重新参加省政府，以便从机构内部增加反对官僚政治的群众压力。需要立即着手去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组织全民的战争努力。

具体地说，約希号召各省政府组织更有效的空防，成立“公民军”，筹备战争经费和加速工业生产。除了这些紧急要求外，約希还要求让印度独立并成立全国性政府。但很明显，争取自由并不是迫切的最突出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要求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团结的基本策略——它意味着印度共产党人现在不仅要渗入国大党，而且还要渗入穆斯林联盟——是与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为印度提出的明确的建议背道而驰的。R. 帕姆·杜德以及英共其他领导人在先前发表的声明中曾经指出，应把国大党看作是唯一有资格代表全印度说话的政党。在印共违反了这点以后，英共党刊曾经反复加以重申。D.N. 普里特在 1942 年 4 月——約希的政策声明发表两个月以后——一期的《劳工月刊》中写道：

英国政府应该承认，国大党有资格被公认为全体印度人民的代表，而该党愿意接受的一切条件，只要包括保障少数人的利益的条款，就应

看作是印度所接受的条件。^①

普里特把穆斯林联盟譴責为英帝国主义者一手建立起来的組織，并且硬說它无权代表印度的伊斯兰教徒說話。他还把穆斯林联盟对巴基斯坦的要求斥为“不实际的”。5月間，本·布莱德雷也参加了这个合唱团。他譴責英国把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等量齐观的政策，并且力称国大党有权“代表印度人民”处理問題。^②

英共和印共的政策矛盾一直持續到9月，即英国同志以小册子的形式翻印了約希的政策声明，从而表明他們采取了印共的立場为止。这本小册子刊有哈里·波立特的序言。他承认，“后来的发展情况”証明約希的建議是“絕對正确的”。^③同时，杜德也在《劳工月刊》的文章中，断然放弃了他原先认为只有国大党才能代表印度人民說話的立場，而要求英国政府“同国大党及印度所有的政治派別和政治領袖进行平等的談判”。像約希一样，他也认为国大党为了团結，必須对其他政治派別作出“重大的让步”，他甚至认为，“为了当前的目的，我們无需考虑”这些派別“是否具有代表性”。^④

由于英共和印共的方針在其它一些方面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他們在2月到9月間对国大党的不同态度，不大可能是由于缺少联络所致。看来很可能是因为英共与印共不同，它在这几个月里仍然希望英国政府和印度民族主义者能达成体面的妥协，同时也希望国大党会同意支持这场战争。

① D. N. Pritt, "India" (D. N. 普里特:《印度》), *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 XXIV (April, 1942), p. 107.

② Ben Bradley, "India Threatened," (本·布莱德雷:《岌岌可危的印度》), 同上, (May, 1942), p. 146.

③ P. C. Joshi, *The Indian Communist Party* (P. C. 約希:《印度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政策和工作》), p. 1.

④ R. Palme Dutt, "Notes of the Month" (R. 帕姆·杜德:《每月評論》), *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 XXIV (Sept., 1942), p. 266.

英共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是国大党进步分子的希望；因为国大党駐伦敦的正式代表 V.K. 克里希那·梅农也这样說。他在英共的《劳工月刊》1941年8月号及1942年1月和6月号上发表的三篇文章里宣称，对殖民地人民說来，这场战争的性质已經由于苏联的参战而起了变化；他还說，印度是切望参加的，但由于受奴役而不能参加。^① 在談到殖民地人民对苏联的态度时，梅农說：

对他们說来，苏联的胜利不仅是获得自由的希望所在，而且也是获得自由的保証。他們認識到，苏联人民一向承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苏联一貫支持爭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自治的斗争。……[它]給了殖民地人民很大的鼓舞。……它还促使民族解放运动能够認識到自己的任务，并設法在一个更自由的世界中，在爭取人民自由的世界斗争中發揮自己的作用。

他說，由于苏联遭到进攻，“各地爭取自由的各种力量就必须最充分地动員起来。”他宣称，参加“世界反法西斯陣綫”是印度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要求自由也“同样”是印度政策的一部分。

梅农要求英国政府在承认印度独立的基础上同印度重开談判。但他同时又贊成印度在战争努力方面同英国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他譴責英国对印度的經濟資源調动不力，认为“当前的口号是生产，更多的生产。”他还要求释放印度的政治犯，他說：

其中的許多人，共产党人和其他反法西斯主义者，都是不管英国政府的愚民政策，仍然願意把人民組織起来进行抗战，以免印度重蹈緬甸复轍

^① 梅农的三篇文章是：“Freedom’s Battle”（《自由之战》），*Labour Monthly*（《劳工月刊》），（Aug., 1941），pp. 364—367；“India in the War”（《战时印度》），同上，（Jan. 1942），pp. 26—28；“India Calls for Action”（《印度号召行动起来》），同上，（June, 1942），pp. 185—188。所用的引文都引自这三篇文章。

的人。

他說，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以及其他工人階級領導者都是印度反法西斯主义的“最杰出的战士”。他还具体举出馬來亞共产党作为馬來亞“最重要的”反法西斯力量，正如他以前把苏联說成是這場战争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一样。至于印度，他說，只有“由全国最重要的力量来领导政府”，这个国家才能动員起来。

既然国大党的正式发言人发表这种意见，英共本来滿可以乐观地认为，印度这个民族主义組織迟早是会决定支持這場战争的。但是，这种希望完全落空了，因为国大党以1942年8月通过的著名的“滾出印度”決議提出最后通牒說，无条件給予印度自由必須先于一切。次月(9月)，英共同意了約希的策略：把国大党降低到仅仅是一个印度教徒組織的地位。

印共摆脱了非法地位

印共領導集团根据新方針团结起来以后，又进而从多方面貫徹这个方針。不管“人民战争”的方針有什么缺点，它的好处之一，就是給印共带来了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取得合法地位的机会。印共在其大部分經歷中一直遭到印度英国当局正式取締，如今竟有可能受到政府方面史无前例的欢迎。印共看到这点，首先就着手向政府爭取合法存在的权利。

1942年初，印共討价还价的地位一周强似一周。在东南亚各地，日本人向英国人步步进逼，英国当局也就越来越热中于在印度内部寻求支持，因为印度次大陆是太平洋战争所追求的最終目标。在緬甸方面，对日本人的抵抗很快就崩潰了，从陆海两路大举入侵印度本土的行动，看来已迫在眉睫。2月間，印度政府暗示願意释放共产党罪犯。在立法議會的一次辯論中，雷金納德·馬克斯威

尔爵士說：“要是有人真心誠意想贊助战争努力，我絕不想繼續把他关在牢里。”^①

3、4月間，由于日本人已經进入印度，克里浦斯代表团便与印度各民族主义政党开始談判。丘吉尔政府願意作出的让步还不足以滿足国大党或穆斯林联盟的要求，因此，克里浦斯代表团沒能取得它們在战时的正式合作。但是，印共政治局却宣布贊成代表团的方案，并呼吁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克里浦斯建議的基础上求得解决办法”。印共“保證全力支持这种解决办法”。^②

更重要的是，印共还明白无誤地表示，它願为抵抗日本保卫印度而战斗。在克里浦斯代表团訪印期間，巴雷利監獄中的共产党人发表了一項声明，保證“以不屈不撓的精神支持战胜法西斯主义的事业。……我們宣布，我們將战斗到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不获得胜利决不罢休。”^③ 印共在指出正規軍沒有力量抵抗日本的大举进攻的同时，要求英国当局“把牢門打开”，并且保證說，如果給人民以武器，将有无数人会起来战斗。

在印度，人們普遍認為，P.C.約希曾在私下会见了雷金納德·馬克斯威尔爵士，甚至克里浦斯本人，并就給予印共更多行动自由的問題进行了談判。克里浦斯代表团來訪以后不久，印共就散发了一篇致“朋友和同情者”的非公开声明，扼要地說明了它的立場，并且詳盡地闡述了它为換取合法地位而願提供的援助。^④ 該項声明

① *Indian Information* (《印度新聞》), X (April 1, 1942), p. 332.

② *Party Letter* (《党内通信》), II (April 6, 1942), p. 3.

③ 同上。

④ *Memorandum on Communist Policy and Plan of Work* (《关于共产党的政策和工作計劃的备忘录》), (no place, no publisher, no date), 7 pp. 这是原文件的打字本，上面标有“密件，不得发表”字样。文件的真实性并不絕對可靠，但看来是真的。凡是后来沒有在該党的公开政策和活动中貫徹的建議，都沒有列在文件內。

虽然承认“广泛的爱国舆论”反对在沒有自由的情况下支持这场战争，但又說“今天所有的共产党人，无论是獄里的还是獄外的，无论是自由的还是处在地下的，都怀着热切的願望，願意竭尽全力协助目前的战争努力，如果让我们能够光荣而又有效地作到这一点，即使在现有政府的統治下，我們也在所不辞。”作为合作的条件，印共要求取消对其党员和出版机构的一切限制。作为交换条件，印共答应着手推行一项非常的“工作计划”。印共不仅要展开一次强有力的宣传运动，号召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而且还保证推动征兵工作，为军队提供各种服务，如文娱和医疗工作。印共答应发动学生运动，更重要的是，答应利用自己在劳工队伍中的影响来推动业已增加的工业生产；印共声称，指导该党活动的唯一口号就是“一切为了前线”，因此，“只要我们共产党人力所能及，”英国当局就“不必害怕发生罢工”。最后，印共还保证在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中间征募“敢死队”来采取武装行动；声明說，这些敢死队应“在遭到威胁的几个省中服役，在敌后组织破坏活动，并成为以人民为主的游击队的核心。”

1942年7月，印度政府宣布印共为合法，并且开始释放獄中的共产党人。^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该政府在采取这一步骤以前，就已经利用了共产党人表示願意拿起武器的建議，安排了一个计划来训练以共产党志願者为主的游击队。英国当局无疑知道在印度建立紅军的危险性，因此，这个决定是一种有计划的冒险。英国当局甘冒这种危险，就表明当时的军事形势是如何危急，另一方面也表明来自印度人民其他方面的支援是如何貧乏。

根据现有的少数記述，这项训练计划到6月初就已经开始执

^① 有关英国当局的声明，见《印度新聞》(Indian Information) XI (Sept. 1, 1942), p. 197.

行了。大概是由于保密关系沒有对这项計劃作应有的宣传，但是共产党人却在自己的报刊上报道了这项計劃。由第一批受訓者之一撰写并在《人民战争》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一个游击战士的日記片断》，对这项計劃作了全面的介紹。^①那篇文章說：

的确，我們还远沒有成为一支成熟的游击队；但是我們学会了行軍；我們能够像任何士兵那样勇猛地使用我們的刺刀；我們还知道怎样埋伏和狙击敌人，怎样看地图，在作战时怎样利用地形，怎样炸毀桥梁和建筑物，怎样建設和突破鉄絲网防御工事，怎样在河流和沼澤上架起便桥，怎样同可怕的坦克作战并把它炸毀。我們不仅学会了制造瓶装手榴弹，而且还在射击場上显示了我們的威风。

据这篇日記的作者說，他那一批大約共有三百名来自印度各地的志願者。課程由英国軍官教授，訓練時間是十二天。另外一份材料介紹了浦那附近山区的一个訓練营：那里有若干个小队，每队有十五名志願者，由美国和中国軍官教授游击战术，这些軍官的身分是保密的。^②

后来，日本人入侵的威胁消退，英国当局显然乐于取消这个訓練游击队的計劃。所以从此就沒有下文了。因此，印共丧失了組織紅軍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对于印共的未来以及对印度本身都是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的。如果事态朝另一方向发展——如果日本人侵入印度，而抵抗运动的領導权又落入共产党人之手——那么，中国最近的历史就很可能已在这个次大陆上重演了。

印共在組織上的发展

印共在軍事方面的努力虽然受阻，但在其他方面却取得了惊

^① Rajbans Kishen, "Fragments from a Guerrilla's Diary" (腊支班斯·崙申：《一个游击战士的日記片断》), *People's War* (《人民战争》) I (Aug. 2, 1942), p. 5.

^② 根据印度一个前印共党员的談話。

人的組織上的進展。從 1942 年中開始，印共不僅從自己的合法地位，而且從其他政治組織的非法地位中得到了好處。由於 8 月間國大黨全國委員會要求英國人“滾出印度”這一嚴重事件，國大黨被宣布為非法，其領導人再度被捕入獄。民族主義運動的某些人便訴諸恐怖手段或破壞活動，另外一些人則同日本軍事力量進行勾結。因此，印共在公開的政治舞台上遇到的阻力比較小，它可以奪得或鞏固各方面的群眾組織的控制權。

在農民運動中，共產黨人已經擴大了自己的影響。他們把斯瓦米·薩哈札南德和因都拉耳·雅支尼克這樣一些黨外的農民領袖變為貫徹自己政策的主要力量，並且相繼取得了全印農民協會各省分會的領導權，從而在各屆全印農民協會中央理事會中逐漸加強了自己的力量。到 1941 年底，社會黨和前進集團的兩部分人都退出了全印農民協會。

印共在全印農民協會 1942 年 5 月召開的年會上鞏固了自己的勢力。^① 10 月間，被擊敗的蘭加退出全印農民協會，反對共產黨人的最後一支有組織的力量便消失了。蘭加帶走了六個省分會，於是全印農民協會便陷於分裂；但是，共產黨人這時已控制了協會主體，^② 而且在戰爭結束前一直處於優勢。

在學生運動中，共產黨人也取得了優勢。我們記得，全印學生聯合會當時已經分裂為共產黨控制和非共產黨控制的两翼。1941 年 12 月，當共產黨那一翼在帕特訥舉行年會時，印共的學生領袖幾乎使全體代表（只有少數幾個除外）都信服了“人民戰爭”的方

① 關於印共對二月會議的記載，見《黨內通信》(*Party Letter*)，II (March 24, 1942)。關於全印農民協會五月會議的記載，見米德爾編：《1942 年印度年鑑》(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42 I, 350—353)。

② Ranga, *Kisans and Communists* (蘭加：《農民與共產黨》)，p. 22.

針——考虑到轉变的急遽，这的确是个不小的成就。学生領袖对这一成就兴高采烈的情緒反映在《学生》杂志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文章高呼道：“同志們：想想看，在三天之內，帕特訥的数百学生——最优秀的学生——就被說服了，說服了。”^①然而，說服該組織的全体群众却需要較多的精力。后来出版的一期《学生》声称，新方針至少經過了四个月的热烈討論。^②大体說来，这个方針終于占了上风，共产党控制的全印学生联合会的組織力量稳步加强。战争結束时，它已經盖过了它的对手。

这一成就大概是由于印共以溫和的态度对待学生組織而取得的；在全印学生联合会各次會議上，印共领导人并没有把党的完全正統的方針强加于人，也没有把非共产党分子通通清洗掉。由于容許少量的言論自由，印共能使許多杰出的非共产党人参加它的学生运动。^③

印度工会运动对印共渗透的阻力略强一些。印共虽然不断扩大自己在全印工会大会中的影响，但是沒能使該組織的年会立即正式通过“人民战争”的方針。在全印工会大会 1942 年 2 月的會議上，已經控制了許多地方工会的印共，在推行其新方針时遇到了最高領導机构的坚决反对。^④主持會議开幕式的尼赫魯本人，就直截了当地譴責了共产党的方針，并且声称，印度人在承担起任何其他国家的事业之前首先必須为本国的自由而战。全印工会大会主

① *The Student* (《学生》) (全印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 II (Feb., 1942), p. 15. 黑体字系原有。

② 同上, II (June, 1942), p. 3.

③ 例如, 见全印学生联合会第八次會議(1944年)报告, 載于米德腊編:《1944年印度年鉴》(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44), II, 249—252.

④ 关于这次會議的以下描述均出自米德腊編的《1942年印度年鉴》(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42), I, 366—369.

席 V.R. 卡拉巴也随声附和說，“关于反法西斯陣綫的一切空談都不会給我們带来任何結果。”他对共产党人所謂战争一定会給印度带来自由的蠱惑宣传进行了責难，认为就連“他們的主子也沒有預期这种結果”。老練的劳工領袖 N. M. 卓什也声明反对“人民战争”的方針。在这样强有力的反对面前，共产党人沒有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尽管他們的決議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但是並沒有取得全印工会大会章程为重要決議所规定的四分之三的多数。

在 1943 年 5 月举行的次届年会上，爭論复起。根据当时的一项記載，^① 在會議过程中共产党口号和反共口号紛紛响起，会众“情緒激昂”，以致在場外揮拳扭打。这一次，共产党的主要決議案在六百一十六票中得到了四百二十四票的支持——刚好不滿所需要的 75%。印共号召为战争努力增加生产的另一項決議案因此撤消。非共产党领导人仍然占有該組織的最高职位，由 N. M. 卓什担任具有决定意义的总書記一职。但是，印共能够糾集这样多的代表，就表明印共在地方工会中越来越占优势。

印共在所有这些方面——农民、学生和工会組織——的活动方式，都以取得地方組織的控制权为中心。这样，印共就能指导基层組織的具体活动。在这些群众組織的最高理事会中，印共在要求別人照印共方針行事时，态度是謹慎而溫和的。印共允許非共产党人，甚至那些公开反对“人民战争”方針的某些部分的人，留在有职无权的职位上。印共領導机构經常提醒它的黨員不要把群众組織完全当作“党的讲坛”；換句話說，印共并不坚持要在某一組織的決議中一字不差地重申該党的方針。印共领导人經常否认共产党要控制任何組織，而主张团結各种政治力量。鉴于民族运动对

① 同上，1943，I，357—358。

印共的普遍敌視，人們本以为印共活动的效果不大，但是这种溫和的策略竟带来了出人意外的效果。

在 P.C. 約希领导下的印共领导机构的組織能力，还在战时建立了一大批外围組織中得到了反映。^① 印度人民戏剧协会、进步作家协会、印苏友好协会、儿童福利会、妇女会就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这些組織可以充当行动和宣传的有效工具，在党的政策能和某种职业或某个团体的利益联系起来的时候特别是如此。另一方面，这些組織能把潜在的党员或积极分子吸引到印度共产党的周围——在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对于印共的思想綱領或政治綱領并不大感兴趣也不大了解，可是相信印共是同情他們的特殊利益的。

然而，印共领导人的組織才能受到的最大考驗在于建党的任务本身，而在这方面他們也作得惊人地出色。其中的一个表征就是党员人数的增加。根据印共自称，該党的党员人数从 1942 年的四千五百人左右增加到 1943 年初的九千二百人，1943 年中的一万五千人和 1945 年的三万人。^② 美国政府情报部門关于这一时期的印共的一份报告估計，印共党员在 1942 年約計二千五百人，1945 年二万五千人——增加了九倍。^③ 这种迅速的增长主要是靠印共放寬入党标准取得的；印共在其中央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群

① 关于外围組織发展过程的詳細論述，见第十七章。

② N. K. 格利什南編的《伪造与事实：共产党揭露第五纵队》(N. K. Krishnan, *Forgery Versus Facts*)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3, p. 4) 一书中有 1942 年和 1943 年初的数字。約希：《共产党人对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指控的回答》(Joshi, *Communist Reply to...*, p. 142) 一书也为这两个年份提出了大致相同的数字，同时也提出了 1943 年中和 1945 年的数字。

③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印度共产党》)(R and A Number 2681), (Mimeographed),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 1945, pp. 5, 8. 这份报告于 1947 年公开了。

众性”的共产党以后，便宣布抛弃“旧有的清规戒律”，“取消一切不必要的障碍，向一切够条件的正直人士打开入党的大门”。^①

印共发展壮大的另一迹象在于其宣传活动的展开。印共取得合法地位以后，便开始发行一种新闻周报《人民战争》和一系列省报。不出一年，这些机关报的发行量据称就有六万六千三百五十份。^②书籍和小册子的出版也有迅速的增长。

印共也抓紧了党内的组织工作，尤其注意建立一个稳定的干部系统。到1943年，印共自称有二千六百三十七个“专职干部”——拿薪水的专职工作人员。^③有迹象表明，这些专职工作人员是以空前未有的效率进行活动的。仅供党员阅读的报纸《党内通信》，期期都刊载着大量的指示、通知、调查表、图表以及其他旨在使工作系统化的项目。印共的下级组织可以得到有关工会活动等特殊活动领域的策略的指导，在群众集会上用的“发言提纲”，关于如何编排党小组报纸的指示以及写给中央委员会的示范报告。下级组织还接到有关它们的财政情况、党员的人数和成分、它们在粮食生产运动中的工作、它们在穆斯林中的活动以及其它方面活动的调查表。

1943年中的一项决议说明了这次组织改革的彻底程度，因为决议为印共的当前发展规定了各种具体指标。根据《党内通信》，印共领导的指标是，专职干部六千零二十名，省一级的组织者二百六十名，地方组织者一千七百二十名，小组书记六千二百五十名，全党党员五万六千名，特别筹募的经费五十万卢比（按当时的汇率

① 引自同上报告第9页的《人民战争》(People's War)一节。

② Krishnan, *Forgery Versus Facts* (格利什南：《伪造与事实：共产党揭露第五纵队》)，pp. 6, 8. 印共所说的这一数字似乎已为美国上述情报报告《印度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pp. 16—17)所接受。

③ *Party Letter* (《党内通信》)，III (June 8, 1943), p. 3.

約合十六万七千美元)。^①

在这前后,《党内通信》还刊载了印共的一份明細預算表。表上說,中央委员会的资产——省組織和地方組織的资产除外——共計二十二万五千卢比(約合七万五千美元)。中央委员会每月的开支为七千五百卢比(合二千五百美元),每月的經常收入为五千卢比(合一千六百六十六美元)^②。差額靠不定期的經費捐募运动弥补。同以前的財政情况相比,这种局面无疑是使印共感到兴奋的。

由于取得了合法地位,印共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真正公开召集會議的机会。因此,当1942年9月举行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时,印共报刊把这次全会高呼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③《人民战争》指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次會議竟在印度全国各地的日报中得到了报道。

出席这次全会的共有三十人,其中包括中央委員和来自党的省組織的“特邀代表”。它显然具有一种极力自我恭維,甚至是拚命自我恭維的气氛。印共关于这次會議的正式报告宣称,印共是“我国第三个最大的政党”,它的国际作用“仅次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这种說法恐怕不能使英国共产党人高兴。在对全会讲话时,約希解释說,印共现在所以能取得合法地位,是因为印共一向“坚定不移地效忠祖国”并且“赢得了爱国人士和人民的愛戴和敬仰”。他最后断言,印共是能够“挽救国家”的唯一政党。根

① 同上, p. 4.

② *Party Letter* (《党内通信》), III (Aug. 12, 1943), p. 1.

③ 以下关于九月全会的記述摘自《人民战争》(*People's War*), I, (Oct. 4, 1942), 即 N. K. 格利什南編:《民族团結保卫祖国》(N. K. Krishnan, ed., *National Unity for the Defence of the Motherland*),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 d. [1943 ?], pp. 1—15) 轉載的版本。

据《人民战争》的记载，他“一再”强调印共的杰出作用，是为了“使代表们有信心和勇气去面对新的任务”。

1943年2月又开了一次全会。这次全会为一件更加引人注目的新奇事件——印度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拟订了计划^①。这次大会于1943年5月23日在孟买召开，有来自印度各地的将近三百名代表参加。经过一周的讨论，大会没有提出任何根本背离印共现行政策的主张，反而为纠合全党支持这一政策提供了机会。大会重选P. C. 约希为总书记，并且基本上赞成当时的领导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大会恰好是在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后第二天召开的；因此，这次大会可以作为一个讲台来驳斥有关印共效忠外国的指责。约希在一项特别声明中宣称，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于利用共产国际作为口实来进行反苏反共活动的“一切反动势力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打击”。

在1942至1943年的这三次会议中，印共根据约希以前发表的各项声明，拟订了一条精密的策略路线。印共在战争后期一直使用的这些策略，可以分两个主要方面来考虑：“民族团结”运动和生产运动。

民族团结运动

正如前面所说的，印共民族团结策略的纲要是：呼吁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进行合作，因而要求国大党承认穆斯林联盟有代表穆斯林教派发言的权利，并对该联盟的政治要求作出巨大让步。印共既然奉行这种策略，就感到越来越不容易同国大党保持友好关

^① 关于印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这项记载，摘自米德腊编的《1943年印度年鉴》(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43), I, 304—309.

系，哪怕是表面上的友好关系。为了討好国大党，印共在 1942 年 7 月給国大党工作委員會写了一封“公开信”宣称，“留在我們的伟大爱国組織[国大党]之內，是我們生来就有的权利，”公开信还說：

你們是我們引以自豪的民族运动的可敬領導，这个民族运动以伟大的国大党为代表，是我国烈士用鮮血建立起来的，它受到我国千百万人民的拥护。……我党也是从同一广泛的民族运动中誕生的，十五年来我們一直在竭力加强民族运动。我們都以持有国大党党証为荣，并把它看作是我国宝貴的民族遺產，是鼓舞我們为印度的自由同爱国同胞并肩作战的活的力量。^①

但是，这种令人作呕的歌頌并不能掩盖印共和国大党之間的基本分歧。8 月間，国大党全国委員會中的共产党人反对通过“滾出印度”的決議，从而在实际上抛弃了国大党。国大党全国委員會中的主要共产党人——K. M. 阿什腊弗、薩札德·札喜尔和 S. G. 薩尔堆賽——提出了体现“人民战争”政策的种种修正案，并且同国大党当时的領導进行了尖銳的斗争。^②

在“滾出印度”的決議作出以后，民族主义情緒的巨大浪潮席卷印度各地，这种局面显然动搖了印共对其政策的信心。約希后来承认，在印共的队伍中是有“动搖现象”的；結果，“我們的小伙子就陷入了泥坑。”^③ 这样一来，印共就不得不另找办法来攏絡国大党。这显然就是在以后几个月中形成的民族团結运动的主要内容——要求恢复国大党的合法地位并释放甘地——的目的。印共中

^① Krishnan, ed., *Forgery Versus Facts* (格利什南編：《伪造与事实：共产党揭露第五纵队》), p. 23.

^② 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42* (米德腊編：《1942 年印度年鉴》), II, 245—246.

^③ Krishnan, ed., *National Unity for...* (格利什南編：《民族团結保卫祖国》), pp. 5—6.

央委员会九月全会为这个运动规定了如下几个主要口号：

释放圣雄甘地和其他民族领袖，停止镇压，制止破坏和捣乱活动并克服无政府状态，取消对国大党的禁令，为全面解决进行谈判，成立临时全国性政府来保卫印度。^①

印共把“滚出印度”的决议指责为“错误的”和“有害的”，但又说英国人应对国大党的错误负主要责任。它开展了一次声援甘地的强烈运动，同时也缓和了对国大党的批评。它转而集中谴责“第五纵队”——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破坏英国在印度的战争努力或同日本人勾结的分子。印度社会党人被说成是日本军队的先遣队。对苏帕斯·占德腊·鲍斯及其通敌的“印度国民军”的攻击也构成了印共宣传的很大一部分内容。

无论如何，印共对穆斯林联盟的日益增加的热情暗含着一种强烈反国大党的倾向。印共把穆斯林联盟提高到国大党的同等地位以后，接着又宣布赞成该联盟的要求。用印共中央委员萨札德·札喜尔——他本人是个穆斯林——的话说：

穆斯林联盟不断发展壮大并把我国千百万爱好自由的人民团结在它的周围，这对印度的穆斯林以及对整个印度说来，都是件好事，是个吉兆。……穆斯林联盟把穆斯林群众推向进步和民主道路的力量和能力日益加强，这就使我国千百万穆斯林同胞有了得救的希望，使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有了团结的可能性。^②

但是，印共不仅宣布对穆斯林联盟及其目的表示一般的同情，它还制订了一项解决印度的教派问题的计划，这项计划既符合印共的理论和目的，又有助于实现穆斯林联盟的目的。在1940年初

① 同上，p. 20.

② Sajjad Zaheer, *A Case for Congress-League Unity* (萨札德·札喜尔：《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团结问题》)，(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4), pp. 20, 36. 札喜尔后来成了巴基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

见端倪的印共“民族”政策，现在已经和盘托出了。

到 1942 年中，印共已公开抱定这样一个总的看法：印度是个多民族的实体，每个民族都应当得到充分的自决权。印共的七月声明问道：“我国民族团结的基础是什么？是承认我们这个辽阔的次大陆上的所有民族享有自决权、包括分治权的原则。”^①

印共中央委员会 9 月全会根据 G. 阿提加利的报告作出的一项决议明确地综述了印共的新方向。下面是决议的一个关键段落：

印度人民中，凡是拥有连成一片的土地作为自己的乡土，具有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语言、文化、心理特征和共同的經濟生活的社会，都要看作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民族。它有权在自由的印度联邦或联盟内部作为一个自治邦存在，如果愿意的话，也有权退出这个联邦或联盟。……这样，未来的自由印度将是一个由各个民族的自治邦组成的联盟或联邦。这些民族是：巴檀族、西旁遮普族（主要是穆斯林）、锡克族、信德族、印度斯坦族、拉贾斯坦族、古季腊特族、孟加拉族、阿萨姆族、比哈尔族、欧利雅族、安得拉族、泰米耳族、加尔那达克族、马哈拉施特拉族、喀拉拉族等。^②

至于是否所有的民族最终都应该实行分治的问题，印共并没有给予直接的答复。按照阿提加利的说法，“不应当把赋予分治权同真正行使分治权混为一谈，也不应当把它同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实行分治这种权宜办法混为一谈。”^③但是，决议十分清楚地指

① Krishnan, ed., *Forgery Versus Facts* (格利什南编：《伪造与事实：共产党揭露第五纵队》), p. 19.

② Krishnan, ed., *National Unity for...* (格利什南编：《民族团结保卫祖国》), pp. 24—25.

③ G. M. Adhikari, *Pakistan and Indian National Unity* (G. M. 阿提加利：《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民族团结》), (London: Labour Monthly, 1943), p. 29.

出，那些以穆斯林为主的民族可以退出联盟或联邦：“这就使那些在本乡居住的、連成一片土地上占絕大多数的穆斯林获得成立自治邦的权利，甚至分治的权利，如果他們願意的話。”^①

在这时，印共并没有明确提出各伊斯兰教民族有合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即巴基斯坦的权利。但是，这种前景本来就存在于印共的民族政策中，而且印共后来的決議和声明又一次比一次更清楚地表明，印共是贊成这样作的：9月的政治決議有一处提到了“穆斯林的独立”；^②10月发表的宣言，在談到成立一个穆斯林国家时，已不使用过去的“自治”一詞而是使用了“主权”这个字眼。^③一年以后，印共进而公开支持巴基斯坦。札喜尔告誡国大党說：

国大党人一般都看不到穆斯林联盟所起的反帝解放作用，也看不到穆斯林要实行自决或成立巴基斯坦的要求是正义的、进步的民族要求，是为国大党人多年来历尽千辛万苦竭力爭取的自由和民主的积极表现。^④

由此看来，印共为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政治上和解而提出的方案只要求单方面作出让步。P.C. 約希坦率地承认了这点：

国大党是个大党，必須不負众望，而甘地的責任則更大。穆斯林联盟只要明确提出自己的要求就够了；因为它是个少数的組織，它完全有权利怀疑多数。他〔甘地〕必須比真納先生考虑得更多。他必須为印度的民族运动拟訂一个既能滿足穆斯林联盟的要求又能促使国大党和穆

① Krishnan ed., *National Unity for...* (格利什南編：《民族團結保卫祖国》), p. 25.

② 同上, p. 21.

③ Krishnan, ed., *Forgery Versus Facts* (格利什南編：《伪造与事实：共产党揭露第五纵队》), p. 43.

④ Zaheer, *A Case for Congress-League Unity* (札喜尔：《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團結問題》), p. i.

斯林联盟建立統一戰綫的新綱領。^①

看来印共民族政策的当前目的是要扶助穆斯林联盟，其用意大概是为了爭取穆斯林联盟和穆斯林对战争的支持。R. 帕姆·杜德后来露骨地說，“对巴基斯坦的支持者所以采取这种同情态度，其策略原因就在于爭取他們参加全印民族統一戰綫”^②。这个民族政策十之八九还具有这样一个长远目的，那就是使印共更容易滲入到这个次大陆的穆斯林居民中間。当时的印共中央委員索黎·巴德黎瓦拉在叛党以后說，印共认为“支持穆斯林联盟会使印共在穆斯林群众中得到一个立足点，正如 1936 年以后印共由于支持国大党而在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群众中得到了立足点一样。”^③

然而不可思議的是，印共竟沒有認識到，印共在穆斯林方面得到的好处势必会使它在印度教徒（即印度居民的多数）方面蒙受某种損失，尤其是会恶化它同国大党的关系。那么，印共又为什么要采取这一严重步驟呢？可以試举几种解释。首先，印共或許还不了解它的損失会有多么严重；它或許也不充分了解教派情緒的强烈程度——要印共了解这点的的确是困难的。另一方面，印共或許认为穆斯林对战争努力的支持比非穆斯林的支持更加重要，所以故意牺牲它在非穆斯林方面的利益，来換取更高的利益，即穆斯林的支持。印共之所以认为穆斯林的支持更为重要，或許就是因为

① P. C. Joshi, *They Must Meet Again* (P. C. 約希：《他們必須重归于好》)，(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4), p. 30.

② R. Palme Dutt, "India and Pakistan" (R. 帕姆·杜德：《印度与巴基斯坦》)，*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XXVII (March, 1946), pp. 88—89.

③ Soli Batliwala, *Facts Versus Forgery* (索黎·巴德黎瓦拉：《事实与伪造》)，(Bombay: National Youth Pub., 1946), p. 19.

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在印度具有最大的军事意义；这些地区在印度扼制着日本人和德国人可能入侵的东西边境。

但是，还可能有另一种解释。印共采取这一政策的动机之一也许在于，印共不仅打算鼓励穆斯林的分治主义，而且还打算鼓励这个次大陆上的一切地方主义。虽然只有印共把印度的地方语言集团称作“民族”，这些集团却多次表现出强烈的地方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很容易为政党所利用。这时印共也许模糊地意识到，按照印度的政治发展，现在应该是支持这种情绪的时候了，正如以前支持民族主义情绪一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眼看就要获得自由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要为反对这个国家作准备，印共再也找不到比地方分治主义更好的武器了，因为这种武器能够削弱甚至摧毁新德里的资产阶级政府。

然而，对于印共战时政策的这种解释是带有高度猜测性的。在战争期间，只有一些迹象表明，印共打算使印度巴尔干化，而不是把它分割成两部分。印共一度公开建议，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外，孟加拉也可以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它还暗示说锡克族也应该享有独立地位。但是不管怎样，印共政策——即支持地方主义——的更大意义，只是在战后才充分揭示出来。

生产运动

像民族团结运动一样，印共的经济计划的目的在于使印度能对战争努力作出最大的贡献。像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团结策略是为了促进印度各种政治力量的合作一样，生产运动是为了团结一切经济力量：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以及商人。像从事民族团结运动一样，印共从事生产运动的目标显然也是为了加强印共本身。

在 1942 年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中^①，印共虽然宣布以充分发展工业生产为其目标，但仍然力图保留某些工人阶级利益的传统概念。它绝口不提经济改革，更不谈革命，但是严厉批评了政府的无能和雇主的投机活动，并代表工人提出了一些最起码的要求。印共说要设法把罢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又表示不愿完全放弃无产阶级的这一武器，因为它明白指出，“我们只是到不得已时”才依靠罢工。

但是到 1943 年中，由于发展生产的策略需要，这些传统政策的残余便完全消失了。B. T. 兰纳迪夫在对第一次代表大会作报告时^②宣称，“有条件地支持生产”是一种“左的民族主义倾向”。他说，即使工人的生活是“地狱般的”和“难以忍受的”，“也应该坚决防止罢工”。生产是一项“神圣的义务”，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要求只能在有助于增加生产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为了解决经济纠纷，兰纳迪夫建议用三方委员会的形式使工人、雇主和政府机构的合作制度化。

印共的农业生产政策在精神上是与工业政策一样的。^③ 印共完全放弃了关于土地改革的传统要求，并且勉励农民同地主和农村商贩合作，以求充分发展生产。印共还要求成立“人民粮食委员

① Krishnan, ed., *National Unity for...* (格利什南编：《民族团结保卫祖国》), pp. 27—35.

② B. T. Ranadive, *Working Class and National Defence* (B. T. 兰纳迪夫：《工人阶级与国防》),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d. [1943 ?]), pp. 34.

③ 见格利什南编的《民族团结保卫祖国》(Krishnan, ed., *National Unity for...*, pp. 63—69) 一书所载的中央委员会 1943 年 2 月决议。印共农业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是 S. G. 萨尔德赛，他向 1943 年 2 月中央全会作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见 S. G. 萨尔德赛：《人民取得粮食之道》(S. G. Sardesai, *People's Way to Food*),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d. [1943 ?]), 46 pp.

会”，把“囤积者”以外的各阶层农村居民包括在内。印共声称，农业政策既要为农民保证合理的价格，也要为商販和地主保证“合理的利润率”。

充分发展经济生产的运动，在印共的宣传和活动中，特别是在工会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工作中，受到了最大限度的重视。P. C. 約希曾經說过，比起生产运动来，“其它一切都是空話”^①，他用这样一番話来論証这个运动的重要性，就仿佛印共的政策处处都是为了最后能对这场战争作出最大的经济贡献似的。但是，印共已經坦率地供称，生产运动也有助于印共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中央委員 S. G. 薩尔堆賽在談到粮食生产的組織工作时承认，“因此，我党在粮食战线上的正确领导和实际成就的严格試金石，就在于这项工作能使我党在人数上和政治上加强到何等地步。”他还厚顏无耻地为上述观点辯护，說什么只有印共的政策才是正确的。他还說：

因此，通过粮食运动来建設我党絕不是牺牲任何其他人民組織来謀求我党的自私的宗派利益。恰恰相反，建設我党是我們对所有印度人以及对我国所有其他爱国政党的最大贡献。我党的建設是挽救我們祖国的唯一可靠保证。^②

印共政策的結果

尽管印共把他們的全部才能和人力物力都投在“人民战争”的政策上，但是它在运用自己的策略和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却感到越来越困难。代表印度一般輿論的国大党仍然反对战争努力；因

① 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43 (米德腊編：《1943年印度年鉴》), I, 305.

② Sardesai, *People's Way to Food* (薩尔堆賽：《人民取得粮食之道》), p. 34.

此，印共沒有达到民族團結反对法西斯的目标。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目标和观点方面基本上还是不一致的；这样，印共促使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團結的策略便落了空。而且正如随后几年所表明的那样，印共也沒有能用它的民族策略为自己在穆斯林中赢得多大的声望。其次，尽管印共停止鼓动罢工和土地改革，可能对增加生产真正作出了貢獻，但印共的經濟策略並沒有能使印共一劳永逸地巩固它在工人和农民中間的地位；虽然它在工会运动和农民运动以及在其他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組織上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主要是靠缺乏反对力量取得的。

印共战时政策的主要結果是，印共同首要民族主义組織国大党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印共在战争最后一年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实际上就是在国大党人日益加深的敌視面前，力图与国大党保持一种至少是表面的友好关系。共产党人仍然保持着国大党党籍，而且还在国大党内担任某种职务，但是他們遭到的攻击已日益加强。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一本反共小册子，虽然承认印共有深厚的民族基础，但却指責印共因“急于捍卫俄国的利益”而出卖了民族运动。^①另一本由国大党孟买省委会出版的小册子宣称，印共“輪流不断地对印度国大党各派进行了頑固而有系統的詆毀和誹謗”。^②

印共同国大党的关系，也由于印共有同英国当局秘密勾結的

① D. K. Rangnekar and S. K. Parukh, *Congress-Communist Tangle* (D. K. 濫格內加尔与 S. K. 巴魯克：《国大党同共产党的糾紛》)，(Bombay: National Youth Publications, 1945), pp. 16—17.

② A. G. Tendulkar, *Nation Betrayed? A Case Against Communists* (A. G. 登都耳加尔：《这豈不是叛国嗎？对共产党的控訴：他們自己的証据》) (Bombay: Bombay Provincial Congress Committee, 1945), p. iii. 黑体字系原有。

嫌疑而遭到損害。1942 和 1943 年，印度的許多杂志刊載了据說是約希写給雷金納德·馬克斯威尔爵士的一封信，說明印共从政府方面取得財政援助，同穆斯林联盟有秘密协定，并以各种方式破坏国大党的活动。^① 印共把这封信斥为伪造品，而这封信的真实性也的确十分可疑。1945 年，索黎·巴德黎瓦拉这个有名的叛党分子又說他看到过約希和馬克斯威尔的类似通信^②，这就为普遍的怀疑提供了更多的根据。

到 1944 年底，約希不得不承认“大多数国大党人都怀有反共的偏见。”^③ 国大党的若干省委会已經通过了禁止共产党人担任职务的決議。由于这个原故，約希便搔首弄姿地呼吁恢复良好关系，对国大党百般頌揚：

是国大党树起了印度的自由旗帜；是国大党領袖使我們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初步教育，而今天也正是国大党人不打算让我们享有为了共同事业而同他們并肩作战的权利，但是在国大党人的教导下，我們已把这个事业当作了生活的主要目标了。对我們說来，国大党是我們的母体，国大党領袖是我們的政治导师，国大党的追隨者是我們的战友。^④

当印共想以异乎寻常的方式打动甘地本人时，印共拉攏国大党的努力达到了頂点。約希同甘地进行了为时一年的通信，力图使甘地相信印共的爱国主义和誠意。印共自己发表了这些信件，显

① 印共在格利什南編的《伪造与事实：共产党揭露第五纵队》（Krishnan, ed., *Forgery Versus Facts*, pp. 3—16）一书中轉載并否认了这封信。

② Batliwala, *Facts Versus Forgery*（巴德黎瓦拉：《事实与伪造》），pp. 7—10. 巴德黎瓦拉要求印共发表这封信，但又沒有提出任何証明确有这封信的具体証据。

③ 引自登都耳加尔：《这豈不是叛国嗎？对共产党的控訴：他們自己的証据》（Tendulkar, *Nation Betrayed?...*），p. 24.

④ P. C. Joshi, *Congress and Communists*（P. C. 約希：《国大党与共产党》）（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4），p. 2.

然非常重視这次为了减少損失而作的最后努力。^①

这次通信是約希开始的，他以一个短簡向“我国人民最伟大的爱国組織的最敬爱的領袖”甘地表示了“十二分的敬意”。接着便安排了一次会晤，这时甘地向約希提出了几个关于印共政策和活動的問題，請約希在下次通信中予以答复。甘地沒有得到答复，便致函約希，重复自己的問題。約希在复信中力图故作鎮靜，对甘地“这样关切我們的事情”表示“惊喜交集”。他为自己沒有早日作答辯解道，“我本以为不写信給你会有助于完成使你迅速恢复健康这个伟大的民族任务。”接着他便开始回答甘地的問題。

在問到“人民战争”的含意时，約希简单地介紹了印共的老一套看法，并没有增添什么新內容。在問到印共的財政是否受公众检查时，約希指出，政党的帳目一般都不受公众检查，但是印共的帳簿願意請甘地或是他的代表过目。在問到印共有沒有协助政府逮捕罢工領袖时，約希閃爍其詞，不肯明白答复，他請甘地相信 N.M. 卓什关于印共的誠意的判断。在問到印共打入国大党时是否“不怀好意”，約希又避而不答，只是說共产党人把参加国大党看作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光荣”。最后，在問到印共的政策是否“由外人决定”时，約希宣称，虽然各国共产党都“有共同的思想”，但是“印共是按照它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的了解来决定自己的政策的。”

約希接着說，甘地的問題“使我們感到痛心”，因为這些問題說明还存在着“先入为主的成见”。約希还談到关于印共接受英国政府財政援助的指責，但是他再一次逃避直接回答，只是列举了政府

① 以下关于这段通信的記載均出自《圣雄甘地与 P. C. 約希之間的通信》(Correspondence Between Mahatma Gandhi and P.C. Joshi),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5), pp. 1-42.

镇压共产党人的一些事例。

甘地在后来的一封信里曾以特有的风格把个人的谦逊同十分坚定的政治见解结合在一起。他承认他的成见使他不能接受約希的答复，并且說，他这样承认是想“要求你对我忍耐并尽力設法消除我的成见”。

我知道你們的长处。你們中間有許多非常能干的青年男女，像我敢于自称地那样大公无私。你們都是勤劳工作、精力充沛的人，还为你們的工作人员规定了严格的紀律。这些都是我所珍惜和贊賞的。我不会因为任何先入为主的看法而輕易失去这支力量。

但是另一方面，甘地实际上是断然駁回了約希的大部分答复。他說，“人民战争”这个命題“誤人不浅”。他接着又說，“在写这封信給你以前，我反复研究了你的論点。但每一段話都难以入耳，因为在我看来它們缺乏现实意义。”他承认了約希在印共財政問題上所表示的誠意，但是对于其他問題則保留了自己的看法；他还在字里行間表示，約希有必要以具体証据来补充他的言論。

从那时候起，他們之間的通信所涉及的，主要是一些非政治性問題。約希曾试图就印共不道德、吃葷食、不穿粗布衣服，并且揚言要使用暴力等指責进行辯解。但是甘地最后还是不肯負責就印共的地位問題作出决定，他說国大党各派人士必須“根据自己的認識而不是根据我的判断行事，因为我的判断缺乏充分的証据，也許是錯的”。

于是，印共试图撫慰甘地并通过甘地撫慰国大党全党的这番惊人努力失敗了。两党的关系日趋恶化，战争结束后沒有几个月，国大党工作委員會便采取了行动。工作委員會委派尼赫魯、瓦拉帕伊·巴堆耳、果溫德·巴拉泊·潘特組成一个高級小組委員會，去調查共产党人在国大党內的活动。小組委員會很快就建議指責

共产党人的行动违反国大党政策，并要求共产党人说明他们不应受到纪律制裁的理由。印共没有接受这个要求，反而发出指示，着令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以外的所有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大党。于是，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12月间正式决定把共产党人从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或任何其他选任职位上赶走。^①这样，国大党和印共的关系就彻底破裂了。

“人民战争”是得胜了，但是使印共却为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第十一章 立宪共产主义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印度未来的地位问题更加需要立即予以解决了。人们期望新成立的英国工党政府要从根本上修改殖民地政策，并对印度的民族主义采取新的做法。而且，印度的局势也要求这样做；正如以后的事态所表明的那样，战时的镇压使具有潜在爆炸性的民族运动澎湃起来了。因此，在战争结束后的两年中，既存在着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也存在着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事态迅速地朝着期待已久的印度独立的最高峰发展下去。

这是一个急剧转变的时期，这时印度国大党已从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政党变为一个正式执政的政党。在这样一个变化莫测而又有机可乘的时期，人们原来预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采取有力的主动措施。然而，苏联对印度的态度事实上是小心谨慎的、临时应付的。直到印度独立前夕，苏联还是表现得犹豫不决，它不能

^① 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45* (米德腊编:《1945年印度年鉴》), II, 102, 112—122.

預料事态的发展而是跟在事态的后面。

由于缺乏国外的明确指导,由于遭到公众的輕視以至敌視,以及由于內部斗争的尖銳化,印共自己被迫采取了反复无常和事后补救的临时应付办法。它的政策左右搖摆,失去了重心。这是印共的轉变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印共总的說来似乎只求在自由印度充当一种“效忠的反对派”的体面角色。

苏联的騎牆态度

战争将近結束时,印度民族运动极为高涨。当大多数国大党領袖被监禁了两年半,而于1945年3、4月間获释时,印度的政治局面正如尼赫魯所說的,是一种“疯狂的激动”的局面,对英国的政策感到“持久的憤恨和辛酸”^①。有一个时期,民族运动在寻找新方向上陷于混乱,而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政府这三个参加爭論的主要方面彼此僵持不下,这又加剧了运动的失望情緒。甘地和眞納不久以前举行的一些會議未能解决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在对印度所抱的理想上存在的矛盾。丘吉尔政府在1945年6月发表的一項主要政策声明也沒有提供新的途径;只是重申了1942年克里浦斯代表团的宪法方案^②。总督和印度领导人之間随后举行的談判也归于无效;談判不仅沒有平息反而进一步激怒了印度的輿論。

印度群众日益强烈的憤怒在一个短时期內集中在英国企图把和日本人并肩作战的印度国民軍的被俘軍官提交軍事法庭审判这件事情上。人們普遍对拿起武器反对英国人的士兵抱有强烈的同

① 尼赫魯:《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識社1958年版,第755頁。

② 声明原文载于雷金納德·庫普兰爵士所著《印度:再声明》(Sir Reginald Coupland, *India: A Re-statem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pp. 295—299) 一书中。

情，这說明了他們不共戴天的反帝情緒。

与此同时，工党政府已經就职，并且宣布願意尽快給印度以完全的自治。作为成立制宪机构的一个步驟，总督宣布重新选举中央議会和省議会。^① 1945 年底至 1946 年初的冬季举行了选举，这次选举奠定了国大党在各印度教政党中間的最高地位，并且确立了穆斯林联盟代表穆斯林集团发言的权利。这样一来，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以教派为分野，各守一方，形成对峙局面，这种教派的分野使印度人民的分裂越来越加深了。

英国答应馬上給印度以独立并没有驅散日益严重的紧张气氛，这一事实可以从 1946 年 2 月皇家印度海軍发生大规模兵变这一史无前例的事件中得到証明。虽然这次兵变被溫和的国大党领导以及英国当局所制止，但是它清楚地表明局势潜伏着极大的危机。

然而，在战后的头几个月里，苏联报刊的評論对这些动乱事件只是作了例行的評述。在本来滿可以解释为革命形势的面前，苏联当局的态度却消极得出人意外。苏联当局对印度形势的評論，不仅根本沒有給人們一种战斗性的指导，反而采取一种极为含糊和謹慎的态度。

苏联的这种反应大概是由許多因素造成的。它是符合苏联当时举行的克制政策的。例如它劝告西欧各国共产党同战后的政府合作，而不要打算夺取政权。至于印度，苏联的发言人也倾向于采取一种观望态度。而这种态度对于印度說来，和对于意大利或法国說来是不同的，它是适合印共力量薄弱的情况的，尽管这在过去并没有妨碍印共号召进行革命。苏联领导人也可能是对印度的事

① 总督声明的原文，见同上书，pp. 299—300.

务未予重视，因为它同重建俄国、并吞东欧，解决欧洲的政治问题这些难题相比，当然是次要的。

说明苏联当局正在对印度采取临时应付措施的最明显的迹象，大概就是，苏联表示愿意考虑由联合国托管殖民地地区。最初的迹象来自苏联著名的亚洲问题发言人 E. 茹科夫，他接受了托管方案，虽然他警告说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一定会设法利用这种制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但是在大约一年以后发表的一篇论述殖民地问题以及解决这个问题所应采取的原则的文章中，茹科夫则进一步。他声称，虽然联合国宪章关于托管的规定并不理想，但是托管“能够促使殖民地在走向完全独立的道路上取得进展。”^②他显然避免采取共产党的传统论战手法；而以称赞的口吻提到“领导民主力量”的英苏美三国联盟，并且极力主张把联盟的纲领——大概是指大西洋宪章——也适用于殖民地。^③

其他一些苏联评论家也持有同样温和的观点。当时以印度问题主要评论家的身份出现的 A. 季亚科夫温和地评论说，印度是联合国会员国，但却没有取得自决权，这是“极为矛盾的”。他最后说，殖民地仍然被剥夺基本政治权利的事实，给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造了更多的困难”。^④

① E. Zhukov, "The Colonial Ques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E. 茹科夫:《现阶段的殖民地问题》), *Marxist Miscellany* (Bombay) (孟买《马克思主义杂俎》), II. (May, 1945), pp. 118—119. 这篇文章原载《战争与工人阶级》(*War and the Working Class*), (Moscow, March 15, 1945), pp. 5—10.

② E. Zhukov, "Porazheniie Iaponskogo imperializma i natsional'no-osvoboditel'naiia bor'ba narodov vostochnoi Azii" (E. 茹科夫:《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与东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Bolshevik* (《布尔什维克》), (Dec., 1945), pp. 86—87.

③ 同上, p. 80.

④ A. Dyakov, "India After the War" (A. 季亚科夫:《战后印度》), *New Times* (《新时代》), (Jan. 15, 1946), p. 10.

但是，在苏联論述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政策的文章中，有一篇作为未来政策的一种試探性暗示，具有重要意义。这篇文章也是由茹科夫写的。他警告說，除非在殖民地取得政治独立的同时，也取得經濟独立，否則，仅仅給予它們有名无实的主权，很可能只是繼續对它們进行奴役的一种烟幕。他說，现在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殖民帝国，这种殖民帝国是由某些只是表面上拥有主权的附属国組成的；其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同菲律宾的关系。^①但是茹科夫并没有詳細論述这个問題，也没有指明印度就是一个可能受到这种危害的国家。

苏联的发言人对待印度国内問題的态度也同样是試探性的。他們虽然也勾画出一条新战略的輪廓，但是在策略上却是模稜两可的。即使在战争結束以前，苏联就倾向于建議印共恢复战前实行的同印度资产阶级合作的反帝战略；^②现在，这一点在后来的許多文章中反复得到重申。他們断言，印度的一切阶级，“除了封建王公和一部分大地主以外”，都能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尽一份力量。^③

但是，和以前的“統一战綫”方針不同，苏联在1945—1946年所持的观点没有明确肯定說国大党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体现者。也没有确认印共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团结”的策略。因此，在主要策略問題上，印共从苏联的言論中几乎得不到什么明确的指

① E. Zhukov, "Porazheniie Iaponskogo..." (E. 茹科夫:《日本帝国主义的失敗与东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p. 86.

② 主要见印共出版的小册子, P. C. 約希:《誰的胜利?》(P. C. Joshi, *Victory...Whose?*),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d. [1945], p. 18) 中的一段引文。

③ A. Dyakov, "Sovremennaiia India" (A. 季亚科夫:《当代印度》), *Bolshevik* (《布尔什維克》) (Feb., 1946), p. 41.

导。

但是对于国大党，苏联一般說来是采取了一种慎重的支持的态度。像別人一样，季亚科夫的分析称贊了国大党的兼容并蓄以及它在群众中得到的广泛支持。他沒有把国大党领导单說成是哪一個階級的，而只是說資產階級在国大党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他說，国大党的目标是取得印度的完全独立，其社会和經濟綱領在印度的条件下是“进步的”。^①他把尼赫魯說成是一个“进步的民主主义者”，并且称贊他“对国际形势的估計基本上是正确的”。然而，季亚科夫說，其他国大党领导人可以阿布勒·卡拉莫·阿沙德为代表。他說，阿沙德虽然不像“狹隘的民族主义者”薩尔达尔·瓦拉帕伊·巴堆耳和拉金德拉·普拉沙德那样是个正統的甘地主义者，但却是很不进步的。^②

苏联評論家对国大党比对穆斯林联盟更加注意，但是对后者总的說来也表示同情。他們称穆斯林联盟是“最有影响的穆斯林組織”，并且說国大党以前曾經是一个狹隘的印度教組織，“很少注意穆斯林的需要”，言外之意认为穆斯林联盟的存在是正当的。^③但是他們对穆斯林联盟並沒有明确表示态度。

在巴基斯坦这个关键問題上，苏联持一种謹慎的中立观点。一方面，季亚科夫斥責国大党沒有在自己的綱領中承认分离权；他指出，国大党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C. 腊札果巴拉札利曾經建議让穆斯林地区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即巴基斯坦，这项建議并且得到全印工会大会以及其它工人和农民組織 [即印度共产党] 的支

① 同上，pp. 44, 51.

② A. Dyakov,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Leaders" (A. 季亚科夫: 《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 *New Times* (《新时代》) (May, 15, 1946), pp. 27—29.

③ A. Dyakov, "Sovremennaja Indiiia" (A. 季亚科夫: 《当代印度》), p. 45.

持。另一方面，他說，“印度許多进步的领导人认为，分治并不能解决印回問題，反而会削弱印度。”他說，国大党领导人认为，“把印度变为一个由民族行政区域組成的联邦，比按教派把印度划分为两、三个独立的国家，会更有利于印度的发展。”^①

实际上，季亚科夫只不过是把包括印共在內的印度各个政党的观点重复了一遍。他並沒有明确表示贊同印共在分治問題上所采取的方針，他的話倒确实可以解释为对国大党的观点暗示贊同。

如何对待巴基斯坦的問題从根本上来說也就是如何对待印度的“民族”組成問題；在这个問題上，苏联的发言人也沒有吐露自己的意见。印共曾提出了一个精細而又全面的方案，其中包括一份各“民族”一览表。但是，苏联当局尽管也承认印度是多民族国家这一总原則，却拒絕接受任何关于“民族”的严格定义，更不用說接受印共那份明确的一览表了。举例來說，有一篇主要是介紹印度地理概况的文章，把一些种族称为“民族”，但是列举的很不完全；而且也沒有給“民族”这个詞下一精确的定义，竟把散达耳、果恩德、欧腊欧恩、蒙达这些原始的小部落同孟加拉、泰米耳以及其它大的語言集团等量齐观，都当作民族看待。^②对民族問題的这样一种不系統的分析，看来实际上就是拒絕贊同印共的方案。

苏联的发言人在对待当时印度的一些具体事件上，同样是小心謹慎的。对于像反对把印度国民軍軍官提交軍事法庭审判的示威游行和皇家印度海軍兵变这样一些重要的政治騷动，他們也只是作簡短的叙述，而且仅仅指出这些事件表明了印度政治舞台上

① 同上，pp. 48—51.

② A. Dyakov, "India and Her Peoples" (A. 季亚科夫：《印度和它的民族》)，*New Times* (《新时代》) (March 1, 1946), pp. 25—31.

“极端紧张的局势”。^①

最后，这个时期苏联报刊评论的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是对印共完全置之不顾。虽然苏联评论家详尽地谈论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问题，却很少提到印度共产党，更不用说把它看作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队了。苏联采取这种漠视印共的态度原因——以及苏联对印度的整个态度的关键——也许可以从季亚科夫的一篇评论中看出来：

印度群众的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水平仍然很低，其组织程度也比在民主国家中所看到的要差得多。因此，像国大党这样一个由比较有限的人士组成的政党，也还能够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一些为人民中相当广泛的阶层所支持的主张。^②

因此，在这个时期，苏联当局显然认为印度简直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可能。他们似乎认为英国不会交出政权，当时的印度领导也不会夺取政权。由于当时在国际上和印度国内，都有许多无法估计的事件，他们就采取了观望和骑墙态度。他们虽然也含糊地规定了一个四阶级“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然而他们的言论简直没有给予印度共产党人以启发或安慰。

印共的竞选宣言

1945年底到1946年初的冬季，印度共产党正忙于参加战后第一次中央议会和省议会的选举。印共所进行的多方面的竞选活动构成研究印共精心制订的战略和策略的一个很好的实例。

① A. Dyakov, "Sovremennaiia India" (A. 季亚科夫：《当代印度》)，p. 52.

② A. Dyakov, "India After the War" (A. 季亚科夫：《战后印度》)，p. 11.

首先應該指出，印共的竞选政策是由以 P.C. 約希为首的当时的领导在全党并没有对此作出新的指示的情况下制订的。虽然印共党章要求在正常情况下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前次代表大会是在 1943 年召开的，而印共领导并没有决定在 1945 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① 直到 1948 年才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期间 P.C. 約希继续担任总书记。他担任该职达十三年，是印共史上任期最长的。

一方面，印共处于一种令人兴奋的新的地位：它第一次作为合法政党参加竞选。印共的新地位，以及当时的紧张和不安局势，使它得到前所未有的机会在印度政治中保持一种独立的身分。但是它未能利用这个机会来促进革命，因为它采取了反帝战略；这个战略以阶级合作共同反帝反封建为目标，因而要求实行一种足以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温和政策。

像在其它场合一样，这种联盟主要是靠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策略来争取的：印共既同国大党非常疏远又未能同穆斯林联盟结成联盟，因而无法考虑同这两个党的领导正式结成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于是便不得不直接去争取这两个党的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同情。

印共在 1946 年 2 月发表的竞选宣言中详细叙述了这个新的战略和策略。^② 宣言号召“所有爱好自由的印度人进行联合斗争”

①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印度共产党党章》)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d. [1943]), Article 7. 1948 年该党修正通过的《印度共产党党章》(*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Calcutta: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48], p. 12.) 保留了这条。1953 年，该条改为全国代表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印度共产党党章》。《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世界知识社 1955 年版，第 60 页)。

② 下面的竞选宣言引文，录自 P. C. 約希所著《为最后取得政权而斗争！印

反对英国“奴役者”，并且把对印度各阶级的批评只局限在大地主和大企业身上，以此来阐明印共的战略方针。它向资产阶级提出明确的呼吁：

印度共产党将寻求中产阶级的衷心合作和紧密联盟，并为实现中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联盟而奋斗。……共产党呼吁革命的中产阶级要看到我党能把中产阶级同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农民联合在一起。

此外，竞选宣言还向城乡中产阶级作出具体保证，说印共真正关心他们的利益。因此，宣言在其经济方案中仅仅要求实行温和的改革，并宣称国家工业计划将“通过国家、资方和劳方代表之间自由平等的合作”来执行。宣言甚至对提倡农村工业的人也作出友好姿态，建议大小工业都应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在土地政策问题上，宣言反复重申“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口号，但又将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规定为一百亩——这是很宽的限额。为了使人不致怀疑它的意图，宣言保证印共将“不触动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宣言自然也包括一些吸引工人阶级的老一套的政纲，这样，它就提出了一个旨在获得特别广泛支持的竞选纲领。

在为竞选而写的另外一些小册子中，印共更加明确地阐述了阶级合作问题。兰纳迪夫写的一篇论述工业政策的文章号召“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分子、雇员为实现国家有计划的发展而团结起来，”^①阿提加利写的另一篇论述土地政策的文章则号召农民中的一切阶层团结起来，而且竟然承认，如果实行印共的纲领，中农和

度共产党的自由纲领》(P. O. Joshi, *For the Final Bid for Power! Freedom Programme of Indian Communists*),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 d. [1945 ?], pp. 101—122) 一书中所引的文本。

① B. T. Ranadive, *Jobs for All* (B. T. 兰纳迪夫: 《人人有事作》)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5), p. 30.

富农将比貧农获得更大的利益。^①

然而，兰納迪夫和阿提加利两人对于向資產階級伸出友誼之手都显得有点局促不安，因为他們的文章的另一一些段落使人想起对“既得利益集团”、“資本家”或“实业家”的老一套攻击。他們两人一致认为存在着这种危險：英国和印度的“既得利益集团”或“大企业”将会成为剝削这个次大陆的伙伴。

正如印共领导人自己后来所証明的，兰納迪夫和阿提加利論述經濟政策的文章中自相矛盾的論点反映了印共內部的分裂。到1945年12月，由于对 P.C. 約希的溫和路綫感到不滿，結果出现了一个以兰納迪夫、阿提加利和阿約艾·高士为主要的最高級发言人的“左翼反对派”。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在“溫和”路綫还是“強硬”路綫問題上的爭論，使印共越来越分裂。^② 但是約希暫時仍处于統治地位。

比宣言的經濟綱領更为重要的是它提出的印度宪政方案。在这个問題上，印共显然找到一个通过竭力迎合地方主义来吸引所有階級，特别是地方中产階級的絕好机会。

在这以前就已經有种种迹象表明，印共支持各語言“民族”的分治主义情緒，因为它看到这样做会不断获得力量，以防有朝一日一些主要的民族政党取得中央政权。宣言証实了这一政策。宣言

① G.M. Adhikari, *Food for All* (G. M. 阿提加利: «人人有飯吃»)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d., [1945 ?]), p. 26.

② 有关这一时期的党内糾紛，主要参閱 B. T. 兰納迪夫向1948年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主要檢討报告，載于《人民世紀增刊》(*People's Age, Supplement*, March 21, 1948, pp. 3—4)。也可参閱勃腊波特·占德腊 [阿約艾·高士]: «論〈关于我党当前情况的意见〉» (Prabodh Chandra [Ajoy Ghosh?], “On ‘A Note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our Party’”), «总部党组公开論壇» (*PHQ Open Forum*, No. 12, Oct., 1949, pp. 2—3)。这个党内文件載有1945—1949年間印共党内事务的許多材料。

的政治綱領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主张印度在政治上分为一个由十七个按語言集团划分的主权国家組成的邦联。

宣言在提出立即独立的老一套要求之后，实际上建議把政权不是移交給一个甚至两个印度政府（印度和巴基斯坦），而是移交給十七个“有主权的”临时民族制宪議會，这些制宪議會分別代表印共在 1942 年所划分的各“民族”，只增加了一个民族，即俾路支族。宣言沒有說明这些国家的边界将如何划定——尽管这是問題的症結所在，——也沒有說明怎样建立这些議會。但是它們无疑将构成独立的实体，拥有“完全和真正的主权”，并且享有“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协商、规定并最后确定它們在一个独立印度范围内的相互关系的自由权利”。每个議會均将派代表参加全印制宪議會，討論最后解决制宪問題，但是宣言又說，这些代表“不应享有比全权代表更大的权力”。

因此，印共所建議的临时政府結構，并不是苏联式的联邦，而是由一些独立国家組成的邦联。宣言还进而申明，印共将主张在最后的宪政方案中规定建立这种邦联。宣言声称，在全印制宪議會辯論这个問題的时候，国大党将要求建立一个单一的印度联邦，穆斯林联盟将要求建立两个单独的联邦，但印共将建議成立一个“由各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自願組成的联盟”，这些国家是民主的、相互帮助的，“先进国家通过一个共同的联邦中心帮助后进国家。”虽然宣言沒有具体說明这个“中心”的性质，但是只要这些国家拥有主权，那么，它显然不可能是“联邦式的”。

共产党在印度的民族政策已經达到了頂点。1940 年以前，印共一直认为印度应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但后来却迅速跨过若干阶段，终于承认了地方分治主义。起初，它同意在多民族的印度各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但还没有在分治的問題上明确表示态度。然

后它又承认，分治是合乎那些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民族的要求的。最后，印共在竞选宣言中声称，所有的民族都应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

虽然民族政策的主要制订人很可能是阿提加利，但是宣言大概是由约希执笔的，因为从宣言的文体上可以辨别出他那惊人的才干。但是，当宣言用英文印成小册子发表的时候，约希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其目的显然是想缩小民族问题方案所产生的影响。^①序言在谈到这个方案时，措词十分含糊。约希经常使用“主权”和“自治”这两个词，好像它们有着同一概念。又如他在谈到印度的未来时，把它说成是一个“由拥有主权的自治国家组成的自愿联盟。”^②此外，他还谴责穆斯林联盟以一种“分治主义”的态度来维护穆斯林教派的权力，并且对此提出印共的相反的意见，说印度人民是一个“各民族的大家庭”。他并且称赞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联邦是把各个民族“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的宪政典范。最后，他声称成立十七个民族乡土的方案，不仅不会使印度分裂，反而会“为建立一个幸福的印度奠定基础。”^③

约希对宣言的这种两面留有余地的解释多半是为了适应城市中说英语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因为他们的国家团结观念自然比地方上的知识分子或不识字的农民要强烈。而且还应该指出，约希在解释中所暗示的那种宪政安排同当时在印度政界中流行的其它折衷计划十分相似。例如，像息甘堆尔·哈特·汗爵士和穆罕默德·札弗鲁拉·汗爵士这样一些温和的穆斯林领袖就曾建议成立

① Joshi, *For the Final Bid...* (约希:《为最后取得政权而斗争:印度共产党的自由纲领》), pp. 1—100.

② 同上, p. 34.

③ 同上, p. 90.

一种新型的邦联，各邦联合在一个只拥有委托权力的中央机构(对其性质只作了含糊其詞的說明)之下。^①[堆支·巴哈都尔·]薩勃魯委员会，以及像雷金訥德·庫普兰爵士那样的无党派英国学者，也都提出过大致类似的計劃，主张在一个只拥有十分有限权力的中央政府下組成一个松散的联邦。^②無論在英国还是在印度，这些計劃都作为代替分治的唯一可行的办法而得到过許多人的支持，而印共也竭力說它的建議是介乎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的要求之間的一种方案。

但是，印共方案同其它方案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权宜的解决办法，而是作为唯一合理的解决办法提出的——这种办法是以这样的假定为基础的：主权并非作为一种方便，而是作为一项权利給予各个語言民族的。印共的方案把“民族乡土”看作是政治結構的唯一当然的基础。

不管怎样，印共在群众中的竞选活动显然把約希的溫和解释抛在一边，而使用了宣言本身的那种极端主义的調子。因为尽管印共的竞选活动一般說来是小规模的、零星的，但印共的报刊报道表明，它的竞选活动在某些地区完全集中在地方自治主义的問題上。例如，印共在致馬德拉斯邦說泰卢固語的选民的呼吁书中鼓吹道：

如果你們要把三分之一的泰卢固弟兄和五分之二的土地从邦主的腐朽統治下拯救出来，建立一个全体安得拉人的独立的大安得拉，那么，你們就必須投共产党的票，因为只有我党把建立大安得拉的主张写在自

① Coupland, *India: A Restatement* (庫普兰：《印度：再声明》)， pp. 271—272.

② 同上， pp. 266—271. 另见 P. N. 瑪薩耳丹：《1858—1950年印度地方自治的演变》(P. N. Masaldan, *Evolution of Provincial Autonomy in India, 1858 to 1950*) (Bombay: Hind Kitabs Ltd., 1953), pp. 174—176.

己的旗帜上，并为之而奋斗。^①

印共竞选活动的另一个方面，显然是努力恢复印共作为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反帝力量的名誉——这个名誉由于印共支持英国在印度的战争努力而受到严重损害。印共在公众的敌视面前显然一直处于防守地位，这种敌视不仅表现在要求把印共驱逐出国大党的呼声上，而且还表现在对印共党员和印共办事处（特别是在孟买）的猛烈袭击上。1945年9月，印共报刊报道说，印共党员在街上出售《人民战争》时受到有组织的匪徒的袭击；一星期以后，当印共党员试图参加国大党召集的公众集会时，又引起了一场暴行。^②11月和1月，集聚的人群袭击印共的孟买办事处，向印共党员投掷石头并破坏印共印刷厂的设备。^③印共的加尔各答办事处也曾遭到袭击。

索黎·巴德黎瓦拉（前中央委员）在叛党后声称，有时袭击是由共产党人自己引起的，他们向集聚在印共办事处附近的并无恶意的人群投掷石头；他说，孟买印共总部楼房的阳台上，存有大量应急的石头和空瓶。^④

但是印共坚持说是它受到国大党的迫害。1946年3月，约希发表了一项声明，声称，“今天全国都知道是国大党人袭击共产党人，而不是共产党人袭击国大党人。”他指示印共党员“使用一切可用的武器”来进行自卫，警告说，“不论哪个同志，凡是被人打了而

① *People's Age* (《人民世纪》), IV (March 17, 1946), p. 3. 黑体字系原有。

② *People's War* (《人民战争》), IV (Sept. 9, 1945), p. 5, and (Sept. 16, 1945), p. 4.

③ 同上, (Nov. 18, 1945), p. 4, and (Jan. 27, 1946), p. 3.

④ Soli Batliwala, *Facts Versus Forgery* (索黎·巴德黎瓦拉:《事实与伪造》) (Bombay: National Youth Pub., 1946), pp. 16—17.

沒有猛烈反击就跑回来，都是胆小鬼，都要被开除出党。”^①

为了平息民憤，印共展开了一个深入的运动来証明自己是印度革命传统的真正继承人。为此，它发表了一些小册子，說明印共是头几十年民族主义运动中某些恐怖主义英雄的最后避难所，因此是“他們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合法继承人。”^② 印共吹嘘說，許多有名的恐怖主义集团——包括“吉大港軍械庫袭击者”和孟加拉邦的其它組織，旁遮普的卡德尔党以及帕加德·辛格的印度斯坦社会共和协会——的成員，在獄里都参加了印共。这些小册子发表的时候，印共的确設有“獄中組織”，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叫做“共产党人的团结”的特別小組。該小組由当时监禁在安达曼群島流放地的一些以前的恐怖主义分子組成。

按照印共的說法，这些恐怖主义烈士只是由于他們在推行国大党的不合作运动中遭到挫折，才从正常的民族主义政見轉向恐怖主义；印共說，他們向共产主义的轉变，說明他們的政治“成熟”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例如，約希在談到“吉大港軍械庫袭击者”时写道：

閱讀一下她本人的事迹 [指袭击者之一加耳巴那·杜德的事迹] 就可以

① *People's Age* («人民世紀»), IV (March 3, 1946), p. 5.

② Niranjan Sen, *Bengal's Forgotten Warriors* (尼濫占·森：《孟加拉邦被遺忘的战士》)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5), 封底。这是当时发表的一套小册子的一本，这套小册子包括：加耳巴那·杜德：《吉大港軍械庫袭击者：回忆录》(Kalpana Dutt, *Chittagong Armoury Raiders: Reminiscences*)；阿約艾·古瑪尔·高士：《一位战友回忆帕加德·辛格和他的同志們》(Ajoy Kumar Ghosh, *Bhagat Singh and His Comrades, by One of Their Colleagues*)；尼濫占·森：《孟加拉邦被遺忘的战士》(Niranjan Sen, *Bengal's Forgotten Warriors*)；和 濫提尔·辛格：《卡德尔党英雄，1914—1915 年旁遮普革命者的軼事》(Randhir Singh, *The Ghadar Heroes; Forgotten Story of the Punjab Revolutionaries of 1914—15*)。

了解我国民族运动富有生命力的一面，了解絕大多数被扣留和被监禁的恐怖主义者是怎样在三十年代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对他们說来，加入我党的队伍是既容易又困难的一步。其所以容易是因为他們从我党的政策和实践中看到了为实现他們的革命理想而进行的更科学、更有成效的斗争。其所以困难是他們必須丢弃幻想并从思想上認識到自己錯在什么地方，应该怎样改正錯誤才能繼續他們在少年时代就已經决心献身的事业，即为祖国而战斗。这些回忆录告訴我們，恐怖主义是他們革命生活的初期阶段，而共产主义則是成熟阶段。^①

当时，这些“政治犯”中的許多人仍被关在牢里，虽然印共原先要求释放这些政治犯的运动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以及像甘地、尼赫魯、腊宾德腊那特·泰戈尔这样一些领导人物的贊同，但是1945年发起的一次新的运动却很不成功，仅仅得到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少数著名的記者、知識分子和艺术家稀稀落落的支持。^②

印共为了証明自己的正統地位，力图說明自己继承了恐怖主义“革命传统”，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印共本身打算立即采用暴力。相反，当一次显然可能演成革命的惊人的暴力行动——1946年2月的海軍兵变——当真发生以后，印共却煞費苦心地推脫一切責任，并努力保持和平。

反抗英国軍官的印籍海軍人員已經控制了一些舰艇和陆上机构，帝国政府面对着这样一种不利局面：驅逐舰和小型海軍舰艇在怀有敌意的司令官的指揮下在各海港間駛来駛去，有时甚至炮轰英軍控制的岸上陣地。同情罢工遍及整个印度，甚至扩展到皇家

① Kalpana Dutt, *Chittagong Armoury*... (加耳巴那·杜德：《吉大港軍械庫袭击者：回忆录》)，pp. 3—4. 加耳巴那·杜德是 P. O. 約希的妻子。

② Niranjana Sen, *Bengal's Forgotten Warriors* (尼濫占·森：《孟加拉邦被遗忘的战士》)，pp. 91—93.

空軍的印籍人員。^①但是，印共中央領導顯然避免鼓勵暴力行動；它僅僅敦促各個政黨團結起來喚起公眾支持兵變參加者的某些要求——較好的生活條件和較多的權利。在民眾情緒高漲的各港口城市，印共地方組織對於這種溫和的做法無疑表現出不滿。雖然海軍人員中的一些印共黨員在這次兵變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當政府在幾個月以後就此事進行正式調查時，印共中央領導卻聲稱，印共沒有參與組織這次叛亂，參加兵變的共產黨人完全是“獨自”行事的。^②

按照印度社會黨一位印共問題評論家瑪士·黎瑪耶的論斷，印共領導面對着人民日益強烈的不滿顯得“慌亂和手足無措”；由於採取了妥協路線，因此未能迅速看出採取比較具有戰鬥性的行動的機會，更不用說抓住這種機會了。據黎瑪耶說，印共“勉強跟在這些示威行動後面，呼喚建立統一戰綫”。^③

因此，印共在戰後初期所追求的不是革命，而是在印度國民中的威望。它顯然把競選看作是達到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並且對有權作為一個合法政黨參加競選感到相當滿意。但是它對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都抱着十分和解的態度。在總共一千五百八十五個省議席中，印共只提出一百零八個候選人；它還宣布在沒有印共候選人的地方，印共願意支持國大黨候選人競選一般議席，支持穆斯

① 有關這次兵變以及隨之發生的騷動事件的記載，見恩利奔德腊·那特·米德腊編：《1946年印度年鑑》（Nripendra Nath Mitra, ed., *The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46*）（Calcutta: The Annual Register Office, 1947），I, 285—329.

② *Towards a People's Navy*（《為建立一支人民的海軍而努力》）（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d. [1946 ?]），p. 18.

③ Madhu Limaye, *Communist Party: Facts and Fiction*（瑪士·黎瑪耶：《共產黨：事實與捏造》）（Hyderabad: Chetana Prakashan Ltd., 1951），p. 54.

林联盟候选人竞选穆斯林議席。^① 这样，印共就进一步表示出，它承认議会代表中的教派差別，并把穆斯林联盟看作是穆斯林教派的真正代言人——这种姿态恐怕很难博得国大党的欢心。

印共曾公开宣称它期望在省議會中获得二十五个席位；事实上它只获得八个議席，得票总数为六十六万六千七百二十三张。它只在四个邦(孟加拉、孟买、馬德拉斯、奧里薩)获胜，而且在它所获得的八个議席中，有七个是留給劳工代表的。印共仅仅获得全部选票的 2.5%，而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竞选中占了压倒优势。^②

然而，就得票多少而論，印共成为第三大党，而且鉴于它遇到的一个严重障碍——受到严格限制的选民抱有保守偏见——这个成就就更加令人鼓舞。在各省的选举中，有选举权的人大約只占成年居民的 14%，因为选民資格主要是根据财产和收入来决定的。^③ 此外，按照当时一位評論家的說法，如果实行比例代表制的话，印共不会只获得八个議席，而会是五十一个。^④

印共是第一次，而且又是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参加竞选的，它滿可以由于它的成就而得到鼓舞。而且，这个成就似乎还証实了战后所采取的約希路綫是明智的。但是，其他一些力量也在起着

① 见《印度共产党的竞选政策》(“Election Policy of Indian Communists”), *People's War* (《人民战争》), IV (Oct. 14, 1945), pp. 5 ff.

② 关于选举結果的概要叙述，见米德腊編：《1946年印度年鉴》(Mitra, ed., *The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46*, I, 229—232)。关于社会党对选举的分析，见阿索加·梅达：《印度的政治精神》(Asoka Mehta, *The Political Mind of India*) (Bombay: The Socialist Party, 1952), Appendix IV, pp. 82—89.

③ Masaldan, *Evolution of Provincial Autonomy...* (瑪薩耳丹：《1858—1950年印度地方自治的演变》), p. 109.

④ Mehta, *The Political Mind of India* (梅达：《印度的政治精神》), p. 89.

作用,这很快就将在印共的政策产生惊人的变化。

直接的国际指导

1946年3月以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刊物,无论是俄国的还是英国的,对印共提供的有益指导都比较少。但是,充当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主要顾问的英共官员R. 帕姆·杜德于3月间抵达印度。他是作为伦敦《工人日报》特派记者随同英国政府内阁代表团来到印度的,因此在印共同印度民族主义为求得全面政治解决而进行谈判的决定性的几个月里,他能够给印共以指导。

杜德的访印报道以长篇的《旅行札记》的形式连续发表在他的杂志《劳工月刊》上。就这些札记看来,杜德显然在一开始就肯定印共当前的战略——即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在“民族统一战线”中进行合作——是正确的,但是在策略上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虽然他也赞成建立一种包括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但是当他详尽地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极力主张共产党和国大党结成自上而下的联盟——这正是他向印共提出的建议的关键。他在对它们之间的分裂表示惋惜时写道:“由于在即将来临的时期中民族团结至为重要,人们希望这种嫌隙能够尽早消除。”^①

此外,他还以最富于同情、使人想起三十年代后期的那种气氛的字眼,把国大党描述一番。他指出,国大党“长期以来一直是团结印度进步民族主义运动中一切派别的主要组织”,并且得到“绝大多数印度人民”的支持。他虽然也指出国大党越来越受到印度大资产阶级的影响,但在这时却没有对印度大资产阶级的爱国主

^① R. Palme Dutt, “India and Pakistan” (R. 帕姆·杜德:《印度与巴基斯坦》), *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 XXVIII (March, 1946), p. 92.

义表示怀疑：他說，他們希望“打破英国垄断集团的羈絆”，“在一个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大规模地发展工业”。^①

杜德亲自为实现国大党和共产党的和解进行了努力。他采取了惊人的步骤，不仅直接向甘地和尼赫鲁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还向薩尔达尔·瓦拉帕伊·巴堆耳和 S. K. 巴底耳这样一些以敌视共产主义著称的国大党其他领导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記述訪問这些人的经过时說，他毫无例外地強調同印共和解的必要性。他向甘地表示，希望现存分歧能够得到解决，他并且設法消除这种普遍存在的想法：共产党人主张使用“秘密力量”，——在甘地看来，这是两党之間“不可逾越的障碍”。杜德在报道会见巴堆耳的情况时說，这位国大党的“强硬人物”“在同共产党人和解并埋葬过去的爭端这个願望上表示了最友好的态度”。^②

杜德进而推动他的印度同志修改策略，以便同国大党和解——而最重要的是从公开支持成立巴基斯坦的立場上脫出身来。他声称，“从进步的观点来看，印度的統一是人所共望，而分治則是反动的步骤”。^③他把穆斯林联盟关于成立巴基斯坦的要求說成是一种“反动的”策略，并且直言不諱地說，印共必須把自己的政策同穆斯林联盟的政策“区别开来”。他接着說，印共必須闡明，它要求印度十七个“民族”自决，同穆斯林联盟要求建立一个单一的穆斯林国家并非是一碼事。^④

杜德进一步提出了一項宪政方案，这项方案同竞选宣言中要

① 同上，pp. 91—92.

② Dutt, "Travel Notes Number 2" (杜德：《旅行札記(二)》，*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XXVIII (June, 1946), pp. 185, 188.

③ Dutt, *Freedom for India* (杜德：《給印度以自由》) (Lond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46), p. 15.

④ Dutt, "India and Pakistan" (杜德：《印度与巴基斯坦》)，pp. 88—89.

求按語言集团成立十七个主权国家的主张是完全矛盾的。杜德不顾印共关于成立一个由十七个制宪議會組成的邦联，而由各制宪議會派全权代表参加中央机构的方案，他建議成立一个由人民直接选举的中央制宪議會，它拥有决定印度宪政体制的“最高”权力。杜德說，在召集这个議會以前，英国应把权力移交給一个临时的印度政府，这个政府由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代表在平等的基础上組成，如果办不到，就由国大党的代表单独組成。^① 这样，他明显地表示了他对国大党的偏袒。

因此，在杜德看来，印共应当主张統一，至少暫時如此。但是，杜德在文章的其他地方又暗示，印共主张統一，与其說是真的，还不如說是表面的。因为，尽管他一方面表示，理想的制宪方案是建立一个“全印联盟”，但他又說，“我們这并不是預先解决”分治問題。“万一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一致要求成立一个以上的制宪議會[印度的和巴基斯坦的]，”他說，“那么，就應該自动地予以接受。”^② 換句話說，印共應該摆出中立的姿态，既主张統一但又不完全反对分治，而應該等待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間政治斗争的結局。

杜德的建議的第一个具体成果是印共4月15日向內閣代表团提出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的措詞是含糊的：它虽然也大談自决权，包括給印度各“民族”以“主权”，但又建議直接选出一个中央制宪議會来解决制宪問題。备忘录只字不提巴基斯坦而一味強調統一，声称印共“坚信印度人民群众一起留在一个共同的联盟內是符合他們的最大利益的。”备忘录同时还說，英国应把权力移交給由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平等的基础上組成的印度临时政

① 同上，pp. 92—93.

② 同上，p. 93.

府。^①

这样,由于这一备忘录的发表,印共就从它的竞选宣言大大地后退了,并且放弃了它关于成立邦联的主张。杜德本人儼然以恩人自居地对此加以贊許。他說,备忘录是“一个明确的、实际的、建設性的、而且是(这对共产党出版物說来是很少见的)簡明的文件。”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說备忘录“完全粉碎了”所謂印共支持穆斯林联盟成立巴基斯坦的要求的“神話”^②——这也許是透露了备忘录的主要目的。

共产主义运动对英国內閣代表团方案的反应

英国內閣代表团在与印度领导人进行了大約两个月的紧张談判以后承认說,代表团未能同国大党或穆斯林联盟取得一致意见。因此,代表团便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并于1946年5月16日加以公布。这个方案规定建立联邦制,中央政府的权力很小,它仅仅拥有外交、交通和国防三方面的权力;其他权力則归省政府。方案还规定,划几个省为一地区,在这种地区內成立中間一級的政府;这些地区相当于那些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这种安排可能滿足穆斯林少数的要求,以此代替真正的分治。^③但是,这种方案实际上是容許分治的,因为它赋予各省在一定时期后可以退出的权利。

尽管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都利用了方案中他們认为有利的部

① 备忘录全文載米德腊編:《1946年印度年鉴》(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46, I, 220—222)。

② Dutt, “Travel Notes Number 2” (杜德:《旅行札記(二)》), pp. 189—190.

③ 方案摘要載瑪薩耳丹:《1858—1950年印度地方自治的演变》(Masaldan, *Evolution of Provincial...*, pp. 176—178)。

分,但是不久便已看出,他們对这个方案都感到不滿。气氛愈来愈紧张;8月間,当穆斯林联盟在加尔各答发起“直接行动日”时,紧张气氛达于頂点,教派之間終於发生了暴力冲突。

在这紧急关头,苏联的印度問題发言人仍然两面討好。俄国杂志上的評論寥寥可数,只是把英国內閣代表团的方案說成是一个目的在于加强英国在印度的地位的帝国主义的新策略,并且談到国大党的进步分子反对这个方案,而且認識到它不会带来独立。^①

这样就只好让当时在印度的杜德向印共提供更为有益的指导了。杜德的《旅行札記》表明,他在英国內閣代表团寻求解决办法宣告失敗以后,便开始重新考虑印度的局势。他似乎对印度资产阶级的誠意越来越表示怀疑,而原先他对这个阶级的爱国主义倒是肯定的。他在报道他和印度的一位重要实业家 J. D. R. 塔塔晤談的情况时說,塔塔的看法表明,“印度大企业多么强烈地把美国资本主义看作是典范,而反苏宣传的影响又多么深刻。”^②此外,他还暗示說,大企业日益增大的势力正在影响着国大党,并且他还談到,塔塔現在已經从原先不过問政治的立場轉为“比較公开地傾向于国大党了。”^③

杜德在分析英国內閣代表团的方案时說,这是一个策略,主要是针对当时在印度而且也在全世界所出現的新的“人民的高潮”。他沒有明确說明这个“高潮”是什么,也沒指出印共如果要采取行动,究竟应采取什么行动。但是,从他在离印前所采取的最后行动

① “A New British Plan for India” (《英国对印度的新方案》), *New Times* (《新时代》) (June 1, 1946), p. 20.

② Dutt, “Travel Notes Number 4” (杜德:《旅行札記(四)》), *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 XXVIII (Sept., 1946), p. 287.

③ 同上。

之一——即大力支持謝克·阿卜杜拉及其“滾出克什米尔”的运动来看,就可以看出他当时所想的那个新办法。

謝克·阿卜杜拉是克什米尔最重要的政治組織——国民會議——的領袖。国民會議同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都沒有什么联系;尽管它的大多数成員都是穆斯林,可是它的領導却是亲国大党的。然而,謝克·阿卜杜拉却是倾向于采取战斗行动,而且就在英国內閣代表团在印度同国大党領導进行談判的时候,阿卜杜拉便发动了一个有力的群众行动运动。在“滾出克什米尔”的口号下,这个运动既反对克什米尔王公的独裁統治,也反对那里的帝国主义当局。杜德抵印后不久,便同阿卜杜拉通信,因此,杜德和印度共产党人很可能参加策划了这次运动。

不管怎样,杜德显然从这个运动中——这个介于革命行动和国大党克制政策之間的运动——为印度共产党今后所要采取的行动找到了一个榜样。在运动开始而阿卜杜拉随后被捕入獄后,杜德在旅行札記里称贊他是“各邦人民的最勇敢、最杰出的代表,”^①并在6月間长途跋涉前往克什米尔,在阿卜杜拉受审的审判室內同他进行了談話。杜德甚至会见了国民會議的地下領袖們——这对一个英国記者來說确是惊人之举。杜德在叙述他的克什米尔之行时說,“滾出克什米尔”运动是印度各邦中“最强有力的并且最富有战斗性的运动”,应该得到“最大可能的支持”。杜德见解的实质概括起来也許可以这样說:克什米尔是“印度爭取自由的斗争的政治风暴中心”。^②

① Dutt, "Travel Notes Number 3" (杜德:《旅行札記(三)》), *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 XXVIII (July, 1946), p. 219.

② Dutt, "Travel Notes Number 5" (杜德:《旅行札記(五)》), *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 XXVIII (Oct., 1946), pp. 321—324.

后来的事态表明，这些都不是空話。7月底，杜德从克什米尔回来前往英国途中曾在孟买停留，和当时正在开会的印共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簡短的会談；^①不久后，印共中央便通过了所謂的八月決議——这是印共政策的一次混乱不堪但却是根本性的調整。^②在阿提加利、兰納迪夫和高士領導下的印共激进派显然看到杜德的见解至少是部分地支持他們的比較具有战斗性的路綫，因此他們就比过去更为有效地推动中央委员会采納这项決議。但事实上，正如八月決議所表明的，激进派比杜德走得还要远，因此，它必然代表着印共党内的一股强大的潮流。

八月決議是激进派观点和溫和派观点的不协调的混合物，是約希派和左派之間的一个明显而又不稳定的妥协。两相权衡，左派观点毕竟占据上风，尽管这种观点由于矛盾重重而被冲淡了。特别是決議中有一段典型地說明了这个文件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段決議开头看来似乎是言之无心，其实不过是經杜德修改了的約希路綫而已：

国大党代表我国独立运动的主流。

穆斯林联盟有着广大的反帝的、爱好自由的穆斯林群众的支持。

而共产党領導着广大的有組織的工人和农民。

因此，为了开展这样一場决斗并保証斗争的胜利，有必要建立一个由这三个主要爱国政党——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共产党——和其他人民爱国政党組成的联合战綫。

但是，这段決議說了些客套話立刻就改变了腔調；它攻击代

① 同上，封底。

② 以下从“八月決議”中摘录的引文系引自以小册子形式发表的正式文本《准备总攻击：印度人民在印度革命现阶段的任务》（*For the Final Assault: Tasks of the Indian People in the Present Phase of Indian Revolution*）（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6），18 pp.

表印度資產階級的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的領導“妥協成性”。它說，一個聯合戰綫的建立只能

依靠發動群眾在不顧其領導的意見情況下毅然要求成立這個戰綫。

這個戰綫的建立要根據黨在日益廣泛的共同的群眾鬥爭中確立並擴大黨的政治領導的程度而定；要根據黨喚醒群眾，使他們對其領導的宗派主義、分裂主義和妥協性的政策不抱幻想，並且喚起群眾為反對英帝國主義的方案和爭取實現民族民主革命綱領的基本任務而鬥爭的程度而定。

決議最後號召“勇敢地 and 富有戰鬥精神地”領導工人階級的行動，從而走向政治總罷工作為奪取政權鬥爭的一部分；號召開展更為強大的農民運動；號召在所有的土邦中開展像克什米爾那樣的“具有廣泛基礎的鬥爭”。決議說，印共必須“主動出來成為印度革命這個新階段的組織者並領導這個革命走向勝利”。這樣一來，“革命”這個字眼便在印度共產黨的辭典中重新出現了。

事實上，新政策的關鍵論點就是認為印共面臨着“革命的高潮”。決議中的“革命的高潮”同杜德的“人民的高潮”二者之間顯然不同，說明兩條路綫的差別。

接着，決議一方面闡明它的主要論點說，印共現在必須奪取領導權，並且通過反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而實現反帝革命；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已經暴露出它心甘情願同帝國主義妥協，因而已經轉向反動。這種論斷是一種正統的、老式的左派主張，使人想起了1928年到1934年間的路綫；它意味着一種反資本主義的戰略，並且假定印度革命已經達到一個新的階段。決議拋棄了早先的政策聲明中特有的那種對資產階級表示關切的調子。

但另一方面，這種激進的論點卻又大大地被沖淡。首先，決議中有若干地方暗示，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領導應該施加影響而

不应予以排斥，言外之意是說这些领导人不是反动的，仅仅是动摇而已，而且还是可以理喻的。此外，決議有时并不是把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导說成是上述那样的资产阶级，而說它是“大资产阶级”，也就是說只有大资产阶级才是反动的。这两种暗示都是同反帝战略相一致的，并且都要求继续向资产阶级求助。

总之，八月決議在理論上非常含糊不清，因而印共很难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定出一条坚定不移的路綫。除非印共能就基本战略問題——即确定它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作出决定，否則它是制訂不出一个前后一贯的行动綱領的。

尽管杜德这个富有經驗的理論家似乎不大可能参預这个文件的最后定稿工作，但是文件中有好几处显然是受了他的影响。決議支持在他的命令下开始的那种企图，即宣布印共不支持穆斯林联盟成立巴基斯坦的要求，因为決議說，这种要求反映了“穆斯林资产阶级封建既得利益集团的政策，这个集团正在和帝国主义寻求妥协，以便在分裂的印度中分得一部分政权”。決議断言，支持国大党的人民群众“正确地反对在宗教和不民主的基础上分治印度，并且正确地要求建立一个单一的联盟”。決議仍然含糊其詞地要求給各民族以“自决权”，但它又說，穆斯林群众应当贊成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团结而“不以国大党接受成立巴基斯坦的要求作为先决条件”。它规定以建立“一个自願的联盟”作为目标。

杜德的意见在另一个地方也看得很明显：決議建議在各邦采取像克什米尔那样的群众行动，因而它表示印共已經把“滚出克什米尔”运动当作政治行动的榜样。事实上，八月決議发表几个星期以后，印共就发表另一个政策声明說，克什米尔要成为“今天爭取自由的斗争的中心”，并且断言那里已开始了“一种新形式的斗争”。声明批評了包括尼赫魯在內的国大党的领导，說他們企图压

制謝克·阿卜杜拉；它把尼赫魯对謝克·阿卜杜拉的告誡說成是“可怕的悲劇”；它还断言，克什米尔不能等待，因为那里正处在“战争状态”。^①

印共的分裂

八月決議仅仅是激进分子的部分胜利——而且是暂时性的胜利，因为 P.C. 約希及其追随者继续散布他們的温和方針。正如約希在后来的一段自我批評的談話中所承认的，他“利用了 1946 年 8 月決議的弱点以恢复过去的方針”^②。党内的分裂越来越严重，到了 1946 年底，中央办公厅内部似乎已完全失調了。以尼赫魯为首的过渡政府已在 9 月間就职，而在印共努力确定它对过渡政府的态度过程中，互相矛盾的声明却接二连三地不断出现。

在阿提加利发表的一项正式的政策声明中，激进派闡明了自己的立場；声明譴責了民族主义的領導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姑息者”，并且宣称印共必須为全国范围的总罢工鋪平道路，必須建立“印度人民为爭取独立和民主而进行最后斗争的革命团结”。因此，它实际上是建議对过渡政府展开全面斗争。^③

然而，几乎是在同时，印共又重新发表了約希在头一年 4 月所

① Romesh Chandra, *Salute to Kashmir* (罗米希·錢德拉：《向克什米尔致敬》)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6), pp. 22—23.

② 这段談話引自約希在 1948 年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放弃原来主张的发言，載于《1950 年 6 月 5 日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 P. C. 約希对开除他出党提出的申訴所作的決議》(“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on P. C. Joshi's Appeal Against Expulsion”, June 5, 1950) [typed copy] p. 4. 这是一个未經发表的党内文件。

③ G. Adhikari, *Resurgent India at the Crossroads; 1946 in Review* (G. 阿提加利：《在十字路口上的觉醒的印度；回顾 1946 年》)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d. [1947 ?]), 24 pp.

写的措詞溫和的致英國內閣代表团的备忘录——这个文件在八月決議发表之后本来是过时了的。^①此外，大約就在这时，新的制宪議会的共产党議員索莫那特·拉喜利提出了一个決議草案，要求印度人民“支持”过渡政府，他說这个政府得到“我国絕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应该变为独立印度的一个临时政府。^②阿提加利本人在为印共出版的拉喜利的提案而写的序言中，明显地向溫和派表示投降。因为，尽管他重申民族主义的领导在“姑息英国帝国主义者”，但是他却接受了約希所提出的民族主义的领导仍然可以接受影响的假定，并且断言，代表两大政党和各个次要党派的制宪議會能够“成为維持和表达印度人民意志的工具”。^③

阿提加利的投降显然反映了印共党內的总趋势，因为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約希的“效忠的反对派”方針占了上风。但是，当印共的地方組織冲破溫和派方針的約束而采取战斗行动时，左派观点偶尔也有所表现。特别是馬德拉斯的党組織，激烈地反对当地国大党新政府，因而在印共鼓动下在果耳登罗克、科因巴托尔、馬杜賴、維格腊莫辛加普腊莫等若干个城市发生了騷乱，造成五百五十名工人和工会領袖的被捕事件——其中有許多是印共的地方工作人員。^④1947年1月，馬德拉斯政府宣布印共在該邦是非法的，并且拘留了一百六十多名共产党人。^⑤

的确，某个地区的富于战斗性的左派观点十分强烈就足以造

①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 d. [1946 ?]), pp. 11—16. 这个小册子的序言是1946年12月8日写的；这个小册子可能是那个月发表的。

② 決議全文載于上述小册子，pp. 5—10.

③ 同上，pp. 2—4.

④ *People's Age* (《人民世紀》)，VI, (Sept. 14, 1947), p. 8.

⑤ 同上，V (Feb. 2, 1947), p. 12.

成一种真正革命形势。在海得拉巴邦，最显著的是在說泰卢固語的那耳貢达及伏隆古尔两地区(称为堆楞加那)，一个农民革命运动正在緩慢地形成，这个运动主要是由当地的印共領袖們所領導的。1947年間，游击战逐漸蔓延开来，局势变得越来越严重。尽管阿提加利有一次欢呼这个运动“第一次从根本上动摇了印度封建秩序的主要堡垒”^①，但是印共中央領導总的說来却对这次革命时机表示冷淡。

的确，尽管过渡政府对印共采取敌对行动，可是印共却仍然对过渡政府保持了效忠的反对派的方針。印度共产党弄到了英国的一些“絕密”計劃，这些計劃规定一旦发生重大的罢工或暴动就立即采取軍事行动。印共于1946年9月把这些計劃在党的报刊上公布了。^②紧接着在全国各地发生了粗暴的警察行动，这就清楚地說明，这些計劃是真的，而且泄露这些計劃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1947年1月14日，在十七个城市中进行搜捕；在这次搜捕中，印共办事处、外围組織的办事处以及重要的黨員的住宅均遭到搜查，据估計这是为了弄清印共是否可能还掌握其他的秘密文件。根据印共材料的記載，三十六名印共領導人被逮捕。^③共产党人公开承认了他們自己的罪行；約希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就說，“我們确实揭露了英国陸軍总司令部及其所属各軍区司令部制訂的某些秘

① G. Adhikari, *Resurgent India*... (阿提加利:《在十字路口上的觉醒的印度; 回顾1946年》), p. 14.

② 这些計劃是在一系列题为《爱国者手册》(“Patriot's Notebook”)的文章中被揭露出来的; 文章刊载在从1946年4月至8月的《人民世紀》(*People's Age*)上; 9月, 这些文章又印成小册子, 题为《“收容所行动計劃”》(*Operation Asylum*)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7)。

③ “Operation Asylum” and You (《“收容所行动計劃”同你的关系》)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7), pp. 22—25. 被捕者当中有《人民世紀》(*People's Age*)的編輯阿提加利和副編輯罗米希·錢德拉。

密軍事計劃”^①。印共声称，警察的镇压行动是得到印度内政部长薩尔达尔·瓦拉帕伊·巴堆耳和某些省的国大党政府的批准的；印共要求过渡政府洗清自己在“迫害”中的責任并惩办与所揭露的計劃有关的英国軍事当局。但是印共把攻击的主要矛头指向英国当局，声称搜捕是英国当局“发动、策划并組織的”。印共說，这次警察行动目的在于消灭民族运动的最富有战斗性的部分，以便“以后更好地反对国大党领导下的运动”。它特別称贊制宪議會中“国大党领导所发表的各項进步声明”，并且号召一切爱国印度人士参加反英的“共同事业”。^②

党内的分裂再加上这次镇压，进一步地使印共在印度奔向独立的最后的那几个月里丧失了战斗力。由于1947年初极关紧要的事件，共产党人变得分外消沉。他們不是全神貫注在关系着印度未来的中心問題上，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一些次要的枝节問題和事件上。在这期間，印共显然避免就制宪問題发表一項重要的政策声明，尽管近两年前发表的那个竞选宣言(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政策声明)大概早已过时了。

1947年2月，英国宣布說，至迟到1948年6月它将給予印度独立，并且着手和印度各民族主义的領袖恢复談判。印共此时看来已觉察到迫切需要赶上客观的形势，但它所作出的唯一反应却是针对杜德促使它注意的土邦問題而发的。现在印共声称它所看到的不是革命的时机而是英国控制各土邦的危險。印共說，英国的方案是要慫恿較有势力的王公不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統轄，然后把他們的土邦变成为英国控制这个次大陆提供經濟基地和軍事

① 同上，p. 14.

② 同上，pp. 4—7.

基地的“王公斯坦”。^①

但即使在这个問題上，印共仍然表示深信能够說服国大党的领导采取适应形势的正确的政策。約希說，国大党的錯誤在于“姑息王公”，但是人民的压力“能够而且一定会对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②

在这几个月里，印共始終对国大党扮演了一个朋友和溫和的批評家的角色。在談到联合国时，它极力贊揚以維札雅拉格什米·潘迪特夫人为首、主要由国大党党员組成的印度代表团；印共說，这个代表团是“我們的国家和人民的真正代表，它不是在英国指揮下而是为了印度的利益慷慨陈詞”^③。而且，印共在論述各省的形势的一系列的声明中，再次对国大党表示信任。这些声明通常是由印共各省委员会以备忘录的形式向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发出的；这些声明譴責省政府“批准警察的鎮压行动”或让“貪婪的既得利益集团自由行事”，并且呼吁国大党中央领导进行干預。而且备忘录一致暗示，說服国大党进行糾正是办得到的。^④ 例如，有份备

① *Down with Autocracy: Tasks Before the States' Peoples Movement* (《打倒独裁：各邦人民运动的当前任务》)。(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d. [1947?]), pp. 3-5. 又见罗米希·錢德拉：《王公斯坦——帝国主义未来的巢穴》(Romesh Chandra, *Princistan—Imperialism's Nest for Tomorrow*)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7), 15 pp.

② *Down With Autocracy...* (《打倒独裁：各邦人民运动的当前任务》)，pp. 4, 6.

③ Mohan Kumaramangalam, *India and UNO* (摩含·古瑪腊曼加拉莫：《印度与联合国組織》)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7) 序言。

④ 以小册子形式发表的一系列的声明如下：印度共产党安得拉委员会：《安得拉的地主-警察恐怖》(Andhra Committe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Zemindar-Police Terror in Andhra*)；S. A. 丹吉：《在国大党内閣統治下：血洗阿馬耳內尔》(S. A. Dange, *Under Congress Ministry! Blood Bath at Amalner*)；印度共产党德里委员会：《誰統治着德里？》(Delhi Committee, Com-

忘录說，“我們希望一个由尼赫魯先生亲自领导的人民政府会制止德里的官僚机构的这一政策”^①。

下面这个事实也許可以充分說明印共对印度整个形势所采取的溫和态度：印共安得拉委员会的一项声明甚至沒有提到堆楞加那的农民暴动，而不厌其烦地表示印共在安得拉的运动，除了一个小小的例外，完完全全是非暴力的。^②

因此，印共在这一时期的动向由于一方面轉向国际問題，另一方面轉向地方問題，从而使自己和印度独立的重大問題脫节；但是，無論在国际問題上还是在地方問題上，印共同国大党的关系，如果不是公然表示友好，至少也不是不可和解的。

苏联的拖延

印共在 1947 年上半年所发表的这些声明清楚地表明，P. C. 約希已經恢复了他对党的控制，但是这件事却严重地削弱了印共的力量。从他战胜了党内的激进派这件事看来，有一个现象恐怕是极为重要的，那就是不論是英共或苏共的声明，都沒有进一步支持“左傾反对派”举起革命的旗帜。

英共几乎是完全保持緘默；在杜德訪印后的那一年里，他主編的《劳工月刊》一直沒有刊登过有关印度的任何重要文章。俄国当局的态度也不比英共强多少，显然是暫時不願作出判断。1946 年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Who Rules in Delhi?*); 印度共产党加尔那达克省委员会：《加尔那达克的“貢达”》(Karnatak Provincial Committe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The "Goondas" of Karnatak*)。这些小册子是由孟买人民出版社在 1946 年底和 1947 年初出版的。另一本題为《特拉凡哥尔在陣痛中》(*Travancore in Travail*) 的类似小册子系由孟买市特拉凡哥尔保卫委员会出版。

① *Who Rules in Delhi?* (《誰統治着德里?》), p. 5.

② *Zemindar-Police Terror in Andhra* (《安得拉的地主-警察恐怖》), p. 9.

10月，E. 茹科夫在一篇关于亚洲局势的重要文章中虽曾提到“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高涨”，但却丝毫未表示印度局势有爆发革命的可能。茹科夫只是重复 R. 帕姆·杜德在6月发表过的那些论调，而对印共的八月决议却只字未提；他集中大部分精力来分析英帝国的政策。他说，英帝国对亚洲各地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策略是孤立比较富于战斗性的分子，然后同右翼力量达成妥协。因此，他说，帝国主义国家“在土耳其利用了基马尔主义的不断增强的反动倾向，在印度利用了甘地主义在民族资产阶级中间的影响，在中国则利用了反革命的国民党右翼的背叛活动。”^①

更坦率点说，茹科夫这段话的意思不外是暗中警告说英国企图同资产阶级国大党中的甘地主义右翼分子达成妥协，只不过是沒有指名提到国大党而已；茹科夫在文章中并未详细发挥，仅是提出警告说，英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以美国同菲律宾的关系为范本的，根据这种关系，后者只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处于美国的经济和控制之下。而且，引人注目的是，茹科夫并未提起印度资产阶级、甚至并未提起右翼人士已经准备同英帝国主义“妥协”。

以后的苏联报刊也并未发表什么评论来弥补茹科夫文章中的空白。大部分不过是搬出一堆陈词滥调而已。但是随着印度事态的发展，苏联代言人对尼赫鲁的过渡政府好像隐约表示了一点好感。像过去那样，季亚科夫称赞尼赫鲁是一个“左翼进步人士”，同时他还指出，出席联合国的印度代表团包括了“一些进步的领

^① E. Zhukov, "Velikaia oktiabr'skaia sotsialisticheskaia revoliutsiia i kolonial'nyi vostok" (E. 茹科夫：《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殖民地东方》)，*Bolshevik*（《布尔什维克》）(Oct., 1946), p. 43.

袖”。^① 1947年初，印度和苏联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苏联报刊就曾对这件事大加赞扬，把它说成是“印度走向独立自主政策的一个标志”。^② 苏联访印人士也纷纷著文祝贺两国的友谊。参加全印科学会议归来的 V. P. 伏尔金，强调印度政府对俄国的友好态度说：尼赫鲁曾盛赞苏联科学的蓬勃发展。而且，伏尔金还吹嘘说，他和 E. N. 巴夫洛夫斯基获得了科学博士名誉学位。^③

更值得注意的是 E. 茹科夫本人访问了印度，他是出席 1947 年 3、4 月间举行的亚洲会议代表身分前去的。苏联的评论一般都是赞扬这次会议对进一步巩固亚洲国家的真正独立所做出的贡献。^④ 但是，茹科夫在他的访问记里，则主要是强调当时的印共论点：英国人阴谋利用土邦做为维持他们对印统治的基础。他说，印度的“进步人士”害怕英国人即使在给予印度以正式的独立以后，也还能用这种办法来保持经济和军事的控制。^⑤

还有一篇苏联的评论指出“印度被分割成几个单独的国家”的可能。^⑥ 因此，这个次大陆在取得独立的过程中变得四分五裂的前

① A. Dyakov, "The Situation in India" (季亚科夫：《印度形势》), *Soviet Press Translations* (《苏联报刊译丛》), Feb. 28, 1947, p. 6. (译自 1946 年 10 月 21 日《真理报》。)

② "Establishment of Soviet-Ind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苏印外交关系的建立》), *New Times* (《新时代》) (April 18, 1947), p. 15.

③ "Eighteen Days in India" (《在印度的十八天》), *Soviet Press Translations* (《苏联报刊译丛》), April 15, 1947, p. 11. (译自 1947 年 2 月 2 日《消息报》。)

④ I. Platov,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Asia Conference" (I. 普拉托夫：《亚洲会议的成果》), *Soviet Press Translations* (《苏联报刊译丛》), Sept. 15, 1947, p. 95. (译自 1947 年 5 月 31 日《消息报》。)

⑤ E. Zhukov, "India: A Traveler's Impressions" (E. 茹科夫：《旅印观感》), *Soviet Press Translations* (《苏联报刊译丛》), II (Sept. 15, 1947) pp. 100—101. (译自 1947 年 5 月 12—16 日《真理报》。)

⑥ "One More Plan for India" (《另一个对印度的方案》), *New Times* (《新时代》) (March 7, 1947), p. 20.

景,在苏联的眼里,正像在印共的声明里一样,日益受到重视。

但是,除此以外,苏联对印度局势的解释仍然是很含糊的,它只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印度将成为一个“真正独立民主的国家”呢,还是像菲律宾那样的一个附庸。^① 6月初发表的一篇巴尔迪斯基所写的文章曾提到民族主义领袖们有采取进步政策的必要,并下结论说,“在不久的将来即可看出,当前的印度政策制订人、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领导人,是否都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②

这个“不久的将来”比巴尔迪斯基所料想的还要更近一些,因为在他的文章发表以后不到一星期,苏联就突然改变了它那长期以来的拖延态度。

第十二章 暴动的根源

1947年2月,英国政府毅然答应在十六个月内允许印度独立。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受命主持一次最后解决印度问题的会议,被派往印度,继魏菲尔出任总督。到了5月,次大陆的分治显然已成定局^③:穆斯林联盟对分治的要求是毫不动摇的;国大党的

① E. M. Lemin, *Britanskaia Imperia* (E. M. 列明:《英帝国》)(Moscow: Izdate'lstvo "Pravda", 1947), p. 31. 这本小册子是1947年5月20日的报告全文。

② N. Baltisky "Reply to Indian Readers" (N. 巴尔迪斯基:《答印度读者》), *New Times* (《新时代》)(June 6, 1947), p. 19. 关于苏联政策的详细论述,见琴·D. 奥弗斯特里特:《苏联对印度的看法,1945—1948》(Gene, D. Overstreet, *The Soviet View of India, 1945—1948*) (M. A.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Political Science, 1953)。

③ Alan Campbell-Johnson, *Mission With Mounbattan* (艾伦·坎贝尔-约翰逊:《随蒙巴顿出使记》),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 1953), Chapters 4, 5, 6.

領袖在公开的声明中，无可奈何地、憤懣地透露，除接受分治外，看不到其他出路。蒙巴頓就移交英国政权給两个政府的最后細节，同双方进行了紧急会談。

6月的第一个星期，所謂蒙巴頓方案得到了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双方领导人的同意。^①根据这个解决方案，那些决定不参加印度现有制宪議会的地区的代表，可以重新組織一个“独立的新制宪議会”——巴基斯坦。在方案公布的第二天，英国便宣布它定于8月15日正式让出政权。这样，所剩下的時間就只有两个月零几天了。这使得印度的两大政党沒有从事策划的时间；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新自治領势将突然面临一个难以逆料的前途。

苏联针对尼赫魯作出的决定

在这次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有迹象表明，莫斯科的对印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个迹象出现在1947年5月，当时，苏联的經济学家在一次會議上，辯論尤金·瓦尔加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所表明的观点。^②在論述殖民地的一章中，瓦尔加宣称，殖民地在經济上对帝国主义强国的依賴正在减少。他引証事实，說明某些殖民地的工业已有很大的增长，有时甚至是帝国主义統治者的債权人。这种符合印度情况的观察暗示，殖民地可以通过一个演进的过程获得独立。这确是一种异端邪說。就像十年前譴責

^① 这个方案包括在艾德礼首相1947年6月3日在下院所发表的声明中。哈罗德·艾薩克：《亚洲的新紀元》(Harold Isaacs, *New Cycle in Asi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47] pp. 137—143) 一书曾全文載录。原文见 Cmd. 7136, H. M. S. O., London.

^② Frederick C. Barghoorn, "The Varga Discuss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弗雷德里克·C. 巴洪：《瓦尔加批判及其意义》)，*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美国斯拉夫及东欧評論》)，VII (Oct., 1948), pp. 223, 232.

M.N. 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論一样,这种观点遭到了共产党人的无情攻击;同时,显然是在苏联领导集团的授意下,苏联经济学家召开了会议,以便诋毁瓦尔加。他因为流露出演化的观点而遭到非难,因为没有强调殖民地革命斗争的必要性而受到攻击。而事实上,这时英国人正准备在印度放弃正式的权力,因此苏联重新强调革命,既不现实,也有不祥的味道。

表明苏联对印政策有重大改变的另一个迹象,出现在苏联对蒙巴顿方案的初次反应中,这是刊登在《新时代》上的季亚科夫的一篇文章。^① 季亚科夫抨击这个方案是英国的阴谋,目的在于使帝国主义永远控制次大陆,并宣称,印度领导人在接受方案时,就已“背弃了他们过去的立场”。他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印度富有阶级的上层在向国大党领导人施加强大压力,强迫他们妥协。”他又说,印度的企业家希望同帝国主义做交易,以便分享国内市场,避免革命。

由此可见,这暗示,在苏联的新看法中,国大党代表印度的反动势力。不过,季亚科夫没有明白道破这一点,而是意味深长地留有余地。在另一处,在讨论到国大党接受蒙巴顿方案时,他说:

我们仍然无从得知国大党人的动机是什么,但是根据印度报刊的评论,我们只能这样判断:某些政治集团认为立刻同意一个至少能够部分满足独立要求的方案,总比让整个問題无限期地悬而不决有利。

根据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推断,季亚科夫认为至少某些国大党领导人是从善良的动机出发的。此外,他还赞许尼赫鲁的主张——印度制宪议会将作为一个主权机构行使职权,不受英国建议的限制

^① A. Dyakov, "The New British Plan for India" (A. 季亚科夫:《英国对印度的新方案》), *New Times* (《新时代》) (June 13, 1947), pp. 12-15.

制。季亚科夫的解释显然是暫定性的；既然他照旧认为国大党领导集团有进步的和反动的两翼，他就不可能明确地评价国大党作出的决定的意义。

然而，苏联的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是短期的。7月間，苏联第一流亚洲問題专家E. 茹科夫发表了一篇論述印度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新路綫誕生的信号，而苏联领导集团正是以这篇文章向尼赫魯发动冷战的。

茹科夫直截了当地說，现在的国大党领导集团代表印度大资产阶級(垄断資本主义)；它在同意英国的条件以求得政治解决时，就已走上了反动的道路。^①他說，国大党领导集团已向帝国主义投降，因为大资产阶級害怕群众更甚于害怕英国人。大资产阶級并不要求真正的独立，而是滿足于同英国人达成一項对双方有利的協議，这样，正式的独立就会由于帝国主义的經濟和軍事关系的繼續存在而受到限制。

茹科夫对待尼赫魯本人的态度，也許是表示苏联变心的最好說明。尼赫魯过去被看作是进步的民主主义者，而今天則被称为“有錢佬”，已随同巴堆耳之流的反动领导人向右轉。茹科夫說，尼赫魯目前支持反动集团向帝国主义投降。

不过，茹科夫又說，在国大党党员队伍中，仍然有进步分子。此外，他也用同样的話来評論穆斯林联盟，断言該联盟虽为反动的大资产阶級所控制，其中仍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因此，他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間所展开的大辯論中保持中立态度。不过，他暗中同意分治，因为他說，对穆斯林群众來說，成立巴基斯坦的主张具有不同的涵义，而与联盟的反动领导集团的想法不同。此外，

^① E. Zhukov, "K polozheniiu v Indii" (E. 茹科夫:《論印度的形勢》), *Mirovoe khoziaistvo...*(《世界經濟...》) (July, 1947), pp. 3-14.

他还特別贊許印共提出的印度“各民族”自决的綱領。按照这个綱領，每个語言集团可以自由参加联邦或保持独立。

茹科夫的文章的另一明显特点是強調工人階級的作用。他說，工人階級目前已成了反帝运动的領導力量。似乎为了进一步加强強調工人階級的重要性，茹科夫又說，对比之下，农民是落后的，由于不識字，由于种姓制度和农村中的封建残余，他們至今还没有动員起来。

总之，茹科夫建議采用反帝战略，去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封建主义和垄断資本主义。虽然根据这个战略的要求应当攻击尼赫魯政府，但是由于把这个政府和大資產階級視为一体，因而也就有必要采取一种溫和的綱領，这就是說，采取一种目的在于既吸引小資產階級又吸引中等資產階級的自下而上的統一战綫的策略。

考虑到 1947 年年中的国际形势，对印度局势所作的这番新解释，显然是为了适应正在抬头的苏联的冷战政策。新路線既认为印度将无法获得真正的独立，所以力图动員印度輿論去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即苏联在冷战中的对手英国和美国。此外，由于断定向帝国主义投降的只有印度的大資產階級，茹科夫的政策还企图把动摇中的資產階級拉过来。苏联当局有理由相信，英国在印度的投資势将继续阻碍印度資本的发展，因此，印度的企业家階級必然继续对帝国主义心怀不滿。无论如何，苏联当局显然认为，英国的势力必然会通过土邦王公而继续保持下去，这种局面就会使反帝情緒高涨起来。因此，即使在正式权力移交給印度新政府以后，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可以继续利用沒有得到滿足的資產階級民族主义。

由此可见，茹科夫在印度問題上采取上述立場的主要原因，大

概是想尽可能为反对西方强国的冷战斗争争取最广泛的支持。但是,这种立场也意味着对印度政府进行冷战。

共产主义大家庭中的辩论

苏联在支持还是反对尼赫鲁政府的问题上作出了决定。但是,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在支持还是反对资产阶级这一根本战略问题上,他们还没有作出一致同意的决定。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它将决定共产党用来向尼赫鲁进行斗争的纲领的性质,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印度学家的意见有着严重的分歧。

俄国 1949 年发表的文件表明,苏联科学院的印度问题专家在 1947 年 6 月举行过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印度的形势。^① 主要发言是由茹科夫作的。(显然,这次发言是茹科夫于 1947 年 7 月发表的上述文章的基础。)但是,季亚科夫与巴拉布谢维奇在发言中却持有根本不同的意见。两人都说,尼赫鲁政府不仅代表大资产阶级,也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后者也同样走上了反动的道路。

按照巴拉布谢维奇的說法,印度的分治是“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同英帝国主义交易的结果”。他宣称,“印度资产阶级和国大党领导集团已完全倒向反动和帝国主义阵营。”季亚科夫则说,印度的分治表明“在国大党领导集团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印度资产阶级,已在放弃自己的若干要求的基础上妥协了。”他宣称,目前的形势

^① *Uchenyi zapiski tikhookeanskogo instituta; Tom 2: Indiiskii sbornik* (《太平洋研究所学报》,第 2 卷,《印度问题汇编》)(Moscow: 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 SSSR, 1949), chapters 1, 2, 3. 根据汇编引文,茹科夫所写的论文已经发表。关于这次辩论和印共战后政策的详尽探讨,参见约翰·H. 考茨基所著《莫斯科与印度共产党》(John. H. Kautsky, *Moscow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New York: The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56), pp. 24 ff.

是“印度資產階級貪婪和背叛的結果；為了本身的利益，資產階級不惜犧牲祖國的獨立。”

應該注意，巴拉布謝維奇和季亞科夫對國大黨領導集團的譴責不僅是無保留的，而且還追溯到既往。巴拉布謝維奇說，在大戰期間，國大黨就已經“破產了”，而且在戰後的最初階段，“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的反動政策只是加強了英帝國主義的地位，使它得以進行陰謀活動。”季亞科夫以同樣的調子斷言，國大黨過渡政府在1946年就已經開始採取反動的路綫，“公然維護印度資產階級的利益”。不過，當時的蘇聯評論員都沒有採用過這種說法。

就像茹科夫一樣，巴拉布謝維奇十分強調印度工人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作用，只是偶然提到農民。他宣稱，工人階級已經證明它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影響愈來愈大；他認為，工人階級的鬥爭鼓舞了農民，哪里同城市工人保持最密切的聯繫，哪里的農民就最積極。巴拉布謝維奇雖然詳盡地敘述了1946和1947年罷工之類的無產階級活動，但實際上卻沒有提到共產黨領導的印度南部的農民起義，這一事件就發生在同一期間。不過，他以樂觀的語調結束自己就農民問題所說的那番話，他說，印度農村已“普遍地”慶祝五一節和十月革命周年紀念等節日。

巴拉布謝維奇在他發言的結尾說：

印度的勞苦大眾，在印度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印度共產黨——的領導下，為了完整的獨立，為了鏟除封建主義的一切殘余，為了人民民主，正在同帝國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反動聯盟進行堅決的鬥爭。^①

總之，季亞科夫和巴拉布謝維奇提出了一套同茹科夫路綫根本不同的戰略和策略公式：他們提出了反對資本主義的“三階級戰

^① 同上，p. 28.

略”来代替茹科夫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四阶级战略”。茹科夫的公式主张采用温和的纲领，作为反对尼赫鲁政府的基础，而季亚科夫和巴拉布谢维奇的公式则要求一种以革命为目标的非常激进的纲领。

这种基本分歧能在苏联科学院显然是为宣布对印度的新路线而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共产党人看来，对印政策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整个国际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问题上的争执，也许就反映了在整个问题上的争执。

显然，上述分歧并没有涉及中国共产主义的新理论对印度的关系，因为，依靠农民虽然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点，但是并没有一位苏联发言人特别注意印度的农民。此外，尽管季亚科夫和巴拉布谢维奇实际上是说印度已进入革命的较高阶段，但他们并没有根据斯大林主义为中国提出的公式断言这个较高阶段就是农民革命阶段。他们也没有把印度民族主义领导集团走向“反动”同国民党领导集团 1927 年的动向相比；如果他们联想到中国问题，他们就肯定会使用这一类比的。

因此，必须从其他方面探索印度问题引起争执的原因。看来，原因很可能就是“人民民主”这一新理论以及这一理论在殖民地的应用所引起的辩论。事实上，巴拉布谢维奇曾使用“人民民主”这个名辞来归纳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东欧建立的各共产党政权需要新的理论解释，因为这些政权同标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假说不十分吻合。由于俄国的占领，共产党人在这些政权中占据重要职位，但是他们并不享有全面的控制权。按照莫斯科心目中的国际和当地局势的要求，共产党人暂时容忍了资产阶级政党，并在逐步消灭城市

和农村资产阶级时采取了慎重态度。为了描述这些政权，不久就出现了“人民民主”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这一理论宣称，“人民民主”是一种新的过渡期的国家形式，它既不是资产阶级政府，也不是无产阶级政府。这种国家形式应用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机器，但为工农联盟的利益服务。此外，它的政策主要是反对外国资本（即反对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大地主（封建主义）。^① 总之，它采用了反帝国主义战略。

但是，到了1947年年中，以上关于“人民民主”的说法显然至少遭到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南斯拉夫党——的攻击。从南斯拉夫理论家后来发表的言论来判断，他们已经开始为一种更富有战斗精神的政策进行辩护。^② 他们并不说“人民民主”是过渡期的政权，介乎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相反，他们强调，为了向社会主义迈进，“人民民主”必须把这两种革命结合起来或“交织起来”。因此，南斯拉夫理论家要求采用一种更激进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反对整个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而不仅仅反对垄

① 《世界经济…》(*Mirovoe khoziaistvo…*) (March, 1947, pp. 3—15) 所载 E. 瓦尔加的《新型的民主》(E. Varga, “Demokratiia novogo tipa”) 一文中有这一理论的说明。并请参阅 C. E. 布莱克所编《当代东欧问题文选》(C. E. Black, ed., *Readings on Contemporary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Free Europe, Inc., 1953, pp. 71—92)。其中约瑟夫·雷维伊所写的文章特别清楚地叙述了“人民民主”理论的发展。

② 若干有关战后的南斯拉夫或东欧的著作都举出南斯拉夫党领导的“左倾”的例证；特别参阅汉密尔顿·菲希·阿姆斯特朗：《铁托与歌利亚》(Hamilton Fish Armstrong, *Tito and Goliath*),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51, pp. 57—59) 以及弗拉基米尔·德迪耶尔编《铁托的言论》(Vladimir Dedijer, *Tito Speaks*), (London: Wedenfeld and Nicolson, 1953, p. 304)。根据这些证据，弗朗茨·博凯瑙在《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Franz Borkenau, *European Communis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td., 1953, pp. 504—522) 一书中暗示，南斯拉夫代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派，甚至还影响了俄国的上层统治人物。

断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同时，他們建議，必須摧毀資產階級民主的制度，而代之以“蘇維埃式民主”的新形式，這種形式應由各國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①

南斯拉夫的領導人不僅在東歐的“人民民主”的性質問題上持不同意見，他們顯然也不盡同意世界其他部分的共產黨政策。這一點可以用他們在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攻擊法共和意共的事實來證明。但是，就目前的問題來說，更加重要的是，南斯拉夫領導人早在1947年年初就談出了自己對殖民地政策的看法，建議採取一種顯然同蘇聯當時的評論中表現出的騎牆態度完全相反的路線。愛德華·卡德爾於1947年1月在南斯拉夫黨的理論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宣稱，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反動”代理人。他說，許多殖民地的工人階級不僅走上擺脫帝國主義枷鎖的解放道路，也走上擊敗資產階級的道路。總之，正在走上“人民民主的勝利”的道路。同時，他暗示，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獲得這種勝利；各殖民地正面臨“動蕩和動亂”的前景，“反動的帝國主義力量同民主的反帝國主義力量之間將發生不同程度的劇烈衝突”。卡德爾斷言，在“三階級戰略”下，反帝國主義革命應該同反資本主義革命結合起來。這實際上是把南斯拉夫關於“人民民主”的看法應用於殖民地上。^②

① 這些觀點是從愛德華·卡德爾在9月召開的華沙共產黨情報局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摘出的。印度共產黨人曾在《共產主義者》(Communist, I [Jan., 1948], pp. 334—340)中發表了這篇報告的摘要。南斯拉夫同當時蘇聯在“人民民主”問題上的分歧，在卡德爾後來的著述中有所闡釋。特別參閱：愛德華·卡德爾：《論南斯拉夫的人民民主》(Edvard Kardelj, *On People's Democracy in Yugoslavia*), (New York: Yugoslav Information Center, n.d. [1949]), 97 pp.

② Edvard Kardelj,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 Marxist Analysis* (愛德華·卡德爾：《國際發展問題：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7), pp. 28, 32.

1947年6月中旬，俄国的印度学家聚集于莫斯科，季亚科夫和巴拉布謝維奇提出了一項战略公式，实质上，它同整整半年前卡德尔所提出的公式一样。这两位俄国人只字未提暴力革命的需要，但在别的方面，这两种观点簡直就沒有什么区别。与此相反，茹科夫的公式則同苏联对“人民民主”所下的标准定义相吻合，按照这个定义，敌人是大資產階級，而不是整个資產階級。

由此可见，关于“人民民主”的性质及其应用的辯論，同关于印度共产党政策的辯論之間有着直接关系。

印共起来拥护尼赫魯

当苏联印度学家举行會議的时候，印共中央委员会也在孟买开会。該委员会开会时显然一点也不了解莫斯科发生的事，因而就在尼赫魯問題上作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俄国譴責蒙巴頓方案，认为这个方案背叛民族主义事业，攻击尼赫魯政府接受了它，而印共实际上則宣称这个解决方案是向前迈进的一步，并保証支持尼赫魯政府。^①

印共的決議开头是照例批評蒙巴頓方案，宣称这个方案沒有給予印度充分的独立，企图在新的条件下尽量保持帝国主义势力。不过，決議肯定，方案的确体现了“重要让步”，提供了“民族进步的新机会”。因此，印共认为这个解决方案至少部分滿足了民族主义的要求。

接着，決議說，英国人希望通过封建王公和地主，通过同大企业的合作，保持在印度的势力，而王公、地主和大企业則在“国大党领导集团的极右翼”中有“莫大的势力”。不过，印共又明确地指

^① “Statement of Policy”(《政策声明》), *People's Age* (《人民世紀》), V (June 29, 1947), pp. 6-7.

出，背叛的右翼既不能支配整个国大党，也不能左右新政府：

国大党是主要的民族民主組織……。

共产党希望国大党领导机构迅速而始终不渝地执行国大党所宣布的反帝的民主綱領。

在民主基础上建立印度共和国的光荣任务中，共产党将同全国领导机构进行充分合作，为印度的統一开辟道路。

決議承认，促使蒙巴頓让步的原因是“国大党领导机构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接收政权”，而群众的压力也是原因之一。由此看来，印共认为占統治地位的民族主义中坚人物的誠意是沒有問題的。因此，決議号召“人民政府同一切人民組織充分合作，来完成民族解放和复兴及最后統一的崇高任务”。決議說，这种合作应该由一切“进步”力量——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左翼分子与印共本身——組成的“联合陣綫”来实现。

特別有意义的是，印共在決議中只是在口头上空談印度“各民族”的自决要求。6月決議的主要精神是希望团結——次大陆各种各样政治和宗教力量的团結。決議宣称，共产党“完全相信”，印度能以这种团結“决定性地击败帝国主义的阴谋”，并获致真正的民族独立。

由此可见，印度共产党对即将独立的前景的反应，恰恰同苏联的反应相反。印共的反应遵循了苏联前一时期的观点，但是，印共決議的語調說明，該党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国内那种既兴奋又焦虑的情緒的影响。这种情緒显然很强烈，甚至影响了共产党的激进派。B. T. 兰納迪夫在后来的自我检讨中承认，印共中央委员会的激进派同意了效忠的反对派的政策。他說，支持尼赫魯政府“这一修正主义偏向的严重程度，当时誰也沒有看出来”。^①

^① 见兰納迪夫在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1948年）上所作的关于共产党政策的

印共当时显然相信自己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步調一致的。这一时期的党内文件表明，印共沒有立即收到关于苏联新路線的通知。此外，印共的顧問 R. 帕姆·杜德也大力支持印度共产党人效忠主义的方針。6月，杜德就印度形势发表意见，簡直同印共的意见一致。^① 杜德先引証苏联当局的意见詳細評述蒙巴頓方案的各項弊端，他最后却說，方案使局面“大大前进一步”，它为未来的民主发展“开辟了道路”。他宣称，方案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被迫退却”。因此，他並沒有譴責全国領導集团接受蒙巴頓条件，相反，他号召印共同国大党合作：

当前形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說明，迫切需要努力弥合国大党和共产党过去阶段的严重分歧，以便在一个民主发展的共同綱領下携手前进，爭取获得充分的独立和全印最后的民主統一，滿足經濟、社会方面的要求和实现土地改革、国有化方案以及有計劃的工业发展。这一迫切需要也日益为国大党和共产党双方所認識。全印的工人、农民和群众正殷切期待去完成这些工作。

杜德的声明通篇的言外之意是說尼赫魯政府是进步的。事实上，他贊揚印度代表团在联合国的某些“大胆而进步的”主张，同时认为“苏联、印度和进步的民主国家”将在世界事务中起“联合领导作用”。既然同苏联联系在一起是共产党詞汇中最高的贊語，单单这段話就足以証明，杜德对尼赫魯政府領導下的印度的前途是乐观的。

印共翻印了杜德的声明，大概以为自己的路線因此也就合乎

檢討：《人民世紀：增刊》（*People's Age: Supplement*）VI（March 21, 1948），p. 4.

① R. Palme Dutt, “The Mountbatten Plan for India”（R. 帕姆·杜德：《蒙巴頓的对印方案》），*Labour Monthly*（《劳工月刊》），XXIX（July, 1947），pp. 210—219.

正統了。我們完全可以這樣相信，因為俄國人在好幾個月期間內沒有把反尼赫魯的新路線通知給印共。事實上，除了茹科夫的一篇文章以外，在科學院會議以後，俄國正式發表的評論，態度依舊不明確，簡直就像過去一樣。7月初，V. Ia. 阿瓦林在莫斯科發表公開演說，講稿隨即被刊登出來。他在这次演說中說，國大黨接受蒙巴頓條件是“為了在政治絕境中找一條出路”。他又說，國大黨害怕群眾運動，“受到那些準備同英帝國主義達成協議的分子的影響”。但是他沒有深入闡明這一暗示，也沒有用“反動”這個綽號去稱呼國大黨領袖。最後，他以不肯定的語氣說，我們不能不預料印度會“出現新的糾紛”。^①

季亞科夫在7月份的《消息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避而不談某些方面，因而尤其受到人們的注意。文章僅僅攻擊英國的政策，重彈蒙巴頓方案目的是要在次大陸上永久保持帝國主義勢力的老調。^②不過，迄今為止，季亞科夫的文章最清楚地說明了他們預計印度會在獲致正式獨立的过程中四分五裂。季亞科夫說，有七個土邦已經表示要保持獨立，並指出，這樣就會使印度聯邦分割成兩部分，被一些獨立的邦隔絕起來。因此，他宣稱，次大陸會變成“自治領和邦的混合體”。他說，甚至連那些願意加入自治領的土邦，也會“只是在名義上受其管轄”。

在印度的未來這一問題上，蘇聯的這一篇文章和前一時期的

① V. Ia. Avarin, Politicheskie izmeneniia na tikhom okeane posle vtoroi mirovoi voini (V. Ia. 阿瓦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太平洋地區的政治變化》) (Moscow: Izdatel'stvo "Pravda", 1947), pp. 8—19. 這是1947年7月2日的公開演說的全文。

② A. Dyakov, "The English Plan for the Partition of India" (A. 季亞科夫：《英國的印度分治方案》), *Soviet Press Translations* (《蘇聯報刊譯叢》), II (Nov. 1, 1947), pp. 201—203. (譯自《消息報》[*Izvestia*], July 5, 1947)。

文章的总的看法是，印度将成为一个仍然受帝国主义間接統治的巴尔干化的次大陆。

对共产主义来說，一个国家面临軟弱而分裂的前景，是发动革命的大好机会。誠然，当尼赫魯政府于 1947 年 8 月 15 日接收政权时，由于面临急待解决的一些难题，它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土邦本来在形式上各自为政；合并土邦的任务当然是极其艰巨的。但更重要的是，随着分治爆发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血腥內战；单为完成恢复和平的迫切任务，就耗尽了新政府的全部精力。

不过，印共根本沒有轉向革命，反而怀着日益高涨的热情宣布效忠政府。独立的前夕，印共宣称，它将“同全民一起欢庆独立日”，并将“同民族运动并肩站在一起去爭取完全的独立”。^① 印度共产党报刊在报道庆祝自由的群众集会与游行时，特別叙述了那些由印共、国大党以及其他“爱国”党派联合举办的集会与游行。印共刊物还特別报道了一次集会，当时的共产党和国大党演說者竟情不自禁地在讲台上互相拥抱。^②

印度共产党人竭誠效忠政府的态度，由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爆发內战而显然大大加强了。印共把这次內战說成是“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针对尼赫魯政府发动的“一次攻势”。^③ 但是，印共宣称，教派之爭的“社会基础是狹隘的”，通过进步力量之間的合作，会“迅速消除”。^④ 显然，印度共产党人当时簡直就不了解潜伏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深处的那种沒有理性的群众心理，而且很可能由于教派互相残杀的事实而惊慌失措，因为馬克思主义关

① *People's Age* («人民世紀»), VI (Aug. 3, 1947), pp. 1, 16.

② 同上, (Aug. 31, 1947), p. 9.

③ 同上, (Sept. 14, 1947), p. 1.

④ 同上, (Sept. 21, 1947), p. 4.

于人类动机的见解沒有能够使他們預料到这种局面。兰納迪夫后来解释說，教派风潮是促使激进派随同約希支持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政府的重要因素。^①但是，不管印共的反应是由于惊慌失措，还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这个党的合理的方針應該是設法在反教派的政治力量中起更大的作用。因此，約希破除一切顾虑，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宣布，印共要支持它們，他說：“全心全意地、热情地拥护它們并保証給予充分的支持，是我們全体的責任。”^②

为了表示效忠于印、巴两个政府，印共竟不惜压制前些时候它自己发动的群众运动。堆帕加运动就是个值得注意的例子。这个运动是印共一年前在孟加拉发起的，它体现了农民想多分农作物的要求。这个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但是，到了1947年秋，印共在孟加拉的最高领导人坡瓦尼·森却宣布：“我們呼吁农民今年不要像去年那样采取直接行动。”他解释說，新政府“一定要有通过法律途径履行其諾言的机会”。^③

然而，总的說来，愈来愈明显的是，印共并不是服从新的印度政府，而是服从一个人，即尼赫魯。10月，印共称呼尼赫魯是“人民的喉舌”，提議建立一条“从尼赫魯先生到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联合陣綫”。^④11月，印共敦促国大党基层黨員加强尼赫魯总理的地位以便“政府实行民主改組”。^⑤在尼赫魯生日这一天，印共送祝賀辞說他在过去数月中“独力維系住民族运动的民主传统”。賀辞淨是些頌揚的話，最后則热誠地希望尼赫魯成为“引导印度走上

① 同上，《增刊》(Supplement) (March 21, 1948), p. 4.

② P. C. Joshi, "The Punjab Riots" (P. C. 約希：《旁遮普暴动》), *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 XXIX (Oct., 1947), p. 315.

③ *People's Age* (《人民世紀》) (Nov. 30, 1947), p. 10.

④ 同上，(Oct. 12, 1947), P. 5; 及 (Oct. 19, 1947), p. 1.

⑤ 同上，(Nov. 30, 1947), p. 16.

社会主义和富强之路的第一位总理”。^①

由此显然可以看出，印共对待进步的尼赫鲁不同于对待政府的其他人士，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加强总理的地位来使政府开明化上面。据社会党领导人玛土·黎玛耶说，R.帕姆·杜德曾在一次谈话中，明白提出了这种策略。按照黎玛耶的说法，杜德曾在1947年11月的一次私人谈话中对他說：

你說，你要脱离国大党，这是不合时宜的、错误的。你不仅应该留在国大党内，而且应该鼓动共产党人重新加入这个全国性的组织。国大党目前已分成两个阵营，尼赫鲁先生、谢克·阿卜杜拉以及其他一些人士领导进步阵营，而反动阵营则由萨尔达尔·瓦拉帕伊·巴堆耳领导。支持尼赫鲁是我们大家的责任。如果尼赫鲁在他的内阁中给你们席位，你们应该欣然接受。^②

由此可见，印共及其指导人 R.帕姆·杜德几乎直到1947年年底还继续认为尼赫鲁值得左翼支持，会受左翼的影响。他们显然深信，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尼赫鲁总理会击败政府中的保守势力，而让进步分子占有掌权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莫斯科苏联当局已就尼赫鲁其人宣布了恰恰相反的定论（把他当作“有钱佬”而抛弃他，谴责他的政权是“反动的”）整整五个月以后发生的。

印共向尼赫鲁宣战

事实证明，印共激进派向约希的温和路线投降只是暂时的。左倾分子虽然由于国内的教派之战而显然有所收敛，但在获得独立以后又很快变得难于驾驭了。约希的路线依旧是印共正式奉行

① 同上，(Nov. 9, 1947), p. 3.

② Madhu Limaye., *Communist Party: Facts and Fiction* (玛土·黎玛耶:《共产党:事实与捏造》) (Hyderabad: Chetana Prakashan Ltd., 1951), p. 57.

的路綫，但是，約从 8 月中旬起，兰納迪夫的文章就常常出现在印共的刊物上，可以說是在約希的抒情詩旁边响起了刺耳的音調。比方說，在印共庆祝独立日声中，兰納迪夫就在《人民世紀》上警告說，尼赫魯政府“正在妥协”，而且正在“发展独裁的特性。”^①

人們只能猜測印共內部再次出現激進情緒的真正原因。然而，8 月中旬在印共刊物上開始有另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露面，這種力量肯定要激起戰鬥精神，這也許不是偶然的巧合。印共理論刊物《共產主義者》第三期（大約是在 8 月 15 日發行的）開始登載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所寫的文章。^② 根據印共領導人後來的証言，可以看出，印共當時已經注意到卡德爾論述共產黨在殖民地的政策的那篇過激的文章。的確，到了 1947 年年底，印度共產黨人就以小冊子的形式發表了這份文件。^③ 卡德爾的觀點是，資產階級總的說來已經走上反動的道路上，必須以暴力革命去對待。印共的激進分子大概就從這種觀點中得到了鼓勵，他們為了推翻對尼赫魯採取的那種不適當的效忠的對立派政策，正需要這種鼓勵。

不過，在激起印共的激進情緒方面，國內因素也起了作用。這時，激進情緒已得到黨內更廣泛的支持。首先，很可能，印共的老黨員都習慣於鬥爭，不能斯斯文文地在自由印度扮演效忠的對立派這一角色。其次，全體印共黨員顯然有一種傾向，往往把他們在黨的許多群眾活動中所碰到的困難都歸咎於約希路綫。印共已經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着國大黨和社會黨的組織家在長期監禁

① *People's Age* (《人民世紀》), VI (Aug. 15, 1947), p. 20.

② “Character of the New Democratic State in Yugoslavia” (《南斯拉夫新民主國家的性質》), *Communist* (《共產主義者》), I (Sept., 1947)。這是一篇轉載的社論，原載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共產黨人》(*Communist*) (Jan., 1947)。

③ 見 320 頁注②。

后恢复活动，印共在工会、农民、学生和妇女运动中的实力就逐渐减退。这时，印共在这些方面正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例如，在工会方面，印共眼看着建立起一个对立的联合组织——印度全国工会大会。这是国大党发起的组织，目的显然在于同共产党控制的全印工会大会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指望共产党的劳工领袖会为了实行忠于国大党政府的政策而欣赏那种左脸挨打连右脸也伸过去的精神。印共在这个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坚强分子，自然要求采取一种比较激进的政策。此外，印共的基层党员可能已经开始比较深刻地感觉到，在印度的混乱不安的政治局面中已出现各种革命的可能性。

不过，印共党内对约希的温和政策感到不满的主要原因，无疑是更富于战斗性的路线在堆楞加那获得成功树立了榜样。如前所述，堆楞加那在海得拉巴士邦的东半部，计有八个区，占地四万四千平方哩，居民主要是说泰卢固语的人。在海得拉巴的邦主的专制统治下，这里一直实行一种残酷压榨的半封建土地制度，其结果是农民都准备接受激进的领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堆楞加那的共产党人控制了安得拉大会。它过去是一个性质温和因而为邦主所容许的文化政治组织。堆楞加那的共产党人就以控制这个组织为起点，集中力量于那耳贡及瓦伏隆吉尔两区，逐步发动了一个真正土著的反对地主和土邦专制的群众运动。到了1946年年中，这个运动在若干分散地区已发展到实际暴动的地步，开始组织农村武装志愿队，以反抗邦主的统治。形势很明显，农村纷纷起义的连锁反应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直到这时，共产党人一直在宣扬有节制的目标。在印共中央领导集团的指示下，他们并没有鼓励公开的暴动。他们的要求仅限于废除地主强加于人的“非法的苛捐杂税”和其他过火的做法。不仅如此，他们还保证支持海得拉巴

加入印度的主張；至少他們在表面上還同土邦的國大黨組織保持合作的关系。由此可见，共产党的政策在于反对土邦的专制，而不是要反对中央政府。但是，泰卢固族浓厚的地方主义，再加上农民的不满情绪，却造成了对中央政府发动进攻的大好基础。^①

不管原因是什么，一种激进的倾向已开始印共内部再度出现，約希发现自己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党内有人攻击他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把过多的支持自己的亲信——其中有許多是刚从英国大学归来的青年——安插在党机构的重要位置上。^②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倾趋势的消息传到印度时，印共内部一个日益壮大的派系便急欲利用这个趋势，以便据以推翻約希和改变党的路线。

显然，关于激进的国际路线的第一个明确声明，是通过关于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的新闻报道传到印度共产党人手中的；这次会议是1947年9月在波兰举行的。日丹諾夫在会上所发表的主要演说，向印度的激进派提供了额外支持。日丹諾夫断言，帝国主义国家的日益衰弱加剧了“殖民制度的危机”。他说，处于绝望境地的帝国主义国家，依靠几种方法去维持殖民地对它们的从属关系。它们曾经力图用武力摧毁民族运动，制造了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进行的那种殖民地战争。或者，它们捏造赤祸的说法，用来证明它们应当继续当政。他说，“他们企图用这种办法使印度和中国继续处于帝国主义底统治之下，继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处于被奴

① 这里所述的堆楞加那的情况，主要是根据以下资料：《关于堆楞加那起义的报告》（“On Telengana”）（Information Document No. 7 [2]）（Politburo,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Oct. 7, 1950），pp. 1—5；《海得拉巴问题：下一步》（*The Hyderabad Problem: The Next Step*）（Bombay: Hyderabad Struggle Committee, Socialist Party, 1948），pp. 70—77。

② 根据在印度同一位前印共党员的谈话。

役的地位”。他宣称，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工人阶级底主要危险……在于低估自己的力量，高估敌人的力量”。因此，各国共产党必须领导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在一切方面的扩张和侵略”。^① 日丹诺夫所说的有关印度的话就是这些，但是印共的激进派断定尼赫鲁政府已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把日丹诺夫的演说解释成武装起来反对尼赫鲁政府的号召。^②

实际上，日丹诺夫的确曾认可在殖民地加紧反帝国主义运动，而在俄国看来，这就意味着对尼赫鲁政府发动进攻。但是，日丹诺夫并没有公开同意一种全面的反资本主义战略。事实上，他在结束演说时还强调共产党的“民主”目标，而且他没有明白指出资产阶级已变为反动。

但是，印度激进派从这次会议的另一篇演说中，即卡德尔发表的演说中，听到反资本主义战略显然得到了承认。卡德尔在发言中有力地阐述这样的观点：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交织在一起”，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对整个资产阶级发动进攻。印共激进派热切注意的正是这篇演说。印共机关刊物曾转载这篇演说的摘要和铁托元帅在南斯拉夫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主要报告的某些部分。^③ 根据阿约艾·高士后来在党内就这段时期的情况所作的说明，印共激进派把卡德尔看作是俄国以外的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高士说，卡德尔的著述“极其有力地影响了我以及其他为反对约希主义而进行斗争的人”，兰纳迪夫欢呼这些著述

① 安·日丹诺夫：《国际形势》。见《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北京版，第13、16和35页。

② 根据在印度同一位前印共党员的谈话。

③ *Communist* (《共产主义者》), I (Jan., 1948), pp. 313—319, 334—340.

“向我們指出正确的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①

南斯拉夫对印共的影响,显然由于另一件事而加强了,即印共的主要劳工领导人 S. A. 丹吉前往布拉格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某次会议。我们对丹吉的活动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在东欧和苏联旅行。但是他在归国后显然成了南斯拉夫路线的传达人。R. 帕姆·杜德后来就说他是印共中“铁托政治影响的主要传播工具之一”。^②既然丹吉必然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领导人取得了联系,那么,看来很可能,在印度采用“铁托”路线的主张曾得到这些领导人的批准或至少是默许。

无论如何,从印共的行动来看,它就好像已经取得国际方面对新路线的最后认可一样。1947年1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印共中央委员会在孟买开会,激进派向约希挑战。如果激进派还需要其他论据来支持他们的反对立场的话,他们可以在以下这一事实中找到:仅仅在一个星期以前,孟买国大党政府——约希曾号召印共作为这个政府的效忠反对派——竟然宣布对共产党报刊的内容加以严格的限制。^③但是,激进派早已有所准备,兰纳迪夫为自己的路线找到了多数的支持,遂取代约希而成为共产党的实际领袖。

印共中央委员会在一项新决议中宣布彻底改变党的路线。^④

① Prabodh Chandra [Ajoy Ghosh?], "On 'A Note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Our Party'" (勃腊波特·占德腊 [阿约艾·高士?]: 《论〈关于我党当前情况的意见〉》), *PHQ Open Forum* (《总部党组公开论坛》), No. 12 (Oct., 1949), pp. 3-4.

② Deven and Bal Krishna, "Talks with Comrade R. Palme Dutt and Other Impressions Gained Abroad by Deven and Bal Krishna" (堆文与巴耳·格利什那: 《堆文与巴耳·格利什那同 R. 帕姆·杜德同志的谈话及在国外获得的印象》), *PHQ Unit*, Jan. 6, 1951, p. 4.

③ *People's Age* (《人民世纪》), VI (Dec. 7, 1947), P. 1.

④ *Communist Statement of Policy: For the Struggle for Full Inde-*

約希和杜德曾推断，尼赫魯政府会受到群众压力的影响，甚至还可能改組，延攬左傾力量，決議斥責这一推断是“机会主义”。与此相反，決議号召对尼赫魯政府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決議根据日丹諾夫的論点，即世界现已分成两个敌对的陣营，宣称，尼赫魯的政策“只能导致向英美帝国主义陣营屈膝的后果”。決議說，印度的大企业已同帝国主义妥协，資产階級政府正在支持这种“反动的”政策。因此，決議最后說，“資产階級的全国领导集团将被迫愈来愈屈从于帝国主义統治，而普通的劳苦人民也将被迫服从上层階級的領導，即服从全国的领导集团。”为了对付这种形势，決議号召“工人、农民和进步的知識分子”团结起来，掀起一次运动去推翻資产階級的領導。

因此，就印共來說，在 1946 至 1947 年間进行的长期辯論——拥护还是反对尼赫魯政府，拥护还是反对印度資产階級——到此算是結束了。印度共产党人已作出了重大决定，要在彻底的反資本主义的方針下，对尼赫魯发动一次全面的政治进攻，尽管他們似乎还没有了解这一决定的全部意义。于是，冷战蔓延到印度。

俄国的院士們早就在关于尼赫魯的辯論中取得了一致意見，但是迹象表明，在 1947 年年底，甚至在以后，他們还没有就辯論的第二部分——拥护还是反对印度資产階級——取得一致意見。1947 年 12 月和 1948 年 1 月，茹科夫、季亚科夫和巴拉布謝維奇在俄国刊物上詳尽地发表了他們自己的意見。在这些意見中仍然找不到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所应采用的一致同意的战略。

茹科夫在 12 月份的《布尔什維克》上說，总的說来，在殖民地中同帝国主义妥协，从而背叛民族利益的，是大資产階級，因此，他

pendence and People's Democracy (《共产党政策声明：为爭取完全独立和人民民主而斗争》)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7), 14 pp.

宣称,在亚洲的“許多国家中”,中等資產階級可以成为工人階級的同盟軍。茹科夫把这个論点应用于正在进行殖民地战争的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之类的国家,而没有明确地应用于印度。实际上,在論述印度时,他的关于資產階級的意见是模棱两可的。他譴責“印度資產階級”在国际事务中一心追求中立主义,而在后一段中又宣称“資產階級民族主义者”或“民族改良主义者”是英国在印度的“第二道防綫”。但是在規定印共的任务时,他甚至根本不提反資本主义的战略,反而似乎在強調印共力量比較薄弱,就像在告誡印共不要犯革命冒险主义的錯誤。^①

季亞科夫和巴拉布謝維奇兩人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場,认为資產階級已經变得反动了。^② 不过,巴拉布謝維奇还是表现出他是跟在事件的后面,而不是預見事件的发展。因为他說蒙巴頓方案体现了一次真正的让步,因而对印度說来是“前进的一步”。这种說法正是約希路綫的回响,同巴拉布謝維奇自己的分析显然不調和。这个事实,連同茹科夫不願明确表示态度,似乎足以說明,俄国人还没有针对印度形势得出一个一致同意的战略。姑不論有意还是无意,其結果是,指导印共的任务便落在共产党情报局的肩上,从而也就落在南斯拉夫人的肩上。

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

不管有没有取得俄国当局的明确批准,兰納迪夫派的激进分

^① E. Zhukov, “Obostrenie krizisa kolonial’noi sistemy” (E. 茹科夫:《殖民体系危机的加剧》), *Bolshevik* (《布尔什維克》) (Dec. 15, 1947), pp. 51—65.

^② A. Dyakov, “Partitioned India” (A. 季亞科夫:《被分治的印度》), *New Times* (《新时代》) (Jan. 14, 1948), pp. 3—10; V. Balabushevich, “Indiia posle razdela” (V. 巴拉布謝維奇:《分治后的印度》), *Mirovoe khoziaistvo* (《世界經濟》) (Dec. 1947), pp. 41—63.

子现在终于控制了印共中央委员会。他们开始以派别活动的罪名清除党机构内所有赞同约希路线的人。不仅如此，为了使自己的控制合法化，为了动员全党支持新路线，他们决定召开一次全印共产党代表大会，即印共有史以来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12月会议——指派了一个小组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详尽的政治决议草案，以便在印共内部分发传阅；会议还拟定了一份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选人名单，以便提交代表大会。随后，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便回到自己所属的地区，匆匆召开省一级的共产党会议，讨论决议草案，选举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就是这样，在上级强有力的指示下，党的机器便迅速而有效地把整个组织团结起来。1948年2月28日，也就是12月作出决议仅仅两个半月以后，共产党代表大会便在加尔各答召开了。^①

参加会议的都是共产党的核心人物。根据共产党刊物的报道，在出席大会的六百三十二名代表中，有五百六十五名是“专职干部”或“职业革命家”——党的工作者和组织者。《人民世纪》说，总共选出了九百一十九名代表，但许多代表未能出席大会。据说，堆楞加那原有七十五名代表要到加尔各答去，但能够成行的只有四、五人。据党的刊物报道，参加大会的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缅甸、锡兰以及南斯拉夫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英国共产党和苏联都没有正式代表参加大会。

后来党内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记载表明，来自澳大利亚、缅甸和锡兰的同志仅仅是消极的旁观者，而南斯拉夫的代表弗拉基米尔·德迪耶尔和拉多文·索科维奇二人则极其活跃，好像他们

^① 下面有关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进行情况的说明，主要是根据印共机关刊物《人民世纪：增刊》（*People's Age: Supplement*），VI（March 21, 1948），（March 14, 1948）所刊正式报告；这次大会是在秘密中举行的。

就代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样。据阿約艾·高士說，他們用那套在反資本主义的战略下把两种革命“交織起来”的理論教导了印度代表。他們还在代表大会上为在印度按照南斯拉夫党所創造的体制建立一条由共产党领导的坚强陣綫的策略辯护。某些印共领导人認識到，由于印共实力不强，这种策略在印度是行不通的；正如高士所說的，“否則，我們就全部接受了南斯拉夫夫人對我們所說的話”。高士还說，澳大利亚的夏基同志也不反对我們採納南斯拉夫的意见；誰也沒有提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論。^①

兰納迪夫完全全拿南斯拉夫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路綫的基础。他从一开始起就控制了代表大会。會議的第一件大事是他作了关于決議草案的报告；这个报告就确定了大会的基調。兰納迪夫宣称，印度資產階級已經站在同苏联所领导的民主陣营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的英美帝国主义陣营一边。他說，因此，印度共产党必須领导爭取“人民民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爭取民主的斗争“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交織在一起”。換句話說，印度共产党必須领导“为团結大多数人民反对資本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說，党必須建立一条“人民民主陣綫”，体现工人階級、农民、小資產階級以及进步的知識分子所結成的自下而上的同盟。

除了背誦反資本主义的战略以外，兰納迪夫强烈地暗示，在应用强暴的术语的同时，他还要在某些地区应用强暴的策略。約希领导集团忽視了堆楞加那的农民起义，兰納迪夫却抓住了这个机会，认为农民起义是共产党正进入新阶段的象征。他說，在堆楞加那，“我們以出色的組織工作，使斗争在性质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① Prabodh Chandra, "On 'A Note...'," (勃腊波特·占德腊：《論〈关于我党当前情况的意见〉》）， p. 5.

最后，他宣称，“堆楞加那就意味着共产党人，而共产党人也意味着堆楞加那。”

在代表大会的第二篇主要演说中，即将成为兰纳迪夫主要助手的坡瓦尼·森进一步说明了新策略。这篇演说对印共在1942—1948年间所奉行的民族政策作了重大修改；印共这时宣称，民族自决权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革命行动来实现，而不是依靠某一民族的全体成员来实现。坡瓦尼·森着重指出，堆楞加那为印共政策提供了新的榜样，他谴责前一时期的以克什米尔事件为代表的政策，党在那里支持了谢克·阿卜杜拉的亲印运动，甚至支持克什米尔正式加入印度而不加入巴基斯坦。不仅在那些还没有正式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的土邦中，即使在整个次大陆，都必须首先进行革命。

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办法是在战场上。英雄的堆楞加那人民和他们反对专制的伟大榜样，不仅告诉我们各邦内部将发生什么情况，同时也指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真正前途是什么。这正是胜利的人民走向自由和真正的民主的道路。……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里至少存在着将赢得印度解放的力量。^①

事实上，拥护堆楞加那运动的情绪是那么强烈，以致来自那一地区的几位代表竟能使大会自动通过一项决议，表示完全支持他们的运动。

在大会的主要报告之后，由被免职的共产党领袖 P. C. 约希作了一小时的发言，照例自我检讨一番。他承认他作了“叛徒”、“懦怯者”、“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分子”、“典型的官僚”和“右倾改良主义的化身”，使党“混乱和腐化了”。他否定自己作为领袖的全部

^① *People's Age: Supplement* (《人民世纪：增刊》)，VI (March 21, 1948), p. 3.

事业，甚至說自己在开始时不过是“一个知識分子学生，由于历史的偶然因素，才置身于党的領導位置”。^①

不过，当前届中央委员会提出新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候选人名单时，約希的名字也同多数上届委員和数目大致相等的新候选人出现在名单上。但是，出席大会的代表显然都被約希的自我譴責所說服，因为在正式的候选人中，只有他一人沒有当选。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立刻推选 B. T. 兰納迪夫担任总書記，从而使两个半月以前发生的变化合法化了。

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进行的其他事务，包括对领导机构提出的主要政治決議案——“政治提綱”——进行長時間的辯論。在党内就前一份草案进行討論后，起草委员会已經把修正意見納入这项決議。但是，根据共产党刊物的报道，大会代表們还是“热烈而坚定地”，进一步批評了这一文件的細节。討論結束时，兰納迪夫要求大会不加修改地通过決議案，并委托中央委员会事后根据代表們所表示的意見予以修正。这个建議被接受了，于是決議案得到一致的通过。后来发行的小册子政治提綱长达九十五頁，对新路綫作了全面的說明。^② 就要点來說，提綱宣称，“革命的高潮”已在印度出现，革命的最后阶段，即“武装冲突”的阶段，已經到来。提綱說，这场“人民民主革命”既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也要同时建設社会主义”。党必須动員工人階級、农民和小資产階級去反

①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on P.C. Joshi's Appeal Against Expulsion” (《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 P.C. 約希对开除他出党提出的申訴所作的決議》), June 5, 1950 [typed copy], p. 4.

② *Political Thesis; Adopted at the Second Congress, Calcutta, February 28—March 6, 1948* (《政治提綱：1948年2月28日至3月6日在加尔各答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Bombay: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48), 95 pp.

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据这个提綱，尼赫魯政府是代表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必須建立一条新的民主陣綫，即“由群众組織起来的真正战斗同盟”，去进攻这个政府。

如果对这份文件的具体含意还存在任何怀疑的話，那么，在辯論过程中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所发表的一项具体声明就使大会代表們释疑了。这项声明的大意說，“人民民主国家”恰恰就是指“无产阶级专政”。印共已經表明，它决心进行正統的革命去反对尼赫魯政府。

后来发生的事件說明，有这种意图的还不单单是印度共产党人。1948年，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共产党也采取了革命道路；在緬甸、馬來亞和印度尼西亚都爆发了激烈的內战。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揣測(沒有明显的根据)，这些暴动是由莫斯科在东南亚青年會議上向各国共产党所传达的具体命令引起的；这次會議几乎就在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时，在加尔各答举行的。^①俄国的客人随同巴基斯坦、緬甸、印度尼西亚、馬來亞、越南、菲律宾、北朝鮮和南朝鮮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更加重要的也許是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出席，他們是为参加印共代表大会而来的。既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以权威姿态对印度共产党人发言(姑不論这种权威是他們的国际威望的产物还是共产党情报局的明确批准的产物)，他們也很可能以权威姿态对东南亚其他共产党发言。正如P. C. 約希在后来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所表示的，印共领导集团是“在鉄托的南斯拉夫代表团亲自向我党代表大会指出的策略路綫

^① 关于这种揣測的簡述和意見，參閱約翰·H·考茨基所著《莫斯科与印度共产党》(John. H. Kautsky, *Moscow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pp. 33—34.

的基础上，” 指导堆楞加那农民革命的。^① 南斯拉夫的指示促成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共产党的游击战式的革命，这至少是有可能的。

緬甸共产党的总書記丹东参加了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在向大会发表的一篇演說中露骨地提到了緬甸的革命。他說，緬甸的共产党人正在竭尽一切努力避免內战，“但是，如果民族資产階級在英美人的支持下坚持要打，那么，我們就跟他們打”。他在結束演說时宣称，“同志們，对解放运动來說，1948 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它将决定东南亚解放运动的命运。”^②

姑不論 1948 年对亚洲其他共产党是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印共倒开始面临空前的危机。

第十三章 冒险主义的后果

B. T. 兰納迪夫带着党代表大会指示他发动革命的命令，搬进了印共孟买总部的总書記办公室。首先，他有責任动員全党，在印度各地发展堆楞加那式的农民暴动。然而，不久便已看出，兰納迪夫还没有一套同他的革命辞句相适应的革命行动計劃；同时，印共虽然发出信号要采取暴力行动反对尼赫魯政府，但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足以执行这种任务的全国性組織。因此，紧跟着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的那段时期，只能是准备行动的时期。

兰納迪夫首先关心的是，彻底清洗党机构中，特别是約希显然

① P. C. Joshi, *Problems of the Mass Movement* (P. C. 約希: 《群众运动的問題》) (Allahabad: Adhunik Pustak Bhandar, n.d. [1951 ?]), pp. 76—77.

② *People's Age* («人民世紀»), VI (March 14, 1948), p. 10.

还有影响的党总部中那些支持約希的人。党总部的成員在印共組織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他們不仅掌握党的活动工具，而且能够接触关于党务的最詳尽的情报。因此，兰納迪夫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確保他們忠于自己，而他使用的方式却是极其独裁的，甚至引起了政治局其他委員的反对。^①

正当兰納迪夫和印共新的領導集团忙于战斗准备时，尼赫魯政府早已充分准备好采取对策了。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閉幕后还不到一个月，印度政府就制定了一项进行局部鎮压的全国性計劃，以对付共产党的暴力行动。尼赫魯本人在一次公开演說中宣称，共产党人正企图在国内制造混乱；显然，他准备亲自負起鎮压行动的責任来。^②虽然中央政府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宣布印共非法，但是从地方措施的范围和時間上显然可以看出尼赫魯的指导作用，因为各邦政府都相继采取行动对付当地的共产党人。

3月26日，西孟加拉邦政府根据公共安全法禁止共产党活动。該邦內政部长 K. S. 洛埃宣称，他属下的警察已发现共产党的武器收藏所，并搜出秘密文件，証明共产党正在准备暴动。^③在下一个星期中，迈索尔、印多尔、博帕耳和昌德納戈尔都宣布印共非法。警察还搜查了孟买、馬德拉斯、帕特訥、阿拉哈巴德以及那格浦尔等主要中心的印共办事处。西孟加拉、喀拉拉和安得拉等

① Prabodh Chandra [Ajoy Ghosh ?], "On 'A Note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Our Party'" (勃腊波特·占德腊 [阿約艾·高士?]: «論〈关于我党当前情况的意見〉»), *PHQ Forum* («总部党組公开論壇»), No. 12 (Oct., 1950), p. 5.

② B. T. Ranadive, *Nehru Government Declares War Against Toilers* (B. T. 兰納迪夫: «尼赫魯政府向劳工宣战») (Bombay: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48), pp. 7—14.

③ M. R. 瑪薩尼所著《印度的共产党》(M. R. Massani,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London: Derek Verschoyle, 1954) 第91頁有引証。

地共产党委员会的机关报也被查禁了。印度全国的数十名共产党领导人被捕,其中包括 S. A. 丹吉、約底·巴苏、穆札法尔·艾哈迈德、S. S. 米拉吉卡、索含·辛格·卓什、R. D. 帕腊德瓦支以及丁加尔·梅达。^①

就是这样用一次统一的扫荡行动就使很大一部分印共组织陷入瘫痪。这显然出乎印共的意料之外,于是,全国的印共地方组织都呈现出混乱和瓦解的现象。但是,印共孟买总部的领导核心还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兰纳迪夫、阿约艾·高士、G. M. 阿提加利等人仍然能行动自由,党还继续出版中央机关报《人民世纪》。

印共领导集团对这种镇压行为的第一个反应,是义愤和蔑视交集的混杂情绪。在4月初发表的两篇声明中,兰纳迪夫否认共产党正在为进行暴动而征集武器,他要求国大党领导人重新审查他们的政策,恢复自由。但是,他也指出印共决不退让。他说,如果共产党的行动对政府有危险,那么,“现任政府的政策必须改变,或者是政府本身必须改变”。他宣称,这就是“民主的实质”。^②

印共最高领导人——对暴力威胁直接负责的那些人——没有立刻被捕,这一事实,促使共产党人指责政府的镇压行动并不是预防性的,而是挑拨性的,目的在于激怒共产党采取使党信誉扫地的行动。印共领导集团的反应是转入地下。不出几个月,阿约艾·高士、S. G. 萨尔堆赛、罗米希·钱德拉、S. V. 卡堆、S. S. 优素福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捕了;政府还发出逮捕兰纳迪夫和阿提加利的拘票。共产党中央的出版设备被孟买邦政府查封

① Ranadive, *Nehru Government Declares...*(兰纳迪夫:《尼赫鲁政府向劳工宣战》), pp. 16—22.

② B. T. Ranadive, *Open Letter to Congressmen* (B. T. 兰纳迪夫:《致国大党人的公开信》) (Bombay: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48), p. 19.

了；《人民世紀》的許多職員，包括編輯 M.B. 腊欧，都被关进監獄。《人民世紀》仍繼續出版，但在好幾個邦里很快就遭到查禁。後來，共產黨在馬德拉斯、海得拉巴和特拉凡哥爾-柯欽等地，也被禁止了。^①

在 8 月間，蘭納迪夫向黨內同志發出密函，宣稱不出六個月，將在全國內舉行總罷工和大規模農民起義。^② 但是，由於蘭納迪夫是靠工會起家的，而又贊揚俄國式的暴動，因而，他傾向於城市革命而不傾向於土地革命。他越來越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動員城市的暴力行動上，以求通過總罷工奪取政權。

這種策略特別需要進行全國性的鐵路罷工；全印鐵路職工聯合會的共產黨人開始動員基層人員採取鬥爭行動，於是，要求舉行罷工的情緒高漲起來。但是，全印鐵路職工聯合會中的社會黨領導集團，在主席賈扎雅勃腊加什·那腊延的領導下，却同政府和解，宣布中止即將舉行的罷工。共產黨分子公然反抗聯合會的領導集團，力圖繼續罷工，但未獲得成功。六個月以後，共產黨的組織者又設法越過全印鐵路職工聯合會的領導機構，企圖發動一次鐵路總罷工，但又遭到失敗了。其他工會組織也採用了極端主義的罷工策略，而且共產黨控制的全印工會大會所屬的各工會幾乎取得了成功；但結果是，到了 1948 年年底，全印工會大會的大多數共產黨職員都進了監獄，許多著名的非共產黨職員——如 N. M. 卓什和 M. K. 鮑斯——也都辭職了。^③

① 關於政府所採取的逮捕和其他措施的細節，是從《人民世紀》(*People's Age*, April-December, 1948) 上摘引的。

② Prabodh Chandra, "On 'A Note...'" (勃腊波特·占德腊：《論〈關於我黨當前情況的意見〉》)，p. 5.

③ *People's Age* (《人民世紀》) (Aug. 29, 1948), p. 8; and (Oct. 17, 1948), p. 2.

印共执行革命策略到什么程度，在印度内政部于 1949 年发行的《印度共产党暴行》一书中有所说明；这本书有选择地报道了这一时期共产党的活动。它引证了 1949 年 2 月尼赫鲁的演说，这篇演说谴责共产党人计划进行“暗杀、纵火、抢劫以及破坏活动”。尼赫鲁谈到了加尔各答的示威游行，游行者在向警察、公共汽车和电车投掷炸弹和手榴弹。他着重指出，共产党决心要破坏铁路网和其他交通设备，“在全国制造混乱状态”。他甚至指责共产党通过使铁路陷于瘫痪的手段，“蓄谋制造饥饉状态”。^①

印度政府的出版物从警察查抄时搜出来的共产党文件中摘引了好多引文。在“共产党人宣传暴动”这一标题下，这本书引证了印共的一本标题名为“突击队干部教程”（即游击战手册）的小册子。这本手册详细指导如何应用小型武器和手榴弹；还讲述了游击队的组织、野外演习的训练方法以及具体的突击战术问题。为了给适当的游击活动下一个总的定义，手册列举了下列活动：“袭击警察所及地主住宅；伏击警察人员，消灭他们并且夺取他们的武器；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割断敌人的电话和电报线以孤立敌人”。手册说，游击活动的政治目的是，“支援正在全国发展的群众运动，在人民普遍愿意拿起武器时，把群众运动提到更高的水平。”^②

在政府引证的其他共产党文件中，有许多是孟加拉各共产党团体发出的：^③其中的典型是印共孟加拉省委员会所发的传单，号召印度的陆军人员“掉转你们的枪炮和刺刀，向国大党法西斯主义者射击”，“同工厂里的革命工人和街头上的学生紧密团结起

① *Communist Violence in India* (《印度共产党暴行》) (New Delhi: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1949), pp. 3—7.

② 同上, pp. 8—13.

③ 同上, pp. 13—34.

来”；共产党制陶工会战斗委员会所散发的传单，煽动工人“袭击国大党代理人的住宅，把他们打出去……消灭残暴成性的国大党政府”；另一份传单号召：“让大火在孟加拉各地燃烧起来吧……从各个方面打击国大党豺狼”；还有一份传单宣称：“烈士们所流的热血要求我们报仇。监狱中遍体鳞伤的英雄们号召我们伸张正义。起来参加史无前例的群众英勇战斗吧。向国大党的巴士底狱* 展开猛攻。在《印度共产党暴行》一书的附录里，印度政府列举了若干项共产党暴行，其中包括抢劫银行，抢劫火车，向群众集会（包括尼赫鲁发表演说的一次集会）投掷炸弹和硫酸弹，抢劫、捣毁工厂设备以及暗杀警察、敌对的劳工组织者和其他敌人。上述事例主要是根据孟加拉的情况记载下来的，但也有根据阿萨姆、比哈尔和马德拉斯的情况的。①

在后来党内进行自我检讨时，印共坦率地承认它曾进行过这种活动。有一份这类自我检讨文件承认：

我们袭击了火车站，我们向火车和公共汽车投掷了炸弹，我们设法破坏尼赫鲁的集会……我们纵火焚烧国大党办公处……这些行为以及在集会和示威游行中利用硫酸弹，都是前领导集团的革命路线的一部分。②

* 巴士底狱本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被起义群众攻陷的巴黎监狱。后来，巴士底狱就成了反动统治的同义辞。——译者

① 同上，pp. 59—71. 至于印度政府就印共活动所发表的其他文件，见《共产党在海得拉巴的罪行》(*Communist Crimes in Hyderabad*)，(Hyderabad: Government Press, 1950), 83 pp.; 《共产党在孟买邦的活动》(*Communist Activity in Bombay State*)，2 vols., (Bombay: Directorate of Publicity, 1950), 14, 32 pp.; 《共产党罪行录》(*Charge-Sheet Against the Communists*)，(Madras: Government Press, 1949), 21 pp.

② Ajoy Ghosh, S. A. Dange, and S. V. Ghate, “A Note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Our Party” (阿约艾·高士、S. A. 丹吉和 S. V. 卡堆：《关于我党当前情况的意见》)，Sept. 23, 1950 [typed copy], p. 23.

但是,从这些报道所揭露的共产党活动的一般情况来看,这种活动并不是有计划的和步调一致的革命运动,而是乌合之众在铤而走险。很明显,兰纳迪夫领导集团打算发动城市暴动,但同样明显的是,这个领导集团并没有这种力量;而且,除了在可能的条件下一般号召采取暴动方式外,印共党员根本得不到上级关于整个策略的指示。

这种“冒险主义”使党员和同情者,特别是使前总书记 P. C. 约希提出了愈来愈多的批评。在兰纳迪夫担任领导的整个时期中,约希发动了大胆反对印共正式领导人的运动,企图恢复自己的地位。在发表出来的论战文件中,约希引证了印共的传单和招贴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党正被引上提倡个人恐怖主义的道路。^①

印共政治局在接近 1948 年年底时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的第一次会议,那时,很明显,政治局所关心的主要还是怎样进一步采取措施来清除党内的不忠实分子,而不是怎样拟定一份真正的革命方案。

国际共产党人的观点

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仅仅几个星期以后,随着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交换信件,便开始了开除南斯拉夫党的运动。南斯拉夫于 1948 年 6 月正式被共产党情报局开除,从此南斯拉夫人在指导印度共产党方面就不再起作用了。

然而,国际共产党人早期就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几份报道,看来是赞同代表大会根据南斯拉夫人的建议所采取的路线。

^① P. C. Joshi, *Views to Comrades Abroad and B. T. Ranadive* (P. C. 约希:《对国外同志和 B. T. 兰纳迪夫的意见》)(Howrah: P. C. Joshi, 1950), pp. 4-5.

在《劳工月刊》的一篇文章中，R. 帕姆·杜德譴責了“印度資產階級”，同時宣稱“工人階級要出來接收戰鬥的領導權”。他說，印度爭取自由的鬥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① 共產黨情報局的機關刊物《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也刊登了一篇評述印共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文章，同樣指責“印度資產階級”，似乎也在支持印共的反資本主義方針。^②

不過，這些文章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印共推行戰鬥的南斯拉夫路線的最後共鳴。此後，俄國發言人便恢復了主動，開始發出克制的口氣。實際上，共產黨情報局的文章本身，在暴動策略的問題上，似乎就曾暗示要慎重將事。這篇文章說，印共曾“強調建立一條對抗美英帝國主義者和印度資產階級的民主戰綫的必要性”。^③ 這種強調“民主戰綫”的提法，似乎就是要提醒印度同志，在發動暴力革命以前，必須有一個集中全力建立適當的群眾組織的緊張準備階段。

這種慎重的語調在後來的蘇聯評述中變得更加清楚了。A. 季亞科夫在6月份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所描繪的印度形勢遠遠不是革命的形勢。^④ 他並沒有像蘭納迪夫那樣，用“革命高潮”的辭句來說明印度的形勢，而僅僅談到人民對新政府“深感失望”。他說，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愈來愈同群眾隔絕”，“正在逐漸變成帝國主義者的工具”。這種說法似乎暗示，這一“正在逐漸變成”的

① R. Palme Dutt, "Whither India" (R. 帕姆·杜德：《印度何去何從》) *Labour Monthly* (《勞工月刊》), XXX (June, 1948), pp. 161—170.

② *For a Lasting Peace, For a People's Democracy*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April 15, 1948, p. 3.

③ 同上，p. 3.

④ A. Dyakov, "The Situation in India" (A. 季亞科夫：《印度的形勢》), *New Times* (《新時代》) (June 2, 1948), pp. 14—17.

过程必須进一步成熟以后，群众才会感到幻想破灭，准备进行革命。

6月份的《布尔什維克》发表了 M. 阿列克謝耶夫的一篇詳尽透辟的文章；这篇文章再一次指出印共曾強調建立民主战綫的必要性；由此可见，俄国共产党官方杂志的文章，是要提醒印度同志注意有必要建立适当的外围組織。阿列克謝耶夫在結束他对印共政策的說明时，进一步宣称，印共要領導群众“最后摧毀殖民統治，消灭封建残余和封建割据。”^①从这段話應該可以看出，反資本主义在印共綱領中應該再也沒有地位了。在苏联这些文章中，任何地方都沒有承认兰納迪夫从南斯拉夫人那里抄袭过来的、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應該交織起来的提綱。

不过，阿列克謝耶夫在討論印度形势时，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漏洞。虽然他清楚地說，只有印度大資產階級才是反动的代理人 and 尼赫魯政府中的統治力量，但是他又以同样明确的口吻說，印度共产党人要团結的階級是“工人、农民和小資產階級”。他就是这样避而不談茹科夫以前列在某些亚洲国家进步力量之內的中等資產階級。为了証明自己的分析正确，阿列克謝耶夫引証了斯大林的話，大意說印度資產階級已經分成“两派，即革命派(小資產階級)和妥协派(大資產階級)”。由于这句引文是 1925 年讲的，因此它在澄清 1948 年的形势时并不是特別有用的。

因此，这个問題一直拖到 1948 年 10 月季亚科夫写的一本书在苏联問世的时候为止。^② 这篇篇幅有三百二十八頁的关于印度

① M. Alexeev, "Indiiskii soiuz i Pakistan posle raschleneniia Indii (M. 阿列克謝耶夫: 《印度分治后的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 *Bolshevik* (《布尔什維克》) (June 15, 1948), pp. 66.

② A. Dyakov, *Natsional'nyi vopros i angliiskii imperiializm v Indii*

“民族”問題的著作，完全改变了季亚科夫本人过去的立場；此外，这本书也填补了阿列克謝耶夫的分析中所留下的漏洞，是对苏联态度的一次重要的提炼和澄清。

总的說来，季亚科夫的这本书对印度人民的“民族成分”作了一次全面分析，同时广泛地討論了英国和印度两国共产党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这本书的主要論点之一是，它強調控制印度民族运动的不是全国的而是少数几个民族的大資產階級——特别是“古季腊特-馬尔瓦尔族”財团。季亚科夫說，少数几个民族的資產階級企图联合英国資本家垄断印度市場，他們所采用的办法是，压制其他民族的发展，从而防止敌对企业集团的兴起。正如季亚科夫在最后一章中所說的，这就意味着，处于古季腊特-馬尔瓦尔族大資產階級以及封建王公和地主的联合控制之下的印度政府，“不仅鎮压人民中工人、农民和小資產阶层所发动的革命运动，而且还采取了危害馬拉地、孟加拉、泰卢固等印度民族中較弱小的資產階級利益的行动。”^①虽然季亚科夫这一次并没有談出按照这一公式应该采用什么战略，但是显而易见在說，在反抗政府的革命运动中，可以把印度某些民族的地方資產階級当作同盟者。总之，他主张鼓动馬拉地、孟加拉、泰卢固以及其他地区的企业階級反对居于統治地位的全国性企业集团古季腊特-馬尔瓦尔族財团。

季亚科夫摆出了一套明确的方案，为实施这种战略提供策略。他宣称，虽然馬拉地和孟加拉之类民族的“民族运动”是由各民族的資產階級来领导的，但这些运动还是“进步的”。因此，他要求印度共产党人像前一时期同中产階級的民族运动合作那样，同中产

(A. 季亚科夫：《印度的民族問題和英帝国主义》) (Moscow: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 1948), 328 pp.

① 同上，p. 311.

階級的語言运动合作。^①

苏联在这里终于同意要促进亚民族的狭隘主义，作为反对执政党的武器；这也正是印共曾在1942年制定过的政策。但是，相当可笑的是，苏联是在印度共产党人把这一政策搁在一边而鼓吹暴力革命的时候才同意这一政策的。

1949年初，季亚科夫的理論公式在《布尔什維克》上得到公认。^②E. 茹科夫在評論《印度的民族問題和英帝国主义》这部书时，贊同了季亚科夫所下的这样一个結論：古季腊特-馬尔瓦尔族大資產階級是印度全国領導集团中的統治因素；他也不反对季亚科夫就战略所作的这样一个主要暗示：印度各弱小民族的資產階級是进步的运动的适当同盟者。茹科夫最后說：“这本书应该得到肯定的評價。”

茹科夫还对季亚科夫的著作作了一些批評，要点是它忽視了印度革命中农民問題的一面。他責难季亚科夫在階級敌人的名单中沒有列入封建地主，同时強調，尽管印度农民有其落后性，但是他們正在日益被卷入斗争中。

因此，茹科夫的評論足以証明，印度的地方主义观念的号召力以及农民不滿情緒所带来的各种机会，深深地打动了苏联的观察家。同时，这也可能是另一种傾向的标志。既然同資產階級結成联盟和強調革命的农民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中心因素，那么，苏联发言人也許已經对这些思想逐漸形成一种新的評價。

所以，总的說来，苏联在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閉幕后的一年中

① 同上，pp. 137—138.

② E. Zhukov, "Maneuver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in India" (E. 茹科夫：《英帝国主义对印度的策略》，*Communist* (《共产主义者》)，II (June—July, 1949), pp. 123—134. 由《布尔什維克》(*Bolshevik*) (Feb. 1949) 轉載。

所发表的評論同印共当时所采取的路綫，在許多地方都不相同；苏联发言人对反資本主义战略表示反对，并警告不要过早地使用暴力策略。不过，如果苏联确乎有意責难兰納迪夫，它倒始終沒有把这种責难直接表达出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並沒有像数十年前所做的那样公开发表言論来指責犯錯誤的印共领导人。而且，从能够得到的印共这段时期的文件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沒有同印共进行秘密联系。事实上，反对兰納迪夫路綫的势力在印共內部发展起来以后，它所以有一段时期处于一筹莫展的境地，恰恰就是因为它未能取得权威的国际共产党人的支持。因此，事实很可能是，只要有获得成功的可能，苏联领导集团倒願意兰納迪夫进行反尼赫魯政府的革命；有充足的証据說明，苏联领导集团对該政府是敌視的。

印共內部的反对

不同意兰納迪夫的领导的意见，不久便在印度共产党組織中出现。这种反对首先是因为不滿总书记专断地操纵党的机器。兰納迪夫曾經促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把党章加以修改，授权中央委员会“在特殊情况下……得自行改組并改組其他党委和党組等，并得制定新的规章。”^① 兰納迪夫变本加厉地利用这些和其他組織特权，解散了低一級的党委員会（例如孟加拉省委員会），开除难于駕御的党员。P. C. 約希一案就可以說明这次清党中对个别反对者所采用的一些方法。政治局中止了約希的党籍以后，就把他赶出他的工作地点加尔各答，同时切断他同党的联系：不准他参加党的活动，不准他进入党的孟买图书馆，竭力阻止他接触党的文献資

^①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印度共产党党章》) (Bombay: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48), p. 13.

料。在这样孤立他一年以后，终于正式把他开除出党。^①

除了有人反对兰納迪夫所采用的方法以外，不久又有人强烈反对他的路线。这种政治性的反对（与反对兰納迪夫本人不同），主要来自孟买的工会领导人和印度南部的农民领袖这两方面。

根据阿約艾·高士本人的秘密报告，他在1948年年中被捕以后，曾在监狱中向兰納迪夫提出抗议，宣称指望在六个月内掀起革命是极端不现实的，必须采取更有效的组织措施。兰納迪夫的回答是阻止党员同高士联系，力图孤立他。党的罢工策略的极端倾向约在1949年年初变得愈来愈明显时，高士再一次向总书记提出“极强烈的”抗议，指控他是“小资产阶级革命狂”。由于深信兰納迪夫必然患了“狂热病”，高士又在5月寄出一纸便笺，断言党的工会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对此，兰納迪夫竟威胁要开除他出党。^②

另一位终于公然反抗兰納迪夫的工会领导人是全印工会大会主席 S. A. 丹吉。由于长期在孟买从事劳工活动，丹吉本人至少在孟买的一个工会——纺织工人工会——中建立了稳固的个人控制。兰納迪夫对这种控制提出了挑战，企图把丹吉的副手都赶走。但是，丹吉派进行抵制，谴责总书记，甚至发展到公开散发传单反对“托洛茨基派”的兰納迪夫。^③

印共在工会中的老人反对兰納迪夫，仅仅是由于他们在策略

① Joshi, *Views to Comrades...* (约希:《对国外同志和 B. T. 兰納迪夫的意见》), pp. 31—32.

② Prabodh Chandra, “On ‘A Note...’” (勃腊波特·占德腊:《论〈关于我党当前情况的意见〉》), pp. 5—6.

③ P. C. Joshi, *Problems of the Mass Movement* (P. C. 约希:《群众运动问题》) (Allahabad: Adhunik Pustak Bhandar, n. d., [1951 ?]), pp. 37—38.

上有不同意見；這一派惟恐過早的暴動會瓦解他們長期領導的勞工組織。而比較帶有根本性的不同意見則是由印度南部農民領袖提出來的，他們反對蘭納迪夫政策所依據的基本戰略。

甚至在印共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前，海得拉巴邦堆楞加那地方的運動就已經突破了它以前所訂的溫和界綫。農村暴動的那種山雨欲來的鏈鎖反應也已經開始了，在幾個月內建立了數以千百計的農村“蘇維埃”，奪取土地，殺害或趕走地主和邦主政府的地方官吏。一支兵員十足的游擊隊很快就投入了戰鬥；事實上，整個那耳貢和伏隆古爾兩地區都處於共產黨的控制之下。^① 堅決反對加入印度聯邦的邦主政府，在本土上正面臨共產黨的據點。

在邦界那邊的馬德拉斯邦泰盧固語區(叫作安得拉)的共產黨人，正把堆楞加那的事變看作是土地革命的先驅。安得拉共產黨人同堆楞加那運動的組織關係如何，並不清楚。從技術上看，既然共產黨安得拉省委員會包括海得拉巴和馬德拉斯兩邦的全部泰盧固族人民，那麼，海得拉巴縣委員會就不過是安得拉省委員會的一個下級機構。不過，實際上，安得拉和堆楞加那的共產黨團體是互相分開的兩個實體，就像邦的界綫已把兩個團體劃分開似的；堆楞加那的共產黨領導機構有很大的自主權。不過，不管怎樣說，1948年初，安得拉和堆楞加那的共產黨人之間，就已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安得拉共產黨領導人力圖把農民暴動擴大到自己的地區。在邦界綫的兩邊有聯合游擊行動，但是安得拉這一邊缺乏適當的組織，同時農民的不滿情緒也不那麼高昂，這就意味着，堆楞加那的情況不可能在安得拉重現。^②

^① *On Telengana* (《關於堆楞加那起義的報告》), Information Document No. 7 (2), (Politburo, CPI, Oct. 7, 1950), pp. 4—5.

^② “Self-Critical Report of the Andhra Communist Committee” (《安得拉黨委員會的檢討報告》), [typed copy, 1952 ?], Part I, pp. 25—31.

然而，从开始起就在印共内部把反对兰納迪夫政策的任务承担下来并为农民革命說話的，倒是安得拉共产党领导人，而不是堆楞加那的参謀部。在安得拉共产党人所领导的运动中，他們掌握了一个重要的力量来源：一种来自国外的很有說服力的理論論据。正如同兰納迪夫的理论在南斯拉夫人的著作中找到根据一样，安得拉共产党领导人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著作中找到根据。由此可见，在1948年年初，毛澤东思想就开始在印度应用，而且的确影响印共政策的制定。

安得拉共产党人拥护毛澤东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由于他們的社会背景这一因素，尽管这种說法把問題过分簡單化了。安得拉共产党为一批金摩地主所控制，他們是拥有肥沃的三角洲地带80%土地的金摩种姓的成員。^①毛澤东主义及其容忍富裕农民阶级的政策，非常适合他們的处境。

从組織上來說，安得拉共产党人的力量非常薄弱，因为在政府的鎮压下，共产党安得拉省委員会几乎已經完全瓦解了，只有一个小小的書記处保留下来。尽管这样，在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仅仅几个月以后，書記处便开始反对兰納迪夫领导权的派系运动。在一封所謂“1948年6月的安得拉信件”中，安得拉共产党人宣称，應該把毛澤东的“新民主主义”当作“印度的指針”。^②他們提出了一条战略公式：指出，全体农民（包括农村資产阶级或富农）会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团結起来，进行“游击战(中国的道路)”。因为按照該書記处的說法，既然只有大資产阶级和大地主，才走上了反

① Selig S. Harrison, "Caste and the Andhra Communists" (西利格·S. 哈里逊：《种姓制度与安得拉邦共产党人》),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美国政治学評論》), L (June, 1956), pp. 380—381.

② "Self-Critical Report..." (《安得拉党委员会的检讨报告》), Part 1, p. 15. 安得拉書記处的那封信无法得到，但检讨报告摘要地說明了这封信的内容。

动道路，

中农就会是革命的坚强同盟者，并且会参加革命。沒有拖着封建尾巴的富农可以作为一个阶级使它中立，但是在封建制度非常巩固的堆楞加那和腊雅拉西瑪这样的地区，甚至有可能使某些部分的富农参加斗争（虽然他们会动摇）。①

安得拉书记处在谈到印度的情况时说：

我们的革命在许多方面都同正統的俄国革命不同，却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国革命相同。我们的前途不大可能是，举行总罢工和总起义，从而导致农村的解放，而很可能是，以农民革命的方式，进行顽强的抵抗和长期的内战，最后通过一个民主陣綫夺取政权。②

从这里可以看出，兰納迪夫的观点同安得拉共产党人的观点显然是对立的。

正如 P. C. 約希后来所評述的，安得拉共产党人只不过是全盘仿效中国的办法来代替兰納迪夫的全盘仿效俄国的办法而已。同时約希又说：“对印度知识分子来说，一变恣意盲目詆毁的作风，轉而盲目和諂媚地崇拜偶像，本来就是十分自然和十分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的传统观点是由种姓制度和婆罗門統治下的封建社会所决定的。”③

印共所提出的印度“各民族”自决的主张，在安得拉人中間引起的反应比在任何其他語言民族中都大；印共所以能实现引起安

① “Struggle for People’s Democracy and Socialism—Some Questions of Strategy and Tactics”（《爭取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几个战略和策略問題》），*Communist*（《共产主义者》），II（June—July, 1949），p. 71. 本文广泛援引了安得拉书记处信件的原文。

② 同上，p. 83.

③ P. C. Joshi, *For a Mass Policy*（P. C. 約希：《为实现一項群众政策而奋斗》）（Allahabad: Adhunik Pustak Bhandar, n.d. [1951 ?]），p. 15.

得拉城乡资产阶级共鸣的战略，基本上正是靠了这项策略和党的土地政策。因此，安得拉共产党人就把民族自决当作他们纲领中的第一个要点。^①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安得拉共产党的纲领实质上是把印共的民族政策同反帝国主义战略的毛泽东主义翻版和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策略结合起来。

兰纳迪夫对安得拉反对派的回答

对于印共党内从事工会工作的老党员的反对，兰纳迪夫可以用私人的组织制裁手段加以对付，对于安得拉共产党人的挑战，他就不能不郑重加以对待了。因为这一挑战有威望越来越高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做后盾。于是，这位总书记就运用这一职位的全部权力，利用印共官方理论刊物《共产主义者》的篇幅，在1月、2月和6—7月各期上发表四篇文章，展开了一次强有力的反击。

在第一篇文章中，兰纳迪夫从根本上再一次说明了自己的战略，重申自己对应用于印度的“人民民主”的提法。这一提法涉及这样一个假定：印度已经到了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刻，这也就是说，印度的经济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可以向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转变。从逻辑上来说，这种立场也就意味着，民主革命实质上已经完成了——帝国主义事实上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因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就成了主要敌人。于是，兰纳迪夫就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期间夺取政权并在反资产阶级战略下立刻展开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政府。他企图表明他的观点仅仅是正统的不断革命理论

^① *On Telengana* («关于推楞加那起义的报告»), p. 4.

的重申，他还从列宁和斯大林的著述中摘出大量引文来支持自己的論点。^①

在第二篇文章里，兰納迪夫把他的战略公式具体地用于农村方面。他认为农村的資本主义发展已經达到很高的程度，因此便号召对乡区的資产階級——富农——展开进攻。他說，只有中农（农民中的小資产階級分子）可以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同盟軍。因此，这一論点的邏輯推論是，封建主义，就像帝国主义一样，已經大部分被消灭了。^②

在第三篇文章里，兰納迪夫想說明他的思想来自欧洲。这大概是为了通过对于共产党情报局路綫的正統闡述来加强自己的地位。他批評了1947年以前的旧的“人民民主”观点，在“修正主义”的罪名下，罗列它的各种“錯誤”。^③有趣的是，兰納迪夫竟然利用这次机会攻击了南斯拉夫人；就像苏联领导人一样，他也說南斯拉夫党具有修正主义观点，其实，南斯拉夫人在1947年是这些观点的主要反对者。

在最后一篇文章中。^④ 兰納迪夫用最极端的辞句重申了自己

① B. T. Ranadive, *On People's Democracy* (B. T. 兰納迪夫:《論人民民主》) (Bombay: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n. d., [1949?]), 12 pp. 按《共产主义者》(*Communist*, II [Jan., 1949]) 翻印。关于这次理論性辯論的更詳尽的长篇評述，参閱約翰·H. 考茨基著《莫斯科与印度共产党》(John H. Kautsky, *Moscow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New York: The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6), pp. 61—80.

② “On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India” (《論印度的土地問題》), *Communist* (《共产主义者》), II (Jan., 1949), pp. 13—53.

③ “Struggle Against Revisionism Today, In the Light of Lenin's Teachings” (《根据列宁的教导同当前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 *Communist*, II (Feb., 1949), pp. 53—66.

④ “Struggle for People's Democracy...” (《爭取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几个战略和策略問題》), pp. 21—89.

的立場的要点。他宣称，“俄国革命的全部經驗在印度也完全适用”——俄国的历史为印度提供了榜样。兰納迪夫回顾了自己的战略，又一次說資產階級是主要的敌人，因为它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資產階級集合体”的主要成員。不过，在三頁以后，他又从上述立場后退了一些，承认印度的資產階級政府“仍然依靠帝国主义者”，对他們保持一种依附的关系，因此，帝国主义才是主要的敌人。然而，总的說来，他的語調是粗暴激烈的；“法西斯恐怖”、“革命高潮”、“广泛的群众战斗”、“小型內战”之类的革命詞藻，在全篇文章中到处可见。

兰納迪夫在这篇文章中摆出了安得拉共产党書記处的观点，并一一予以駁斥。他引用安得拉共产党信件的原文，詳細抨击了安得拉共产党联合四个階級(包括农村資產階級)进行土地革命的战略，宣称这是“赤裸裸的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是“见不得人的階級合作的理論”。他重申富农是敌人，同时暗示說安得拉共产党领导人所以不承认这一点，仅仅是因为他們本身絕大多数都是“农村知識分子，是富农和中农的子弟。”

如果对兰納迪夫的自信心还存在着任何怀疑的話，那么，最后一篇文章中的另一部分——对毛澤东本人的猛烈攻击——就足以驅散这种疑念。在攻击了安得拉共产党的观点以后，兰納迪夫并没有避开攻击这些观点的来源。他首先說，“这不是評判毛澤东同志的提法的場合”，但是他下一步恰恰就进行了这种評判。他宣称，某些提法是“任何共产党都不能承认的；它們是同世界对共产党的理解矛盾的”。他的批判还不仅限于此，他甚至用“錯誤的”、“反动的”、“反革命的”和“可怕的”等辭句去評價从毛澤东著作中引来的具体思想。

兰納迪夫是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前夕进行攻击的。

因而，有很多人推測，兰納迪夫所以敢在这样一个时刻发动这样惊人的公开攻击，完全是因为他了解毛澤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論已經受到莫斯科的攻击。事实上，某些印度共产党人就是这样解释的。阿約艾·高士后来写道，当他和獄中的同伴听說兰納迪夫攻击毛澤东时，

我們便說，我們的领导人不可能是独出心裁这样干的。鉄托和哥穆尔卡的例子，我們是記憶犹新的。我們认为我們的同志[兰納迪夫和政治局]必然从国际方面得到了中国会发生某种爆炸性大事件的情报；而这种攻击一定是他們同国际的同志們进行过討論的結果。^①

高士並沒有进一步提供材料来証明他自己的解释是正确的。不过，在另一份党内文件中，即在安得拉共产党领导集团本身后来所作的检讨报告中，却稍稍提供了一点証据支持这一假說。报告說，兰納迪夫在攻击安得拉共产党書記处时利用了“苏联局的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印度的革命必然是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②但是这份检讨报告沒有指出“苏联局”是哪个机构，也沒有在别的方面闡明这句隱秘的話；这一时期的其他党内文件也沒有提供更多的材料。

另一方面，从季亚科夫 1948 年所写的那本关于印度民族問題的书和茹科夫贊揚这本书的书評来看，苏联当局已經在理論上采取了同兰納迪夫的观点相反的态度；这一态度可能还反映出他們很重視毛澤东主义中某些部分。因此，关于莫斯科支持兰納迪夫攻击毛澤东的假說，至少還沒有得到証实。

① Prabodh Chandra, "On 'A Note...'" (勃腊波特·占德腊：《論〈关于我党当前情况的意见〉》），p. 5.

② "Self-Critical Report..." (《安得拉党委员会的检讨报告》），Part II. pp. 1-2.

無論如何，兰納迪夫的文章清楚表明，他深信他只應該接受共产党情报局对印度的指导。他說他所以反对毛澤东，一个主要論点就是：

首先，我們必須着重声明，印度共产党承认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馬克思主义的权威来源。除此以外，印度共产党还没有发现新的馬克思主义来源。也没有发现任何共产党宣布信奉据說是由毛澤东提出的所謂新民主主义理論，并說这种理論是对馬克思主义的新补充。十分奇怪的是，欧洲九国共产党會議[共产党情报局]也没有提到这种对馬克思主义的新补充。^①

兰納迪夫居然在刊物上这样暴露这次党内辯論，这就說明了爭执的严重性。这也可能表明，党的机构处于瓦解状态，以致无法彻底传达党内秘密文件，兰納迪夫沒有其他办法，只有借助党的刊物。最后，这也說明兰納迪夫可能打算向党外讀者（即印度国内的同情者或海外顧問）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設想，他也許希望国内的同路人这次能像历次一样对党的政策发生某种影响（見第十七章）；更重要的是，他可能希望从伦敦或莫斯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印政策的权威来源获得支持。

尽管反对安得拉共产党書記处的运动消耗了兰納迪夫很大一部分精力，但是他并没有忽視激励革命群众的工作。随着他的暴动策略的失敗越来越明显，他号召拿起武器的語調也日益激烈了。虽然政府已发出拘票要逮捕他，但是他同中央领导机构的少数成員仍然逍遙法外；共产党照样发行机关刊物，有时也发行那种充滿煽动暴动的文字的小册子。至少也有这样的可能：政府是故意让它发行这类刊物和小册子的，深信共产党会弄得自己陷入声誉扫

^① “Struggle for People’s Democracy…”（《爭取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几个战略和策略問題》），p. 77.

地、分崩离析的境地。

兰納迪夫装出一副滿意的姿态来看周围的形势，断言革命的高潮已經使得政府采取那种只能进一步激励群众的反革命措施。他說，政府已經暴露了它的弱点和反动本质；又說，它已經暴露出自己是“张牙舞爪的法西斯野兽”。1949年年底頒布印度共和国新宪法时，兰納迪夫譴責它是“奴隶的宪法”，是“法西斯专制的宪法”。^①

为了寻找革命的征兆，兰納迪夫又不得不轉而矚目于堆楞加那运动。他一方面反对这个运动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指出这个运动是革命高潮的主要証据。就在兰納迪夫在《共产主义者》上攻击安得拉共产党書記处的那几个月份里，印共发表了一项声明，欢呼堆楞加那运动是“人民民主革命洪流高涨的信号”。^②

不过，堆楞加那运动本身事实上却在动摇。1948年初，由于农民大力支持那个反对当地传统敌人，特别是反对专制制度的綱領，这个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但是当印共按照它的新政策，集中力量反对尼赫魯政府时，堆楞加那共产党人便倾向于約束自己反对邦主政权的行动。他們宣称他們反对海得拉巴并入印度联邦，同时請求邦主給予保护，以抵制尼赫魯。事实上，为了报答这种明显的支持，邦主政府竟撤消了自1943年以来一直实施的禁止共产党活动的禁令。

① *Manifesto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on the New Constitution* (《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新宪法的声明》) (Bomba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n.d., [1949?]), pp. 1, 4. 同时参閱: *One Year of People's Struggles* (《人民斗争的一年》) (Bombay: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48), 16 pp.; *One Year of Freedom* (《取得自由以来的一年》) (Bombay: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48), 20 pp.

② *What is Happening in Hyderabad?* (《在海得拉巴发生了什么事情?》) (Bombay: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49), 26 pp.

1948年9月,印度陆軍开入海得拉巴,强制合并,这时共产党人提出了“自由的海得拉巴”的口号,同时号召抵抗这支“法西斯軍隊”。^① 堆楞加那共产党游击队同过去的敌人腊查加尔并肩作战,有时显然还同他們合作,腊查加尔是一支忠于邦主的私人軍隊,具有极端主义的穆斯林情緒。^② 但是印度陆軍在短短的几天內就蕩平了包括腊查加尔在內的全部抵抗力量,只有共产党游击队靠打了就跑的战术,沒有被消灭。后来,印度政府額外派出軍隊,才使暴动沒有扩大(如果不是平息的話)。在一項党内传閱的秘密文件中,堆楞加那共产党領袖腊維·那腊延·累迪承认,运动变成了一系列“不分青紅皂白和不必要地对非軍事人員进行的恐怖行动”。他說,这使領導“声誉扫地”,其結果是,“我們实际上陷入了毁灭的境地”。党“无法动員人民支持这场斗争”,剩下的游击队員就寥寥无几了。^③

在边界綫的安得拉这一边,局势对共产党人說来就更加令人不能乐观了。安得拉共产党領導人力图发动一次堆楞加那式的暴动,并沒有产生任何效果;更糟的是,这反而使党分裂了。正如安得拉共产党領導人后来所承认的,“人民沒有参加我們的行动”。

① “Self-Critical Report...” (《安得拉邦委员会的检讨报告》), Part I, pp. 24—25; 又见: *On Telengana* (《关于堆楞加那起义的报告》), pp. 7—9; Bhayyaji Kulkarni, et al., *Struggle Against Sectarian Legacy and For a New Perspective* (帕伊雅季·古可加尔尼等著:《为反对宗派主义遺毒和爭取新的前途而斗争》) (Poona: N. P., 1950)。

② Alan Campbell-Johnson. *Mission With Mountbatten* (艾伦·坎貝尔-約翰遜:《随蒙巴頓出使記》)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1953), pp. 325, 331.

③ O. P. 散加耳在所著《堆楞加那起义与腊捷什瓦尔·腊欧的領導》(O. P. Sangal, *Telengana and the Rajeshwar Rao Leadership*), (Allahabad: Adhunik Prakashan, 1951, pp. 53, 55.) 一书中曾加引証。散加耳是 P. C. 約希在这时反对印共領導的一位同僚。

这些领导人說，既然人民不准备参加，“我們的活动就像紙上談兵一样”。企图通过实例激励群众采取暴力的各种努力，终于导致个人恐怖主义；这又反过来使安得拉共产党进一步遭到孤立和镇压。到了1948年年底，那里的共产党领导人承认，“总的說来，全省都沒有斗争和罢工。”結果，安得拉共产党党员从二万一千名减到七千名；事实上，某些县組織就公开反对書記处的政策。在若干地区，党已“陷入完全瓦解的境地”。^①

由此可见，安得拉共产党人的观点，在实践中显然不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单靠本地共产党的大力支持，本来就不大可能在印度共产党中占上风的。但是现在，在实力日趋衰退的阶段，安得拉共产党领导人却发现自己获得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批准。

苏联批准了中国方式

如果俄国确曾反对过毛澤东，那么，它很快就撤消了这种反对。几乎就在兰納迪夫展开反对毛澤东的論战时，苏联当局正式批准了中国的革命方式。在1949年6月举行的一次由茹科夫主持的苏联科学院院士會議上，列宁的反帝国主义战略作为整个亚洲的战略提了出来，这一次沒有持不同意见的。这一战略比較新的翻版，就是苏联早期所解释的“人民民主”和毛澤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核心。

茹科夫在开幕詞中，大力强调东欧理論和中国理論的相同之处。^②他說，在“速度”上（即在发展水平上）虽有不同，两者总的发

^① “Self-Critical Report...” (《安得拉党委员会的检讨报告》), Part I, p. 35, and Part II, pp. 12—17.

^② E. Zhukov, “Voprosy natsional’no-kolonial’noi bor’by posle vtoroi mirovoi voiny” (E. 茹科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民族、殖民地斗争問題》), *Voprosy Ekonomiki* (《經濟問題》) No. 9, 1949, pp. 54—62. 轉載

展规律却是相同的；因此，“在基本特点上，东方的人民民主和西方的人民民主并没有什么不同”。茹科夫又說，中国政权的綱領証明，它正在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民主阶段。

在說明亚洲的战略时，茹科夫說：

团结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爭取人民民主的斗争中的不仅有工人、农民、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甚至还有中等資产階級中关心摆脱残酷的国外竞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某些部分。

茹科夫說，既然亚洲各国的經濟和文化发展水平低于东欧，那么，亚洲的革命在开始时就必须是反帝国主义的而不是反資本主义的，显然印度也包括在这条理論公式之內。茹科夫并没有明确說这一战略只适用于“某些国家”，而且他也是把“大資产階級”当作印度的敌人而談起它的，就如同他把大資产階級当作亚洲其他地区的敌人一样。

在策略方面，看来茹科夫现在已明确同意在印度和整个东南亚实行武装暴动。他在贊揚“許多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的武装斗争”时，还特別把“印度的农民起义”，同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馬來亞、緬甸和中国的暴动相提并論。他說，这些斗争証明，民族解放运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和更高的阶段”。

V. 巴拉布謝維奇在會議上作了关于印度的主要报告。他全面地說明了在印度应用中国战略和策略的方式。^①他說，中等資产階級的某些部分可以算作革命的暫時“同路人”；他明确指出，他

于《殖民地人民爭取解放的斗争》(*Colonial People's Struggle for Liberation*)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0), pp. 1—11.

① V. Balabushevich. "Novyi etap natsional'no-osvoboditel'noi bor'by narodov Indii" (V. 巴拉布謝維奇：《印度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阶段》)，*Voprosy Ekonomiki* (《經濟問題》)，No. 8, 1949, pp. 30—49. 轉載于《殖民地人民爭取解放的斗争》，pp. 32—59.

們包括本身利益受到外国資本侵犯的阶层和印度比較落后的各“民族”的資產階級。此外，巴拉布謝維奇还跟着茹科夫，竭力贊揚印度的武装斗争的发展。他推許堆楞加那运动是“在印度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第一次嘗試”。他說，这是“农民革命的前驅”，是解放运动的“最重要的內容”。他明显地指出，这正是印度共产党人必須走的道路。由此可见，以毛澤东主义为藍本的更加強調促进亚民族地方主义的安得拉共产党書記处的綱領，已經得到了明确的批准。

苏联很快把这条新公式传达給了亚洲各国共产党。俄国杂志《經濟問題》发表了茹科夫和巴拉布謝維奇的文章。在那本关于亚洲形势的主要苏联著作《殖民制度的危机》中，季亚科夫在論述印度的一章里对上述新路綫也表示了附和的态度；他說，有时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的农民的积极斗争，是印度革命“最具有代表性的特点”。^①最后，在11月北京举行的亚洲澳洲工会代表會議上，这项新指示又传达給了亚洲各国的共产党。^②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在致

① *Krizis kolonial'noi sistemy* (《殖民制度的危机》) (Moscow: 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 SSSR, 1949), p. 122. 这篇文章后来又在印度重印了; A. Dyakov, *New Stage in India's Liberation Struggle* (A. 季亚科夫: 《印度解放斗争的新阶段》)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0), 48 pp.

② *Manifesto and Opening Speech by Liu Shao-chi; Trade Union Conference of Asia and Australasian Countries, Peking, November 1949* (《亚洲澳洲工会代表會議宣言和刘少奇的开幕詞》)(1949年11月,北京)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d., [1950?]), pp. 1—10. 又见: “Speech by Liu Shao-chi at the Conference of Trade Unions of Asia and Oceania” (《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For a Lasting Peace...* (《爭取持久和平, 爭取人民民主》) (December 30, 1949), p. 2. 这里所引証的几段話, 在这篇演說的上述两种譯文中都相同。(刘少奇主席的开幕詞見《新华月报》1949年12月号, 第440—441頁。——譯者)

開幕辭時宣稱，中國革命所遵循的道路，“是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所應該走的道路”。在總結這條道路時，劉少奇指出，它必須始終以四階級戰略為基礎，必須“在可能的地方和可能的時候”進行“武裝鬥爭”。他說，武裝革命是許多亞洲國家的“主要鬥爭形式”。他引証了越南、緬甸、印度尼西亞、馬來亞和菲律賓的內戰，宣稱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是完全作得正確的”。此外，他在另一段里說，“在印度也發生了爭取解放的武裝鬥爭。”劉少奇的話並沒有說明他是否認為武裝暴動是——或應該是——印度的“主要形式”，但他的話肯定不排斥這一點。北京會議的宣言*並沒有把印度列入從事武裝暴動的國家的名單，但名單顯然不是完整的，因為它有“如……等國”的說法。無論如何，季亞科夫和巴拉布謝維奇已經說過，農民的武裝暴動是印度革命的“最重要的內容”或“最具有代表性的特點”。因此，顯然可以看出，在客觀環境許可時，印共應該發動暴力的農民革命。

劉少奇強調，暴力的策略必須同各種形式的合法活動配合起來，並在結束演說時號召與會的代表討論各國應該發動的“具體的鬥爭”的性質。但是，就印度而言，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印共沒有派代表參加會議，而且後來的發展也表明，並沒有在北京就印共的詳細策略方案作出明確的決定。

1950年1月，把中國綱領應用到亞洲各不發達國家一事，得到了另一權威方面——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刊物《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的正式同意。^①不過，在談到印度時，共產黨情報

* 即《告亞洲各國工人和一切勞動者書》，載《人民日報》1949年12月2日。
——譯者

① “Mighty Advance of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Colonial and Dependent Countries”（《殖民地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高

局的领导集团就似乎为反对完全和专只采用中国道路的战略和策略特点，留下余地。情报局的文章虽然大大赞扬了中国革命，断言在加强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方面，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文章却意味深长地改变了刘少奇的话：刘少奇本来說，中国的道路，就其总的方面來說，应该为“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所采取，这似乎是指所有这类国家。而共产党情报局的引文却改成“許多殖民地附属国家的人民”。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宣称，中国的道路在亚洲普遍适用，唯一的限制是，武装斗争的因素并不一定到处都可行；而共产党情报局則似乎坚持，限制并不仅限于这一点。此外，共产党情报局的文章在討論到印度时說，印共必須吸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經驗”。

由此可见，共产党情报局可能坚决不肯在印度革命仿效中国榜样的問題上作出最后决定；同时，这种反抗态度也說明，在究竟由誰掌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印度共产党活动的指导权的問題上，产生了爭执。1947至1948年間对印共进行指导的共产党情报局，也許很不願意把这种特权让給中国领导集团。

不过，在討論印度政策的那一段里，共产党情报局的文章肯定了四阶级公式；因而，共产党情报局和中国在战略方面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但是，同俄国前一时期关于印度农民問題的評論恰恰相反，共产党情报局根本沒有提到暴力方法。因此，在基本的策略問題上，印度同志在接到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个方面的意见时，不能不感到这些意见含混不清，令人左右为难。但是

漲》，*For a Lasting Peace*…（《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Jan. 27, 1950），p. 1.

* 按《新华月报》所載亞澳工会代表會議開幕辭，刘主席在談到這一問題时，並沒有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而是用“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譯者

到了现在，兰納迪夫的战略从此宣告完結，已非常明显了。

印共中央委员会的改組

共产党情报局的文章发表以后，苏联的新观点就在印度共产党内充分发生了影响。兰納迪夫进行了自我批評，承认犯了“一些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錯誤”，并且保証忠于新路線。但是他的让步是有些保留的，因为他虽然承认應該联合全体农民，却坚持应使貧农和农村无产阶级摆脱富农的影响——这也許是对安得拉共产党领导人的有意打击。^①此外，根据后来的党内文件看来，兰納迪夫还坚持他的反毛澤东主义的立場，他在致党的另一领导人的信中說，北京會議宣言的某些部分是“极坏的提法。”^②

兰納迪夫的声明又为英国共产党正式理論刊物所轉載，好像他在伦敦仍然得到支持似的。但是杜德始終保持緘默，因此兰納迪夫就无法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有人贊同他的领导。只有安得拉書記处才能自称是新路線的正統代表。結果，这一派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假定同意下取得了党内领导地位。

在1950年5月中央委员会的一次會議上(这是两年以来的第一次會議)，安得拉的领导进行了一次党内的宫廷革命。頗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所以能够这样作，是靠了兰納迪夫亲自在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爭来的一项党章修正案，这项修正案賦予中央委员会以自行改組的权力。旧的委员会解除了兰納迪夫的总書記职

① “The Situation in India” (《印度的形势》), *Communist Review* (《共产主义評論》) (London, June, 1950), pp. 175—184.

② “Letter of the New Central Committee (Reconstitut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Elected at the Second Party Congress) to All Party Members and Sympathizers” (《[經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出之中央委员会加以改組的] 新的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及同情者书》), June, 1, 1950, p. 5.

务,然后选举了一个由九人组成的新委员会,其中有四人来自安得拉。值得说明的是在旧委员会的三十一名委员中,有十九人不顾政府对党的镇压得以出席了这次会议;有六人在监狱中,另外一人已故,三人受到了撤职或停职的处分,二人未能出席。新委员会选举安得拉书记处重要成员 C·腊捷什瓦尔·腊欧为总书记,从而完成了这次政变。^①

这次会议以后,《共产主义者》编辑部也立即进行了改组,并且在这个杂志的下一期中正式撤销了兰纳迪夫的自我批评声明,说它是“极端左倾的宗派主义路线”和“全面的托派论点”;在另外一篇声明中又对第一篇声明加以发挥,增加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形容词。编辑部在中国共产党二十九周年纪念时向它祝贺,宣称“殖民地世界的各国共产党都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它们的榜样。”^②

除了作出这些姿态以外,编辑部只对它的新政策作了笼统的说明。中央委员会在党内传阅的一份“告全体党员及同情者”的密函中,却有比较清楚的说明。^③密函首先回顾了党内形势。密函说,党组织已被领到“分裂的边缘,”而且在兰纳迪夫的控制之下普遍存在着“怀疑、阴谋和紧张的奇臭的兵营气氛”。只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新路线,进行干预,才在最后一分钟把党从“完全瓦解”中挽救出来。但是,新委员会在承认党是一片混乱之后,却又提出一个野心十足的纲领——而且在这个纲领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安得拉共产党人决心要动员全党进行武装农民革命。

新的中央委员会声明它的纲领不仅是根据共产党情报局的文

① 同上, pp. 13—14.

② *Communist* (《共产主义者》), III (July—Aug., 1950), pp. 1—26.

③ “Letter of the New Central Committee…” (《〔经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出之中央委员会加以改组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及同情者书》), pp. 4—15.

章和北京會議的宣言，而且也是根据俄国人——茹科夫、季亚科夫、巴拉布謝維奇、馬斯連尼科夫等——所写的文章制訂的，这說明它看到了国际上一切有关方面的指导文件。但是，尽管这些方面的文件在武装斗争問題上說得含糊不清，但中央委员会却不是这样。它說，中国的綱領首先意味着实行一种“民族統一战綫”的战略，在这个統一战綫中，中等资产阶级，包括富农在內，要同其他进步的阶级联合起来。其次，中国綱領的“主要之点”則是主张民族解放斗争“必須通过在农村进行武装游击战，建立解放根据地和解放軍——最后在全国范围夺取政权。”因此，中央委员会断言武装斗争是毛澤东主义的必要侶伴。

中央委员会在声明的另外一段中也承认武装斗争只是“許多”殖民地，而不是一切殖民地所必須进行的。但是，密函却坚持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局已把印度列为使用暴力的条件已經成熟的國家；为了支持这一点，密函可以而且也的确引用了共产党情报局在5月間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其中把印度列入正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國家。这篇文章再加上俄国杂志上的文章和刘少奇的演說中的許多类似說法，显然足以使新的中央委员会深信国际方面充分贊成它在印度全国进行堆楞加那式的暴动。因此，委员会說，“共产党情报局的直接政治指导和各兄弟党的政治支持”是它的路綫正确的“担保”。

新中央委员会除了在密函中自称获得国际方面的贊同以外，还譴責那些仍然认为印度事实上还不具备武装斗争的成熟条件的同志。委员会确实描繪出一幅具有巨大革命潜力的图景。它說，印度广大群众已經認識到，国大党政府是个“吸血鬼”政府，群众以前对这个“惡魔”政权所抱的幻想都已“完全破灭”，人民要求行动起来。委员会說，进行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即“群众要求統治

当局下台”——已經具备。“除了某些地区以外,就整个印度来說,現在已經具备了发动游击抵抗的客观条件。”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說法,党虽然事实上力量薄弱,但是加强和发展党的唯一途径就是采取暴力策略。密函虽然一方面也順便談到党不应忽視諸如迫切需要的改組等其他任务,但看来新的领导决心要把党引上“在农村中进行武装斗争的軌道。”

在另外一个意味深长的段落中,中央委员会通知說,党将重新支持語言地方主义的主张,而这一点曾为兰納迪夫所忽視。委员会在談到要求成立自治省的运动的声势时宣称,党必須“掌握主动,引导这些运动,使之成为爭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总的斗争的一部分。”它还像季亚科夫一样指出,这些运动的鋒芒是指向居于統治地位的大資产階級和封建王公的,并断言这些运动是“进步的。”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印共的新领导人就动手去实现把农民武装暴动扩大到全印度的目标。他們把堆楞加那的經驗写成一份机密的概要文件,以資示范;虽然这个文件差不多可以肯定是言过其实的,但却提供了最好的証据,說明共产党在該地区的行动的性质。据这个文件說,总共有三千个村庄实现了苏維埃化,一百万畝土地为农民夺取过来。正规的游击队队员为数已达两千,村自卫队估計在一万人以上。在印度政府軍占領海得拉巴以前,邦主的警察曾“屠杀”了約两千人,而游击队也反过来打死了数目相当的警察和地主。在反击印度政府軍的行动中,游击队歼敌二百,本身則伤亡三百多人。^① 根据新领导人的說法,那“照亮了印度人民民主革命道路”的运动就是这样。

① *On Telengana* (《关于堆楞加那起义的报告》), pp. 5, 9, 16.

为了鼓励各地都仿效这个典型，中央委员会接着就其他孤立地区游击运动的进展情况发出了一些通报和指示。例如，在一份关于米門辛格(东巴基斯坦)边境山区斗争情况的通报中，中央委员会对当地的运动情况作了非常详尽的叙述，包括其所采取的游击战术，制造军火的方法和袭击警察所的具体情况等。^①

两年以后，安得拉的共产党人在头脑比较清醒的情况下承认自己犯了“迷信武装游击斗争”的错误。^②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并未同他们一起迷信武装斗争。

党内的新反对派

腊欧领导集团的革命训诫使已经筋疲力竭和组织涣散的党更加混乱。印共没有接到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当局的有效而详尽的指导，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局很可能像在兰纳迪夫领导的初期一样，又一次只满足于让印共把革命活动进行下去，只要它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印共的某些集团却始终坚决反对当时实行的路线。

最引人注目的反对来自 P. C. 约希。约希这时已经正式处在党外，他曾经为反对兰纳迪夫的纲领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现在，又同样反对安得拉路线。他运用了他多年来从事党务活动所取得的经验和手法，同时又使用了共产党人差不多闻所未闻的反对计

① “Report on the Struggle in the Hill-Border Regions of Mymensingh, Bengal” (《关于孟加拉邦米門辛格县边境山区的斗争的报告》), Information Document N. 6 (1), (Sept. 30, 1950), [typed copy], 14 pp. 又见《特里普拉邦人民武装抵抗法西斯恐怖的英勇斗争》(“Tripura State People's Heroic Armed Resistance to Fascist Terror”), C. C. Information Document No. 5 (Dec. 3, 1950), [typed copy], 10 pp.

② “Self-Critical Report...” (《安得拉党委员会的检讨报告》), Part III, p. 3.

謀。他除了尽力同他过去的同事們保持联系并对他們施加影响外,还出版了至少三本人所共知的小册子,并創辦了一个月刊来发表他的观点。^①在呼吁人們支持他反对当权的印共领导集团时,他不仅向一般群众、并且还向外国的共产党公开申述自己的意见。約希的論战是极端輕率的,因为,正像他說的那樣,他的“心情十分煩惱”;但是他发誓說,他对党是忠实的,并且他沒有做任何他明知“同一个共产党人不相称的”事情。

約希完全是根据正統的理論来进行爭論的;他表现出他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报刊十分熟悉,并且常常表现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具有敏銳的洞察力。約希譴責腊欧领导集团犯了兰納迪夫犯过的錯誤,那就是,认为印度的革命形势已經到来。他同时根据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的解释和实用主义的証据声称,在印度举行武装暴动的时机还未成熟。在一篇文章中,他就印度和中国两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作了一个明显的对照,以此来証明,印度不能机械地搬用中国的道路。他基本上主张在实行四阶級战略和議会策略的前提下,回到战后初期的“效忠的反对派”的路綫。根据印度报刊的評論来看,約希曾广泛宣揚他的主张,以致政府希望他能在党外领导一个鉄托派,而且为了让他便于行事,就沒有逮捕他。^②

但是,对安得拉路綫更有力的反对来自工会中的共产党領袖。这个集团同样认为新的政策是冒险主义的政策,威胁到党作为一

① 见 P. O. 約希:《为实行一项群众政策而奋斗》(*For A Mass Policy*);《群众运动問題》(*Problems of the Mass Movement*)和《紅旗下的〈观察〉杂志》(*Views...*)。約希发行的杂志叫做《今日印度》(*India Today* [Allahabad]),从1951年5月开始出版。

② 《十字路口》(*Crossroads*, I [April 7, 1950], p. 7)曾引述了一些报刊的評論。

个組織的存在。由于他們更能在党内进行工作，因此他們的反对不像約希那样轰动一时；但是，它采取了不寻常的方式。

S. A. 丹吉再一次成为工会反对派領袖之一。1950年7月，他对报界发表了一个声明，否认印共在計劃举行武装暴动；他說，“不幸的是，某些共产党領導人的考虑不周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这种印象。”他宣称，他自己的观点不是最后的和权威性的，而且，党的政策的某些問題，仍在討論中，許多集团持有針鋒相对的意见。^①

一周以后，党的报刊登載了政治局的一个声明，大意說，丹吉的話只代表他自己的意见，不能代表党。^② 声明証实了丹吉的說法：印共政策正在党员中进行討論。声明說所有党员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过，“在公开的声明中，所有党员都必须遵守中央委员会宣布的路綫。”实际上，党内正在进行一場空前未有的爭論，而党的紀律則已被破坏无遺了。

在此以前，丹吉在4月間就写了一篇对党的政策进行分析的长篇批判文章，題为《关于加尔各答代表大会后我党的錯誤的根源的几点意见》，^③ 在党内进行传閱。而现在，到了9月間，阿約艾·高士和S. U. 卡堆又同他一起写了一篇类似的声明。^④ 声明断言党员的人数已从十万减少到两万；共产党工会处于“完全瘫痪和停頓”状态；农民組織“实际上已不存在”；而党的本身也处于“瘫痪和分裂”的情况之中。这两个声明的主要点，像約希的一样，都是对

① 同上，(July, 28, 1950), p. 2.

② 同上，(Aug. 11, 1950), p. 5.

③ “Some Notes on the Roots of Our Mistakes After Calcutta” (《关于加尔各答代表大会后我党的錯誤的根源的几点意见》)，43 pp.

④ “A Note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Our Party” (《关于我党当前情况的意见》)，pp. 4—5.

兰納迪夫和腊欧两人的冒险主义的攻击。

到 1950 年秋天，所謂总部党組已經成为反对派进行活动的中心。这个由总部工作人員和各种类型的党的領導人物所組成的党組，成为宣揚不同意见的讲坛，而且，这个机构确实还发行了一份叫做《总部党組公开論壇》的不定期反对派刊物。10 月里，这个刊物刊載了阿約艾·高士的一篇讲话，非常清楚地說明党已变成了什么样子；他說：

今天的实际情况是，印度共产党內沒有一個人能解决这一危机。正是国际上的同志們指出了我們的錯誤。既然我們對他們的意見的解釋莫衷一是，那么，只有他們才能幫助我們。因此，我們必須同国际上的領導人取得联系。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明了《持久和平》社論的意思。任何人如果自称他是正确的，那么，从他那方面來說，这就是狂妄自大。^①

来自伦敦的新指示

就在高士宣称印共面临着无法消除的“危机”的那一月里，終於从国外传来了一項新指示——这次是来自伦敦。在表面上漠不关心近三年之后，英国党終於重新担負起指导印共的任务，給了印共中央委员会一封英共政治委员会的密信。

但腊欧领导集团不仅最初拒絕按照英国党的指示行事，甚至还不让这封信在党内传閱。英国党的意见通常总是被认为具有权威的，而这次的意见，正像后来党內的指責所指出的，却被“压下”了。过了約三个月之后，即在 12 月間，这份文件才落到总部党組的手中，在总部党組“擅自”將該信在党内传閱后，全党才获悉这封信的内容。^②

^① Prabodh Chandra, “On ‘A Note...’” (勃腊波特·占德腊：《論〈关于我党当前情况的意見〉》)，p. 9.

^② “PHQ Unit’s Covering Note to the Letter of the Political

在这封信中，英国党斥責了印共领导集团，說它沒有对印度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沒有为改組印共提出具体的建議。它要求在全党展开“充分的自由討論”，并选举一个“能为党员所信任”的新的领导机构，以消除印共的危机。它批評說，选举现任中央委员会的方法，是“对民主的否定”。它要求彻底消除“托洛茨基—铁托主义的毒瘤”，建議召开一次选举新领导人的党代表會議。

在談到政策問題时，英国党的来信指出，印共在一些迫切的問題上显然沒有进行“及时的政治领导”，在朝鮮問題、和平运动、生活費用的不断上涨、比哈尔邦的饥荒或其他实际的政治問題上，缺乏政策。相反地，据該信說，印共却对这些問題“哑口无言”。問題的主要根源是曲解了1月間在《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因为腊欧领导集团根据这篇文章，誤认为武装斗争是印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信中說，在印度不应排斥武装斗争的策略，应当遵循这种策略，把它看作是“通往胜利的道路”；但是鉴于印共党内和印度国内的情况，目前还談不到这点。該信最后敦促印共利用一切合法活动的机会，尤其是要为日益临近的大选作好准备。

这封信在党内传閱后三个星期，印共中央委员会开会进行研究。它面临的任務是十分艰巨的：要制定适合于一个和平的党的真正的政治綱領，以代替抽象的战略概念或起义手册。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承认最初它是失敗了；它在會議公报中說，“在这次會議上，未能通过討論来消除主要政治分歧或制訂为大家一致同意的政治路綫”。因此，中央委员会扩大了，选出了新的政治局，“以便使党的领导机构能够代表党内所有主要派別。”腊捷什瓦尔·腊欧

Committee of the CPGB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总部党組附在英共政治委员会致印度共产党信上的附件》), Dec. 6, 1950, 6 pp.

暫時留任總書記。最後，中央委員會決定“儘快”召開黨代表大會，並宣稱它正在考慮恢復 P. C. 約希黨籍的問題。它還通過了幾項初步的政治決議，號召同其他左派政党和進步分子組成統一戰綫參加競選。^①

大約在這個時候，從倫敦又來了一項意見。R. 帕姆·杜德為了答復印共向他提出的五個問題，草擬了一份新時期的政策提綱。^② 第一個問題及其回答是為了強調和平運動，杜德說，必須發起和平運動來反對英美帝國主義集團，爭取亞洲的解放。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才說明了新政策的主要特點：在應印共的要求評價尼赫魯對朝鮮問題和中國加入聯合國問題的態度時，杜德說，這種印度外交政策有所改變的跡象，是“目前國際局勢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發展”。杜德說，雖然尼赫魯的政策只是“一個開端”，並且還沒有成為“一貫的和平政策”，但它已表現出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進行“猶豫的和有限的反對”的跡象。他指出，必須歡迎任何可以促使印度脫離帝國主義集團的步驟，必須展開聲勢浩大的運動，要求向這個目標繼續前進。杜德這一句話，就取消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三年來一貫堅持的那種對尼赫魯採取不可調和的敵對態度的政策，代之以一種有條件地反對尼赫魯、但又不否認在外交政策方面可能找到共同基礎的政策。這樣一來，就承認了尼赫魯可能成為“和平”的朋友。

對第三個問題的答復則大談其和平運動的重大作用，強調和平與自由的必然關係。杜德說，因為一切戰爭都是帝國主義戰爭，所以爭取和平也就是爭取擺脫帝國主義的統治。對第四個問題的

① *Crossroads* (《十字路口》), II (Dec. 29, 1950), pp. 5—6.

② R. Palme Dutt, *Situation in India* (R. 帕姆·杜德:《印度形勢》) (Bombay: Crossroads Pub., n. d.), pp. 2—6.

答复为印度詳尽地拟訂了一套策略路綫：在一个簡單的民主綱領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左翼政党和团体的統一战綫。杜德指出，这个“广泛的民主战綫”必須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統一战綫，是通过同其他进步政党的領袖和代表达成协议产生的。它应当制定出一个以独立与和平为基础、能获得大多数人支持的共同行动綱領，以使这一战綫最后成为一个可以代替现政府的組織。在答复第五个問題时，杜德十分明确地指出，在印度目前的形势中，不可以采取暴力策略。虽然他也指出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訴諸武装斗争，但他认为在目前还談不到这点。

在总部党組发給党内传閱的一份报告中，这些意见又得到进一步发挥，这份报告是由去伦敦同杜德进行私人談話的两个身分不明的印共同志写的。^①在这份报告中，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他們給尼赫魯政府所下的新定义，因为杜德再次提出了这样一种意见，即印度政府是由两种傾向或派別組成的。他在解释这一点时說，印度政府虽然是大資产阶级的政府，但这个阶级中以巴堆耳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比較倾向于帝国主义，而以尼赫魯为首的那一部分人則倾向于同帝国主义分道揚鑣。杜德說，因为大資产阶级中的某些人認識到，由于印度同中国接邻，同中国作战就可能意味着他們的灭亡，所以他們采取的外交政策并不总是同帝国主义陣营一致的。他說，因此，印度政府是搖摆不定的，必須用人民的压力来助长这种反帝傾向。

因此，归納起来說，杜德在 1950 年底通过这些同印度的来往，

① Deven and Bal Krishna, "Talks With Comrade R. Palme Dutt and Other Impressions Gained Abroad by Deven and Bal Krishna" (堆文与巴耳·格利什那：《堆文与巴耳·格利什那同 R. 帕姆·杜德同志的談話及在国外获得的印象》), PHQ Unit, Jan. 6, 1951, 6 pp.

提出了“人民民主”或“新民主主义”的战略和策略，但他暂时排斥了暴力革命。他主张把四个阶级联合起来，或是通过对“进步”政党采取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策略，或是通过对国大党采取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策略。对政府展开武装斗争的策略被搁置起来了。

准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虽然已经决定召开党代表大会，但是印共却仍因意见分歧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必须先解决这些分歧，才能使这次大会表现出应有的团结。因此，印共历史的下一阶段就是在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徐徐恢复的时期。印共只是经过长时期的逐渐复原过程，才从内訌和外患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在1951年4月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采取了第一个步骤，会议通过了“纲领草案”和初步的“政策声明”。^① 这些文件后来在党内传阅以供讨论。中央委员会在5月召开会议，对政策作进一步的讨论，初步通过了纲领草案。中央委员会还接受了腊捷什瓦尔·腊欧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新的总书记暂时没有选出，但阿约艾·高士被任命为书记处书记。几个月后，高士正式升任总书记。

10月，印共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印共报刊对这次会议未加大事宣扬，但据估计，参加会议的除中央委员会成员外，还有各地方组织的代表。它在略加修改后，通过了纲领草案和政策声明，它们因此终于逐步成为党的正式政策。

印共的新纲领煞费苦心地阐明了杜德所提出的新路线；它不仅是竭力迎合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竭力迎

^① 《印度共产党纲领草案》，《新华月报》1951年10月号，第1290—1293页。
Statement of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印度共产党政策声明》) (Bombay: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1 [May]), 12 pp.

合中等資產階級的利益。^① 印共向“民主”資產階級保證，雖然印共堅決要實現社會主義，但“在我國發展的現階段中，共產黨並不要求建立社會主義”。因此，印共保證要保障私人工業的發展，使之不受外國的競爭，要求在政府的全面管理和統籌下建立混合經濟。在綱領的另一部分（其目的是為了迎合最廣大的群眾的心意），印共強烈地要求給予一切“民族”自決權，呼喚按語言區界重新劃邦和建立“自願的”聯盟。

但在對外政策方面，從這份綱領里可以看出，印共認為杜德的观点是難以接受的。認為大資產階級的政府居然可能成為和平與自由的朋友的看法，的確是十分新鮮的，因此，印共十分不願放棄尼赫魯政府是帝國主義的走狗這一提法；在綱領中，印共竭力強調說，該政府“基本上是執行英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並力稱政府的和平表白被它自己的行動所揭穿了。同時，綱領宣稱，尼赫魯政府不僅屈從英帝國主義，還允許美帝國主義滲入印度。由於原來的綱領草案修正後才提到了美帝國主義，因此它顯然表明在黨內有這樣一種看法，即美帝國主義對印度的威脅日益增加。

此外，凡是杜德把帝國主義國家籠統地說成是“英美集團”的地方，印共總是把它們區別開。在談到爭取民族自由這個目標時，綱領把英國看作是印度人民的主要敵人；它說，要取得真正的獨立，印度就必須同英聯邦斷絕關係，沒收英國資本，驅逐政府和軍隊中的英國顧問。但在談到爭取和平這一目標時，綱領卻又把美國當作主要敵人。它要求印度完全脫離以美國為首的戰爭陣營，並重申它以前的論點，即尼赫魯在和平問題上的政策是“騙人的”，或“可疑的”，是不符合印度的利益的。

^① *Programm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印度共產黨綱領》) (Bombay: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1 [Oct.]), 20 pp.

像綱領一樣，政策聲明對尼赫魯外交政策的看法也不像杜德那樣樂觀。^① 同時，兩個文件對和平問題的重視，也遠不如杜德所竭力要求的那樣。印共絕不肯喪失反對尼赫魯的主要政治武器——即指責他是帝國主義陣營中的走卒。

但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黨內在印共政策的主要問題上仍有爭論。在1951年，印共領導曾允許出版一些小冊子，上面載有黨員所發表的互相沖突的看法。其中一份叫作《公開論壇》的小冊子，據說是這一系列同樣性質的出版物中的第一份。^② 一年之後，有一期《黨內通信》承認，在黨的隊伍中仍然意見分歧。^③

印共在參加印度第一次大選的競選運動時，主要是依靠它的傳統的反帝口號作武器。在競選宣言中，它宣稱尼赫魯的外交政策“並不是和平政策”。它聲稱，一個“與帝國主義者勾結”的政府“不能實行獨立和進步的外交政策，不能實行真正的和平政策”。一般地說，宣言是非常嚴厲地對待尼赫魯政府的，說它是“賣國的”政府，“地主和壟斷資本家的、使用警棍和槍彈的”政府。^④（關於印共的競選運動的情況，見第十九章）

① *Statement of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印度共產黨政策聲明》）（Bombay: Published by Jayant Bhatt, 1951 [Nov.]), 12 pp.

② *Nehru's Foreign Policy*（《尼赫魯的外交政策》）（Bombay: Crossroads Pub., n.d. [1951 ?]), 28 pp. 這本小冊子包括洛梅什·塔巴爾的一篇曾發表在《十字路口》上的文章和兩篇不同意這篇文章的聲明——一篇是 K. M. 腊占寫的，另一篇是一群“巴黎讀者”寫的。兩篇聲明都批評了塔巴爾，說他對尼赫魯的外交政策採取了過于否定的態度；這兩個聲明發表後，塔巴爾改變了論調。

另一份同樣性質的小冊子是：S. G. 薩爾堆賽、蘇勃腊達·森·古普塔與達淪·巴蘇：《有關綱領草案中某些論述的經濟資料》（S. G. Sardesai, Subrata Sen Gupta, and Tarun Basu, *Economic Data Relating to Some Statements in the Draft Programme*）（n.p., n.d., [1951 ?]), 58 pp. 作者手頭的這一本小冊子無書名頁或封面。

③ *Party Letter*（《黨內通信》）（April, 1952）p. 34.

④ 《印度共產黨競選宣言》，《新華月報》1951年10月號，第1294頁。

选举的结果似乎是令人兴奋地证实了不妥协的反对策略是正确的,因为正是在那些印共斗争得最勇猛、甚至是最激烈的地方,尤其是在堆楞加那,印共得到了最大的胜利。印共中的激进分子想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采取更强硬路线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环境却日益要求采取与此相反的路线,要求更加重视把尼赫鲁培养成为和平运动的合作者的可能性。因此,在1952年底召开的印共扩大全会上批评了忽视和平运动的倾向,并宣称和平运动必须是印共的主要任务。^①但1953年3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所作出的决议,还是把英国当作主要敌人,仍然把尼赫鲁政府当作帝国主义的帮凶。^②

因此,当印共行将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支持还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問題虽然已经解决了,但是在支持还是反对尼赫鲁政府这个老問題上,党内还普遍存在着摇摆不定的状况。

第十四章 回到立宪共产主义

当印度共产党于1953年12月27日到1954年1月4日在馬杜賴(馬德拉斯邦)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印度共产党人发现,他們仍无法就該党在印度环境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問題取得一致意見。尽管自1950年以来,印共已逐渐放弃武装斗争的观点,但还不打算让自己仅仅起一个議會反对党的作用。由于1948到1951

① *Party Letter* («党内通信») (Jan. 30, 1953), p. 3.

② *Resolut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 (Delhi: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3), pp. 9-10.

年的冒险主义的緣故，激进方針受到怀疑。可是，激进派领导人远沒有死心，而且他們在安得拉、西孟加拉和孟买各邦的共产党据点中还有很大势力，所以仍然是一支必須加以考虑的力量。

馬杜賴大会代表們最为激动的一些爭端，虽然隐藏在行話和含混不清的詞句下面，但在仔細閱讀正式文件之后是能够辨认出来的。在这些爭端里，最有分歧和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組織統一戰綫的問題和印共对尼赫魯政府的态度問題。事实上，直到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后一問題还在党内討論中占着压倒一切的地位；而且人們在这个問題上的分歧也非常严重，致使印共党内相继出现危机。

因此，这一章将叙述从馬杜賴代表大会到 1958 年初这一期間内，印共对尼赫魯政府的政策的演变。

在馬杜賴，正如以前常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印共为它所处的双重环境的互相矛盾的要求所困扰。一方面，印度政府在遵循着一种足以使苏联向它討好的中立主义对外政策。使印度的中立主义轉变为反西方情緒的可能性表明，国际共产主义对待印度的最好政策将是一种不仅能加深印度与西方的矛盾，同时还能增进印度同共产党国家的友好关系的政策。但是，如果一个受莫斯科领导的共产党从事一項重大的内部顛复运动，那么后一目的是很难达到的。苏联的任何一种使印度轉而反对西方的計劃都要求印共不要輕率行事，以免使共产党国家感到为难。因此，国际形势和对苏联的忠誠要求印共对尼赫魯政府采取溫和政策，这正是党内右派分子长期鼓吹的路綫。

另一方面，印度政治舞台上的某些要素，看来又好像是专为左派策略而提供的。要求建立語言邦的群众运动已經引起了相当的暴乱，政府的威信也因为国内許多語言集团的对立而受到威胁；而

且，印度境內有四千万穆斯林，这就意味着必須經常考虑教派的暴力斗争的可能性。克什米尔和納加族地区的动荡状态，构成了中央政府的另一主要問題。与此同时，日益增加的失业群众中間的不滿情緒和政府为解决土地占有問題上的拖拉作风，又加剧了國內的騷动。看来，渾水摸魚的机会比比皆是，因此出席馬杜賴大会的許多代表要求宣告漁汛已到。

馬杜賴大会上的冲突

馬杜賴代表大会必須拟定一个既能使右派滿意又能使左派滿意的方案。問題的关键在于决定誰是主要敌人，是美国还是英国。阿約艾·高士在評論第三次代表大会时說，“关于誰是我們的主要敌人這個問題，就不是一个学院式的问题，“因为我們的整个行动方針都跟這個問題有关联。”^①

安得拉党支部向馬杜賴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提綱，論証英国是主要敌人。提綱說：

“现在，同志們提出了这样的問題：难道美帝国主义不是反动的急先鋒，不是苏联、人民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主要敌人嗎？难道美帝国主义不是正对全世界的共产党，当然也对我們的党策划阴谋嗎？难道美帝国主义不是企图渗入我們的国家并剝削和奴役我們嗎？如果这些都是事实，难道我們不應該也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嗎？这些都是很中肯的問題，我們必須作正确的答复。我們的党，作为世界工人階級一部分的印度工人階級的先鋒队，必須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这是我們神圣的国际义务，說得更确切些，是我們自己的革命任务。我們，作为工人階級的政党，作为世界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要尽我們在國內和国际上的义务。

^① 阿約艾·高士：《論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輯》，世界知識社 1955 年版，第 143 頁。（本篇中譯本譯自 1954 年 1 月 24 日《新世紀》[*New Age*]。——譯者）

从国际方面来说，美国是世界反动派的急先锋，也是世界人民的和平与自由的主要敌人。但是，我们既然处在一个特殊政权控制下的国家内，就有许多具体的任务要完成。今天，我们民族自由的主要敌人是英帝国主义。”^①

这段引文和安得拉提纲的实质在于，印度国内环境的需要应该摆在国际环境的需要前面；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主要敌人未必就是印共的主要敌人；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不应妨碍印共在印度争夺政权。显然，安得拉邦的同志具有民族主义的倾向。

根据阿约艾·高士的说法，另一派想“把美国的威胁作为我们一切活动的轴心。”^②虽然这是最适合苏联对外政策当前需要的路线，但是，不应该认为这个路线的拥护者会自动把苏联的需要置于印共的需要之上。因为反美的路线往往使印共扮演效忠反对派的角色，而反英的路线却意味着这种或那种群众斗争。因此，反对安得拉提纲的这一派无疑包括很多像 P. C. 约希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从反美路线出发而得出的策略更符合他们的心意。

这两派的实力都很雄厚，但就人数来说，好像安得拉支部所领导的一派占优势。不过，这种优势已在某种程度上被勾销。第一，反美派有国际领导的权威作后盾；这一点从英共总书记哈里·波立特出席马杜赖大会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公开讲话时表明，他是专心致力于攻击美国的。^③第二，反美派由于美国政府有

^① *Communist Conspiracy at Madurai* (《共产党在马杜赖的阴谋》) (Bombay: Democratic Research Service, 1954), pp. 51—52. 这本马杜赖代表大会文件选辑是由孟买的一个反共情报组织——民主研究社 (DRS) 出版的。当民主研究社发表这些文件时，印共指责它们是伪造品。但是，这些文件与印共报纸所发表的文件十分相似，印共领袖也在私下予以承认，因此就有十分有力的理由要把它们看作是真的。

^② 高士：《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世界知识社 1955 年版，第 142 页。

^③ *Harry Pollitt Speaks* (《哈里·波立特言论集》) (Calcutta: National Book Agency, 1954)。

增加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这种可疑的意图，因而获得了支持。对巴基斯坦入侵的真实恐惧，特别是在克什米尔糾紛上的恐惧，促使印度政府、报界和輿論都把美国的計劃当作不友好的行动看待。（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問題后来成了团結印度群众的焦点，并使印共有了一个贏得越来越多的群众的爱国論点。）

阿約艾·高士在一篇評論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文章中，澄清了隐藏在誰是主要敌人这个問題后面的两种政策的选择：

如果說美帝国主义不仅是和平的主要敌人而且也是印度人民的自由的主要敌人，那么我們便不能采取其他任何态度，而只能借口同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作斗争而逐步支持尼赫魯政府。

如果說美国仅仅是对和平的一种威胁，而完全没有威胁到印度人民的自由，那末，对印度來說，反对美国威胁的斗争及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都失去了它一切迫切的意义。

党代表大会有把这一問題完全澄清的必要。因为，我們对于这一問題的認識，将决定我們对尼赫魯政府的根本态度。^①

高士說，只能有两种行动方針：“或者是与政府合作，而批評它某些具体的行动，或者是反对政府，而支持它某些具体的行动。”

由于这两派的力量几乎相等，馬杜賴大会通过的政治決議体现着一种不自然的妥协：印共决定反对政府，而支持它的某些具体行动。決議說，“不能因此而认为民主力量应当对政府的各种政策——即使是国际方面的政策——給与一般的全面支持，因为印度

^① 高士：《論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当印共把这篇文章重印成小册子时，这几段話已加以修改，不像这里說的那样明确。见阿約艾·高士：《論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Ajoy Ghosh, *On the Work of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Delhi: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4），p. 6.（世界知識社 1955 年版《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輯》刊载的这篇文章的譯文，虽然也譯自 1954 年 1 月 24 日《新世紀》周刊，但这几段話与本书所引有出入〔参见該选輯第 147 頁〕。疑系在編譯該选輯时据单行本作了相应的修改。——譯者）

政府并不是一貫地执行和平和与民主的政策。”^①高士总结道，“我们对尼赫鲁政府的态度仍旧是采取总的反对的态度。”^②

恶化中的印美关系

美国考虑给予巴基斯坦军事援助的消息，公众最初是在1953年11月知道的，尽管直到1954年2月25日才正式宣布。^③从11月开始，印美关系就在走下坡路了。印度总理和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对美国进行了严厉抨击，印度各地也组织了群众集会，抗议“美巴协定”。艾森豪威尔总统企图用美国也准备对印度提供军火的保证来缓和印度的情绪，但并未唤起新德里的友好反应。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艾森豪威尔总统这样做对他自己和对我们都是不很恰当的。如果我们反对给予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而我们自己却接受这种援助，我们就变成了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了。”他又说，鉴于华盛顿的行为，在克什米尔的联合国停火监督小组里的美国军事观察员今后就不能“被当作中立者对待了。”^④

美国助理国务卿华尔特·S. 罗伯逊据说曾经说过美国为了和平的利益，必须无限期地“统治”亚洲；这也无济于事。尼赫鲁在人民院发表演说时就痛斥美国说：“不管他们的目标是甚么，亚洲各国，而且肯定地说还有印度，决不会接受这个政策，并且决不打算

① 《印度共产党政治决议》，《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第7页。

② 高士：《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第145页。

③ 见（詹姆斯·W. 斯佩恩：《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James W. Spain, “Military Assistance for Pakista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政治学评论》），XLVIII（Sept., 1954），pp. 738—751.

④ *The Hindu*（Madras）（马德拉斯，《印度教徒报》），March 2, 1954, p. 4.

受任何国家的統治。”^①

苏联很快就認識到,印度总理发表的这种反美声明,对于苏联的对外政策是有利的。在尼赫魯在人民院发表演說十天以后,当时的苏联总理馬林科夫就对莫斯科的群众說:

印度这个伟大的国家对于加强和平的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貢獻。我們欢迎印度领导人對侵略势力在亚洲的企图所表现的警惕性。

在美国外交官員最近发表声明,声称他們企图无限期地統治亚洲以后,印度总理說,亚洲各国,包括印度在內,将不会同意这种政策,而且也不会屈从于任何外国的統治。

这番話是充分具有深刻而又现实的意义的。^②

1954年春天,尼赫魯在外交方面繼續采取了一些为共产党国家所贊許的步驟:他呼吁停止氢弹試驗;4月29日,印度政府在北京同中国簽訂了一項有关西藏貿易的协定,次日,印度政府同意把它在西藏的财产无偿地轉交給中国人。5月23日,U. K. 克里希那·梅农在日內瓦同周恩来开始举行一系列的会談,以后,周恩来又于6月25日到新德里与尼赫魯总理进一步会談。这些会談結果便产生了体现现时已很著名的和平共处的潘查希拉(五項原則)的公报。

改变路綫的最初努力

周恩来6月訪問印度以后,《新世紀》周刊上有明显的迹象可以說明,右派观点在印共党内日益得势。因为在这个周刊的7月18日的一期上,P. 腊瑪木尔底(該周刊的編輯,系印共九人組成的政治局的成員之一)写道,尼赫魯一周恩来的声明意味着“亞

① 同上。

② 同上, March 14, 1954, p. 5.

洲力量对比的改变。”他在用了几栏的篇幅攻击美国以后，提出他的結論說：

尼赫魯……今天已采取了一种反对美国在亚洲所策划的許多阴谋，并反对美国对印度进行威胁的立場。全体爱好和平的人类和我国人民都对此感到鼓舞。……

我国人民热烈地并衷心地欢迎同中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他們也同样衷心地欢迎同苏联的合作和友好的发展。……

尼赫魯采取的反对帝国主义者并站在和平力量一边的立場越明确，……我国亿万人民的支持也将越热烈。①

腊瑪木尔底然后又提出了口号，要求制訂一个“爭取和平与自由的全国性綱領”——这个口号就引起了党内的激烈的爭論。

我們联系阿約艾·高士在馬杜賴提出《政治決議》时他所作的发言来看，腊瑪木尔底的这个表面上不刺耳的口号的意义也就很清楚了。高士曾說：

爭取和平的斗争和爭取自由的斗争不是同一的东西。一个主要锋芒是对着美国，而另一个是对着英国。……我們應該明白，这两个运动的范围是不同的。和平运动比爭取自由的斗争更为广泛。一切参加爭取自由的斗争的人必須参加和平运动。但是，一切参加和平运动的人就不一定都願意参加爭取自由的斗争。②

但是，在腊瑪木尔底的口号中，爭取和平的斗争和爭取自由的斗争——这是馬杜賴代表大会曾煞費苦心加以区分开来的——却被說成是一个东西了。如果拥护和平的力量（包括尼赫魯政府在內）能够与拥护自由的力量（印共和它的同盟者）联合在一起，那

① P. Ramamurti, "Drive U.S. Out of Asia" (P. 腊瑪木尔底: 《把美国赶出亚洲!》), *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July 18, 1954), p. 14.

② 阿約艾·高士: 《印度共产党当前的任务》, 《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輯》, 世界知識社 1955 年版, 第 41 頁。

么，二者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

此外，腊玛木尔底还清楚地指明美国不仅是和平的主要敌人，而且也是自由的主要敌人；而这一分析的逻辑推论，正如高士曾经指出的，必然是采取“借口同美国的威胁作斗争，逐步地追随尼赫鲁政府”的政策。

腊玛木尔底的文章把党内的争论引向高潮，造成了论战的风暴，其最高潮就是指责政治局犯有改良主义倾向。看来促使高士在7月末前往莫斯科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党的危机，而不像宣布的那样是为了治病。

在9月5日到11日举行的由三十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大部分委员支持关于政治局有“改良主义”的指责。E. M. S. 南布迪里巴德在他向会议所作的正式报告中说：

经过充分讨论，中央委员会终于得出结论：在腊玛木尔底的文章中所提出关于争取和平和自由的全国性纲领的口号，可能给人以一种印象，使人以为，由于最近国际形势的发展，有可能制订出一个争取和平和自由的纲领来——这个纲领将包括国大党组织在内。

如上所述，这个口号是一个错误的口号，因为国大党组织是由地主和与英帝国主义合作的垄断企业主所控制的，它不能始终如一地支持和平的政策，因而也就谈不上同国大党组织制订争取自由的纲领了。^①

南布迪里巴德的报告指出，左派占了优势，党对尼赫鲁政府的态度仍然未变。

中央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没有正当理由改变党对国大政府的态度，或者修改上次马杜赖党代表大会提出的主要政治口号。……更谈不上放弃反对国大政府的斗争，或者修改用

^① E. M. S. Namboodiripad, "Counter Seat to by Asian Solidarity" (E. M. S. 南布迪里巴德：《以亚洲团结来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 *New Age* (weekly) (《新世纪》周刊), I (Sept. 19, 1954), p. 15. 黑体字系原有。

民主联合政府代替国大党政府的口号。从另一方面說，民主力量的任务，就是要加强这一斗争。^①

来自国外的忠告

尽管中央委员会在9月間提出了駁斥的意见，但腊瑪木尔底对国际共产主义政策趋向的分析，却是正确的。这一点在10月間，当共产党情报局的刊物发表了R. 帕姆·杜德的一篇重要文章时，就变得非常清楚了。杜德的文章认为，世界舞台上已經发生了变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已經加紧努力，以便渗入并統治西欧各国以前所有的、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錫兰在內的殖民地，并且根据这一事实，可以得出如下的重要結論：

第一，英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内的各个国家中的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已不再仅仅是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了，而是首先反对英国的直接統治和美帝国主义的日益加剧的渗透。如果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落入圈套，把美帝国主义者当作是英帝国主义者的对手和敌人，因而認識不到斗争的这个新阶段，那么，这就会使民族解放运动的目的落空并受到挫敗。……爭取和平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的战争竞赛的斗争，是和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是和爭取和平的斗争分不开的。**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的利益，是同民主反帝和平陣营以及促进并支持一切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行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②

因此，杜德所說的恰好就是腊瑪木尔底在7月間所說的話。他

① 同上。

② R. Palme Dutt, "New Features in National Liberation Struggle of Colonial and Dependent People" (R. 帕姆·杜德：《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特点》), *For a Lasting Peace, For a People's Democracy*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Oct. 8, 1954), p. 6. 黑体字系作者所加。

要求采取同尼赫魯政府合作的政策。当杜德的文章在印度发生作用以后，印共政治局对于中央委员会的九月会议攻击政治局为改良主义的指责，仍然耿耿于怀。政治局决心避免给人以提出类似的批评的口实，于是在11月间召开了另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来讨论杜德的这篇文章。孟买的反共组织——民主研究社(DRS)出版的一个印共党的秘密文件说，印共政治局召开这次会议的具体目的，是要反对杜德文章。^①

毫无疑问，杜德的文章在共产党情报局的官方刊物上发表出来，这就加强了中央委员会中的右派势力的地位，而且当中央委员会于11月间举行会议的时候，出现了僵局，这就有必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重新估价自馬杜賴会议以来的形势”。^②

在12月的第一周中；阿約艾·高士从莫斯科回到了新德里。《新世紀》周刊立即刊載了他写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表明，他在訪問莫斯科以后，似乎有点向右轉了：高士問道，“試問任何認真研究印度問題的人，难道能够否认尼赫魯先生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过去五年中所歷經的改变嗎？……(我們)支持这种改变，”他說；他还扼要指出新的政策是“支持尼赫魯先生外交政策中的和平方面，而

① *Communist Double Talk at Palghat* (《共产党在帕尔加特会议上的自相矛盾的論点》)(Bombay: Democratic Research Service, 1956), p. 92. 这是民主研究社出版的第二批文件选輯中的一卷。1956年9月，阿約艾·高士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只指出了选輯中有一个文件是伪造的，这个文件据說是季米特里·謝皮洛夫写給印度共产党的函件。高士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民主研究社出版的中央委员会向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文本要比正式发表的文本詳細。至于組織报告，高士說：“另外的一个所謂秘密文件就是政治局向党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組織工作上的某些缺点的意见。这个文件无所谓秘密可言。这个文件在全体代表中散发，但是没有发表，因为文件只是为了討論而用，并不是提交代表大会通过的。”(“Tissue of Lies” [《一連串的謊話》], *New Age*[weekly] [《新世紀》周刊], III. Sept. 23, 1956, p. 2)。

② *Communist Double Talk at Palghat* (《共产党在帕尔加特会议上的自相矛盾的論点》), p. 93.

且在國內要同反动政策作无情的斗争。”^① 而高士在 12 月 7 日举行的記者招待会上把印共的立場說得更加明确。他說：“尼赫魯政府的國內政策不符合群众的利益，而它的外交政策則符合群众的利益。”^②

使問題复杂化的种种因素

1954 年到 1955 年这个冬天，印度舞台上的許多事态的发展，使得印共的一些策略問題进一步复杂化了。11 月初，尼赫魯总理訪問中国归来，在 11 月 28 日发表了一次重要談話，他在称贊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对印共进行激烈攻击。他在这次談話中，还提到当时尚未与苏联言归于好的南斯拉夫鉄托元帅計劃訪問印度一事。尼赫魯說：“南斯拉夫就其或多或少是个共产党国家这方面而言，它是一个不寻常的国家。……南斯拉夫有它自己的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因此，南斯拉夫同俄国之間过去就有些疏远了。”^③ 后来，在鉄托在新德里向印度議會发表演說的同一天里，政府表示决心說，政府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样式的社会。^④ 鉄托还前往馬德拉斯参加了国大党的年会，并且在会上发表演說，贊揚印度政府的經濟政策。但是，共产党的報紙則根本不提鉄托的这次訪問。

① Ajoy Ghosh, "Communist Answer to Pandit Nehru" (阿約艾·高士：《共产党給尼赫魯先生的答复》), *New Age*(weekly) (《新世紀》周刊), II(Dec. 5. 1954), pp. 1, 13.

② "Ajoy Ghosh Answers Questions on Communist Policies", (《阿約艾·高士对有关共党政策的解答》), *New Age* (weekly) (《新世紀》周刊), II (Dec. 12. 1954), p. 13.

③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新德里《印度斯坦时报》), Nov. 29, 1954, p. 12.

④ 同上. Dec. 22, 1954, p. 1.

然而，这段时期中最重要的事件还是2月間在安得拉举行的选举。安得拉是印共的主要据点之一，这个邦的党的领导权掌握在富于战斗精神的人手中，印度共产党人在1952年的安得拉普选中干得很出色。人們普遍认为，他們将会在1955年的邦立法机构中改善他們的地位。因此，国大党便作了巨大的努力要击败共产党人，它同其他次要的党派结成联盟，花费了大批金錢，并且派遣了許多有全国影响的重要人物到这个邦去竞选。国大党在竞选运动中运用的主要法宝就是指責印度共产党效忠于某个外国。事实証明，所有这些做法都收到了效果，国大党赢得了一次轰轰烈烈的胜利，获得了61%的議席，而共产党人只获得8%。^①安得拉选举独特的现象之一，就是《真理报》在1月26日(印度共和国日)发表了一篇社論，不仅贊揚了尼赫魯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还贊揚了它的国内政策。^②安得拉的国大党选举策略家們充分利用这篇社論，把它全文翻印了成千上万份，在全邦各地散发。

中央领导的崩潰

印共中央委员会于3月17到29日举行会议，分析安得拉选举的失败原因；这时党内的分歧便达到了严重的地步，而且討論也“变成了一场尖銳的爭論。”^③根据一項文件所載：

① 关于安得拉选举的詳情，可參閱馬歇尔·溫德米勒：《安得拉邦的选举》，(Masshall Windmiller, "The Andhra Election"), 載《远东概覽》(*Far Eastern Survey*, XXIV, April, 1955, pp. 57—64); 和瑪格丽特·W. 費希尔与乔安·V. 邦杜兰特合著的《印度民主选举的經驗》(Margaret W. Fisher and Joan V. Bondurant, *The Indian Experience with Democratic Elec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56, pp. 79—86)。

② 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II (March 9, 1955), p. 33.

③ *Communist Double Talk at Palghat* (《共产党在帕尔加特会议上的自相矛盾的論点》), p. 93.

随着中央委员会的这次会议的召开，政治局及其仅有的一点点作用也就告終了。曾经在中央委员会的9月和11月的两次会议上所出现的分歧，现在显得更加尖锐了。更糟的是，这些分歧使得那些持有一定见解的人把那些同他们的意见相左的人看作是必须与之“斗争”并予以“击败”的人。^①

3月会议以后发表的正式公报，明确指出了安得拉竞选所以失败的两个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党的错误在于“没有向人民充分强调印度最近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世界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二个缺点则是“党没有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②但是，中央委员会始终未能作出挽救局势的具体决定。在随后的两个月中，局势继续恶化。11月间成立的负责重新估价党的政策的特别委员会这时也分裂成两派，每一派都各自准备了一个文件，以便提交给预定在6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加以考虑。

6月间，当尼赫鲁总理正在苏联访问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争辩了整整一个月，然后才通过了一个长达三十二页的政治决议。这个决议标志着争论中的两派之间的妥协，因为尽管决议表明了党对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明确立场，但是，它对政府在国内所起作用的评介，以及党对于这个政府应该采取的态度却是混乱而又自相矛盾的。

决议支持尼赫鲁的外交政策说：

印度在维护和平这场世界范围的斗争中，是一直起着伟大的作用的——这种作用提高了印度的国际威望，并且激起了每个爱国的印度公民

① 同上，pp. 93—94.

② “What Caused the Landslide? Communique on Delhi Meeting” (《大选中遭到惨败的原因何在? 德里会议公报》), *New Age* (weekly) (《新世纪》周刊), II (April 3, 1955), p. 8.

的民族自尊心。

一直为争取一种维护和平的前后一贯的政策而战斗着的共产党，欢迎并支持这种方针，并将作出努力，使之更加巩固。^①

决议中有一段攻击了印度政府的国内政策：

政府对待人民的需求和斗争的一般态度，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敌对而又充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态度。无论甚么地方的人民大众，只要他们起来为反对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而斗争，政府就坚决镇压他们。因此，政府的政策也就意味着对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民主权利的进攻，生产的中断，警察费用的增加，全国范围内的倾轧和冲突的加剧。^②

在以后的一段里，决议似乎又在号召印共参加政府的发展计划：

对政府主办的或实施的计划袖手旁观的倾向必须加以制止。我们应该参预其事；积极而又有效地同腐化、缺乏效率的现象以及官僚主义的作风作斗争；协助实施并推行这些计划，以便为人民谋求最大的利益。这一点必须成为党的活动的重要部分，成为我们在其中工作的群众组织的活动的重要部分。^③

6月决议中所体现的妥协，在解决党内分歧方面并没有收效，倒不如说它却使得这些分歧更加深了。就像以往一样，党再一次分裂成三个集团——支持决议的中间派和反对决议的左派和右派。根据党的一个组织报告说：

支持和反对决议的两派之间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反对派又分成两类——一类来自左派，一类来自右派）成了从上到下的党内生活的主要特点。在

① *Communist Party in the Struggle for Peace, Democracy and National Advance* («为和平、民主和民族进步而斗争的共产党»), (Delhi: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5), p. 4.

② 同上, p. 11.

③ 同上, p. 30.

大多数省内，即便是党的当前的活动也停顿了。^①

在6月会议上，中央委员会曾决定在12月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会刚开完，阿约艾·高士的“旧病”又复发了，7月7日前往莫斯科。9月6日他才返回印度。^②

9月间，中央委员会再度举行会议，但仍未能解决观点的分歧。这次会议通过了党纲的一系列修正案，并在提交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批准之前，要散发出去加以讨论。拟议中的修正案说明右派在对当前的路线作某些轻微的修改上获得了成功，但是拟议的修改的弦外之音却说明两派的观点又是多么势均力敌。举例来说，1951年的纲领曾把印度说成是：“亚洲最大的一个仍然受着奴役者掠夺和剥削的半殖民地附属国”，而拟议中的修正案中则说印度不是一个“附属的”和“半殖民地的国家”，而是“亚洲最大的具有半殖民地经济的国家”；它不是受“奴役者的剥削”，而是仅仅受“帝国主义的剥削。”^③

根据拟议中的修正案来看，很明显，中央委员会并不反对印度的外交政策，并且还一致认为，这个政策“大体上是一种有利于和平及民族自由的事业，缔造亚洲团结并主张同社会主义和民主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④因此，可以说，早在1955年9月，党内的意见分歧就主要集中在党对政府的国内政策究竟应该采取什么

① *Communist Double Talk at Palghat*(《共产党在帕尔加特会议上的自相矛盾》), p. 94.

② 见《新世纪》周刊 (*New Age, weekly*), II. (July 10, 1955), p. 1, and (Sept. 11, 1955), p. 4.

③ 见《印度共产党纲领》(*Programm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Bombay,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1), p. 24; 及《修改党的纲领的意见》(*Amendments to the Party Programme*)(Delhi: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5), p. 13.

④ *Amendments to the Party Programme* (《修改党的纲领的意见》), p. 11.

态度这一問題上。

布尔加宁和赫魯晓夫的訪問

10月16日,《新世紀》宣布,原訂于12月召开的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将延期到1956年2月2日举行。这次延期看来好像是由于苏联总理尼古拉·布尔加宁和尼基塔·赫魯晓夫訪問印度的緣故。印度报界普遍都把这次訪問說成是印共的一次挫敗,而且表面看来也确实如此。苏共領袖同印共領袖几乎毫无接触,記載下来的唯一接触,就是他們在政府的一次正式招待会上的匆匆握手。此外,印共也沒有取得权利正式参加欢迎苏联客人来印訪問的仪式,鉴于国大党領袖 U. N. 堆巴尔参加了这个仪式,印共党人非常恼火。从布尔加宁和赫魯晓夫的訪問中提高了威信的,是政府和执政的国大党。这就使印共感到不快。但是,从长远看来,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識形态受到了尊重,而且在印度公众心目中,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既然印度政府和国大党采取了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这一点就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四次党代表大会

由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于2月在莫斯科召开,而且阿約艾·高士要前往参加,印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便再度延期举行。这次大会終於在1956年4月19到29日,于馬拉巴尔区(現屬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据点帕尔加特召开。同以前历届党代表大会一样,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討論是秘密进行的。很多赶赴帕尔加特采訪會議的新聞記者只准予参加一次沒有爭論的公开會議。非共产党報紙对于这次大会的报道一般都是公式化和不大可靠的,至于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这类基本情况,报道有的說是四百,

有的說是四百六十人，其說不一。共产党報紙只报道了大会決議的正式文本以及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成員名单。

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政治決議案的辯論，看来非常激烈，党的机关刊物描述这次辯論時說，“其特点是，很多发言人都严肃而尖銳地提出了他們的观点。”^①

根据一項非共产党的报道，P. C. 約希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步驟，向大会提出了另外一个決議案，并且在正式表决中，得到了四百多名出席代表的大約三分之一的支持。^② 他的观点在最后決議中留下了深刻烙印，以致人們可以說，印共的正式路綫实质上已变成了右派的路綫。腊瑪木尔底在1954年7月发表的异端邪說现在已成了正統教条，因为決議宣称：“生活本身已經表明，爭取和平的斗争和保卫民族自由、爭取民主权利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的斗争是如何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而且彼此互相加强。”^③ 決議也明确了对政府应采取的态度：“政府采取的加强民族独立和国民經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垄断資本的每一个步驟都将得到我們最有力的和毫不吝嗇的支持。”^④ 在这阶段，印共要作为一个議會反对派。決議宣称：“共产党为了能够采取这样一种革命而灵活的政策，正确地發揮它作为民主运动的建設者和先鋒队的作用，就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全国性的力量。它必须成为现政府的一个反对党。”^⑤ 由于采取这种策略，印共将設法为实现各项改革进行真正

① M. Hanumantha Rao, "Fourt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in Session" (M. 哈努曼塔·腊欧：《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New Age* (weekly) (《新世紀》周刊), III (April 29, 1956), p. 1.

② *The Times of India* (Bombay) 孟买《印度时报》，April 26, 1956, p. 7.

③ 《印度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政治決議》，《印度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輯》，世界知識社1957年版，第5頁。

④ 同上，第24頁。

⑤ 同上，第26頁。

的斗争。它谴责国大党只会在改革问题上夸夸其谈。通过这种手段，印共将运用在邦和全国范围内建立联盟的办法，渗入政府机构。

这样的一条路线对印共来说是难于遵循的，因为印共要采取这条路线就必须有极大的克制力，也必须要有它从未表现过的巨大负责精神。要在民主立宪制度下成为反对派的领袖，印共不仅必须同那些对共产党过去的两面态度具有痛苦经验的非共产党领袖共事，而且还必须得到他们的信任。这就需要作出妥协，而印共对此是没有经验的，同时也是印共领导集团中很大一部分人所强烈反对的。但是，在帕尔加特通过的政治决议说明，印共是要作这种努力的。决议提到执政党时说：

国大党虽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并且吸引了许多地主参加它的组织，但是在它的党员中间仍有着广大的民主分子。它具有反帝的和民主的传统。政府最近采取的一些措施和应许的诺言，使得国大党甚至在那些正在离开它的某些人们中间恢复了它的地位。同时，在国大党内部以及在追随国大党的群众中间，也产生了急进的和民主的情绪。

我们对国大党的态度和对国大党各种政治政策的批评方法，必须照顾到所有这些因素；不应当排斥正直的国大党人，而要团结他们；必须在国大党内部加强争取国大党采取民主的政策斗争，增强那些采取——那怕是摇摆不定地——比较进步立场的力量。^①

至于如何对待其他主要的左翼政党，即人民社会党和它的支派社会党，新路线故意说得很含混，它只号召团结，但没有明确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决议说：“左翼党派的接近有利于团结群众中先进的分子，并且对于群众斗争和竞选都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②

① 同上，第33页。

② 同上，第34页。

帕尔加特決議对群众斗争这个问题的态度比1955年6月通过的決議温和得多。在帕尔加特決議通过以后，印共在果阿和語言邦的問題上，显然很克制。由于政府不主张在果阿进一步搞非暴力运动，共产党也就沒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公开行动，并且也沒有在1955年的非暴力运动紀念日組織一次活动——这原来是能够得到相当多的群众支持的。同样，印共也緩和了他們在語言邦問題上的宣传，虽然孟买邦的重新划界曾經留下一些不滿情緒，从而为不負責任的政治鼓动造成了溫床。这就使孟买邦的党組織很难按紀律执行党的全国性路綫。孟加拉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那里，由于印共領導了阻止孟加拉邦同比哈尔邦合并的运动，印共的地方党組織便在一次重要的議會补缺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因为这种地方斗争对于建設邦一級的党組織是极端重要的，所以，就不免有人經常施加压力，反对克制策略了。

非斯大林化的影响

当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印共的理論刊物发表了阿約艾·高士代表中央委员会致苏共的唁电。唁电說道：

我們怀着非眼泪所能表达的哀痛，悼念已故的斯大林同志的英灵。人类丧失了自己最崇高的代表人物，人类解放运动丧失了它最伟大的領袖，和平事业丧失了它的百折不挠的战士。……我們，当代的共产主义者，为人类思想和行动的巨人的逝世深感悲痛，而且将怀着驕傲的心情永远記住：我們曾与斯大林同志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一直領導和指引着我們，并教导我們如何为工人階級和人民的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①

① “Mess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印度共产党唁电》), *New Age*(monthly)(《新世紀》月刊), II(March, 1953), pp.6—7. 又见《悼念斯大林》(“Homage to Stalin”) *New Age* (monthly)(《新世紀》月刊), III (March, 1954), p. 1. 这篇文章对斯大林的贊揚比較更有节制，并且談到了“像个人迷信这样一

毫無疑問，國際共產主義的非斯大林化運動破壞了印共的威信和團結，但是要在本書中估計這個運動的全部影響，仍然為時過早。印共已經刊印了有關非斯大林化的國際文件，並通過了兩個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1956年3月，中央委員會的一個決議批評了“個人迷信”，但又用了這樣一段話來贊揚斯大林對革命進展所作的貢獻，緩和了對他的批評。這段話是這樣說的：

每一個人都知道，在列寧逝世以後，斯大林同志領導蘇聯共產黨進行了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以及反對右傾和左傾偏向的鬥爭。他發展和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他在抵抗希特勒侵略的戰爭中起了主導作用。他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各國共產黨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斯大林同志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偉大朋友，他的著作對他們的民族解放鬥爭提供了莫大的幫助。所有這一切都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遺產的組成部分，並將永遠鼓舞着全世界的共產黨人。^①

1956年6月4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赫魯曉夫攻擊斯大林的報告全文，這使印共不得不採取更為堅決的立場。7月，中央委員會發表了第二個關於“個人迷信”的決議，決議說：

很明顯，斯大林同志應對破壞蘇維埃民主和違反黨內生活準則負主要責任。同樣無可爭辯的是，在他的晚年，個人迷信有了極大發展。充分認識到斯大林的領導方法中產生的消極因素和嚴重缺點以後，印度共產黨認為，片面評價他在最後二十年，即在蘇聯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取得巨大發展的二十年里所起的作用，就會在群眾中造成思想混亂，而且會被共產主義的敵人利用來迷惑群眾。……很明顯，一種本身能夠產生這種違法亂紀現象的制度絕不可能使億萬人民在空前的規模上發揮出

些有害的傾向”，這可能是由於貝利亞事件引起的。值得注意的還有1954年3月7日出版的《新世紀》周刊I所附的斯大林專刊。

① “Resolutions on 20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關於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III(April 8, 1956), p. 5.

創造力并带来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苏联国内出现的錯誤和极端行为，并不是由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或者苏維埃制度的緣故，而是由于在实践中从多方面背离了它們的緣故。^①

1956 年末，由于明显看出苏联扭轉了非斯大林化路綫，《新世紀》周刊也就在斯大林七十七岁誕辰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一篇紀念他的文章。由阿約艾·高士执笔的这篇文章，承认“斯大林犯了一系列錯誤”，但最后却說：

但是，尽管斯大林有这些錯誤，人类将永远記住他的名字，认为他是历代最伟大的馬克思主义者之一，是崇高品格的化身，是思想和行动的巨人，是一个献身于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他对人类解放事业的貢獻将继续鼓舞全世界的亿万人民。^②

很多印度人都容易有英雄崇拜的傾向，而且往往把意識形态本身和这些意識形态的主要倡导人的品格混为一談。因此，如果对一个真正的信徒說，人类的“崇高代表人物”实际上是一个暴君和凶手，那就必然会使他对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感到痛心失望。

印共領導明白这一点，从他們担心有人利用赫魯晓夫的报告在“群众中制造思想混乱”一层就可以看出。因此可以預料，印共将竭力隱瞞或紛飾斯大林的罪过，以便使它的万神殿保持完整。

1956 年秋天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对印共的影响也是同样有害，同样难以充分估計的。受打击最重的就是印共的外围組織。其中的一些非共产党成員，由于不能宽恕苏联在匈牙利的暴行而脫离了这些組織。

① “Struggle Against Cult of the Individual in CPSU”（《苏联共产党内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III(July 15, 1956), pp. 1, 13.

② Ajoy Ghosh, “J. V. Stalin”（阿約艾·高士：《約·維·斯大林》），*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IV(Dec. 23, 1956), p. 3.

新思想的影响

但是，国际舞台上还有另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对印度共产主义的长远影响，也许比非斯大林化运动和匈牙利事件更为严重。这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的辩论。由铁托的异端邪说所引起的这场辩论的实质是：除了走苏联的道路外，是否也能通过其他的道路建成社会主义；苏联的领导人是否有权决定别国共产党的政策。^①这场辩论的某些方面一直使印共领导深深感到不安。

在1956年7、8月间，《新时代》（莫斯科出版的英文杂志）分两期登载了一个叫作莫德斯特·鲁宾斯坦的人所写的文章，题目是“不发达国家的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文章主要是谈论印度。鲁宾斯坦以明显的赞许态度引证了印度国大党的阿瓦底决议。1955年1月通过的这个决议责成执政党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样式的社会”。^②鲁宾斯坦在说明电气设备工厂、钢和肥料等工业归印度政府所有时声称：“这些发展国家工业的措施本身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是，在印度，正如在其他新近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经济落后国家一样，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在目前的情况下，印度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起着进步的作用。”因此，他结束道，“如果国内一切进步力量都能紧密合作，印度就可

① 关于这一辩论的重要文献可参阅保罗·E. 津纳编：《民族共产主义运动与东欧的群众暴动》（Paul E. Zinner, *National Communism and Popular Revolt in Eastern Europ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② 阿瓦底决议全文和有关决议通过经过的论述，见玛格丽特·W. 费希尔与乔安·V. 邦杜兰特合著：《印度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Margaret W. Fisher and Joan V. Bondurant, *Indian Approaches to a Socialist Socie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56）。

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正在許多不发达国家推行的經濟計劃，只有在工人和农民、有技术的青年知識分子、科学家、学生等积极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完成。”^①

印度共产党人对魯宾斯坦的文章感到异常震惊。他們本来认为阿瓦底決議是大資產階級用来欺騙群众的騙局，而现在，刊在苏联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竟暗示說，印度在国大党的领导下正在走向社会主义。更糟的是，它还奉告印共要同国大党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这无异于要无产階級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接受資產階級的領導！

阿約艾·高士在 10 月份的《新世紀》月刊上流露了印共的苦惱。在談到魯宾斯坦的論点“使人吃惊”的时候，高士問道：

哪一个階級从政府的經濟政策中得到最大的好处——这是一切馬克思主义者、一切严肃认真的經濟学家必須研究的問題，只有經過研究，才能断定政府所走的道路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甚至是不是民主計劃的道路。不幸的是，這個問題莫德斯特·魯宾斯坦竟然連提也沒提。^②

但是，高士說明了使印共苦惱的真正原因是文章对印共的意义。他引証了苏共中央对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并且說：

这篇文章实质上抹煞了这样一个深刻的真理，即：“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切形式中，不可缺少的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就是以工人階級先鋒队为首的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沒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資產階級，不論怎样激进和进步，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以新的产权关系为基础的。无产階級領導的民

^① Modeste Rubinstein, "A Non-Capitalist Path for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莫德斯特·魯宾斯坦：《不发达国家的一条非資本主义道路》，轉載在《新世紀》月刊(*New Age*, monthly), V(Oct., 1956), pp. 19—28.

^② Ajoy Ghosh, "On India's Path of Development" (阿約艾·高士：《論印度的发展道路》，*New Age*(monthly) (《新世紀》月刊), V(Oct., 1956), p. 8.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42 頁。——譯者

主群众必須掌握政权——这是建設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以工人階級为領導的人民的統治必須代替資產階級地主的統治——沒有这一条，社会主义是无法想像的。……总之，对印度这样的不发达国家來說，非資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无疑是存在的。但是，认为資產階級領導的现任政府能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却是一种幻想。印度共产党是不抱这种幻想的。①

高士虽然沒有用“修正主义”这样重的字眼，但是用这个字眼攻击魯宾斯坦的文章，肯定是适当的。从字里行間可以看出，这篇文章违反正統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到了抛弃共产主义战略和策略的最根本原則的地步。

痛苦的重新估計

1956年的几个事件无疑迫使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一反过去不能不正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弱点。在印度，共产党人特別为一个老同盟者，札雅勃腊加什·那腊延的质問所震惊。那腊延作为本世紀三十年代社会党的領導人，一度贊成同共产党結成統一战綫，結果給社会党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1月初，那腊延写了一封信給共产党，要求《新世紀》周刊的編輯——他称之为“同志”——全文发表他这封信。印共破例接受了他的請求，在11月18日发表了他的信。信里滿都是那腊延要求印共回答的問題。他問道：斯大林的全部罪恶怎么能对共产党人隱瞞如此之久？他說：“赫魯晓夫的‘揭发’其实說不上是揭发。共产党人——至少是他們的領導人——不可能不知道內情。那么他們为什么久久緘口不言？”他又問道：“难道共产党人准备赫魯晓夫把他們領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停止下来嗎？他們不打算进一步探明真相嗎？难道真相对共

① Ajoy Ghosh, "On India's Path of Development" (阿約艾·高士：《論印度的发展道路》，轉載于《新世紀》月刊(*New Age, monthly*), V(Oct. 1956), pp. 16, 17, 18.

产主义沒有任何用处嗎？共产主义能建筑在謊言的基础上嗎？”^①

过了一星期，阿約艾·高士用了两倍的篇幅作答，不过对那腊延提出的大部分問題都避而不談。他說：至于斯大林的罪行，“事情的真相是，我們直到苏共領導自己揭露了他的罪行之后才略有所聞。”他指責那腊延片面看問題。他說：“对你來說，消灭資本主义和地主土地占有制以及消灭人剝削人的制度似乎是无关重要的事。你对这样一个事实似乎也毫不重視：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过选出的机构在各級行使权力的，正是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識分子。”他要求那腊延“毫不含糊的承认，劳动群众在世界三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

高士确实作了自我批評的尝试。他說：

“我們承认，过去我們不應該把苏联的每一件事都理想化。我們應該对于社会党人和非共产党民主人士对苏联的批評給以更多的注意。我們承认，在我們中間和別的共产党內都有一种傾向，总是要为苏联所作的每一件事进行辯护，而对每一个敢于批評苏联政策任何一方面的人加以譴責。我們深深認識到，这种傾向对于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团結，甚至对于社会主义事业都有害处。我們决定放弃这种态度。”^②

但是，由于他繼續不加批判地贊揚共产党国家，并且板起面孔硬說在这些国家內，是人民“在各級行使权力”上面这番話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这样一来，高士实际上就是正面回答了那腊延提出而他在辯論中迴避的問題：“共产主义能建立在謊言的基础上嗎？”

^① Jayaprakash Narayan, "A Letter from Jaiprakash Narain," [sic] (札雅勃腊加什·那腊延：《札雅勃腊加什·那腊延的信》), *New Age* (weekly) (《新世紀》周刊), IV (Nov. 18, 1956), p. 7.

^② Ajoy Ghosh, "Our Observations on the Jaiprakash Letter" (阿約艾·高士：《我們对札雅勃腊加什·那腊延的信的意见》), *New Age* (weekly) (《新世紀》周刊), IV (Nov. 25, 1956), pp. 1, 8—9.

但是，到了下一个月，已有迹象证明，印共党内的其他人并不打算迴避这个问题。

12月，印共理论刊物上登载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暗示，札雅勃腊加什·那腊延的信至少已在高士的一个同志心中引起了一番“痛苦的重新估计”。这篇文章是由一个经常为党的周刊撰稿的人戴维·寇因写的，题目是《“策略”还是真理？》。寇因的特色是一向恶毒反美。他在1956年6月曾到赫尔辛基参加国际新闻工作者大会。在返国途中，他出席了在波兰举行的波兹南暴动审讯，并访问了苏联和中国。

寇因在他那篇刊于12月份《新世纪》月刊的文章中，对真理的性质发表了一套哲学议论，在此以前，他在写作中从未流露过这种思想。他说：

有时，人们可以从一些本来其他各方面都很聪明的人口中听到这样的话：“真理吗——那是有的，不过这也要看是从哪个角度来看，是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

然而，真理怎么会有什么角度呢！凡是想把人们替资本主义作的辩解解说成是事实的人，就不能不歪曲真理。真理本来就是在工人阶级这方面的，不然，便不会有共产主义运动。工人阶级不需要找任何“角度”来谈真理。……犬儒学派——和市僧——的行为有时是很粗鲁。他们说：“当然，真理是要讲的（比如在讨论会上，等等），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先占上风，然后再去管真理等等”。

这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哲学，那就是，为了共产党的胜利，你可以不择手段，你可以随使用一切阴谋诡计，是非的唯一标准就在于你能不能取得成功。如果你失败了，你就作“自我批评”；如果你胜利了，你就可以保证今后做一个最讲真理的人！……多年规避的争论最后应该归结为目的和手段的问题。我认为有必要指出，恶劣的手段必定会破坏原意善良的目的。手段决定目的。^①

^① David Cohen, “‘Tactics’ or Truth?” (戴维·寇因：《“策略”还是真

寇因的文章所以令人吃惊，不仅因为它是在紧接着他訪問了共产党国家之后写的，而且因为像这样老实而彻底承认共产主义运动的虚伪和欺騙性，在印度共产主义的文件中还从未见到。毫无疑问，当寇因談到犬儒学派和市僧时，他是指他党内的某些同志。他还說，“不幸的是，常言說，上一代的革命家会成为下一代的保守派，这句老話似乎还多少可以应用。”

印共获得政权

在印度获得独立以前，共产党人和許多印度民族主义者都认为，只有在一次暴力革命之后，才能取得自治。因此，后来英国和平移交政权就使他們大吃一惊。同样地，共产党人曾长期认为，要在独立的印度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只有通过使用传统的革命方法才能实现。但是結果又使他們大吃一惊。1957年4月，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的普选中获胜并組成了政府。这是他們第一次在印度获得政权，而政权是通过宪政方法获得的，这一事实一直在共产党人的思想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印共党内右派的論点——在目前条件下，議會斗争的策略胜过革命斗争的策略——已无比巩固了。

要在这本书中评价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的成績还为时过早。一方面，有人指責共产党人允許破坏法律和秩序，特别是在种植园地区；而在农村地区成立的人民委员会又为极权統治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又不得不对邦内活跃而叫嚷的反对派集团作出让步，特别是在教育法案方面。这个教育法案公布以后就被人广泛解释为是对基督教学校的进攻。把外国企业收归国有的計劃——在竞选运动中許下的主要諾言——被抛到了一边，至少是暫

理?》), *New Age* (monthly) (《新世紀》月刊), V (Dec. 1956), pp. 57—58.

时被抛到一边，代之以不是那么激进的措施。

印度中央政府对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的态度是一方面严密监视，一方面要它的各项立法严格遵守宪法。为了保证作到这一点，中央政府便运用宪法赋予它的权力去审查喀拉拉邦议会机关所通过的法律。这样一来，引起争论的教育法案就同土地改革法案一样，被搁置了数月之久。

当共产党人极力设法在这些约束之下管理他们的政府时，他们在党的组织方面进行了一些根本性的改革。在喀拉拉邦取得政权后还没有一个月，中央委员会就决定将预备党员必须经过预备期的规定暂时取消六个月，以便使党员人数增加一倍。另外还拟定了一个彻底改革党的机构的计划，1958年2月，《新世纪》刊载了新党章的草案。4月召开了党的特别代表大会。

和前一个党章不同，新党章草案的序言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把共产党说成是“坚实统一的战斗组织”。序言把党的目的说成是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其方法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印度的现实条件以及印度的历史经验、印度人民的传统以及印度民族的特点结合起来”。^①原封未动的概念是民主集中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新党章所勾画的组织结构较为灵活，至少在字面上较为民主。

经过1948—1951年堆楞加那事件以后，尼赫鲁总理的政府认识到，要用暴力大力扑灭印度的共产主义势必会使印度的民主受到严重损害。从此以后，尼赫鲁政府就集中力量迫使印度共产党放弃它使用暴力的倾向和对苏联的过分忠诚。阿姆利则代表大会

^① *New Age*(weekly)(《新世纪》周刊), V(Feb. 23, 1958), p. 7. (参见《印度共产党党章》，《印度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世界知识社1958年版，第31页。——译者)

暫時使尼赫魯确信这条道路是成功的，因为 1958 年 4 月 24 日当他在共产党取得喀拉拉邦政权后第一次到那里訪問时，曾在特里凡得琅說，印度共产党終於采取了“一个非常合理的途径。”他說：“如果他們按照印度的条件更多地为印度着想，我相信印度共产党人会越来越改变自己的看法，而不再成为高唱国际論調的共产党人。”^① 这种发展肯定是可能的，但是，正像尼赫魯本人已經注意到的那样，印共在莫斯科对南斯拉夫的动搖不定的路綫上亦步亦趋，这似乎表明这种发展仍然是遙远的未来。本书的第二部分将研究印共活动的某些方面，在那些方面，这种趋势是一目了然的。

① *The New York Times* 《紐約时报》，April 26, 1958.

第二編

第十五章 党：結構和职能

根据共产国际的“党的組織原則”，“共产党的組織就是共产党人領導无产階級革命的組織。”^①这种說法中包含的思想是，党的組織具有一个崇高的目的，因为只有党才能領導无产階級，也只有无产階級才能領導世界。共产党认为自己拥有独占政治領導权的权利，并且負有有效地行使这种权利的义务。因此，党的內部組織系統就具有了无比的重要性。^②

印度共产党的正式組織

共产党的崇高職責要求它首先是进行政治活动的“有效工具”。从理想上来說，它必須在紧密无間的团結之下进行活动——这种团結是以自觉的严格紀律为基础的。这一点要通过“民主集中制”去实现，也就是說，要通过既对党員負責又对党員拥有絕對权力的領導机构去实现。

作为一种党的組織方式的理論，“民主集中制”是以下述两个

① *Principles of Party Organization* (《党的組織原則》),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Ltd., n. d.), p. 2.

② 关于共产党組織的一般理論和實踐，見菲利普·塞耳茲尼克：《組織武器：对布尔什維克战略和策略的研究》(Philip Selznick, *The Organizational Weapon: A Study of Bolshevik Strategy and Tac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350 pp.; 并見內森·利特斯：《布尔什維主义研究》(Nathan Leites, *A Study of Bolshevism*)(Glencoe: The Free Press), Chapter X.

主要原則为基础的：(1)党的一切决策机构都由选举产生，并且必須定期向全体黨員汇报工作；(2)根据旨在保証少数服从多数的严格紀律，上級机关的决定对所有下級机关均具有絕对的約束力。^①从理論上說，权力是自下而上建立的，自上而下行使的。集中必須是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这就是說，各领导机构有“責任經常指导和系統地影响党的工作。”^②任何事情都不能听其自然或者放任“自流”。但在同时，这种集中的“民主”基础也必須是真正的；这就是說，权力决不能仅仅来自形式上的选举，而且还必須建立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間的“有机联系”上。黨員必須承认党内领导的合法性。

这种“民主”容許在实际作出决議之前持有不同的意见；但表示意见只是个人的特权，决不是党内或党委会内有組織的集团或派别的特权。宗派活动或“党内爭夺权力的斗争”，在理論上是不容許的。^③

正如印度共产党党章所具体体现的，“民主集中制”的結果形成了以間接选举为基础的等級制度。^④* 最基层的組織是“小組”

①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經典說法，載在苏联共产党章程；見詹姆斯·H. 迈塞尔与爱德华·S. 寇澤拉合編：《苏联制度研究資料》(James H. Meisel and Edward S. Kozera, eds.,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Soviet System*), (Ann Arbor: The George Wahr Publishing Company, 1953), p. xlix.

② *Principles of Party Organization*(《党的組織原則》), p.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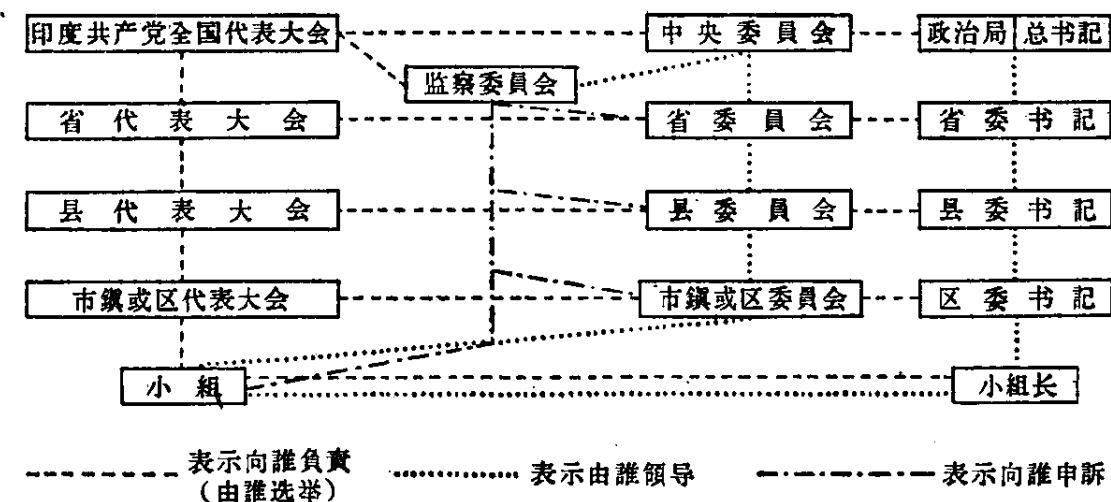
③ 同上, p. 2.

④ 《印度共产党党章》，《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輯》，世界知識社1955年版。以下引証党章的材料均出于这一来源。在某些細节上有些不同的較早的党章，包括：《印度共产党党章(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Adopted by the Second Congress...*), (Calcutta: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48), 18 pp.; 和《印度共产党党章(1943年)》(*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43*)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 d.), 12 pp. 关于1958年的組織机构改革，見附录。

* 以下引証党章的材料及党的組織机构名称，除另有說明者外，均根据世界知

(从 1957 年以后是“支部”)——由一个工厂、村庄或城市中邻里的一群党员组成。同一地区内的所有小组均参加其本市镇或本区的“党员代表大会”。这种代表大会规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它选举代表出席县党员代表大会，县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代表出席省代表大会，省代表大会选举代表出席印度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各级党委会，党委会又各选举书记一人；在最上层，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C C)，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P B)和总书记。各级委员会在各级代表大会的两年闭会期间，有权代行代表大会的职权。(见印度共产党组织表)

表一 组织表



选举的原则，事实上已为印共党章中的其他规定所取消。首先，书记(总书记除外)均须由上一级党委会批准。其次，每一级的党委会都有权撤消甚至改组在整个组织系统中处于其下级的任何党委会，命令下级党组织的代表大会延期举行。而且，最上级的中

識社 1955 年出版的《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中的《印度共产党党章》。

——譯者

央委员会还有权随意改组其本身。最后，各级党委会的委员都有权互选。因此，实际上，选举的原则是可以完全搁置起来的。

形式上向普通党员保证的党内讨论的原则，也同样受到了限制。印度共产党党章宣称“自由而认真地讨论党的政策”是每个党员的“应有之权利”。但它又说，“无限制的”讨论或组织派别的企图，就是对这种权利的滥用。它最后说，只有当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省一级的组织提出要求或是当中央委员会同意时，才容许展开“广泛的党内讨论”；总之，只有党的上级组织，主要是中央委员会，才能发起党内辩论。此外，党章还宣布，在这种辩论当真发生时，也必须“在中央委员会或下一级党委坚强领导之下”进行。讨论必须以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为根据，并且必须尽可能由上级组织派到下级组织去的代表亲自指导。

因此，印共的正式结构和章程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并维持一种高度的集中。的确，印度共产党的章程比俄国共产党的章程容许更大程度的形式上的集中，后者在 1939 年取消了各级党委会互选委员的权利，并在 1952 年取消了上级党委撤消下级党委的权利。^①

另一方面，印度共产党党章规定了普通党员表示意见的正式途径。党章在其为民主集中制所下的定义中说，党的每个党员或组织，均有权随时直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自己的“愿望、建议、意见或申诉”。此外，它还规定，党员如果不同意任何党组织的决议，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或全国代表大会申诉。最后，它还规定建立一个上诉法庭，其名称是监察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并受权复查各级党组织关于纪律处分的决定（撤消下级党组织，开除党

^① Meisel and Kozera eds., *Materials for...*, (迈塞尔与寇泽拉合编：《苏联制度研究资料》), pp. 314, 344, xliii, Lxi.

員等等)。監察委員會可以听取来自个别黨員或黨組織的申訴，或者受理中央委員會委托給它的案件。監察委員會在形式上隶属于中央委員會，因为它的決定必須由中央委員會批准；但它具有某种自主权，因为它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中央委員會选出的。

进一步比較印度共产党党章和俄国共产党党章的結果表明，前者对黨員的权利提供了更多的保証。在俄国共产党党章为民主集中制所下的定义中，不包括黨員或黨組織向中央委員會提出自己的願望的权利。此外，俄国共产党的黨監察委員會(Committee of Party Control, 以前叫 Control Commission [監察委員會])是由中央委員會而不是由黨代表大会选出的，并且完全是一个执行机构而不是一个上訴法庭。^①

这里所綜述的印度共产党的正式組織，当然只是党的实际活动中的一个要素。党的活动方式与党章所规定的往往很少相似。但是，如果說党章与印共的活动有任何关系的話，那么，党章似乎是要把一种不寻常的集中与普通黨員的一种不寻常的表达意见的自由結合在一起——或者換句話說，就是独裁与无紀律的一种矛盾的結合。研究一下印度共产党的活动就可以看出，这两种性质的确是共产党活动中的最突出的特征。

① 在其他共产党里，監察委員會或类似的机构，似乎被认为是中央委員會的統治工具。见罗杰·斯威临根与保罗·朗格合著：《日本的紅旗》(Rodger Swearingen and Paul Langer, *Red Flag in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94—95; 并见馬里奧·埃諾迪等人著《共产主义在西欧》(Mario Einaudi, et al, *Communism in Wester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87.

党活动中的独裁

正如本书第一編的历史研究所表明的，印度共产党的大权掌握在位于其金字塔式組織机构頂端的很少几个中坚人物手里。

印共党章要求每两年召开一次印度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但实际上在党的整个生命过程中仅仅举行过五次代表大会——在1943年，1948年，1953年，1956年和1958年。在代表大会閉会期間，全部权力掌握在由九名至三十九名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手內。

党章要求每三个月举行一次中央委員會的會議；我們沒有关于它的开会次数的詳尽資料，但平均說来，它的开会次数似乎远远少于规定的次数。1954年党的一个报告說，中央委員會在过去的十五个月內开了六次会，但把这一点說成是重大的改善；报告說，在那段时期以前，中央委員會有六个月沒有开会。^①在更早的时期，中央委員會每隔一年才开一次会。在中央委員會閉会期間，全部权力掌握在一个由三名至九名委員組成的政治局手內。

按照党章的规定，政治局必須每月开会一次。但它通常的实际开会次数，显然也远远少于规定的次数。因此，日常作出决定的权力，就落在总書記和实际駐在中央总部的其他少数几个政治局委員的手內。

上述1954年的报告暗示，仅仅有两位或三位政治局委員經常与中央有联系；根据这个报告透露，这个小小的领导核心就代表全党作出“重大的”决定。^②而且到1956年，情况实际上还是一样。1956年的一份党的报告詳細叙述了政治局委員們当时的活动：

① *Communist Conspiracy*…(《共产党在馬杜賴的阴謀》), pp. 131—132.

② 同上, p. 131.

Z.A. 艾哈迈德忙于他的省組織的事务，而且“除了参加政治局的會議以外，其他時間都不在党中央工作”；腊嫩·森花了一些精力去监督工会的工作，但“对党中央其他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沒有管”；S.A. 丹吉“对中央的工作不大感兴趣”；腊捷什瓦尔·腊欧“根本沒在中央工作”；而阿約艾·高士則由于到国外旅行大部分時間不在中央，并且“即使当他在中央的时候，也沒有管組織工作中的具体問題。”只有 P. 孙达腊雅、P. 腊瑪木尔底、E.M.S. 南布迪里巴德和哈利基閃·辛格·苏尔吉德，可以說是尽到了他們的一般職責。^① 換句話說，在那段时期，这四位领导人实际上垄断了印共的全部权力。

但是，無論把党的領導核心說成是中央的这几个人，或者說成是政治局，甚至說成是整个中央委員會，它总是一个很小的集团。印共的章程給了这个集团几乎是无限的正式权力。在危机时期或者当一位坚强果断的人物支配着这个集团的时候，它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在政策和人事上改組党本身。例如，在 1948—1950 年期间，当危机和坚强人物凑在一起的时候，权力实际上就垄断在总书记 B.T. 兰納迪夫和他在政治局內的一、两个坚定的支持者之手。这个集团在其分布于各个下层組織的追随者的协助下，至少撤消了一个省委会（孟加拉省委会），并改組了其他大部分的省委会。它开除或者停止了几百名黨員的党籍，其中有三个持不同意见的中央委員，甚至还有一个政治局委員。党的若干主要人物被清洗了，其中包括前任总书记 P.C. 約希，也包括下一任的总书记 A.K. 高士。兰納迪夫当时推行一种日益背离 1948 年党代表大会的指

^① *Communist Double Talk at Palghat* (《共产党在帕尔加特會議上的自相矛盾的論点》), (Bombay: Popular Book Depot for the Democratic Research Service, 1956), pp. 97—98.

示的政策，他不久就遭到了普通黨員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物的反对。但是，他利用党章所赋予他的权力和其他手段，竟得以維持他对党組織的正式領導权达两年以上。（见第十三章）

在这一次危机和其他危机中，党的监察委员会似乎沒有起到积极监督中央領導的作用。1950年，当 P.C. 約希請求监察委员会撤消对他的开除处分时，是中央委员会本身对这一案件作出了决定。它說，监察委员会无法行使职权，因为其中的两个成員正在監獄里，而且还有一个成員已被清洗出党。由五个成員組成的新监察委员会在 1951 年选出；在随后的一年半中，它开了四次会。关于它的活动的报告表明，它所处理的仅仅是属于区一級或省一級的案件，尽管它曾經推翻了属于这两級的若干有关紀律处分的决定。^① 监察委员会似乎是党內的較小糾紛的仲裁者，而不敢触犯党的中央領導。

独裁的工具：通信制度

印共的中央領導除了拥有党章所赋予的特权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权力工具。其中最主要的也許就是党內的通信制度。

印共公开发行一些报刊和小册子，其对象大概主要是黨員或同情者，而不是一般公众。同时它还实行一种正规的秘密通信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所謂「党内通信」。这是一种针对全体黨員的定期刊物，由党的总部发行，其中載有有关党的政策和活动的詳細报告和指示。当党的活动进行正常时，「党内通信」至少每月出版一期。此外，印共还发行了一种只供省委会和县委会閱讀而不发給普通黨員的定期刊物。这个刊物叫「中央委员会情报文

^① *Party Letter* («党内通信»), March 12, 1953.

件》，其中刊有十分机密的报告和指示，为了党的安全，这些文件都要绝对保密。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不定期发行的通信材料，例如通报和备忘录，其中经常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权威人士论述印度的文章。而且除了自上而下的通信以外，从理论上说，还有一种自下而上的正规报告制度。印共党章规定，每个党组织都必须按期向上一级的党组织报告工作。

在传送这些秘密的党内通信材料时，印共通常不需要依赖印度的邮政。过去，一个所谓“技术机构”或秘密网一直负责在中央与省的党组织之间和省与县的党组织之间每月传送一次通信材料。^①在印度共产党处于非法地位的时期，警察破坏了这个机构，严重地损害了党的效率。

显然，这种通信制度在掌握它的中央领导手中能够成为一种重要的武器。原则上，通信是严格地自上而下的，每个党组织只能通过从中央传达下来的通信获得关于党的活动和政策的情报。当然，实际上，每个党组织都通过非正式的接触获得相当数量的情报。但是，因为所有的情报最后都集中在中央，所以只有中央才有资格声称它掌握了充分的材料，从而能够据之判断党的整个形势。中央可以利用它对分发情报的控制权，设法使全党支持它所选定的路线。

中央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印度的看法的情报。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权威方面的未经公布的通信

^① P. C. Joshi: *For a Mass Policy* (P. C. 约希: 《为实行一项群众政策而奋斗》), (Allahabad: Adhunik Pustak Bhandar, n. d., [1951?]), p. 40. 关于印度共产党的“技术机构”组织，没有其他的材料。一个秘密的通信网大概是存在的，但它的活动的整个范围和性质无法估计。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印度共产党在它的革命时期(1948—1951年)的历史表明，它的地下机构的效率在当时是很低的。

——例如，来自英国共产党的信件——是只送给中央的。此外，中央还能更方便地接触到苏联报刊上用俄文写的文章，这些文章经常最先透露出政策上的改变，并且是被印度共产党人视为权威的；^①中央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俄文材料的译文，但在普通党员中，只有极少数人懂俄文，甚至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得到俄文刊物。这样，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明对印共领导进行了批评或者威胁到它的权威时，印共领导就能够暂时扣压这方面的消息，而且有时它也当真这样做了。

当然，如果这些声明刊载在像《新时代》之类的英文刊物上（它们正越来越多地刊载在这类刊物上），这种扣压就不可能了。此外，由于党的次要领袖也到共产党国家去旅行，因而印共的较低级的成员有时也能够获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印度共产党人，其中有許多二流的人物，到苏联和中国去旅行，并且参加了一些外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因此，党的领导通过对秘密通信制度的控制而得到的力量，并不是绝对的。

这种力量还由于秘密通信制度本身的效率较低而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首先，存在着文盲的障碍；有些党员仍然受不到党的秘密通信或公开通信的影响，因为他们不能阅读英文，有的甚至不能阅读他们当地的文字。党的最近的一个报告说，“大批”党员是文盲。^②而且，党员并不总是热心阅读党的材料的，“公开”刊物的发行量很低，就说明了这一点。印共自己就抱怨说，党组织内存在着

^① P. C. 約希有一次在谈到苏联共产党刊物《布尔什维克》（现名《共产党人》）上的一篇关于印度的文章时，说过下面的话：“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通过阿列克谢耶夫的文章评论了我们的党代表大会。”（*For a Mass Policy* [《为实行一项群众政策而奋斗》]，p. 40.）

^② 阿約艾·高士：《无产阶级领导与民主运动》，《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世界知识社 1955 年版，第 191—192 页。

一种对党的出版物“漠不关心”的态度，领导对于改善刊物的内容或者为刊物写文章，都不感兴趣，而且甚至连领导人自己都不阅读党的机关刊物。^① 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决议要求所有中央委员阅读一定的刊物，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有些中央委员甚至连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机关刊物《新世纪》都不看。

此外，这种通信制度也可能仅仅由于下级机构不积极响应而失去效力。这是党内文件经常抱怨的一件事。有一篇这类的党内文件说，中央委员会在一年之内所发出的几十件传阅文件，只有两件得到了全体或差不多是全体省委会的答复。此外，还可以提一提，这篇文件还抱怨说，许多来自下级党组织的报告是用当地的文字写的，而且“由于明显的原因仍然搁置在档案里。”^② 文字问题显然也困扰着印度共产党，正如它困扰着印度政界的其他组织一样。

总之，印共的内部通信制度，肯定还没有成为一种完善的权力工具。但是，在领导力求建立一个进行政治活动的有效而集中的机构方面，它却起了一种不可缺少的帮助作用。

思想教育的工具

党的通信制度的作用，主要在于它具有有一种基本思想教育工具的价值。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党的领导认为，反复灌输基本理论是团结和推动党员的主要手段之一。

中央委员会最近的一项决议说，思想工作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例如，决议在谈到小册子的作用时说，它们“会使一般党员

① E. M. S. Namboodiripad, *On Organization* (E. M. S. 南布迪里巴德：《论组织工作》)，(Delhi: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4), p. 74.

② *Communist Conspiracy at Madurai* (《共产党在馬杜賴的阴谋》)，(Bombay: Popular Book Depot, 1954), p. 133.

积极活动起来，加深他们对党的政策的认识，并在政治上把他们团结起来，从而在**巩固党的组织**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样一类小册子能使全党有纪律地和有组织地行动起来。”^①

但是，除了基本的思想训练以外，印共还进行了几种其他形式的教育。一种是在党内反复灌输军事纪律的精神。经常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在进行政治分析或劝诫它的党员时总是大量地使用军事术语。印共也是如此，它惯于使用“防御”和“进攻”，“前线”和“后方”，“战斗”和“休战”，“军队”和“部队”等等名词。这些词汇自然是从共产党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中产生出来的，但也可能是有意识地用来加强党内的纪律的。

从印共文件的风格上可以看出，它还采用了另外一种教育形式——在党内创造一种家庭的气氛；它异乎寻常地大量使用了只在家庭关系中使用的词汇。这一点在 P. C. 约希的著作中特别明显。例如，约希把国大党和印度共产党的关系描写成兄弟关系，而且有一次还宣称，印共党员把全体印度人民看成是“我们的真正父母”。还有一次，他很有意思地把党总部说成是“一个共同的大家庭”；当时由八个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个人的总部是按照公社的形式组织在一起的，并且由“一个唯一的母亲”来主持。^②这些说法和其他许多类似的说法表明，印共的领导力图利用类似家庭中的那种感情上的联系来加强党的团结——这种方法对许多抛弃了他们真正家庭的党员来说，可能具有特殊的力量。

此外，这里还可以提一提，共产党的纪律既约束党员的政治生活，也约束党员的私人生活。当约希担任总书记的时候，他有一次

① 《组织决议》，《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世界知识社 1955 年版，第 87—88 页。黑体字系作者所加。

② *People's Age*（《人民世纪》），IV（Dec. 30, 1945），p. 6.

向甘地說，“我們力求指導、批評和陶鑄我們的黨員的整個生活，包括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① 一位前中央委員索黎·巴德黎瓦拉在脫黨以後說，領導可以命令黨員結婚、離婚，甚至墮胎。^② 在開除出黨的通告中，有時把開除的原因歸之于“道德上的墮落”，而不是政治上的錯誤。而且由於黨力圖陶鑄每個黨員的全部生活，它就一直想把黨員的社會活動、娛樂和文化活動完全鑄成一個模樣。例如，許多黨組織都成立了戲劇俱樂部之類的文娛團體。這些俱樂部不僅幫助領導鞏固黨的組織，而且还一直是領導的一種有效的宣傳工具，因為它們能夠在群眾大會上表演政治諷刺劇或戲劇。^③

在對普通黨員進行思想教育和心理教育時，黨的領導並不完全依賴書報，另外一種方式是黨校。印共曾企圖建立一種等級的學校系統，以便定期訓練各級的黨員；其中既包括理論教育和組織訓練，也包括掃除文盲的初級教育。這樣一種系統顯然還沒有完全建成，但已經有過一些臨時性的專設中央學校，那裡的講義會重印數次，用來指導下級黨組織建立學校的工作。

最近在孟加拉建立黨校體系的企圖，就是省級黨組織進行建校工作的一個例子。^④ 孟加拉省委會成立了一個教育小組委員會，

① P. O. Joshi,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ahatma Gandhi and P. O. Joshi* (P. O. 約希：《聖雄甘地與 P. O. 約希之間的通信》)，(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5), p. 33.

② Soli Batliwala, *Facts Versus Forgery* (索黎·巴德黎瓦拉：《事實與偽造》)，(Bombay: National Youth Pub., 1946), pp. 6—7.

③ 關於對共產黨黨員心理的全面討論，主要見加布里埃耳·A·阿耳蒙德等人著：《共產主義的吸引力》(Gabriel A. Almond, et al, *The Appeals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413 pp.

④ Chinmohan Sehanobis, "Some Problems of Party Education in West Bengal" (緊摩含·塞哈諾比斯：《西孟加拉省黨的教育中的幾個問題》)，*New Age*(monthly)(《新世紀》月刊)，I(Dec., 1952), pp. 76—83.

这个小组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学校体系，并且提供了课程表和教师。党员和“积极分子”（可能入党的人）都报了名；最后有五百五十名学生进入了五十个正规学校。最初的课程是讲授关于印度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纲领的初步知识；以后的课程是讲授党和民族运动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以及共产党对各种问题——例如土地问题——的看法。孟加拉省委会终于不得不设立一个师资训练学校，以满足对教师的需要；此外，它还集中了若干套专门的教科书，其中包括斯大林、毛泽东、陶里亚蒂、索波列夫、克鲁格曼、罗斯托夫斯基和其他国际共产党权威人士的著作。此外，它还举办了公开的讲座和电影放映。

但是，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后来执行得不起劲了，主要的原因是下级党组织不能自己主办这些学校，因而丧失了热情；监督和管理的责任都属于教育小组委员会。^①正如在所有其他领域中一样，在党的教育工作中，集中也是一个不变的原则。用阿约艾·高士的话来说，“教育工作必须由负领导责任的各级党委来组织，必须由党的负责同志亲自领导。”^②

这样，思想教育和心理教育就形成了支持印共党内独裁权力的另外一种有价值的工具，尽管是一种不完善的工具。

权力的零散化

如果从印共的行动上对它的专制独裁的一面进行一番研究，就可以看出，这个党似乎确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如果停留在这种看法上，显然就会造成误解。对印共内部活动的深入观察

① 同上，pp. 79—80.

② 高士：《无产阶级领导与民主运动》，《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第191页。

將表明，儘管它的領導握有它的全部權力工具，它却未能建立一個真正統一的組織。我們首先會看到，它的領導本身就是分裂的，而不是個統一的集體。

前面引過的 1956 年那件黨的報告表明，當時只有少數政治局委員在中央執掌大權。報告中的這一段大意是說，黨的許多領袖事實上都逃避這種權力；他們對中央的工作“不注意”或“不太感興趣”。這個報告暗示——而且這一點是由其他的黨內文件所証實的——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二。一個原因是，許多領袖從性格上說都不喜歡搞辦公室工作；他們寧願參加行動，領導罷工或示威，而不願在總部里參加一般的計劃工作。黨的文件經常抱怨說，全黨的各級黨委員會都不能夠正常地發揮作用，因為它們的許多成員都去參加現場政治活動去了。

第二個——而且是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黨的領袖們都不願脫離他們自己擅長的工作。他們寧願把他們的注意力放在他們個人興趣所在的方面——無論是像工會組織和國會那樣的活動舞台也好，或是像省組織那樣的下級組織也好。總之，這些領袖們寧願在黨的某一分支組織執行“具體的”權力，而不願在黨中央執行“一般的”權力。

政治局的委員還確實有幾次拒絕到中央總部去擔任職務。中央委員會 1954 年的一項決議曾批評“有些有能力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却“拒絕擔負這方面的責任。”^① 同年的一件黨的正式報告抱怨說，當政治局企圖解除某些領導人在省組織內擔任的工作而把他們調到中央來時，“不是有關的省委會或這些同志本人不願意，就

^① 《組織決議》，《印度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選輯》，世界知識社 1955 年版，第 75 頁。

是两者都不願意。”^① 1956年那份報告說，政治局的一個委員腊捷什瓦尔·腊欧甚至曾要求取消他的委員資格，以避免在中央工作。^②

這種情況所造成的結果就是，印共的領導分裂成了許多互不通氣的部分。“总的”權力已變得相對地沒有意義，因為黨的最上層機構已經變成了由各部門首腦組成的一個鬆散的聯合機構，其中的領袖們分別在自己的活動範圍內實行個人的控制。這種情況在1956年的報告中被描寫成政治局的“共同的缺點”。

這個共同的缺點就是政治局的各個委員未能使他們的個人活動服從整個黨組織的共同活動的需要。這一共同的弱點可以稱之為個人主義，這是小資產階級的一個典型的特徵。

正是這一點，使得政治局內部的活動形成一種特殊的局面：(a)每個政治局委員都只“願意管”與他“特別有關”的那一部分政治局的工作（不是某一個“外圍組織”就是某一個省），而且沉溺在這項工作中；(b)每個政治局委員都抱著一種“不干涉”“別人的工作”的態度；(c)以上兩種態度結合起來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整個政治局都不“願管”集體領導的主要工作。^③

例如，政治局對黨在和平運動、婦女運動和學生運動中的活動，就沒有實行集體領導；這些運動中的領導工作，“交給了個別的同志。”同樣，根據這份報告所說的，黨的報刊也是由個別同志領導的；黨的機關刊物上的文章“毫無例外地”是由一位撰稿人同“政治局的一個委員”商量之後撰寫的。在工會運動和農民運動這兩個重要領域中，政治局分別設立了小組委員會，但是，每個小組委員

① *Communist Conspiracy*... («共產黨在馬杜賴的陰謀»), p. 132.

② *Communist Double Talk*... («共產黨在帕爾加特會議上的自相矛盾的論點»), p. 96.

③ 同上, p. 101.

会都由两三个委员控制着；这些领域里的政策问题，“并不是整个政治局所能过问的”。^①

因此，正如所有的官僚组织一样，印共也要逐渐变成一个私人王国的集合体，每个领袖都在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拥有个人的权力。印共自己把这种情况叫做“官僚主义”，而且承认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尽管进行过多次自我批评，情况却仍然未变。因此，印度共产党不是一个单一的独裁政治的统一体，而是一个独裁政治的集合体——无论是按工作说还是按地区说，都是如此。

但是，这还仅仅是使印共陷于分裂的原因之一。“非布尔什维克”的无纪律现象，使得党进一步零散化。

权威的破产

一种长期抵制、甚至公开反抗党的既定政策的现象，一直困扰着印度共产党，这种现象在它的领导机构内部和那些既蛮横无理又能说会道的党员中间都存在着。这些从上到下的抱不同意见的分子，充分利用了党章所提供的机会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并且远远超出了在正当的领导下进行党内辩论那种理论上的限界。

印共的历史上充满了反对当权的领导集团的内部分歧的例子，其中最突出的包括下面几件：《安得拉信件》，这是一个省组织反对党的现行政策的抗议书；S.A.丹吉 1950 年的记者招待会，他在这次招待会上公开反对党最近的某些活动；P.C.约希的反抗运动，这个运动是利用大量的小册子和一种定期刊物公开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开的出版物上进行党内辩论是在 1950 年经过印度共产党的顾问帕姆·杜德批准的。他说，在沒有其他的方法

^① 同上，pp. 99—100.

反对“托洛茨基-铁托式的”领导时，这种做法“不仅是容許的，而且是必要的。”^①

对印共当权领导的反对，經常从所謂总部党組內产生出来。这个党組显然主要是由設在总部所在城市(现在是新德里)的各种党机构中的低級職員組成的，这些机构包括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党的报刊，印共議會党团办公处和全印工会大会总部等等。但它显然也包括上述机构中的某些重要負責人，而且近来甚至还包括国会的一些共产党議員。由于这个組織包括这样一些人物，而且又处在党組織的核心，它大概已經成了印共的最重要的“支部”。

正如前面已經說过(见第十三章)，在1950—1951年，总部党組在糾集力量、反对党的領導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了建立一个討論分歧意見的讲坛，总部党組召开了特別會議，并出版了一种新聞通訊——《总部党組公开論壇》。后来，在1953—1954年举行的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总部党組的十四个成員——其中有一个是国会議員——提出了一个決議草案，批評中央委员会未能向代表大会提出工作报告。^②

实际上，这个党組是如此的重要，以致它在最近正式被賦予了相当于一个省組織的地位。它以“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員”的名义定期举行會議，并且被授予了派代表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利。在1956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它派去了七名代表——比德里邦、古吉拉特、加尔那达克、中央邦、中央印度和博帕耳、瑪腊特瓦达或拉賈斯坦等邦的省組織的代表还多。这个集团显然还继

① “Talks With Comrade R. Palme Dutt and Other Impressions Gained Abroad by Deven and Bal Krishna” (《堆文与巴耳·格利什那同 R. 帕姆·杜德同志的談話及在国外获得的印象》), PHQ Unit, Jan. 6, 1951, p. 5.

② *Communist Conspiracy*... (《共产党在馬杜賴的陰謀》), p. 159.

續保持着它的反对领导的傾向，因为它在 1956 年 3 月举行的第三次會議上，通过了一个提案，要求中央委员会“重新起草”准备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政治決議草案，并且要求中央委员会設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一个新的党綱。^①

尽管大权在握的领导可以利用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特权，印共党内反对派的意见却从来没有能有效地压制下去。而且，这种反对派还常常采取有組織的宗派活动的形式。正如本书第一編对印共的历史研究所表明的，印共很少有不鬧严重宗派糾紛的时候，这种糾紛不断造成领导的更換。西方的大多数共产党和亚洲的其他重要国家内的共产党，在过去許多年中一直保有比較稳定的领导——这种领导能够在随着国际路綫的改变而改变政策以后繼續存在下去，并且能够逐漸建立一种日益成熟而有效的政治組織。印度共产党还没有“成熟”到同样的程度；它仍然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期間存在于其他党内的那类宗派活动所苦。对印共來說，一次政策的改变就意味着一次领导的更換，或者，說得更确切些，就意味着党内各派之間力量对比的一次变化。

正如在其他政党内一样，印度共产党内的宗派斗争也往往是由于党内不同部分的各种特殊利益而产生的。这里面首先是工会的利益。出身于工人階級的党员当然希望党的政策和活动以改善他們的生活条件为目的；那些由于领导工会工作而得到了工人群众拥护的領袖們，当然会去維護工会的利益。这些領袖通常总是支持一种捍卫工人階級的利益和感情的战斗政策，但是他們反对采取暴力的极端，因为那将引起政府的严厉鎮压，从而危及他們的工会組織。

^① *New Age* (weekly) (《新世紀》周刊), III (April 1, 1956), p. 4.

另外一种特殊利益是农民的利益。促成以腊捷什瓦尔·腊欧为首的安得拉派的建立的基本原因，显然是因为他们把农民追随者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还有另外一种利益，显然是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利益。以印共中这一部分人为其基本追随者的领袖们，自然要强调他们的利益，并且从而鼓吹一种以阶级合作为基础的比較温和的意识形态路线。此外，印共的国会派似乎也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这一部分人人数不多，而很有影响；在中央和邦的立法机关中代表党的这一部分人，当然很可能趋向于支持任何看来旨在维持或者改善他们在各自选区内的地位的政策。也时常有其他派别从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如学生或文化工作者——中产生出来。

地区性的利益对于印共内部派别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党的全国性政策的要求很可能同某一个省组织的特殊利益相矛盾。因此，省的领袖们，其中包括那些已经成了中央委员的领袖，总是拥护那些可能满足某一地区的特殊愿望的政策。尽管地区性的反抗情绪在印共党内似乎不像在整个印度那样激烈，但也仍然是影响印共行动的宗派活动的一个根源。在印度社会中的某些其他分裂因素如种姓和教派纠纷方面，情况也是如此。^①

迄今为止，印度共产党内没有一个领袖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各种集团都听命于他，并且依靠持久的个人权威把整个党团结在一起。总的说来，最上层的领袖都是党内各种具体力量的代表，因而一直是各种具体政治路线的执行人。

最近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宗派活动的情况和它所造成的分裂

^① 例如，见西利格·哈里逊：《种姓制度与安得拉邦共产党人》(Selig Harrison, "Caste and the Andhra Communis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美国政治学评论》), L (June, 1956), pp. 378—405.

性后果。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印度共产党表面上保持了几个月的团结，但到1954年中，激烈的党内争论就又爆发了。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部，都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而且在9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政治局提出了分别代表右派和左派的两个互相矛盾的声明。这两个声明，各有三个政治局委员签署，其他政治局委员则保持中立。经过了激烈的辩论以后，中央委员会以多数票表决，谴责右派为“改良主义者”，并且在全党传达它对右派的批评。

结果，政治局内的优势就转移到了左派手中。于是，政治局在11月召开了另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但在那一次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实际上谴责左派为“极端主义者”；随后，中央委员会传阅了一个决议，说在党的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是没有指明争论的性质。在同一次会议上，中央委员会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重新估价党的政策。但在讨论的过程中，这个委员会本身就分成了两派，并分别草拟了自己的建议，提交中央委员会。1955年6月，中央委员会在长达一月的会议中研究了这两个建议；尽管它终于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折衷的决议，分歧却仍然没有解决。因此，中央委员会正式准许那些未被说服的中央委员可以在他们工作的下级党组织中反对这项决议。此外，它还准许那些反对这项决议的人在一个新的党内刊物《党中央委员会论坛》上发表他们的意见。辩论在整个党内激烈地进行，而在1956年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展到了一个全面争论的高潮。^①

显然，处理这种情况的方式极端严重地违反了关于党内争论的正式规定。但是，由于另外一个原因，这种争论却具有重要的意

^① *Communist Double Talk*... («共产党在帕尔加特会议上自相矛盾的论点»), pp. 91—95, 102—103. 关于这次争论所涉及的政策问题，见第十四章。

义，那就是，它显示出印共内部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經院哲学的倾向。党的 1956 年的正式报告批評說，这种爭論的“性质是极端抽象的，——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群众运动的問題。”报告說，中央委员会按其作用來說，“不再是党的领导，而成了討論抽象理論問題的一个辯論会”。^① 印共早期的一个文件对它的内部爭論作了如下的描述：

同志們对重大的政治問題一直进行着激烈的討論，并且每个人都用自己最大的力量，企图将这些問題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联系起来。在到处进行着的几乎是无尽无休的討論中，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的尘封已久的书卷又被重新打开来，去支持人們的論点。^②

正如在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內一样，在討論任何观点时，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前还有)斯大林著作中的話，都是一种根本的論証。在印共的另外一个文件上，还有一段对这种情况的不大夸张的描述：

党委会甚至在討論細小的問題时也往往进行条分縷析的辯論，并把問題提高到基本原則上，这已經成了一种习惯。把意见上的分歧称为改良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已經成了一种通病。結果就产生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在大家一致同意的問題上，也不作任何事情。^③

按照印共的一件材料所說的，这种喜欢进行抽象辯論的现象，乃是“由于不去耐心地分析印度情况的显著特征而产生的缺点”；这件材料把这种缺点称为印共整个历史中的“主要缺点”。^④ 的确，

① 同上，pp. 58—59.

② Sehanobis, “Some Problems...” (塞哈諾比斯：《西孟加拉省党的教育中的几个問題》)，p. 76.

③ “Self-Critical Report of the Andhra Communist Committee” (《共产党安得拉委员会的自我批評报告》)[打字稿，1952?]，Part III, p. 13.

④ Bhayyaji Kulkarni, et al, *Struggle Against Sectarian Legacy and*

印共沉湎于理論公式的非现实世界的傾向，似乎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共产党。

依賴国际权威

但是，印共内部的派別爭吵并不能由于引証馬克思和列宁的話而得到解决。决定各派力量对比的最終尺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的路綫，而且在过去，哪个派別的政策路綫被认为当时已經得到国际权威方面的批准，哪个派別就占了上风。这里用“被认为”一詞是有必要的，因为国际的指导并不总是十分明确的，因而不可能完全消除引起誤解的可能性。在关键性的时刻，国际共产主义关于印度的声明一向是前后矛盾或含意不清的，而且也沒有更明确的秘密通信予以补充；結果，印共党內的某一个迫不及待的派別就可以暂时曲解声明的意义，并声称得到了上級的批准，而事实上，这种批准至少是可疑的。

有时，派別竞争还造成了需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直接进行干預的僵局。例如，P. C. 約希在反对兰納迪夫和腊欧的领导时所采取的最极端的行动，就是要求进行这种干預。在他所发表的那些小册子中宣称，变化不可能从印共内部发生。于是他便向其他共产党呼吁：“因此，弟兄們，现在必須由你們这些在海外的人来采取行动，并且迅速采取行动。”他繼續說，“由于我們是誠懇而忠实的共产党人，当权威方面指出我們的錯誤时，我們將承认这些錯誤，并将尽我們最大的努力去糾正这些錯誤，求得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調一致。”^①

for a New Perspective (帕伊雅季·古耳加尔尼等著：《为反对宗派遺毒和爭取新的前途而斗争》)，(Poona, 1950)。

① P. C. Joshi, *Views to Comrades Abroad and B. T. Ranadive* (P. C.

当改組后的中央委员会在1950年年中宣布新的政策路綫时，它承认印共的传统“一直是像一个钟摆一样在两个极端之間搖摆”，因而党员“现在发生怀疑是完全有道理的”；这就公开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問題：“有什么保証說中央委员会这次已經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呢？”中央委员会在回答这个問題时，列举了三条“保証”，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共产党情报局的直接的政治指导和兄弟党的政治帮助。”^①

S. A. 丹吉在1950年的一份党内文件中描述了那一年的危机和印共对共产党情报局指导的反应：

每个人都开始感到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头，但是沒有誰能够正确地把它說出来，而有些人則不願意說——一直到共产党情报局把它說出来。于是我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有一个共产党情报局給我們一些指示，这难道不好嗎？我們听从共产党情报局的話——即令不是听从毛澤东、刘少奇和其他人的警告——这难道不好嗎？那里有我們的希望；我們要糾正自己的錯誤。^②

因此很显然，印共的领导已經私下承认，它不仅忠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还謙卑地依靠它来解决自己的内部糾紛。丹吉曾經断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糾正一个党的錯誤之前，要“等待一段很长的時間”，希望这个党会自己糾正自己，只有“当失去了一

約希：《对国外同志和 B. T. 兰納迪夫同志的意见》，(Howrah: P. C. Joshi, 1950), pp. 29—30.

① “Letter of the New Central Committee (Reconstitut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elected at the Second Party Congress) to All Party Members and Sympathizers” (《(經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出之中央委员会加以改組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及同情者书》), June 1, 1950, pp. 15—16.

② S. A. Dange, “Some Notes on the Roots of Our Mistakes After Calcutta,” (S. A. 丹吉,《关于加尔各答代表大会后我党的錯誤的根源的几点意见》), April 20, 1950, p. 41.

切希望而事情并没有得到改善的时候”才进行干预。^① 这段等待的时间,对印共来说常常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它的宗派主义一直还没有找到自我医治的良方。

但是,这并不排斥印共党内的某一领袖或派别暂时起来反对这种依赖的可能性。印共有时只是在经过一段抗拒或至少是不心甘情愿的时期以后才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劝告。按照丹吉的说法,甚至像 P. C. 约希那样忠实的领袖有一个时期也曾企图与苏联杂志《新时代》的编者取得联系,以便要求他停止发表与约希的政策相矛盾的“使人为难”的文章。^②

然而,应当着重指出,尽管印共内部的派别斗争一直很激烈,但它从未引起过有组织的脱党。持不同意见的党员或派别的典型作法是在口头上反对当权的领导,但在行动上服从,或是完全不采取任何行动。尽管印共时常陷入几乎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和被动局面,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还没有任何主要派别分裂出去另行组党——就像印度政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由此可见,在印度的具体条件下,印共已经显示出了惊人的亲和力。

因此,如果全面衡量一下,就可以说,尽管印共的内部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既不够完善又缺乏效率,并且多次难免陷于严重的瘫痪状态,但它总算团结一致地渡过了许多次异常严重的危机。事实证明,它的亲和力量胜过了分裂力量。而最主要的亲和因素似乎就是共同的意识形态普遍渗透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坚持不渝的忠诚。

① 同上, p. 39.

② 同上, p. 40.

党的财务

印共的财务收支情况，外間知道的极少；印共向来不公布它的年度收支賬目，这是人所共知的。有一次，在1945年，当印共特别急于駁斥关于它从英国人那里得到财务援助的指責时，它曾建議让甘地或他委派的代表检查它的賬目，甚至还同意公开那些匿名的捐助者的姓名。^①但是这个建議当时沒有被接受，而且以后再也未提起过。

当然，經常有些关于印共接受莫斯科卢布的謠言，但是，尽管人們都知道印共在二十年代中曾从国外得到資助，却沒有任何証据說明它在最近若干年內接受过直接的資助。虽然如此，印共却以出售外国共产党政府免費供給的书籍和小册子的方式接受一种間接的資助，尽管这笔資助的数量不得而知。印度政府沒有切断外国书报的供应，但它也不准許共产党或其他政党的出版物在火車站之类的政府建筑物內的书摊上出售。

个人捐款是另一項主要的經費来源。这种捐款往往为数很大，因为印共把若干非常富裕的人吸收入了党，而这些人已把他們的全部或大部收入捐給了印共。例如，E. M. S. 南布迪里巴德就捐給了印共七万卢比（約合一万四千七百五十美元）。据传说，印共还从非共产党来源，甚至从某些企业家那里，获得巨額的捐款。

印共党章要求每个党员按月繳納党費，但是說明这些錢是供县級或县級以下的党委员会用的。党章规定，省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可以对某些党员的收入抽稅，以筹集基金。凡是收入相当多的党员，包括担任国会議員或立法議会议員的党员在內，必須按照

^① Joshi, *Correspondence*... (約希：《圣雄甘地与 P. C. 約希之間的通信》)，p. 9.

一定的百分比向党繳納他們一部分薪金；党的若干文件报道說，这些人有时反对这项規定。

总的來說，同执政的国大党比起来，印共似乎沒有充裕的財務来源，而且在过去，它曾显然瀕近絕境；1953年，《党内通信》报道說，所有的党组织都陷于“严重的財務困难”中，党出版的刊物也“面临着危机”^①。但是，近来印共已經有了比以前充裕一些的迹象。据《紐約时报》記者报道，1954年它在德里和新德里购买了九处上等的办公楼地基；据悉其中四处的总价将近一万一千美元。这位記者說，中央总部工作人員每月的薪金至少要五万美元，因为有二百名以上的专职人員在中央工作，他們的月薪从二十美元到八十美元不等。他說，印共在整个印度的全部开支，每月必須要数百万卢比。（一个卢比約合美元二十一分。）他断言，上述已知的印共經費来源“远远不能滿足”它的財務需要。他說，认为印共从出售外国书报上面賺錢的看法，确实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那些书报的售价很低，而其发行費用很大。但是当他提出“它的錢到底从何而来？”这个問題时，他却举不出任何具体事实，証明印共确有国外的經費来源。^②

如果印共接受大量的外国財務援助，政府多半会知道；而如果政府知道的話，国大党和尼赫魯本人也多半会利用这一点——特别是会在选举运动中利用这一点，因为在竞选时对印共的主要攻击就是說它同外国有联系。

有証据表明，中央总部有时不得不依靠下級組織来筹措它的日常經費。印共的一个文件說，在最近的財務困难时期內，中央委员会号召各省委会展开一个特別的經費募集运动。各个省組織都

① *Party Letter*（《党内通信》），April 30, 1953, p. 1.

② *New York Times*（《紐約时报》），May 30, 1954, p. 9.

定出了他們自己的指标，同时也决定了应当上繳中央委员会的比例。中央委员会說它在最近的将来需要十万卢比去应付它的开支，但結果它只收到了五千卢比。^①

中央总部在財務上的依賴性，会使那些比較富裕的省組織在中央拥有超过它們应有的影响。例如，能够指靠許多地主党员的财产的安得拉党組織，可能就是这样。

印度共产党的成分

印度共产党曾經多次决定要变成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但是，它的入党标准始終沒有大幅度地放松，而只要入党标准不变，它就只能是具有高度排斥性的党。

印共党章规定，一个党员应“承认本党綱領，在党的一个組織中工作，服从党的決議，并定期繳納党費。”凡申請入党的人必須有党员二人介紹，經他要参加的党小組通过，并須經市鎮或区的党委批准。他必須作六个月的“預备党员”（如果他出身于“地主或資本家”家庭，就要十二个月），在此期間他有党员的义务，但是沒有表决权。只有在預备期滿以后，党小組才能給予他正式党员的資格，这也同样必須經過上一級的党組織批准。^②（见表二）

党员的数目必須看做是一种估計数字，因为这些数字往往是从党的材料得来的；不过这些数字看来也并未过分夸大，因而很可能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印共党员人数的变化。

① Namboodiripad, *On Organization* (南布迪里巴德:《論組織工作》), p. 72. 这个文件中关于經費支絀的說法以及其他文件中的类似說法，当然可能是故意插到印共的文件中以便迷惑公众的。但这一点似乎不像，因为在那些不准备給公众看的党内文件上也有同样的說法。

② 《印度共产党党章》，《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輯》，世界知識社1955年版，第51—52頁。

表二 印度共产党的党员数目，1934—1957年

| 年 份 | 党 员 数 目 | 年 份 | 党 员 数 目 |
|-----------|---------|-----------|---------|
| 1934[1] | 150 | 1947[7] | 60,000 |
| 1942[2] | 5,000 | 1948[8] | 89,263 |
| 1943[3] | 15,563 | 1950[9] | 20,000 |
| 1944[4] | 25,000 | 1952[10] | 30,000 |
| 1945[5] | 30,000 | 1954[11] | 75,000 |
| 1946[6] | 53,000 | 1957[12] | 125,000 |

材料来源:

[1] *India and Communism*(《印度与共产主义》),(Simla: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1935), p. 208.

[2] *People's War*(《人民战争》), I(Oct. 4, 1942), p. 1.

[3] P. C. Joshi, *Communist Reply to Congress Working Committee Charges* (P. C. 约希:《共产党人对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指控的回答》),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6), p. 142.

[4] *People's War*(《人民战争》), II(May 14, 1944), p. 1.

[5] P. C. Joshi, *Communist Reply*... (P. C. 约希:《共产党人对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指控的回答》), p. 142.

[6] 帕姆·杜德:《今日印度》,世界知识社1954年版,下册第144页。

[7] George E. Jones, "Tumult in India"(乔治·E. 琼斯:《印度的骚乱》), (New York: Dodd, Mead & Co., 1948), p. 178.

[8] *People's Age* (《人民世纪》), VI(March 14, 1948), p. 6.

[9] S. A. Dange, A. K. Ghosh, and S. V. Ghate, "A Note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Our Party"(S. A. 丹吉, A. K. 高士与 S. V. 卡堆:《关于我党当前情况的意见》)[打字稿], p. 4.

[10] A. K. 高士的声明,载《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 Jan. 13, 1954, p. 3.

[11] 《组织决议》,《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第69页。这个数字中包括二万五千名预备党员。

[12] *New Age* (weekly)(《新世纪》周刊), IV(May 26, 1957), p. 5. 这一期的《新世纪》报道了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规定了在六个月内把党员人数增加一倍的指标。正如决议所表明的,这就意味着决心把党变成一个“群众性的”政党。

观察一下这些数字就会看出,印度共产党在 P. C. 约希领导

期間得到了穩步的發展。但是，1948—1950年企圖進行革命的結果，使黨遭到了嚴重的損失；黨員人數縮減到少於原有人數的四分之一——這個損失抵銷了大約五年期間的發展。在最近的幾年內，印共已經有了顯著的恢復，而且，如果它執行一種溫和的政策，黨員人數也許還會繼續增長。

關於黨員的社會成分，我們只能猜測。從1943年以來，黨從未公布過說明黨員各種不同成分的材料。但是，在1943年，印共確實公布過一個詳細的材料，不僅分析了參加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的成分，而且還分析了全體黨員的成分。^①

根據這份材料，這一百三十九名代表中包括八十六個“知識分子”，二十二個工人，二十五個農民，三個地主，兩個小地主和一個商人。材料還按照宗教派別對代表進行了分類，這種分類表明，代表中，有十三個穆斯林，八個錫克教徒，三個不可接觸者，兩個祆教徒，一個基督教徒和一個耆那教徒。其餘的代表大概都是出身於信奉印度教的家庭。值得注意的是，不可接觸者的人數竟這樣少，因為這個被壓迫的階級似乎應當是印共的一個豐富的黨員源泉。

參加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都非常年輕，幾乎有70%在三十五歲以下——而這些人都是黨的領袖，並不是普通黨員。差不多有一半代表是大學畢業生。將近四分之三的人進過監獄，他們被監禁的時間合計達四百一十一年；一半以上的代表有地下工作的經驗。

至於一般黨員的社會成分，據印共稱說，在總數約計一萬六千名的黨員中，有26%是工人，36%是農民，11%是學生；5%是婦女。這幾類合計僅占總數的四分之三左右，其餘的大概都出身於

^① *People's War* («人民戰爭»), II (June 13, 1943), p. 1, 和同上 (Aug. 1, 1943), p. 8.

中产階級。因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成分，在普通黨員中不像在領導人當中那樣占優勢。

在領導人當中，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占的比例之高是令人吃驚的，最近的印共文件仍然在抱怨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黨員太多；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印共仍在從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中吸收占很大比例的黨員。前面提過的使辯論抽象化的傾向，就是知識分子人數過多的證明，而這種傾向也許還在促使印共吸收更多的知識分子。

1943年那份材料表明，有二千六百名黨員是“專職工作者”或“把全部工作時間都用于教育和組織黨員工作的職業革命家。”由於這個數字占當時黨員總數的16%，這就表明印共由於專職人員過多而有些頭重腳輕。

只是在印共組成成分的一個方面——它的地理分布情況——可以找到較新的材料。印度共產黨黨員在印度各邦的分布情況，可以從各邦參加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名額上粗略地推測出來，因為邦的代表名額被認為是同它的黨員人數成正比例的。印共沒有正式宣布過參加1956年第四次代表大會的各邦代表名額，但是，大多數邦的代表名額可以從印共報刊有關全國代表大會前夕舉行的各邦代表大會的零星記載中找到。各省的代表名額以及某些省的黨組織的人數見表三。

表三的分析儘管並不完全，但表明了印共的地理分布很不平衡。由於根據規定，每個邦至少要派出四名代表，因而在那些僅僅派出了四名代表的邦里，共產黨很可能是幾乎不存在的。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南部（特別是安得拉、馬拉巴爾、泰米爾納德、堆楞加那和特拉凡哥爾—柯欽）占了優勢。除了一個例外——西孟加拉——六個最大的代表團都來自南部各個地區。

表三 从 1956 年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看印度共产党

| 省委员会 (PO) | 党员数目 | | 代表 名額 | 省委员会 委员人 数 | 省 委 书 記 |
|------------|-----------|----------|----------|------------------|--------------|
| | 正式 党员 | 预备 党员 | | | |
| 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人员 | | | 7 | | |
| 安得拉 | 11,700 | 9,000 | 59 | 35 | C. 腊捷什瓦尔·腊欧 |
| 阿萨姆 | | | | | 帕尼·波腊 |
| 比哈尔 | | | 21 | 25 | 尤根德腊·沙尔玛 |
| 孟买市 | | | | 21 | P. B. 瓦达 |
| 德里邦 | 500 以上 | | 5 | 12 | M. 法鲁奇 |
| 古季拉特 | | | 4 | 10 | 丁加尔·梅达 |
| 加尔那达克 | | | 5 | 7 | N. L. 乌帕达雅 |
| 中央邦 | | | 4 | 15 | 苏达莫·堆什木克 |
| 中央印度和博帕耳 | | | 4 | 11 | L. R. 坎德加尔 |
| 马哈拉施特拉 | 4,700 | | 24 | 21 | S. S. 米腊吉卡 |
| 马拉巴尔 | 7,369 | 3,203 | 37 | 29 | K. 德摩达滥 |
| 曼尼普尔 | | | | 13 | 陀格卓莫·比腊·辛格 |
| 玛腊特瓦达 | 657 | 184 | 4 | | C. D. 乔塔里 |
| 奥里萨 | | | | | 古鲁札滥·巴德乃格 |
| 旁遮普 | | | 20 | 17 | 哈利基因·辛格·苏尔吉德 |
| 拉贾斯坦 | | | 4 | 9 | H. K. 乌雅斯 |
| 泰米尔纳德 | 5,700 | 2,000 | 28 | 25 | M. R. 文加达腊曼 |
| 堆楞加那 | | | 32 | 31 | 巴曼·耶拉·雷迪 |
| 特拉凡哥尔-柯欽 | 11,000 | | 33 | 32 | C. 阿朱塔·梅农 |
| 特里普拉 | 2,700 | | 10 | 21 | D. 德勃·巴尔曼 |
| 北方邦 | | | 23 | 31 | Z. A. 艾哈迈德 |
| 西孟加拉 | 10,775 | | 44 | 35 | 约底·巴苏 |

注：关于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总数，印度的非共产党报刊上有下列几种不同的报道：四百一十一名(*The Statesman* [《政治家报》], May 1, 1956); 四百六十名(*The Hindu* [《印度教徒报》], April 26, 1956); 四百五十名(*The Hindu* [《印度教徒报》], April 27, 1956)。转载自《太平洋季刊》(*Pacific Affairs*), XXIX (Dec., 1956), p. 357。凡是沒有数字的地方，都是因为没有搜集到材料。

印度共产党的某些領袖

关于印共領導的其他特征，也是由于材料缺乏而不能进行詳尽的分析。但是，现有的关于某些最高級領袖的传记材料，却使我們得以对他們的经历、品质和才能进行一些推測性的評述。（见表四）

党的領袖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內部的或官僚主义的領袖，以总書記为典型。另一类是“民众”的或群众的領袖，以当选国会議員的黨員为典型。

第一类可以包括从 1934 年党正式成立以来的所有总書記。在 1957 年时，这些人都是中央委員，并且仍在党内担任領導工作。他們是：G. 阿提加利博士、P. C. 約希、B. T. 兰納迪夫、腊捷什瓦尔·腊欧和 A. K. 高士。

在 1950 年以前担任总書記的那些人（阿提加利、約希、兰納迪夫）之間，有某些共同点。首先，他們都是二十五年到三十年的黨員，有着长期的党内经历。他們都是大学毕业生，得到过从文学碩士、法学学士、科学博士等各种不同的学位。他們都是在大学期間或在刚刚离开大学以后入党的；这就是說，他們在政治方面的唯一經驗就是作共產黨員的經驗。他們都以具有思想家和宣传家的才能而享有盛名；他們都曾經有自己的鮮明的“路綫”，而且都是多产的作家。他們当中沒有一個人拥有任何有势力的群众，也沒有一個人公开演讲之类的群众領導艺术方面具有显著的才能。他們都来自印度北部，三个人中有两个是馬哈拉施特拉人。这三位領袖总的說来似乎是印度共产党內的“老布尔什維克”的代表。他們所表现的最重要的共同特点是：长期的經驗，杰出的学識以及理論和宣传方面的才能。关于他們的社会背景，现有的材料太籠統，无

表四 历届中央委员会

| | 选 出 时 间 | | | | | |
|-------------|------------|-----------|-----------|------------|------------|------------|
| | 1943年(22人) | 1948年(不全) | 1950年(推测) | 1951年(15人) | 1953年(39人) | 1956年(39人) |
| G. M. 阿提加利 | X (政治局委员) | X | | X (政治局委员) | X | X |
| 穆札法尔·艾哈迈德 | | | | X | X | X |
| Z. A. 艾哈迈德 | | | | X | X (政治局委员) | X (政治局委员) |
| 阿鲁那·阿萨夫·阿里 | | | | X | X | X |
| 达斯腊特·德勃·巴尔曼 | | | | X (政治局委员) | X | X |
| 约底·巴苏 | X | | | X | | |
| S. S. 巴德黎瓦拉 | X | | | X | | |
| B. D. 帕腊德瓦支 | X | X (已故) | | | | |
| 帕尼·波腊 | | | | | X | X |
| 阿淪·鲍斯 | X | | | | X | X |
| 罗米希·钱德拉 | | | | X | X | X |
| K. 达摩达滥 | | | | X (政治局委员) | X (政治局委员) | X (政治局委员) |
| S. A. 丹吉 | X | X | | X | X | X |
| 苏达莫·堆什木克 | | | | X | X | X |
| S. Y. 堆什班堆 | | | | X | X | X |
| S. V. 卡堆 | X | X | | | | |
| A. K. 高士 | X | X | | X (总书记) | X (总书记) | X (总书记) |
| A. K. 高普兰 | | | | X | X | X |
| 普卑什·古普塔 | | | | X | X | X |

| | 選 出 時 間 | | | | | |
|-----------------|------------|-----------|-----------|------------|------------|------------|
| | 1943年(22人) | 1948年(不全) | 1950年(推測) | 1951年(15人) | 1953年(39人) | 1956年(39人) |
| 穆罕默德·伊斯迈耳 | | X | | X | X | X |
| 索舍·辛格·卓什 | X(总书记) | | | | | X |
| P. O. 約希 | | | | | X | X |
| L. R. 坎德加尔 | X | | | | X | |
| N. K. 格利什南 | X | | | | | |
| M. 古瑪腊曼加拉莫 | X | | | | | |
| 索莫那特·拉喜利 | X | X(政治局委員) | X | | | |
| 丁加尔·梅达 | | | | | X | |
| O. 阿朱塔·梅农 | | | | | X | X |
| S. S. 米腊吉卡 | | | | | X | |
| 比斯瓦那特·穆克季 | X | | | | | |
| M. N. 果温丹·乃尔 | | | | | | X |
| E. M. S. 南布迪里巴德 | X | | | X(政治局委員) | X(政治局委員) | X(政治局委員) |
| S. V. 巴魯雷加尔 | | X | X | | | |
| S. G. 巴德加 | | | | | X | X |
| 古魯札溢·巴德乃格 | | | | | X | |
| P. 格利什那·比来 | | X(已故) | | | | |
| M. 巴薩瓦·崩尼阿 | | X | X(政治局委員) | | X | X |
| P. 腊瑪木尔底 | | | | X(政治局委員) | X(政治局委員) | X(政治局委員) |
| B. T. 兰納迪夫 | X(政治局委員) | X(总书记) | | | | X |

| | X | X(总书记) | X(政治局委员) | X(政治局委员) | X(政治局委员) |
|--------------|---|--------|----------|----------|----------|
| O. 腊捷什瓦尔·腊欧 | | | | | X(政治局委员) |
| D. 文加堆萨·腊欧 | | | | | X |
| M. 占德腊塞卡腊·腊欧 | | | | | X |
| M. 哈努曼塔·腊欧 | | | | | X |
| N. 勃腊萨达·腊欧 | | | | | X |
| B. 耶拉·雷迪 | | | | | X |
| 腊维·那腊延·雷迪 | X | | | | X |
| 曼泽尔·李兹维 | X | | | | X |
| S. G. 萨尔堆赛 | X | | | | X |
| 坡瓦尼·森 | X | | | | X(政治局委员) |
| 腊嫩·森 | | | X | | X |
| Y. D. 沙尔玛 | | | X | | X |
| 尤根德腊·沙尔玛 | | | | | X |
| 伊赫巴耳·辛格 | X | | | | X |
| P. 孙达腊雅 | | X | | | X(政治局委员) |
| 哈利基因·辛格·苏尔吉德 | X | | X | | X(政治局委员) |
| N. L. 乌帕达雅 | | | | | X |
| D. S. 瓦达 | | | | | X |
| M. R. 文加达腊曼 | | | | | X |
| H. K. 乌雅斯 | | | | | X |
| S. S. 优素福 | X | | | | X |
| 萨扎德·扎喜尔 | | | X | | X |

注：沒有“X”号的地方，表示左面的人在上方所标的年度内不是中央委员会委员。

据作者所知，印共没有公布过1948、1950和1951年各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但是，1948年中央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可以以许多方面的零星资料中推断出来。1950年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可以根据推测断定。

关于1950年的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情况，只有一项已知的二手资料。“我们驻印度的特派记者”在《东欧与苏俄》(*East Europe and Soviet Russia*, [London] VII [Jan. 18, 1951], pp. 1-4)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列举了以下的人：腊捷什瓦尔·腊欧，“南布德里巴德”(*Nambudripad*)，“比累斯·米斯里”(*Bires Misry*)，“那累延·累德底”(*Nareyan Reddi*)，“巴鲁雷卡尔”(*Parulekar*)，“玛兰达·辛克”(*Marinda Singh*)，“腊登·森博士”(*Dr. Raden Sen*)，“俞斯苏弗”(*Yussuf*)，丹吉(*Dange*)，“阿札伊·果什”(*Ajay Gosh*)和“加堆”(*Gatte*)。这个名单显然不是完全可靠的；姓名拼法上的错误表明作者对情况不够熟悉，并且名单也没有包括来自安得拉的全部成员，却相反地包括了阿约艾·高士等人，而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当时正是中央委员会的反对者，而不是它的成员。

1950年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及同情者书》(*Letter of the New Central Committee of 1950*, p. 13)对中央委员会们做了一些描述，但是没有指出他们的姓名。他们包括：四个来自安得拉的委员；“一个来自孟加拉的老政治局委员……”；“一个来自孟加拉的省委委员，他曾经是米门辛格地方武装起义的领袖”；“来自喀拉拉邦的中央委员之一”；“来自阿萨姆邦的中央委员，他……曾经根据他的经验组织过武装游击斗争”；“一个来自马哈拉施特拉的中央委员，他曾经在阿赫梅德那加尔发动过农民斗争，而且在工会和农民运动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这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必须从这些材料和其他材料中加以综合推断。假设《新的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及同情者书》对其成员的描述是正确的，就可以推断如下：

来自安得拉的四个委员显然是C. 腊捷什瓦尔·腊欧(总书记)、P. 孙达腊雅、M. 占德腊塞卡腊·腊欧和M. 巴萨瓦·崩尼阿。1952年2月8日出版的《十字路口》(*Crossroads* pp. 8-9)上的一篇文章，把孙达腊雅说成是一个“前”中央委员，把M. 占德腊塞卡腊·腊欧说成是一个“前”政治局委员。在联邦院官方“名人录”的传略中，M. 巴萨瓦·崩尼阿说自己是1950—1951年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在《关于我党当前情况的意见》(*A Note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Our Party*, p. 27)中，那个“来自孟加拉的老政治局委员”被断定是索莫那特·拉喜利。

那个“来自孟加拉的省委委员”或许是伊斯瓦尔·辛格。这位领袖后来在曼尼普尔很活跃，并且越过了缅甸的边境，1952年在那里的游击战争中被子毙。他大概就是《东欧与苏俄》(*East Europe and Soviet Russia*)中所说的那个“玛兰达·辛克”。

来自喀拉拉邦的那个委员可能是 E. M. S. 南布迪里巴德（伦敦的资料拼作“南布德里巴德”）。
来自阿萨姆邦的那个委员或许是比累什·米斯腊（伦敦的资料拼作“比累斯·米斯利”）。米斯腊是 1948 年阿萨姆省委会的书记。

曾经在阿赫梅德那加尔领导过一次农民斗争的那个来自马哈拉施特拉的中央委员，大概是巴鲁雷加尔。这位领袖主要是同瓦尔黎族的运动有关系，瓦尔黎人是阿赫梅德那加尔附近的县里的一个落后部族。

关于 1951 年中央委员会的资料，来自 M. R. 瑪薩尼所著《印度共产党简史》（M. R. Masani,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London: Derek Verschoyle, 1954）一书的第 124 页。

法加以綜合。

目前的总書記 A. K. 高士是不合乎这个标准的，因为他在党內的历史比較短（大約二十年），并且有很多共产主义运动以外的政治經驗；他在参加印度共产党之前，曾經积极参加旁遮普恐怖分子的活动，并且同国大党和罗易派的活动有联系。他与上述三人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主要是一个組織者而不是一个宣传家；尽管他的地位要求他在理論問題上撰写权威性的文章，但他並沒有在这方面显示出非凡的本領。然而，由于他有比較广泛的政治經歷，而且由于他不那么“教条”，他可以代表一种比較“现代化的”党内領袖的类型。

1950年至1951年的总書記腊捷什瓦尔·腊欧是曾經担任这个职务的唯一的南部印度人。从下面几点看来，他似乎是个典型的来自南部的領袖：他显然是在三十年代后期加入印度共产党的，他出身于富农而不是出身于城市，他主张执行一种比較重視农民的作用的政治和理論路綫。

在中央委员会內，南部印度的成員数目少于它应有的数目。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的人数表明，南部印度的代表代表着占总数一半以上的黨員；而且，在1951—1952年的大选中，被选入国会的共产党人約有70%来自南部印度。然而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选出的中央委員中，却只有41%是南部印度人。北部印度人之所以占优势，主要是由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发展情况所决定的。这个运动几乎完全是在北方的城市工业中心开始的。这主要是因为来自国外的那些帮助組織这个运动的密使——M. N. 罗易和英国共产党的代理人——都把这些地方作为发展黨員的最好基地而集中在这些地方。在三十年代末期以前，共产党在印度南部的势力一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这个地区也就沒

有产生过像来自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那样的具有长期經驗的党内領袖。

最后，应当看到，最高級的领导人当中沒有妇女，因为目前的中央委员会中一个妇女也沒有。事实上，根据印共最近的一个文件的說法，在全体党员中妇女的数目一直是“微不足道的”。^①

印共的群众領袖是以它的国会議員为代表的。这一类印共領袖的特点，分析了下列共产党国会議員的共同特点就可以推断出来，这些人是：A. K. 高普兰、K. C. 乔治、腊維·那腊延·雷迪、耶拉·雷迪、达斯腊特·德勃·巴尔曼、喜冷·穆克吉和累努·查格拉瓦尔底。这里面包括所有那些身为 1956 年中央委员会委員的国会議員，另外还有两个著名的来自孟加拉的国会議員。下述的情况是很引人注目的。首先，所有这些領袖都是在 1934—1940 年和 1945—1947 年的溫和“統一战綫”时期参加印共的。在参加印度共产党之前，这些人差不多都参加过国大党和国民大会社会党，具有广泛的政治經驗。他們大都有专门职业（教学或者当律师）。尽管沒有充分的材料說明他們的社会出身，但他們大部分似乎都出身于上层社会。最后，他們大部分都是在农民占优势的选区里当选的。

同印共的党内領袖們对比之下，这些“群众”領袖都有丰富的政治經驗，并且都表现出具有领导群众的技巧。他們远远胜过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似乎都是“天生的”領袖。他們的經歷以及他們是在印共作为溫和的“效忠的反对派”时期入党的事实表明，他們同他們自己的社会的联系，比那些党内領袖們更为密切。

印度共产党的未来，从根本上来說，很可能要靠它是否有本領

^① 《組織決議》，《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輯》，世界知識社 1955 年版，第 93 頁。

把这种“天生的”領袖吸收到它的队伍中去。而且由于党近来已經进入了一个新的溫和时期，它吸收这类領袖的前景和它的整个前途都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

印共的另外一位領袖 E. M. S. 南布迪里巴德，尽管他既未担任过总書記，也未作过国會議員，仍然值得注意。他似乎是一身兼备了党内領袖和群众領袖所应具有的个人品质。作为一个党内領袖，南布迪里巴德在非常靠近党的最上层处占有一个稳定的位置。他对党的事业的显而易见的忠誠，从他放弃财产和崇高社会地位上得到了有力的証明。他是一个具有非凡的才干和著述很多的宣传家，同时显然也是一个有能力的行政官員。也許最重要的是，他是以溫和著称的，而且从来没有同党内任何主要派別发生过紧密的关系；他实际上是 1943 年以来唯一参加了每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党内領袖（另外一个 P. 孙达腊雅），这最好地說明了上面这一点。由于他可以得到各方面的滿意，因而他就能够在各个派別之間进行調解。根据非正式的材料，南布迪里巴德在 1953—1954 年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得的票数最多，在 1956 年举行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得的票数占第三位。^① 在高士几次赴莫斯科治病的期間，南布迪里巴德曾代理总書記。因此，毫無疑問，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为党内領袖所必需的品质。

但是，他还特別具备群众領袖所必需的品质。他具有出身于最高种姓的社会声望，因为南布迪里家族是婆罗門种姓的最优秀的亚种姓之一。他还有丰富的政治經驗和巨大的名望，因为他在

^① 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选举，见《共产党在馬杜賴的阴謀》，(*Communist Conspiracy at Madurai*), p. 157; 关于第四次代表大会，见《共产党在帕尔加特會議上的自相矛盾的論点》(*Communist Double Talk...*), p. 155.

三十年代末期参加共产党之前曾經是一个頗有才干的国大党領袖和社会党領袖。最后，他现在又具有了印度的群众領袖所必备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正式的政府官职。作为喀拉拉邦新共产党政府的首席部长，他得到了过去和现在的印共領袖从未有过的博得群众拥护的机会。在一个仅仅根据政府領袖的崇高职位而受尊敬的民族中，这是一个宝贵的机会。

由于种种原因，例如，由于他的政府的失敗，南布迪里巴德本人可能无法在印度共产党中获得最高地位。但是，他或者另外一个具有同样品质的領袖，可能会对印共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影响。

首先，这样一个領袖或許能够凭借个人的威信使党团结和稳定起来，这是至今还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的。这样，印共就可能摆脱它一直没有摆脱掉的不成熟状态，而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消除那些曾經降低它的活动能力的弱点——分裂成許多个人的王国，个人或集体的不遵守紀律的现象和經院哲学式的风气。印共可能会变得不再那么卑躬屈节地依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并不减弱对它的忠誠。

此外，这样一个領袖或許还能够使印共在印度的选民中获得威望，这也是过去任何人所未能做到的。在印度，領袖人物在政治局勢中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共产党的領導机构中如果有一个有吸引力的領袖，那就可能比任何綱領或标語口号更能增加它的号召力。

第十六章 群众組織

共产党是由优秀分子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被认为是革命的

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的最重要的輔助力量就是群眾組織，因為群眾組織是黨的主要政治力量的源泉；共產黨正是力圖通過這些群眾組織動員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的全部力量去進行革命的。

斯大林在 1924 年闡明了群眾組織的作用及其與黨的關係。他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說：

黨並不是工人階級的唯一組織。無產階級還有其他許多為順利地進行反對資本的鬥爭所絕對必需的組織，如工會、合作社、工廠組織、議會黨團、非黨婦女團體、出版機關、文化教育組織、共青團、革命戰鬥組織（在公開的革命發動時期）以及作為國家組織形式的代表蘇維埃（當無產階級執掌政權時）等等。這些組織極大多數都是非黨的，其中只有某一部分直接接近黨或者是黨的支脈。所有這些組織，在某種條件下都是工人階級所絕對必需的。^①

由於這些組織都是為一個階級服務的，根據斯大林的看法，它們就應當“按照一個方向進行工作”。但是誰來決定這個方向呢？答案是很明顯的：無產階級的黨。

黨具備為此所必需的一切條件，第一，因為黨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的集合點，這些分子和無產階級的非黨組織有直接聯繫，並經常領導它們。^②

斯大林得出結論說，黨

按其經驗和威信來說，它是能把無產階級鬥爭的領導集中起來的唯一組織，因而也就是能把工人階級所有一切非黨組織都變成使黨跟本階級聯結起來的服務機關和引帶的唯一組織。……參加這些組織的黨員，這些無疑是有威信的人，應該採取一切說服辦法，使這些非黨組織在自己的工作中跟無產階級政黨接近，並自願接受這個黨的政治領導。^③

① 《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55 頁。

② 同上，第 156 頁。

③ 同上。

关于共产党的組織工作的这些經典性原則，已經写进了印度共产党的党章。党章的第十一条說：

第一节 在各种群众組織，如工会、农民协会、学生和妇女团体、合作社、体育会和青年团体等等之代表大会、一般集会及委员会中，以及在地方自治机关和立法議會等里面，凡有党员二人以上者，即成立党組，以一种有紀律的党的方式来进行活动。党組必須努力爭取非党群众对党的政策的支持，以加强各該組織的团結、战斗能力与群众基础。

第二节 各級党組完全受各同級党委(中央、省、县、市鎮、区等委员会或小組)之管理，在一切問題上严格执行而不违犯领导它的党組織的決定。

群众組織的上級机关中党組，如取得同級党委之同意，得給該群众組織的下級机关中党組以指示，下級机关中党組应視為上級党机关的指示而坚决执行之。^①

对印度共产党來說，最重要的群众組織是那些属于工人、农民、学生和妇女的組織。在这些組織中，工会組織是它的政治力量的最大源泉。

全印工会大会

印度的现代工会运动发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即全印工会大会(AITUC)，成立于1920年。全印工会大会的組織者并不是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而是与印度国民大会党有密切联系的資产階級民族主义者。推动这些领导人的动机不仅是民族主义而且还有人道主义，早期的一个領袖(是个雇主)就曾經解释他参加的原因說：“如果我不偿还，至少部分偿还我欠那些受了虐待的工人的債，我就对不起自己。”^② 全印

^① 《印度共产党党章》，《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輯》，世界知識社1955年版，第63頁。

^② 1921年11月30日在查利阿举行的全印工会大会第二届年会的接待委员会

工会大会的第一任主席是拉拉·拉支巴德·腊伊。1917年M.N. 罗易夫妇在紐約就認識了他。不論罗易同腊伊的私人友誼如何，罗易并没有把腊伊和他的全印工会大会同事誤认为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1922年，罗易在《国际新聞通訊》上評論全印工会大会第二届年会时写道：

印度的工人階級运动的領導，并不是完全符合理想的。大多数重要工会的领导人不是与政府有間接联系的英国熟练工人，就是没有任何階級斗争概念的人道主义改良主义者或机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政客。^①

他这种评价到第三届年会时仍沒有改变，他把那届年会描述为“民族主义、烏托邦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一种奇妙的大杂燴。”^②

共产国际在1921年7月建立起紅色工会国际(RILU,有时称为“工会国际”),这清楚地显示了它对国际工会运动的关心。^③紅色工会国际立即把注意力轉向了亚洲的工会，因为这个地区一向是社会党人领导的国际工会联合会(IFTU)所忽視的。当全印工会大会于1921年11月30日在查利阿(比哈尔邦)举行第二届年会时，紅色工会国际发了賀电，并且呼吁这个印度的工会組織“在絕對平等的条件下参加这个爭取国际团結的新的伟大的世界运动。”^④全印工会大会的那些穩健的領袖既不想立即参加紅色工会

主席塞特·T. 腊莫朱什·阿加尔瓦拉的演說；載在米德腊編：《1922年印度年鑑》(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22), p. 457.

① M. N. Roy, "The Indian Trade Union Congress" (M. N. 罗易：《印度工会大会》), *Inprecor* (《国际新聞通訊》), II (Jan. 3, 1922), p. 4.

② M. N. Roy, "Where are the Masses?" (M. N. 罗易：《群众在哪里?》), *Inprecor* (《国际新聞通訊》), III (May 9, 1923), p. 333.

③ 见 E. H. 卡尔：《1917—1923年的布尔什維克革命》(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London: Macmillan, 1953), pp. 399—401.

④ S. D. Punekar, *Trade Unionism in India* (S. D. 布内加尔：《印度的工会运动》), (Bombay: New Book Co., 1948), p. 91.

国际,也不想立即参加国际工会联合会,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爭論一直延續了很多年。

印度共产党人在工会运动中取得一个立足点,是用了很长时间的,而且他們在开始时所获得的成就,似乎也是由于英国同志們的努力。早在 1924 年,英国共产党就开始組織那些到英国港口去的印度海員。^① 海員之所以最先受到注意,也許可以用共产国际的一种需要来解释,那就是,共产国际需要找到信差来把信件和宣传品帶給处在萌芽状态的印度共产主义运动。

我們所能够得到的有限的証据表明,印度共产党人在乔治·艾利逊于 1926 年 4 月到达印度以前沒有参加过任何重要的工会活动。据艾利逊的一个同事說,艾利逊是由紅色工会国际派到印度去“鼓舞印度的劳工运动”的。^② 在他到达以后一年之内,共产党人就能够提出了他們在組織紡織工人、鉄路工人、市政工人、碼頭工人和印刷工人(大部分是在孟买)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績。^③

艾利逊于 1927 年 1 月被捕,但这是在菲利普·斯普拉特也到了孟买以后的事情(见第 110 頁)。斯普拉特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工人和优秀的組織者,共产党的工会工作由于他的領導而获得了很大的动力。到 1927 年 5 月,孟买的共产党領袖已經能够說,他們不仅在孟买而且在印度其他几个地方都已取得了某些进展。印共的一个正式报告說,在拉合尔,同志們已經“在工会大会的活动中起了显著的作用,而且已經成功地組織了大約六个工会。”这个报告說,已經在孟买建立起来的工会“能够在全印工会大会中占

① *Meerut Sessions Judgement*(《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p. 61.

② Philip Spratt, *Blowing Up India* (菲利普·斯普拉特:《炸毀印度》), (Calcutta: Prachi Prakashan, 1955), p. 32.

③ *Meerut Sessions Judgement*(《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p. 179.

据一个很有影响的地位。”^①

但是，共产党人所組織的最强大的工会，还是他們在孟买的棉紡工人和鐵路員工当中所組織的工会，即紡織工人工会和大印度半島鐵路員工工会。关于早期的大印度半島鐵路員工工会，我們只有很少的材料。一个名叫 K.N. 卓格雷加尔的共产党人是它的主要組織者，并且在 1928 年，他曾經有好几个月往来奔走于大印度半島鐵路沿綫征集会員。^② 到 1929 年时，这个工会已經拥有四万一千名会員。^③

1925 年 8 月，一个紡織工人的工会，紡織工人大会，已經在 A.A. 阿耳威和 D.R. 瑪耶加尔领导之下在孟买成立；这两个人分別担任主席和書記。^④ 几个月以后，1926 年 1 月，N. M. 卓什领导成立了一个与他們对抗的工会，孟买紡織工会 (BTLU)。但是，卓什的工会不如阿耳威的工会斗争性强，因此，当共产党人开始积极插手孟买的工人事务时，他們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后者上面。

1927 年年中，孟买的若干紡織厂采用了一种“高效率計劃”，形成了裁减工人的威胁。它在工人当中引起的不滿給具有战斗精神的工会工作者創造了理想的气氛，因而到 1928 年 1 月，共产党人便計劃发动一次紡織工人的总罢工。卓什的工会虽然表示反对，但也被迫参加了罢工計劃，否則它就会被它的会員們所抛弃。他們成立了代表这两个工会的联合罢工委员会，并且在 1928 年 4

① 同上，p. 155.

② 同上，p. 366.

③ Punekar, *Trade Unionism in India* (布内加尔：《印度的工会运动》，p. 326.

④ 关于这一时期的孟买紡織工会的詳細情况，见《1928—1929 年孟买罢工調查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Bombay Strike Enquiry Committee, 1928—29*)，(Bombay: Government Central Press, 1929), vol. I. 这个材料是根据那个报告来的。

月 26 日开始罢工。在罢工过程中,阿耳威和瑪耶加尔之間发生了爭执,于是紡織工人大会便分裂成了两个。瑪耶加尔集团保留原来的名称;阿耳威則把他的工会登記为紡織工人工会(GKU),S.A.丹吉担任总書記,本·布萊德雷、S.H.札勃瓦拉和 R.S.宁勃加尔(都是共产党人)任副主席。总罢工一直繼續到 1928 年 10 月 6 日,那时工厂主們同意了由一个政府委员会去进行調查。在罢工的六个月期間,共計損失了二千二百三十四万七千六百二十个工作日。^①到那年年底,阿耳威的新紡織工人工会的會員已經从几百人增加到了大約五万四千人,而卓什的孟买紡織工会則从八千四百三十六人減少到六千七百四十九人。^②

孟买紡織工人的罢工,并不是 1928 年期間工会的斗争性逐漸加强的唯一表现。印度政府在它提交英国議会的年度报告中提出警告說:

在报告所包括这一年,印度的工业情况远比前一年混乱。1927—1928 年的罢工次数是 129 次,牽涉了十三万一千六百五十五人,而这一年的罢工总次数則达 203 次,牽涉的人不下五十万零六千八百五十一人。損失的工作日总数达三千一百六十四万七千四百零四个,比以前五年中所損失的工作日总数还要大。^③

毫無疑問,共产党人,特別是斯普拉特和布萊德雷,要对这种混乱情况負很大責任。事实上,政府似乎已經認識到了共产党人

① India. Home Department. *India in 1928—29* (印度內政部:《1928—1929 年的印度》),(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1930), p. 7.

② Morris D. Morris, *A History of the Creation of a Disciplined Labor Force in th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of Bombay City, 1851—1951* (摩里斯·D. 摩里斯:《在孟买棉紡織工业中一支有紀律的劳动大軍的成长过程, 1851—1951 年》),(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54), p. 446.

③ *India in 1928—29* (《1928—1929 年的印度》), p. 7.

在制造这种混乱情况方面所起的作用，因为它在前一年的报告中曾經說：

值得怀疑的是……这些土生土长的工潮煽动者骨子里是不是共产党人。他們通常是沒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但他們学到了一星半点的布尔什維克理論，因此能够用激烈的演說打动无知的工人，这些演說里夹杂着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传道者所使用的那些时髦的詞句和口号。但是，我們必須承认，他們具有一种活力和进取精神，而这两者在那些“資產階級的”工会工作者身上都是不明显的。尽管全印工会大会的右翼在同工人打交道时总的說来是推行着一种明智的方針，但他們同工人一直还有一些距离，因而沒有能够“进入他們的心里”。^①

此外，政府决定在这种不穩局面达到高潮时开始在密拉特对共产党謀叛案进行审判，这似乎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共产党渗入全印工会大会

共产党对全印工会大会的关心，早在1925年就已經很明显。当时，全印工会大会孟买會議的主席，共产党的一个同情者D.R. 滕格底发表了一篇关于阶级斗争的演說，这篇演說激怒了居于統治地位的溫和派。当左派后来企图利用修改章程的办法来使全印工会大会更加“无产阶级化”时，他們却失败了。^②

到1927年，共产党人在全印工会大会中开始有了很大的影响。共产党的威信由于英国議會中的一个印度共产党議員薩布尔季·薩格拉德瓦拉出席了3月間在德里举行的全印工会大会第七届年会而得到了提高。苏联的一位評論家在評論德里會議所通过的那些決議时写道，已經“前进了一步”，但这并不說明已取得了

^① *India in 1927—28*(《1927—1928年的印度》), pp. 341—342.

^② M. N. Roy, “The Indian Trade Union Congress” (M. N. 罗易: 《印度工会大会》), *Inprecor*(《国际新聞通訊》), VI(Feb. 18, 1926), p. 191.

“重大的进展”，因为印度的大多数工会领袖“都不支持阶级斗争，而是仍然相信阶级合作。”^①

共产党对温和派的第一次真正挑战，发生在1928年12月在查利阿举行的第九届年会上。来自反帝联盟的一个友好代表J.W. 約翰斯頓出席了这届年会，但是在参加了第一天的会议之后便被捕了。这件事大大激怒了与会的代表，因而他们立即决定让全印工会大会加入反帝联盟。如果不是发生了这件事，他们本来是不会作出这个决定的。^②另一方面，共产党人想要使全印工会大会参加共产国际控制的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PPTUS）的努力却失败了，这个问题被推迟到了下一年。

还有另外一个外国的友好代表也参加了在查利阿举行的年会，不过他比約翰斯頓幸运。这个人就是澳大利亚共产党人賈克·瑞安，他是特地去鼓动全印工会大会参加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的。瑞安后来在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的公报中评价这次工会大会时写道：“有一切理由相信，到下一次大会召开时，左翼将不再是少数，保守的老领袖们将被击败。”^③这个预言结果是准确得惊人，因为全印工会大会第一次重大的分裂就发生在第十届年会上。

第十届年会于1929年11月30日在那格浦尔召开，主席是賈瓦哈拉尔·尼赫魯。在这一届年会开会前不久（日期不详），共产党人已经使他们的两个最大的工会——即拥有五万四千名会员的

① Balabushevich, "Indian Trade Union Congress Holds Seventh Session" (巴拉布謝維奇:《印度工会大会举行第七届年会》), *Inprecor* (《国际新闻通讯》), VII(June 9, 1927), p. 714.

② 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28* (米德腊编:《1928年印度年鉴》), II, 503—504.

③ *The Far Eastern Bulletin* (《远东公报》), (Jan. 16, 1930 [原文如此]), p. 5. 这个出版日期显然是错误的。大概应当是1929年。

紡織工人工会和拥有四万一千名会员的大印度半岛铁路员工工会——参加了全印工会大会。这就使得他们的力量比在查利阿时大大加强了。

在举行大会之前，执行委员会曾经开会并且通过了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个赞成参加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的决议草案。包括 N. M. 卓什、札曼·拉耳和莫利那耳·甘底·鲍斯在内的一群领袖对这种发展深感不安，他们因而举行了会议并且决定不参加大会。共产党人在获悉这种情况以后，便决定在大会上撤回这个令人不快的决议草案，以便保持团结。与此同时，在反对决议草案的人们之间也发生了争执，并且分裂成了两派，一派由 N. M. 卓什领导，另一派由莫利那耳·甘底·鲍斯领导。但是，尽管共产党人愿意撤回他们的决议草案，这两派却都不愿意参加大会。尼赫鲁在会议之后发表的一篇声明中描述了这种奇特的形势：

虽然分裂看来已不可避免，但是，肯定还有许多人积极地进行分裂活动，并强行制造分裂。一方面，左翼的某些年轻气盛的成员想不顾一切后果蛮干下去，另一方面，还有些人有意識地推动他们这样蛮干下去，以便扩大分裂，从而为退出大会制造更多的借口。^①

尼赫鲁批评那些退出大会的人行动急躁，因为实际上他们比那些留在大会的人拥有更多的票数。他说，“后来的事实表明，如果他们当时参加了大会，最后通过的那些决议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他又说，“麻烦来自那些在一个下午内改变了态度的人们。”因此，尼赫鲁的话并没有证实很多人表示过的那种看法，即，在那次全国范围的工会运动中所发生的第一次重大分裂应该归咎于共产党人。

^① 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29* (米德腊编：《1929年印度年鉴》), II, 429.

一个反对派的共产党人 1931 年在美国的一个反对派的杂志上写道,那格浦尔年会上有三个主要的派别:共产党人(仍然占少数),改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爭辯說,尼赫魯当选为主席,是共产党人同民族主义者进行的一場交易的结果,这场交易使 S.A. 丹吉担任了总书记。^① 不论是否真有这样一场交易,共产党人确实攫取了這個組織的一些重要职位。D.B. 古耳加尔尼、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和阿卜杜耳·馬季德当上了副主席,菲利普·斯普拉特和本·布莱德雷則被选进新的执行委员会。D.R. 滕格底和 K. N. 卓格雷加尔被选为全印工会大会出席反帝联盟下一次世界大会的代表。^②

1929 年以后的印度工会运动史就是一部不断分化的历史。^③ 在那格浦尔年会之后,N.M. 卓什和溫和派建立了印度工会联合会(ITUF)。与此同时,全印工会大会中的共产党-民族主义者联盟也因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而归于破裂,这种斗争精神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1931 年,在 S.V. 堆什班堆和 B.T. 兰納迪夫(共产党的大部分高級領袖当时都被拘禁在密拉特)领导下的共产党人退出了全印工会大会,并且組織了紅色工会大会。但他們自己之間又发生了斗争,他們在孟买的两个最大的工会也因

① S. K. Vidyarthi,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India" (S. K. 維达尔提:《印度的工会运动》), *Revolutionary Age* (《革命世紀》), II (Aug. 29, 1931), pp. 3-4.

② *Meerut Sessions Judgement* (《密拉特刑事法庭判决书》), p. 227.

③ 本书中沒有充分介紹印度工会运动的历史。但是,以下各书中有些有用的材料: P. P. Lakshman, *Congress and Labour Movement in India* (P. P. 拉格什曼:《国大党与印度的工人运动》), (Allahabad: All-India Congress Committee, 1947); Oscar A. Ornati, *Jobs and Workers in India* (奥斯克尔·A. 奥尔納提:《印度的就业情况和工人》), (Ithac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and Labour Rel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1955); 和 S. D. Punekar, *Trade Unionism in India* (S. D. 布内加尔:《印度的工会运动》), (Bombay: New Book Co., 1948).

宗派活动而分裂。

主要由于国民大会社会党希望工人团结，全印工会大会和全国工会联合会(NTUF, 它的前身是印度工会联合会)于 1935 年 2 月举行了一次讨论合作问题的联席会。同年 4 月，共产党人根据他们当时的统一战线政策重新参加了全印工会大会；1938 年，全国工会联合会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在 1942 年 8 月甘地发起“滚出印度”运动以后，大部分民族主义领袖都被投入了监狱。但是共产党人，由于他们支持英国的战争努力，却仍然有自由，而且能够继续进行他们的政治活动。当民族主义领袖坐牢期间，共产党人牢牢地掌握了全印工会大会。战后，国大党的领袖们企图破坏共产党人对全印工会大会的控制，但是没有成功。国大党的领袖们不愿听任共产党垄断印度的工人运动，因而在 1947 年 5 月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工会联合会，即印度全国工会大会(INTUC)。在社会党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即印度劳工协会(HMS)以后，共产党人又面临到更多的竞争者。

到 1957 年 12 月全印工会大会在埃纳库拉姆举行第二十五届年会时，共产党人已经使他们所掌握的那一部分工会运动适应了印共的同尼赫鲁政府进行有条件合作的新政策。埃纳库拉姆年会的主要结论是，全印工会大会应当在国家的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做法就是帮助印度政府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特别是发展重工业的计划。为了作到这一点，大会警告工人，不要在工资要求方面施加过大的压力。S.A. 丹吉说，“斗争将继续进行，但是并不需要将每一场斗争都发展成为一次罢工，而且斗争也不能再以旧的方式进行。在我们的国家内，伦理准则正在改变，因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罢工必须以和平方式进行，以便获得群众的最大限度的支持和

同情。”^① 尽管孟加拉的代表反对,这个新的方针还是通过了。

全印工会大会的組織机构

全印工会大会 1945 年的会章使人毫不怀疑,印共党人在改組这一群众組織时,是按斯大林的教导做的。全印工会大会会章认为工会是

階級斗争的工具; 因此,工会的基本任务在于組織工人为增进并捍卫本身的权利和利益而斗争; 而且,虽然工会必须进行集体协商,虽然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内,談判、抗議、联合行动和集体协商的其他办法都必须成为工会活动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劳力和資本在資本主义制度中是不可能調和的。^②

改善工人階級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是这个組織的第三个目标; 其他两个更重要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实现生产、分配及交换手段的国有化。因此,很明显,全印工会大会的基本职能是属于政治方面的。

按照会章的规定,全印工会大会的领导干部是由选举产生的,主要政策由出席年会的代表們制定,年会通常每年在 12 月中举行。但是,实际上,年会几乎每两年才召开一次; 从 1942 到 1954 年的十二年中,仅仅召开过六次年会。出席年会的代表名額是按各工会分配的,即每个工会每五百名会员派出代表一人,超过五百名則相应递减。因此,一个拥有三千名会员的工会,可以派出代表

① *New Age (weekly)*(《新世紀》周刊), V(Jan. 5, 1958), p. 15.

② *All-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 Constitution* (《全印工会大会会章》) 5(a)(i)。轉載在《全印工会大会第二十一屆年会报告, 1945 年, 馬德拉斯》(AITUC, *Report...Twenty-first Session, Madras, 1945*) (Bombay: AITUC, 1945), p. 96. 1954 年, 全印工会大会曾指派了一个委员会来修改会章。作者手边沒有这种可能經過修改的会章。

六人,但一个拥有一万二千名会员的工会则只能派出代表十五人,而一个拥有五万名会员的工会,所派的代表不过二十九人。^①

表五表示过去举行的七次年会中每次出席代表的数目。这是根据全印工会大会的正式报告编制的。这个表也表明了每届年会开会时参加了全印工会大会的工会的数目和它们的会员总数。但是,引用这些数字时必须十分审慎,这不仅因为数字本身无疑有夸大的地方(特别是1949年的数字,那时是B.T.兰纳迪夫控制着印共),而且因为正式报告内有許多自相矛盾之处。

表五 全印工会大会年会出席代表

| 年 会 | 地 址 | 年 份 | 代表数目 | 参加工会数目 | 全印工会大会会员人数 |
|-------|-----------|------|-------|--------|------------|
| 第十九届 | 康 波 尔 | 1942 | 168 | 94 | |
| 第二十八届 | 那 格 浦 尔 | 1943 | 306 | 191 | 269,803 |
| 第二十一届 | 馬 德 拉 斯 | 1945 | 850 | 401 | 451,915 |
| 第二十二届 | 加 尔 各 答 | 1947 | 1,049 | 407 | |
| 第二十三届 | 孟 买 | 1949 | 400 | | 800,000[1] |
| 第二十四届 | 加 尔 各 答 | 1954 | 825 | 937 | 655,940 |
| 第二十五届 | 埃 納 庫 拉 姆 | 1957 | 1,282 | | |

[1] 1949年世界工会联合会发表的全印工会大会会员人数是六十万。见《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报告》(*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IInd World Trade Union Congress*)(Paris: WFTU, 1949), p. 360.

还须指出,很多参加了全印工会大会的工会并未出席某些年会。例如,1954年举行的第二十四届年会的正式报告说,实际出席年会的八百二十五名代表只代表参加工会大会的九百三十七个工会中的二百九十五个工会。^②这二百九十五个工会共有会员三

① 同上, p. 100.

② *Twenty-fourth Session of the All-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 Report and Resolutions* («全印工会大会第二十四届年会报告和决议汇编»)(New Delhi: AITUC, 1954), p. 18.

十二万一千九百三十二人，而全印工会大会則共有會員六十五万五千九百四十人。因此，有六百四十二个参加全印工会大会的工会未出席年会，其會員人数共为三十三万四千零八人。

按照会章的规定，在每届年会上，代表們从出席代表中选出总理事会的理事。总理事会的理事名額是按行业分配的，各行业分配到的理事名額，和計算它出席年会的代表名額一样，是按递减比例来确定的。在1954年举行的第二十四届年会上，选出了一百一十名总理事会理事。全印工会大会的中央领导干部是总理事会的当然理事。^①

总理事会有权額外推选理事，但不能超过各会員工会代表名額的六分之一。总理事会按规定“至少每年”召开一次會議，同时，会章上虽然并未明确规定其职权，但实际上該会在年会休会期間負責决定或批准政策。

在1954年的年会上选出的总理事会理事的名单，对全印工会大会在印度各个地区的实力情况提供了很好的說明材料：安得拉，五人；阿薩姆，二人；孟加拉，二十九人；比哈尔，五人；孟买，十五人；德里，四人；海得拉巴，七人；加尔那达克，四人；中央印度，三人；中央邦，四人；馬拉巴尔，四人；奧里薩，三人；旁遮普，五人；拉賈斯坦，二人；泰米耳納德，七人；特拉凡哥尔-柯欽，五人；北方邦，四人；全印工会大会总部，二人。很明显，孟加拉和孟买占有优势。

总理事会以上的机构是工作委员会。1945年的会章规定，該机构应由全印工会大会的中央领导干部(書記除外)和由总理事会

^① 在关于1956年7月举行的总理事会會議的記載中，曾談到有一百一十二名理事。*New Age(weekly)* (《新世紀》周刊), III(Aug. 5, 1956), p. 16. 1947年时有一百六十七名理事。

“根据累积投票选举制”* 选出的十五人組成。^① 到 1954 年时，这个数目增为三十人，尽管在那一年的年会上仅选出了十八人。^② 会章还规定，工作委員會必須每年开会两次，其职权如下：

- (i) 采取一切措施执行全印工会大会本届年会的決議；
- (ii) 处理本届工作委員會任期内发生的影响工人階級利益的紧急事宜；并且
- (iii) 全面推进和贯彻全印工会大会的目标和意图。^③

領 导 人 物

表六列举了全印工会大会自 1943 年举行第二十届年会以来的上层領導人物。除 1947 年的領導人名单系摘自世界工会联合会公报外，其他材料都系摘自全印工会大会正式发表的資料和印共的报刊。1949 年的年会是在 B.T. 兰納迪夫領導印共的全盛时期举行的，大部分共产党的工会領袖如：S.A. 丹吉和 S.S. 米腊吉卡等当时都在獄中。关于这个机构在这段时期内的活动情况的材料很少，而且人們可以設想，从拖延很久才召开第二十四届年会这一点来看，这个机构的組織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分析一下这个表，可以发现几件耐人寻味的事情。第一，不管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人士，沒有任何人像 S.A. 丹吉和 S.S. 米腊吉卡两人那样长期保持了他們的領導地位。这两个人都来自孟

* 各投票人可投等于候选人人数的票数，且可将票全数投給一个候选人。——譯者

① *All-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 Constitution* (《全印工会大会会章》), p. 99.

② *Twenty-fourth Session of the All-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 (《全印工会大会第二十四届年会报告及決議汇编》), p. 197.

③ *All-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 Constitution* (《全印工会大会会章》), p. 101.

表六 全印工会大会领导人

| 选任 | 第二十周年会, 那格浦尔—1943 | 第二十一周年会, 馬德拉斯—1945 | 第二十二周年会, 加尔各答—1947 | 第二十三周年会, 孟买—1949 | 第二十四周年会, 加尔各答—1954 | 第二十五周年会, 埃納庫拉姆—1957 |
|-----|---|---|--|------------------|---|--|
| 主席 | S. A. 丹吉 | 莫利那耳·甘底·鮑斯 | S. A. 丹吉 | V. 札加賴·捷底阿尔 | V. 札加賴·捷底阿尔 | S. S. 米腊吉卡 |
| 副主席 | S. O. 森 S. K. 勃腊瑪尼格 B. K. 穆克季 法澤耳-伊耳-依耳 希·古尔班 古拉莫·穆罕默德·汗 | S. A. 丹吉 V. 札加賴·捷底阿尔 S. S. 米腊吉卡 P. C. 鮑斯 朱甘·汗 | 阿夫塔布-阿里 S. S. 优素福 S. S. 米腊吉卡 K. N. 卓格雷加尔 R. A. 奎德基加尔 | 資料缺 | 腊嫩·森 薩达勃利雅·班納吉 S. S. 米腊吉卡 阿魯那·阿薩夫·阿里 R. K. 哈耳都耳加尔 | 黑曼达·古瑪尔·巴苏 腊嫩·森 P. 腊瑪木尔底 圭达尔·达斯 S. S. 优素福 P. 巴拉占德腊·梅农 |
| 总书记 | N. M. 卓什 | N. M. 卓什 | N. M. 卓什 | S. A. 丹吉 | S. A. 丹吉 | S. A. 丹吉 |
| 司庫 | R. A. 奎德基加尔 | R. A. 奎德基加尔 | 彼得·阿伐里斯 | M. S. 巴格希 | K. 阿南丹·南比阿尔 | T. B. 維塔耳·腊欧 |
| 副书记 | 閃达·帕雷腊欧 S. S. 米腊吉卡 | 閃达·帕雷腊欧 瑪內格·甘地 N. V. 帕德圭 | 閃达·穆克季 瑪內格·甘地 N. V. 帕德圭 丁加尔·德賽 | 資料缺 | 馬格东·摩喜烏丁 P. 巴拉占德腊·梅农 阿尔温德·廓沙耳 S. 格利什那木尔提 | K. T. K. 檀加瑪尼 腊文·巴哈都尔·戈尔 因德腊季德·古普塔 薩底什·罗莫巴 K. G. 斯利瓦斯达瓦 |

买而且都是印共中央委员会的资格很老的委员。从 1943 到 1947 年，总书记一职一直由温和的非共产党人士 N.M. 卓什蝉联（他在 1955 年 5 月 30 日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在这段时期内，丹吉曾两度担任该会主席，人们可以料想得到，这时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人士是势均力敌的。1947 年以后，很多非共产党工会退出了全印工会大会，丹吉接任了总书记的职位，而把主席一职让给了 V. 札加赖·捷底阿尔。捷底阿尔曾在 1918 年同 B.P. 瓦底阿创立了印度第一个现代工会。捷底阿尔的年纪（他生于 1881 年）和他健康不佳使他不能在全印工会大会的会务活动中起到真正的积极作用。他未能参加 1954 年的年会，也未能出席 1956 年 7 月举行的总理事会会议。因此，可以设想，在他任职期间，主席一职没有太大的实权。

还可看出，在 1954 年的年会中，全印工会大会的领导权是牢牢控制在印共手中的，在八个最高级领导职位中，有六个由共产党人担任，其中有两人（丹吉和森）是印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另外两人（米腊吉卡和阿鲁那·阿萨夫·阿里）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司库一职由 K. 阿南丹·南比阿尔担任，他是来自马德拉斯邦的共产党国会委员，也是南印度铁路工会的总书记。两名非共产党人士又都是前进集团（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员，近年来都同印共密切合作。过去担任已故苏帕斯·占德腊·鲍斯的助手的萨达勃利雅·班纳吉得到西孟加拉议会中共产党人的支持，于 1952 年当选为联邦院委员。^① R.K. 哈耳都耳加尔既是前进集团中央邦分支机构的主席，也是该地的一个矿业工会的领袖。从 1957 年的领导干部名单来看，共产党对全印工会大会的控制也是很明显的。

^① 见萨达勃利雅·班纳吉关于共产党支持的选举的声明，载《新世纪》周刊 (*New Age*[weekly]), I(March 21, 1954), p. 15.

正式的文獻指出，全印工會大會十分缺乏訓練有素的中級領導幹部。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印共於1952年5月在加爾各答召集了共產黨的全體工會工作者，以便對他們作一系列的講課，進行訓練。S.A. 丹吉的講稿被印成了學習文件，這個文件的主要部分專門研究“我們的工會幹部應有的品質和任務。”在這一部分內，可以明顯看出，共產黨的隱密性也滲透到工會的工作里面去了。

我們必須學會把一些幹部隱蔽起來。不然，雇主要的花招會把我們所有最優秀的領導和同志從真正的工作崗位上排擠出去，那就是從工廠、商店和辦公室中排擠出去。

有些人以為，由於我們的工會現在是合法的，所以我們可以把我們所有的幹部都放在工作的最前綫。我們應該記住，雖然工會是合法的，但是資本主義的危機並未過去。當我們領導工人鬥爭的時候，資產階級會毫不猶豫地向我們進攻。^①

1953年8、9月間，在那格浦爾還辦了一所歷時兩個星期的中央工會學校，而且計劃繼此之後，在各邦都舉辦類似性質的地方工會學校。但是，只有在古季腊特、泰米耳納德和旁遮普作到了這一點。^②

像印共本身一樣，全印工會大會還必須同它的領導人忠於地方的態度以及同隨之而來的對中央組織問題漠不關心的態度作鬥爭。S.A. 丹吉在1954年所作的組織報告中談到這一點時說：

除了對每個行業進行具體指導外，我們還設法訪問了各邦並參加了它們的會議，不過這種訪問為數很少而且相隔的時間很長。在這方面，中央限於缺乏人員和工作繁忙有很大困難。能夠前去參加邦工會大會

① S. A. Dange, *On the Indian Trade Union Movement* (S. A. 丹吉：《論印度的工會運動》)(Bombay: CPI, 1952), p. 42.

② *Twenty-fourth Session of the All-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 (《全印工會大會第二十四屆年會報告及決議匯編》), p. 84.

的只有薩达勃利雅·班納吉、阿魯那·阿薩夫·阿里、P. 腊瑪木尔底、腊嫩·森、S. S. 米腊吉卡、約底·巴苏和我自己等几个同志。^①

財 务

全印工会大会的财务章程載在会章內，会章规定每个参加大会的工会应交納：

(i) 每年的会費：凡会員五百人或五百人以下者每年应向大会交納会費十卢比；一千人或一千人以下者每年交納二十卢比；一千人以上、一万人以下者，每超过一千人或一千人以下額外交納十卢比；一万人以上者，每超过一千人或一千人以下額外交納五卢比。

(ii) 代表团費用：每一代表应交二卢比；

(iii) 經总理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理事同意决定的其他类似費用。

1945年，上述会費共收入五千六百六十七卢比，1953年(公布統計数字的最近一年)为四千九百二十五卢比。但是，这些数字并不能說明全印工会大会财务情况的全貌，因为，遇有特殊事項时可以用特別募集的款項来支付。例如，每届年会的費用是由年会开会地点的地方接待委员会負担的，为了举行1954年的那次會議，当地委员会募集了一万八千四百二十八卢比。^② 会章还规定，为年会募集的資金如有剩余，将留給主办年会的地方机构使用。此外还經常募集别的費用。1944年，印共的一个周刊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报道，談到了募款的手法：

募款是在12月8日这一天开始的。这一天是有軌电車公司开始发薪的日子，也是工会照例进行募款的日子。

在加黎卡德仓库的大門外蹲着区委员会的两个委員。他們手里拿着募集工会和列宁日基金的募捐簿。另外两个委員則在門內不远的地

① 同上，p. 85.

② 同上，p. 18.

方徘徊，差不多就在會計室的窗口前面，在那里，工人們正排成一行領取他們的工資。当每个人領到工資走向大門的时候，这两个委員就立刻走到他的身边，一旁一个，把他夹在中間，热烈地、反复強調地提醒他：党现在需要款，他應該記得加入工会时所作的諾言等。通常，工人总是立刻有所反应，而等在門外的那两个募款人就能稳稳当当地有所收获。

万一有人溜过去了呢？不要紧，在这两个募款人的后面还有一道“防綫”——区委員会的另外四个委員！他們围住不肯捐款的工人，同他爭論，向他解释，对他进行說服，直到他掉轉身来，走向門边，掏出捐款为止。……在公园廣場上，工人們貼了一张“黑名单”，把那些不履行义务的人一一列上，說这些人因为不肯捐款而违背了他們自己向工会作过的庄严諾言。这种揭露，像魔术一样有效——名单上的名字很快就一天天减少了。^①

根据全印工会大会公布的預算，該会 1953 年的总开支是一万五千五百六十九卢比。^②

参加国际組織

全印工会大会是共产党控制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會員，而且自 1949 年以来，S.A. 丹吉就是这个国际組織的副主席之一。^③全印工会大会的年度預算中虽然說明有为世界工会联合会筹募的

① Indrajit Gupta, "One Rupee Each, For the Party" (因德腊季德·古普塔：《每人为党捐一个卢比》), *People's War* (《人民战争》), II (Jan. 16, 1944), p. 6.

② *Twenty-fourth Session of the All-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 (《全印工会大会第二十四屆年会报告及決議汇编》), p. 201.

③ 关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背景材料见：伯納德·S. 摩里斯：《共产党国际外围組織的性质和任务》(Bernard S. Morri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Front Organizations: Their Nature and Function"), *World Politics* (《世界政治》), IX (Oct. 1956), pp. 76—87; 和 約翰·P. 温德謬勒：《美国工人与国际工人运动，1950 年至 1953 年》(John P. Windmuller, *American Labor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ovement 1950 to 1953*) (Ithac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1954), pp. 52—66.

捐款，但是該会实际上捐獻給国际总部的数字并未公布。另一方面，世界工会联合会却对全印工会大会給予财务上的支援：在1950年7月到1952年5月間，世界工会联合会曾捐款二万卢比，作为在这个极端激进的时期內因犯罪而受审的工人的辯护費用。^①

1949年11月，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澳工会代表會議在北京召开，但印度未派代表出席。^② 根据苏联代表的建議，大会决定設立一个永久性的聯絡局以协调亚澳工会的活动。聯絡局預定由苏联、中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工会各派代表一人組成。但是，作者未能找到任何証据足以說明印度的代表曾在該局工作或者該局确曾实际起过作用。^③

1952年初，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印度的工会表示出特别的兴趣，他們邀請了十四个印度工人領袖到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典礼。根据新德里的一家杂志《思想》报道，邀請是向私人而不是向任何全国性的工会联合組織发出的。^④ 据說，印度政府反对这样的接触，后来，中国修改了邀請名单，邀請了所有全国性的工会組織，包括国大党控制的印度全国工会大会和人民社会党的印度劳工协会。印度全国工会大会辞謝了邀請，印度劳工协会接受了。

① Dange, *On the India Trade Union Movement* (丹吉:《論印度的工会运动》), p. 60.

② Prabodh Chandra, "On 'A note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our party'" (占德腊·勃腊波特:《論〈关于我党当前情况的意见〉》), *PHQ Open Forum* (《总部党组公开論壇》), XII (n. p.: 1949 [实际是1950年]), p. 9. 据《十字路口》(*Crossroads*, I [Dec. 9, 1949, p. 12]) 报道, 印度代表出席了这次會議, 并被选为工作委員會委員之一, 但未指出代表的姓名。由于上面摘引的党内文件断言印度沒有派代表参加, 因此, 这个报道不足凭信。

③ 见 John H. Kautsky, *Moscow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約翰·H. 考茨基:《莫斯科与印度共产党》) (New York: John Wiley, 1956), pp. 99 n, 159 n.

④ *Thought* (《思想》), IV (May 10, 1952) p. 3.

因此，实际上到中国去的代表团包括有中国人本来不打算邀请的非共产党人士。下面是中国人最初邀请的名单：^①

共产党：

V. 札加赖·捷底阿尔，全印工会大会主席，该会改组前是和平运动的领导人。

S. A. 丹吉，全印工会大会总书记，印共政治局委员。

约底·巴苏，全印工会大会总理事会理事；印共政治局委员。

巴布腊欧·札格达勃，孟买纺织工会（红旗）主席。

K. 阿南丹·南比阿尔，南印度铁路工会总书记；共产党国会议员。

S. S. 优素福，全印工会大会副主席；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

V. 穆克季，疑即比斯瓦那特（有时作维斯瓦那特）穆克季，那格浦尔的一位知名的共产党人。

T. V. 托马斯，特拉凡哥尔-柯欽邦立法议会的无党派议员。

前进集团及统一工会大会：

萨达勃利雅·班纳吉，全印前进集团（马克思主义者）总书记；全印工会大会副主席；联邦院议员。

西耳帕德腊·雅吉，全印前进集团（马克思主义者）副主席。

K. T. 沙赫，统一工会大会主席；共产党提出的印度共和国总统候选人。（1953年3月逝世）。

希班·拉尔·萨森那，统一工会大会成员，1951年农工人民党建党人之一。

其他：

M. A. 赛义德，加尔各答统一海员工会总书记。

腊克比尔·辛格，全印中央公用工程部员工工会主席。

值得指出的是，这张名单不仅包括印共中央委员会的三个重

^① *The Hindu*(Madras)(马德拉斯《印度教徒报》), April 8, 1952, p. 6.

要的委員，而且还有几个以乐于在某些方面与共产党人合作而著名的重要的非共产党人士。

至少有一人，即丹吉，印度政府拒絕发給他护照，而最后到达北京的由十七人組成的代表团中，只包括了原来那张邀請名单中的七人：优素福、札格达勃、南比阿尔、薩森那、沙赫、賽义德和腊克比尔·辛格。^①

195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再次邀請印度的工会領袖到中国参加五一劳动节观礼。代表团由三十二人組成，他們虽然大多数是共产党人和同情共产党的人士，但中間也包括了很多人民社会党人和其他非共产党人士。^② 5月17日，代表团中有九个代表提前两个星期回到孟买，以抗議組織一个亚非工会會議的建議，这个建議“企图把所有的代表都誘入共产党的怀抱。”^③ 表面上提議是由日本代表团提出的，而且根据提前回去的九人之一，比加什·瑪仲达尔的說法，这一提議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共产党情报局亚洲書記处。”^④（代表名单见本书第506—507頁）

当其余的代表回到印度时，他們发表了一个声明，承认日本代表們曾提議“所有亚非国家工会代表举行一次非正式集会，就与整个工人階級有关的共同利益进行討論和交換意見。”^⑤ 但是，这个声明說，印度尼西亚代表所提的关于設置一个筹备委員會的建議却被否決了。除 B.K. 穆克季和拉莫·查格腊瓦尔底两人外，这

①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中国大陆报刊概覽》), No. 327, 1952, pp. 8, 9, 10.

② 全部名单见《工会記錄》(*Trade Union Record*), XII(May 5, 1955), p. 38.

③ *The Hindu*(Madras)(馬德拉斯《印度教徒報》), May 20, 1955, p. 5.

④ 同上。

⑤ *Trade Union Record*(《工会記錄》), XII(June 5, 1955), p. 55.

些代表都在声明上签了名。

如果没有更多的材料，人们不能断定举行亚洲工会会议的主意，究竟真是由日本代表提出来的呢，还是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提出来的，后者也许通过世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路易·赛扬提出，因为赛扬那次也在北京参加“五一”观礼。同样，人们也不能理解代表团中为什么包括了这样多的人民社会党人。但是，事实是，这些人民社会党人的出席确实给共产党人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而且使外部世界有可能比通常更多知道一些有关国际共产主义在工会方面的活动。

1955年全印工会大会若干领导人物参加共产党国家“五一”庆祝典礼的事实，具有重大意义。他们中有六人到了苏联，二人到了罗马尼亚，二人到了捷克斯洛伐克。^①这些经过选择的印度工会领袖对中国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访问，说明莫斯科和北京都有建立某种亚洲工会组织的愿望。除此以外，目前还不能谈到别的。没有事实说明中国和苏联之间为了控制这个计划而展开竞争，也没有事实说明北京对全印工会大会有任何控制力。

外国的共产党人也通过派遣友好代表参加全印工会大会年会的方式和印度的工会运动保持联系。参加1957年年会的就有世界工会联合会书记圭塞佩·卡萨德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伊凡·古列夫；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和法国总工会的罗贝·昂利奥。^②

全印农民协会

共产国际很早就认识到印度农民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并且在

① 同上，(May 5, 1955), p. 38.

② *New Age*(weekly)(《新世纪》周刊), V(Jan. 5, 1958), p. 15.

1926年就在农民国际(属于共产国际)中专設了一个机构来开展印度的农民工作。农民国际主要想通过英国共产党人进行工作,并且写信給英国共产党的阿瑟·麦克馬納斯,要求他提供可以为了政治目的而与之保持联系的印度著名农民領袖的名单。信中說:“我們的第一件工作将是同印度现在所有的农民組織取得联系,尽管从这些組織的綱領看来,它們在农民工作的总的目标和工作方法上和我們的观点是不一致的。”^①但是,尽管共产党人很早就对这方面发生了兴趣,他們在組織占印度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依靠农业为生的人民的工作上所获得的成就,远远赶不上他們在建立同人数較少的工业无产階級联系的“传送带”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在作者写作本书时仍然是軟弱无力的,而且,除在有些地区以外,一般都毫无成效。

关于印度农民运动的历史,尙无令人滿意的著述。少数可資利用的記載,也多充滿門戶之见,而且文献資料貧乏。^② N.G. 兰加自称他應該享有首創有組織的农民运动的荣誉。兰加出生于安得拉邦貢土尔县一个拥有大量田地的富裕家庭,在牛津受过教育。当他回到印度的时候,心里“充滿了对俄国經驗的欽佩”,并且早在1923年就开始組織了一系列的农民會議。这些會議大多数是在安得拉举行的。^③直到1936年4月在比哈尔的农民領袖斯瓦米·薩哈札南达·薩腊斯瓦提主持下在勒克瑙举行第一次全印农民大

① *Communist Papers* (《共产党文件》), Parliamentary Publications, 1926, Vol. XXIII (Accounts And Papers, Vol. 8) Command 2682 (London: HMSO, 1926), p. 104.

② N.G. 兰加和斯瓦米·薩哈札南达·薩腊斯瓦提所著的《农民运动史》(N.G. Ranga and Swami Sahajananda Saraswathi: *History of Kisan Movement*), (Madras: Kisan Press. n. d. [1939], 143 pp.) 收有一些有用的材料。

③ N. G. Ranga, *Revolutionary Peasants* (N. G. 兰加: 《革命的农民》), (New Delhi: Amrit Book Co., 1949), p. 60.

会时，全印范围的农民运动才开始形成。第二次全印农民大会于1936年12月在費茲浦尔举行，并选举了下列諸人为大会的中央领导人員：主席：N.G. 兰加；总書記：斯瓦米·薩哈札南达·薩腊斯瓦提；書記：因都拉耳·雅支尼克、B. P. L. 貝底、班基莫·穆克吉。

全印农民大会从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之日起，就受到了内部和外部的影响和压力。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者，像兰加和薩腊斯瓦提，把全印农民大会看成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輔助組織。但是，他們在农民中的組織工作并没有受到印度国大党的某些领导人物特别是薩尔达尔·瓦拉帕伊·巴堆耳的很大重視。巴堆耳认为应该把农民組織到国大党内来，而不应该另行組織，他主张把关于經濟改革的某些要求推迟到获得独立以后再提。^① 結果，兰加同国大党领导集团的关系便往往不是那么融洽的了。

在农民运动内，有四部分势力在爭夺领导权：共产党人，国民大会社会党人和由 N.G. 兰加与斯瓦米·薩哈札南达·薩腊斯瓦提分別领导的两个地区集团。1936年，共产党人同兰加合作，击败了国民大会社会党人。^② 以后，到了1941年，当“帝国主义战争”轉变为“人民战争”的时候，共产党人把斯瓦米·薩腊斯瓦提爭取到自己方面，但是，与此同时，却失去了兰加。当共产党人在全印农民协会（这一名称从1938年开始采用）中获得更大的势力时，他們日益倾向于把这一組織当成印共的附属团体。他們的这一作法激怒了因都拉耳·雅支尼克和斯瓦米·薩腊斯瓦提两人。1943年7月，雅支尼克辞去自己的职务，并在向报界发表的声明中說，由于

① 见米德腊編《1936年印度年鉴》(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36), II, 286.

② Ranga, *Revolutionary Peasants*(兰加：《革命的农民》), p. 69.

这个协会完全为共产党人所把持和控制，因此没有像他这样的人的容身之地。^① 薩腊斯瓦提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深为烦恼，不过他仍然在这个组织内留了一年光景。到了 1945 年，他也离开了全印农民协会，而印共则谴责他为叛徒。^②

战争结束时，共产党人发现全印农民协会中差不多只剩下他们了。国大党、社会党和别的党派正在组织同这个协会对立的其他农民组织，而且，尽管共产党人在组织地方性的农民示威运动——例如孟加拉的堆帕加运动——方面取得了某些成就，但是他们在农村的势力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全印农民协会在这段时期自称拥有会员八十万人，这看来是个过分夸大的数字。^③

在共产党的农民领袖们还没有来得及消除由于他们在战争时期反对民族主义运动而招致的反感之前，印共就执行了兰纳迪夫时期的急进的左倾战略。由此而引起的警察镇压，实际上已使全印农民协会不复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E. M. S. 南布迪里巴德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全印农民协会中央理事会的几乎全部成员不是坐牢，就是转入地下，”从 1948 年到 1952 年间，年会根本无法召开。^④ 从战争结束到写作本书时止，全印农民协会日趋衰落。

全印农民协会的组织机构

全印农民协会的会章是一份文字粗糙、结构松散、没有注明日

① *Party Letter* («党内通信»), III (Sept. 13, 1943), p. 3.

② *People's War* («人民战争»), IV (Oct. 7, 1945), p. 3.

③ E. M. S. Namboodiripad, *The Peasant in National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E. M. S. 南布迪里巴德:《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农民》), (Delh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p. 92.

④ 同上, p. 93.

期的长达八頁的文件。^① 会章中规定了一个由下列三个全国性的管理机构和三級地方組織組成的系統：由选出的代表組成的年会；全国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省农民协会；县农民协会；基层农民协会。

会章规定，凡年滿十六岁，加入一个基层农民协会并交納由省农民协会规定应交的会費的农民，均得为全印农民协会会员。基层农民协会和省农民协会間的关系由各省农民协会的会章规定之，各省的会章視地区的不同而有异。出席全印农民协会年会的代表选举的方法也由省农民协会的会章规定。代表名額以省为单位进行分配，其比率为每二千名基层会员得产生代表一名，每省最少产生五名代表。全印农民协会公布的过去五届年会的代表数目及各届年会时全国的会员人数见表七。

表七 全印农民协会历届年会出席代表 1947—1956 年

| 年 会 | 地 址 | 年 份 | 代表人数 | 全印农民协会 会员人数 |
|------|--------|------|-------|----------------|
| 第十届 | 錫康德腊腊欧 | 1947 | 700 | 800,000 |
| 第十一届 | 坎那諾尔 | 1953 | 600 | 1,000,000 |
| 第十二届 | 摩加 | 1954 | 258 | 1,087,247 |
| 第十三届 | 达哈努 | 1955 | 200以上 | 1,100,000 |
| 第十四届 | 阿姆利則 | 1956 | 142 | 693,205 |
| 第十五届 | 崩加昂 | 1957 | 約800 | 599,574 |

这些数字的主要用处在于可以說明代表人数与会员人数之間的特殊比例关系，不能把它当成說明全印农民协会的实力的可靠材料。代表人数只表明实际出席年会的代表人数，并非会章规定

^① *Constitution of the All-India Kisan Sabha*(《全印农民协会章程》), (New Delhi: AIKS, n. d.), 8 pp.

的人数。例如，必須注意，1947年的會員人数虽少于以后三年中每年的會員人数，但出席第十届年会的代表人数却最多。

表八系摘自正式报告。該表說明各省出席1954年年会的代表人数，和1954年及1956年的會員人数。^①在1954年的年会上，几乎有半数省份沒有按照会章的规定至少派遣五名代表出席。来自南印的代表这样少，大概是由于这次年会是在国内极西北隅举行的原故。

一般以为年会是制訂全印农民协会的政策的主要机构，其实，它通常不过是起橡皮图章的作用而已。在共产党人控制該会以后，他們严格限制討論，因此，除开某几个問題外，年会只是照例通过印共制訂的政策。

全印农民协会的第二个最大的机构是全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預定每年开会两次，并且是“在协会年会休会期間执行全部权力的最高权力机关”(会章第X条，第1款)。各省出席委员会的代表人数視各該省會員人数的多少而定，委员会的委員是从出席年会的代表中选举产生的，每五个代表产生一个委員(会章第VII条，第2a款)。再由委员会决定中央理事会的理事人数，并选举理事。中央理事会实际上是全印农民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并且是制定決議的主要机构。1954年，中央理事会的理事定为四十二人，但在1956年减为二十五人。^②

① *Twelfth Session of the All-India Kisan Sabha, Proceedings and Resolutions*(《全印农民协会第十二届年会记录及決議汇编》),(New Delhi: AIKS, 1954), p. 59; 及 *Fourteen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All-India Kisan Sabha, Report*(《全印农民协会第十四届年会报告》),(New Delhi: AIKS, [1956?]), p. 17.

② Harkishan Singh Surjeet, "Amritsar Session of the Kisan Sabha" (哈利基閃·辛格·苏尔吉德:《农民协会阿姆利則年会》), *New Age*(monthly)(《新世紀》月刊), V(Nov. 1956), p. 7.

表八 全印农民协会 1954 年和 1956 年年会出席代表及
当时的会员人数

| 省 份 | 1954年 会员人数 | 1954年 出席代表 | 1956年 会员人数 |
|----------|---------------|---------------|---------------|
| 安得拉 | 110,074 | 7 | 20,000 |
| 阿萨姆 | 15,768 | 8 | 7,788 |
| 比哈尔 | 56,640 | 20 | 54,912 |
| 古季腊特 | 8,064 | 2 | |
| 喜马偕尔 | 1,572 | 3 | |
| 加尔那达克 | 4,032 | 2 | 960 |
| 中央印度 | 19,152 | 9 | 7,680 |
| 马哈拉施特拉 | 86,016 | 20 | 35,000 |
| 马拉巴尔 | 38,400 | 3 | 116,544 |
| 曼尼普尔 | 3,996 | 3 | |
| 玛腊特瓦达 | 15,000 | 4 | |
| 奥里萨 | 9,234 | 5 | 6,384 |
| 卑勃苏 | 40,704 | 21 | 169,914 |
| 旁遮普 | 114,336 | 57 | |
| 拉贾斯坦 | 70,400 | 15 | |
| 泰米尔纳德 | 81,732 | 1 | 91,800 |
| 堆楞加那 | 114,000 | 11 | |
| 特拉凡哥尔-柯欽 | 20,160 | 2 | 16,320 |
| 特里普拉 | 15,760 | 3 | 3,456 |
| 北方邦 | 69,888 | 19 | 19,200 |
| 维达尔帕 | 6,000 | 5 | |
| 温德亚邦 | 960 | 1 | |
| 西孟加拉 | 185,359 | 37 | 143,247 |
| 总 计 | 1,087,247 | 258 | 693,205 |

注：表中无数字处系因材料缺乏。

领 导

表九表示在 1953—1957 年历届年会上当选的全印农民协会

领导人。以前各届年会的资料不全。就像在全印工会大会里一样，全印农民协会的主席一职多半都是名誉职务，至少在近年来，担任主席的人似乎都没有利用这一职位来影响政策。1954年，因都拉耳·雅支尼克在摩加承认，他没有时间履行主席的职务，因此请求解职，但是在索含·辛格·卓什和 P. 孙达腊雅(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坚持之下，他同意再作一任主席。^① 他的继任者那那·巴底耳于1952年参加印共，曾经是从马哈拉施特拉农工党分裂出来的一个小集团的领袖，在争取成立马哈拉施特拉单一语言邦的斗争中也很活跃。他既然忙于马哈拉施特拉的地方事务，就不能毫无牵挂地进行全印农民协会的活动。1956年担任主席的 A.K. 高普兰也同样因为其他事务不能脱身。除了担任议员和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以外，他还积极参加了要求成立语言邦的运动。

最重要的就是总书记一职，N. 勃腊萨达·腊欧从1953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他是印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共产党安得拉邦组织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一派的成员，同时也是联邦院的议员。由一个安得拉邦的人担任总书记是适当的，因为提倡以农民为革命基础的主要是安得拉邦的共产党人，他们也是印共内部最有势力的地方集团。腊欧担任总书记以后，几乎不得不把领导全印农民协会的工作一手包办下来。1954年，他自称是新德里中央机构的唯一领导干部。^②

从1953到1957年，司库一职由旁遮普革命者巴巴·古鲁木

① E. M. S. Namboodiripad, *Peasants Meet at Moga* (E. M. S. 南布迪里巴德:《在摩加举行的农民会议》), (New Delh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p. 16.

② *General Secretary's Report to the 12th Session of the All-India Kisan Sabha* (《全印农民协会总书记向第十二届年会作的报告》) (New Delhi: AIKS, 1954), p. 42.

表九 全印农民协会各届领导人

| | 第十一届年会 1953年4月22—27 日于坎那諾尔 | 第十二届年会 1954年9月15—19 日于摩加 | 第十三届年会 1955年5月17—20 日于达哈努 | 第十四届年会 1956年9月28日至10 月2日于阿姆利则 | 第十五届年会 1957年10月27日至11 月3日于崩加昂 |
|-----|--|--|---|-------------------------------------|-------------------------------------|
| 主席 | 因都拉耳·雅支尼克 | 因都拉耳·雅支尼克 | 那那·巴底耳 | A. K. 高普兰 | A. K. 高普兰 |
| 总书记 | N. 勃腊薩达·腊欧 | N. 勃腊薩达·腊欧 | N. 勃腊薩达·腊欧 | N. 勃腊薩达·腊欧 | N. 勃腊薩达·腊欧 |
| 副主席 | 加腊南德·沙尔瑪 那那·巴底耳 | 那那·巴底耳 O. 腊捷什瓦尔·腊欧 Z. A. 艾哈迈德 | 因都拉耳·雅支尼克 班基莫·穆克吉 都耳息达斯·扎塔烏 | 那那·巴底耳 班基莫·穆克吉 | 希班·拉尔·薩森那 班基莫·穆克吉 |
| 书记 | 札格基德·辛格·拉耳 布利 Z. A. 艾哈迈德 S. G. 薩尔堆賽 K. A. 吉腊里延 | 札格基德·辛格·拉耳 布利 B. 斯利尼瓦薩·腊欧 尤根德腊·沙尔瑪 比斯瓦那特·穆克吉 | 札格基德·辛格·拉耳 布利 B. 斯利尼瓦薩·腊欧 比斯瓦那特·穆克吉 散加尔·达雅耳·底瓦利 | 札格基德·辛格·拉耳 布利 B. 斯利尼瓦薩·腊欧 | 札格基德·辛格·拉耳 布利 阿卜杜拉·馬索耳 |
| 司庫 | 巴巴·古魯木克·辛格 | 巴巴·古魯木克·辛格 | 巴巴·古魯木克·辛格 | 巴巴·古魯木克·辛格 | A. V. 昆罕布 |

克·辛格担任。他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曾与加利福尼亚的卡德尔党合作,以后为了印度独立事业周游中东和俄国,并在英国和阿富汗監獄中度过了大約十七年。他因为年事已长(約生于 1883 年)和长期从事革命而享有威望,这对他为全印农民协会募捐很有帮助。1953 年全印农民协会遇到财务困难时,他曾到塔塔鋼鐵公司所在地詹謝普尔,为全印农民协会募得二千五百卢比。^①

財 务

全印农民协会的会章规定,每个省农民协会应按每会员一銅币(一卢比的一百九十二分之一)的标准向全国組織交納会費,另外按照全印农民协会中央理事会或全印农民协会全国委员会的规定,分担他种财务摊款(第十二条第二款)。除此以外,参加年会的代表每人須繳代表費八安(即半卢比)(第八条第一款 2 項)。年会的費用由地方接待委员会担負。为召开年会捐募的款項如有剩余,应以 25% 交全印农民协会办公处。余款由省組織留用。

全印农民协会的最大一宗收入来自会员繳納的会費。1954 年的会費(现有的最近数字)只有四千零二十八卢比。捐款是第二个最重要的来源。^② 但是收入还是非常不够,近年来协会接連陷入财务危机中。1954 年,总書記报告說,除了旁遮普—东巴地阿拉联邦的組織外,省組織都沒有交来任何款項,而旁遮普—东巴地阿拉联邦的組織也只是交了所应分担的一部分。全印农民协会那一年的支出是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卢比,其中有四千九百五十卢比

① 同上, pp. 43—44.

② *Twelfth Session of the All-India Kisan Sabha...* (《全印农民协会第十二届年会記錄及決議汇编》), p. 58.

必須靠貸款彌補。^① 情況一直在惡化。全印農民協會的雜誌《農民公報》因經費不足於 1954 年停刊，^② 在達哈努（1955 年）和阿姆利則（1956 年）兩次年會之間，全印農民協會中央理事會“沒有從邦組織收到任何報告和款項。”^③ 有八個省組織因為不交會費而被開除出會。^④

全印農民協會財務的惡劣情況，只是說明這個組織全面衰敗的一個跡象。協會中央理事會開會時出席的人數往往很少。在 1953 和 1954 的兩屆年會之間，中央理事會只舉行了三次會議，還有一次因為不足法定人數（全體委員的三分之一）而不得不延期。哈利基閃·辛格·蘇爾吉德就 1955 和 1956 年兩屆年會之間的時期作報告時寫道：“可悲的是，中央理事會會議所以沒有取得成就，有兩次都是由於不足法定人數這樣一個簡單的原因。”^⑤ 阿姆利則年會顯然就是由於這一原因，才決定把中央理事會的委員由四十三人減為二十五人，從而使法定人數減至九人。

近年來參加年會的人也相應地減少了。《新世紀》周刊在報道阿姆利則年會的情況時說：

在總計一百四十二名代表中，只有五十九名來自旁遮普以外的其他各省。阿薩姆、海德拉巴、喜馬偕爾、古季腊特、馬哈拉施特拉、瑪腊特瓦達、曼尼普爾、中央邦、奧里薩和溫德亞等地都沒有派代表參加。

安得拉只派了代表三人，北方邦二人，堆楞加那二人，泰米爾納德四

① *General Secretary's Report...*（《全印農民協會總書記向第十二屆年會作的報告》），pp. 43—44.

② 同上，p. 44.

③ Surjeet, “Amritsar Session...,”（蘇爾吉德：《農民協會阿姆利則年會》），p. 6.

④ *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 IV(Oct. 7, 1956), p. 2.

⑤ Surjeet, “Amritsar Session...,”（蘇爾吉德：《農民協會阿姆利則年會》），p. 6.

人。^①

哈利基閃·辛格·苏尔吉德在1956年底写道,全印农民协会这种“摇摇欲坠和令人不满的状况”引起了“理所当然的焦虑”^②。在上述背景前面,很难說他是大惊小怪的。

国际上的連系

在工会运动中,参加国际組織的問題一直是个棘手的問題。這個問題迟至1954年才在全印农民协会中提出来,而解决这一問題的办法,頗能說明这个組織的工作情况。1953年10月,当时担任全印农民协会主席的因都拉耳·雅支尼克正在維也納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會議。他在會議上宣布,全印农民协会将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一个部門——农林工人工会国际。在全印农民协会于1954年举行年会时,雅支尼克出席了全国委员会,并要求該委员会批准他所采取的行动。P. 孙达腊雅支持他,但是有些人則认为,这是全体代表大会应当討論的問題,可是,代表大会正在休会,因此這個問題就擱置起来了。^③后来印共报纸报道下一届达哈努和阿姆利則年会时也沒有再提到這個問題,全印农民协会的公开記錄也沒有提到它采取了任何行动。

在全印农民协会中,就像在工会和外围組織里一样,他們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保持联系的办法通常是派遣巡迴代表团。1955年8月,全印农民协会有九位領袖,作为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农

① *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IV(Oct. 7, 1956),p. 2.

② Surjeet, "Amritsar Session...", (苏尔吉德:《农民协会阿姆利則年会》), p. 5.

③ *Twelfth Session of the All-India Kisan Sabha...* (《全印农民协会第十二届年会記錄及決議汇编》), p. 14.

业工人工会的客人，在这两国旅行了七个星期。他們是：^①

达斯腊特·达勃，代表特里普拉的共产党議員、全印农民协会中央理事会理事、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

K. P. R. 果巴蘭，喀拉拉邦老資格的共产党領導人和农民組織者；

K. R. 巴底耳，中央邦立法議會議員和农工党領導人；

那那·巴底耳，全印农民协会主席、馬哈拉施特拉邦的农民組織者；

B. 斯利尼瓦薩·腊欧，全印农民协会的書記和泰米耳納德地方的农民組織者，1938—1939 年任印共月刊經理，1953 年竞选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落选；

Y. V. 格利什那·腊欧，安得拉邦农会总書記、印共安得拉省委员会書記处書記；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腊苏耳，西孟加拉邦农民协会主席；

尤根德腊·沙尔瑪，比哈尔邦农民协会总書記、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

哈利基閃·辛格·苏尔吉德，旁遮普立法議會議員、全印农民协会中央理事会理事、印共政治局委員。

很明显，这个代表团如果說是代表一般印度农民，还不如說是代表印共。其中至少有六个人是长期从事党的活动的老共产党員，一个是政治局委員，另外三个是中央委员会委員。希望这样一批人在莫斯科只討論农民运动問題，看来是很不可能的。

缺 点

全印农民协会越来越衰弱，这一点从表八所列的會員人数中可以清楚看出。在 1954 到 1956 年間，协会的會員人数只在馬拉巴尔和泰米耳納德这两个地区有所增加。在其他許多地区，减少的数字令人吃惊，有些重要省甚至沒有向中央組織提出报告。

近年来全印农民协会江河日下的原因，不在本书討論范围之

^① *Trade Union Record*(《工会記錄》), XII(Aug. 20, 1955), p. 104.

內，但是应当指出，全印农民协会的衰落并不一定意味着共产党在印度农村中的影响已經减少。很可能，削弱全国性組織的許多因素——例如語言地方主义——并不会削弱較小地区中的共产党集团的地位。一个省組織不向中央总部提供資金，甚至不作报告，也不一定表示它已經不存在了。全印农民协会的領袖一再申辯說，尽管它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每况愈下，但是共产党在农民中的影响却有增无已，这种論調也許是不无道理的。

另一方面，作者也能指出一些使印共和全印农民协会在农村中受到严重損害的因素。共产党人同社会党人分裂以后，他們就丧失了追隨許多社会党領導人的广大农民，在比哈尔尤其是这样。在1938年2月，全印农民协会自称共有會員五十四万六千八百人。其中有二十五万人——几乎一半——来自比哈尔邦。^①（任何一省也沒有达到这个数目的三分之一。）到了1954年，据宣布，比哈尔邦的會員人数却是五万六千六百四十人，远在安得拉、堆楞加那、西孟加拉、旁遮普、馬哈拉施特拉和其他許多地区以下。^②

比哈尔的农村仍然是社会党势力的根据地，人民社会党在那里竭力把农民組織起来。这个邦也是維諾巴·帕威“献田运动”的主要目标。由于人民社会党的老牌領袖札雅勃腊加什·那腊延积极参加献田运动，共产党在农村居民中的影响受到了很大的損害。^③ 那腊延和帕威完全致力于呼吁地主广发善心，将土地給予沒

① P. C. Joshi, "Comilla Kisan Congress" (P. C. 約希:《庫米拉农民代表大会》), *National Front*(《民族陣綫》), I(June 5, 1938), p. 1.

② *Twelfth Session of the All-India Kisan Sabha*... (《全印农民协会第十二届年会記錄及決議汇编》), p. 59.

③ 关于共产党同人民社会党在比哈尔竞争的情形，請參閱因德腊底勃·辛哈:《比哈尔邦农民反对提高灌溉稅的斗争》(Indradeep Sinha, "Bihar Peasants Struggle Against the Rise in Water Rates"), *New Age*(monthly)(《新世纪》月刊), III(May, 1954), pp. 32—37.

有土地的人，人民社会党的其他领导人，虽然也重视献田运动，却组织了更富有战斗性的运动来支持农民的各项要求。只要社会党人为表达农民不满情绪提供了有组织的手段，共产党人就很难同他们竞争。

妨碍共产党人在农村居民中获得成功的另一因素是，他们在无地的农业工人问题上所处的困境。在某些地区，这种农业工人足足占农业总人口的37%，^①他们往往以不足糊口的工资受雇于农民和地主。但是如果为了提高工资而把这些无地工人有效地组织起来，那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会比对富有地主的不利影响更大。共产党要这样做就很难希望获得小片土地持有者的支持，更不用说富农和地主了，而在安得拉这样的地区，印共对富农和地主是非常依重的。^②种姓问题又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多数无地工人都是“贱民”或是种姓低贱的人，因此他们被农民看作是劣等人或者从宗教上说不纯洁的人。这样看来，无地工人的利益同农民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而在工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则显然是对立的。

另一方面，印共又把他们看作是“农业人口中最有战斗性的阶层。”^③因此，问题就在于如何利用他们的战斗性而又不致同举足

① Thomas Shea, "Agrarian Unrest and Reform in South India" (托马斯·谢：《南印的农民骚动和土地改革》), *Far Eastern Survey* (《远东概览》), XXIII[June, 1954], p. 83.

② 见 G. S. 帕尔加瓦：《论安得拉邦共产主义运动》(G. S. Bhargava, *A Study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Andhra*) (Delhi: Siddhartha Publications, 1955), 及西利格·S. 哈里逊：《种姓制度与安得拉邦共产党人》(Selig S. Harrison, "Caste and the Andhra Communis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美国政治学评论》), L(June, 1956), pp. 378—404.

③ 《我们在农民群众中的任务》，载《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第117页。

輕重的土地占有者疏远。直到目前为止，印共尽管百般設法，也沒有能把这支穷苦工人大軍組織起来，甚至也沒有能在作法上取得一致意见。

1954年4月，印共中央委员会的一项決議声称，党和农民运动“必須大力注意与支持农业工人的迫切要求。”^①但是，这要在全印农民协会外面进行：

农业工人应该单独地組織在独立的阶级組織里面，跟农民的組織分开。因为第一，他們在工資、工作時間、假期等方面有自己的单独的要求。第二，农业工人中大多数是来自社会上落后的、甚至所謂“不可接触”的等級(賤民等級)；要使他們和其他等級的农民在一起，直接参加农民协会并在其中积极活动，是比較困难的。而且，即使我們能把他們吸收到农民协会里来，这又会使得其他許多农民不願参加农民协会。第三，如果把农业工人单独組織起来，同时又使他們参加农民协会，他們就会成为領導力量。^②

共产党人似乎普遍同意把农业工人单独組織在另一工会內，但是在这些工会成立起来以后是否应当参加全印农民协会的問題上却有着很多爭論。下面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在1954年年会上討論这一問題的情况：

孟加拉的[穆罕默德]阿布杜拉·腊苏耳同志提出修正案說，只要不損害組織农业工人的事业，就应当努力使它們[农业工人工会]参加农民协会。孙达腊雅同志[来自安得拉的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 P. 孙达腊雅]反对这一意见說，目前进行这种努力有害而无利；他认为，只有在运动发展到了农业工人自己感到有此必要而且要求参加协会的阶段，才应当努力吸引他們参加。有人坚持要求把腊苏耳同志的修正案提出表决，結果

① 同上。

② 同上，第119頁。

以一百一十五票对五十票遭到否决。二十人保持中立态度。①

近年来还没有迹象表明，共产党人已经找出了既能利用农业工人的战斗性，又不致失去农民支持的两全其美的办法。事情就是这样。

全印学生联合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学生逐渐成为印度政治上的重要因素。在甘地的不合作运动的吸引下，成千上万的学生放弃学业去参加争取独立的斗争。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学生组织已在各大学出现，但是直到三十年代，人们才试图成立一个全印组织。1936年8月，在联合邦学生联合会的倡导下第一届全印学生会议在勒克瑙举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主持会议开幕式，穆斯林联盟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担任主席。②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二百一十个地方学生团体和十一个省学生团体的代表九百八十六人。这次会议产生了后来成立的全印学生联合会。③关于这个拟议中的组织是否应当参加政治的问题，出席勒克瑙大会的代表有些分歧意见。从接待委员会主席勃累莫·帕尔加瓦的欢迎词中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会议的发起人认为这个组织是政治性的组织。他说：

我们的运动不一定要以浓厚的政治色彩为其必不可少的特征，但是至少我个人不知道我们在我国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完全脱离政治。当然，如果我们的学校以造就英帝国主义的“合唱队队员”为其唯一目的，

① Namboodiripad, *Peasants Meet at Moga* (E. M. S. 南布迪里巴德：《在摩加举行的农民会议》)，p. 34.

② Prabodh Chandra: *Student Movement in India* (勃腊波特·占德腊：《印度的学生运动》) (Lahore: AISC, 1938), pp. 53—54. 不要把该书作者同阿约艾·高士所用笔名勃腊波特·占德腊混淆起来。见参考书目。

③ 同上，p. 53.

那就另当别论了。①

最后，主张积极参加政治和不主张参加政治的人达成了妥协。他们通过了一项宣言说，这个组织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学生在政治、社会和經濟方面的认识，使他们成为良好的公民，以便在争取国家完全自由的斗争中尽他们应尽的义务。”②

在勒克瑙会议结束三个月以后，又在拉合尔召开了第二次会议，由孟加拉的民族主义者薩腊德·占德腊·鲍斯担任主席。鲍斯在主席演说中专门谈论政治，并要求代表注意“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他对参加会议的学生说：“你们有责任把知识分子的活动同无产阶级工人的活动联系起来。”③ 拉合尔会议通过了一个章程，于是全印学生联合会就正式产生了。

虽然从现有的印共文献中，还找不出任何证据说明共产党人已选中学生运动作为他们渗透的重要对象，但是有迹象表明，到了1938年，联合会中有很很大一部分人是亲苏的——如果不是亲共的话。在1938年1月于馬德拉斯举行的全印学生联合会第三次会议上，就有人提出了显然亲苏的决议：

会议坚决认为，苏俄是世界上一贯奉行和平与进步政策的唯一国家，它的存在是所有被压迫人民，特别是国际学生运动的灯塔。会议要求世界各国学生断然谴责法西斯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进行的任何侵略，并在苏联遭到攻击时，予以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援。会议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俄国胜利地完成了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表示祝贺，并对世界最民主的新宪法的产生感到无比欣慰。④

① 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36(米德腊编：《1936年印度年鉴》), II, 503.

② Chandra, *Student Movement...*(占德腊：《印度的学生运动》), pp. 54—55.

③ 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36(米德腊编：《1936年印度年鉴》), II, 508.

④ 同上, 1938, I, 413—414.

4

這項決議案引起了激烈的爭辯和很大的混亂。提出議案的人一度想把它撤回，但是由於會議進行表決而作罷。等到有人要求正式投票時，忽然發現在十個省代表團中只有兩個交納了代表費。因此，主席米諾·R·瑪薩尼宣佈休會一天。第二天一復會，他又立即宣佈散會；於是有些人就召集了一次殘余會議，選出了新主席，並宣佈對瑪薩尼不信任。這種分歧後來得到了彌補，於是共產黨人和國民大會社會黨人在統一戰綫期間建立起來的朝不保夕的團結，又在學生運動中維持了兩年。

全印學生聯合會繼續吸引民族運動中傑出人物的注意：全印學生聯合會於1939年1月1—2日在加爾各答舉行第四次會議時，薩德德·占德德·鮑斯主持開幕式，賈瓦哈爾·尼赫魯再次向會議致詞，阿什德弗（後來成為印度共產黨知名領袖，但在加爾各答會議時還不一定是共產黨員）擔任主席。1940年1月1日在新德里召開的第五次會議則由蘇帕斯·占德德·鮑斯主持。在這段時期中，共產黨在這個組織中的實力有了增加。

1940年年底，共產黨人決定利用英國忙於應付戰爭的機會，抓住時機來推翻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全印學生聯合會於1940年12月25日在那格浦爾舉行第六次會議。在會上，共產黨人在甘地於1940年10月為了反對英國的戰爭努力而展開的“個人不合作”運動問題上，把他們的新戰鬥精神帶進了學生運動。共產黨學生因為這個運動的戰鬥性不強而表示反對；而大多數非共產黨學生則表示支持這個運動。由於不能達成協議，這個組織便宣告分裂，而且兩派分別召開了自己的會議。K.M.阿什德弗和喜冷·穆克吉領導共產黨的一派。阿什德弗還把非暴力運動說成是“反對強迫印度參戰的極為可憐的抗議。”M.L.沙赫和阿德賓德·鮑斯領導非共產黨的一派。那格浦爾大學副校長從中調停沒有成功，從此，

全国学生运动就断然分裂了。^①

非共产党人后来組織了一个新的全国性学生联合会，即全印学生大会。这个組織在 1948 年以前还在活动，后来由于内部政治斗争激烈，不能发挥作用，又宣告解散。继之而起的是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是 1950 年 9 月間建立起来的。它得到总理和札雅勃腊加什·那腊延一流著名人士的贊助。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全国学生联合会是印度最大和最有代表性的全国学生組織。共产党人虽設法保持了全印学生联合会的旧名称，但是自从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他們在有組織的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就越越来越小了。

組 織

全印学生联合会自称在 1946 年有會員六万零五百九十八人，在 1947 年有會員七万四千人^②。1953 年 1 月在海得拉巴举行的第十三届年会上，正式宣布的数字是十万人，但是《新世紀》关于第十四届年会（1955 年 1 月 4—9 日在勒克瑙举行）的报道，引人注目的是对會員人数避而不談。^③

官方报道的會員人数，即使可靠，也不能看作是說明全印学生联合会的力量的可靠指标或者看作是說明它作为印共政策工具的功用的可靠指标。的确，由于关于全印学生联合会近年来的組織和活动的資料不全，我們很难对这一重要問題做出概括的結論，但是我們也不妨提出几点看法。

① 同上, 1940, II, 414.

② *People's Age*(《人民世紀》), IV(Feb. 24, 1946), p. 10. 和 V(Jan. 26, 1947), p. 12.

③ *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 II(Jan. 16, 1955), p. 16.

全印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看来都是忠心耿耿、训练有素、相当能干的。其中有許多在讀書时就参加了印度共产党。另外一些人是在不再积极从事学生运动以后才入党的。其实，印共目前的許多領袖都是在领导学生运动时最初受到組織上的鍛练的（如約底·巴苏、帕尼·波腊、巴薩瓦·崩尼阿、Y. D. 沙尔瑪等）。在1955年，全印学生联合会的两个最高领导人，苏根都·馬琼达尔（总書記）和格利什那·阿南德（書記），已是人所共知的印共专职干部了，而根据全国学生联合会一位领导人的說法，他們早在几年前就不是学生了。^① 因此可以看出，全印学生联合会就是印共吸收和訓練黨員的組織。

全印学生联合会的政策，同共产党所控制的其他群众組織的政策，是非常接近的。在国际問題上，全印学生联合会采取了亲苏反美的立場，在国内問題上，它企图成为爭取政治改革和改善学生待遇的积极战士。它在印度独立后的多次学生罢課中都积极活动。有几次罢課曾經引起了暴力行动和警察开枪的事件。但是，要把学生的騷动完全归咎于全印学生联合会，那是錯誤的。鬧事的原因比这复杂得多，看来全印学生联合会只不过是利用原有的不滿情緒而已。1955年8月，帕特訥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公共汽車加价，結果，引起了暴力行动和警察开枪的事件。当时，尼赫魯总理赶到該市，并在一篇怒气冲冲的演說中把这次动乱的责任推到共产党人身上。人民社会党領袖札雅勃腊加什·那腊延曾在对記者发表的一篇很长的談話中評論这种指控說：

总理給人大扣紅帽子。他肯定是听人說，所有麻煩都是共产党人制

① Chandra Bhal Tripathi, *Presidential Address* (占德腊·帕耳·德利巴提：《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在1955年12月第一次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Lucknow: C. B. Tripathi, [1956?]), p. 17.

造出来的……大家都知道，我并不崇拜共产党人，但是我可以毫不躊躇地說，他們在最近这次風潮中始終都是克制的。他們从来沒有鼓励或慫恿任何一种暴力行为。共产党人有許多缺点，但他們是一个有組織、有紀律的集体。他們现在遵循的具体政治方針是一个談不上使用暴力的政治方針。这次在比哈尔事件中，他們也是以克制的精神按照这个方針行事的。①

不过，毫無疑問，全印学生联合会总是想尽量利用学生中的不安情緒：哪里一成立学生罢課委员会，他們就設法打进去，哪里一发生动乱，他們就广为宣传。例如在比哈尔事件中，印度学生联合会当时的主席 B.那尔欣格·腊欧就在《新世紀》周刊上发表文章，并附以残尸橫陈的血腥照片；印共的人民出版社也发行了一种描写这次斗争的长达三十八頁的小册子。② 1953年10月在勒克瑙举行的、有全印学生联合会領袖积极参加的学生罢課，也得到了同样的广泛宣传。③

参加国际組織

全印学生联合会像共产党控制的其他群众組織一样，也同相应的国际共产党团体保持着联系。全印学生联合会已經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国际学生組織——国际学生联合会。全印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也不时到国外去参加国际学生联合会的會議和其他国际

① 基利札·古瑪尔·辛哈：《比哈尔日記》(Girija Kumar Sinha, *Bihar Diary*, New Delh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d. [1955], p.36)作为附录轉載。

② *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 II(Sept. 4, 1955), p. 3; 和辛哈：《比哈尔日記》(Sinha, *Bihar Diary*)。

③ *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 I(Nov. 8, 1953), p.16, 和 Nov. 15, 1953, pp. 8—9. 关于非共产党人对全印学生联合会在勒克瑙罢課中所起的作用的描述，见占德腊·帕耳·德利巴提：《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在1955年12月第一次會議上的讲话》(Chandra Bhal Tripathi, *Presidential Address*, pp.15—16)。

共产党人的集会，但是由于全印学生联合会和国际学生联合会的影响日漸衰微，这些接触好像并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结果。^①

全印学生联合会参加的最重要的国际活动，就是1956年5月30日至6月7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所谓亚非学生小万隆会议。举行亚非学生会议的主张，原是印度尼西亚全国学生组织印度尼西亚大学生联合会提出的，并且在1953年4月印度尼西亚大学生联合会的年会上第一次拟定了具体计划。^②国际学生联合会立即对这一建议发生兴趣，并协力争取控制这个会议。1955年9月间，国际筹备委员会成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伊朗和黎巴嫩的人员组成。除菲律宾的代表以外，其他都是共产党人。

为了控制印度代表团，全印学生联合会于1956年2月主动组织了一个全国筹备委员会。但是，这时许多非共产党的学生领袖已对此事感觉兴趣，并打算同全印学生联合会争夺筹备委员会的控制权。2月中，德里、阿利加尔、贝拿勒斯、勒克瑙和阿拉哈巴德

①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学生运动的进一步研究，见《世界政治中的学生》(“Students in World Politics”)，载《今日世界》(World Today, VII, No 8, Aug. 1951, pp. 346—356)，及《国际学生会议》(“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载《今日世界》(World Today, XII, Sept., 1956, pp. 371—378)。关于国际学生联合会的详细情况，见埃符龙·M. 柯克帕特里克：《目标：全世界》(Evron M. Kirkpatrick, Target: The World, New York: Macmillan, 1956, pp. 142—144)。

② 这里关于小万隆会议的介绍，是以各种外国和美国的报纸以及下列文章为根据的：占德腊·帕耳·德利巴提：《亚非学生会议》(Ohandra Bhal Tripathi, “The Asian-African Students’ Conference”)，载《人民周刊》(Janata, XI, May 20, 1956, pp. 11—13)；威拉德·A. 汉纳：《小万隆会议》(Willard A. Hanna, “The Little Bandung Conference”, American Universities Field Staff Report, July 5, 1956)；哈里·朗：《亚非学生会议》(Harry Lunn, Asian-African Students’ Conference, n. p., n. d., mimeographed)。朗过去是美国学生领袖，这次以自由记者的身分参加了会议。

等大学的学生联合会主席发出通知，邀请其他大学的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各邦组织的主席，出席在勒克瑙召开的会议，以便成立一个更有代表性的筹备委员会。会议在3月间召开，另外成立了一个二十二人委员会。委员会只包括两个知名的共产党人，即安得拉大学和国际大学的两个学生联合会主席，但是它比全印学生联合会控制的前一筹备委员会具有大得多的代表性。^①到万隆去的印度代表团包括以德里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普兰·萨帕尔瓦耳为首的八名非共产党人和以全印学生联合会总书记苏根都·玛琼达尔为首的四名共产党人或亲共人士。

共产党人显然想在小万隆会议上达到两个重要目的。他们想把会议推上强烈反西方的立场，同时还想在国际学生联合会领导下成立某种形式的亚非学生联合会。这两个目的他们都没有达到。由于非共产党代表特别是普兰·萨帕尔瓦耳和菲律宾代表吉耶莫·德维加的活动，最后决议谴责了“在其各种表现中的”殖民主义，并要求禁止“世界各地的”核武器试验——在这两点上都没有把苏联排除在外。^②

得到埃及人协助的共产党代表既有手腕又很积极，并且不遗余力地利用民族主义和种族偏见；但是他们的对手也同样高明。结果，会议对世界两大强国集团都表示不信任，并坚持要摆脱外国的统治。在这一点上，小万隆会议正确地反映了意义更加重大的万隆会议精神。

全印学生联合会在这次会议上吸取了重要的教训，它将来肯

① Tripathi, "The Asian-African Students...", (德利巴提:《亚非学生会》), p. 13.

② 小万隆会议的决议, 刊登在《学生明镜报》(*Student Mirror*) No. 109 (July 15, 1956)和以下各期上。

定会贊成更多地参加这类活动。毫无疑问，印共有意鼓励全印学生联合会同亚洲其他学生組織建立联系。从这种态度出发，全印学生联合会对尼泊尔表示非常感兴趣。1953年12月，全印学生联合会要求印度軍事代表团撤出尼泊尔，尼泊尔的学生也作为兄弟組織的代表参加了全印学生联合会的几次會議。在受到共产党中国覬覦而保持着微妙平衡的这一边疆战略要地，这些学生可能成为印共的重要耳目。

根据现有的有限証据看来，全印学生联合会好像既不是强大的組織，也不是推行印共政策的有力工具。看来这主要是共产主义本身的性质和全印学生联合会和印共之間的明显关系造成的。印度学生显然比一般人民更富于探索精神，更有知識，因此很难誘使他們輕信共产党那种反复无常的政策，很难使他們把全印学生联合会看作是印共的附属品。看来，全印学生联合会如果真想要在印度学生运动中扩大影响，它就有必要在两方面进行改革：它应当多培养学生領袖而少培养职业領袖；它还应当少追隨苏联和印共的政策而更多地独立行动。在写本书时，这两者似乎都作不到。

其他群众組織

看来，主要的群众組織就是工人、农民和学生的組織了。他們为建立青年和儿童的組織也作过一番努力，例如，1952年11月，他們就召开了孟买青年會議，以便团結“工厂中的工人階級青年、机关和公司中的中产階級青年雇員、‘难民’营中‘流离失所’的青年、教师和学生”。^①非共产党的印度青年也受到共产党发起的各

① *Crossroads*(《十字路口》),IV(Nov. 30, 1952),p. 16.

种世界青年大会的吸引。1956年8月,九个印度人到莫斯科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国际筹备委员会会议,这次世界青年联欢节预定于一年后在莫斯科举行。根据《新世纪》的说法,九个人中有一个是旁遮普政府的副部长,有一个是国大党全国委员会青年部的成员。^①但是,在这些活动之后,并没有成立能够与上述组织相比拟的群众组织。

但是,应当提到共产党人为成立一个妇女群众组织而作的努力。这一工作在西孟加拉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因为共产党人在这里控制了活跃的西孟加拉妇女自卫协会。1943年,《人民战争》在论述西孟加拉妇女自卫协会和相应的穆斯林妇女组织时说:“今天在加尔各答妇女中掀起了巨大浪潮的这两个组织,是在共产党发起下建立起来的。这是三十名女共产党员和三十三名同情共产党的妇女的成绩。”^②在西孟加拉妇女自卫协会的倡导下,“劳动妇女的第一次会议”于1948年11月3—6日在加尔各答召开。这个约有一百名代表参加的会议抗议印度政府禁止共产党控制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所召开的亚洲妇女会议。^③到了1954年4月,西孟加拉妇女自卫协会宣称有会员一万八千人,其中大多数都是黄麻工业中的农民和工人。^④

1954年6月,印度全国妇女联合会在加尔各答的全国妇女大会上产生。参加成立大会的有来自十八个邦的代表八百三十人和来自女青年会一类组织的姊妹代表大约五十人,另外还有外国姊

① *New Age*(weekly)(《新世纪》周刊),IV(Oct. 7, 1956),p. 7. 有四百五十名印度代表参加了1957年7月举行的莫斯科青年联欢节。见《印苏文化协会季刊》(ISCUS)IV,(Special number 4, 1957),p. 67.

② *People's War*(《人民战争》),I(April 4, 1943),p. 1.

③ *People's Age*(《人民世纪》),VII(Nov. 21, 1948),p. 13.

④ *New Age*(weekly)(《新世纪》周刊),I(April 18, 1954),p. 6.

妹代表若干人，其中包括尼泊尔的代表二十三人。因为希望非共产党人参加，共产党人就很谨慎地使会议只具有温和的政治内容。大多数决议都只谈到妇女问题，只有一项决议抗议联合国在“美国外交家的唆使下”，取消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非政府组织的地位。^①大会选出了一个二十九人执行委员会和下列职员：主席布斯巴摩伊·鲍斯；书记阿那苏雅·吉延·占德和哈支腊·卑古莫二人。哈支腊·卑古莫是一个积极的共产党组织家，她是印共政治局委员Z.A.艾哈迈德的妻子。

除了哈支腊·卑古莫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妇女担任共产党的和共产党赞助的组织的领导人。最知名的是阿鲁那·阿萨夫·阿里，她原是社会党人，1954—1956年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样知名的还有代表西孟加拉的共产党议员累努·查格拉瓦尔底。她曾就学于剑桥大学，是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国大党人B.C.洛埃的甥女，但这种情况好像并没有使她们二人感觉窘迫。另外一位积极参加了共产党所发起的各项运动的女议员是，代表特里凡得琅的古玛利·安妮·玛斯卡伦尼。玛斯卡伦尼女士是国大党的老干部，1952年以无党派人士身份选入人民院。曾任1953年6月在丹麦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的印度筹备委员会委员。还有两位共产党员也值得提一下，不过她们的活动主要是从事党的工作而不是在群众组织或外围团体中工作。这两个人就是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罗米希·钱德拉的妻子比兰·钱德拉和以前的孟加拉恐怖分子、现在是P.C.约希的妻子的加耳巴那·杜德。

印度全国妇女联合会于1957年6月在维查雅瓦达（安得拉）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德里、泰米耳纳德、喀拉拉、特

① *New Age*(weekly)(《新世纪》周刊),I(June 13, 1954), p. 13.

里普拉、西孟加拉、比哈尔和安得拉的三百五十三名代表。除了来自英国的蒙尼卡·费尔顿以外，还有苏联、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各国姊妹团体派来的代表。大部分决议都涉及到与妇女有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会议也提出了停止核武器试验的要求。^①

印度的社会历来把妇女放在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上。但是，这种情况已经迅速地起了变化，印度宪法赋予妇女以平等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在内。因此，妇女就成了印度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情况是共产党人深深意识到的。E. M. S. 南布迪里巴德说过，“工人阶级对于妇女运动采取轻蔑的态度……事实上就意味着在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中放弃了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②

結 束 語

印度共产党控制的群众组织近年来好像在走下坡路。既然这些组织是共产党联系群众的主要纽带，人们就不免认为，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必然也在衰退。但是，1957年选举的结果说明，这一结论是错误的。

大家一定还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人在重要的群众组织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竞争，因为国大党的领导集团都在狱中，社会党人也转入地下。共产党依靠P. C. 约希的组织天才，几乎毫无阻碍地组织了工会、农民和学生运动。到了1947年前后就逐渐有了竞争，这时任务就比较艰巨了。此外，B. T. 兰纳迪夫所

① *New Age*(weekly)(《新世纪》周刊), IV(June 23, 1957), p. 16.

② E. M. S. Namboodiripad, "Women's Movement for Democracy" (E. M. S. 南布迪里巴德:《妇女争取民主的运动》), *New Age*(monthly)(《新世纪》月刊), V(Feb., 1956), p. 30.

遵循的十分有害的极端路线，又进一步危害了群众组织。它对群众组织的有害影响大概比对印共的其他卫星团体的有害影响更为严重。在这个时期，又有许多第二流领袖，由于进行毫无意义的暴力行动和狱中反抗而遭受杀害，还有许多人抱着厌恶和失望的心情离开了印共。今天群众运动所遭遇的困难，大多数可以追溯到1948—1951年兰纳迪夫和腊欧控制印共的时期。

印共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削弱群众组织的就是极端主义或“宗派主义”。这一点在全印农民协会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该协会过分奉行印共政策，已意味着不时要失去一些像雅支尼克和萨腊斯瓦提这样重要的农民领袖。这种情形在学生运动中也很明显，在工会中略好一些。阿约艾·高士在谈到印共中央委员会1954年5月的一些决议时写道：

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一定要把群众组织当作真正的非党联合组织来进行组织和领导，要使群众认为它们是它们自己的组织，并对它们的活动切实关注。今天的情况往往不是这样，不仅在改良主义者领导的组织中是如此，就是在共产党人领导的组织中也是如此。以宗派主义方法领导这些组织，不仅有害于党和群众组织，而且削弱了群众运动。^①

全印学生联合会筹备小万隆会议的作法说明，印共当时还没有吸取这一教训。

从全国的角度来看，群众组织的力量是薄弱的，但是在某些地区，它们无疑是很强大的。西孟加拉就是全印工会大会、全印农民协会、全印学生联合会以及印度全国妇女联合会都很有势力的一个邦；的确，这些组织就是合在一起在哪个地区也没有这么广泛

^① Ajoy Ghosh, "On the Decis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阿约艾·高士：《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New Age*(weekly) (《新世纪》周刊)，I(May 2, 1954), p. 4.

的基础。这就使共产党人有了一支能够动员起来参加罢工、游行示威和竞选活动的大军，而且他们运用起来也是卓有成效的。全印农民协会和全印学生联合会在安得拉邦也很强大，共产党人在喀拉拉、马哈拉施特拉和旁遮普邦也有很好的农民组织。

要适当地评价共产党控制的群众组织，就需要同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控制的群众组织比较一番；这项工作不仅要列出会员人数，还要作其他比较，因而越出了本书范围。只有当我们能对印度全国工会大会、印度劳工协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之类组织作出更好的分析，并且能把这种分析同印度选民的态度结合起来看的时候，我们才能评价共产党控制的群众组织的政治意义。

参加 1955 年北京五一节庆祝典礼的 印度工会代表团

全印工会大会：约底·巴苏、V. D. 堆什班堆、穆罕默德·伊里亚斯、古拉勃·腊欧·加那札腊、S. G. 罗卡尔、B. K. 穆克季、K. 腊玛尼(腊曼?)。

统一工会大会：瓦曼·帕雷腊欧、苏希耳·帕达札腊、勃利底什·占德腊、奎梅什(加莫雷什?)·札德季。

邮电联合会：^{△△}B. K. 穆克季、A. S. 腊占、卡巴耳(加布耳?)·辛格。

全印银行雇员联合会：A. C. 卡卡尔、[△]F. M. 平托。

全印保险业雇员联合会：R. M. 巴南支比。

全印港口码头工人联合会：玛坎拉耳·札德季、[△]W. T. 平托。

^{△△} 这些代表按原定时间留在中国，但没有在否认提前回国九人的说法的声明上签字。

[△] 这些代表提前两星期回国，以抗议成立一个亚非工会组织的企图。

全印教育工作者联合会：D.H. 薩哈斯腊布堆、M.K. 班納季。

全印石油工人联合会：G. 孙陀兰。

全印海員联合会：索哈拉布·阿里、[^]比加什·瑪仲达尔、[^]J.D. 兰堆利阿、底黎勃·洛埃、[^]阿卜杜耳·卡达尔·薩濫(塞隆?)。

印度劳工协会：[^]R.J. 梅达、[^]甘加塔尔·J. 欧加雷、[^]巴斯万·辛格。

鐵路員工工会：[^]札格底什·阿支梅腊、^{^^}拉莫·查格拉瓦尔底。

第十七章 外围組織及同路人

正像群众組織是党和一般工人階級之間的“传送带”一样，“外围”組織是党和其他階級中的“进步”分子之間的桥梁。把传送带引伸到社会一切階級之中，以便动員店主、地主、自由职业者、職員以及貴族等各方面人士支持共产党的主张，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列宁时代，但其大力运用，則是晚近的事。

我們今天所謂的共产党的“外围組織”很难說是工人階級的組織，而主要是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組織。最早把外围組織当作一种策略工具的，大概要算德国的共产党人威利·明岑堡了。1921年他在柏林創立国际工人援助会，主要目的是为俄国饥荒地区募集救济物資。它不仅募集了大量物資送往俄国，而且还在募集的过程中放映了俄国电影，进行了广泛的亲苏宣传。^①明岑堡还創立了青年共产国际，但是对印度來說，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精心創作，反帝国主义联盟。自1927年到1931年，賈瓦哈拉尔·尼赫魯

^①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E. H. 卡尔：《1917—1923年的布尔什維克革命》)，(London: Macmillan, 1953), III, p. 404.

是它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见本书第 122 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共产党外围组织已在印度大量出现。按照共产国际早在 1926 年制订的政策,在印度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团体和小型委员会的完整的太阳系,也就是说,这些小型团体是在我党的影响之下(而不是机械的领导之下)进行实际工作的。”^① 这些外围组织有两个主要功用。作为讲坛,它们可以为党的活动创造有利的舆论条件;作为吸收新党员的来源,它们可以提供一种场所,在那里可以对各种各样的政治积极分子进行观察、施加影响,然后把他们吸收到党的组织里。

为了方便起见,印度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有关国际问题的外围组织,即针对世界和平、印苏关系等具体国际问题而成立的一些组织。第二、行业外围组织。这类组织目的在于将各种具体行业的人组成支持共产党某一方面政策的社团。第三、地区性外围组织。这类组织是为了利用在安得拉和马哈拉施特拉等地区兴起的那种富于战斗精神的地方主义而成立的。

国际问题外围组织

印苏友好协会

印度的第一个重要外围组织就是印苏友好协会(AIFSU)。像印度的许多其他政治运动一样,它也是起源于孟加拉的。1941 年,孟加拉印苏友好协会“在腊宾德腊那特·泰戈尔的赞助下”组成。1944 年 4 月,它的第二届年会在“杰出的女国大党人”内黎·森·

^①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for Work Among the Masses” (《群众工作委员会报告》), *Inprecor* 《国际通讯》, VI (April 15, 1926), p. 429.

古普塔夫人的领导之下，在加尔各答举行。^① 1944年6月3日和4日印苏友好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孟买大学的会议厅举行，成立了全国性的印苏友好协会。来自印度各地的将近两千人参加了那次大会，其中有一百人是代表^②。就大会吸引了一些著名的非共产党人士去参加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妹妹维札雅拉格什米·潘迪特担任大会主席，接待委员会主席是《孟买纪事报》主编赛义德·阿卜杜拉·布累耳维。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女战士萨洛季尼·乃都被选为这个新组织的主席，不过她由于进行民族主义政治活动当时正被监禁，所以未能出席这次大会。

这些人物大大提高了该组织的威望，但他们的出席决不表示实际控制权不是操在印度共产党之手。在大会上发言的共产党人(B. T. 兰纳迪夫、喜冷·穆克吉、R. M. 札莫斐加尔)操纵着会议进程，党员和可靠的同情者被安置在执行委员会的各个重要职位上。大会选出的负责人员如下：主席：萨洛季尼·乃都；副主席：玛哈加维·瓦拉陀耳(六十七岁的马拉巴尔诗人，已成为共产党外围组织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赛义德·阿卜杜拉·布累耳维(《孟买纪事报》主编)，普奔德腊那特·达达(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维冷德腊那特·札多巴塔雅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即使不是党员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K. 斯利尼瓦散(马德拉斯《印度教徒报》主编)；秘书长：R. M. 札莫斐加尔(即使不是党员，至少也是一个可靠的同情者)；秘书：喜冷·穆克吉(后来担任议会中的共产党领袖)，瑜难迦博士(情况不详)；司库：玛痕德腊·沙赫(后

① *Peoples' War* (《人民战争》), II (May 14, 1944), p. 4.

② A. S. R. Chari, "Indo-Soviet Friendship" (A. S. R. 札利: 《印苏友好》), *Peoples' War* 《人民战争》, II (June 18, 1944), pp. 4-5.

来在其他外围組織中积极进行活动)。

战时正是成立这样一个組織的理想时期，因为当时苏联还被英国看作是忠实的盟国，而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則激起了全世界对苏联人民的贊揚。当时的印共总书记 P. C. 約希十分重視这种有利的环境，他在《党内通信》中提到这种情况时說：

这就說明了为什么苏联以往的成就及其在目前战争中的作用能够在今天給我們以最有力的武器，使我們能够用来激发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在我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間建立起最坚强的革命联系。……这就說明了为什么印苏友好协会的工作能够在今天成为我党工作中最重要的部門之一。看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了解我們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之一就在于在我国人民和苏联之間建立起最广泛的团結，作为推进我們的国内和国际事业的首要手段。……固然印苏友好协会必須在同苏联友好和团結的基础上联合我国人民中間的一切爱国阶层，**而不管它們属于什么政治派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也不应该意味着印苏友好协会是一个非政治性的組織。**^①

这是对一個外围組織的清楚的描繪：它是一个团結各方面“爱国”人士，推进共产党国内和国际事业的政治性組織。

印苏友好协会在成立之后不久就消声匿迹了。1944 年以后，在共产党的刊物上除了有几次附带提到孟买分会以外，几乎再也沒提起过它。这大概是因为这个組織在 1944 年和 1945 年反共情緒泛滥期間失去了非共产党的支持者，由于无法利用“爱国”人士来为共产党的目的服务，才萎靡不振的。在 1948 至 1951 年共产党实行左傾战略期間，各外国組織遭到了另一次厄运；只是到了該党开始改变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以后，这类組織才又重新出头露面。

1952 年 2 月，孟买的一批同路人为举行一次印苏友好周及印苏友好大会而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大会則准备在下一个月，即

^① *Party Letter*《党内通信》，IV (Jan. 25, 1944), pp. 2—3. 黑体字系原有。

在以俄国作家尼古拉·吉洪諾夫为首的一个苏联代表团訪問印度的同时在該市举行。^① 后来大会于 1952 年 3 月 14 日举行,并从大会中产生了印苏文化协会(ISCUS)。一位孟买的外科医生 A.V. 巴黎加博士被选为主席, S. 文加达腊曼被选为秘书长。^② 巴黎加曾在前一年夏季率領一个医学代表团訪問了苏联^③。

这个新的組織试图作出非政治性的姿态。它在自己的刊物中說:

本协会及其正式刊物《印苏文化协会季刊》全心全意为苏俄和印度之間的文化交流、文化了解和文化联系而努力。我們业已声明,我們不过問政治。我們通过文化讲坛呼吁印度和苏联的广大群众携起手来,为促进文化了解和文化进步而努力,并通过这种努力来消除国际交往中那种不必要的无知、猜疑和畏惧。^④

該协会用来推进上述目的的种种方法,經常公开发表在它的刊物的封底上面。这些方法是:

- (1) 举办各种集会、演讲会、討論会和学习小組;
- (2) 促进印度和苏联之間交換各种代表团和考察旅行团;
- (3) 演出戏剧并組織詩歌座談会和詩朗誦小組;
- (4) 举办艺术、攝影、集邮、著作手稿及其他各种展览;
- (5) 开办閱覽室和图书馆;
- (6) 对于志願学习两国語言的人提供帮助;
- (7) 安排印苏各文化机构間交換学生、学者、艺术家和教授;
- (8) 設法把有关苏联文化的书籍和出版物譯成印度的各种文字;
- (9) 出版并发行有关印苏文化的书籍、杂志等;
- (10) 发展文字上的友誼;

① *ISCUS*(《印苏文化协会季刊》),II(Spring, 1955), p. 84.

② *Crossroads* (《十字路口》),III(March 21, 1952), pp. 8—9.

③ 同上,(Aug. 10, 1951), p. 16.

④ *ISCUS*《印苏文化协会季刊》,I(July, 1954), p. 3.

(11) 进行其他可以促进本协会宗旨的类似活动。①

凡年龄在十五岁以上并接受该协会宗旨的人，均可成为会员。

印苏文化协会第二次会议于 1954 年 11 月 26—28 日在德里举行，开幕式由萨尔达尔·堆札·辛格主持。辛格是前旁遮普—东巴地阿拉联邦高级法院首席法官，并且是刚刚访苏归来的一个三十五人代表团(其中大多数是该协会会员)的团长。会上选出了一个由九十八位印度“著名”人士组成的新的全国理事会；A.V.巴黎加被连选为主席，印共老党员 S. 马赫茂都札法尔(已于 1956 年 8 月 24 日逝世)接替 S. 文加达腊曼担任秘书长的要职。

在两次代表会议之间的那段时期，马德拉斯、海得拉巴、加尔各答、德里、班加罗尔、安得拉、密拉特、阿姆腊瓦底、瓜廖尔、印多尔和帕特纳城都成立了印苏文化协会的分会，而印苏之友的一些单位也死灰复燃，并入了印苏文化协会。②

德里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列举了各地分会举办的种种活动，数目十分可观。例如，孟买的分会声称，在最初的十六个月内，他们在孟买地区就放映了三百二十场苏联电影，观众总数超过十万人。在不少城市举办了許多讨论小组和展览会，有些地方还成立了阅览室，其中备有苏联书刊。孟买分会曾于 1954 年 3 月派印度象棋冠军腊玛占德腊·萨勃累赴苏参观世界象棋锦标赛。他从苏联归来以后，便在孟买帮助组织了一个象棋小组。

到 1956 年印苏文化协会在加尔各答举行第三次全国会议时，它已经有四十二个分会分布在印度全国各地。二十一个分会向总会报告的会员人数共为七千六百七十人。③

① 同上，I(Jan., 1954)，封底。

② 同上，II(Spring, 1955)，pp. 85—86。

③ 同上，III(Winter, 1956)，pp. 1, 69。

1954年1月，該会开始出版一种季刊，刊名《印苏文化协会季刊》。按印度的标准来说，这个季刊编辑完善，印刷精良，是一份引人入胜的刊物。刊物的内容不外是把对印度事物的并不高明的吹嘘和对苏联的热烈称赞巧妙地结合起来——全部都用注释和学术的外衣装点起来。譬如，在1955年春季号中，有一篇文章给人的印象是：在苏联，人们非常爱好印度的文学、艺术、语言，电影。而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D. N. 普里特则告诉《印苏文化协会季刊》的读者说：在苏联，不需要西方式的个人自由，因为苏联公民“感到政府是他自己的政府……是他的朋友，而且会帮助他。”^①

至于印苏文化协会到底有多大作用，我们只能猜测。它的前身印苏友好协会在1944年还得到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印苏文化协会则到1957年为止，还没有能把任何那样的知名人士拉进自己的组织。这似乎说明它在印度当政的优秀分子中没有造成多大影响。在群众中，它的影响可能大一些。当1955年11月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尼古拉·布尔加宁访问印度到达孟买时，该会举行了一次宴会，有邦长、首席部长、首席法官和其他一些显要人物出席。这些人的光临不仅大大提高了该协会及其领导人的威望，而且还使苏联得到了一种它以前在印度群众的心目中未曾享过的尊敬。

和平运动

在印度所有共产党外围组织中，最苦心经营、作用也最大的组织就是为了宣扬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捍卫者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组织。共产党的国际和平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8年8月在波兰弗罗茨瓦夫举行的世界知识分子大会和次年3月在纽约举行的

^① 同上，p. 18.

著名华道尔夫—阿斯多利亚飯店會議。两次會議都有印度共产党的主要同路人参加——作家木耳格·腊支·阿南德参加了前者，数学家 D. D. 高善必参加了后者。随后，1949 年 4 月在巴黎召开的和平大会正式成立了一个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設委員會，并設立了一个十二人組成的执行局，以法国科学家弗雷德里克·約里奥—居里为主席。由于印度政府拒发护照，大会沒有印度的代表团参加。但是，有一些当时正好在欧洲的印度人前往巴黎代表印度出席了大会，其中，孟买的 R. M. 札莫斐加尔(前印苏友好协会秘书长)成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設委員會的委員，D. D. 高善必被选入了执行局。^①

1949 年 11 月，共产党情报局官方刊物宣称：“把和平力量組織和巩固起来以反对战争力量的任务，现在应当成为”全世界的“所有共产党和民主組織的全部活动的中心。”^② 这样，过去已經很明显的事情现在就变得更加清楚了：和平运动的首要目的就是为苏联的外交政策提供另一种工具。

巴黎和平大会是在印共正热中于执行兰納迪夫的反资产阶级战略和暴力策略的时候举行的。因此，印共当时很难去领导一个吸引中产阶级分子参加一項国际事业的广泛群众运动。尽管如此，印共还是作了努力，而且在巴黎大会以后不久，全印工会大会便宣称它准备“联合印度劳苦人民的一切进步組織和民主組織”，

^① *Crossroads*《十字路口》，I(May 6, 1949), p. 10; April 14, 1950, p. 15. 在这次大会的正式文件中，执行局成員中沒有列入印度人。*Pervyi Vsemirnyi Kongress Storonnikov Mira; Parizh-Praga, 20—25 apreliia, 1949 goda (Materialy)* (《1949 年 4 月 20—25 日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举行的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資料汇编〕》), (Moscow: State Publishing House, 1950), p. 500.

^② “Defense of Peace and Struggle Against the Warmongers” (《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 *For a Lasting Peace for a People's Democracy*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no. 28 (Nov. 29, 1949), p. 1.

召开一次全印爭取和平大会。^① 在筹备这次全国性會議的期間，孟买、阿薩姆和西孟加拉都在 1949 年 6 月到 10 月間举行了預备會議。

第一届全印和平大会終於在 1949 年 11 月 24—27 日在加尔各答举行，由全印工会大会主席 V. 札加賴·捷底阿尔担任接待委员会主席。大会的正式报告宣称，有三千名代表出席了會議，他們代表着拥有总数达二百万男女成員的二百五十个群众組織。^② 一个全印和平委员会宣告成立，由捷底阿尔担任主席，D. N. 加万加尔担任秘书。

由于共产党这时正向国大党、社会党和所有资产阶级的代表展开全面进攻，第一届和平大会自然完全变成了共产党控制的各种群众組織及其附属組織的大会。这些組織就是：全印工会大会、全印学生联合会及全印农民协会。捷底阿尔以主席身分发表的演詞中的亲苏反美腔調，就証明他們并不力求把非共产党分子吸引到这个运动中去。他对代表們說：“苏联不希望也不可能希望战争，我国人民十分清楚地了解这一点，而且[他們也了解]英美帝国主义势力是真正的战争挑拨者。”^③

这种強調难免会把任何尚未接受苏联对冷战的看法的人排斥在印度和平运动之外，結果就削弱了和平問題在非共产党的中产阶级中可能产生的宣传效果。因此，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而論，印度和平运动的第一步就走得不太对头。

就在加尔各答和平大会以后仅仅两个月，共产党情报局便开

① “Review of the All-India Peace Congress”《評全印和平大会》，*Communist*(《共产主义者》)，III(Jan., 1950)，p. 52.

② 同上，p. 46.

③ 同上，p. 58.

始告訴印度共产党人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領導不支持 B.T. 兰納迪夫的左傾战略。（見第十三章。）但是印共迟迟沒有反应，而且由于左派在 1950 年 5 月以前一直控制着該党，和平运动便受到了影响。

1950 年 3 月 15—19 日，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設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第三次會議，并发表了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R. M. 札莫斐加尔代表印度出席了这次會議，并在印共的《十字路口》周刊上报告了會議的經過。他在报告中着重引述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总書記让·拉菲特的意见。拉菲特說：

不能认为我們的运动是现有各民主組織的調整机构。也不能认为我們的运动仅仅是现有各民主組織的总和，因为这沒有任何好处。我們的运动必須是一种更加广泛的运动。①

这些意见特別适用于印度。1950 年 4 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委員、英国科学家 J. D. 貝尔納赴印出席印度科学大会。当他在印度期間，不辞辛苦地考察了和平运动的进展情况，并在发表于《十字路口》上的一封信中向全印和平理事会报告了自己的所见。貝尔納說：印度的和平工作者“为数过少，而且我感到他們要求于他們的追随者的了解可能是太多了，要求于他們的政治上的一致可能也太全了。”②

当 4 月間在印度开始进行斯德哥尔摩宣言签名运动时，虽然沒有宣布具体的定額，不过全印和平理事会和《十字路口》杂志都說要征集“几百万人”在宣言上签名。③ 但是，到 6 月便已看得很清楚，事情进行得并不順利。6 月 16 日出版的《十字路口》在第 1 頁

① *Crossroads*(《十字路口》), I(April 14, 1950), p. 15.

② 同上, II(May 5, 1950), p. 7.

③ 同上, I(Special Peace Issue, April 21, 1950), p. 14.

上登載了一个通知,号召更多的人签名,并且承认“印度的签名运动落在世界运动的后面。”到9月,在一份党内文件中談到只征集到不足三十万人的签名,承认遭到了惨敗。^①

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設委员会执行局于1950年5月举行了会议,决定召开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这次会议的地点决定为英国的設菲尔德。这一计划由于英国政府最多只发给二百个代表签证而遭到破坏,于是会议地点便在最后的时刻移到了比較好客的华沙。

随着第二届和平大会的临近,事情已經愈来愈明显:有必要对印度和平运动进行一番整顿。但是这件事做起来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尽管这时B. T. 兰納迪夫的总書記职务已被撤掉,印共却仍然由一些富于战斗性的分子控制着,他們把和平运动只看成是推动起义的另一种手段。

变化首先出现于孟买。《十字路口》在10月間說:“由于孟买的和平运动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到现在为止,它只为斯德哥尔摩宣言征集了五万签名,因此在10月22日举行的……一次公开会议上选出了新的孟买和平委员会。”^② 木耳格·腊支·阿南德被选为主席;R. K. 卡朗吉亚(《閃电》周刊主編)和K. A. 阿巴斯被选为副主席;格利閃·占达尔被选为总書記;腊支(洛梅什?)·塔巴尔担任司庫。

1950年10月28—29日全印和平大会在孟买举行,左派与溫和派之間的斗争終於公开化了。勒克瑙的代表F. A. 卡茲米“要求将和平运动同人民的日常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并宣布英美帝国

① *A Note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Our Party* (《关于我党当前情况的意见》), (n. p.: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0), p. 38.

② *Crossroads*(《十字路口》), II(Oct. 27, 1950), p. 3.

主义为侵略者和战争贩子。”^① S. A. 丹吉回答說，“和平运动不是工人运动”，并警告說，不要把侵略者的标签貼到美国身上，否則会把許多可能支持和平运动的人吓跑。孟加拉代表团要求撤銷加尔各答和平大会的宣言，因为該宣言“背离了世界和平运动的政策和綱領，并且用錯誤的口号限制了印度和平运动的范围。”但是，大会宣称它无权正式撤銷該宣言，它只是发表了一項呼吁书，在第二届全印和平大会召开以前，用以指导和平运动。大会成立了一个有互选权的十四人筹备委员会。在西班牙內战时期参加过国际纵队的瑪丹拉耳·阿达耳博士被选为主席，作家格利閃·占达尔被指定为書記。据宣称，这个委员会并非代替原有的全印和平委员会，而是将与它共同筹备第二届全国和平大会。

1950年11月16—22日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华沙举行；印度派遣了一个由三十七人組成的代表团出席，团长为瑪丹拉耳·阿达耳，团员中包括已故的薩洛季尼·乃都的兄弟、无党派国会议員哈蘭德腊那特·札多巴塔雅和共产党的《十字路口》周刊的主編洛梅什·塔巴尔。^② D. D. 高善必未能出席这次大会，但被选入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代替了以前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設委员会）。

人們还会記得，1949年11月共产党情报局的刊物曾經宣布和平运动是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全部活动的枢紐”。在1950年10月和12月之間，两个印共领导人到欧洲去就印共危机問題征求意见。他們在会见 R. 帕姆·杜德时，特別問到他是否认为和平运动應該是印共一切活动的“枢紐”。1951年1月間印共党内传閱了关于这次会见的詳細报告。报告引杜德的話說：

① 同上，(Nov. 3, 1950), p. 16.

② 同上，(Dec. 15, 1950), 增刊, p. 4. 哈蘭德腊那特是維冷德腊那特的兄弟。

很明显，和平运动为党建立印度各阶层人民的广泛陣綫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武器。朝鮮战争以后的最新經驗表明了，在印度建立这样一个陣綫有多么巨大的可能。如果我们承认建立民族民主陣綫是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任务的话，那么很显然，即使暂时撇开“枢紐”这个字眼不用，和平运动也必然会成为党的主要活动——从和平运动中产生的广泛陣綫将为建立民族解放陣綫奠定基础。^①

因此，到了1951年初，每个印度共产党人都应该已经看清楚，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把和平运动看作是具有重要性的事情，而且不赞成印共左派领导对待和平运动的那种宗派主义态度。但是，当杜德的谈话在党内传阅时，组织了孟买和平大会的比較温和的分子从左派手中夺去了和平运动的领导权。

与此同时，在华沙和平大会上成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于1951年2月21日至26日在柏林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且号召发起一次新的签名运动。这次是呼吁五大国签订和平公約。

1951年3月3日和4日，第二届全印和平大会筹备委员会在新德里举行会议，以拟定召开大会的最后计划。虽然只有二十三个成员参加了德里的会议，但是当时筹备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却是六十一人，并且其中还包括一些十分著名的非共产党人士。^② 这些非共产党人士中有赛福丁·克其鲁博士，他是一个穆斯林，曾在1924年担任印度国大党总书记，并且曾长期从事国大党的活动。

^① Deven and Bal Krishna, *Talks with Comrade R. Palme Dutt and Other Impressions Gained Abroad by Deven and Bal Krishna* (堆文与巴耳·格利什那：《堆文与巴耳·格利什那同 R. 帕姆·杜德同志的谈话及在国外获得的印象》), (n. p.: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1), p. 2. “堆文”和“巴耳·格利什那”都是假名字。据一项非共产党的材料说，S. A. 丹吉、阿约艾·高士、腊捷什瓦尔·腊欧和巴萨瓦·崩尼阿曾于1951年初秘密赴莫斯科。见《共产党在馬杜賴的阴谋》(*Communist Conspiracy in Madurai*), (Bombay: Democratic Research Service, 1954), pp. 19—20.

^② *Crossroads* (《十字路口》), II (March 9, 1951), p. 16.

筹备委员会德里会议透露，虽然和平运动的活动这时已比较符合共产党情报局的政策，但是在总书记腊捷什瓦尔·腊欧领导下的印共的激进领导仍然不愿遵行和平运动的新政策。这个问题吸引了筹备委员会的全部注意力。它“严重地注意到在某些邦和县里，人们至今还不理解为什么必须保持和平纲领的真正广泛性，并避免在局部的和狭隘的党的口号和党的决议中滥用和平纲领。”^①会上提出来给予具体批评的是安得拉邦的各个分会。安得拉邦是腊捷什瓦尔·腊欧的家乡，那里的和平委员会曾企图把和平运动同反对预防拘留法的运动结合起来——有大批安得拉共产党人被政府根据该法投入监狱。

筹备委员会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未来的争取和平大会的开会地点问题。因为印度政府内政部长 C·腊札果巴拉札利已经宣布大会不能在德里举行。克其鲁曾率领一个代表团劝他取消这项禁令，但内政部长坚决不同意。^②

这里，有必要提一提在 B.T. 兰纳迪夫领导期间被开除出党的前印共总书记 P.C. 约希在和平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当 1950 年 7 月腊捷什瓦尔·腊欧代替了兰纳迪夫以后，约希曾企图回到印共党内；但是他被拒绝了，理由是他的政治路线仍然是改良主义的。在本书第十三章中已经指出，约希对共产党情报局指令的理解比印共正式领导的理解更为正确。这时，他立刻体会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对和平运动的重视，而且他很快就看出，这种重视是赶走腊捷什瓦尔·腊欧的一个可资利用的工具。

① 同上，II(March 30, 1951)p. 8.

② 共产党指责说，内政部长受到了菲利普·斯普拉特的小册子《共产党人对和平的呼吁》(*The Communist Peace Appeal*) (Bombay: Democratic Research Service, 1951) 的影响。

改組和平运动的最高潮是 1950 年 10 月在孟买召开和平大会；关于約希是否在发动这次改組上起了作用，现在沒有公开的記錄可資說明。但是，到 1951 年 3 月第二届全印和平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德里举行會議时，約希已經是該会成員了。^①当他在 1951 年創辦他自己的杂志《今日印度》时，第一期便出版了“和平专号”，其中載有他写的一篇分析印度外交政策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到“印度政府最近为爭取和平作了一系列主动努力”，并且把这些努力說成是“帝国主义反动陣营中的种种矛盾的反映”。然后，他又做了如下的补充，显然是針對他的过去的同志而写的：

列宁，我們时代的最伟大的革命战略家，曾宣布过下面的策略原則：如果无产階級和人民的运动不能利用敌人陣营中的矛盾、不能爭取同盟者（不管它們如何搖摆和如何軟弱），那就永远不能斗争到最終的胜利。

印度进步人士对待尼赫魯外交政策的正确态度应当是：

大胆地支持他的一切具体和平行动；这些行动在客观上都是有利于反帝和平陣营的。

无情地揭露尼赫魯政策中所有的軟弱、动摇和矛盾。

不懈地致力于建立一个使印度完全同帝国主义断絕联系、并全心全意参加反帝和平陣营的政府。^②

比約希的文章更加重要的一篇文章是載在同一期中的筹备委员会書記格利閃·占达尔所写的文章。占达尔为約希的杂志写文章，就无异于用他自己作为和平运动的主要人物的威望去支持一个已被开除出党并仍被党的正式領導譴責为叛徒的人。占达尔写道，“印度和平运动是一个最近才发展起来的运动，它与老的和平运动毫无关系。老的和平运动主要局限于一个政党和它的密切的

① *Crossroads*（《十字路口》），II（March 9, 1951），p. 16.

② P. C. Joshi, “India in the Battle for Peace”（P. C. 約希：《印度为爭取和平而战》），见《今日印度》（*India Today*），I（May, 1951），pp. 14—15.

追随者与友人的范围之内。它是一个有严重关门主义的运动；它的发展是关门主义的，并且终于由于自己的关门主义而死亡[原文如此]”。^① 筹备委员会中的其他知名人士，包括瑪哈加維·瓦拉陀耳、阿里·薩尔达尔·札弗利和 D. D. 高善必在内，也都为約希的杂志写稿。

由于在德里举行和平大会无法获得批准，筹备委员会便选定孟买为会议地点。1951年5月11日至13日，全印和平大会（临时把“Congress”改为“Convention”）在孟买举行，有来自印度各地的二百八十八名代表出席。^② 筹备委员会解散了，一个由一百五十人组成的全印和平理事会宣告成立，理事会成员有无限的互选权利。比阿达耳博士远为著名的克其魯博士做了新的主席，但格利閃·占达尔仍然担任总书记。大会批准了阿达耳博士和 D. D. 高善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并且又向世界和平理事会推荐了克其魯、占达尔、勃利特維·腊支·卡波尔（孟买的一个电影演员兼制片商和联邦院議員）和木耳格·腊支·阿南德。^③

为了实现广泛开展和平运动的目标，大会决议“在各級組織采取种种特殊的措施，去接近那些仍然站在和平运动之外的持各种意见的人士——包括由圣雄甘地的亲密学园弟子所领导的大批和平主义者和各种拥护和平的宗教团体。”^④

孟买和平大会响应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会议的号召，支持要求締結五大国和平公約的呼吁书，并规定了指标，要在9月1日

① Krishan Chandar, “Peace in Our Time” (格利閃·占达尔: 《我們时代的和平》), 同上, p. 34.

② *Peace and Indian People* (《和平与印度人民》) (Bombay: All India Peace Council, 1951), p. 24. 这本书列出了各省的出席代表。

③ 同上, p. 10.

④ 同上, p. 18.

以前征集一千一百万以上的人在呼吁书上签名。全部征集任务按省分派，连印度的圣者都定了一个指标——二十万人。^① 这项指标没有完成，到1952年9月，即在原定的截止期一年以后，只征集到了二百五十万人的签名。^②

P. C. 約希对于这次大会的成绩，大体上是满意的，尽管当时他也有点苦恼，深怕和平运动在消除极左路线的错误时可能向右走得太远了。他说，“右的错误来自上面，犯错误的是掌握大会进程的一些负责的领袖（即共产党人）和一两个著名的知识分子。”^③ 他说，右的倾向表现在下面的作法上：“他们[右倾分子]一味表彰尼赫鲁政府为和平所做的积极努力，却避而不谈它为战争贩子帮忙的亲帝国主义行为”。他继续说，赞扬政府的建设性行动是正确的，但是，不批评尼赫鲁的“亲帝国主义”行动则是错误的，因为这会“破坏体现在当前和平运动中的左派团结”。^④ 这种“右的”倾向是否真的使約希感到苦恼，是无关紧要的，但孟买和平大会的成就似乎确实影响了印共党内的形势。不拘怎样，在大会闭幕后不到三个星期，孟买的印共总部便宣布腊捷什瓦尔·腊欧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1951年6月4日）。^⑤

在孟买和平大会以后，一大批文化、科学、经济代表团开始往来于印度和它北方的两个共产主义邻邦之间。1951年6月19日，

① 同上，pp. 21—22.

② *Crossroads*（《十字路口》），IV（Sept. 21, 1952）p. 2. 1953年1月5日，克其鲁在莫斯科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宣称，已经征集到三百万人的签名。见《伸过喜马拉雅山的手》（*Hands Across the Himalayas*）（New Delhi: All-India Peace Council, 1953），p. 139.

③ P. C. Joshi, “India Can Halt War”（P. C. 約希：《印度能够制止战争》），见《今日印度》（*India To-day*），I（June, 1951），p. 20.

④ 同上。

⑤ *The Hindu*（*Madras*）（马德拉斯《印度教徒报》），June 5, 1951, p. 5.

一个由作家、新聞工作者、医师和工程师組成的十三人代表团，在哈蘭德腊那特·札多巴塔雅的领导下，由德里首途，經喀布尔前往莫斯科。^① 这个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員都与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共产党外围組織有关系。有五个中国組織通过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館向全印和平理事会、印中友好协会孟买分会和加尔各答分会发出邀請，接着在1951年9月，一个由潘迪特·森德拉尔率領的非官方代表团起程前往中国。^② 在此以前(7月)，全印和平理事会就为参加莫斯科經濟會議成立了一个印度筹备委员会，該會議于1952年4月举行时，有二十八个印度人出席。^③ 当莫斯科經濟會議正在进行时，印度政府宣布，一个由維札雅拉格什米·潘迪特夫人率領的十四人文化代表团，将于4月27日启程前往中国。^④ 第二天，馬德拉斯《印度教徒报》获悉，十四名印度工会工作者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邀請，将訪問中国，并在北京参加五一节庆祝典礼。^⑤ 后来，这个代表团由十七个工会工作者組成，他們与潘迪特夫人所率領的文化代表团同时訪問了中国。

正当代表团的来往成为中印关系中这样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的時候，一批十一个著名的中国知識分子* 于1952年5月在北京与宋庆龄(孙逸仙夫人)举行了會議，并发出召开亚洲和平會議的

① 同上，June 22, 1951, p. 6.

② Sunderlal, *China Today*(森德拉尔:《今日中国》)(Allahabad: Hindustani Culture Society, 1952)pp. 1—2.

③ *Crossroads*(《十字路口》), III(July 27, 1951), p. 9. 参加會議的印度人的姓名见:《莫斯科国际經濟會議》(*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Moscow: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p. 321—322.

④ *Indian Press Digests*(《印度报刊文摘》), I(March, 1953), p. 19.

⑤ *The Hindu* (Madras)(馬德拉斯《印度教徒报》), April 8, 1952, p. 6.

* 11人应包括宋庆龄在內。——譯者

号召。^① 6月3日,二十个国家的四十七名代表在北京举行筹备会议,以制定召开全亚洲和平会议的具体计划^②。出席会议的印度代表是D.D.高善必、萨尔达尔·古尔巴赫·辛格(旁遮普的文学家和《可爱的花环》的编辑)和因都拉耳·雅支尼克。显然,雅支尼克是在参加了莫斯科经济会议以后从俄国去到北京的。原为工会代表团团员的S.S.优素福以观察员身分代表全印工会大会签署了最后的公报。^③

印度和平运动立即响应了中国的建议,《十字路口》并在8月宣布,将召开一系列省级的和平会议,以便募集基金和选派前往北京的代表。^④

1952年9月13日,第三届全印和平大会在贾朗达尔(旁遮普)举行。在参加大会的新人物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曾在美国受教育的J.C.古玛腊巴博士(锡腊丘兹大学科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甘地主义经济学者”,当时任全印农村工业协会主席。古玛腊巴是1951年9月访华文化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并且在归国以后还用他的若干次赞扬中国的讲话慷慨地偿还了共产党的投资。从此以后,他便全心全意地委身于共产党人歌颂共产主义国家而诽谤美国的运动中。^⑤自从第三届和平大会以来,古玛腊巴在共产党所支持的集会上,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宣传员。

① *China Monthly Review*(《密勒氏评论报》), CXXIII(July, 1952)p. 66.

② 同上,(August, 1952), pp. 122—125.

③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中国大陆报刊概览》), 1952, no. 346, p. 9; no. 349, p. 2; and no. 350, p. 6.

④ *Crossroads*(《十字路口》), IV(Aug. 24, 1952), p. 11.

⑤ 见古玛腊巴(Kumarappa)为L. 纳塔拉詹:《美国阴影笼罩印度》(L. Natarjan, *American Shadow over India*)(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2)所写的前言。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于1952年10月2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有来自三十七个国家的三百六十七名代表参加了讨论。据一个苏联的作家说，印度有三十九个代表和十二个观察员参加，但中国报纸关于大会的报道则说参加会议的印度人在六十五名以上^①。罗米希·钱德拉声称，有二十多个原定的代表，被印度政府拒绝了签发护照。^②

印度的共产党和非共产党报纸关于这个代表团的情况都谈得很少，只有那些最著名的代表的姓名被公布了。但是，札都尔·那腊因·玛拉维雅（来自博帕耳的国大党国会议员），腊维·闪加尔·乌雅斯（“古季腊特的一位著名而有威望的圣雄甘地追随者”）和果温德·萨海（北方邦立法会议员，该邦首席部长的前任驻国会秘书）的参加，却被大事宣扬。^③ 报纸对代表团中的印共成员只是轻描淡写，但是在前往北京的共产党代表中却包括着 A. K. 高普兰、Y. D. 沙尔玛、罗米希·钱德拉、P. V. 腊格哈外阿（国会议员）、萨尔达尔·勃利特维·辛格、加腊南德·沙尔玛和萨尔拉·古普塔夫人。罗米希·钱德拉被任命为大会的副秘书长，克其鲁、吉安·占德和乌雅斯则被选入了主席团。

正如外间所料，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文件，谴责美国侵略朝鲜和进行细菌战。A. J. 法利底、阿尔温德·梅达、阿米雅·穆克吉代

① A. Popov, "The Peoples of Asia Speak Out for Peace" (A. 波波夫：《亚洲人呼吁和平》，*News*（《消息报》[Nov. 1, 1952]）p. 15. *Crossroads*（《十字路口》），IV（Oct. 12, 1952）第八页认为代表团为60名，但1952年11月9日的一期（第8页）则声明，该代表团系54名。

② Romesh Chandra, "At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Peace"（罗米希·钱德拉：《在北京为和平效劳》，*New Age*（monthly）《新世纪》月刊），I（Dec., 1952），p. 25.

③ 同上，p. 27.

表印度代表团在科学家和医师关于美国进行細菌战的一项宣言上签了名。^① 大会对印度代表团和巴基斯坦代表团的关于克什米尔問題的联合宣言大事吹嘘，这个宣言是当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台上互相拥抱时，在“雷鳴般的掌声”中签字的。但是，这个宣言也仅仅号召和平解决爭执，并批評联合国和“英美两大国”的“明显的目的”是“加剧印-巴冲突，从而使这两个国家都屈从于它們”。^② 关于撤退军队和公民投票这两个棘手的問題，大会未提出任何建議。

在大会結束时，成立了一个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有四个印度人被选入該委员会：賽福丁·克其魯当选为副主席之一；罗米希·錢德拉当选为副秘书长之一；吉安·占德和腊維·閃加尔·烏雅斯当选为委員。^③

就北京會議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來說，應該說由于这次會議而产生的最重要的文件就是罗米希·錢德拉关于會議經過的报告，这份报告曾刊登在印共的新理論刊物《新世紀》第三期。錢德拉在北京會議中找到了对印度和平运动的——就其含意來說，也是对印度共产主义的——一种战略指示。他說：

我們在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进行討論时发现，他們正面临着我們在印度所面临的同样問題。在所有的国家內，在和平运动內部需要严防的主要危險，就是把調子定得太高——即“左”的危險——以致使那些在政治上不太先进的人們难于理解和把握。当然，落后于人民大众的进步觉悟的危險也存在着，但是主要的危險是第一个危險——太左。^④

① *Survey of the China Mainland Press*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 1952, No. 432, p. 24.

② 全部文件的原文均见于《消息报》(*News*) (Nov. 1, 1952) 和《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 (Oct. 23, 1952, and Nov. 1, 1952) 增刊。

③ *People's China* (《人民中国》) 增刊, Nov. 1, 1952. p. 3.

④ Chandra, "At Peking..." (錢德拉: 《在北京为和平效劳》), p. 31.

就是这样，在印共以比較溫和的分子代替了它的激进的总書記和中央委员会一年多以后，这位負責和平运动的印共黨員仍然感到有必要在党的刊物上指出，还存在着左傾的危險。

北京和平會議是在 1952 年 10 月举行的。同年 12 月 12 日至 19 日，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在維也納举行，有三十个印度代表前去奧地利出席。代表团是由克其魯博士率領的，其中包括几位引人注目的非共产党人士。甘地派有很多代表，即 J. C. 古瑪腊巴、瑪黑什·都德·米斯腊、和維努派·G. 沙赫。后者是維諾巴·帕威的献田运动中的一个著名成員。农工党的領袖都耳息达斯·札塔烏也出席了大会。在出席維也納和平大会的人中，只有克其魯、罗米希·錢德拉及其夫人和南德拉耳·塔尔曾出席北京和平會議，尽管古尔巴赫·辛格在 6 月就到了北京。

但是，关于这个代表团的最值得注意的事实还是 P. C. 約希的参加，因为他当时在党内仍然处于曖昧的地位。此外，他还是在維也納和平大会閉幕之后立即前往莫斯科的二十六名代表之一；在莫斯科，克其魯被授以斯大林和平奖金。^① 在去莫斯科的人中，有四个人（罗米希·錢德拉、比蘭·錢德拉、哈支腊赫·卑古莫、S. K. 阿札腊）可以看做是共产党积极分子，并且可以列入印共的右派。S. K. 阿札腊和約希一样，在 1949 年 1 月就已經被兰納迪夫領導集团开除出党。^②

在 1953 年內，世界和平理事会曾先后于 6 月和 11 月在布达佩斯和維也納举行會議。^③ 布达佩斯會議标志着陆軍少将薩喜

① 关于这次訪問紀实，见《伸过喜瑪拉雅山的手》(*Hands Across the Himalayas*)。

② *People's Age*(《人民世紀》), VII(Jan. 23, 1949)p. 3.

③ 部分代表的名单曾在共产党的刊物上发表。见《十字路口》(*Crossroads*), V(June 21, 1953), p. 7; 和《和平》(*Peace*), I(Jan., 1954), pp. 17-18.

勃·辛格·苏奎爵士参加印度和平运动的开始。苏奎是一个被指定的联邦院議員和 1950 至 1952 年世界卫生組織的副总干事。根据《十字路口》的报道，他曾想参加中国所支持的“科学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調查了对在朝鮮进行細菌战的控訴——但是由于印度政府的阻止，他没有做到。^① 1953 年 4 月，他在欢迎克其魯从苏联返国的集会上发表了演說；6 月，他率領印度代表团前往布达佩斯。当全印和平理事会的杂志《和平》于 9 月創刊时，苏奎被列为顧問編輯委员会的委員之一。这些活动的結果使他成了第二个获得斯大林和平奖金的印度人——1954 年 7 月，他在莫斯科接受了这项奖金。^②

世界和平理事会維也納會議（1953 年 11 月）决定，为了召开一个大规模的國際和平會議，要努力爭取非共产党組織的支持，以扩大和平运动。罗米希·錢德拉在报告中說，这项决定把和平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性质不同的水平”。他在《新世紀》月刊中写道，“我們现在不仅要設法同平行的組織和运动建立接触和进行討論，还要同它們采取統一的行动。”^③

在維也納會議以后不久，美国政府向巴基斯坦提供軍事援助的决定，給了印度和平运动一个意外的帮助，因为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在克什米尔問題上与巴基斯坦进行着剧烈的爭执。美国这个行动在印度被广泛地解释为对南亚事务的不友好的干涉，有碍于和平解决这两个国家之間的未决問題。一股反美情緒席卷了全国，

① *Crossroads*(《十字路口》), IV (Dec. 28, 1952) p. 7.

② *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 I (July 25, 1954), p. 15.

③ Romesh Chandra, "Towards Great National and World Peace Meetings—New Stage in Peace Movement" (罗米希·錢德拉:《走向伟大的全國和平會議和世界和平會議——和平运动的新阶段》), *New Age* (monthly)(《新世紀》月刊), III (March, 1954), p. 45.

使許多过去同情美国的輿論同美国疏远起来。共产党利用了这一点,把2月14日定为“反美巴协定日”,在全国各地組織示威游行,并在某些地区取得了执政党分子的合作。^①此后,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便成了和平运动中的重要題目。

尽管国际上的这种新发展大大有助于共产党組織更广泛的和平陣綫,但是它也立即造成了一种困难的局面:任何反对巴基斯坦的运动,就像这次的反美巴协定运动一样,都必然有(现在还有)在印度占人口大多数的印度教徒和四千万穆斯林之間激起教派糾紛的危險。罗米希·錢德拉在报告中說,“在某些邦里,‘不分党派的’共同反美巴协定运动,在和平委员会的领导下,都变成了教派的和反巴基斯坦的集会和示威。我們已經在团結的欢欣中忘記了运动的真正目标,而教派势力和反动势力則抓住了这个机会,利用美巴协定去实现它們自己的目的”。^②

和平运动也由于另外的一些困难而繼續遭到損害。在某些邦里,印共党员坚持要和平运动支持“左派和反对党的最进步的口号”,而在另一些邦里,他們則难于阻止他們的和平會議給予政府以无条件的支持。

但是,最大的問題还是,党员中間普遍存在着一种对和平运动漠不关心的态度。阿約艾·高士于1954年1月在他的《論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写道,“党内对于和平运动的重要性”一詞存在着“非常严重地过低的估計”,而且“党把整个和平运动都忽視了”。^③錢德拉在3月間的报告中說,在某些邦里,仍然存在着一種

① *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I(Feb. 21, 1954), p. 16.

② Chandra, “Towards Great National...”(罗米希·錢德拉:《走向伟大的全国和平會議和世界和平會議——和平运动的新阶段》), p. 49.

③ 阿約艾·高士:《論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輯》,世界知識社1955年版,第145頁。

“純形式地”对待和平运动并把和平运动看成是“浪費時間”的傾向。^①他特別提請注意“群众組織沒有給予和平运动以足够的支持和重視”。所謂“群众組織”当然指的是指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农民和学生組織。高士也暗示过这一点。^②

但是,由于中国总理周恩来 6 月間的訪問印度,和平运动获得了一种令人欢欣鼓舞的刺激。他同尼赫魯的会談結果,发表了一个宣布“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公报,这后来在印度被称为“潘查希拉”。当全印和平理事会于 7 月底在加尔各答举行會議时,它便号召展开一个“統一的运动来爭取以接受五項原則为基础的亚洲团結”。^③到 10 月时,錢德拉已能看到,在群众組織对和平运动的反应方面,已經有了一些好轉。他报告說,有几个工会已經保証給予积极的支持,全印农民协会在 9 月举行的第十二届年会上,也通过了关于和平的特別決議。但是他說,尽管如此,如果断言各群众組織“已全力投入和平运动”,却是錯誤的。“这远远不是事实。有好几个邦,那里的群众組織对亚洲团結运动,只是用一个通告或一項宣言給了形式上的支持。”^④

尽管和平运动組織者可能不滿意群众組織对运动的反应,但是他們却有理由对党外重要政治人物的参加人数感到欣慰。由于下列情况,他們尤其有理由感到滿意: 1953 年 5 月,国大党工作委

① Chandra, “Towards Great National...” (罗米希·錢德拉:《走向伟大的全国和平會議和世界和平會議——和平运动的新阶段》), p. 51.

② 阿約艾·高士:《論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輯》,世界知識社 1955 年版,第 148 頁。

③ *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 I(Aug. 8, 1954), p. 16.

④ Romesh Chandra, “Build a Broad Platform for Peace and Asian Solidarity” (罗米希·錢德拉:《为和平和亚洲的团結建立一个广大的讲坛》), *New Age*(monthly)(《新世紀》月刊), III(Oct., 1954), p. 31.

員会在新德里举行會議，并且指出，“某些和平組織尽管表面上是在为促进和平而努力，但是，它們的用意却在于达到某些政治上的目的。”他們指示国大党人不要参加这类的組織，也不要到国外去出席它們的任何會議；而且这种指示还在1954年2月重申过一次。^①但是，到了1954年10月，已經有好几个显要的国大党人被吸引到和平运动中去，其中最著名的是孟买邦国大党委员会主席S. K. 巴底耳。他实际上曾列席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德里會議，而且就是那次會議劝告国大党人不要参加那些組織的。^②积极参加和平运动的其他国大党人还有：来自阿姆利則的国會議員，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委員和国大党旁遮普邦委员会主席基阿尼·古尔木克·辛格·木薩菲尔；来自西孟加拉邦的联邦院議員賽义德·諾舍尔·阿里；和在美国受教育的联邦院議員和1949至1951年联合国朝鮮委员会的印度代表阿努勃·辛格博士。

当全印爭取和平和亚洲团结大会于12月底在馬德拉斯举行时，国际和平运动的领导对印度和平运动的重視，就看得很清楚了。几个外国的友好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其中几个相当重要的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秘书长让·拉菲特；J. D. 貝尔納；和D. N. 普里特夫人——她的丈夫就是因为肯尼亚为毛毛恐怖分子进行辯护而聞名的那位英国律师。普里特夫人当时已經在印度，正帮助建立一个律师界的外围組織。馬德拉斯大会实际上就是第四届全印和平大会。因此，会上也进行了选举：賽福丁·克其魯再度当选为主席；罗米希·錢德拉仍任总書記；国大党議員札都尔·那腊

^① *Congress Bulletin*(《国大党公报》), No. 5(May, 1953), p. 144; No. 2 (Feb.-March, 1954), p. 78.

^② Chandra, "Build a Broad Platform..." (錢德拉：《为和平和亚洲的团结建立一个广大的讲坛》), p. 33.

因·瑪拉維雅,担任司庫。^①

在馬德拉斯會議以後開始進行的第一個重要計劃,就是1955年4月6日在新德里舉行的亞洲國家會議。來自十六個國家的二百五十名代表參加了會議,其中包括中國的以郭沫若為首的三十九人代表團。大概是因為印度政府樂於簽發護照給這些客人和參加馬德拉斯大會的代表,人們普遍認為亞洲國家會議獲得了總理的贊同。^②不論怎樣,直到會議開幕前的最後一分鐘,有好幾個非常重要的國大黨人同會議有聯繫;其中最著名的還是S. K. 巴底耳,他原來曾同意擔任孟買代表團的團長。4月4日,巴底耳在孟買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談到會議的種種計劃。^③4月6日,他在德里出席了籌備委員會的一個會議,卻沒有出席在同日舉行的大會的開幕式。4月7日,他回到了孟買,顯然是很難為情的解釋說,說他“退出”代表大會,是不正確的;他根本就未出席,原因是德里的官員認為,大會“不會為即將舉行的萬隆會議創造合適的條件”。他說,“我們應該早些弄清國大黨最高領導對德里會議的看法;因為我們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過錯在我們方面。”^④

大會按照預定的計劃進行,主要是為郭沫若和攻擊“美國好戰集團的殘酷和侵略行為”的其他共產黨代表提供了一個講壇。^⑤但是,顯要的國大黨人的退出,削弱了大會對輿論的影響。共產黨報紙關於大會的報道,顯然沒有提到印度參加者的姓名,不過對留在

① *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II(Jan. 9, 1955), p. 13.

② *The Hindu*(Madras)(馬德拉斯《印度教徒報》),April 8, 1955, p. 5.

③ *Times of India*(Bombay)(孟買《印度時報》),April 5, 1955, p. 3.

④ 同上, April 8, 1955, p. 3.

⑤ *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II(April 17, 1955), p. 7.

大会的两个国大党重要人物腊梅什瓦利·尼赫魯夫人和阿努勃·辛格博士却談得不少。尼赫魯夫人主持了那次主要的會議，阿努勃·辛格則代表印度代表团提出了关于政治問題的報告。这篇報告在原子能、台湾、东南亚条約組織和一些其他問題上都符合国际共产主义的路綫，但其程度也沒有超过印度政府的现行政策。^①

自从德里會議以后，全印和平理事会更加着重于吸引大量的甘地信徒、基督徒和平主义者和国大党的重要成員参加和平运动。到1956年8月，已有迹象表明，他們在这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就在这个月里，一位可尊敬的甘地信徒，联邦院議員卡卡沙哈勃·卡雷耳卡尔，在德里主持了全印和平理事会全国执行委员会會議。^②9月，C. 腊札果巴拉札利放弃了他在担任內政部部长时对和平运动表现的敌視态度，在第二届馬德拉斯和平會議上发表了演說。^③在同一个月里，罗米希·錢德拉宣布了关于預定在11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印和平大会的計劃。他說，“从参加大会的成分来看，”这次大会将“与以前的四次大会在性质上很不相同。”^④

但是，在第五届和平大会还未举行时，国际和平运动就面临了應該对匈牙利革命和苏联干涉采取什么立場的問題。1956年11月18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赫尔辛基举行會議，并发表了一个公报，承认“在这个問題上，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各国的和平运动中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且由于存在着两种相反的主张，不可能得

① 同上，p. 6.

② 同上，III(Sept. 9, 1956), p. 3.

③ 同上，IV(Oct. 14, 1956), p. 14.

④ 同上，IV(Sept. 30, 1956), p. 14.

出一个共同的想法。”^① 世界和平理事会中的这种分歧，无疑是印度和平大会延期召开的原因；直到 1957 年 5 月 24 日，全国和平大会才在班加罗尔举行。这时，和平运动已经得以将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停止核武器试验运动上了。

匈牙利事件既没有改变全印和平理事会的亲苏方向，也没有引起任何重要人物脱离和平运动。报纸上关于班加罗尔大会的报道也确实表示出，亲苏、反美的调子加强了，非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的支持也增加了。在 1956 年 9 月的马德拉斯和平会议上只发表了一篇演说的 C. 腊札果巴拉札利，现在主持了班加罗尔和平大会的开幕式。他发表了一篇开幕词，集中攻击西方国家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并且号召印度退出英联邦。^②

和平运动已经证明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共产党可用以在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和整个中产阶级中扩大影响。只要核战争的威胁继续存在，全印和平理事会就能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一份有益的贡献。

印中友好协会

印中友好协会是国际问题外围组织中最年轻的一个，但是，它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组织创始于孟买。1951 年 5 月 15 日，由孟买的一家小报《闪电》周刊的编辑 R. K. 卡朗吉亚发起，在孟买成立了一个地方性的印中友好协会。在那次成立大会的发起人中，还有：阿鲁那·阿萨夫·阿里，当时是社会党的一个领袖，后来是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P. R. 列里，《闪电》周刊编辑部编辑；

① *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 Nov. 26, 1956, p. 5.

② *The Hindu*(Madras)(马德拉斯《印度教徒报》), May 26, 1957, p. 5. 和 *New Age* (weekly)(《新世纪》周刊), IV(June 2, 1957), p. 16.

表十 全印和平理事会的领导人员，1952—1957年

| | 第三屆和平大会 賈郎达尔，1952 | 第四屆和平大会 馬德拉斯，1954 | 第五屆和平大会 班加罗尔，1957 |
|-----|---|---|---|
| 主 席 | 賽福丁·克其魯 | 賽福丁·克其魯 | 賽福丁·克其魯 |
| 总書記 | 罗米希·錢德拉 | 罗米希·錢德拉 | 罗米希·錢德拉 |
| 副主席 | 木耳格·腊支·阿南德 M. L. 阿达耳 勃利特維·腊支·卡波 尔 D. D. 高善必 J. C. 古瑪腊巴 維威加南达·穆克季 G. M. 薩迪赫 古尔巴赫·辛格 腊那·占格·巴哈都 尔·辛格 K. 苏勃腊瑪尼阿莫 | T. M. 格利什那斯瓦米· 艾雅尔 木耳格·腊支·阿南德 M. L. 阿达耳 薩达勃利雅·班納吉 (1957年逝世) 勃利特維·腊支·卡波尔 D. D. 高善必 J. C. 古瑪腊巴 維威加南达·穆克季 G. M. 薩迪赫 古尔巴赫·辛格 腊那·占格·巴哈都尔· 辛格 S. S. 苏奎 K. 苏勃腊瑪尼阿莫 潘迪特·森德拉尔 欧莫加尔那特·塔古尔 因都拉耳·雅支尼克 | 木耳格·腊支·阿南德 M. L. 阿达耳 K. 巴夏莫 P. 鲍斯(女士) J. C. 古瑪腊巴 維威加南达·穆克季 約瑟夫·蒙多舍利 G. M. 薩迪赫 古尔巴赫·辛格 腊那·占格·巴哈都 尔·辛格 S. S. 苏奎 潘迪特·森德拉尔 欧莫加尔那特·塔古尔 因都拉耳·雅支尼克 |
| 秘 书 | 不詳 | 巴拉·孔戴阿 K. 瑪塔瓦那尔 瑪黑什·都德·米斯腊 V. 巴腊梅什瓦濫 拉支巴德·腊伊 | 底黎勃·鲍斯 K. 瑪塔瓦那尔 札都尔·那腊因·瑪拉 維雅 V. 巴腊梅什瓦濫 A. 森 |
| 司 庫 | 不詳 | 札都尔·那腊因·瑪拉維 雅 | 不詳 |

和 M. D. 札貝特。中国駐德里大使館參贊康茅召在会上宣讀了中国政府的祝辭。会上成立了一个包括卡朗吉亞、列里和阿瑪冷都·洛埃在內的七人临时委員會，以进行这个新組織的工作。^①

但是，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印中友好組織的計劃，却是到1953年5月在新德里举行預备性的印中协商會議时才形成的。那次會議吸引了一些著名的人物，其中包括来自浦那的国大党国会議員、印度政府工程、生产和供应部前任部长（1947—1952年）N. V. 加德基耳；国会議員阿努勃·辛格博士；和 J. C. 古瑪腊巴。前国际貨幣基金組織金融組組長吉安·占德博士任接待委員會主席，德里大学經濟学院院长 V. K. R. V. 腊欧博士也作了該委員會的委員。議會駐外交部秘书拉格什米·梅农夫人在会上发表了演說。^②

印中友好协会第一届全国會議于1953年12月11日至13日在德里举行，当时正在印度訪問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丁西林曾在大会上致詞。大会吸引了一些非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的支持，其中包括人民院副議長阿南塔薩雅南·阿延加尔；德里邦首席部长勃腊赫莫·勃腊加什；和外交部联合秘书黎拉瑪尼·乃都女士。大会主席团包括了吉安·占德、賽福丁·克其魯、S. S. 苏奎將軍、古巴尔赫·辛格和木耳格·腊支·阿南德——这就使得这个會議与和平运动极为相似。大会除成立了一个二十一人的执行委員會和一个一百余人的全国理事会以外，还选出了下列負責人員：^③ 主席：潘迪特·森德拉尔；执行委員會主席：吉安·占德；副主席：

① *Crossroads*(《十字路口》), III, May 18, 1951, p. 16. 孟买會議一年后，当維札雅拉格什米·潘迪特夫人所率領的文化代表团正在中国訪問时，一个相应的組織在北京成立，潘迪特夫人并在其開幕式上发表了演說。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覽》(*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1952, no. 338, p. 7.

② *Crossroads*(《十字路口》), V(May 17, 1953), p. 14.

③ *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 I(Dec. 20, 1953), p. 16.

R. K. 卡朗吉亚、德利布腊利·查格腊瓦尔底；总書記：札都尔·那腊因·瑪拉維雅。

1955年4月20日至23日印中友好协会第二届全国會議在加尔各答举行时，中国大使曾經出席。这次大会选出了下列負責人員：① 主席：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潘迪特·森德拉尔；全国理事会主席：前巴特那大学經濟系主任吉安·占德；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前印度駐华大使 K. M. 潘尼迦；副主席：印度政府外交部部长賽义德·馬赫茂德，来自北方邦的国大党国会議員烏瑪·尼赫魯夫人，西孟加拉邦立法議會議長賽拉·古瑪尔·穆克吉，德利布腊利·查格腊瓦尔底，《閃电》周刊編輯 R. K. 卡朗吉亚；总書記：来自博帕耳的国大党国会議員札都尔·那腊因·瑪拉維雅；秘书：德維真德腊·南底；司庫：来自馬拉巴尔邦的国会議員（以农工人民党候选人的資格当选）K. A. 达摩达腊·梅农。

第二届全国會議的显著特点是，很多著名的国大党和政府官員参加了會議，而且乐于在协会中担任职务。像潘尼迦和外交部官員这些人担任重要职位，这就表明了政府并不仅仅是对該协会表示好感，而且还想对它的政策保持严密的控制。我們沒有二十一人全国执行委员会的詳細名单，但是，在检查印中友协職員名单时却发现其中竟沒有一个著名的印共領袖，这真使人不禁感到驚訝。印苏文化协会和全印和平理事会都是由一个著名的共产党領袖担任总書記，但在印中友好协会中，担任这个职务的却是一个国大党議員——尽管他有很长一段参加共产党組織的活动的历史。

第二届大会上的发言和決議要求：美国撤出台湾；准許共产党

① 同上，II. (May 1, 1955), p. 3.

中国参加联合国；所有国家接受潘查希拉；印中两国进行自由的經濟和文化交流——这都是印度政府官方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报纸关于會議的报道中，沒有对美国进行直接攻击的迹象。^①

我們不知道印中友好协会的确实會員人数，但是据《新世紀》宣称，它在1953年10月有六十个分会，1955年9月有一百三十五个分会，1958年2月有一百四十个县和基层分会。^②这些分会的任务是，传播有关中国的出版物，安排演出有关中国的电影，招待訪印的中国代表团，总的說来，就是在印中关系中完成它的姊妹組織在印苏关系中所完成的同样任务。在1954至1958年間，四十个印度代表团訪問了中国，有三十个中国代表团訪問了印度。^③

孟买分会是最活跃的一个分会。这主要是由于 R. K. 卡朗吉亚的努力，他曾在他的报纸《閃电》周刊上为这个組織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早在1956年孟买分会举行第二次會議时，它的开幕式就是由邦长哈累格魯什那·瑪赫达勃主持的，而且它还得到了特許，不受当时由于語言糾紛而頒布的禁止举行公共集会命令的限制。出席那次會議的还有印度商会主席木腊尔季·瓦达，孟买的司法官巴格希·达黎勃·辛格，和孟买經濟和社会学院院长 C. N. 瓦基耳教授。^④

尽管孟买分会取得了上述的成就，全国总会却发展得很慢。1955年4月，卡朗吉亚的副手 P. R. 列里抱怨說，各分会之間协

① 见加尔各答《甘露市場报》(*Amrita Bazar Patrika*, Calcutta), April 22, 1955, p. 10; April 24, 1955, p. 7; April 25, 1955, p. 5. 大多数报纸都忽略了这次會議，因为它们都在全力报道当时正在万隆举行的亚非會議的消息。

② *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 I(Oct. 18, 1953), p. 10; II(Sept. 4, 1955), p. 13; 和 V(Feb. 16, 1958), p. 16.

③ *Blitz*(《閃电》周刊), Feb. 8, 1958; p. 12.

④ *Blitz*(《閃电》周刊), Feb. 18, 1956, pp. 8—9.

作得很不好，每一个分会都不大知道其他分会在作什么。他还对下面的事实表示痛心：印度政府“对印中友好协会不给予支援，这种支援是它应享的权利，而且没有这种支援，它就无法全部做出它有决心和能力做出的工作。”^①但是，到1958年时，印中友好协会便没有理由再抱怨政府的态度了，因为当它的第三次全国会议于2月间在孟买举行时，国防部长V. K. 克里希那·梅农便在它的讲坛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政策演说。梅农当着中国大使的面要求中国释放仍然在中国被监禁着的六个美国人，同时也批评了西方国家剥夺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政策。

1958年全国会议所采取的主要行动，就是决定发出请愿书，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措施，保证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它的所有其他机构中有它的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②这次会议选出了下列负责人员：主席：潘迪特·森德拉尔；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乌玛·尼赫鲁夫人；副主席：赛义德·马赫茂德、吉安·占德、R. K. 卡朗吉亚、国会议员达腊占德、V. H. 格利什南·伊耶尔、那圭什瓦尔·勃腊萨德、S. S. 米腊吉卡；总书记：国会议员Ch. 勃腊赫莫·勃腊加什、德维真德腊·南底；司库：国会议员M. 果温达·雷迪。关于增加一名第二总书记和取消一名全国理事会主席这种组织上的改变，其详细情况，在写本书时还不了解。

专业性外围组织

全印进步作家协会

① P. R. Lele, "Consolidate India-China Friendship Movement" (P. R. 列里：《加强印中友好运动》), *Blitz*(《闪电》周刊), April 23, 1955, p. 14.

② *New Age*(weekly)(《新世纪》周刊), V(Feb. 16, 1958), p. 16.

在自由职业界中建立的一个最重要的外围組織是全印进步作家协会。它是1935年在勒克瑙举行的一次全国进步作家會議上成立的，那次會議由著名的印地語作家勃累莫·占德主持。薩洛季尼·乃都也出席了會議。第二次全国进步作家會議于1938年12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由腊宾德腊那特·泰戈尔主持，但是此后不久，这个組織就瓦解了。^①1942年4月，在孟加拉的一次由“印度新聞界的老前輩”腊瑪南达·札德季主持的會議上成立了“反法西斯文学艺术家联合会”，^②从而恢复了這個組織。但是到了5月，印地語月刊《含斯》(Hans)的編輯S. S. 兆含即因企图恢复这一全国性組織的活动而被捕。

印共于1942年再次取得合法地位后，便计划在孟买与印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第四次全印进步作家會議。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动员作家支援战争。會議于1943年5月22日至25日举行，由S. A. 丹吉主持。會議决定把这个組織的总部从勒克瑙迁至孟买，并且选举了一批新的领导人。薩札德·札喜尔，一位在牛津受过教育的来自北方邦的共产党人，继勒克瑙大学的阿卜杜耳·阿利姆博士任总書記。比什努·堆和K. A. 阿巴斯任書記，瑪瑪·瓦累加尔当选为司庫。^③

为了配合印共在印度穆斯林群众中扩大影响的新战略，于1945年10月14日至17日在海得拉巴召开了全印烏尔都語进步作家會議。薩洛季尼·乃都主持會議的开幕式；出席的还有冒拉那·哈斯腊德·摩哈尼，他自从在1925年同薩达·帕格达的印度

① Hiren Mukerjee, "Bengal Progressive Writers Get Together" (喜冷·穆克吉：《孟加拉邦进步作家的聚会》), *People's War* (《人民战争》), I (Nov. 15, 1942), p. 8.

② 同上。

③ *People's War* (《人民战争》), I (June 6, 1943), p. 6.

共产党合作以来，一直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外围活动。格利閃·占达尔和木耳格·腊支·阿南德也出席了會議并发表了演說。^①由于怕这次會議会显得过份重視烏尔都語，两年后(1947年9月6日至9日)在阿拉哈巴德又举行了全印印地語进步作家會議。^②但因发生了“激烈的爭吵”，印地語作家們始終未能建立起一个固定的組織，尽管1957年12月在阿拉哈巴德又举行了第二次會議，而且参加的人很多。^③

1949年5月27日至30日，在孟买召开了全印进步作家协会第五次會議，当时印共正在执行B. T. 兰納迪夫的左傾战略。由于当局不准在孟买市內召开这次會議，會議不得不在市外的皮万底举行；一个苏联的作家代表团也因印度政府拒絕給他們簽證，未能出席會議。會議选出了一个新的执行委員會，巴耳万德·腊支布德学院英文系主任腊莫·比拉斯·沙尔瑪博士当选为总书记。^④

沙尔瑪是在兰納迪夫領導印共期間領導全印进步作家协会的适当人选，这一点从他在1953年(即左傾主义已經破产两年多以后)所拟的对全印进步作家协会第六次會議的报告草稿中可以看出。他說，“进步作家的主要任务是，用我們的作品来保卫并丰富我們的民族文化。我們要保卫我們的民族文化，使之不受什么东西的侵袭呢？首先，我們要使它免受英帝国主义者的腐朽的和外来的文化的影响。”^⑤

① 同上, IV (Nov. 18, 1945), p. 12.

② *People's Age*(《人民世紀》), VI (Oct. 5, 1947), p. 11.

③ *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 V (Jan. 12, 1958), p. 15.

④ *Crossroads*(《十字路口》), I (June 10, 1949), p. 14.

⑤ Ram Bilas Sharma, *Draft Report to 6th All-India Progressive Writers' Association* (腊莫·比拉斯·沙尔瑪:《向全印进步作家协会第六次會議的报告草稿》), (New Delhi: Preparatory Committee, 6th AIPWA, 1953), p. 2.

沙尔瑪对于“那种力图窒息保罗·罗伯逊和霍华德·法斯特的声音”的美国文化也有意见。“美帝国主义的文化就是赤裸裸的和恬不知耻的战争宣传，”他说。“我们力求保卫我们的民族文化免受这种恶疾的传染。”他生怕读者会怀疑他受了某个政党的影响，因此匆匆地补充道：“根本没有共产党控制进步作家协会这类的事。我们这里的事情是通过作家之间相互讨论决定的，无论是共产党作家也罢，还是非共产党作家也罢。”^①

全印进步作家协会第六次会议于1953年3月6日至8日在德里举行。会议辩论、修改并通过了沙尔瑪的报告，尽管经过修改的报告并没有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发表，但他那激烈的语气想必已大有缓和。会议选出不象沙尔瑪那样激进的格利閃·占达尔接替他的总书记职务，还选出了一个包括二十人的新的执行委员会。^②会议闭幕时通过了一项悼念斯大林逝世的决议，然后大家就前往苏联大使馆对这位已故的苏联领袖表示哀悼。

全印进步作家协会近年来执行的一个最重要的计划就是1956年12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亚洲作家会议。在木耳格·腊支·阿南德和国大党议员贝那尔息达斯·札都尔威底的领导下，1956年3月25日在德里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来自印度各个语言区的许多作家都同意参加该委员会。^③当该委员会同它的外国委员们于7月间举行第一次会议时，V. K. 克里希那·梅农在会上讲了话，委员们后来还受到了总统和总理的接见。^④

亚洲作家会议是1956年12月23日至28日在新德里举行

① 同上，pp. 4, 10.

② *Crossroads*(《十字路口》), IV(March 22, 1953), p. 11.

③ *New Age*(weekly)(《新世纪》周刊), III(June 17, 1956), p. 3.

④ 同上(Aug. 12, 1956), p. 14.

的，参加的有緬甸、錫兰、中国、日本、朝鮮、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叙利亚、苏联和印度支那的作家。苏联代表团由十三人組成，中国代表团中包括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和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許多著名的印度人士参加了會議，其中包括教育部秘书胡馬云·卡比尔和印度爭取文化自由委员会書記，一个直言不諱的共产主义的批評家勃腊帕加尔·巴塔。巴塔曾就极权政权下的文化自由問題同一位中国代表进行了激烈的爭辯。會議閉幕时，印度总统和副总统，以及刚刚訪問美国和加拿大归来的尼赫魯总理都向代表們讲了話。

全印进步作家协会一向就缺乏团結，印共报刊上关于共产党发起的作家會議的报道表明，爭論往往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不仅是在政治和社会問題上，就是在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問題上，也經常有激烈的爭論。一則关于1955年5月举行的馬拉巴尔地区进步作家會議的报道說，“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士殫思极慮地想把這場[关于閃加腊·古魯勃的作品]的爭論引到地方主义和教派主义的不健康的道路上去。”^①伊里亚·爱伦堡也出席了这次會議，“当代表們一个接着一个地走上讲坛猛烈批評他的作品时，他仍然面帶笑容地坐着”。这件事虽然是作为爱伦堡先生秉性溫和的証明而提出来的，但恐怕还不如作为他不懂馬拉雅拉姆語*的标志而更恰当些。《新世紀》在綜述这次會議时說，會議已經采取了步驟“以便澄清混乱的局勢”并“消灭馬拉雅拉姆語文学中假借文学批評之名进行詆毀的现象；”《新世紀》还說，这次會議已經开辟了“进行有原則的爭論、不怀恶意的批評和不帶偏见的評价”的道路。^②

① 同上，II(May 29, 1955), p. 15.

* 馬拉巴尔地方的土語。——譯者

② 同上。

印共在全印进步作家协会及其召开的历次会议上的目的是要向当代印度文学中注入共产主义内容。格利閃·占达尔 1945 年在海得拉巴举行的烏尔都語进步作家会议上发表演说：“我认为每个进步作家现在都必须尽他一切的力量来拥护共产主义的生活制度。”^① 这个目标近年来已经不那么明显了，但依然未变。

印度人民戏剧协会

印度人民戏剧协会和全印进步作家协会一样，也是为了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注入印度的文化生活中去而设立的。它是 1943 年 5 月当印共正在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在孟买成立的。它组成了许多舞蹈和戏剧巡回演出队，到印度各地演出表现以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主题的芭蕾舞和戏剧。据印共宣称，1943 年至 1944 年，一个到全国巡回演出的演出队为救济孟加拉的灾民募集了二十万卢比。^② 1947 年，印度人民戏剧协会宣布，在上一年度内，它的四十四个分支组织共演出了五十二出舞台剧和八百首新歌，观众人数达五百万以上。^③

印度人民戏剧协会于 1953 年初在孟买举行第七次会议时，参加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百名代表。会上选出的全印机构负责人如下：^④ 主席：比瑪耳·洛埃，电影制片人；副主席：安娜·包·薩推，诗人和作曲家；K. 苏勃腊瑪尼阿莫，电影制片人；K. A. 阿巴斯，作家；阿卜杜耳·馬立克，教授兼作家；苏蘭堆尔·高尔（夫人）；总书记：尼濫占·森；书记：札斯万德·塔果尔、尼尔瑪耳·廓

① *People's War* (《人民战争》), IV (Nov. 18, 1945), p. 12.

② *People's Age* (《人民世纪》), IV (Jan. 6, 1946), p. 12.

③ 同上, V (May 18, 1947), p. 13.

④ *Crossroads* (《十字路口》), IV (April 26, 1953), p. 9.

什；司庫：薩緊·森·古普塔，劇作家。

1946年，K. A. 阿巴斯和索黎·巴德黎瓦拉曾在印共和印度人民戲劇協會的關係問題上進行過一次很有意義的交鋒。巴德黎瓦拉在1943年的印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曾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但在1945年因印共干涉他的私人生活脫離了印共。他指責印度人民戲劇協會受共產黨控制時說：

你（指阿巴斯）在印度人民戲劇協會中的同事們沒有一個人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參加這個協會的工作的，他們全都處於負責領導印度人民戲劇協會的那位印共中央委員的嚴格管束之下。我不知道格利什南同志是否是你們的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但是，如果未經 N. K. 格利什南同志的批准，無論你們的執行委員會進行怎樣秘密的討論，你的共產黨同事們誰都不敢提出任何異議。這也適用於那些在你們的戲劇中扮演角色的人，適用於那些在各種不同的崗位上專門為這個組織工作的人。^①

阿巴斯回答說，印度人民戲劇協會曾經演出許多非共產黨人（他把他自己也算在內）的作品，這就證明了這種指責毫無根據。^②

但是，從印度人民戲劇協會所演出的劇目內容，從它的領導人的政治觀點，以及從印共報刊為它大事宣傳看來，印度人民戲劇協會毫無疑問是印共的外圍組織。然而，和其他外圍組織一樣，近年來已更加努力來掩蔽這一事實，在1953年的會議上，戲劇委員會的報告僅僅說：“總的說來，我們必須歌頌那些擁護社會進步的人，譴責那些阻礙社會進步的人。”^③ 1957年末，印共的路綫大大地轉向右傾以後，《新世紀》宣稱：

① Soli Batliwala, *Facts Versus Forgery* (索黎·巴德黎瓦拉：《事實與偽造》) (Bombay: National Youth Pub., 1946), pp. 30—31.

② 同上, p. 24.

③ *Crossroads* (《十字路口》), IV (April 26, 1953), p. 18; 又見《印度人民戲劇協會宣言》(“IPTA Manifesto”), *Indian Literature* (《印度文學》), no. 3 (1953), pp. 95—96.

在国内和国际上取得了成就的新局面下，印度人民戏剧协会必須重申它的宗旨，并声明它不是任何党派的一翼，因而不能被任何党派利用来为其利益服务。这个协会的唯一宗旨就是为人民文化的共同利益服务，因而它欢迎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士参加。这个原則必須以行动来贯彻，以使人们为之深信不疑。^①

《新世紀》在 1957 年 12 月宣称，印度人民戏剧协会已經暂时得到了教育部的音乐舞蹈戏剧学会的承认。

全印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

尽管 1954 年以前在印度的律师界中还没有建立全国性的外围組織，但是却已有过某些活动。1953 年 8 月，为了响应预定于当年 11 月在布魯塞尔举行的国际法律工作者會議而成立了印度发起委员会。^②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在孟买邦的一个分支机构显然在 1954 年初就成立了，而且在孟买市举行的一次會議上选出了一个由八个人組成的执行委员会。前巴罗达邦的檢察官 A. S. 巴檀当选为主席，丹尼尔·拉迪菲当选为書記。^③

全印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是 1954 年 9 月 27 日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一次會議上成立的，参加这次會議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會議在加尔各答高等法院律师协会主席 S. C. 达卢格达尔主持下开幕，通过了支持“潘查希拉”、要求禁止氢弹和要求政府把行政和司法部門分开等項決議。^④ 协会宣布它的某些宗旨是：“保卫印度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主共和国的地位，为維护、扩大和发展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在法庭内外保护人們免遭不民主的法律或

① *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 V(Dec. 22, 1957), p. 12.

② *Crossroads* (《十字路口》), V(Aug. 2, 1953), p. 6.

③ *New Age*(weekly)(《新世紀》周刊), I(April 25, 1954), p. 8.

④ 同上, II(Oct. 17, 1954), p. 10.

专横的和非法的訴訟的迫害，保卫权利、自由和世界和平。”^① 帕特納城的 P.R. 达斯当选为主席，丹尼尔·拉迪菲和 S.K. 阿札腊当选为书记。

这个新成立的协会的的第一个重大的措施是召开一次亚洲法律工作者會議，这个會議于 1955 年 1 月 25 日至 30 日在加尔各答举行。出席會議的有来自二十八个国家的三百名左右法律工作者，除了南朝鮮、菲律宾和南越以外，亚洲所有的国家都派有代表参加。^② 由前孟加拉邦检察官 S.M. 鮑斯主持會議，西孟加拉省长 H.C. 莫克吉也出席了會議，从而抬高了它的身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对这次會議的重视，可以由这一事实說明：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的最高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會議，計有它的主席 D.N. 普里特；它的总书记馬特尔·乔埃·諾德曼和它的书记伊斯特万·科瓦契。^③

地方性外围組織

印度独立后发展起来的那种要求建立单一語言邦的强烈情緒，为共产党的宣传鼓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种土壤特别适宜于发展外围組織。这类組織在安得拉、馬哈拉施特拉和西孟加拉等地活动得卓有成效，但如果认为这些外围組織也和其他一些外围組織一样，也是牢牢地掌握在印共手里，那就錯了。实际上，地方性外围組織所鼓吹的主张受到群众如此热烈的拥护，以至各个政党的領袖都积极参加了这些組織，因而很难說权力究竟掌握在誰的手里。例如，在馬哈拉施特拉邦，共产党人在建立馬哈拉施特拉

① 同上。

② 同上，II(Feb. 6, 1955), p. 15.

③ 同上，(Feb. 13, 1955), p. 11.

协会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該协会总書記的位置却給了人民社会党的議員 S.M.卓什，从这个人的政治历史并看不出他具有共产党人所喜欢的那种馴服性，而在共产党外围組織中任职的人本应是馴服的。該协会于 1956 年 2 月成立的行动委员会由下列政党各派两名代表組成：印度共产党、社会党、人民社会党、工农党、农工党、革命社会党、印度教大会党、布尔什維克党、紅旗集团、右翼的人民同盟和太平社等政党。^① 很难想象这样一批人对共产党会唯命是从。

共产党人所能彻底控制的地方性外围組織是安得拉大会，这个組織鼓吹把所有說泰卢固語的地区（称为安得拉或安得拉堆什的）合并成一个邦。这个大会，有时又称大安得拉大会，是由国大党的領袖們于 1913 年在馬德拉斯邦北部沿海地区組織起来的。它本来是一个主要致力于提高說泰卢固語的人民的文化水平的文化組織。共产党在 1950 年所写的一份关于这个組織的报告中說：“这个組織当时操纵在封建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手中。”^②

四十年代初，当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因为英国忙于战争而趁机大肆活动时，馬德拉斯邦泰卢固族地区的政治領袖們对居住在边界另一方的海得拉巴土邦中說泰卢固語的人民大显殷勤。据上面引述的报告說，“安得拉沿海地区的共产党就是在 1940 年初同安得拉大会的进步工作者和領袖們建立了联系，把他們爭取到共产党这一方的。”^③ 在 1942 年的“滾出印度”运动之后，国大党大部分領袖均已被捕入獄，共产党就趁机完全控制了安得拉大会。安得拉的国大党領袖們于 1943 年初获释以后，立即企图夺回这个

① *The Hindu*, (Madras) (馬德拉斯《印度教徒报》), Feb. 10, 1956, p. 12.

② *On Telengana* (《关于堆楞加那起义的报告》) (*Information Document no. 7(2)*) (n. p.: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0), p. 1.

③ 同上。

組織。这个組織終於分裂了，到印度政府于 1953 年 11 月建立安得拉邦时，至少有三个組織自称是原来的安得拉大会的合法继承者。这些組織是：国大党控制的以来自維查雅瓦达的 K. 加雷斯瓦拉·腊欧为首的大安得拉大会；以来自貢土尔的 G.V. 崩乃阿·薩斯德利为首的安得拉大会；由来自海得拉巴的共产党人腊維·那腊延·雷迪控制的安得拉大会。

共产党人就是通过安得拉大会在 1948 年至 1950 年发动了堆楞加那的农民起义，并在某些地区以农民苏維埃代替了政府政权。上面引述的 1950 年的报告說：“现在，安得拉大会已經变成了一个群众組織，拥有會員十万人，原有的封建的領導在 1944 年已由那些被爭取到了党这方面来的年輕的人們所代替。”这个报告繼續說：

到 1947 年年底时[原文如此]，我党在当时的改良主义分子領導下，作了再三的努力，試图同……国大党的領袖們取得諒解，以便通过斯瓦米·腊瑪南达·底尔特和瑪腊特瓦达的国大党果温达斯族及宾都族集团，把我們領導下的安得拉大会同該邦国大党合并。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由于他們坚持要我們放弃反封建的斗争和我們拒絕放弃这一斗争而归于失败。最后，当全印各邦人民會議禁止共产党人参加各邦人民組織时，这些談判就中止了。正是由于我們独自进行了部分的斗争，并揭露了該邦的国大党領袖，才使我党在 1946—1947 年期間得以成为堆楞加那人民运动的公认的領袖。^①

因此，这是共产党建立一个外围組織的成功范例，他們本想在印度各地要求成立語言邦的集团中也建立这种外围組織。他們在堆楞加那所以能够在初期取得成就，乃是由于抓住了时机，并由于其他地方所沒有的許多复杂因素。他們在別处都沒有能够这样

^① 同上，p. 2.

彻底地控制类似的組織，尽管他們在馬哈拉施特拉和在西孟加拉的确进行过这种努力。

根据国会于1956年11月1日通过的法令所进行的省邦的重新划分，对于各語言集团的政治态度会产生什么效果，那是很难預言的。如果人們仍然怀有不公平和受歧視的感觉，那就会給共产党人提供进一步建立这种外围組織的机会。如果今后沒有这种感觉的話，这方面的活动恐怕就会不再那么受到重視。

“同路人”

“同路人”这个詞在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政論家当中頗受欢迎。这个詞在美国已經成为一种进行人身攻击的非常方便的武器，主要是因为它很不精确，从而使得那些不公平地被扣上这个帽子的人很难根据法律要求补偿。

在本书中，“共产党人”这个詞只用于那些积极参加該党的組織并且服从該党的紀律的人。这个定义十分狹隘，因而有必要用另外一个詞来形容其他許多接受共产主义的意識形态、支持共产党的大部分政策、或者經常在一般的政治活动中与知名的共产党员合作的人。“同路人”这个詞显然是最适宜于用来形容这一类人的，但在使用这个詞时应加小心，而且应当进行一定程度的判断，但是判断的标准却很难确定。例如，不能仅仅因为S.K.巴底耳曾在共产党的和平运动讲坛上出现过两三次就把他称作是同路人；但另一方面，尽管J.C.古瑪腊巴长期参加甘地主义运动，而且他以反对馬克思主义而著称，但是由于他参加了共产党发起的許多运动，因而同路人这个头衔对他来說是合适的。

同路人聚集的最自然的場合当然是外围組織。这并不是說外围組織的所有成員都是同路人，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地道的反共人

士，而另外一些人則可能是地道的共產黨員。但是，外圍組織是一個吸引同路人的團體；是一個進一步教育他們的學校；是共產黨力圖通過它來增加他們的信徒的傳道會。

從有關印度的同路人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有助於洞察印度的政治演變。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有些印度人會成為同路人。

研究一下那些經常參加各種外圍組織的非共產黨人的背景就可看出，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在他們所選擇的那一行職業或社會活動中未能獲得相當的聲譽，或者即使曾經一度享有聲譽，由於年齡或其他原因而遭到冷遇。對這些人來說，外圍組織往往能滿足他們的一定需要。這些組織送他們出國參加國際會議，從而使他們感到身價十倍。這些組織可使他們在共產黨的報刊上大出風頭，而且能夠動員群眾來聆聽他們的演說。這樣的報酬對於那些感到自己在傳統的社会生活範圍內被剝奪了應有的地位的人來說，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對那些已經享有全國性聲譽的人來說，外圍組織可使他們出風頭的時間更長一些。

如果外圍組織的成員的檔案能夠公開供人研究，我們也許就能在究竟有哪些行業的人士參加了外圍組織的問題上得出有益的結論。但是，儘管現有的材料十分有限，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許多作家和新聞記者都參加了外圍組織。毫無疑問，這一點可以歸功於印共在改變“溝通者”的信仰方面精心策劃的政策，因為他們指望利用這些人來擴大他們的宣傳對象。這就說明了為什麼有這樣多的電影界人士——演員、制片人、導演、電影劇作家——也參加了各種外圍組織。

這些人參加外圍活動的另外一個基本原因是一種與政治上的世故無關的理想主義，這種理想主義似乎是印度的許多同路人

的特点。例如，在他們当中可以找到許多自称为甘地主义者的人。这是一个很含糊的名詞。在甘地的追随者当中关于究竟是誰在正确地追求圣雄的目标，这个問題有很多的爭論。但是，一般地說，在印度，凡是贊成甘地在非暴力和經濟問題上的意见而且在为了发揚甘地的教义而建立的任何一个組織中工作过的人，都可以叫作甘地主义者。由于甘地主义者是和平主义者，因而他們很容易受共产党的和平运动所吸引。對他們來說，废除軍事同盟和禁止核武器似乎是值得予以支持的目标，不論它們对世界政治有什么关系——即使这种关系已为人所共知也是如此，更何况这种关系往往不为人所共知呢。在那些积极支持和平运动的甘地主义者当中有：潘迪特·森德拉尔、J. C. 古瑪腊巴、瑪黑什·都德·密斯腊、腊梅什瓦利·尼赫魯夫人、札都尔·那腊因·瑪拉維雅、腊維·閃加尔·烏雅斯、和維努派·G. 沙赫。然而，应当补充的是，在圣雄的某些信徒看来，其中有些人在甘地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毫無疑問的是，他們作为甘地主义者的声誉足以使和平运动在群众心目中具有一种有价值的正統味道。

从印度的同路人所发表的演說和文章来看，他們的才智并不惊人。例如，由外围組織派往共产党国家去的各种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員，對於他們所看到的事物，未能給予一种持平的描述。許多人写了一些神乎其詞的报告，給中国和苏联添上一些連这些国家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优点。一位比較世故的同路人抱怨說，“他們当中有很多人在他們有机会訪問的国家里不論看到什么都惊奇得目瞪口呆。”同时，他們“對他們自己国家里的所謂的落后状况发表了一些无知的評論，往往使他們的东道国感到极为尷尬。”他得出結論說，派遣这些“对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計劃比对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計劃知道得更多的馬克思主义知識分子”的代表团出国，是一种錯

誤。^①

除了这种普遍的愚昧以外，印度的許多同路人还具有过份的浪漫主义的特点。他們的演說是装腔作势的，充滿了陈詞滥調。拙劣的自我吹嘘是司空见慣的，他們經常竭力把自己装扮成英雄。^②

另一方面，也有少数消息灵通的知識分子深知他們所参加的組織同国际和国内政治的关系。这一群人当中最重要的人物都在孟买，主要有木耳格·腊支·阿南德、R.K.卡朗吉亚、K.A.阿巴斯和P.R.列里，后三人和小型报纸《閃电》周刊有联系。就积极参加党的組織这一点來說，沒有証据說明他們当中任何人是共产党员，但他們全都有着参加共产党的各种活动的长期历史。卡朗吉亚一向是印中友好协会和和平运动的領袖，而且在預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方面显示了非凡的才能，有时甚至在印共领导人之前。但是，尽管他显然同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却能同印度政府一直保持相当良好的关系。这表明他具有一种高度的政治手腕，并使得K.M.潘尼迦（他本身就是一位手腕灵活的政治家）說卡朗吉亚是一位“深諳政治的某些訣窍”的人。^③

然而，比卡朗吉亚更有意思的是K.A.阿巴斯这位記者、作家兼电影剧作家，他多年来一直同共产党的許多外围組織有着联系。

① K.A.阿巴斯的話，見《閃电》周刊(*Blitz*)，Sept. 15, 1956, p. 16. 对印度訪华人士所发表的观感有趣的分析，見瑪格丽特·W. 費希尔与乔安·V. 邦杜兰特：《共产党中国对印度訪华人士的影响》(Margaret W. Fisher and Joan V. Bondurant, "The Impact of Communist China on Visitors from India"), *Far Eastern Quarterly* (《远东季刊》), XV (Feb. 1956), pp. 249—265.

② 見印度联邦院《議員人名录》中勃利特維·腊支·卡波尔的传略 (New Delhi: Council of States Secretariat), 1952, p. 76.

③ K.M. Panikar, *In Two Chinas* (K.M. 潘尼迦：《在两个中国》), (London: Allen & Unwin, 1955), p. 138.

阿巴斯自称是非共产党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不仅企图左右印共的政策，而且还企图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一点上的一个最有意义的证据是，他在1952年参加以潘迪特·森德拉尔为首的代表团访华后为J.B.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特别是对中国政权的批评。阿巴斯谈到了中国的“从保密到检查、从检查再到保密这种恶性循环，和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谈到了官方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忽视；谈到了“中国今天男女老少所穿的千篇一律的蓝布衣裤。”这些批评使得编者不得不在文章前面加上一段很长的反驳按语，而且后来在这份杂志上至少发表了两篇可以说是答复阿巴斯的文章。但阿巴斯的文章所以极为重要，乃是在于它的主要论点：

“人民民主”的大胆尝试——由工人阶级领导一个在爱国的“共同纲领”下团结起来的各政党的联盟——对于我们来说，恐怕具有许多中国人所意想不到的重大意义。它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社会革命，这种革命概念之不同于正统的革命概念，正如马克思主义之不同于英国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中国人民已经驳倒了那些正统的革命理论家，使他们狼狽不堪，那些人仅仅由于农民是农民就断言，他们绝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先锋队——他们认为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才有这种特权，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只有西方的工业先进国才有这种特权。中国人民已经证明，陕西、河北和湖南的农民，尽管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在工厂中操作过机器，但是只要有正确的领导，就能成为比英、美的高度工业化了的工人更伟大的革命者。

因此，我不仅是从中国革命为中国带来的成就出发，而且是从它为其他国家（特别是为亚洲的国家）所照亮的道路出发，来看待中国革命的。中国人民不仅在一个庞大的国家里掀起了革命，而且在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整个大陆上掀起了革命——他们在革命这个概念上掀起了革命！

如果他们允许我这样说，我愿意说，他们的革命的这种更广泛

的意义既給他們带来了历史性的威望，也給他們带来了历史性的責任。例如，他們是不是能把“人民民主”的概念扩大到国际范围上去——把宣称或奉行不同意識形态的各个国家集合到一个和平的“共同綱領”之下呢？^①

用不着猜想就可看出，当阿巴斯談到“正統的理論家”时，他指的是俄国的理論家。由于他向中国人說他們已經在革命的問題上掀起了一場革命，他就說出了連中国的理論家們自己都不便說的話，尽管这种說法可能是正确的。鮑威尔的刊物所以会刊登这样囂张的异端邪說，就足以証明像阿巴斯这样的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計劃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因此，阿巴斯是这些同路人当中的主要典型，这些人决不仅仅是印共中央委員會的傀儡，而且由于印共不能忽視他們并需要他們的支持，因而他們可能对共产党的政策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他們也可能影响印共党內的派系斗争——《閃电》周刊集团經常攻击印度共产党內的左派分子，卡朗吉亚則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在 P. C. 約希領導下的党内少数头脑比較清醒的人士。”^② 因此，当外围組織变成党内爭論的場所时（这原是常见的现象），非共产党人可能促使印共更換它的領導。約希在和平运动中的非共产党朋友，对于他爭取恢复党籍的努力肯定是有帮助的。

因此，尽管外围組織是共产党人希望用来达到他們的目的的一种工具，但它也可能成为那些不是共产党人、或者甚至是不同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們能够用以影响共产党的政策的工具。这不仅可能是那些以博爱为主要政治武器的天真的甘地主义者的目的，

① K. A. Abbas, "Discovery of China" (K. A. 阿巴斯: 《中国的发现》) *China Monthly Review*(《密勒氏評論报》), CXXII(Feb., 1952), pp. 157—158.

② *Blitz*(《閃电》周刊), Feb. 4, 1956, p. 3.

而且可能是社会党人中少数精明的政治家們的目的。肯定地說，如果人們认为对共产党人可以用民主的教育加以改造的話，外围組織也許能成为开始进行这种教育的場所。而且，在外围組織中，非共产党人的势力很可能会变得十分强大，以致足以和共产党成員爭夺控制权，或者至少可以迫使共产党人修改他們的政策。在印中友好协会里就可能已經发生了这种情况。

总之，外围組織是印度共产党希望借以打入上层階級和知識分子当中去的武器。但是，这是一件双刃的武器，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危及印共的本身。因此，外围組織的成就乃是衡量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的地位的最有用的指标。

第十八章 宣传鼓动工具

“宣传”这个詞，如果撇开它的貶义不談，就可以恰当地用来表示一个政党为了影响別人的态度和信仰而进行的任何鼓吹。根据这个定义，宣传可以說是一切政党的工具，不論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但是共产党，由于本身的性质迫使它們非改变別人的信仰不可，所以一直以非凡的决心和策划去利用宣传。对它們來說，說服人的艺术已經成了政治活动的關鍵性因素。

这种改变別人信仰的必要性，来源于几种固有的需要。首先就是理論上的需要。前面已經指出，共产党对于自己的目的的看法，为它自己规定了一种神圣的义务，即建立一个有效的組織；这种看法同样也迫使它要有效地利用宣传。第二，还有某些实际上的需要。共产党往往不能或不願利用議會活动或选举活动等正常的政治活动形式；因此，宣传就似乎成了可能利用的最好的代替形

式。最后，可能还有一种个人的需要。共产党人一般都是热狂的人，他们在强烈的信仰和个人对党的高度忠诚的推动下，负起传道者的使命。

在共产党的词汇中，《宣传》一词有其特殊的意义，并且和“鼓动”的意思不同。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两者的区别是：一个指一般的，一个指特殊的。宣传是对少数特殊听众传播复杂的思想；鼓动是对广大群众传播简单的思想，并且往往采取口号的形式。（在本章中，宣传和鼓动的总计划简称作“宣传鼓动”。）从理论上说，每个党员都是专职的鼓动者和宣传者。作为一个鼓动者，他必须通过口头或书面语言每日同群众接触，用那些与当前问题有关的基本政治口号去鼓舞他们采取行动。而作为一个宣传者，他又必须对较少的和较有修养的群众，用推理的方法解释党的政策，以求进一步改变他们的信仰。

详细探讨共产党在印度基层群众中所进行的宣传和鼓动工作，还有待于对印度政治的进一步研究。目前，我们必须集中探讨印度共产党在这方面活动中最突出的一面——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它的出版事业。

印度共产党的报刊

出版物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在其整个历史中，一向都用很大一部分人力和物力来维持一家正式党报。印共甚至在其发展的初期，也就是当它的党员人数和组织规模都还不足引起重视的时候，就已经有一批很可观的出版物值得夸耀了。看来当时的宣传工作几乎是居于组织工作之上的。以后，不论境遇是好是坏，印共还是始终不渝地维持了一个可观的出版事业；甚至在那些分裂时期，例如

在1949—1951年，当它不能进行什么組織活动的时候，它通常还是继续不断地出版刊物。研究一下印共出版机构的历史和规模，就可以看出，它一向是以如何的热情和毅力把出版事业当做一种宣传鼓动的手段而为之努力的。

印度共产党出版了两种正式的中央机关刊物——一种是以鼓动群众为主要目的的周报，一种是作为“宣传”媒介的理論月刊。

中央的报纸：印度最早的共产党期刊有 S. A. 丹吉在孟买办的《社会主义者》，庫拉莫·侯賽因办的烏尔都文周刊《革命》和劳工自治党的孟加拉文机关报《犁》。但这些都是地方共产党小组的喉舌，称不起党的中央机关报。^①

中央机关报的职能，最初是由 M. N. 罗易在国外出版的报纸（见下表）承担起来的。罗易的报纸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出版，并且由于检查和财务方面的问题较少，因而能够非常有规律地按期出版，而且尽管英国人力图在各輸入港口沒收这些报纸，仍能大量地流入印度。

但是，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后半期，印度共产党才有了一家在印度本土創办的中央报纸《民族陣綫》。由于共产党当时是非法的，它不能宣布《民族陣綫》是它的官方出版物，但《民族陣綫》还是起了官方出版物的作用。当印共在 1942 年取得合法地位后，它便創办了《人民战争》周刊。自那时起，除了在 1949 年中断了六个月以外，印共一直保持着一种中央报纸——尽管它用过不同的名称。

中央报纸通常既用英文出版，也用几种印度文字出版；《人民战争》和《人民世紀》是用印地文、烏尔都文和馬拉地文出版的，《新

^① 关于印度共产党报刊的历史全貌，請參閱《新世紀》周刊(*New Age, weekly*)創刊号, I (Oct. 4, 1953), p. 3.

世紀》則用了越来越多的各种特殊文字出版。

表十一 印度共产党的中央报纸

| 名 称 | 地 点 | 日 期 | 主 编 |
|--------------------------|-----------------|------------------------------|-----------------------------------|
| 《印度独立先锋》 (又名《前卫》) | 柏林, 苏黎世, 安纳西 | 1922年5月—1924年12月 | M. N. 罗易 |
| 《印度群众》 | 巴 黎 | 1925年1月—1928年 | M. N. 罗易 |
| 《民族阵线》 | 孟 买 | 1938年2月—(1940年?) | P. C. 约希 |
| 《人民战争》 | 孟 买 | 1942年8月2日—1945年 11月18日 | P. C. 约希 G. 阿提加利 |
| 《人民世纪》 | 孟 买 | 1945年11月25日—1949 年2月20日 | G. 阿提加利 M. B. 腊欧 V. M. 高耳 |
| 《新世纪》,《时事》, 《人民先驱》[1] | 孟 买 | 1949年2月27日—1949年 4月13日 | V. M. 高耳 G. S. 宾多尔 Y. M. 腊欧 |
| 《十字路口》 | 孟 买 | 1949年4月29日—1953年 9月27日[2] | 洛梅什·塔巴尔 V. M. 高耳 P. 腊玛木尔底 |
| 《新世纪》 | 马德拉斯, 德里 | 1953年10月4日—现在 | 普卑什·古普塔 |

[1] 名称屡次改变, 是因为政府力图取缔印共的报纸。

[2] 1949年7月22日至12月9日期间, 由于政府取缔而中断。

印共过去很少透露它的各种中央机关报的发行额。1943年初,《人民战争》自称,各种文版共发行三万三千份,^①《十字路口》在1949年只发行一万份,^②到了1954年,这家机关报的发行额又进一步下降,因为根据印共方面的报道,《新世纪》在那一年的发行

① N. K. Krishnan, *Forgery Versus Facts* (N. K. 格利什南:《伪造与事实: 共产党揭露第五纵队》),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3), p. 8.

② *Crossroads*(《十字路口》), I(July 22, 1949), p. 1.

額只有八千份左右。^①不过，这种下降大概是由于党在 1949—1953 年危机时期的不穩定状态而引起的；近年来，《新世紀》的发行額或許有了相当的增长。无论如何，发行数字并不足以說明印共出版物的流传范围；印度人习惯于把报纸輾轉传閱，所以实际的讀者人数会超出发行額很多倍。

印共中央报纸的技术水平一向很高。它們的印刷精良，完全能与印度的商业报纸媲美。漫画和照片也很丰富；版面的大小和設計，則像美国的小报。

印共官方报纸在內容方面，一向以“鼓动”为其主要目的。它一直是印共用来传达有关当前重大問題的口号的主要工具，它用很大的篇幅刊載印共对于地方、国内的和国际時事的看法。报纸上的大部材料虽然由編輯部記者或地方通訊員提供，但主要文章則往往是由党的領袖們亲自撰写的。此外，报纸还經常刊載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論述国际問題或其本国事务的文章。还有一部分篇幅用于报道党内的新发展，如地方和省的會議，或开除党籍和停止党籍的事件等。总之，印共机关周刊的主要目的，是动員公众和党员参加政治行动。

理論刊物：印共的第一个理論刊物《新世紀》，大概是在 1937 年問世的。它是一个月刊，由 S. V. 卡堆主編。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一度被迫停刊，但在 1945 年又以《馬克思主义杂俎》的名称重新出版。《馬克思主义杂俎》由 G. 阿提加利主編，不定期地出版了几年。1947 年，該刊被《馬克思主义者》这一新刊物所代替，但是后来又出版了好几期。《共产主义者》由一个成員姓名不

^① E. M. S. Namboodiripad, *On Organization* (E. M. S. 南布迪里巴德：《論組織工作》)，(Delhi: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4), p. 68.

詳的編輯委員會負責編輯，在 1950 年底以前差不多按月出版。經過大約兩年的間斷以後，它又以原先的名稱《新世紀》重新出版。它的正式名稱是《新世紀》(月刊)，以區別於《新世紀》週報。到作者執筆寫這本書時，《新世紀》(月刊)一直是由印共總書記 A. K. 高士主編的。

印共的理論刊物主要刊載關於黨的政策原則的一般說明，常常也刊載關於馬列主義哲學的解說。從外國共產黨報紙，特別是從俄國刊物轉載的東西，一貫是它的重要內容，並在很多期中佔了大部分篇幅。這個理論刊物的目的，顯然是教育黨員群眾和知識分子同情者中間的少量讀者，使他們了解印共的戰略和策略的基本面貌。

書籍和小冊子：印共中央出版物的——和宣傳鼓動的——第三個組成部分是書籍和小冊子。黨有自己的出版公司人民出版社 (PPH)。該社設在德里黨中央委員會辦公處隔壁的一座現代化建築內。它由於自己的附屬機構新世紀印刷廠設在同一建築內，因而有了自己的印刷設備。

印共盡量把出版物價格定低，以求廣大的群眾可以閱讀。印刷朴素而精良的一本十五頁到三十頁的小冊子，平均只賣美元三分到五分；八十頁到一百頁的小書，售價美元二十五分左右；三百五十頁到五百頁的書，售價在一美元到一美元五十分之間。訂閱黨的機關週報，每年只要十二盧比；理論性月刊，每年六盧比(分別折合美元二元六十二分和一元二十六分)。

儘管我們只能根據估計進行比較，印共出版的書籍和小冊子看來比印度任何其他政黨的數量都大，種類也多。能與它競爭的只有印度國大黨，儘管人民社會黨也發行了大量的出版物。

印共出版物的数量和种类，可以从人民出版社的图书目录上看起来。例如，1954年的书目載有七十五种获得批准的主要出版物，其中有五种是根据另一出版許可証出版，而由人民出版社发行的。这些出版物的种类，按題材來說，包括印度、中国、苏联、国际事务、历史和传记、文学和艺术、經濟、馬克思主义等。^①

① *Catalogue of Books, 1954* (《1954年出版书目》)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d.), 41pp. 下面是其中的一些典型出版物:

关于印度的: R. Palme Dutt, *India Today* (R. 帕姆·杜德: 《今日印度》) (2d revised Indian edition), 590pp.; Indrajit Gupta, *Capital and Labour in the Indian Jute Industry* (因德腊季德·古普塔: 《印度黄麻工业中的資本家和劳工》), 64pp.; Kartar Singh, *Kashmir and Imperialist Intervention* (加尔达尔·辛格: 《克什米尔与帝国主义干涉》), 40 pp.

关于中国的: Mao Tse-Tung, *China's New Democracy* (毛澤东: 《新民主主义論》) (4th Indian edition), 44 pp.; *Stalin on China* (《斯大林論中国》) 106 pp.

关于苏联的: W. P. and Zelda K. Coates, *Soviets in Central Asia* (W. P. 与澤尔达·K. 寇茨: 《苏联人在中亚細亚》), 240pp.; *Soviet Cinematography* (《苏联的电影艺术》), 244pp.; E. Frolov, *Industrialization Without Foreign Loans* (E. 弗罗洛夫: 《不借外債的工业化》), 40pp.

关于国际事务的: Joseph Starobin, *Viet-Nam Fights for Freedom* (約瑟夫·斯塔罗宾: 《越南为爭取自由而斗争》), 62pp.; T. Ganesh, *Colonialism in Africa* (T. 加内什: 《殖民主义在非洲》), 16pp.

关于历史和传记的: Alexander Trachtenberg, *History of May Day* (亚历山大·特拉腾伯格: 《五一劳动节史話》) (2d. Indian edition), 26pp.; Emi Siao, *Mao Tse-Tung, His Childhood and Youth* (蕭三: 《毛澤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 76pp.

关于文学和艺术的: G. V. Plekhanov, *Art and Social Life* (G. V. 普列汉諾夫: 《艺术与社会生活》), 252pp.; Harindranath Chattopadhyaya, *I sing of Man* (哈蘭德腊那特·札多巴塔雅: 《我歌頌人》), 74pp.

关于經濟的: Leo Huberman, *Man's Worldly Goods* (利欧·霍伯曼: 《人类的财产》) (3d Indian edition), 280pp.

关于馬克思主义的: Maurice Cornforth,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莫里斯·康福斯: 《辯証唯物主义》), 172pp.; J. Stalin,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 (約·斯大林: 《馬克思主义与国家、殖民地問題》), 258pp.; Liu Shao-Chi, *On the Party* (刘少奇: 《論党》), 116pp.

书目的最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在全部出版物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印度人写的关于印度的著作——在七十五种著作中，只有二十三种是关于印度的，其中还有好几种出自外国人手笔。整个目录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外国人的著作。

这个书目只包括英語著作。印共还出版了大量用本国語言写的书籍和小册子；不仅人民出版社用本国語言譯出它的英語书籍，省組織也用它們本地的方言出版它們自己的資料。

地方語言出版物：党的省組織用各种地方語言出版的报纸和期刊，构成了印度共产党出版事业的另一个重要部分。

这种地方語言出版物比中央的报纸出现得还要早。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工农党的許多地方組織就出版了正规的周报：孟加拉的党組織出版了《群言》周刊(Ganavani)，由穆札法尔·艾哈迈德主編；P. C. 約希为联合省的党組織編了一种印地文期刊《革命者》(Kranti Kari)；孟买的党組織用馬拉地文出版了《革命》周刊(Kranti)；旁遮普的党組織用烏尔都文出版了《劳动人民》周刊(mehnat-kash)。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出版的其他地方报纸，还有烏尔都文的《工人信使报》(Payam-e-mazdoor)，旁遮普文的《荣誉》(Kirti)和孟加拉文的《觉醒报》(Jagaran)。

这些期刊后来都由于政府继密拉特謀叛案之后实行了鎮压而被迫停刊。其中有一些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又以不同的名称重新出版了一个短时期，但都在政府的鎮压下再度停刊。停刊的有：孟加拉文的《短工》(Din Mazur)，《馬克思追随者》(Marx-Panthi)和《群力》(Gana Sakti)；馬拉雅拉姆文的《黎明》(Prabhatam)；馬拉地文的《革命》(Kranti)；泰卢固文的《新力量》(Navasakti)；泰米耳文的《人民力量》(Janasakti)。

印共在 1942 年取得合法地位以后，便开始建立一个省机关报体系。第一批包括：孟加拉文的《人民战争》(Janayuddha)，泰卢固文的《人民力量》(Prajasaki)，馬拉雅拉姆文的《爱国者报》(Deshabhimani)，泰米耳文的《人民力量》(Janasaki)，欧利雅文的《解放战争》(Muktiyuddha)和旁遮普文的《自由的战斗》(Jange-e-Azadi)。根据印共的报道，^① 这些报纸在 1943 年的发行额，总计三万四千三百五十份。此后不久，又出版了甘那达文的《人民力量》(Janasaki)。

其他的省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创办的。但在 1948—1949 年，印共的省报再一次由于政府的禁令而销声匿迹；不过到这时候，它们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这可以从某些报纸在被迫停刊时的发行额上看出。当时叫做《自由报》(Swadhinata)的孟加拉文报纸，自称有十万份的“实际”发行额；《人民力量》(Prajasaki)销售一万五千份，《爱国者报》一万五千份，《人民力量》一万份，另外一种馬拉雅拉姆文的报纸《蒙南尼》(Munnani)销售五千份。^② 上述五种报纸，三种是日报，两种是周报。

到 1953 年，共产党的地方语言报纸再度兴盛起来。这时已有五种日报(《自由报》[Swadhinata]，《大安得拉》[Vishal Andhra]，《爱国者报》，《新世界报》[Navalokam]和《新世纪报》[Naya Zamana])和九种周报(《新印度斯坦》[Nava Hindusthan]，《人民世纪》[Janyug]，《人民力量》，《新世纪》[Navayugam]，《人民力量》[Jana Sakti]，《红色》[Aruna]，《新世界》[Navi Dunia]，比哈尔的《人民力量》和《知识者》[Matamat])。大多数重要的地方语言都

① Krishnan, *Forgery Versus Facts*(格利什南：《伪造与事实：共产党揭露第五纵队》)，p. 6.

② *People's Age*(《人民世纪》)，IV(July 4, 1948)，p. 6.

有了自己的报纸，其中包括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泰米耳语、甘那达语和欧利雅语。

省报后来的发展同样是起伏不定的，而财务危机有时也迫使它们暂时停刊。不过总的说来，印共的这一类出版物一直在发展着。

关于这些地方语言的出版物，我们没有什么新的资料，而且这些出版物所使用的语言种类繁多，所以在这里不可能对它们的内容进行彻底的分析。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却不能低估，因为它们比中央的英语出版物拥有更多的读者。此外，省报并不完全是中央报纸的翻版，它们致力于报道省的事务，因此也相应地使本省读者感到更加亲切。对于外国观察家来说，由于他们的注意力很自然地集中在印共的全国性政策和活动方面，印共的英语出版物也许看上去像是它最重要的宣传鼓动工具。但是，对省的出版物作进一步的研究就会清楚地看出，它们才是更有效的媒介。

外围出版物：——除了印共的公开出版物或机关出版物以外，还有受共产党影响的群众组织和外围团体的出版物。尽管这些出版物并不是同样受到印共的管束，我们却必须把它们当做印共向印度公众传播大部分信息的媒介之一。

大多数群众组织和外围组织都有自己的正规的杂志：全印和平理事会会有《和平》月刊；前印苏友好协会曾出版《印苏月刊》，该协会的后身印苏文化协会则有《印苏文化协会季刊》；进步作家协会会有《印度文学》；印度人民戏剧协会有《团结》杂志；全印学生联合会有定期刊物《学生》。全印工会大会年度出版《工会纪录》。

许多这类的组织还出版各种小册子，其内容当然是根据它们的“顾客”（见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而定的。这些出版物都是通过

印共出版物的正规銷售机构以及各群众組織和外围組織自己的机构銷行的。关于这些出版物发行量的系統資料現在还没有，但是可以肯定，它們是印共出版物的重要补充。

銷售途径

印度共产党在发展和銷行它的出版物方面，既利用常规的方法，也利用自己独特的方法。

印共并没有忽视普通的商业途径；只要有可能，它就将它的出版物委托給普通书商代售；为了使它的貨物更受欢迎，它还給一种大大超过一般标准的回扣。以外国顾客为主要对象的那些最大的书店，通常是不卖政党出版物的；但到处皆是的市场书摊上却往往摆着共产党的书报。

在这些商业途径之外，印共还建立了自己的銷售网，这个网由設立在印度大小城市的一系列党的正式书店构成。这些书店都是人民出版社的經銷店，专门銷售經過許可的共产党出版物。在这些书店中，最著名的一家也許要算德里书刊中心，它的地点和門面仅次于首都最大的几家书店。

此外，印度共产党还可以把它的每个党员当作书报推銷員，而且确实这样做了。印共要求它的地方組織定期組織“书报推銷小組”，到城市的大街上，工厂的大門口，或是挨門挨戶地推銷党的出版物。甚至党的領導人也参加这种特殊活动；共产党的国会議員有时也以推銷員的身分出现在新德里主要商业中心的便道上。

其他的銷售办法包括在特殊节日設立流动书店和临时书摊。在許多地方組織里，党员們常常用自行車或摩托車載着“书店”，定期到集市上或偏僻的乡村里去卖书。每逢庙会或节日，常常可以在人們聚集的地方，看到印共地方組織的成員在那里摆設书摊，甚

至在宗教圣地也是如此。在 1954 年甘婆庙会——一次罕见的宗教集会，它把大批印度教信徒吸引到了阿拉哈巴德——以后，印共声称，它卖掉了总值一千五百卢比（约合三百一十五美元）的党的出版物，这意味着卖了好几千本几分美元一本的小书和小册子。^①

显然，印共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把它的出版物直接送到公众那里，以便最广泛地传播它所要说的话。

党的出版事业的管理

印共为了管理它的出版活动，已经设立了一个旨在贯彻集中领导的专门机构。印共的党章规定，党的出版事业由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委员应“分担党中央机关报和党中央出版物的编辑”以及“党的印刷所和书刊的发行”等责任。^② 党章还规定，省机关报的编辑必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并且必须从省委员会成员中选出。此外，党章还规定，党的省组织“须得中央批准”才能出版和发行书刊。^③

一般说来，印共中央机关报的历任编辑不仅是中央委员，而且还是政治局委员（M. B. 腊欧、V. M. 高耳、洛梅什·塔巴尔等人是例外，他们显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有好几次，党的总书记亲自担任编辑。

此外，为了确立党中央对党的整个出版事业实行监督的制度，政治局已经在它的成员中组织了一个宣传鼓动小组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也选出了一个宣传鼓动委员会。^④ 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对

① *New Age*（《新世纪》），I（April 4, 1954），p. 12.

② 《印度共产党党章》，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世界知识社 1955 年版，第 62 页。

③ 同上，第 59 页。

④ 在 1951 年，这个委员会据说包括 S. A. 丹吉、S. V. 堆什班堆、阿里·萨尔达

党的出版事业的监督工作，显然已經落到对此感兴趣的人們身上，而不是由一个党的組織来承担了；至于有效的协调，与其說是一种现实，不如說是一个目标（见第十五章）。但是，正像在印共其他方面的活动中一样。集中仍然是印共宣传鼓动事业的一个确定不移的原则。

印共对其出版事业的集中控制手法，可以从印共的几次制裁行动中得到說明。有一次，《印度文学》編輯部的阿里·薩尔达尔·札弗利由于允許在該刊上发表异端作品而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責备。这个异端作品是室利·室利所作的一首詩《向俄国致敬》，这首詩說“馬克思、恩格斯、巴枯宁、布哈林和克魯泡特金”的思想都已經在苏联实现了。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意见，札弗利由于忽視不叫他发表那首詩的劝告，而“沒有尽到他”作为一个印度共产党党员的“政治責任”。^①

还有一次，《十字路口》編輯部的果温达·維达尔提由于未經上級批准便出版了一本被判定为“反党著作”的书，而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处分。他和他在这家杂志中的同事，都分別受到了在长短不同的时期內不得担任党内負責职务的处罰。^②

正如上述例子所表明的，印共宣传鼓动机关的效果，并不是毫无問題的。这部机器已由于某些内部缺点而受到了損害，党的出版物本身就充滿了关于这一方面的自我批評。

例如，在中央委员会 1954 年的一項決議中，就包括着一些具

尔·札弗利、罗米希·錢德拉和維克托·高耳。见 M. R. 瑪薩尼：《印度共产党簡史》（M. R. Masani,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London: Derek Verschoyle, 1954），p. 124. 除此以外，沒有更近的資料。

① *Party Letter*（《党内通信》），April 31, 1953, p. 3.

② 同上，p. 4.

体的指責。^① 決議首先宣稱，黨的宣传鼓動工作傾向於“極其一般化和長篇大論”，而且它的特点是“熱情”而不是“效力”。這樣看來，這種經院哲學的傾向——也就是逃避印度的真正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顯然已經影響了印度共產黨的宣传鼓動工作，正如影響了它的內部爭論一樣。此外，決議還提到了“重復和大喊口號”的情況，承認黨的宣传鼓動工作中存在着鸚鵡學舌的現象。最後，決議譴責了在這方面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的黨員，說宣传鼓動工作是“我們的活動中最被忽視的方面之一”。決議還特別指出，宣传鼓動活動只限於報紙和公開演講，而“個人的口頭宣传”方法則遭到忽略。

這類的自我批評雖然暴露了某些缺點，但是也使人可以看出，印共在力求解決如何最充分地利用宣传鼓動武器這個問題上，一向抱着堅定的決心。

外國共產黨的宣传

從更大的範圍來看，印共的宣传鼓動不過是每天流入印度的國際共產主義宣传鼓動的一部分。因此，為了了解在印度進行的共產主義宣传的全貌，就有必要研究一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用來向印度公眾傳達信息的各種工具。

廣播、電影、出版物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宣传鼓動，使用了印共無法得到的兩種媒介：廣播和電影。印度的廣播網是國有的，並且一直拒絕繳費的

^① 印度共產黨：《組織決議》，《印度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選輯》，世界知識社 1955 年版，第 82 頁。

政治广播；但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利用中亚細亚的一些轉播台，就能使印度的大多数地区都收听到。到 1955 年，苏联电台向印度广播音乐和政治評論的时间，英語达到每周十五又四分之三小时，印地語五又四分之一小时，孟加拉語八又四分之三小时。^① 这些广播以及“美国之音”和其他外国广播节目，都登載在印度許多家报纸的广播节目栏內。北京电台也向印度广播，但只使用英語，而且规模也較小。

印度的观众也能看到苏联的电影。1954 年，印度从共产党国家进口了五十六部影片，其中包括二十部故事片。^② 像进口数量远远超过共产党国家影片的美国和英国影片一样，共产党影片也必须經過印度政府的批准才能上演。根据印共报纸的报道，在 1953 年有六部外国共产党影片沒有得到上演許可。^③

印度各主要城市都有定期上映共产党集团影片的影院；另外还有专门設立的外围組織所举办的非公开放映。比如 1952 年成立的加尔各答人民教育电影中心就为工会、青年团体和其他观众安排共产党影片的放映。^④

此外，共产党集团国家还极力在印度的国际电影节上推广它們自己的影片，同时苏联也是願意同印度交换影片在本国影院上映的少数国家之一。不仅如此，苏联政府在 1956 年还大力协助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印度的 K. A. 阿巴斯联合拍制一部关于阿法那西·尼基丁——十五世紀到印度旅行的一个俄国人——的传记

① Evron M. Kirkpatrick, ed., *Target: The World; Communist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1955* (埃符龙·M. 柯克帕特里克：《目标：全世界；1955 年的共产党宣传活动》)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6), p. 239.

② 同上, p. 242.

③ *New Age* (《新世紀》), I (Dec. 13, 1953), p. 14.

④ *New Age* (《新世紀》), I (Jan. 17, 1954), p. 11.

片。*

但是，共产党集团国家在它们的宣传鼓动计划中，还是把首要重点放在出版物方面。苏联和中国的英语杂志，如《苏俄》、《新时代》和《人民中国》等，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出版物《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一样，也可以在印度各地的书报摊上买到。还有一种印地文版的《苏维埃国土》也可以买到。印度共产党还从共产党国家收到大量的免费书籍，并通过自己的正规销售途径以最低廉的价格把这些书籍销售出去。除了这些外国共产党的书刊以外，还有苏联的新闻通讯社塔斯社的出版物；该社的新德里分社不仅向印度的报纸发售正式的新闻稿，有时还出版小册子普遍发行。

代 表 团

另外还有一条近年来已经变得日益重要的宣传鼓动途径，这就是由来往于印度和共产党集团国家之间的代表团构成的“活的”媒介。很多这类的代表团都负有其正常的文化、外交或技术交流的使命，但它们往往不免要成为共产党拉拢公众的工具。因此，这些代表团，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往往就成了共产党对印度公众进行宣传鼓动的媒介。

派到印度的共产党代表团

从苏联、中国和其他共产党国家派往印度的代表团越来越多。这些代表团构成了最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媒介之一，而且，由于个人来往的作用，这些代表团，从长远看来，会比那些“现成的”媒介——广播、电影或印刷品——有效得多。

* 中国译名是《三海旅行记》。——译者

共产党集团代表团的成員不論是政府官員、学者、电影明星、作家、艺术家或是運動員，很少不在公众集会和記者招待会上吹嘘共产党的进展或解释共产党的政策的。他們要說的話从人嘴里說出来，其影响就要比在当地共产党報紙上登出来大得多。此外，因为他們的訪問是具有新聞价值的事件，所以他們的一言一行总会引起很大的兴趣，并且要在所有非共产党的報紙上刊登出来。

即使这些代表团并不公开进行說教，他們也具有一种固有的宣传价值，因为他們的成員一般都在其各自的专业上代表一定程度的技术成就，而这正是印度人极为羨慕的；每一个代表团都在印度人心目中那幅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文明的图画上添上几笔。这类代表团有效地抵消了关于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都是无可救药的落后和愚昧的反共說法。同这种說法相反，他們証明，印度或許能够从共产党国家学到些东西，至少是在技术方面。由于技术成就正是印度的政治中坚人物的最高目标之一，所以这是代表团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成就。

这些代表团还摧毁了某些反共人士的另一种极端见解：外国共产党人都是些暗藏炸弹的恐怖分子。代表团又亲切而善于有分寸地进行阿諛，抓住每一个机会称赞印度的一切，因而一般都能引起印度人对他們的好感；由于亚洲人历来好客——在西方观察家看来，有时显得过于亲热——他們就更容易做到这一点了。

根据最近的統計，单是在 1955 年，就有五十八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訪問了印度：二十二个来自苏联，二十二个来自东欧，十个来自中国，四个来自北朝鮮等其他亚洲共产党国家。按性质来分，有十六个文化团体，五个体育代表队，一个和平代表团，一个劳工、农业、合作社方面的代表团，十三个貿易或商业代表团，十五个

科学、专业或技术团体和七个正式政府代表团。^①在非共产主义的国家中，印度所接待的代表团数目，居第八位。

· 将几个代表团的情况介绍一下，就可以使读者看出他们是怎样活动的。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领导人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所作的两次正式国事访问。（见第十四章。）这两次在全世界普遍报道的访问，是共产党国家政府从私人 and 政府两方面向印度讨好的积极努力。但是，这类偶然的政治代表团，不管多么激动人心，从长远看来，可能并不如川流不息的“非政治性”代表团来得有效。

在这类“非政治性”代表团中，被报道得最多的就是一个俄国文化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于 1954 年访问印度，并在印度的主要城市演出。由苏联文化部副部长 N. N. 别斯帕洛夫率领的这个代表团包括苏联的一些著名音乐家和舞蹈家：苏联大剧院的歌剧明星马克辛·米哈依洛夫和列奥卡迪雅·马斯连尼科娃；俄国著名芭蕾舞演员玛雅·普利谢茨卡娅和尤利·郭夫曼；钢琴家尤里·布留希科夫；小提琴家奥尔加·卡维兹涅娃；民间舞蹈家木古腊莫·都尔昆帕瓦；以及民间音乐家和其他的舞蹈家。在新德里、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班加罗尔和孟买，这个歌舞团的表演都激起了公众的极大的兴趣和赞扬；据《印度时报》报道，这些俄国人“已经使每个人都爱上了他们”，而且每到一处总是满载“盛誉”而归。^②观众因为有几个俄国艺术家表演了印度的歌舞而特别着了迷。用《印度斯坦时报》的话来说，这种讨好的姿态“使得迷迷糊糊的印度群众非常高兴”。^③这些艺术家都是印度政府的正式客人，在访问

① Kirkpatrick, *Target: The World...* (柯克帕特里克：《目标：全世界；1955 年的共产党宣传活动》，p. 107.

② *Times of India* (《印度时报》) (New Delhi), Feb. 4, 1954, p. 3.

③ *Hindustan Times* (《印度斯坦时报》) (New Delhi), Feb. 2, 1954, p. 4.

期間曾受到中央卫生部长、馬德拉斯首席部长和孟买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等印度显貴的欢迎。演出的收入全部贈給了尼赫魯总理的全国救济基金会。这个代表团在訪問过程中，处处受到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招待，其中包括印苏文化协会举行的若干次招待会。在該协会的一次招待会上，馬德拉斯的首席法官兼全国音乐、舞蹈、戏剧学院院长 P. V. 腊札曼那尔說，“未来的印度文化将走苏联文化发展的道路，”意思是說，文化應該是一种国家的活动，但是各个地区的特有文化，應該允許自由发展。^① 俄国代表团团长別斯帕洛夫先生利用这些招待会和其他社交場合，号召进一步发展苏联和印度之間的文化联系，以增进两国之間的了解和友誼。他經常称贊印度的文化，說印度的文化一向“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② 在新德里的一次記者招待会上以及在其他的場合，他着重叙述了苏联艺术家所享受的优厚物质待遇和社会福利，并且指出，在苏联的文化界，也有批評和自我批評。^③

大約在一年以后，一个类似的中国代表团又訪問了印度。由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鐸率領的这个代表团，是一个由六十七人組成的歌舞团，其中包括表演民間歌舞的艺术家，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以及著名的京剧演員。这个歌舞团作为印度政府的客人在印度訪問了六个星期；負責安排这次訪問的招待委员会的主席是印度总理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正像以前來訪的俄国代表团一样，中国歌舞团也演出了优秀的节目，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贊美。但是，同这些美妙的节目交織在一起的，却是明显的宣传：演出是以“印中友好歌”开始的，这支歌贊美两国之間の友誼，并把这种友誼称

① 同上, Feb. 20, 1954, p. 8.

② 同上, Jan. 18, 1954, p. 1.

③ *Times of India*(《印度时报》), Feb. 3, 1954, p. 4.

作“伟大的和平力量”；随后便是一支名叫“我們的园丁”的歌，根据正式印刷的节目单，这个歌“表示了”新疆省人民对毛澤东的“热爱和感激”，反映了“他們的幸福和丰富多彩的生活”。^① 在訪問結束时，郑振鐸在告別辞中贊美了印度的“辽阔而美丽的土地”，“古老而丰富的文化”和它“对和平的热爱”。他肯定地說，除了紀念品和礼物之外，歌舞团还要把他們在印度所学的歌舞帶回中国去。^②

我們还可以簡略地介紹一下其他不同类型的共产党代表团。俄国一个非表演性的文化代表团在 1955 年訪問了印度。这个代表团由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詩人阿历克謝伊·苏尔科夫领导，包括若干戏剧导演和音乐指揮，一个东方建筑专家，几个新聞記者，一个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官員，几个来自苏联中央亚細亚的作家，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副主席。代表团在印度游历了一个多月，訪問了印度的主要城市和著名的游览胜地。苏尔科夫在許多次公开演說和談話中稱贊了印度的文化、經濟进步及“和平意向”。^③ 他強調印度和俄国的条件是相似的，断言印度现在經歷的发展阶段正是苏联几十年前經歷过的阶段。^④

1953 年，苏联卫生部副部长 M. D. 科弗利金娜应印度政府的邀請，到印度进行了三个星期的訪問。她在公开发言中，主要着意于描繪苏联妇女的进步。^⑤ 在她訪問期間，恰好另一位妇女中国的卫生部长李德全女士也来到印度訪問。

① Cultural Delegat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gramme, Dec. 12, 1954, National Stadium, New Delhi*(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1954年12月12日在新德里国家体育館演出节目单》), (New Delhi: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Government of India, 1954), p. 1.

② *Times of India*(《印度时报》), Jan. 20, 1955, p. 3

③ 同上, Jan. 29, 1955, p. 3.

④ *Hindustan Times*(《印度斯坦时报》), Feb. 24, 1955, p. 6.

⑤ 例如，见《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 Dec. 26, 1953, p. 10.

1954年，印度接待了一个由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孔原率领的中国高级贸易代表团。^① 1955年，一个由捷克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捷克斯洛伐克商会主席和文化部副部长率领的捷克贸易代表团为了捷克在孟买举行工业展览会，也来到印度。那次展览会被称作是一个国家在印度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工业展览。^②（1955年中，苏联已在孟买开设了一个永久性的工业品陈列所，展出一百五十多种机器和设备。^③）

1954年，由G. F. 亚历山德罗夫博士率领的一个由十一个人组成的俄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海得拉巴举行的印度科学大会。在大会上和大会外发表的几次演说中，该团团长阐明了苏联宣传中的许多主题；他详细叙述了俄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赞美了苏联“科学研究的绝对自由”，解释了公私利益在苏联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之下的协调，并且把西方的人口政策谴责为他们不断进行战争的口实。^④ 但是，至少有一家印度报纸评论说，这些演说都是“聒噪的宣传”，俄国人在这次大会上发表的言论“与其说是科学方面的，倒不如说是政治方面的”。^⑤ 一年以后举行的次届印度科学大会，又有一个俄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代表团团长是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先生。

其他的共产党代表团有：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率领的中国工会代表团；俄国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代表团；俄国的足球队和

① *Indian Express*（《印度快报》），（New Delhi），Sept. 18, 1954, p. 5.

② *Times of India*（《印度时报》），Feb. 5, 1955, p. 10.

③ 同上，April 18, 1955, p. 10.

④ *Hindustan Times*（《印度斯坦时报》），Jan. 7, 1954, p. 12; and Jan. 26, 1954, p. 3.

⑤ 同上，Jan. 18, 1954, p. 6; and Jan. 24, 1954, magazine section（杂志栏），p. 3.

排球队——他們在印度各地进行了一系列比赛；以及派往印度参加 1952 年国际电影节的俄国、中国和捷克的电影代表团。（在参加那次国际电影节的外国代表团中，苏联的代表团最大，而且是由一个副部长率领的。）

总之，每年都有种类繁多的共产党国家代表团访问印度。这些代表团虽然往往是正常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关系的促进剂，但也是意识形态和心理方面的宣传工具。由于缺乏关于这个问题的有系统的舆论研究，谈论这些代表团对印度人态度的影响，就只能是一种臆断了。不应该认为他们永远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也不应该认为他们的影响一定是对他们有利的。何况，他们的影响也可能为西方国家的代表团所抵销。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结束访问以后马上在印度三个地区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人们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本身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测验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在过去几个月中对苏联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如果有，是怎样改变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统计见下表（数字是百分比）：^①

| | 变好 | 变坏 | 未变 |
|----------|------|-----|------|
| 加尔各答 | 62.0 | 0.0 | 38.0 |
| 德里 | 22.5 | 0.4 | 77.1 |
| 特拉凡哥尔-柯欽 | 42.3 | 0.8 | 56.9 |

另一个问题是，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和怎样改变的，答案统计见下页表（数字是百分比）：

“未变”栏中的数字，在我们所引用的材料中并没有，但是作者

^① *Monthly Public Opinion Surveys*（《每月舆论调查》），nos.7, 8, 9, 1956. 这是新德里印度舆论研究所出版的一种杂志。

添上了这些数字，以便讀者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态度改变和未改变的全貌。

| | 变好 | 变坏 | 未变 |
|----------|------|-----|------|
| 加尔各答 | 16.0 | 0.0 | 84.0 |
| 德里 | 5.7 | 1.3 | 93.0 |
| 特拉凡哥尔-柯欽 | 10.6 | 1.7 | 87.7 |

因此有证据可以说明，共产党的代表团既有一种立即生效的政治作用，又有一种长远的政治作用——他们能在舆论方面创造一种更为友好的气氛，这种气氛在当时就对苏联有用，而在日后又对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用。因此，这方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鼓动，对印共的宣传计划是一个极端有益的补充。

派往共产党国家的印度代表团

1955年，有一百二十六个印度代表团前往共产党国家——相当于共产党国家派往印度的代表团的两倍以上。^①事实上，印度派往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确实比除了英、法两国以外的任何其他非共产党国家的都要多。

在这一百二十六个印度代表团中，有四十六个是到苏联去的，四十三个是到东欧去的，三十五个是到中国去的，两个是到其他亚洲共产党国家(西藏和北越)去的*。按性质分，有二十二个是文化代表团，十个体育代表团，一个妇女代表团，四个“和平友好”代表团，八个青年和学生代表团，十四个劳工、农业和合作社代表团，十一个贸易和商业代表团，四十个技术、专业或科学代表团，和十六

^① Kirkpatrick, *Target: The World...* (柯克帕特里克:《目标:全世界;1955年的共产党宣传活动》), p. 106.

* 按西藏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不是什么“国家”。——译者

个正式政府代表团。^① 值得注意的是,广义的“技术”代表团(包括劳工、农业和合作社方面的代表团,貿易和商业代表团,以及技术、专业或科学代表团),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大于訪問印度的共产党代表团中所占的比例。可见,印度人所着重的是技术交流。

这些印度代表团,正像共产党集团国家派到印度的代表团一样,往往是共产党在印度进行宣传鼓动的有用工具。这些代表团在国外的活动和观感,在印度都是第一版新聞;如果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政府能够博得代表团成員的好評,这种好評不久就会反映在印度的报纸上。此外,在代表团回国以后,他們的看法还会通过記者招待会和公开演說进一步传播开来。这些看法可以大大影响印度人对共产党国家的态度。

至于那些由外围組織(例如和平运动組織)派遣的亲共代表团,共产党国家的政府很容易給他們一种良好的印象;共产党的宣传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搬上印度报纸的。在印度和平运动所派代表的言論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果溫德·薩海先生就在关于参加 1953 年 11 月世界和平理事会維也納會議的公开报告中宣称,俄国人民“已經使他們的国家走上了正确的进步道路”。他还肯定地宣称,俄国人非常热爱他們的生活制度,因而誠心誠意地想完成政府所规定的生产指标。他說,俄国的科学、艺术和文化已經取得了完全的諧調。^② 另一个和平領袖 M.阿达耳在訪問苏联以后說,苏联关于个人自由的标准超过了任何东西方国家,在那里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正在取得巨大的进步。^③ 在印度的非共产党报纸上,类似的言論几乎是引不胜引的。

^① Kirkpatrick, *Target; The World...* (柯克帕特里克:《目标:全世界;1955 年的共产党宣传活动》), p. 106.

^② *Times of India*(《印度时报》), Jan. 4, 1954, p. 12.

^③ *Hindustan Times*(《印度斯坦时报》), Jan. 9, 1954, p. 5.

这类同情的看法印共报纸当然要大肆渲染，外围组织更要进一步在自己的出版物上加以宣扬。例如，全印和平理事会出版的小册子《伸过喜马拉雅山的手；印度人在苏联》就描述了参加1952年维也纳和平大会的印度代表团访问苏联的经过。这本小册子有一百五十六页，印刷精良，图片丰富，是一部用旅行日记体裁写的详尽赞美辞。书的政治倾向，可以从它描述代表们访问斯大林出生地的文字中看出。书上说，代表团对这位“无畏的自由战士”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感”，他们在来宾留言簿上写下了下面的话，来表达他们这种感情：

我们，出席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印度代表团，看到了斯大林同志所留下的时代足迹，深受感动。对于今后世代的人来说，知道捍卫国家自由的真正战士要作些什么，乃是一种鼓舞。他所走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牺牲会带来自由。愿我们这些年轻的战士们能学习这个光辉的榜样。伟大人物的生活都提醒我们，我们也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崇高。^①

这样，亲共的代表团，实际上就充当了印共的喉舌。一些应邀访问共产党国家的非共产党代表团也起了同样的作用，尽管是无意的。虽然有些代表带着批判的态度回到印度，^②但其余的人却显然受了影响。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在1954年访问苏联和中国的一个代表社会党工会联合会的劳工代表团。印度的社会党人一般都是强烈反共的，但这个代表团里的若干著名人士却显然修正了他们的看法。《印度快报》上的一篇文章归纳了代表们的访问报告。下面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① *Hands Across the Himalayas, Indians in the Soviet Union* (《伸过喜马拉雅山的手；印度人在苏联》), (New Delhi: All India Peace Council, n. d. [1953]), pp. 4-5.

^② 例如，见《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 (July 16, 1954, p. 3) 上的 S. 格里巴拉尼(Sucheta Kripalani) 的访苏报告。

坎普尔，8月30日——印度劳工全国协会总书记腊札·腊莫·沙斯德利先生昨天在这里说，在俄国和中国，国民生活的基本结构，是以政府、人民和工会领袖之间的最密切合作为基础的。

沙斯德利先生和坎普尔人民社会党书记维冷德腊·巴哈都尔·辛格先生在俄国和中国访问了两个月回来以后，也在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那里的各界人士都对他们的政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忠诚，而政府也专心致志地为人民谋福利。

在谈到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环境时，沙斯德利先生说，人民有批评政府的充分权利，不过他们的批评很健康，而且受到某些纪律的约束。

他说，在那里也有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他在莫斯科、塔什干和许多中国城市中看到了挤满信徒的清真寺、寺庙和教堂。

沙斯德利先生说，一个外国人在俄国和中国所得到的总印象是，这两国的人民都非常幸福。他们的生活水平非常高。城市都设计得很好，保持得很整洁，也管理得很好。

沙斯德利先生说，俄国有一些由城市里面八岁至十五岁的男孩子管理的小铁道。城里还建立了一些名叫“胜利”和“自由”的小火车站。火车司机、站长、警卫、甚至机械师都是由男孩子担任的。

维冷德腊·巴哈都尔·辛格先生说，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国，工会运动都是根据科学原则组织的。工人和雇主之间根本没有冲突。他说，作为雇员和雇主之间的桥梁的工会，发挥了一种非常健康的影响。

裁员和解雇的现象非常罕见；上海的一家私营面粉厂，在过去五年中只解雇过两个工人。

沙斯德利先生说，看到俄国人和中国人非常尊敬尼赫鲁总理和他的政策，使他深为感动。他还说，他们都以尊敬和赞赏的心情注视着印度。^①

像这样一篇简洁地综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进行宣传的主题的文章，即便在共产党自己的报纸上也很难找到。

在普通的日报上，从一个非共产党人口中说出共产党所要说

① *Indian Express*(《印度快报》), Aug. 31, 1954, p. 6.

的話，也許比共产党報紙上一千頁的宣传文章更为有效。因此可以說，这类“活的”媒介，不論是外来的，还是本国的，都給印共原来已經很强大的宣传鼓动武器添加了无限的力量。

第十九章 議會斗争舞台

根据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观点，資产階級民主的議會，不可能成为实现真正政治变革的机构。根据这种观点，資产階級国家的立法机构不过是居于統治地位的資产階級的一种工具，而且这个統治階級是决不会自动放弃政权的；因此，想要通过立法程序寻求改良或变革，是不会有結果的。

如果共产党人既不能通过議會手段来影响一个資本家的政府，也不能通过議會手段把它推翻，那么他們是否应当完全抵制議會呢？在二十世紀最初几十年里，許多共产党人曾經說过“应当”。在俄国 1905 年的革命期間，列宁曾持有这种见解，并且嘲笑过議會活动，认为群众的直接行动才是改变社会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唯一有效途径。但他后来却以一种比較实际的、策略的眼光对待这个問題。他在坚持馬克思主义的一般立場的同时主张，在不可能采取直接的革命行动的情况下，参加資产階級的立法机关，就可能成为最有用的輔助性的武器；他說，共产党人单靠議會手段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但他們能够对群众起更大的影响；这作为走向最后目标的一个步驟，是有无法估計的好处的。

在“参加不参加資产階級的議會？”这篇論文中，列宁簡要地說明了他的立場，他反复闡明：只要群众相信議會，那么議會活动就是必要的——其目的在于摧毀这种信念。他說，因为参加資产階

級民主的議會易于“向落后群众証明为什么这种議會應該解散，易于取得解散这种議會的成功，易于促使資產階級議會制度成为‘在政治上已經过时了’的东西。”他写信給欧洲各国共产党說：

正因为西欧工人中的落后群众，尤其是小农中的落后群众，受資產階級民主偏见和議會制度偏见的熏染比俄国的这种群众要厉害得多，所以共产党人**只有从資產階級議會这种机关内部**，才能（并且應該）进行长期的、顽强的、百折不挠的斗争，来揭发、消除和克服这种偏见。^①

总之，共产党进行議會活动的目的，是利用另一种机会去对群众进行工作并且“教育”群众。議會能为宣传和鼓动工作提供讲坛，因此不应嘲笑这个讲坛。这种策略是完全符合列宁提出的到敌人陣营内部去工作这个总原則的。有趣的是，列宁在为布尔什維克参加立宪會議进行辯护时，他作了一番軍事上的比喻；他說，在制宪議會中存在着布尔什維克党团，就易于摧毁制宪議會，正像在白色俄国陣营中存在着布尔什維克反对派就易于在国内战争中打敗他們一样。^②

俄国布尔什維克党人遵照在議會舞台上进行斗争的决定，于1907—1915年間（大約自第一次革命失敗时起到第二次革命开始的这段期間內）就进行竞选并在国家杜馬內工作。由于这种实际经历，他們就成了有成就的議會专家。他們的活动的性质（以及指导这种活动的策略原則）在俄国党的官方历史中有簡明的叙述；該书对布尔什維克在第四届杜馬中的工作叙述如下：

起初，布尔什維克和取消派[社会主义的另一派別]在杜馬里面組成为一个共同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但因取消派代表处处妨碍布尔什維克代表

① 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頁。黑体字系原有。本文写于1920年。

② 同上，第43頁。

进行革命工作，所以布尔什维克代表同他们作过一番顽强斗争后，便于1913年10月遵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指示退出联合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而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单独的党团。

布尔什维克代表常在杜马里发表革命演说，抨击专制制度，向政府质问摧残工人和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事实。

他们在杜马里对土地问题也发表过演说，号召农民起来同农奴地主作斗争，揭露反对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的立宪民主党。

布尔什维克向国家杜马提出了施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法案，这个法案当然没有被黑帮杜马采纳，但它终究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布尔什维克的杜马党团始终都与党中央及列宁本人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常从列宁那里领到指示。……

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并没有局限于在杜马内部进行工作，同时他们还在杜马以外加紧努力活动。他们时常巡视各个工厂，到全国各工人中心去作报告，召集秘密会议解释党的决议，成立新的党组织。代表们很灵巧地配合了合法的活动与不合法的秘密的工作。^①

根据上述关于布尔什维克在议会中的活动的叙述，可以逐段地得出有关共产党议会活动的工作原则——即活动方式。

1. 同议会中其他友好的党团实行联合，（但又与之进行斗争）。
2. 利用一切机会“揭露”政府的政策。
3. 首先强调工人阶级的利益，其次强调同盟阶级（如农民）的利益。
4. 提出有宣传作用的立法。
5. 遵守严格的党的纪律。
6. 把在议会内所进行的工作同在议会外的政治活动（包括必需的非法活动）结合起来。

这个行动法规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与其他政党的行动法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4—205页。

規不同的地方并不在于它的具体原則，而在于它有这样一个基本概念：議會活动服从于并輔助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用斯大林的話來說，就是：“議會斗争仅仅是組織无产阶级的議會外斗争的學校和助力”，因为“工人运动的基本問題是要用暴力，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直接斗争，用他們的总罢工，用他們的起义来解决的”。^①

实质上，这就是共产党議會活动的固有法規；这个法規为一切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所承袭下来，而且它也为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所承袭下来。

印共早期的議會政策

代議制在英国統治下的次大陆上逐漸建立起来了，虽然这个工作进行得緩慢而又审慎。印度人觉得这种过程过于緩慢，但是他們对于这些制度，是否应当完全仿照西方的样式，很少提出异議；他們反对英国太上皇，但大体說来他們要求建立英国式的政府。^②

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就已經有了一个开端。当时印度人要求在管理国家方面起更大的作用而英国也許可了。在諮詢性的“立法會議”中（印度人在1861年获准进入这个會議），至少已有了責任政府的萌芽。經過1892年、1909年和1919年的一系列的改革，这些立法會議在規模、影响和責任上都逐步有所增长；印度人参加立法會議的数目增加了，立法會議又被賦予了一些特权，而选举原則也在逐步实施。但这些立法會議仍然不是代議制的，因为

① 約·斯大林：《論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5頁。

② 关于印度議會政府发展的生动的概述，见W.H.莫里斯-琼斯：《印度的議會》(W.H. Morris-Jones, *Parliament in Ind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7), pp. 43—73.

它們是由成年人居民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人所選出來的；它們不是獨立自主的，因為它們仍然要服從總督的至高無上的權力。

但在 1919 年，在省一級卻採取了一種近似責任政府的辦法；在各省，對民選的立法機關負責的省政府，雖然還在受英國指派的總督的約束，但在某些“移交的”領域中，如衛生和教育方面，則有了相當程度的自治權。

在構成一部新憲法的 1935 年政府組織法中，省自治的原則得到進一步的擴大；“移交的”領域增多了，最重要的是，選舉權放寬了，有選舉權的人增加到大約占全國人口的 14%。^①

對於印度國大黨當權派來說，1935 年的改革，儘管有其缺點，卻仍然是參加議會機構的第一個令人滿意的時機。儘管國大黨當時還沒有承擔義務要和政府的新計劃進一步合作，它還是決定參加 1936—1937 年的各省競選。後來，在十個省中，國大黨在八個省以多數選票而贏得勝利，並且經過一場長時間的辯論以後決定就職。國大黨黨員在省的立法機構中獲得席位，在他們占優勢的八個省里組成了政府。這些國大黨“政府”執政直到 1939 年，由於抗議印度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才集體辭職。

但是對於當時根據統一戰綫策略而加入國大黨的印度共產黨人來說，是否參加省政府的問題，多半是沒有什麼現實意義的。印共當時是非法的，共產黨人組成的黨團勢力太小，對於國大黨在議會方面所起的作用影響不大。因此，1935 年的改革並沒有相應地給印共提供利用這個議會鬥爭舞台的機會。而且印共無論如何都不能同樣持有那種贊同英國式政治制度的風行一時的偏見。因

^① P. N. Masaldan, *Evolution of Provincial Autonomy in India, 1858 to 1950* (P. N. 瑪薩耳丹：《1858—1950 年印度地方自治的演變》)，(Bombay: Hind Kitabs Ltd., 1953), p. 109.

此,它便宣称它“完全反对”1935年的政府組織法。这个政府組織法是一部试图在印度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奴隶宪法”。在省的选举当中,印共說,它只支持那些“一心一意要摧毁这种宪法并主张代之以制宪議會”的候选人。它还反对組織省政府,因为参加政府就是“加入了奴隶主的行列”。^①

正像印共自己不久所承认的那样,共产党在选举中所起的影响是“不大的”^②。印共由于不能阻止国大党成立省政府的决定,因此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在立法机构以外繼續扮演反对派的角色。1937年政治局的一项決議宣称,参加政府就意味着替国大党右翼效劳,把“民族运动降到仅仅是議會主义的水平上”,因此決議号召对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我們必須向群众說明,国大党的省政府并不意味着人民的政府。除非人民准备組織起来并且反对帝国主义,否則任何一項要求都不能实现。”^③

印共和制宪議會

1945年9月,差不多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剛结束后,英国政府就着手进行印度制宪运动最后阶段的工作。总督宣称他打算召开中央制宪議會来辯論印度未来的政治形式,并頒布新宪法。只要英国人仍然保持着統治权,这样的議會就只能提出建議而已,但制訂一部由印度人制訂的印度宪法的道路至少还是敞开了一半。

① Bakar, “The Indian People in the Slave Market” (巴加尔:《奴隶市場上的印度人》), *The Communist* (《共产主义者》), I (Feb. 1937), pp. 10—16.

② Chand, “Into Action, Comrades” (占德:《同志們,行动起来》), *The Communist* (《共产主义者》), I (Feb. 1937), p. 9.

③ “Resolution on the Congress Ministries” (《关于国大党的省政府的決議》), *The Communist* (《共产主义者》), I (July, 1937), pp. 8—11.

1946年年中的英國內閣代表團方案規定，制憲議會將由1945年末至1946年初的冬季中選出的各省新議會推選出的代表和各土邦派出的代表所組成。印共第一次以一個合法政黨的資格參加各省的選舉。它在各省議會當中只得到八個席位；但在孟加拉議會中，印共卻使得它的一位領導人索莫那特·拉喜利當選為出席制憲議會的代表。因此，當1946年12月制憲議會在新德里召開時，一位共產黨人就在議會中占有一席，從此印共便開始了它的議會工作。

拉喜利對制憲議會的工作的貢獻，在於他直截了當地運用了列寧主義的議會策略，雖然他遵守著議會中的傳統禮儀，但他的演說卻對制憲議會的目的表示蔑視。他的意圖是進行宣傳，而不是制訂憲法。

拉喜利在開幕式上的演說中譴責那種認為印度通過談判而不是通過群眾行動就能取得獨立的“幻想”。^①三天以後，他在另一篇演說中，對於國大黨決定以參加制憲議會來表示和英國的計劃合作一事，表示遺憾；他還宣稱，他對於制憲議會是否能完成制憲工作是十分“懷疑”的。他這樣說：“我並不認為你們能夠從這裡面得到任何獨立。”他在結束演說時說，只有通過“革命的方式奪取政權”才能取得自由。^②

由此看來，在實質上，拉喜利要求制憲議會放棄它的任務並自行解散。他在制憲議會開幕後的頭幾天里代表印共而提出的一項決議案中，就曾公開地提出這種要求。印共在這項決議案中，要求

① *Constituent Assembl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制憲議會辯論記錄；官方報告》), I, no. 3 (Dec. 11, 1946), (Delhi: Manager of Publications, 1947), p. 45.

② 同上, I, no. 9 (Dec. 19, 1946), pp. 130—131.

制宪議會通过一項独立宣言，把主权交給由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代表所組成的临时政府。这个“受到全体反抗的人民所支持的”临时政府，将会立刻召集一个在普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制宪議會。印共这项決議案实际上就是对现行的制宪議會投出了不信任票。^①

拉喜利提出的決議草案从来没有在制宪議會中进行辯論，因为議長拒絕把它列入議程。^② 但它就像拉喜利后来在制宪議会的辯論中提出的其他建議一样，起着有利的宣传作用。例如，在1947年1月，他提出了一項預算修正案，要求大大削減部长和其他高級官員的薪俸，并且同时大大增加政府低級職員的工資。修正案还要求削減制宪議會自己的議員的津貼，拉喜利在演說中对他的同事們提出挑战，要他們放弃物质上的特权，并且按照人民的生活方式来生活。^③

拉喜利的議會斗争策略还包括在制宪議會中“揭露”国大党的主要政策。1947年4月，他在一次重要的演說中，抨击国大党所提出的关于宪法权利法案的建議；他說，这个建議給民权规定了种种限制，因此它就成为了笑柄。如果对基本权利所作的这种限制得以通过，他說“我們在整個民主世界面前簡直要成为笑料。”^④

政府显然怀疑——虽然无法証实——拉喜利从参加制宪議會的最初时刻起，就一直在采用列宁主义的議會斗争策略中的最后

①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Communist Party Resolution for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独立宣言；共产党关于制宪議会的決議案》)，(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d. [1947?]) pp. 5—10.

② *Constituent Assembl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制宪議會辯論記錄；官方報告》)，I, no. 6 (Dec. 16, 1946), p. 80.

③ 同上，II, no. 4(a), (Jan. 22 and 24, 1947), pp. 7—10.

④ 同上，III, no. 2 (April. 29, 1947), pp. 384—386.

一个項目——非法活动与合法活动相结合。制宪議會召开后約一个月，警察搜查了他在加尔各答的住所，沒收了他的某些文件。这一行动据說是与“收容所行动計劃”的插曲有关（见第十一章，第305—307頁），但这也可能是一种一般的預防性措施。拉喜利在致制宪議會議長的函件里对这种行动提出了抗議。^①

由于制宪議会的辯論工作在1947年趋于結束，拉喜利的名字也就不大在官方記錄中出现了。在印共內部，一个激进派对議會斗争的策略越来越反对，拉喜利本人显然和这个派別有关系。1947年年底，这一派在党内掌握了大权，它当时是选择革命的道路的。在B. T. 兰納迪夫的政治局里担任职务之后，拉喜利可能就轉入地下了。制宪議会在以后的四年中繼續举行會議，但共产党人参与其会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显然是多余的了。印共的議會活动自动地中断了。^②

共产党对宪法的态度

当制宪議會頒布了印度共和国新宪法，准备在1950年1月26日实行时，印共采取了反对态度。印共一面嘲笑在合法的政治范围内从事活动，一面对这个宪法采取了一种比对待英国的1935年政府組織法更为严重的敌視态度。中央委员会的一項声明再度把它說成是代表“印度資產階級”和英帝国主义的阴謀的“奴隶宪法”，声明现在却詛咒它是“法西斯暴政的宪法”、“民族压迫的宪法”、“凶恶的宪法”和“一場欺騙”。声明在贊揚了堆楞加那以及印度其他地区內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对尼赫魯政府的起义后，用一个

① 同上，II, no. 5 (Jan. 25, 1947), pp. 340—341.

② 1950年制宪議會变成了国会，直到1952年为止，它一直是印度的中央立法机关。

革命口号結束道：“爭取制定一部人民的宪法”。^①

苏联报刊持有类似的见解，斥責这个宪法是“资产阶级假民主”的变种。^②苏联的批評是非常具体的，它說：这个宪法由于明文规定保証财产不受侵犯因而“永远維護着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統治地位”；它沒有充分规定出民权条款因而就限制了“劳动人民反对剝削的权利”；它由于未能以語言为基础改組各邦因而“保留了英国压迫者所采用的行政区划”；它体现了間接选举上院的不民主的方法，并且賦予上院以优越权力可以控制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下院(人民院)；它保持着各土邦的“君主政体”；它规定印度繼續作为英联邦的成員国因而承受了“与印度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的种种义务。

在苏联的另一篇評論中，指責印度政府“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遮羞布”，凭靠“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办法”。^③

第一次大选

由于在堆楞加那等地发生的 1948—1951 年的印度革命遭受失敗，印共再度被迫改变策略。1950 年底，它的英国共产主义导师劝告印共恢复合法活动，特別要为 1951 年末至 1952 年初的这个冬天举行的大选进行准备。他們說，这次大选是“对印共的政治

① *Manifesto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on the New Constitution* (《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新宪法的声明》)(Bombay: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n. d. [1949]), 8 pp.

② T. Yershev, “Indian Version of Bourgeois Pseudo-Democracy” (T. 叶尔紹夫:《资产阶级假民主的印度翻版》, *New Times* (《新时代》) (March 15, 1950), pp. 3—7.

③ E. Zhukov, “Voprosy natsional’no-kolonial’noi bor’by posle vtoroi mirovoi voyny (E. 茹科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民族、殖民地斗争問題》), *Voprosy Ekonomiki* (《經濟問題》), 9(1949), pp. 54—61.

地位和影响的一个十分严重的考驗”，而印共不能制訂出一項竞选綱領則是“极端严重的政治弱点”。^①

印共搖擺不定地在探索一項新政策。在1951年8月发表的印共竞选宣言中，很难找到足以說明印共所要采取的竞选策略究竟是什么的綫索。宣言譴責尼赫魯政府的各个方面，向选民許下了种种諾言。最清楚的迹象就是含糊其詞地表示要团結其他“民主的”政治力量。

共产党呼請全国一切民主力量都認識到：建立人民的民主团結在目前是一个基本任务。各民主党派的任务不是为人民描繪一幅灿烂的图画，說如果人民投票贊成它当权它将如何如何，而是形成一个强大的統一的群众运动，只有这个运动才能推翻統治着我們大家的那些人的权力。^②

宣言沒有具体說明“民主党派”究竟指的是誰，但它却极力对这些不明确的同盟者表示好感；宣言呼吁人民，不要单投印共的票，同时还要投“进步民主的党派候选人”的票；此外，宣言还宣称，印共还将支持任何一个由“真正民主党派的統一战綫”所組成的政府。

从这种情况只能得出一个結論：印共不是集中力量把重点放在尽量扩大自己的竞选力量这个积极目的上，而是明显地集中精力于推翻国大党政府这个消极目的上。

共产党的竞选策略是在竞选运动中緩慢地形成起来的。不久，首先可以清楚地看出，印共可能同差不多一切听話的同盟者通

① “PHQ Unit's Covering Note to the Letter of the Political Committee of the CPGB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总部党组附在英共政治委员会致印度共产党信上的附件》），Dec. 6, 1950, p. 6.

② *Election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印度共产党竞选宣言》）（Calcutta: Central Election Board of the CPI, 1951），pp. 24—25.

力合作，不过像旁遮普的阿加利党人这些“教派”集团或极端主义的印度教各政党(人民同盟和太平社)则除外。共产党人还同一些对立的集团展开统一战线谈判，例如同达罗毘荼联盟(馬德拉斯邦中的主张南印度分治的反婆罗门组织)和农工人民党(在甘地主义者阿扎腊·J. B. 格利巴拉尼领导下的国大党的新派别)的地方人士。

当印共同其他党派就竞选进行谈判时，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印共不想同任何一个全国性的政党结成同盟，但却愿意同各个全国性政党的区域组织或地方组织结成联盟。举例来说，共产党人攻击农工人民党的全国性的领导，但却表示愿意同“农工人民党中的人士或个别领袖甚至农工人民党的地方组织”进行谈判。^①最后，他们同安得拉和馬拉巴尔的农工人民党组织达成了协议。同时，共产党人还攻击社会党的全国领导机构，但却宣称，他们将在海德拉巴等地支持一些社会党的候选人。^②

但是，对共产党人来说，比同全国性政党的地方组织成立联盟更为重要的，是同许多地方党派成立联盟。在印共处于非法地位的海德拉巴和特拉瓦哥尔-柯欽这两个邦中，这个问题尤为迫切。在海德拉巴邦中，共产党人同当地的左派分子建立了一个正式的联合政党——人民民主阵线；在特拉瓦哥尔-柯欽邦中，他们同喀拉拉邦社会党和革命社会党成立了一个正式的联盟，这个联盟以左派联合阵线为名而进行工作。

在其他地方，印共又同许许多多地方党派签订不太正式的双边竞选协议。根据后来发表的印共文件记载，这些党派包括：孟买邦的由阿鲁那·阿萨夫·阿里领导的社会党左派；孟加拉、比哈尔

① *Crossroads*(《十字路口》), III(Aug. 3, 1951), p. 5.

② *Crossroads*(《十字路口》), III(Jan. 11, 1952), p. 9.

和奧里薩的前進集團(馬克思主義者);孟買邦和海得拉巴部分地區的工農黨;紹拉普爾市的農工黨;北方邦的革命社會黨;旁遮普邦的紅色共產黨;馬德拉斯邦的勞工黨和馬德拉斯邦某些地區的達羅毘荼聯盟。^①

印共後來因為未能建立更廣泛的聯盟而表示不滿;絕大多數的(雖然不是全部的)協議是同中間偏左的黨派締結的。但是印共在同印度各地其他地方政治集團訂立一系列統一戰綫協議的工作上,至少已經有了一個給人印象頗深的開端。

最初幾年共產黨人在議會中的活動

選舉結果表明,印共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它把力量集中用在一些重要的地區,它只競選人民院中的四十九個席位;它贏得了十六席,獲得了人民投票總數的3.3%。而相形之下,社會黨競選二百五十六席只贏得十二席,所獲票數占人民投票總數的10.6%。如果印共所贏得的席位再加上海得拉巴邦的人民民主陣綫所獲得的七席和特拉瓦哥爾-柯欽邦的左派聯合陣綫中的獨立的共產黨人所獲得的三席,總數實際上就達二十六席。雖然國大黨佔據了議會中的三百六十四席,獲得了人民投票總數的45%,但共產黨人仍然是立法機構中最大的反對派。^②

共產黨議員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黨團。最突出的

① *Party Letter*(《黨內通信》)(April, 1952), pp. 18—20.

② 關於選舉結果的概況,見瑪格麗特·W·費希爾與喬安·邦杜蘭特:《印度民主選舉的經驗》(Margaret W. Fisher and Joan Bondurant, *The Indian Experience with Democratic Elections*), Indian Press Digests—Monograph Series(《印度報刊文摘——專題論文》), no. 3(Dec. 1956),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p. 39—53. 以下所稱“議會”均指人民院,不是指間接選舉出的聯邦院。

一点也許就是他們年輕；他們当中有 58% 是在四十岁以下，而整个議會中年齡在四十岁以下的只占 27%。因此，共产党議員也就缺乏立法經驗；他們当中只有 4% 的人曾在中央或邦的議會中工作，而在整个議會中，却有 51% 的人作过这样的工作。从职业方面来看，他們主要是从事专门职业(教育、法律、新聞)或从事“社会工作”的；他們当中只有 17% 的人拥有土地或企业，而在整个議會中拥有土地或企业的則占 38%。但是他們的文化水平同一般議員沒有差別，大学毕业的占 56%，而在整个議會中，大学毕业的占 58%。^①

在議會开会期間，旁听席上的观众会对共产党党团的另一个特点感到惊奇，就是他們参加會議时的紧张程度。無論是在休息时间或是在进行辯論的时候，他們总是表现出一付意志坚定而又非常认真的神态。而且他們明显表现出来他們对辯論是經過一番系統的准备的：他們就席时随身所带的文件数量要比所有其他的人都多。新德里的共产党議員办事处的研究部門，为了使他們能够在国会中有效地进行工作而为他們提供武器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出色。

共产党的議會党团沒有同其他任何党团共同組織一个正式的同盟。选举刚刚結束，印共中央委员会曾宣称它願意同国会中的其他民主党派組成一个“民主联合反对派”，但它又具体說明，这样一个同盟不得限制印共的言論自由，而且它还规定，共产党人是以党的名义而不是以个人的名义参加。^② 1952 年 5 月，在共产党倡議下召开的一次反对派議員的會議，未能就成立一个正式同盟的

① W. H. Morris-Jones, *Parliament in India*(W. H. 莫里斯-琼斯:《印度的議會》), pp. 115—123.

② *Party Letter*(《党内通信》)(April, 1952), p. 40.

問題達成協議。^① 后来，印共由于拒絕和一个較大的議會集团合并而受到海得拉巴的人民民主陣綫中的过去的同盟者的批評；印共回答說，它曾试图在各反对派当中成立一个“統一行动委员会”，但它仍然坚持，共产党党团必須以自己的名义采取行动。^②

虽然共产党沒有同其他友好的党团正式結成同盟，但它在进入国会的最初几年間却运用了列宁主义的議會策略。共产党議員很快就学会了議會程序这个复杂的手段，他們利用一切机会揭露政府的政策，为人民的疾苦而陈詞，并且提出具有宣传作用的立法議案。

議會中对付政府的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质詢阶段。同英国的下院一样，印度国会的會議程序通常是从质詢阶段开始的；在这个阶段中，政府的部长回答各个議員事先用书面提交給他們的問題。回答以后，还可以接着提出一些有限的“补充問題”(就是針對这个題目再口头提出一些問題)，之后，經常就要发生一場唇枪舌剑的尖銳的交鋒。因此，质詢期間就使反对派不断有机会向政府提出挑战，而且可能弄得政府狼狽不堪。共产党人十分巧妙而且不厌其煩地一再使用这种办法。他們质詢的問題通常范围很广泛，涉及到政府的政策和活动的各个方面，不断地挑剔一些有利于他們宣传的缺点。印共后来吹嘘道，从共产党議會党团的人数所占的比例来看，共产党党团所提出的质詢問題，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党团所提出的，一个共产党議員在所有的議員当中表现得最突出的是，他提出的质詢問題最多。^③

① M. R. Masani,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 R. 瑪薩尼：《印度共产党》)(London: Derek Verschoyle, 1954), pp. 169—170.

② *Communist Conspiracy at Madurai*(《共产党在馬杜賴的陰謀》)(Bombay: Popular Book Depot, 1954), pp. 147—148.

③ A. K. Gopalan and Hiren Mukerjee, *Communists in Parliament*

向政府挑战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提出休会的动議——这个动議就是把国会預訂的事項拖延下来，以便討論某个紧急的社会問題。这样的动議在印度国会中是屡见不鮮的，但很少为議長所采納，因为議長有权决定这个問題是否十分重要而且有无充分理由非另行展开辯論不可。到1957年为止，在国会中提出的休会动議共一百二十二次，其中由共产党人提出的足有半数。所涉及的問題往往据說是和政府过錯有关的社会騷动或灾难方面的事情。^①

其他的办法还有：对具有社会意义的事項提出非正式的決議案并且进行半小时或半小时以上的特殊“討論”——这两种办法中的每个办法都能給反对派以展开辯論的机会。在六十一次的特殊討論中，有二十九次是在共产党人倡議下举行的，討論的問題范围从工矿事故和水灾直到水泥工业問題，从加尔各答港的航运业主的行为直到国民儲蓄計劃中的不法行为。^②共产党人提出的許多非正式決議案，所涉及的就更是大問題了，諸如煤矿国有化、按語重划各邦以及集体談判权等等。^③

共产党人在国会辯論中的活动

但是，也許是在国会的立法辯論中，人們才能十分清楚地看出共产党最初几年中的国会活动的特点。举几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辯論事例，就可以說明印共所采取的方法。

一个富有戏剧性的事例就是对預防性拘留法案(第二修正案)所进行的辯論。預防性拘留法本来是在1950年通过的，1952年

(A. K. 高普兰与喜冷·穆克吉：《共产党人在議會中的活动》(New Delhi: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7), p. 7.

① 同上，p. 6.

② 同上，pp. 7, 52—53.

③ 同上，pp. 49—50.

經临时国会通过予以延期。这项拘留法是根据宪法规定而制订的；宪法规定說，中央政府或各邦政府有权不經审讯拘留人犯。但須受某些具体限制。它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人的；内政部长对国会所作的报告就可以表明这一点；报告說，到 1951 年底，在被拘留的一千六百四十一名人犯中，有一千一百六十名是共产党人^①。新国会于 1952 年 5 月召开会议后不久，政府就提出了預防性拘留法案（第二修正案），要求稍作修改后将此法予以延长。

立法条文很少有像这个条文那样使得印共大为激动的。但是应当注意到，印度的大部分非共产党的輿論是反对这个法的，认为这样侵犯民权沒有必要。

辯論是以內政部长 K. N. 卡德朱为该法案进行辯护而开始。卡德朱的发言一再被来自反对派席位的那种超乎惯例的詰难所打断，于是他便进行还击，指責共产党人一心要在国内制造“騷乱和糾紛”。^②他在发言的稍后部分中又重新提出对共产党人的指責，并且还給他們加上罪名說，他們在战争时期曾同英国人进行勾結，而且现在还在勾結教派分子反对辯論中的这项法案。

国会中由此而发生的騷乱情况使得議長不得不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这一行动在国会里就是要迫使全部議員归座并保持安靜。反对派中某些提出质問的議員还不肯坐下，于是議長便威胁說，凡是不立刻坐下的人都要被驅逐出会场。S.S. 摩尔（孟买邦的一个小党——农工党的議員）显然不听劝告，因为議長后来宣布，他“最好立刻离开国会”，于是摩尔便退席了。

① *Parliamentary Debates, Parliament of India, Official Report* («印度国会辯論记录；官方报告»), Vol. I, no. 18, Feb. 28, 1952 (Delhi: Manager of Publications, 1952), column 1544.

② 同上, Vol. III, no. 11, July 17, 1952, columns 4067—4068.

共产党的議會党团領袖喜冷·穆克吉起而为摩尔辯护，于是他和議長之間便发生了一場唇枪舌剑的爭吵。接着，議長又指責另一个共产党議員 K. A. 南比阿打断別人发言的次数太多，而南比阿却反駁說議長“不公平”。南比阿因为这样严重破坏国会礼节而被指令离开会场，但他拒絕离开，于是警卫便走向前来把他帶了出去——这是印度国会史上十分罕见的事情。

这时，穆克吉起来为南比阿的行为辯解。但是他的言外之意表示議長有失公允，他还宣称，共产党党团馬上集体退出会场，直到紛爭平息为止，言下之意是以此表示抗議。总理出来为議長辯护，并且威胁說，凡是效法南比阿的議員，一律停职。

过了几个小时，穆克吉回到了会场，发表了共产党反对这项法案的一篇重要演說。他說，这个法案“臭气冲天”，是受“毒恶”动机的驅使而提出来的。他說，这种警察国家的立法，具有資产階級民主的性质，因为資本主义制度需要把实际权力保持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手中。他向任何一个国大党議員，包括总理本人在內，进行挑战，問他們敢不敢放弃自己的席位而在預防性拘留这个問題上竞选。他认为不服从那些“坏得”叫人不能接受的法律是人民的一种“生而具有的权利”，他要維護这种权利。他在結束时嘲笑政府說，人民仍然“对于你們的領導抱有某种幻想”，但不要把人民逼得“发疯”。他說，无论如何，政府还没有理由“手忙脚乱”地制定像預防性拘留那样的非常时期的立法。虽然穆克吉的演說的主調显然帶有挑衅性，但是由于引經据典地引用了一些历史上的或法律上的先例，并且还提到了寇克、索罗和肖伯納的一些說法，这种挑衅性的調子就变得緩和了。^①

① 同上，Vol. III, no. 12, July 18, 1952, columns 4070—4174.

这次辯論又延續了五天，激动的声調放低了。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要求公开散发这个法案以便征詢公众的意见。这个修正案以三百一十二票对六十八票被否决。共产党党团領袖 A. K. 高普兰在最后的一次发言中宣称，这个法案的通过，就是“政府的丧钟”。但是这个法案却以二百九十六票对六十一票被通过。^①

这决不是一次“普通的”辯論，但它确实表现出共产党早期的議會活动的一个方面。退出会场和捣乱虽然不是共产党人独享的特权，但也并不是罕见的。

在对預算进行第一次一般性的辯論中，也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做法。共产党的主要做法(这次还是穆克吉出头的)，暴露出印共的演說的挑畔性质和浓厚的宣传色彩。他一开始說，議會由于在他以前发言的国大党議員大放“厥詞”因而臭气充斥，成了个“煤气室”，因此他在这种气氛中起来发言，实在感到有点“精神不振”。由于这种冷嘲热諷，穆克吉受到主持會議的副議长的严厉斥責。他的演說后一部分就是詳細列举出政府政策中的种种錯誤，特别是作了如下的指責：稅收政策的特点就是对待“大財閥”“百依百順”；国防力量“死心塌地地依靠”英美的“破銅烂鉄”；政府对待失业問題表现出“束手无策”；政府頑固地拒絕利用同共产党集团各国进行貿易的好处。最后他下定义說，政府就是“一摊泥人，一摊烂泥人”，并且还問道，这一帮人在“我們的自由的幌子下”究竟正在干什么？^②

从这些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党在印度国会中的作用，从一开始起，其特点不仅表现在对执政党的不尊重(这在議會中的

① 同上, Vol. IV, no. 7, Aug. 6, 1952, column 5753.

② 同上, Vol. I, no. 15, March 3, 1953, columns 1405—1417.

反对派来说本是常事),同时还表现在对政府体制的不尊重。印共不是把国会当作一种取得政治和平变革的机关,而是根据斯大林的定则,把它当作是进行群众斗争的训练场所。

印共在各邦中的活动

在1951—1952年的大选中,印共聚集了相当大的实力而出现在各邦议会中。尽管它只获得了邦议会选举中人民选票总数的4.4%,但它至少在四个邦里设法占有大量的代表席位:马德拉斯邦(六十二席),西孟加拉邦(二十八席),海德拉巴邦(人民民主阵线的四十二席),特拉凡哥尔-柯钦邦(左派联合阵线的三十二席)。它还在阿萨姆邦、孟买邦、迈索尔邦、奥里萨邦、旁遮普-东巴地阿拉联邦和旁遮普邦的议会中获得了一些零星席位,同时它还在曼尼普尔和特里普拉的选举人团中拥有相当多的代表。印共得到的席位总数(194席),超过了国大党以外的任何一个政党所取得的席位。^①

在几个邦的议会中,共产党的实力非常强大,因而使得国大党的控制岌岌可危。这种成就以及在中央选举中所获得的成就,使得印共有理由兴高采烈起来。中央委员会的一个评价选举结果的秘密报告说,国大党“遭到了它有史以来最大一次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失败”。报告预言“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并以其为主的各民主党派的联合,能在许多邦里取代国大党的统治。”因此,在邦一级中,印共看到了它取得政权的希望。虽然它在选举之前所抱的目的是消极的,就是要通过议会投票迫使国大党政府下台,代之以任何

^① Fisher and Bondurant, *The Indian Experience*... (费希尔与邦杜兰特:《印度民主选举的经验》), pp. 50, 53.

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但它现在却轉而抱着一种积极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議会投票而使共产党控制的政府上台。^①

为了弄清楚党在选举中所取得的意外成就的原因究竟何在，印共中央委员会首先指出，那里的群众斗争在“恐怖和镇压的威胁下”及早展开，那里的党的工作就有成绩；明白说来，就是在党组织了武装起义的地方——主要指海得拉巴邦的堆楞加那地区。但是由于印共现在不采取武装起义，因此它就不能使用那种办法进一步加强它在选举中的力量。其次，中央委员会还指出，在组织农民给予支持的地方，党的工作有成绩，而在絕大多数的工业地区，党的工作就没有什么成绩。但是它断言，党“在这些城市中、在这些城市的工人阶级中不能成为一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也就不能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政治力量”。因此，报告有意极力贬低农民在党的力量壮大中的重大意义。

报告接着指出了第三点：灵活的统一战线策略很成功，这个策略以强调团结为重点。第四，报告承认，提出换个政府这个口号是起到实际作用的。报告最后指出，印共在哪里有效地利用语言地方主义这样一个“民族”因素，它就可以在哪里昌盛起来。^②

最后三点显然对印共更具有意义。它们被交织地运用在未来的竞选策略中；它们预示印共要在利用地方主义者的忠实和不满的基础上和地方党派及地方组织进行合作。这个策略是印共的一个向国大党挑战的特别有效的办法。这就是印共实现自己的总战略的主要办法；这个总战略就是联合印度各地方的四个主要阶级，反对中央的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

① *Party Letter*(《党内通信》)(April, 1952), pp. 1—11.

② 同上, pp. 15—24.

印共在各邦中的前景

印共中央委员会由于在 1951 年以后遵循着这种竞选策略，因此它宣称，印共在印度北部說印地語的地区内的基本任务是要促进农民給予更多的支持，但在印度的其他地区，它必須加强語言邦运动并提出其他的地方問題。因此，印共必須和其他的地方政治力量結成更加紧密的联系。这就意味着要同其他党派和集团达成正式协定，而不是向个人发出的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統一战綫”的呼吁；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阶段所作出的另一个決議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決議說，在“民主陣綫”中，决不可能有个人成为其成員。但是，其他党派的个人可以加入諸如工会这样的群众組織，而工会再作为一个組成单位加入到这个陣綫中去。^①

几乎在选举刚刚結束的时候，共产党人就首先看到了在邦一級中取得政权的可能性。在馬德拉斯邦議會中，国大党沒有取得多数地位；因此共产党人便乘机和其他左翼政党組成一个联盟——民主联合陣綫，希望成立联合政府而取得政权。但是国大党在 C. 腊札果巴拉札利的领导下，从无党派人士那里拉攏了足够的力量，組成了政府。

在新成立的安得拉邦(一年以后建立的)，共产党人的前景更加更好了。安得拉邦議會是由从前在馬德拉斯邦立法机关中的代表这个地区的那些議員組成的；在这个邦議會中，虽然共产党和国大党都不居于多数地位，但共产党議員在人数上实际超过了国大党。不过，在安得拉邦里，仍然是国大党設法建立了一个組織政府所必需的联盟。大約一年之后，国大党政府垮台，因而重新举行一

^① 同上, pp. 37—49.

次邦的选举,这时共产党人便又有了机会。但这一次,安得拉邦的共产党人不仅未能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統一战綫,而且由于个人和集团的叛离还丧失了一部分现有的力量。这种情况再加上地方情况比較特殊,因而使得共产党在1955年的安得拉邦选举中显得預料不到的无能为力。^①

印共中央委员会在討論这次挫敗时把它主要归咎于未能运用灵活的統一战綫的策略上。安得拉邦的印共組織曾經处于孤立地位,因为国大党在同其他党派和集团取得協議方面,胜过了印共組織。^②因此,安得拉邦的选举又进一步刺激了印共要采取一种新的联合其他地方政治力量的策略。

在特拉凡哥尔-柯欽邦中,統一战綫联盟的策略获得較大的成功。第一次大选后,国大党执政;在不稳固的国大党政府执政一个时期之后,就有必要重新进行一次选举。共产党成功地团結了左派联合陣綫,而且使联合陣綫同社会党之間就竞选达成了協議,大意是:双方候选人不得彼此竞争。因此,实际上在所有的选区中,国大党都遇到了这个或那个左派政党的直接竞争。这种形势通常被人认为是政治上的“突出事件”,因此人們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視着这次选举运动。^③

但結果出现了僵局,党派的相对力量大体上保持原状。社会党在国大党的暂时支持下成功地組成了邦政府,但是共产党仍有理由指望在經過另一个不稳固的阶段之后取得政权。

① Marshall Windmiller, "The Andhra Election" (馬歇尔·温德米勒:《安得拉邦的选举》), *Far Eastern Survey*(《远东概览》), XXIV(April, 1955), pp 57—64.

② *New Age*(《新世紀》), II(April 3, 1955), p. 8.

③ *Times of India*(《印度时报》)(New Delhi), Dec. 28, 1953, p. 4.

印共最近的議會活动

在 1957 年的第二次大选之前的一两年里，印度共产党遵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适当地对尼赫魯政府表示友好的新路線，因而在議會中的态度和作法都显然溫和起来了。这种变化明显地表现在共产党进行議會辯論时的发言語調和发言內容两个方面。

举例來說，喜冷·穆克吉在 1954 年就預算問題进行一般性辯論时的发言，可以同上述的、他在 1952 年所作的发言比較一下。首先是冷諷热嘲少了。穆克吉 1954 年的发言一开始就談到財政部长。他說，这个預算“可能是他的最糟的一个預算，它說明很多問題”；这种說法虽屬輕率但却不帶諷刺。穆克吉还說：“我們大家都对这位財政部长有好感。”而且，共产党人批評的內容也比較溫和了。穆克吉沒有把預算說成是罪恶或腐敗，而是說它“令人泄气而沉悶”。一般說来，他是采取向政府提出建議的形式而进行批評的，他提醒說这个預算“不能起振奋人心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我們的人民要建立一个比較合乎心願的嶄新的世界所絕對不可缺少的”。^①

共产党在国会中所提出的建議，其性质看来也有了变化。印共最近提出的非正式決議案，看起来像个真正的立法文件而不單純是个宣传材料。正如《新世紀》周刊所报道，共产党人在 1956 年中提出了种种重大的、詳尽的建議，要求修改矿山法、机动車輛法、工人补偿法和工厂法以及煤炭工业和制茶工业国有化的法案。

如果认为印共已然放弃了把議會和議會活动看作是起輔助作

^①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the People, Official Report* (《国会人民院辯論記錄；官方報告》), Vol. II, no. 24, March 16, 1954, columns 2338—2349.

用的东西这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这显然是失于輕率。但是印共显然认为有必要至少在行动上要作出它仿佛是一个負責任的、忠心耿耿的反对派。

然而除开这一点而外，至少还有这样一种可能，即目前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中的这场意識形态上的紛歧（特別集中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个問題上），将会促使共产党人对于議會活动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中的作用問題，产生一种新的观点。1957年和1958年中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有助于說明这种可能。

第二次大选和喀拉拉邦

在印共为 1957 年的大选进行准备时，它在它认为可能組成一个接替政府的几个主要的邦里，加倍地努力寻找同盟者。在孟加拉邦，印共設法在印共、人民社会党、革命社会党和前进集团中的馬克思主义者与魯伊克尔分子中間达成了一项前所未有的竞选協議；根据这项協議，各党派不仅在候选人上而且还在共同綱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安得拉邦，印共恢复了人民民主陣綫，并在这个陣綫和人民社会党之間就竞选問題达成了部分協議。在孟买邦，印共同統一馬哈拉施特拉协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合作。^①

选举的結果再一次使得印度共产党人欢欣鼓舞。虽然他們在中央国会中的收获不大，只增加了四个席位，但他們在邦議會中却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就。首先，尽管他們在像馬德拉斯这些地区失勢，但是他們现在在許多过去他們实际上沒有立足余地的地区內，却成了一个不容忽視的政党：在北方邦、拉賈斯坦邦、迈索尔、中央邦和比哈尔邦，由于他們的种种表现第一次給人以深刻的印

^① *New Age*(《新世紀》), IV(Jan. 6, 1957), *passim* and IV(Jan. 20, 1957), *passim*.

象；他們在像旁遮普和奧里薩各邦中，也有所收获。

但是，他們在喀拉拉邦的成就超过了在其他所有各邦中的成就。这个邦是在重新划定各邦时由馬拉巴尔邦和特拉凡哥尔-柯欽邦合并而成的；在这个邦中，共产党人通过选举而以一個最强大的单一政党出现。他們在邦議會中由于同他們在选举中曾經支持过的五个无党派人士結成联盟因而形成了明显的多数。因此，邦长邀請共产党领导人 E.M.S. 南布迪里巴德組織政府。印度的第一个共产党邦政府——也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由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政府——就职了。

在喀拉拉邦发生的事情很可能对印共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也許会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影响。印度共产党人早期的議會活动經驗，不过只是証明了这种活动可能在准备夺取政权的时期成为加强党的力量的一个有用的輔助性的武器。但是喀拉拉邦的經驗表明，議會活动本身可能是取得政权的直接道路。这个事实所具有的影响，无疑地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喀拉拉邦不过是印度联邦中的一个邦，而且那里的共产党政府还没有証明它能保住政权。但这种經驗仍然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統学說提出了明显的挑战。

如果真能对共产主义理論作出根本的修正，那将是相当长的以后的事。但在这个时期里，印共很可能愈来愈把它的精力集中在議會斗争的舞台之上，特別集中在印度邦一級的政治上面。

第二十章 民族問題和民族團結

布尔什維克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

对列宁和俄国的布尔什維克來說，当时，“民族”問題不是抽象理論的課題，而是国内政策的一个严重的問題。沙皇統治下的俄罗斯帝国是个多民族的实体，許多民族混合杂处：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欧洲斯拉夫人到中亚細亚的突厥族。这个由一个民族——莫斯科大俄罗斯人——征服和統治而联合起来的帝国，其种族之多，同过去英、法两个全球帝国不差上下。同它們一样，俄罗斯帝国也造成了使許多弱小落后民族从属于它的局面，而这些民族对帝国主义統治是深恶痛絕的。对任何一个反对沙皇政府的政党來說，这种局势显然是一种挑战和机会；这样的政党不能不提出解决民族問題的新办法，而且它还可以在政治上利用这种由旧局势所造成的不滿。因此，早期的布尔什維克綱領，不仅一般地迎合了整个被压迫階級的心意，而且也迎合了沙皇帝国各被压迫民族的心意。这就是說，布尔什維克的綱領兼备了反資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方針。

但是，这种兼备两种方針的綱領，并未完全融洽地結合起来，反而使布尔什維克陷入某些思想意識上的难题中。在馬克思主义者看来，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資產階級的现象；它是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首先是各个民族集团或“民族”的新企业家階級爭夺市場的一种表现。它可能在封建帝国里出現，那是因为新兴的民族資產階級要求摆脱中央的那些居統治地位的地主貴族而独立；它也可能在資本主义帝国中出現，那是因为地方資產階級要

求摆脱中央的那些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独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起源于独霸经济市场的欲望，因而自然会导致政治上的分治，或使帝国按民族构成而分割；这样，“民族”就变成了民族国家。

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主要推动者不是民族而是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到处都是一样的，因此，他们要求的是国际团结而不是民族分治。既然民族主义只不过意味着支持一个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反对另一个资产阶级统治集团，那么，无产阶级为什么还要拥护民族主义呢？

1912年，列宁指定年轻的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领袖斯大林写一篇确定民族问题的含义的文章；从那以后，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就成为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政策的试金石。^①斯大林首先致力于对民族的概念下定义，他说一个民族必须具备以下特征：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经济上的联系和共同的文化或“心理素质”。他说，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个民族。

但在承认了民族的存在之后，斯大林只给了它们一些符合无产阶级的目标的权利，这就是把民族意识减少到最低限度，而把阶级意识提高到最大限度。斯大林说，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是要不得的，因为这会由于引起民族纠纷和民族仇恨而阻碍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和团结的增强。民族平等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因此，一切民族均应享有自决权。斯大林说，这种权利包括分离的权利，但是一个民族是否应当实际分离出去的问题，还须根据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来决定。

根据这一点，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证明顺应民族地方主义的

^①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9—358页。——奥佛斯特里特先生于1956年4月在东方学协会会议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曾包括了本章的某些部分。

要求是正确的，这种民族地方主义表现为应許自决——包括自治或分治的权利。布尔什維克就这样同沙俄帝国各被統治民族联合在一起来反对沙皇政府。

但是在布尔什維克随着十月革命而掌握了这个帝国的中央政权之后，他們自然又认为把各民族合在一起对他們有利。因此，为了实现其国内目的，他們就強調民族团结；他們断言，对任何一个民族來說，留在由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所統治的联盟内都是符合它們的利益的。但在国外，他們有着采用革命前的民族政策而取得很大效果的机会，于是共产党人就在世界各地同被統治民族联合在一起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政府。

在 1920 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詳細地論述了在全世界采取布尔什維克民族政策的問題（见第二章）。他說，在殖民地，民族主义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統治，就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因此，这些被統治民族中的共产党人，必須一方面联合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而同时要建立自己的独立力量以便实现夺取民族主义力量领导权的最后目标。列宁論証，支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战略，将会对殖民地的共产党人有利，因为这种战略将使他們能够在順应民族主义情緒的基础上同群众保持联系。而可能更重要的事实是，这种战略有利于俄国共产党人，因为它会破坏那些威胁着新成立的布尔什維克政府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各殖民地国家爭取独立的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大致发展到順利参加了当地民族主义运动的程度。在中国和越南，他們像列宁所希望的那样，掌握了民族主义运动，并且在要求政治和經濟独立上成为主要发言人。但在其他地方，他們未能达到这个最后的目的，例如在印度，民族独立就是在传统的“资产阶级民族”领导下取得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建立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共产党人继续利用残余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此他们声称，这些新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他们的国家仍然服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单就这些政府未能实现预期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善（这二者被认为是独立的果实）而言，这种战略已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

但是，除利用旧式民族主义外，又在这个题目上增加了新的花样：即在新兴国家内部利用人种地方主义或亚民族地方主义，这也是向布尔什维克利用俄罗斯帝国各被统治民族的办法学来的。

以前共产党人把亚洲的每一个殖民地都看作是单一的民族，后来他们却重新确定其中有許多是多民族的实体。诚然，有一些新国家由于是由不同的亚民族成分组成的，因而存在着人种差别；但是，共产党人却把这些亚民族成分提高到“民族”的地位，并支持他们来反对新的中央政府的抱负。例如在缅甸，共产党人断断续续地支持克伦族和克钦族叛乱，支持阿拉干族* 的自治要求。在泰国，他们曾设法鼓动穆斯林马来人的民族统一主义的要求。在锡兰，总的说来，他们是支持泰米耳人的。

印度为这种新政策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在本书第一编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作历史的概述时，曾简略谈到这种政策的发展情况；在本章中，将对此作更加详细的讨论。

印共的民族政策的出现

虽然印度次大陆文化的多样性自然而然成为各种地方主义思潮的基础，但印度国大党几十年来曾成功地把英属印度的各种文

* 即若开族，居住在缅甸西部。——译者

化成分大部分团結在一个单一的政治組織中，因为这个組織表达了要求摆脱外国統治的共同願望。但这种团結越来越受到两个主要的分裂因素的挑战，即語言地方主义和教派主义。

在这个次大陆上有支系繁多的語言和方言，其中十二种可以被认为是主要的語言，即：印地語、烏尔都語、旁遮普語、馬拉地語、古季腊特語、泰卢固語、泰米耳語、孟加拉語、甘那达語、馬拉雅拉姆語、欧利雅語和阿薩姆語。此外，还可以加上另一些重要的方言，如克什米尔語、信德語、比哈尔語和拉賈斯坦語。除了烏尔都語是穆斯林所用的語言外，上述各种語言都是传达某一个別地区的文化的工具。^①

在二十世紀头几十年內，这些地方民族集团的民族意識大大地增加了；这表现在孟加拉人反对寇松分割該地区而发生的騷动上，表现在說泰卢固語的安得拉人的文化組織程度日益增加上，以及表现在时而出现的“語言邦”运动上。1920年，国大党本身就已承认以語言原則为其組織的基础，并基本上按照地方語言集团的划分，建立了二十一个分支机构，或称“国大党省組織”。在全印度，主张以同样的原則改变行政区划的情緒迅速地增长起来。这样，地方主义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但应当着重指出，这种情緒并没有达到要求分治的程度；地方語言集团决心要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实行自治，但并非是完全的独立。

但威胁性更大的分裂因素則是教派主义。尽管国大党自称是非宗教的組織，但穆斯林越来越多地加入了穆斯林联盟。虽然該联盟在1937年的选举中成就不大，只得到很少一部分穆斯林选

① 关于这个問題，主要可參閱馬歇尔·溫德米勒：《印度的語言地方主义》(Marshall Windmiller, "Linguistic Regionalism in India"), *Pacific Affairs*(《太平洋季刊》), XXVII(Dec., 1954), pp. 291—318.

票，但后来却清楚地表现出它有着强大的力量。1940年3月，它正式通过一项决议，极力主张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并要求建立单独的穆斯林国家，即“巴基斯坦”，这时它就引人注目地争取群众的支持。因此，穆斯林地方主义就发展成为公开的分治主义了。

穆斯林联盟采取建立巴基斯坦的口号，显然引起了印共的巨大兴趣。有几个月的时间，印度共产党人显然是处在重要的调整过程中。虽然这个过程的现象并没有一下子就显露出来，但它终于使印共彻底重新考虑了它对印度民族构成问题所持的态度，因而也重新考虑了它对印度民族主义的性质所持的态度。

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就是出现这样一种观点：印度国大党肯定未能将这个次大陆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在单一的民族运动之中，换句话说，就是未能解决印度的教派问题。这种观点出现在印共领导人 K. M. 阿什腊弗博士于1940年6月发表的一篇非正式声明中。^①阿什腊弗是一位穆斯林共产党员，并且是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他断言，建立巴基斯坦的口号的吸引力“在广大的穆斯林中间产生和发展起来了”，“我毫不犹豫地重申，责任几乎全在国大党领导人身上。”他说，穆斯林的分治愿望的产生，是国大党领导根据反动的印度教原则而不是根据进步的社会理想来考虑印度自治问题的结果。他说，这个资产阶级领导集团已经表明它根本不能进一步领导印度革命了，因此，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便不难使广大的穆斯林相信，国大党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

阿什腊弗谴责建立巴基斯坦的口号，说它是“中世纪观点”的产物。但很显然，他一方面反对穆斯林联盟所主张的那种穆斯林自决，但他并不反对穆斯林自决主张本身。他本人倒似乎确被这

^① Dr. K. M. Ashraf, *Pakistan* (K. M. 阿什腊弗博士：《巴基斯坦》)，(Delhi: Adabistan, 1950), pp. ii-v.

种主张所吸引。他說，“除非是关联到一个革命政党的策略和战略”，否則根本不产生成立印度教徒、穆斯林或錫克教徒的主权国家的問題。^①他說，自决的口号“只能意味着动員教派中的落后群众参加反帝斗争”。这样，在阿什腊弗的意见中就暗示出，他深刻地了解，迎合穆斯林地方主义要求是得策的，他是贊成由一个“革命的”政党利用这种要求的。

在印共内部，尤其是在阿什腊弗积极参与的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员当中，这种观点显然很普遍。在1940年底，他在全印学生联合会的年会上又一次发表了这种观点。全印学生联合会中的共产党党团在同非共产党分子分裂后，在阿什腊弗亲自领导下通过一项決議，宣称国大党已不能解决教派問題，并建議自由的印度应该是一个“各地方邦自願組成的联邦”。（见第九章）

就整个印共來說，还没有正式接受穆斯林自决的思想。这样作似乎会严重违背它的意識形态体系，因为根据列宁斯大林主义，自决是民族的特权，而不是教派的特权。要利用这个口号，印共就必须确认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不这样的话，它也得确认穆斯林是一些民族。它是按后一种办法做了。印共鼓吹这样一种观点，即印度人民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多民族的集体，其中一些民族是穆斯林，一些是印度教徒。

采取这一步驟的第一个表现，就是1941年5月在印共内部传閱的一封党内信件，其中論述了印度是多民族国家这一新概念。^②但正如印共领导后来所承认的，这个新方針在印共内部遭到了普

① 同上，p. *iii*. 黑体字系作者所加。

② 作者未获得这一文件，仅是通过第二手資料得知的；见G. 阿提加利：《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民族团结》（G. Adhikari, *Pakistan and Indian National Unity*）（London: Labour Monthly, [1943?]），pp. 16—17.

遍的反对；这封信引起了“誤解和怀疑”，有些同志引用了 R. 帕姆·杜德早期著作关于印度是一个单一民族的提法，以此作为根据来表示反对。^①因此，这个新的方針暂时就沒有公开宣布。

直到一年以后，即在 1942 年年中，印共才正式公开采納了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观点。于是，通过党的出版物广泛传布这一方針，而且 9 月里，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会通过的決議中对該方針作了十分詳尽的論述。（见第十章）決議在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了斯大林对民族的概念所下的定义之后，划分出十六个印度“民族”：“巴檀族、西旁遮普族（主要是穆斯林）、錫克族、信德族、印度斯坦族、拉賈斯坦族、古季腊特族、孟加拉族、阿薩姆族、比哈尔族、欧利雅族、安得拉族、泰米耳族、加尔那达克族、馬哈拉施特拉族、喀拉拉族等”。^②印共提出的印度民族表，大都是根据既定的語言—文化集团来划分的。

这个決議是很重要的，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它把这些集团提高到正式民族的地位，从而使它們有权取得完全独立。但它的最显著和最重要的特点是它有很大的灵活性。首先，在民族表的末尾有个“等”字，这显然表明它不是包罗无遺的。此外，把孟加拉人划为一个民族，同決議的另一条相矛盾，这一条說：在孟加拉东部和北部地区占人口多数的孟加拉穆斯林有权单独成立一个邦。但这个決議的灵活性的最主要表现是，它试图同时滿足地方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的利益；它承认分离权，但却声称，既然这种态度会使穆斯林安心，因此就足以保証团結。

这种灵活性清楚地表现在一个說明性的引言当中，据說这个引言就是 G. 阿提加利在中央委员会會議上提出該決議时所作的

① 同上，p. 17.

② 同上，pp. 30—32.

发言的“全文”。^①阿提加利在发言中说，不需要“作详细的人种学的考察”，也不需要就民族问题将来的政治解决办法的性质提出什么刻板的方案。他说，只须作“一般性的研究”就可以了。在他论述具体事例时，他的意思就比较清楚了。

以信德为例。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信德的穆斯林算一个民族呢，还是全体信德人算一个民族？我认为全体信德人构成一个单独的民族。给予他们自决权，当然也就满足了信德的穆斯林的愿望〔他们占大多数〕。一个坚持己见的人为了争辩可能会问：一旦就分治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时，是让所有的信德人投票呢，还是光让信德的穆斯林投票？回答是：这个问题必须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没有产生，它完全取决于这个运动的产生和开展的方式。我们所采取的不是立宪主义者的方法；只要给信德人以自决权，就足以解决今天的团结和联合斗争的问题。^②

总之，只要应许自决就完全达到了印共的目的，这种目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团结”。而这种“团结”的意义，在阿提加利论述孟加拉族时就更加清楚了。他说，诚然，“孟加拉人构成一个民族”，但另一方面，东孟加拉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具有一种“特有的文化背景”，因此是一个“单独的实体”。他最后说，根本没有必要解决下面的矛盾：“问题的症结是：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团结东孟加拉的被压迫的农民来进行共同的斗争？”看来，这个目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团结。正像阿提加利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采取印共的新政策所依据的基本准则，首先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掌握了一种武器，可以在此时此地团结广大的穆斯林群众，并孤立分治主义者？”^③

但是，革命的团结和民族团结并不是一回事。虽然印共坚持

① 同上，pp. 5—30.

② 同上，p. 28. 黑体字系原有。

③ 同上，pp. 29—30. 黑体字系原有。

說，只要应許自决就会出现一个統一的印度，言下之意是說印共到时会倾向于反对分治，但阿提加利的“基本准則”的第二条却又是另外一种說法了。这条准則是这样一个問題：“我們在給民族下定义时是否让每一个民族都能在一个联邦制的民主印度中充分而自由地发展？”他在另一个地方断言：“我們在划分民族的时候應該让各民族都能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印度**繁荣壮大，向社会主义发展。**”这样，印共又表示它打算鼓励地方主义情緒；此外，印共还拒絕应許在将来反对分离。因为虽然阿提加利譴責每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分治主义傾向”，而且也附帶提到“为共同的革命斗争而团结”，但他却根本不提正統的共产主义民族理論中那种主要的团结方法，也就是这样一条原則：自决权只有在对无产阶级有利的情况下才能行使。他最后說：

怎样、何时、是否实行分治等問題，不能也不應該在今天决定。給予分治权不应同实际运用这种权利相混淆，也不应当同某些实际以分治作为权宜之計的具体情况相混淆。后一問題只能在某个具体的时刻、某一具体的情况下，根据整个社会的发展来决定。^①

因此，总起来說，1940—1942年表现出来的印共的新民族政策，似乎是打算使印共能够在各穆斯林集团中，进而最后在印度所有的地方民族集团中造成一种“革命的”团结。

策略上的灵活性

随着印共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的演变，印共的民族問題綱領越来越偏向于穆斯林联盟，并公然同意了穆斯林联盟在巴基斯坦問題上的立場。印共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关于孟加拉和旁遮普这两个重要地区应如何安排的爭論中所持的立場，就可以

^① 同上，p. 29. [这一段在原书中系用黑体字。]

証明这一点。印共的路綫对穆斯林联盟作了重大让步,并在 P.C. 約希所写的两篇不寻常的文章中加以宣布。这两篇文章在 1944 年中发表,后来以小册子的形式刊行。^① 約希在文章中不是主张建立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独立国,而是主张建立三个独立国,因为他建議让孟加拉也获得主权。

从整个孟加拉看来,穆斯林居多,但也多得有限;东部和北部地区穆斯林居多,其余地区則印度教徒居多。以前,印共曾建議按照这种情况把孟加拉划分开,但穆斯林联盟要求把孟加拉划归巴基斯坦。现在約希声称,孟加拉应该成为一个享有“主权和独立的統一国家,”它将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都保持“相互支援和在經济上友好合作的关系”。这种解决法显然有利于穆斯林联盟,因为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对整个孟加拉而不是仅仅对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扩张势力了。实际上,这个新国家可能会同巴基斯坦合作,但約希并未提到这一点。

按照約希的建議,独立的孟加拉将不是通过公民投票而是通过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協議来建立。这个協議同时也决定这个新国家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說,內部的教派問題,将由苏联式的两院制議會加以解决。他不顾印共以前关于印度教的孟加拉族和穆斯林的孟加拉族是具有不同文化的不同民族的論断,而声称,“孟加拉族,不論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在內心深深認識到,自由的孟加拉必須是統一的孟加拉。”

关于另一个有爭議的地区,即旁遮普(“中旁遮普”)东部的六个县,約希提出了一个同样有利于穆斯林联盟的解决方案。在所有有爭議的县份中,錫克教徒是人数众多的少数,在所有这些县份

^① P.C. Joshi, *They Must Meet Again* (P.C. 約希:《他們必須重归于好》)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4), 44 pp.

中，除了一个县份以外，錫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合在一起又构成了多数；穆斯林只在一个县份中占多数，而且只是微弱的多数。但約希宣称，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六个县都划归巴基斯坦。他还建議簽訂一个“穆斯林—錫克教徒条約”，以保障穆斯林政府統治下的錫克教徒的权利。他說，“錫克教徒絲毫不用担心。”

毫無疑問，在穆斯林联盟承认錫克教徒的自决权的基础上达成一个解决办法是可能的，只要錫克教徒反过来也承认穆斯林的自决权，并願在两族人民共同願望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統一的旁遮普。

这就是說，約希也认为，为旁遮普举行公民投票是必要的。但他在另一处毫不犹豫地承认，这种做法不能滿足确定錫克教徒乡土的要求。印共曾把錫克教徒說成是一个“民族，”而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占有連成一片的土地。但約希现在又說，錫克教徒其实是散居的，在任何較大地区都不构成多数。他說：“因此不能划定錫克教徒的乡土。”（應該附帶說明，根据 1947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最后达成的領土協議，所有这些县份实际上都划归了印度。随着这一協議的产生，錫克教徒和穆斯林之間也就发生了可怕的內战，可见共产党 1944 年的建議是十分荒唐的。）

在这两篇文章中，約希不仅在領土上对穆斯林联盟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实际上还同意了穆斯林联盟的論点，即全体穆斯林构成一个单一的民族——这种主张同共产党以前的立場是完全不一致的。他承认，不能“根据穆斯林信奉同一宗教”就把他們看作是一个民族，但又认为这“只有一半的道理，”因为各个穆斯林集团都有其共同的政治願望，共同的文化，而且，除了在东孟加拉的人以外，还占有連成一片的土地。但是，他在最后分析中避开了穆斯林成立国家的問題，只在一篇文章的末尾宣称，“这个問題不能以‘模稜两可’的手法加以抹杀，更明确地說，穆斯林要么是一个民族，要么

就不是一个民族！”

这两篇文章，显然是共产党安撫穆斯林联盟的运动的最高潮。印共后来不得不从約希的立場后退，特别是在錫克教徒的問題上，因为直言不諱地声称这个集团不能有“自己的乡土”，已証明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錯誤。1945年，G.阿提加利为旁遮普邦这几个有爭議的县份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这种折衷方案可以满足錫克教徒的正当要求。^①阿提加利放弃了印共以前关于“中旁遮普”应划归巴基斯坦的立場，轉而主张另外成立一个制宪議會来决定該地区未来的地位。他断言，在这种安排下，錫克教徒将会“在政府中享有实权。”但他沒有詳細說明，如何保証这个只占人口三分之一左右的集团取得这种权利。

約希主张在旁遮普問題上举行公民投票，阿提加利却沒有提出这种主张；約希沒有主张在孟加拉举行公民投票，而阿提加利却提出了这一主张。阿提加利在把孟加拉列为一个民族单位时說，应“就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地区的公民投票問題事先达成協議，”这意味着孟加拉有分治的可能。但他在另外一处又非常矛盾地宣称，“由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協議組成的統一的孟加拉，”像旁遮普一样，应由制宪議会的决定来确定它的未来地位。

因此，到了1945年，印共民族政策因为常常修改，而往往丧失了它原来的原則。而且这种演变还使印共站到了支持次大陆分治的立場上。另一方面，印共又用了很大的力气去制造一种相反的印象；例如他們在載有中央委员会1942年关于民族政策決議的小

① G. Adhikari, *Sikh Homeland Through Hindu-Muslim-Sikh Unity* (《通过印度教徒—穆斯林—錫克教徒的团結来解决錫克教徒的乡土問題》)(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5), 20 pp.

册子的第二版中，就加上了一句話，指出“迫切需要團結一致”，^①从而修改了这个決議。印共就用这种和他种方法強調它的政策能促进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團結。

在 1945—1946 年的选举中，印共更广泛和更大力地迎合地方自治的情緒，主张按照它以前所划分的各种“民族”把印度次大陆分割为若干部分。印共在竞选宣言中建議让这些民族“独立自主，”并使未来的印度成为由自由的民族国家組成的邦联（见第十一章）。随着这一竞选宣言的发表，印共民族政策就演变到了最高峰。作为公然主张彻底分治的号召，这一宣言是以后的任何言論所不能比拟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想法

在发表竞选宣言几个月以后，印共由于 R. 帕姆·杜德的明白反对，不得不从主张分治的极端立場上略退一步。后来，苏联的发言人 A. 季亚科夫又在一篇論述印度民族問題的文章中，对印共进一步提出了警告。

季亚科夫于 1947 年中发表的这篇文章，支持印共民族政策的主要原則，但駁斥了它的細节。^② 他承认印度是一个多民族的实体，但不同意印共所开列的民族名单。他就語言和历史作了长篇分析之后，开列了十二个印度民族的名单，认为它們已經“在不同程度上形成”；这些民族就是安得拉族（泰卢固族）、泰米耳族、甘那

^① G. Adhikari, ed., *Pakistan and National Unity* (G. 阿提加利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民族團結》)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4), p. 16.

^② A. Dyakov, “K voprosu o natsional'nom sostave naseleniia Indii” (A. 季亚科夫：《印度的民族构成問題》), *Uchenye Zapiski Tikhookeanskogo Instituta* (《太平洋研究所学报》) (Moscow: 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 SSSR, 1947), I, 223—330.

达族、馬拉雅拉姆族、馬拉地族、古季腊特族、信德族、孟加拉族、欧利雅族、阿薩姆族、巴檀族和克什米尔族。他說，这些民族的形成过程“基本上已經結束了”，但在談到克什米尔族时，他加了一个修飾語：“可能”。

正如季亚科夫本人指出的，这絕不是民族集团的全部名单，因为这十二个“民族”，不管当时还是现在，都只构成印度人口的45%左右。其余的50%人口則居于印度的两个传统文化中心：旁遮普（五河盆地）和印度斯坦（恒河平原）。据季亚科夫說，这两个最重要区域的民族关系，显然是“十分复杂和曖昧的”；他还說，由于地方割据和宗教影响这两种强烈的封建残余，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推迟了。

季亚科夫得出結論說，印度斯坦那里沒有形成单一的民族；他說，經濟的发展可能使一个单一民族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上彻底形成，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許多較小民族的出现。他說，旁遮普的“情况也同样复杂”，但在这个地区，人們有比較充足的理由相信，将来那里会有一个单一的民族兴起；他认为錫克教徒并不是单独的民族。

在承认印度只有十二个民族的时候，季亚科夫言外也就責备了印共那种不成熟的“解决”民族問題的办法。事实上，他在整篇文章中，連提也沒有提到自从1942年就存在的印共綱領，更不要說同意这个綱領了。

但是过了一年，即1948年，季亚科夫改变了他对旁遮普和印度斯坦的民族构成的看法，认为那里还有四个民族——旁遮普族、拉賈斯坦族、印度斯坦族和比哈尔族——在那里“正在穩定下来”。^① 因此，根据季亚科夫的說法，印度的民族，包括已形成和正

^① A. Dyakov, *Natsional'nyi vopros i angliiskii imperializm v Indii*

在形成的，总計有十六个。但到这时候，印共的名单已經成了十八个；除了季亚科夫所承认的那些民族以外，还有俾路支族和西旁遮普族。

但是，这些細节上的分歧，现在已变得无关重要了，因为季亚科夫 1948 年发言的主要意义就是完全同意印共关于地方自治的主张。季亚科夫宣称，語言邦运动是进步的，所以要求印度共产党人尽量予以支持。他把这种策略列入了全面的战略提綱中，这个战略提綱目的在于使弱小民族中的地方資产階級同在中央居于統治地位的大資产階級相抗衡。通过地方自治运动的手段，印共就能动員地方上所有的四个階級——无产階級、农民、小資产階級和中等資产階級——投入反对尼赫魯政府的斗争。（见第十三章）

1949—1952 年間，这一方針在苏联各地的报纸上得到了广泛宣传。它表现在季亚科夫于 1952 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

在民族問題上，以印度的垄断資产階級、地主和王公为一方，和以印度联邦的人民大众为另一方（包括一些民族的資产階級，特别是安得拉族、孟加拉族、甘那达族、馬拉雅拉姆族和馬拉地族的資产階級）的矛盾是尖銳的。……

因此，在反对中央政府的反动民族政策和反对国大党领导的斗争中，印度某些民族的資产階級……是劳苦大众的同盟者——虽然不是坚定的同盟者；这个同盟者尽管軟弱和不可靠，但是不能不加以考虑。^①

可见，在苏联看来，地方自治主义已經开始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它現在已經代替反帝运动，而成为在独立的印度取得資产階級

(A. 季亚科夫：《印度民族問題与英帝国主义》，(Moscow: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 1948), pp. 89—90.

① A. Dyakov, *Indiia vo vremia i posle vtoroi mirovoi voiny, 1939—1949* (A. 季亚科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及战后的印度，1939—1949 年》，(Moscow: 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 SSSR, 1952), pp. 216—217.

合作的主要手段。印共以前虽然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外国的统治，现在却不得不联合地方资产阶级反对中央的统治。

民族問題策略趋向温和

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几乎就在这一方针得到充分阐释的时候，政治环境竟要它缓和下来。不久以前，随着国际共产主义集团竭力同尼赫鲁政府建立友好关系，已经不再着重地把民族策略当作积极反对尼赫鲁政府的武器了。这种改变，在共产党关于印度国语这一问题的政策演变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 1948 至 1949 年，当制宪议会辩论新宪法时，语言问题在印度占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议会普遍同意用一种语言代替英语作为印度通用语的方针，但没有哪一种印度方言占有足够的优势，使它可以取得这种地位，而不致引起异议。使用最广的方言是印地语，但它毕竟还限于人口中的少数使用，而且在文学发展上也不及其他几种语言，如孟加拉语、马拉地语、泰米尔语等。然而，它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因而，最后通过的宪法规定印地语为正式国语，不过它在十五年内还须同英语处于同等地位。随后国大党政府不顾其他语言集团的强烈反对，采取了推行印地语为印度国语的政策。

苏联发言人在评论这个问题时，采取了公然反对印地语的立场。季亚科夫在 1949 年初发表的文章中，硬说把印地语当作官方语言加以推行，就是破坏印度联邦各“民族”的“平等权利”。^① 一年以后，T. 叶尔绍夫指责新宪法没有承认“各种语言一律平等。”^②

① A. Dyakov,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in Power" (A. 季亚科夫:《执政的印度国民大会党》), *New Times* (《新时代》) (January 12, 1949), p. 9.

② T. Yershov, "India Version of Bourgeois Pseudo-Democracy" (T. 叶尔绍夫:《资产阶级假民主的印度翻版》), *New Times* (《新时代》) (March 15, 1950), p. 6.

因此在苏联看来，印度不应该只有一种通用语言。正像共产党人自己后来所说的，这种政策显然带有分裂或“分治主义”的意味。这种论点是为了配合整个民族问题策略而巧妙提出的。于是，支持地方自治的纲领现在又有了新的内容，那就是保护一切方言，反对其中任何一种（指印地语）居于国语的最高地位。

1948至1949年，印共内部既有赞成印地语的派别，也有反对它的派别。但到1949年底，党内的主要态度是：强烈反对推行印地语作为国语，不论是正式或非正式的。这种观点在《共产主义者》的一篇有力的文章中表达了出来。不过文章以“一篇供讨论的文章”为副题，表明这个问题尚未得到最后解决。

这篇文章的作者腊莫·比拉斯·沙尔玛斥责那些拥护印地语的同志是“对大国沙文主义作了机会主义的让步。”^①他特别对印共周刊《人民力量》上的一篇文章提出了批评。针对着认为印地语通过自然的发展过程就可以并应该成为全印语言这种观点，沙尔玛宣称，不论是印地语或现有的任何印度语言，都没有资格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他说，在遥远的将来，各种印度语言最后将融合成为不同于其中任何一种语言的通用语言。但在此以前，“要使全国都用一种语言是办不到的。”^②

为了替这个论点辩护，沙尔玛举出苏联为例。他说，在苏联，并没有人企图强迫各民族集团接受单一的国语。他引用了斯大林的理论：俄罗斯语言不会在苏联各民族中居于统治地位，它最后会同苏联其他语言融合成为一种不同于其中任何一种语言的通用

① Ram Bilas Sharma, "On the Language Question in India—An Article for Discussion" (腊莫·比拉斯·沙尔玛：《论印度语言问题——一篇供讨论的文章》), *Communist* (《共产主义者》), II (Sept. - Oct., 1949), p. 51.

② 同上, p. 51.

語。

但沙尔瑪之攻击印地語，主要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他认为，提倡把印地語作为国語，不过是印度大企业借以統治全国的另一种武器。他声称主要是来自印度几个有势力的民族集团的大資產階級，正在力图迫使全国接受一种語言，以便巩固他們对其他民族的經濟控制和政治控制。由于大資產階級的主要竞争者是非印地語民族如泰米耳族和泰卢固族中的資產階級，因此，强迫推行印地語可以使这些竞争者在全国市場上一筹莫展。所以，提倡一种民族語言，有利于“印度統治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①

到了1951年，反印地語派在印共内部显然已占上风。这一派的观点被正式列入4月的《綱領草案》中，草案中写道，“不限定以印地語为全印国語。”^②但这时候又出现了使得情况更加复杂的因素。

就在同一年，苏联科学院院士 N. 索辛娜夫人发表了一篇关于印度語言問題的論文。她說，提倡把印地語作为国語，是“資產階級統治分子想加强他們对全印市場的控制”而采取的一种“反动的”政策。^③因之，就这一点而言，她的說法是和沙尔瑪的說法相符的。但在这篇論文中的其他部分，她对印度語言今后的发展趋势却表示犹疑不决。她认为，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个問題是“极为复杂的”。而且不同于沙尔瑪，她似乎同意有这种可能，即印地語最后也許会成为印度的国語。她說道，“生活本身的实践将会促

① 同上，p. 43.

② 《印度共产党綱領草案》，《新华月报》1951年10月号，第1292頁。

③ N. Sosina, “K voprosu o gosudarstvennom iazyke v Indiiskom soiuza” (N. 索辛娜: 《論印度联邦的国語問題》), *Ocherki po novoi istorii stran srednego vostoka* (《中东国家近代史論丛》), (Moscow: Izdatel'stvo Moskovskogo Universiteta, 1951), p. 18.

成这种共同的語言，不論它是印地語还是其他語言。”^①

如果这个論断同斯大林关于在多民族的环境中最后通用的不是现有的单一种語言，而是各种語言的融合体的論点相矛盾，那恐怕是由于斯大林本人不久以前已經改变了他对这个問題的看法。这位苏联領袖在 1950 年就語言問題发表了一篇重要論文，其目的显然是想大大地修改一下苏联的語言学。在斯大林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論点中，还包括这样一项看法：社会主义以前的时代，民族語言冲突或“杂交”的結果，不是各种語言溶合成为一种共同的語言，而是一种語言代替了另一种語言。他說，因此某些語言在文化合作过程中得胜，并通过吸取被淘汰的方言的部分精华而丰富起来。斯大林在进一步發揮他的见解时声称，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各种民族語言在經過一段合作过程后，首先形成許多丰富起来的“区域性的語言”，最后这些語言又溶合成为一个共同的国际語言。^②

在应用到印度語言問題上时，斯大林的这些言論似乎为下列这种期望提供了理論根据，即某一种区域性語言（假定是印地語）最后将会由于非社会主义社会中語言的“杂交”，或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区域性的語言”的出现，而成为全印國語。根据这种推論，印共将不得不承认印地語有可能成为國語。

但是，苏联的印度学家並沒有立即公开地从斯大林的論文中得出这个結論。为了按照新的旨意改造語言学的研究工作，东方学研究所举行了多次會議。在一次會議上，季亚科夫发表了一篇关于印度的报告，他的說法同苏联原来对印度的看法并无出入。根据这次會議发表的报告，他只是叙述了印度各地方“民族”的起源，完

① 同上，p. 19.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52—54 頁。

全避而不談印度的國語問題。^① 雖然該研究所的學術刊物不久就發表了許多關於其他亞洲語言如日語和漢語的新論文，但看不出有立即對印地語重行評價的跡象。

但重新評價印地語的政治條件却在逐漸成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既已逐漸改變了它對尼赫魯政府的看法，它就必須對這個政府的語言政策採取一種較溫和的態度。斯大林的文章已經提供了理論根據，不可或缺的政治基礎現在也正在形成。

印共在 1953 年底舉行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採取了重大的步驟。由於共產黨日益希望同印度政府在某些方面取得一致，印共宣布有條件地支持印地語。《綱領草案》的唯一修正之處就是：“不得強迫以印地語為全印國語，但應當鼓勵採用印地語作為各省邦政府之間與各省邦人民之間互相交流的語言。”^② 阿約艾·高士後來在一次公開聲明中為這項決定辯護說，一種共同語言對於在印度各民族之間建立密切的聯繫是需要的。^{*} 他在一段很能說明問題的論述中，譴責反對國語的政策（印共在這以前一直採取這種政策），把它說成是“分離主義”。^③

和印共第三次代表大會同時發生的其他幾件事情，清楚地表明印共這一決定是同蘇聯政策相配合的。在召開代表大會的同一

① “V institute vostokovedeniia akademii nauk SSSR”（《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Kratkie soobshcheniia instituta vostokovedeniia*（《東方學研究所簡報》），III（1952），pp. 65—66.

② *Programm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Adopted by the Third Party Congress...*（《印度共產黨綱領，1953 年 12 月 27 日至 1954 年 1 月 4 日在馬杜賴召開的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New Delhi: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4），p. 12.

* 阿約艾·高士：《論第三次黨代表大會的工作》，《印度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選輯》，世界知識社 1955 年版，第 158 頁。

③ 同上。

个月里，新德里的塔斯社出版了一份載有斯大林論語言學問題的文章的小冊子。^① 代表大會閉幕後一個月，莫斯科廣播電台宣布由東方學研究所編纂的第一部俄印字典已經出版。^② 順便說一下，在該研究所的1951年活動報告中却並未提到準備編纂這樣一部字典，因此估計這個計劃可能是在1951年以後着手進行的。^③

總之，蘇聯的印度學家放棄了他們反對提倡印地語的意見。這種轉變在1955年布尔加宁和赫魯曉夫訪印時表現得最為突出。蘇聯領袖們在新德里和國會議員發展印地語協會會員會見時，赫魯曉夫對他們發表了講話，贊揚該會的工作“對於印度人民、對於他們的文化發展是非常有益和有利的。”他保證說，蘇聯政府將使本國人民“有更多的機會學習印度語言，首先是學習印地語。”他表示，他的政府將在兩國的外交關係中，使用印地文和俄文。^④

但是，正像蘇聯領導人在其他方面對待印度的態度那樣，他們在新德里說的這番話，可能給人造成一種他們對尼赫魯政府的政策十分熱情的印象。其實印共以前的那種徹底反對把印地語當作國語的策略雖已有所緩和，但並未完全放棄。他們仍然要求，各邦的政府機關一律使用當地的方言，並應以當地方言作為各級學校的教學用語。他們曾積極參加發展各族語言文學的工作。儘管他

① J. V.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Concerning Marxism in Linguistics*）。這本小冊子的出版日期是1953年12月。

② *Times of India*（《印度時報》），February 16, 1954, p. 4.

③ “Perspektivnyi plan raboty instituta vostokovedeniia akademii nauk SSSR v blizhaishee piatiletie”（《在下一個五年計劃中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的遠景工作規劃》），*Kratkie soobshcheniia instituta vostokovedeniia*（《東方學研究所簡報》），I（1951），pp. 3—16。這篇文章列舉了計劃編纂中的一些字典，包括朝鮮文、阿富汗文、越南文、土耳其文等，但並未提到印度的各種文字。

④ 《赫魯曉夫在會見印度國會議員發展印地語協會會員時的講話》，《新華半月刊》1956年第1號，第150頁。

們的政策同 1949 至 1953 年期間比較起來，已經有所克制，但他們仍堅決支持印度的各種方言。

印共晚近的政策

正像在語言問題上一樣，印共在更為廣泛的民族問題上，近來已不像過去那樣迎合地方主義了，儘管它決不想完全放棄這個策略。

印共的第三次代表大會表明，該黨已經採取更為溫和的方針。就像阿約艾·高士所說的那樣，印共糾正了民族問題上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偏向。”^① 換言之，印共制止了過分強調支持各語言集團中地方資產階級的地方主義所要求的做法。由於各語言集團在文化、經濟、政治等方面彼此對立，這些要求往往互相衝突，所以，如果同地方資產階級聯合，就會使印共地方組織彼此失和。因此印共明確規定，在支持語言集團的要求上絕不許做得過分，以免影響黨內團結。高士寫道，各族勞動人民的團結是最重要的東西，它遠比一民族中各階級的團結為重要。* 其言外之意是：印度本身應該保持統一，而不應分裂成為各種“民族”成分。因此，印共就不再公開迎合分治主義的主張，而這種主張，本來是它的政策的特色。

但該黨並未完全拋棄地方主義。通過對地方政治運動的支持，印共仍舊不斷同地方資產階級合作，反對統治的大資產階級。特別是，它熱情參加了鼓吹根據語言重新劃分印度各省邦的運動。在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的綱領中，該黨以相當篇幅闡明它的要求，

① 阿約艾·高士：《論第三次黨代表大會的工作》，《印度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選輯》，世界知識社 1955 年版，第 156 頁。

* 同上。

即應該“根据共同語言的原則”，^① 重新划分印度全国的省邦。

然而，实际上印共在它提出的关于邦界的具体建議中，却大大背离了語言原則。印共在 1954 年致政府任命的省邦重划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主张，不应按照它以前所列举的民族把全印划分为十六或十八个邦，而應該划分为二十个邦。^② 这个决定并不表明印共已完全抛弃了語言原則；凡是印共备忘录中沒有严格遵照这个标准划分的地区，多半和印度北部边境的几个邦有关。这表明印共对北部与共产党国家毗邻的地区也許別有用心。

印共在关于孟买市的爭論中所持的立場，也許最足以說明印共近来在地方主义問題上所采取的克制态度。两个語言集团——馬哈拉施特拉族和古季腊特族——竞相要求控制該市。印共本来支持馬哈拉施特拉族的要求，共产党地方組織的領袖們参加了統一馬哈拉施特拉协会——一个由不同政治力量組成的联合組織。但当孟买、馬哈拉施特拉族中間的不滿发展到爆发为反国大党政府騷动时，印共中央领导人却放弃了夺取这一运动领导权的机会。尽管地方共产党組織显然想充分利用这种形势，中央领导人却号召和平解决爭端。^③

地方主义曾經是，而且依然是印共力量的巨大源泉。据一位消息灵通的观察家說，印共目前“只有在他們已成为地方爱国主义

① *Programm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印度共产党綱領》), p. 12.

② *Memorandum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to the States Reorganization Commission* (《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省邦重划委员会的备忘录》)(Delhi: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4), 10 pp.

③ Marshall Windmiller, "The Politics of States Reorganization in India: The Case of Bombay" (馬歇爾·溫德米勒: 《印度的省邦重划政策: 孟买事件》), *Far Eastern Survey* (《远东概覽》), XXV (Sept. 1956), pp. 129—143.

的政治监护人的地区才根深蒂固。”^① 印共还有其他一些力量强大的地区，他们在那些地区所以有很大力量，看来主要是因为他們提出一些比較正統的共产党口号，能够打动沒有正当权利的社会—經濟階級。但在它可以提出口号来打动“沒有正当权利的”語言集团以补充它的綱領的地方，印共无疑地有更大收获。利用地方的不滿情緒以及社会經濟方面的不滿情緒，印共可以进一步得到諸如安得拉或孟加拉等地区的工人、农民、学生、店主的响应。不仅如此，它甚至可以得到地方企业家和地主的响应，从而把它的影响扩大到全国四大階級。

随着印度在政治上日漸成熟的自然趋势，印度国内的地方主义力量也很可能日益衰退。但在目前看来，地方主义还是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如果尼赫魯政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眼中失宠的話，这种力量将再度为印共采取更激进的行动提供强有力的武器。

第二十一章 甘地的挑战

馬克思主义者在评价一位政治領袖或历史人物的作用时，首先要判明他属于哪个階級。光是断定他的經濟出身是不足以判明他是属于哪个階級的，因为一位領袖可能出身于一个階級，而在政治活动中却实际代表另一个階級。也不能单凭这位領袖的言論或著作来判明，因为他可能是在迎合某一部分人，而实际上是在为另

^① Selig S. Harrison, "The Challenge to Indian Nationalism" (西利格·S. 哈里逊: 《对印度民族主义的挑战》), *Foreign Affairs* (《外交季刊》) (July, 1956), p. 9.

一部分人服务。所以，馬克思主义者通常是先“客观地”断定这位領袖的活动对哪个階級最为有利，然后再根据他們自己对那个階級的态度来对此人作出評价。因此，如果这位領袖是在为无产階級謀求利益，那他就是革命的。如果他是在为大資产階級謀求利益，那他就是反动的。

但甚至就在这个問題上也是其說不一，因为共产党的理論家在各階級的定义上，或是在共产党对这些階級应采取的态度上往往有分歧。因此，在共产党文献中不仅談到了資产階級，而且还談到了“大資产階級”、“小資产階級”、“买办資产階級”和“民族資产階級”。这些名詞通常缺乏明确的定义，在使用上也往往不一致。而且，每当战略一改变，对各个階級的态度也就改变；随着这些改变，必然要对政治領袖作出新的評价。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党人每逢在路綫上有重大改变时，就必然要重写历史，因此共产党历史学家的估价，其經久程度只不过像共产党的当前战略方針那样。

恐怕再也沒有一个例子比摩含达斯·加腊莫占德·甘地更能說明这个問題了。甘地在印度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是共产党理論家不断遭受挫敗的根源。甘地使得共产党人不能不大伤脑筋，因为他所主张的一切正是共产党人所反对的。他是一名印度教徒，不仅相信印度教的基本哲学，同时还相信由之而产生的社会制度。他承认这种社会制度有弊端，特别是賤民制度，因此他要求进行改革。但他的改革旨在加强而不是推翻这种基本制度。他声称，各階級之間的自然关系是博爱，而不是斗争。

在經济学和科学方面，甘地的思想同共产党人的思想也有矛盾。他反对现代医学、反对节育、反对工厂以及在西方出现的工业化社会。他主张建立一种簡單的农业社会秩序，这种秩序是以分散的农村工业为基础的，并且要尽量减少中央的計劃和管理。他

是个禁欲主义者,在他看来,西方的高度生活水平,是一种物质主义的产物,他不願印度成为这种物质主义的牺牲品。他认为,精神价值必須高于肉体的享乐。由于发展了非暴力运动这一斗争手段,他对暴力斗争是被压迫者唯一有效武器这一概念提出了挑战,从而使共产主义的一条基本教义遭到打击。

由于这种种原因,甘地的教义同馬克思和列宁的理論是不相容的。但在共产党人看来,更糟的是,如果群众接受了他那种博爱和非暴力思想,那就无从誘使他們去夺取剝削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甘地主义在理論上既是反动的,在策略上也是对共产党人的一种威胁,必須加以反对。

但是甘地深受群众的爱戴,反对圣雄就有遭到千百万崇拜他、响应他的政治号召的人敌視的危险。那么共产党人怎样才能反对甘地主义而又不致被认为是在反对甘地本人呢?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共产党人一直未能滿意地加以解决。他們被自己的教条蒙蔽到如此地步,以致他們往往不顾政治现实,硬說甘地的影响已經消灭或已經减少了。M. N. 罗易早在 1922 年就曾写道:“甘地主义即将崩潰,这将結束印度民族运动史上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动人心弦的一章。这将表明,反动势力影响不了社会革命运动。”^① R. 帕姆·杜德在 1931 年也說过:“甘地主义已經奄奄一息;甘地主义已經再无武之地了。”^②

但甘地主义并没有死亡;本文即将表明,即使到现在,圣雄的幽灵还在不断地折磨着馬克思主义理論家,不断地揭露他們的“科

^① M. N. Roy, *India In Transition* (M. N. 罗易:《过渡中的印度》)(Geneva: J. B. Target, 1922), p. 208.

^② R. Palme Dutt, “India”(R. 帕姆·杜德:《印度》), *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 XIII, (May 1931), p. 263.

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中的牵强附会之处。E.M.S.南布迪里巴德在1954年被迫承认：“甘地的思想在我国真诚想为人民服务的那一大部分人中仍然有很强烈的影响。”^①

早期对甘地的态度

第一个对甘地作详尽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共产党作家是M.N.罗易，他对甘地的评价，对共产国际早期所持的态度颇有影响。罗易在他1922年发表的第一部著作《过渡中的印度》一书中，详论了甘地，把他明确列为封建阶级。罗易说，他“无疑具有一种保卫其阶级利益的本能”。

这种强烈的保卫财产权的本能，尤其暴露了甘地的阶级性，尽管他诚心诚意地反对现代文明中的卑鄙的物质主义。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敌视，显然不是革命的而是反动的。他认为私有财产权是神圣的，但却又力图阻止这种制度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殊不知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②

罗易所下的结论是，甘地主义是“反动势力最剧烈、最绝望的表现。”^③

罗易的妻子伊夫林，在共产党的早期论甘地的著作方面，也有重大的贡献。在共产党刊物上所发表过的关于甘地的评论中，以她用散底·堆维这一笔名所写的一系列文章最有说服力。这些文章是在1922年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包括《先锋》和《国际新闻通讯》；其中三篇后来转载于罗易在柏林出版的一本论印度的文集中。伊夫林·罗易曾不惜笔墨，大事赞扬了作为凡人和圣者的甘

① E. M. S. Namboodiripad, "The Birth of Gandhism" (E. M. S. 南布迪里巴德：《甘地主义的产生》), *New Age* (monthly) (《新世纪》月刊), III (July 1954), p. 43.

② Roy, *India In Transition* (罗易：《过渡中的印度》), p. 236.

③ 同上, p. 205.

地，宣称他是：

[一个]理想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他甘心乐意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給他的同胞；他在人格上，沒有一点瑕疵，他的大无畏精神和对真理的热爱为全世界有目共睹；他既像孩子那样天真、純洁，又像男子汉那样意志坚强、原則坚定，以他这样的人格，他将和托馬斯·阿奎那、薩佛納罗拉和阿西齐鎮的圣弗朗西斯这些先圣一样名垂史册，并对后世具有同样巨大的道德影响。^①

但是她接着用极其刻薄的口吻說，遵循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就是要求：

三亿印度人甘心情願地忍受剝削者所施給他們的一切打罵、飢寒和貧苦，靜待这些剝削者天良发现，幡然悔悟，到那时，这些家伙便会抛弃他們的机枪、美食、財富和特权，把这三亿同胞接納到一个新的人类大家庭之中，在那里，自由和平等之神将在至善之爱的庇护下治理人类。……非暴力、听天由命、至善的爱和解脱人生的痛苦——这就是由王公、僧侶和哲人这批有势力的人世代相传下来的印度哲学的实质，因为他們认为这种哲学有助于統治人民。甘地先生只不过是继承了这一系列阴魂不散的古人的衣鉢而已——他完全是传统和环境的产物。他的非暴力哲学也是它继承古人宗教思想的必然結果。遺憾的是，甘地先生偏偏在印度广大群众反对物质貧乏的情緒……空前高涨的时候，重新提倡这种超世俗的哲学。^②

在論述甘地主义的缺陷时，伊夫林·罗易首先指出它缺少一个經濟綱領，还指出甘地“頑固地妄想把一切印度人——地主和农民、資本家和无产者、溫和派和极端派——都团結在一場目标不明确共同斗争中。”她說：“油和水不能混合；獅子和綿羊不能并臥；

^① M. N. Roy and Evelyn Roy, *One Year of Non-Coöperation from Ahmedabad to Gaya* (M. N. 罗易和伊夫林·罗易：《不合作运动的一年：从阿默达巴德到加雅》)，(Calcutta: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23), p. 45.

^② 同上，pp. 48, 50.

甚至在爭取精神独立的斗争中，每个人都是在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甘地主义的另一个缺陷是“把形而上学带进了政治领域”，因而必然“由于宗教上的清规戒律和道德上的顾忌而使生气勃勃的群众运动受到阻碍”。

至于甘地主义的经济学，也被伊夫林·罗易斥之为反动的，她说：

从机器时代倒退到石器时代，也许正合浪漫派诗人和宗教幻想家的心意，但是，自然进化过程是势不可挡的，决非是这种伤感的幻想所能阻止的。人类在经历了痛苦的阶段以后已从作大自然的奴隶进而作机器的奴隶，而机器正是人类为了战胜自然力量凭自己的智慧发明出来的。我们必须凭着使我们能够有今天的这种智慧走向那么一天，那时，人类将利用机器和大自然来为自己谋求福利和享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利用它们来为少数人谋求私利和进行人对人的奴役。“倒退到吠陀时代”，倒退到纺车时代，就是抛弃两千年来的进步，就是抛弃未来时代的一切光辉前景，而在那个时代，人人都能自由地进行精神方面的陶冶，因为他们已经战胜了，而不是躲避了物质规律的统治。^①

最后她总结说：“甘地主义不是革命主义，而是软弱无力的改良主义，它在每一个关键上都逃避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现实。”^②

第二个论述甘地的重要的共产党人是 R·帕姆·杜德，他在他 1927 年出版的《现代印度》一书中，分析了圣雄的阶级立场。杜德没有像罗易那样，把甘地划为封建阶级，也没有把他划为大资产阶级。虽然杜德说甘地“摆脱不了上层阶级的利益和偏见”，并且谴责他把工人只看作是“应当安分守己的劳动工具”，^③他却承认，“甘地时期的国大党领导集团并不是大资产阶级的直接领导集

① 同上，pp. 56, 57.

② 同上，p. 58.

③ R. Palme Dutt, *Modern India* (R. 帕姆·杜德：《现代印度》)(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7), p. 80.

团”。他还說：“这是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的領導集团，他們一方面希望挺身而出作群众的領袖，一方面又害怕同資产階級的財產利益断絕关系。”^①

因此，杜德似乎一直未能肯定甘地的活动究竟对哪个階級有利。他同意罗易所說的，甘地肯定无助于增进工人階級的利益，因而他想把甘地同“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联系在一起，因为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是可以看作是革命的同盟者。不过，杜德对于甘地主义的意識形态所持的态度，却是十分明确的。他說：“在精神上带有反动性的甘地主义的宣传，是同群众的利益敌对的。”^②但他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甘地对民族主义斗争所起的影响：

这一时期[1919—1922年]的主要意义在于，民族主义运动已成为群众性运动。甘地的功績在于，在所有的領袖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意識到这一点，并且努力去接近群众。这是他最伟大的功績。他确实——在某一时期——接近了群众。

人們不妨指責甘地具有种种怪癖和缺点，但是他的这一不可磨滅的功績却大于所有这些怪癖和缺点，这一功績是他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真正貢獻。……

甘地的第二个伟大的功績在于，他給群众带来了一项行动方針，一项群众行动的方針。^③

虽然杜德和罗易夫妇的这些文章的說法模稜两可、含糊不清、并且經常自相矛盾，但仍可看出，他們在观点上有着重大分歧。虽然他們三人一致认为甘地主义的意識形态是反动的，应加以反对，但杜德却似乎认为甘地的政治活动在客观上能起革命的作用。他当时可能打算在資产階級反帝革命阶段中充分利用这一作用。而

① 同上，p. 81.

② 同上，p. 113.

③ 同上，p. 72.

罗易夫妇却认为甘地不仅在世界观上，同时在实际上也是倾向封建主义的，认为甚至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说，他也是个障碍。当然必须指出，本文所引用的杜德对甘地的评价，系写于1926年，即在罗易发表了《过渡中的印度》一书四年后。罗易在1923年后未对甘地多加评论，但他确曾继续抨击他所谓的“对非暴力的迷信”，他在1926年发表的《印度政治的未来》一书中，曾提及“甘地的反革命的政治丑剧”。^①他反对那种认为甘地能起革命作用的想法，这和他通常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大党，认为必须进行武装斗争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

在甘地的阶级立场问题上的分歧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共产国际对甘地并无定论，也没有一致的看法。这可从1929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甘地项目中找到一条耐人寻味的证据。该项列举杜德和罗易两人的著作作为参考书目，把甘地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代表“有产阶层的利益”。^②它并没有像罗易那样把甘地划为封建阶级，而似乎是含糊地姑且接受了杜德对甘地的评价，即把甘地同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在本文中已经指出，这种观点并不排斥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同甘地暂时结成联盟的可能性。

但是，到《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时，共产国际的路线已经改变了，共产国际当时正在推行一种左倾战略。因此，重新评价甘地的作用，乃是在意料之中的。在共产国际刊物在左倾阶段所发表的

^① M. N. Roy, *The Future of Indian Politics* (M. N. 罗易:《印度政治的未来》)(London: R. Bishop, 1926), p. 47.

^② *Bol'shaia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苏联大百科全书》), (1st ed., Moscow: Aktsionernoe obshchestvo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1929), Vol. XIV, columns 514—517.

关于甘地的評論中，以《共产国际》在 1933 年 6 月所发表的一篇署名瓦利亚的文章最为詳尽。

在提到印度同志仍坚持要把甘地划为小资产阶级之后，瓦利亚說道：

这就把我们引到一个主要問題上，对这个問題必須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甘地主义的阶级性是什么，它的演变又是什么。答案直接关系到拟訂一項正确的布尔什維克的政策，关系到无产阶级领导权問題，关系到对民族改良主义及其演变的估計。……

把甘地主义看作是小资产阶级哲学……这种看法仍然受到某些追随革命运动的人的支持，这种看法是极端有害的，它阻碍了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

首先給甘地主义的阶级本质下定論的，是斯大林同志在联共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的一段話：

“至于甘地一类的帮手（按：即帝国主义的帮手），那末沙皇政府也有过一大群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妥协分子做帮手，但是結果也不过得到了狼狽的下場而已。”……*

甘地主义现在又一次暴露了它的自由主义的反革命本性。……

因此，甘地主义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哲学。說它的缺点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于反动的、烏托邦式的小资产阶级理論，是不正确的，因为它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一种同地主制度有联系的、十分害怕民族革命的懦弱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学說。这就是問題的实质。①

瓦利亚并没有把甘地和甘地主义分开，他率直地对二者一并加以譴責。

*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20—221 頁。

① Valia, “The Constitution for the Enslavement of the Indian People and the Policy of the Indian Bourgeoisie” (瓦利亚：《奴役印度人民的宪法和印度资产阶级的政策》)，*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共产国际》)，X (June 15, 1933), pp. 388, 389—390. 黑体字系原有。

拿他的分析来同 M.N. 罗易在 1922 年所作的分析^①进行比较, 是很有意思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正当在共产国际中失宠、在印度被监禁起来的罗易改变了他原来的态度, 把甘地和国大党看作是革命的有用的同盟者时, 瓦利亚却採納了罗易原来的主要論点。

对甘地的不同看法

从 1929 年直到 1948 年甘地被刺, 国际共产党人对甘地的方針并无重大的改变。有某种迹象表明, 1939 年时曾考虑对他重新进行评价, 但却沒有下文(见本书第 210—212 頁)。甚至在統一战綫时期, 共产党人还在攻击甘地主义的意識形态, 把圣雄看作有产阶级的卫士。直到 1942 年, R. 帕姆·杜德还称甘地为“印度政治中一个老奸巨猾的和平主义者”,^② 其实这也就是他在 1931 年所采取的立場, 那就是: “在印度, 甘地的名字就和犹大的名字一样, 是一切热情奔放的青年人詛咒和蔑視的对象。”^③ 在 1942 年, 即在对印共的禁令解除后不久, 右傾的总書記 P.C. 約希也写道:

甘地主义是消极的道路这一过去一直在国家领导集团中占統治地位的信念, 现已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了。它已变成只能滿足甘地及其亲近的追随者的伦理需要, 但却不能解释千变万化的现实的一种全然消极的意識形态。……

否定的世界观、消极的政策和奴顏婢膝的作法——这就是今天的甘地主义。^④

① Roy, *India in Transition* (罗易:《过渡中的印度》), pp. 205—241.

② “India — What Must Be Done” (《印度——应当作什么》), *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 XXIV (Sept., 1942), p. 264.

③ R. Palme Dutt, “India” (R. 帕姆·杜德:《印度》), *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 XIII (May, 1931), p. 264.

④ P. C. Joshi, *The Indian Communist Party; its policy and work*

表明考虑对甘地采取新方针的第一个重要迹象，出现在 1948 年 3 月，即在甘地逝世后两个月，偏偏就是印共在 B.T. 兰纳迪夫领导下采取左倾战略的那个月份。杜德在《劳工月刊》上写道：“诽谤他（按：指甘地）的人要想挑剔他的种种弱点和不一致之处，是很容易的，不过这只表明他们自己的渺小，表明他们没能了解甘地的伟大。”^① 杜德一再指出，甘地没有明确的社会理论，他被有产阶级利用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但他强调指出，甘地“精神的伟大、他的正直、勇气和对人类的爱，盖过了他的种种不一致和矛盾之处”。后来，在提到甘地生前为消除教派暴行所作的努力时，杜德隐晦地提出这样一项新策略——即共产党应对甘地殉难一事加以利用。因为杜德说，甘地在致力消除教派暴行时，曾经

同共产党密切合作。甘地和革命的工人阶级终于在争取人民的民主团结的共同斗争中彼此有了了解。……争取左派的民主团结，在现在比过去更为必要。

印度的民主力量必须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以便使甘地不致白白地牺牲，以便使这场斗争一直进行到胜利，让印度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的团结。”^②

从杜德不仅这样赞扬甘地，而且还把甘地同民主团结联系在一起这件事来看，他不但是在劝告对甘地要采取温和的态度，同时又在建议共产党人在开展自己的群众运动时利用甘地来作标榜。但这并不是莫斯科的意见。

in the war of liberation ... (P. C. 约希：《印度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政策和工
作》)，(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42), p. 26. 黑体字系
原有。

① R. Palme Dutt, "Gandhi—The Last Phase" (R. 帕姆·甘地：《甘地——
最后阶段》)，*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XXX (March, 1948), p. 84.

② 同上，pp. 87, 88.

1949年，苏联科学院太平洋研究所在俄国举行了会议，同年11月，发表了在这次会议上宣读的一些较重要的论文（见第十三章）。这些论文被认为极为重要，因此译成英文以供印共参考，并于4月间在孟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论印度的那篇论文中，苏联的著名印度学家A.M.季亚科夫具体地谈到了甘地：

在印度，企图利用甘地的威信来“保卫民主”，是极端有害和危险的。甘地从未领导过反帝武装斗争，也从未挺身而出反对过印度人中的叛徒。恰恰相反，他一直是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叛徒。不对甘地的威信和对甘地的迷信进行斗争，不揭露经常背叛群众运动、从而在奴役印度的英国人面前立下了巨大功劳的甘地的活动，就不可能有反对甘地主义——印度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斗争。^①

这就同杜德有了直接的矛盾。杜德声称，甘地曾“使印度民族运动成为现实”，曾“燃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火焰”，并“把民族运动从自由立宪主义的小圈子里扩大到群众中去”。而俄国人却坚称甘地“从未领导过武装斗争”，也“从未挺身而出反对过印度人中的叛徒。”这样一来，印共就只好在下面三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中选择一条，即：或是听从杜德，或是听从俄国人，或是走自己的路线。他们决定听从俄国人。

这从一件事上可以明显看出，在季亚科夫的文章于俄国发表后两个月，在印共的理论性刊物《共产主义者》上发表了一篇论甘地的文章。这是一篇痛骂甘地的长文，其论调与季亚科夫十分近似。甘地领导过民族主义斗争吗？没有，在1920年的运动中，他曾“扼杀了革命的群众运动”。^②作者谴责道：“甘地的理论和策略

^① A. M. Dyakov, *Crisis of the Colonial System* (A. M. 季亚科夫：《殖民制度的危机》)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1), p. 32.

^② S. M. Vakar, "The Class Essence of Gandhism" (S. M. 瓦加尔：《甘地主义的阶级本质》), *Communist* (《共产主义者》), III (Jan., 1950), p. 15.

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起了**阻碍的、反动的作用。**”^① 共产党人能否像杜德所暗示的那样，把甘地当作左派团结的象征呢？不能。文章说：“印度无产阶级现阶段的首要任务在于使千百万农民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影响，特别是要摆脱甘地主义思想的影响。”^②

在其后四年中，印共实际上把甘地主义的问题束之高阁。直到1954年夏天，在应对尼赫鲁政府采取何种政策问题上出现危机时，才又在公开刊物上重新评价甘地的作用。《新世纪》从7月号起，开始连载E.M.S.南布迪里巴德所写的一系列论述甘地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根据一年多以来风行一时的、登都耳加尔著的八卷圣雄传记写成的。这些文章探讨了甘地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论述了他的经济和社会理论，其语气较诸1950年已大有缓和。南布迪里巴德承认甘地是民族斗争中的一名重要领袖，但却率直地把他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

甘地先生并无个人企图；他所代表的是整个资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中的个人或团体；因此他便能够从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从资产阶级狭隘的和微小的个人利益或团体利益出发来观察每一个问题。因此，他也不仅能以一定程度的客观性来观察新国家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教派纠纷]，而且还能尽力消除这些不稳定的根源。作为印度资产阶级典型的思想和政治领袖来说，甘地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③

南布迪里巴德显然是小心翼翼，生恐像以前的共产党评论家那样会激起公愤。但他同时又十分明白地告诫马克思主义者说，对甘地的方针并没有改变，共产党仍然认为甘地及其思想是为剥削阶

① 同上，p. 23. 黑体字系原有。

② 同上，p. 7.

③ 南布迪里巴德：《8月15日：是胜利还是失败》。《圣雄甘地与甘地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21页。

級謀求利益的。

与此同时，苏共的方针也有了较重大的变动。也许是由于万隆会议对国际事务所起的影响，苏联的理论家对现代亚洲历史开始作出重要的新解释，其中之一就是对甘地有了一个较良好的评价。^①在5月份出版的一期《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社论，批评了苏联东方学的一般状况，它特别提到甘地：“我们的亚洲学者在考虑甘地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时，一直没有拿印度本身的具体历史情况作为出发点。”^②后来，苏联为了配合尼赫鲁总理6月间到苏联来访问，以惊人的速度，在一个月內赶印了十万册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的俄文译本。^③由苏联东方学家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印度学家季亚科夫和巴拉布谢维奇，在6月份出版的一期《共产党人》杂志上为该书写了书评。他们说，虽然尼赫鲁有时夸大了甘地的作用，但像尼赫鲁那样认为甘地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享有重要地位，则是“十分恰当”的。^④

苏联对甘地的态度有所改变的另一个证据是，N.A.布尔加宁和尼基塔·赫鲁晓夫于1955年11月访问印度时都曾多次赞扬甘地，每次都很简短，而且字斟句酌：布尔加宁11月21日对印度国会说：“大家知道，印度民族运动的卓越领袖圣雄甘地的思想和领

① 见华尔特·Z. 莱奎尔：《苏联东方学的转变》（Walter Z. Laqueur, “The Shifting Line of Soviet Orientology”），*Problems of Communism*（《共产主义问题》），V（March-April, 1956），pp. 20—26.

② “Za dal’neishii pod’yom sovetskogo vostokovedeniia”（《为进一步发展苏联东方学而努力》），*Kommunist*（《共产党人》），no. 8（May, 1955），p. 78.

③ *Blitz*（Bombay）（孟买《闪电》周刊），June 25, 1955, p. 16.

④ V. Balabushevich and A. Dyakov, “Kniga o velikom indiiskii narode”（V. 巴拉布谢维奇与 A. 季亚科夫：《一本论述伟大的印度人民的著作》），*Kommunist*（《共产党人》），no. 9（June 1955），p. 103.

导,在这个[爭取独立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①赫魯晓夫也对印度国会說,甘地的著作已經譯成俄文,“他非常熟悉自己的国家和伟大的印度人民,他在你們的历史中起了重大的作用”。^②后来,布尔加宁于 11 月 24 日在孟买又說道:

你們有过一位杰出的領袖,他对貴国貢獻甚大。我指的是圣雄甘地,他在貴国被尊为伟大的爱国者和人民的朋友。我們十分尊敬地記得他,我們也十分尊敬他的事业的继承者賈瓦哈拉尔·尼赫魯先生的工作。(鼓掌)……

我們列宁的学生們并不贊同甘地先生的哲学思想,但是我們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領袖,他对貴国人民在爭取独立的斗争中的爱好和平思想的发展有巨大的貢獻。^③

从印度人民的观点来看,这些談話并未充分承认“国父”的重要作用。但在印共看来,这些談話却表示着一个重大的改变。只消和第二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甘地”項对照一下,就可明白这一点;該項虽发表于 1952 年,但直到写本书时还未經修正(“貝利亚”項业經修正)。这部百科全书把甘地說成是“所謂甘地主义这一反动政治学說的創始人”。它在介紹他的生平时說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月里,甘地依旧支持英帝国主义。……同时,他还鼓吹給予印度大資产階級和地主以更大的政治权利。甘地对发展民族解放运动所起的作用,反映了印度大資产階級和自由主义的地主的卖国立場。^④

① 《布尔加宁在印度共和国国会发表的演說》,《新华半月刊》1956 年第 1 号,第 126 頁。

② 《赫魯晓夫在印度共和国国会发表的演說》,《新华半月刊》1956 年第 1 号,第 132 頁。

③ 《布尔加宁在孟买省首席部长德賽招待会上的講話》,《新华半月刊》1956 年第 1 号,第 136 頁。

④ *Bol'shaia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苏联大百科全书》), (2d ed.,

当这种运动转变为革命时，他就背叛了人民，帮助帝国主义者镇压起义。《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这一项还说，甘地利用了群众的宗教迷信，“装作印度独立的鼓吹者来蛊惑人心”。它说，甘地主义“已沦为同封建地主和放债人有密切关联的印度大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①

在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后不久，苏联著名的东方学家 E. 茹科夫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甚至比季亚科夫、巴拉布谢维奇、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以前对甘地所作的小心翼翼的评论还更进一步。在谈到布尔加宁在孟买的演说时，茹科夫写道：

遗憾的是，苏联的历史著作未能对甘地的作用作出明确的评价。此外，在苏联的某些著作中，还对他的活动作出了错误的评介。

这应怎样解释呢？

我认为，问题在于直到不久前，我们对印度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还缺乏足够的知识。因此，对于像甘地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分析，必然是片面的。我们的作者集中全力批评甘地哲学的某些方面，完全脱离了印度的具体情况和印度反帝运动的水平来看待他的活动。必须承认，大多数苏联东方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曾一度持有这些观点，这些观点曾在报刊上流露出来。

因此，我愿意再次强调指出，尼赫鲁总理的著作对于正确理解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许多特点，特别是对正确理解甘地的作用，具有巨大的意义。②

其实茹科夫的“解释”完全不能说明过去犯错误的原因，因为

Moscow: Gosudarstvennoe nauchnoe izdatel'stvo "Bol'shaia ...", 1952), X, 203.

① 同上，p. 204.

② E. Zhukov, "Gandhi's Role in History" (E. 茹科夫：《甘地的历史作用》); *New Times* (《新时代》), (Feb. 2, 1956), pp. 15-16.

俄国早期对印度的研究表明具有充分的确切知識，只是不够客观。^①但最重要的是，茹科夫願意把尼赫魯当作“正确了解”印度历史的根据——这不仅就共产党对甘地的态度來說极为重要，同时对国际共产主义世界的整个理論威信問題來說，也极为重要。因为尼赫魯的著作里充斥着对历史和社会主义的非列宁主义观点，共产党人除非放弃基本的意識形态原則，否則就不可能接受这些观点。但是，如果共产党人能从非共产主义者尼赫魯的著作中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这一复杂和經常有爭論的問題有一个“正确的了解”，那么他对其他問題的解释岂不是也具有价值嗎？因此，苏联政府当时匆忙出版尼赫魯的著作一事，是有其重大的影响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恢复圣雄甘地名誉的这项差使却恰恰交給了在二十年代曾捍卫反甘地路綫的奥托·庫西宁。庫西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說：

赫魯晓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在印度发表的講話中正确地承认了圣雄甘地在印度人民历史中所起的显著作用。这样，赫魯晓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就在行动上率先糾正了前些年反映在苏联东方学家的言論中和共产国际的文件中的宗派主义的錯誤。大家知道，甘地的哲学观点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相差很远，我們的某些政論家仅仅从批判他的哲学观点出发而陷入了片面性，以至完全否认了甘地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作用。^②

对甘地的这种重新評價，无疑是由于苏联外交政策要求发展同印

① 例如见 A. 季亚科夫：《印度民族問題与英帝国主义》(A. Dyakov, *Natsional'nyi vopros i angliiskii imperializm v Indii*)，(Moscow: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a, 1948)。

② 《庫西宁同志(卡列里—芬兰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发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上卷第653頁)。試比較他的《印度革命与甘地的策略》(“The Indian Revolution and Gandhi's Maneuver”), *Inprecor* (《国际新聞通訊》), X (March 20, 1930), pp. 241—242.

度的友好关系,而在印度,甘地的名字是神圣的。这种重新评价或许只是一种策略行动,但这可能会有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連印共似乎也承认这一点。在布尔加宁和赫魯晓夫的談話之后、茹科夫的信件发表之前,南布迪里巴德在党的周刊上重申了印共的立場。他贊揚了甘地把印度人民团結“在一条巩固的反帝陣綫中”的本領,但却強調了这种团結的消极方面,他說道:

这种爭取全民团結的热望,在实践中业經証明是一种妨碍民族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力量。因为在圣雄所发展起来的、作为他的建立民族团結計劃的一部分的极其重要的信条中,有一条便是被压迫、被剝削階級(工人和农民)是那些压迫、剝削他們的階級的兄弟和伙伴。……正是这种关于民族团結的甘地主义的概念,使得一般人民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革命热情——甘地把这种發揮斥之为“暴力”。

因此,我們共产党人决不能忘記,即使在今天,我們仍有責任去进行有系統的斗争,以反对他的哲学和行动綱領中这种根本的階級基础的一切表现。同时,我們又不能忘記,甘地先生的領導是民族民主的領導。^①

南布迪里巴德的文章表明,在甘地問題上,印共同俄国人有分歧。因此,难怪到了 1956 年底,俄国人感到有必要对这一問題加以詳細的、权威性的理論說明。結果是在苏联东方学家的主要刊物《苏联东方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由 A.M. 季亚科夫和 I.M. 賴斯納合写的,文章大胆地提出了一个主要的理論問題:

关于甘地思想究竟代表哪个階級的問題,在印度和英国的学者以及苏联的印度学家中,都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曾提出了下面这些观点:甘地是地主的代理人;甘地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甘地是农民的代理人。這個問題的确很难決定。甘地是个极为复杂的人物。^②

① E. M. S. Namboodiripad, "Mahatma Gandhi" (E. M. S. 南布迪里巴德:《圣雄甘地》), *New Age* (weekly) (《新世紀》周刊), Jan. 29, 1956, p. 2.

② A. M. Dyakov and I. M. Reisner, "Rol' Gandi v natsional'no-osvoboditel'noi bor'be narodov Indii" (A.M. 季亚科夫与 I. M. 賴斯納:《甘地

文章还同样大胆地提出了答案：

如果把甘地看作是一位政治领袖和思想家，那就必须承认，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甘地的全部政治活动主要是同他为争取印度独立而进行的努力有关，这也证明了他绝非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

归结起来，我们不妨说：甘地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基本上起了积极的作用。正是由于甘地作为国大党的领袖而进行的活动，才使该党成了一个群众性的党。我们过去对甘地的非暴力策略所持的那种断然否定的态度，已为事实所驳倒。国大党由于在反帝运动普遍活跃的情况下采取这些策略，因而唤起了十分广泛的——同时也是落后的——群众投入斗争。^①

大概不久印共的理论家就会和苏共采取同样的态度。事实上，如本文即将指出的那样，已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在实际问题上要有所转变。

暴力对非暴力

印共长期坚信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即只有通过暴力斗争才能推翻剥削阶级。印共在其1930年的党纲中说道：

本党宣称，走向胜利的道路不是个人的恐怖手段，而是由工人阶级、农民、城市贫民和印度士兵组成的最广泛的群众，在印度共产党的旗帜和领导下进行的斗争和革命的武装起义。^②

M.N. 罗易在1923年说道：“如果印度得不到凭着暴力手段争得

在印度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Sovetskoe Vostokovedenie*（《苏联东方学》），no. 5（1956），p. 29。这篇极为重要的文章的英译全文连载于《思想》（*Thought*, New Delhi），IX（March 23, 1957），（March 30, 1957）and（April 6, 1957）。此处引文系根据《思想》上的译文，并且核对了原文。

① 同上，pp. 30, 34.

② “Draft Platform of A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的自由，那它就宁願不要自由。”^① 在密拉特审判中，曾引用过菲利普·斯普拉特的一段話：

我认为，我們既是共产党人，就大可不必抱歉，大可不必諱莫如深地隱瞞我們的主张中的残暴凶狠的那一面。我們說，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现代社会是以残暴作为基础的，我們既要除去残暴，就必须使用残暴手段。……

我們也不必隱諱，在达到我們目的过程中和建立共产主义时期中，我們必須进行残酷的专政。我們必須在大多数国家中进行內战。^②

虽然近年来印共在說明它对暴力的态度时不那么直截了当，但暴力无疑仍然是印共的一件备用武器，准备一俟情势許可时即加以使用。印共的 1951 年政策声明說：

主要的問題并不是要不要武装斗争的問題，也不是要非暴力还是要暴力的問題。正是反动的統治阶级依靠武力和暴力欺压人民，向我們提出我們的信念是暴力还是非暴力这个問題。这样一个提法也就是甘地主义思想的提法，其目的无非是想把群众引入歧途，我們必須避免这样提法。馬克思主义和历史早就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和人民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問題。群众为了保卫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一切謀求解放的行动，都是神圣的。人民为了扫清通往进步和自由的道路上的腐朽和反动势力而决定采取的一切作法，都是历史所許可的。^③

印共正是在这种必須忠于暴力原則的情况下，被迫决定应当

(《印度共产党行动綱領草案》), *Inprecor* (《国际新聞通訊》), X (Dec. 18, 1930), p. 1219.

① M. N. Roy, *The Aftermath of Non-Coöperation* (M. N. 罗易:《不合作主义的后果》)(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6), p. 118. 导言(p. 5)說該书写于 1923 年。实际上該书有一部分系 1922 年写的。

② *Judgment Delivered by R. L. Yorke ... in the Meerut Communist Conspiracy Case...* (《R. A. 約克等对密拉特共产党謀叛案所作之判決》), (Simla: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1933), p. 225.

③ *Statement of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印度共产党政策声明》), (Bombay: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1), p. 7.

怎样对待甘地主义的非暴力策略的。非暴力运动一般是指用公开的和有组织的违法行动来反对英国当局。对于这种行动，共产党是无法不赞同的。但是根据甘地的教导而展开的非暴力运动要求避免使用暴力，而群众通常以惊人的纪律性作到了这一点。但正因为这种策略是以非暴力为基础的，所以共产党绝不能同意这种办法。因为他们曾声称，非暴力运动先发动群众起来反对非正义，然后又挫伤他们的自发的积极性，在群众正要采取真正的革命行动时给他们泼冷水。

为了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一致起见，印共本应坚持一项彻底反对非暴力运动的政策。但对它说来不幸的是，非暴力的策略在印度已经深入人心；一位共产党领袖曾抱怨说：“我们号召进行斗争，但不久，这场斗争就变成了非暴力运动。”^① 非暴力是一种深受尊重的策略；在独立后的印度，置身于这种形式的运动之外，就是离开了政治行动的一个主要焦点。

至于什么才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最好的办法，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却很少谈到，只有一次曾偶尔谈到。1952年，S.A. 丹吉在一篇论述工会运动的文章中说：

在罢工斗争中，不应鼓励采用非暴力的形式，虽然在今天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形：工人和中产阶级雇员由于过去传统的影响，容易赞成这类建议。如果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形式能有助于发动群众，我们当然应该毫不犹豫地采用这种形式，但在采用这种形式时，应当小心谨慎。^②

阿约艾·高士在1954年评述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时写道：

① *General Secretary's Report to the 12th Session of the All-India Kisan Sabha* (《全印农民协会总书记向第十二届年会作的报告》), (New Delhi: All-India Kisan Sabha, 1954), p. 37.

② S. A. Dange, *On the Indian Trade Union Movement* (S. A. 丹吉：《论印度的工会运动》), (Bombay: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2), p. 56.

在加尔各答，各左翼政党也发动了争取粮食的非暴力运动，但是我们认为非暴力运动乃是一种甘地主义的斗争形式；因此，整个斗争从头到底我们都没有参加。同时因为我们不能参加进去发动总罢工，我们就袖手旁观，不加以支持。这是一个错误，而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

此后，几个地方都发展了一种偏向，即把非暴力运动看作是主要的斗争形式。

党代表大会向大家指出，非暴力运动乃是一种阻碍群众参加斗争而只对敌人施以若干压力的斗争形式。事实上，这种斗争形式乃是恐怖主义的另一极端，原则上同样是主张由英雄领导消极的群众，把人民群众的作用降到旁观者的地位。在若干落后的地区中，非暴力运动在斗争的初期可能是必需的，然而也不应拿它来代替群众行动。^①

因此，不妨用非暴力运动来“发动群众”，但群众一经发动起来之后，共产党就一定会把他们推向“历史上不可避免的”暴力道路上去。凡是组织这种运动的人，尤其是人民社会党，都认识到了这一点。1953年，当人民社会党在阿扎姆加尔（北方邦）和巴尔底（孟买邦）组织非暴力运动以进行土地改革时，共产党人就曾企图渗入到这些运动中去。人民社会党深知如果让共产党站住了脚会有什么后果，因此千方百计地不让他们打进来。人民社会党在这两处地方都使共产党未能得逞，但阿扎姆加尔的共产党人决定另外组织他们自己的土地改革运动。^②

因此，可以预料，印共仍将随机应变地来看待非暴力运动。他们自己也许避免采用这种手段，但只要别人行之有效，他们就会设法打进去，把它导向列宁主义形式的革命斗争。

① 阿约艾·高士：《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第155—156页。

② 见《印度报刊文摘》(Indian Press Digest)，II, pp. 63—76, 89—90.

維諾巴·帕威的“献田运动”

甘地逝世后，印度最著名的甘地主义领袖就是六十一岁的、戴眼镜的維諾巴·帕威，他是圣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自从他在1951年为了解决印度的土地问题发起他那现已举世闻名的献田运动以来，帕威的名字受到了全世界的注意。献田运动就像非暴力运动一样，基本上是诉诸良心的。^①

帕威是在海得拉巴的堆楞加那地区开始推行这个运动的，共产党于1948—1950年间曾在该地建立真正的农民苏维埃，两年多以来，贫困和暴力一直是当地主要的政治决定因素。帕威经常先举行祈祷会，然后呼吁把田地捐献给没有土地的人。这个运动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结果帕威募集并分配了好几千亩土地。后来他在全国范围组织献田运动，并以二百五十万亩作为土地征集目标。随着运动的发展，在运动当中又增添了几“献”，即献井、献牛、献财和献身（献身给献田运动）。近来一直着重于献村，即全体村民把财产汇集起来集体经营。

总的说来，献田运动是在客观形势十分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国大党和印度政府表示赞许这个运动，不过在解决土地问题上，它们主要还是依靠改变土地所有制的立法，而不是依靠帕威改变地主心肠的本领。献田运动虽然在一开始时获得了成功，但公众对它的热情不久便消退了，这主要是因为运动组织不良，还因为土地

^① 关于对献田运动抱同情态度的介绍，见玛格丽特·W. 费希尔与乔安·V. 邦杜兰特：《印度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Margaret W. Fisher and Joan V. Bondurant, *Indian Approaches to a Socialist Socie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6），pp. 35—105。关于对它抱批评态度的观点，见O. M. R. 腊欧：《献田运动的衰落》（O. M. Rao, “The Decline of Bhoodan”），*Eastern Economist*（《东方经济学家》），XXVII, (Sept. 14, 1956), pp. 397—399。

征集指标未能达到。由于未能解决土地问题这一缺点日益暴露，献田运动就逐渐变成一种宗教复兴运动，主要是致力于改善人性，而不是解决土地问题了。

共产党对献田运动的反应一直是消极的。1953年，P. 腊玛木尔底在《新世纪》周刊上就印共的立场作了最权威性的说明。腊玛木尔底说，献田运动“根本不是人民的运动。这是施舍——是土地的施舍，正像为了其他任何目的的施舍一样”。^①他声称，从帕威等人的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首要目的不是解决土地问题，而是不让农民群众为实现其合理要求而成立的组织和进行的斗争得到加强和发展。”^②一年后，在《新世纪》的一篇论述比哈尔邦献田运动的文章中，重申了这一立场，但又多了一种新的说法。“美国阵营正热烈期望”帕威以一个新的甘地的姿态出现，“整个‘美国院外活动集团’都向这位新的‘救世主’致敬”。文章最后宣称：

轰动一时的献田运动，其重要性和其反动本性就在于此。我们不当因它遭到了一些挫败而看不到它作为统治阶级手中的武器所起的作用——这种武器能将日益发展的农民运动引入歧途并加以分化。它是正当中国农民兄弟解放的光辉范例深深打动了印度农民的心弦时搬出来的。

献田运动实质上就是要把这些新的印象和愿望从印度农民心中消除掉。发起这样的运动就是为了攻印度农民的心。^③

甘地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① P. Ramamurti, "What is Bhoodan Yagna?" (P. 腊玛木尔底:《献田运动是什么?》), *Crossroads* (《十字路口》), May 3, 1953, p. 10.

② 同上。

③ Girija Kumar Sinha, "The Bhoodan Movement in Bihar" (基利札·古玛尔·辛哈:《比哈尔邦的献田运动》), *New Age* (monthly) (《新世纪》月刊), III (June, 1954), p. 76.

但是帕威的旨在改变印度地主心腸的运动，其政治影响比甘地至少要小一些。

在 1957 年年中，正当关于甘地主义的“积极工作者”对国大党已感到灰心失望，因而在选举中反对国大党候选人的消息紛紛传来时，有一些耐人寻味的迹象表明，共产党可能同献田运动和解。同年 4 月，即在共产党人在喀拉拉邦組成政府才几个月时，維諾巴·帕威到該邦去作了五十四天的徒步視察。共产党的首席部长 E.M.S. 南布迪里巴德到边境上去迎接帕威，两人作了长时间的密談。南布迪里巴德还参加了帕威的一次祈祷会，并請这位献田运动的領袖在他的一本著作上签名留念。^①

次月，印度著名的甘地主义者，包括札雅勃腊加什·那腊延在內，在喀拉拉邦举行一年一度的积极工作者會議。帕威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說，南布迪里巴德以前曾誤解了献田运动的綱領。他說，这是在他們二人会见以前，現在他已經原諒了这位首席部长。帕威当时还号召献田运动的工作者設法让人民了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像朱木拿河和恒河一样，能汇合在全民福利的海洋中。^②他在閉幕詞中說道：

許多人以为共产党是一种破坏性力量。我們和共产党在許多問題上也的确有分歧。但共产主义本身并不具有破坏性。共产主义本身是值得重視的一种意識形态。……

归根結底，沒有一个共产党人相信人的本性是坏的。他們承认，經過一定阶段之后，国家将会消亡。我认为，凡是有这种信念的人，自己决不会不相信人的天性。……

共产党……說我們是烏托邦主义者。他們說，在今天，假如有必要，

① *The Hindu Weekly Review* (Madras) (馬德拉斯《印度教每周評論》), April 29, 1957, p. 2.

② *The Hindu* (Madras)(馬德拉斯《印度教徒報》), May, 13, 1957, p. 10.

我們就应准备使用暴力，但到最后，我們所得到的将是非暴力。換句話說，为了最后达到非暴力，他們要求我們今天必須敢于使用暴力。但我认为，如果今天一心要使用暴力，而在这之后你还指望在未来的某一时期会出现非暴力，那是决不可能的。这就是我們和共产党的一些基本分歧。……

只有在我們募集到五千万畝土地以后，土地問題才能解决。但在当初，这么大的一个数目却使我心中产生了怀疑和恐惧。我們想募集到五千万畝土地，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因此，当我心中有了怀疑的时候，我便想起了共产党。他們在那个地区也在进行工作。我当时想，如果我无法相信我們能通过仁爱和劝說募集到足够的土地，那么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相信共产主义。如果这件非暴力和仁爱的事业收不到成效，那你就只有贊成共产主义。这两种意識形态就是如此接近。……共产主义相信暴力，但这无疑是出自一片善心。这是一种奇怪的矛盾。①

不管在研究这两种意識形态的人看来多么不合邏輯，誰也不应当排除印共同甘地主义者达成临时協議的可能性。这种協議显然是共产党人所期望的。他們不仅在自己的理論刊物上轉載了帕威的长篇講話，同时还辟出专栏，供黨員討論全民福利思想同馬克思主义是否有矛盾的問題。这些文章表明，印共希望利用帕威的威望。一个作者在《新世紀》月刊(原文如此——譯者)上說道：“像阿札腊先生(按：即指帕威——譯者)那样的人士都在批評印共，并且是建設性的批評，这不仅是值得欢迎的，同时也表明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專門搗乱的分裂集团，而是一个足够坚强、在印度人民中間有着牢固基础的政党。”②

圣雄甘地的名字在印度仍然是个重要的政治象征，虽然在国家致力工业化时，他的社会和經濟思想被閹割或抛在一旁了。甘

① *AICC Economic Review*(《国大党全国委员会經濟評論》), IX (May 25, 1957), p. 31.

② *New Age* (weekly), (《新世紀》周刊), VI (Dec., 1957), p. 40.

地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实质，也依然原封未动地保留了下来。如果共产党能因拥护这种理想而博得声望，那么他们就能随意利用他的学说中的许多其他理想，而且依然能物色到忠诚的甘地主义者来为他们扛红旗。

第二十二章 結束語：趋向与前景

将来的历史学家恐怕会认为 1956 年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分水岭，因而也就是世界政治的大分水岭。就在这一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历数了约瑟夫·斯大林的罪行，使与会代表大吃一惊；也就在这一年，匈牙利工人愤然起来反对暴虐的共产党政权，向一切愿意看到所谓人民民主制度的暴虐性的人士揭露了真相。早在 1956 年 11 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已说过：斯大林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使“预言苏联再也不会像斯大林生前那样”也不为过分。^①

本书是在 1954 年开始动笔的，即在斯大林逝世之后，但在非共产党世界认清这件事的全部意义之前。因此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大部分是在这一动乱的转变时期中完成的，在这个时期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领袖——其中有不少人因理论和现实不一致而苦恼——力图在遭到公众嘲笑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党员灰心失望的情况下，保持他们的组织。这是个大转变的时期，是争论和混乱的时期。新的思想出现了，旧的教条受到了质疑。

混乱至今尚未澄清，还需要过一个时期，才能有把握地分析共

^①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Nov. 28, 1956, p. 16.

产主义运动在这两三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从本书搜集的証据中所得出的結論，很可能已不再适用，共产主义运动很可能已变得大不相同了。但作出某些結論，仍然是值得的，因为在印度共产党中肯定有一种連續性。到写本书时为止，創立印共的人們还在領導着这个党。其中有些人在作风上可能比較灵活，而另一些人在作风上可能比較頑固。但是，当年率領印共加入統一战綫、当年反对国大党 1942 年的“滾出印度”运动、当年在 1948 至 1951 年期間轉入地下的，也就是这一批人。“社会主义”世界的团结一致现在已因鉄托的大异端邪說以及哥穆尔卡和毛澤东的小异端邪說而动搖了，因此印共的领导人将不得不在他們沒有經歷过的环境中进行活动。但他們过去的表现，理应为它今后所采取的路綫提供綫索。

印共的两种趋向

印共的党史可以归結为时而采取“左”的路綫、时而采取“右”的路綫，即时而采取反資本主义战略、时而采取反帝国主义战略的过程。这两种战略最初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由 M.N. 罗易和列宁分別在他們提綱中提出的，自那时以来，它們就成为印共政策的两种相反的方案。

这两种战略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待資产階級民族主义的态度。“左”的战略目的在于**完全**反对資本主义，視資产階級民族主义为敌人。“右”的战略目的則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垄断資本主义，視資产階級民族主义为盟友。由于印共时而采取这种战略，时而又采取那种战略，因此它时而同国大党——印度資产階級民族主义的主要代理人——进行斗争，时而同国大党(和它的領袖或只和它的黨員)进行合作，反对英帝国主义。

所以，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以来，这两种战略的抉择，基本上取决于印共当时为自己所规定的目标。如果它当时的目的仅在于把印度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它就同国大党合作；如果它当时的目的在于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政权，它就反对国大党。但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一向是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为转移的。俄国的领导人特别热中于通过摧毁英国殖民地的支柱来削弱英国，因而自然主张采取联合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帝战略；而印度的革命者，例如罗易，则特别热中于使印度在独立后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而主张采取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战略。

尽管作为负责领导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国际高级领袖，罗易有其一定的影响，但直到1928年，在共产国际的官方政策中占上风的，还是列宁主义的反帝战略。在1928年以后，由于苏联外交政策遇到了许多挑战，共产国际的抉择就变得困难了，但也一直是取决于苏维埃政权的相对的外部安全。只要苏维埃政权认为它受到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个称霸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它就相应采取一种“右”的、反帝的战略，以图争取广大的同盟军。只要它认为不大会受到这种威胁，它的领导集团就可以采取“左”的、反资本主义的战略。

苏维埃政权在斯大林领导下，到1928年已比较巩固，它先前的帝国主义敌人——英国，对它的威胁也相应减小了，因此，它可以要共产国际转而采取反资本主义的战略。但是到了1933年，又出现了另一种“帝国主义”威胁，那就是法西斯德国，因此，还不到两年工夫，共产国际就因为苏维埃政权想寻求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以对付这种威胁而被迫改变策略。德苏条约缔结以后，苏维埃政权又能苟安一时，于是共产国际便又试行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需要争取一切同盟者来反对“帝国主义”威胁；这段同资产阶级同盟者合作的时期一直持续到战后，以便苏维埃政权能着手进行恢复和巩固。但到了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领导人又认为有机可趁，可以向资本主义发动总攻，于是便不顾存在着分歧的意见，开始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推行“左”的战略。到1951年左右，这种战略（再加上对朝鲜的军事侵略）还未能战胜资本主义阵营，美国反而变得空前强大，成为苏联的劲敌。于是苏联领导人便又一次恢复了“右”的战略，以图争取反美的资产阶级同盟者，来壮大自己的声势。

近年来，这种“右”的战略已有所改进，以便用于不发达国家。它仿效东欧的“人民民主”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号召同资产阶级合作来反对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垄断资本主义；在印度，其结果是印共同地方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国大党中央政府和邦政府中的大资产阶级。正和在其他时期（如1935—1939年和1945—1947年）一样，这种战略是通过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视情况而定）的统战策略体现出来的。

印共既然日益倾向采取这样一种立场即支持资产阶级的尼赫鲁的一些进步的（即社会主义的）方面，它就势必倾向采取一种基本上是新的战略，即联合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但采取这种战略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主要取决于苏联的安全状况，因为左右印共的政策，是苏联的安全状况。

但是，当印共的正式政策虽然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战略时，却很少能把另一种战略完全压制下去。“左”的和“右”的宗派集团一直存在；宗派集团为反对正式奉行的政策而进行的活动也一直沒有彻底根绝。这种活动往往使印共迟迟不能采纳新的政策；它还引起对新政策的歪曲或误解；有时它还使印共的正式

文告中出现暂时背弃这种政策的现象。

这种正式政策忽左忽右的现象，在印共的早期历史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 M.N. 罗易的著作忽而肯定共产国际的反帝战略，忽而又肯定罗易本人所主张的反资本主义战略。但在印共历史的任何时期中也都还能找到许多其他的事例，足以证明印共有时是公然违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中央委员会 1946 年的八月决议，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更重要的是，宗派集团为反对印共的正式政策而进行的活动，使得印共或该党某些组织在实际作法上阳奉阴违。当权的印共领导人，曾不断抱怨党内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这种对正式政策的反抗，曾不止一次地表现为公开反对党的领导。印共在 1948 至 1950 年兰纳迪夫领导时期的分裂，就是这种普遍现象中最突出的例子。

印共内部的宗派斗争的程度是如此之严重、为时又是如此之久，以致不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下令就很难解决。印共经常欢迎甚至要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干预，以此作为打破僵局的唯一出路。但依靠国外的命令所得出的解决一向是勉强的，而且是暂时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宗派活动一直存在。

因此，可以看出，印共一方面是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命是从，另一方面却又不断有派别活动，抗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就像它所在的那个国家一样，很不团结。印共党内的分裂状况恰恰反映了国内的分裂状况，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显然也是如此，但是其程度却不及印共。印共党内的每一派别，通常都是印度这个国家内某一因素（不论其为意识形态的、社会的还是地方性的）的缩影。本书已简略地介绍了这些派别，并试行加以鉴别。印共在其整个历史中，显

然一直包括着一个继承了印度的恐怖主义传统的、激进的革命派和一个继承了印度比较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温和的渐进派。它有时还包括一个专门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农民派,和工会派,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派以及其他一些代表这个国家内各社会阶层的派别。此外,它还有一些代表印度各地区的特殊利益的地方派。

这些派别彼此倾轧,结成各种各样的联盟,这些联盟的关系一直不是很明确的,而且经常在起变化。在争吵中双方总是像经院哲学家那样,企图以理论取胜。而事实上它们的立场往往也似乎是从教条出发的。但这些派别的立场显然也是从印度的具体情况和具体需要出发的。这种教条和现实的矛盾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出现于1941年7月至12月,即在纳粹入侵苏联之后。当时,印共某一部分人因遭监禁而在一定程度上同印度的现实相隔绝,他们遵循着这样一条教条,即不惜任何代价支持战争,而另一部分人则在紧张的政治形势下从事地下工作,显然受了在印度占着上风的反战情绪的影响。党内的这种矛盾最后还是依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才得到解决,但以前那种实际上抗拒这条路线的情绪并未消失;约希承认,这种情绪在1942年8月曾再度强烈地表现出来,使印共一度改变了它的方针。在这件事例中,对国际共产主义世界(即对苏联的利益)的忠诚,成为决定印共的政策的主要力量,但这不是唯一的力量,因为它并没有把印共变成一个符合共产党组织的理想形象的、团结一致的政党。

力量和弱点的来源

印共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已经成为其力量和弱点的来源。印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的忠诚,在某一方面加强了它自己,因为这种忠诚能使内部团结,从而使印共不致有人分裂出去和变节,

而在印度的其他左翼政党中，分裂和变节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领导人和 R. 帕姆·杜德对印共所起的作用同尼赫鲁对国大党所起的作用一样——他们一直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威信使印共团结一致的仲裁人。在紧急关头，如在 1950 年，他们确曾使印共免于灾难。

但印共仰仗国外的指导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也对该党有不利之处。首先，它使得印共背上外国代理人的恶名，使得人们认为他们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胜过忠于印度的利益。印共领导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来证明这种指责他们效忠外国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印共和莫斯科的关系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足以使这种指责具有损害性。其次，对印度党提出的指导和劝告，往往主要是为了达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实际上也就是苏联外交政策的目的，因此，这种指导和劝告往往不是为了使印共更有机会取得政权。事实上，苏联的劝告时常缺乏一种对印度情况的现实看法，因此它要求印度党采取的政策往往严重地影响了它取得政权的机会。最明显的例子出现于 1928—1935 年的左倾时期，当时印共响应国际领导的号召，攻击甘地、国大党、尼赫鲁和“改良主义的”工会，从而就使自己同印度政治的主流完全脱离。另一个例子是 1948 年的极左战略，不过这个例子不如前一个例子那样明显罢了。

如果说妨碍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取得成功的最大障碍是约瑟夫·斯大林，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分。斯大林利用共产国际作为反对俄国党敌人的场所，因而常常把不符合当地的政治现实和需要的政策强加于共产国际的其他成员党。如果共产国际当初承认甘地的革命性，并利用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把尼赫鲁吸引到印度一切左派力量的领导集团中来，那么，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

絕不会像今天这样。相反，在約瑟夫·斯大林的指使下，共产国际反对甘地，撇弃尼赫魯。如果共产国际当初同这两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密切合作，那么在 1947 年印度独立后印共原可能分享一部分政权。

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具体应用在印度时往往証明很不切合实际，但是，据说构成这种政策基础的意识形态，却使印共在心理方面有所收获。在印度，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共同的世界观使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具有空前的斗争热情。甘地本人在其著作中就曾对印度共产党人的才能、魄力和献身革命的精神表示钦佩。这种斗争热情虽然有很大一部分都化在内訌上了，但仍足以成为印共的积极力量的源泉，成为令人——即使是反共最坚决的人——嫉妒的原因。

此外，对印度的很大一部分人——一群看不起传统的伦理准则而又十分不信任西方民主制度的无所适从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意识形态有其潜在的吸引力。印共作为一个组织所具有的种种诱人之处，更加强了这种吸引力；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印共这一组织使那些抛弃旧的社会伦理准则的人感到自己又有了归宿。

同这有关的是共产党国家所提供的那种潜在吸引力。苏联在对印度的宣传中，力图描绘出一个强大、繁荣的制度的形象，在这个制度下能取得物质方面的富足，而又没有物质主义的庸俗或贪婪。比苏联更具有吸引力的大概是中国了，因为在许多印度人看来，中国是一个生气勃勃而又有高度文明的国家，为奉公守法的人民所支持。

所以，印共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虽有其极为不利之处，但也有其极为有利之处，因而既给印共带来一些弱点，也给印

共增添了一些力量。要衡量其得失，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絕不能认为印共由于效忠外国就不可能在印度取得政权。事实上，印共在喀拉拉邦已經証明，尽管它效忠外国，它还是能够通过民主方法取得政权。

印共所处的国内环境，也給印共带来一些力量和弱点——要衡量其得失，也是不可能的。

印共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印度人对西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和这种怀疑时常联在一起的，是对苏联的同情并把苏联看作是同道。賈瓦哈拉尔·尼赫魯对这种情緒作了最好的說明，他在1928年說过：

至于俄国，它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它像我們一样，为世界各国所排斥，受尽誹謗，也常犯錯誤。但是尽管它常犯錯誤，它今天却是帝国主义的劲敌，它对东方国家一直是公正的、慷慨的。……

俄国以平等的身份，而不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或带着种族优越感来对待东方。因此就难怪它受到欢迎了。①

尼赫魯从来没有对苏联或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失去过同情。但他的看法大都是持平的。虽然他在大半生里一心想使印度从西方帝国主义統治下得到解放，但他也发觉苏联有扩张主义的迹象。从他近年来在訪問苏联和中国之后，就“共产主义道路”問題所发表的一些演說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非常了解共产主义有其专制极权的一面，并反对它在印度传播。尽管他有时也誤入歧途，但看来他在感情上是矢忠于那些体现为英国式議會民主制度的自由的。

但对于尼赫魯來說(对于印度許多知識分子來說也是一样)，

① Nripendra Nath Mitra ed.,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28*(恩利奔德腊·那特·米德腊編:《1928年印度年鉴》),(Calcutta: Indian Annual Register, 1928), I, 461.

他还矢忠于經濟自由，而他认为这种經濟自由是包含在“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中的。馬克思主义的几个变种，在印度广泛被接受，这一情况縮小了西方化的印度领导人同印共之間的差距。只要共产党主动接受議會方法，那么这种差距就几乎可以完全弥合，因此，印共可能同国大党中的社会主义分子合作，并不是不可想像的。不管怎么說，印共終将因社会主义思想在印度被广泛接受，而获得一些支持。

甘地主义的思想，特别是非暴力思想，一直是印共的一个障碍，但就在这一点上，意識形态的調和也不是不可能的。必須記住，甘地主义的政治策略并不是消极的；恰恰相反，这些策略养成了一种訴諸直接的群众性行动的习惯，这种习惯对共产党有利，正如它有利于任何其他政党一样。

印度活生生的甘地主义传统的主要特点，恐怕还是社会服务的理想。印共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以这种理想作为标榜的，就此而言，这也可算是印共力量的一个来源。近来印共对献田运动所采取的合作姿态，表明他們已認識到这种理想是可以利用的。印共可以通过它的群众組織和外围組織的福利活动，特别是通过和平运动，表示拥护无私的服务这一全民福利运动的口号，以取得人們的支持。

国内环境中的最后一个力量来源，就是地方主义傾向。印共在同这种力量合作方面，表现出巨大的适应能力；事实上，它从印度的地方观念中所取得的力量，可能比它从階級观念中所取得的力量还要大。印共同地方党派达成協議、組成統一战綫的策略，作为一种向国大党在邦和中央一級的近乎垄断的势力进行挑战的手段，是非常有力的政治武器。

許多西方观察家认为，尼赫魯的外交政策似乎有亲苏的傾向，

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他的目的似乎是要把印度变成一个共产党国家。1955年12月，美国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說道：“尼赫魯和鉄托不是中立的。他們在事实上和效果上——即使不在外交詞令上——是共产帝国主义的帮手和同盟者。”某些持有这种看法的人，甚至竟說尼赫魯可能参与了旨在使印度加入苏联卫星国体系的密謀。印度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例如 V.K. 克里希那·梅农对于匈牙利問題在联合国的表现，似乎为这些理論提供了証据。

分析印度的外交政策固然不是本书范围内的事，但是从印度政府对印度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所采取的态度，的确能看出印度政府对世界共产主义和主要的共产党国家的政府所持的态度。在观察自独立后至1957年間印度政府对印共的态度后，人們必然会得出这样一种結論，即印度政府一向是在議會制度的規則所允許的范围内，大力反共的，曾有几次，为了限制印共的活动，印度政府即使沒有违背了这些規則，至少也违背了这些規則的精神。为了限制印共活动，它采取了一項政策，其内容有：（一）派警察严密監視印共、其附属机构及其同国外的接触；（二）限制共产党人出入印度；（三）对派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外围組織的代表团加以种种限制；（四）在共产党人一旦破坏法律时立即将其法办，在預料他們会破坏法律时對他們广泛实行預防拘留；（五）对共产党举行的公众集会进行监督，有时則加以限制；（六）政府和国大党的领导人大力进行反共宣传；（七）建立群众性組織以同共产党控制的群众性組織相抗衡；（八）政府和国大党的人員大量滲入印共某些外围組織，以使共产党无法掌握其組織政策；（九）如印共采取武装斗争政策，即对其进行严厉鎮压；（十）奉行一种外交政策，其副作用是让苏联认为命令印共采取合乎宪法的溫和的政策是对苏联有利的；（十一）进一步使共产党人享有充分宪法权利，包括担任公职在內，

以使印共在目前的政府制度中占有既得利益。

直到 1958 年，这种政策似乎一直行之有效，共产党似乎还无力推翻目前的政府制度。此外，还有迹象表明，由于受到内外两方面的压力，印共可能会修正它的哲学，从而抹消它同其他左派政党之间的区别。

教条的衰微

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教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也是靠教条来维持它的团结的。这种教条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无产阶级是绝对正确的、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是绝对正确的、印共是绝对不会犯错误的、议会是剥削阶级的工具、历史的进程必然要使印共掌握政权，等等。每当现实同教条发生矛盾时，共产党人总是故意漠视现实。他们所以能够这样作而没有给印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一群团结得比较紧密、有良好纪律的人；反之，他们所以能保持紧密的团结和良好的纪律，就是因为他们盲目信仰教条。

今天在印度和全世界所发生的迅速变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教条是否还能在印度共产党中起它过去一贯所起的作用。文化和知识的普及，以及大国竞相进行的宣传，恐怕早已使教条威信扫地，从而打开了一条道路，使现实能够较容易地为人们所接受，能够较容易地来控制人们的行动。斯大林的偶像已被推倒，再也不可能照原来那样重新树立起来了；虽然独裁者一定还会不断地上台、下台，但是人们不禁要怀疑，是否还能不让广大的人民了解，所谓“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其实只是一种旨在掩饰外国控制的神话，正像所谓“白人的负担”，被帝国主义者用来掩饰对殖民地的剥削一样。

在印共內部也隱約發生了一些變化。像戴維·寇因和洛梅什·塔巴爾等人，雖然並不打算廢除一切的教條，但卻猛烈攻擊某些最基本的前提。他們力圖使印共重新對印度的環境作一番比較現實的估計，這種企圖必然會產生深遠的影響。人們猜測將來會有更多的共產黨人提出更多的問題來，巧妙地搬弄空洞的口號和照例引用列寧的話，將越來越不起作用。

由於不大可能通過民主選舉的方法在印度取得政權而產生的失望情緒，一直是加深印共的教條主義與關門主義的一個因素。但 1957 年印共在喀拉拉邦的勝利，要求改變對議會制的看法。在喀拉拉邦的勝利產生了兩種重要的影響：第一，它為在其他各邦取得同樣的勝利以及在目前可以想像的未來在中央取得同樣的勝利展開了前景；第二，它使得現在初次因出任公職而享有威信和津貼的共產黨人在議會制度中有了既得利益。只要在未來選舉中有獲勝的希望，印共就可能會充分利用議會策略。

宗派鬥爭在黨內必然繼續存在，目前對議會所採取的溫和政策將受到左派的攻擊，其理由是領導集團放棄了黨的革命目標。這些論斷將大力仰仗經典著作作為根據，因此左派可能成為教條主義的主要維護者，而右派則會更加一心一意地面對“客觀現實”。

如果右派掌權，那麼印共將不成其為本書所描述的黨了。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他們恐怕不會完全丟棄極權主義思想和超越國界的忠心，因為這些正是共產主義的要素；但他們已表現出一種傾向，在這兩方面會有所收斂。

在寫本書之際，即 1958 年春天，印共距離取得全國政權還有一些時日。它獲得成功的機會，取決於許多千變萬化的因素，其中包括：人民對議會制政府所具的信心能維持多久；國大黨能否吸收年輕有為的人作領導人；尼赫魯總理的作用；以及國際形勢，特別

是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印共既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也不是一直不起变化的；它必然会受到将来在印度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的影响。迄今为止，就印共的性质而言，一直是共产主义的色彩浓于印度的色彩。但它业已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特别是在策略方面。只要它的印度色彩哪怕稍微再浓一点，它就必然会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后 記

1957—1958年，印共的性质和前景发生了若干显著的改变。因此，这段时期所发生的某些重要事件，值得在本书結束前加以評述。

印共特別代表大会：組織方面的改革

在印共的最近发展中，一件最引人注目的事就是1958年3、4月間在阿姆利則举行的特別代表大会。^① 印共领导人自称，召开这次特別代表大会的主旨，并不是要解决政策問題，而是要解决組織問題。因此，这次會議比較重要的成就也就在組織方面，虽然印度和全世界的报纸关于这次會議的报道往往側重于某些臆測的政策改变上。

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产物是一份經過修改的党章。^② 这份党

① 印共当时公布，党员已經增加到二十三万人左右。印共这次虽未发表关于党员成分的統計数字，但却发表了一份关于代表大会代表成分的报告，自1943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根据这份报告，在印共领导人中仍然是非无产者占优势。代表中有67%左右都不是无产階級或农民階級出身（中产階級、地主階級、“小商人”），有72%左右受过一定的大学教育，有78%左右年在45岁以下。见《新世紀》（周刊）（*New Age, weekly*），V（April 27, 1958）p. 6.

② 党章草案刊于《新世紀》（*New Age*），V（February 23, 1958），pp. 7—12。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討論了这份党章草案，并略有修改，詳见《新世紀》（*New Age*），V（April 13 and 20, 1958）。通过的党章见印共：《在阿姆利則举行的印度共产党特別代表大会通过之印度共产党党章》（*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dopted by the Extraordinary Congress at Amritsar*）（譯文见《印度共产党特別代表大会文件选輯》，世界知識社1958年版，第30—53頁。——譯者）。本书作者手头沒有这本小册子，因此，下边关于党章的論述系以《新世紀》的材料为根据。

章与以前的几个党章修改本不同，它不是对原来的党章略加修改，而是彻底改写。虽然唯有实践才会表明这些改变的全部意义，但它們至少造成了一种大规模整党的印象。

乍一看来，恐怕最显著的改变就是名称上的改变。党的基层组织名称从“小组”改为“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全国委员会”，政治局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层下级委员会的名称也同样作了更改。就这些改变本身来说，并无任何意义，但是，它們却很可能有助于造成一种印共“印度化”的印象。

比名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印共各领导机构在编制上的改变。中央委员会或全国委员会的成员过去从未超过三十九名，现在则“不得超过一百零一名”。政治局的成员过去从未超过九名，而现在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则“不超过二十五人”。此外，印共以前一直只有一名总书记，而现在则在总书记以外另设五至七名书记——由这些人和总书记共同组成“书记处”。邦和县委委员会的编制也同样有所扩充。

印共这样扩充它的领导机构，显然使它的各领导机构有趋于瘫痪的危险。只要宗派斗争还以以前那种程度在党内继续存在，今后它就更可能在上层组织中反映出来。事实上，在这次特别代表大会选举扩大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新成员时，已经可以清楚看出，过去和现在的印共骨干分子势必都会当选。被选为书记处书记的，除原任总书记高士外，尚有 Z. A. 艾哈迈德、M. 巴薩瓦·崩尼阿、S. A. 丹吉、普卑什·古普塔、A. K. 高普兰、P. C. 約希和 B. T. 兰納迪夫。很难想像出比这更混杂的人选了。书记处中包括了三十和四十年代的两个主要的对头：約希和兰納迪夫，以及安得拉集团的主要代言人：巴薩瓦·崩尼阿，这是政见多种多样的明证。书记处成员在地理分布上的多样性也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它

包括了南印两名,中印北部两名,馬哈拉施特拉两名,孟加拉一名和旁遮普一名。最后,書記处成員在职务上也是各种各样的,因为其中既有著名的工会及农民領袖,又有議會雄辯家和宣传家。

在这次特別代表大会上,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部二十五名成員。除了上述那些人选以外,还有 E.M.S. 南布迪里巴德、过去的总書記 C. 腊捷什瓦尔·腊欧、P. 腊瑪木尔底、S.G. 薩尔堆賽、索含·辛格·卓什、坡瓦尼·森和其他一些人。如果再加上新选的一百零一名全国委员会成員,那末印共党史中熟悉的名字便几乎包罗无遺了。^① 扩大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使之包罗各色人物,

①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員如下:阿約艾·高士、S. A. 丹吉、普卑什·古普塔、Z. A. 艾哈迈德博士、B. T. 兰納迪夫、P. C. 約希、A. K. 高普兰、M. 巴薩瓦·崩尼阿、S. G. 薩尔堆賽、約底·巴苏、坡瓦尼·森、哈累格利什那·果那尔、C. 腊捷什瓦尔·腊欧、腊維·那腊延·雷迪、E. M. S. 南布迪里巴德、M. N. 果温丹·乃尔、K. 达摩达濫、罗米希·錢德拉、N. 勃腊薩达·腊欧、帕尼·波腊、古魯札濫·巴德乃格、P. 腊瑪木尔底、M. R. 文加达腊曼、哈利基閃·辛格·苏尔吉德、索含·辛格·卓什。

全国委员会全体委員如下:

安得拉邦: P. 孙达腊雅、C. 腊捷什瓦尔·腊欧、M. 巴薩瓦·崩尼阿、腊維·那腊延·雷迪、馬格东·摩喜烏丁、T. 那基·雷迪、M. 哈努曼塔·腊欧、T. 薩达那腊雅那、Y. V. 格利什那·腊欧、N. 腊捷薩卡腊·雷迪、D. 文加堆什瓦腊·腊欧、G. B. 巴那雅、K. L. 那腊息莫含、B. 耶拉·雷迪、M. 占德腊塞卡腊·腊欧。

阿薩姆邦: 帕尼·波腊、阿紧达·帕达札腊。

比哈尔邦: 尤根德腊·沙尔瑪、因德腊底勃·辛哈、札甘那特·薩尔卡尔、阿里·阿什腊弗、苏尼耳·穆克吉、加腊南德·沙尔瑪。

古季腊特邦: 金达尔·梅达、季曼·梅达。

喀拉拉邦: E. M. S. 南布迪里巴德、C. 阿朱塔·梅农、M. N. 果温丹·乃尔、K. 达摩达濫、S. 古瑪濫、C. 温尼·腊札、P. K. 瓦苏堆万·乃尔、K. K. 瓦尔利尔、洛薩瑪·崩諾塞夫人、E. K. 伊莫比季·巴瓦、T. C. 那腊雅南·南比阿尔、K. A. 吉腊里延、P. 巴拉占德腊·梅农、C. H. 加那濫、O. 札那尔达南、V. S. 阿朱达南丹。

中央邦: L. R. 坎德加尔、B. K. 古普塔。

馬哈拉施特拉邦: S. G. 薩尔堆賽、苏达莫·堆什木克、B. T. 兰納迪夫、S. G. 巴德加尔、占德拉·古普塔·乔杜里、G. 阿提加利。

曼尼普尔直轄区: 比腊·辛格先生、提恩·梅克占德腊。

其主要目的之一很可能是想要造成一种团结的印象。但是，如果这种团结实际并不存在，那末，这种安排恐怕就未必能促进有效的领导。

但是，印共党章的确企图克服某些长期妨碍有效的中央领导的障碍。设立书记处就是一个步骤。印共显然想把这个机构当作一个“小内阁”，以便能对印共各方面的活动不断进行协调的指导。党章规定，中央级和邦级书记处的成员应当完全致力于书记处的工作——显然这是企图消除党领导人只致力于宗派活动或只注意他自己那一部门的事务，而忽视日常工作的倾向。此外，党章还再三强调，中央和各邦书记处必须“集体行动”——这显然是想消除各自为政的倾向。党章还规定，要从党费收入中指定一部分拨给中央各机关，从而消除了中央没有正常经费来源可依靠的情况。

但是，这些改变虽然看来加强了党中央的权力，却又为另一些

迈索尔邦：N. L. 乌帕达雅、B. V. 加克基拉雅。

奥里萨邦：果古耳·摩含·赖·朱达玛尼、腊玛格利什那·巴底、古鲁札滥·巴德乃格。

旁遮普邦：索含·辛格·卓什、哈利基因·辛格·苏尔吉德、札格基德·辛格·拉耳布利、阿乌达尔·辛格·玛耳霍德腊、马斯特·哈利·辛格。

拉贾斯坦邦：H. K. 乌雅斯、摩含·布南米阿。

泰米尔纳德：P. 腊玛木尔底、M. R. 文加达腊曼、M. 卡拉那孙达腊莫、N. 散加腊伊雅、P. 捷瓦南达莫、B. 斯利尼瓦萨·腊欧、K. 腊玛尼。

特里普拉直辖区：达斯腊特·达勃、比冷·杜德。

北方邦：加黎·因加尔·舒格拉、散加尔·达雅耳·底瓦利、S. S. 优素福、希乌·古玛尔·米斯腊、札伊·巴哈都尔·辛格。

西孟加拉：约底·巴苏、腊嫩·森、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坡瓦尼·森、卓耳里·高耳、因德腊季德·古普塔、哈累格利什那·果那尔、索莫那特·拉喜利。

德里直辖区：Y. D. 沙尔玛、M. 法鲁奇。

党中央：阿约艾·高士、S. A. 丹吉、普卑什·古普塔、Z. A. 艾哈迈德博士、罗米希·钱德拉、N. 勃腊萨达·腊欧、P. O. 约希、累努·查格拉瓦尔底、喜冷·穆克吉、巴尔瓦底·格利什南、萨札德·札喜尔、S. V. 卡堆、哈支腊赫·卑古莫、A. K. 高普兰。

用意恰恰相反的改变所抵銷了。还有几項改变削弱了中央的权力。例如,新党章取消了中央委员会(或全国委员会)的可以推选新委员或自行改組的权力。新党章还削弱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监察委员会的控制,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經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不得駁回这一上訴机关的决定。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有几項变动是把权力从中央下放到下級机关。解散或改組下級党委会的权力,过去属于中央委员会和省委员会,今后則完全归省委员会。指导党内討論的权利过去属于中央机关,今后則凡是有关全邦性的或地方性的問題,一律归省的党机关。惩戒权过去基本上属于监察委员会和其他中央机关,今后則部分下放到新的省监察委员会——省监察委员会的决定将“通常是最后的决定”,尽管规定以中央机关为归依。

除了这些具体规定的权力下放以外,党章还闡明了中央机关与邦一級的机关两者間在权限上的大致划分。它在闡明民主集中制时說,全国性的重要問題应由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来决定,但全邦性或地方性的問題則“通常由同一級的党組織来决定”。中央机关仅仅在一切地方性决定都不得违反中央政策这一条中是至高无上的。但另一方面,中央领导机关如果要对同一个邦有重大关系的問題作出决定时,事先必須同有关的邦党組織协商。

因此,印共新党章实际上在党的組織方面实行了相当程度的形式上的权力下放。它甚至体现了一种联盟結構的基本原則,以这种联盟結構代替了以前党章所规定的那种严格的集权結構。我們只要回忆一下联盟主义这一党的組織原則曾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受到激烈的譴責,这一事实的意义便更清楚了。它在印共党章中的出现是与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的长期传统背道而馳的。

有充分的証据表明，新党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党对可能的参加者和追随者更具有吸引力。在这以前，印共虽曾多次决心要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或动员群众在选举中支持它，但却从未采取任何行动来消除那些妨碍它达到这个目的明显障碍——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印共本身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独裁組織。现在，印共终于采取了这样一种行动。据 G. 阿提加利博士在他对特别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里表示，新党章“对于所有誠心誠意想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民主爱国人士，必然具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而且必然会推动他們在为社会主义奋斗时参加或支持我們的党”。^①

还有，尽管党中央机关形式上的权力已經有所削弱，但所余的权力仍然足供进行有效的控制。只要党内各种实际的权力工具通过其他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改革得到加强，只要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团结，那末党的领导便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在这种情况下，1958年的印共党章所规定的权力下放便没有什么意义了。很可能，最高級人物——也就是自从印共成立以来就领导党的那些人——都希望并预料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不能取得团结，如果新党员或为印共所吸引的追随者要求进行实质的改变以配合形式的改变，那末印共的基本情况就可能会发生彻底的变化。

印共特别代表大会：政策方面的修改

这些組織方面的改变虽然很耐人寻味，但在印度国内国外，却不如新党章的另一方面更引人注目，那就是经过修正后的党章序言关于原則的說明，序言首先照例重申党的目的是要使由工人阶

^① *New Age* (《新世紀》), V (April 13, 1958), p. 4.

級領導的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它接着又故作惊人之笔，揚言要使它的信条“印度化”。在宣称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党的政策的基础后，随即又声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思想必須与“印度的现实条件”、“印度的历史”、“印度人民的优良传统”、“印度的民族特点”相結合。为了把这一点解释得更加具体，它还声称印共“力求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充分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此外，序言还說，在所提出的“人民民主”制度下，“保証尽可能地扩大个人自由以及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保証人人都有組織政治团体的权利”。因此，序言的实质乃是对印度的非暴力和民主的传统的屈服。

总書記阿約艾·高士在代表大会閉幕后所发表的一項公开声明里，闡明了新序言的意义。^① 当有人問他印共是把和平手段当作信条还是把它当作策略时，高士回答說：“两者都不是”。他說，序言不是欺騙，但另一方面，也不等于接受非暴力原則；他說印共不能保証今后永远不需要使用暴力；序言仅仅意味着，印共察觉到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便是劳动人民（按即印度共产党）可以通过获得議會多数取得政权，而不必用暴力对付旧統治階級的反革命以自卫。高士說，“我們將竭尽全力来使这种可能性在我国变为现实”。印共坚持使用和平手段显然是暫时的和带有条件的。高士最后說，序言与全民福利哲学毫无共同之处。

在这件事例上，印共在表面上似乎又一次违背了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固有传统。但实际上，它只是把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中一条已經完全确定的原則納入它自己的正式党綱里而已。在1956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俄国领导人乐观地宣称，在当

^① 阿約艾·高士：《关于印度共产党的阿姆利則特別代表大会》，《印度共产党特別代表大会文件选輯》，世界知識社1958年版，第56—73頁。

前条件下，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的方法取得政权。至于这种情况究竟可能在什么地方出现，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赫鲁晓夫本人是含糊其词的。他只是说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但是，米高扬在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里说得比较具体。他宣称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地点邻近共产主义国家的“某些个别国家”。他说，这些国家的和平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受到“在邻国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的支持^①。

因此，印共很快就承认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并将它纳入他们的党纲中，原是在意料之中的。

阿提加利在从党的组织和党的政策方面扼要说明新党章的意义时宣称，印共现在在形式上更富有民族性和人民性，但在内容上，它的共产主义精神则丝毫不减。按照布尔什维克惯用的民族政策定义来理解，可以说这一声明恰恰说明了这些变革的策略性。把1958年的印共新党章看成是印共在性质方面的一个革命性改变，固然会是过于轻率，但若等闲视之，认为无关重要，或者否认从长远看来“形式”可能会影响“内容”，未免也同样是轻率的。

无论如何，这个党章代表着印共走向成熟的一步，因为它表明印共对印度的复杂的、权力分散的政治环境的适应力已经有所增长，即使仅仅是在表面上。

印共政策最近的演变

尽管在党章序言里作了一些修改，1958年的特别代表大会并

^{*}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上），第42页。

^① 《米高扬同志的发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上），第444页。

不标志着印共在战略和策略方面有何重大改变。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冗长的政治决议，不过这项决议仅仅是重申现行政策的主要路线而已。^① 它集中攻击美国，说美国是“全世界上最富有侵略性的势力”，同时号召所有“民主”力量团结一致，向帝国主义及其在印度的反动同盟者，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为了推行这种战略，决议提出了对其他反对党采取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灵活结合的统一战线策略。决议说，要设法“同这些政党和它们的追随者采取共同行动”。它接着赞扬同其他政党的合作，主要是在邦一级的合作（像统一马哈拉施特拉协会和大古季腊特人民大会）。而另一方面，它又大谈有必要发起一个团结各反对党中的进步人士的群众性运动。至于对国大党的策略，决议则号召与该党党内进步人士进行合作，这其实是意味着采取这样一种政策，那便是在中央（在那里，国大党的进步人士暂时占优势）适当地支持尼赫鲁政府，而在地方（在那里，国大党反动分子当权）则攻击国大党的邦政府。决议赞扬了尼赫鲁政府所实行的某些“社会主义”措施，但最后却说，只有劳动人民的政府才能实现充分的社会主义。

据阿约艾·高士后来表示，特别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在“任何重要方面”^② 都并未改变帕尔加特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策。但是，如果要对这项政策有更充分的了解，还有待对印共的一些更具体的宣言和活动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从印共对尼赫鲁总理在 1958 年扬言要辞职一事的反应，恐怕也能看出印共对尼赫鲁的态度。不管印共私下的态度如何，它对

① 《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印度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世界知识社 1958 年版，第 1—17 页。

② *New Age*（《新世纪》），(May 18, 1958), p. 8.

这种前景并未公开表示欢欣鼓舞。它認識到，尼赫魯的这种态度正反映了反动势力的影响在他的政府内外日益增大。因此，它要求尼赫魯勇敢地对付这种挑战。印共說，“全国人民一致期望尼赫魯先生和进步的国大党人发起一場爭取通过具体措施来解决危机的斗争。”印共說，只要尼赫魯采取坚定的立場，“他一定会得到包括我党在内的所有爱国和民主人士的支持和合作”。^①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声明与 1947 年当印共在 P. C. 約希的领导下宣布效忠于尼赫魯领导的印度新政府时所发表的声明非常相似。还应当指出，到 1958 年 6、7 月間，約希已被任命为印共机关刊物《新世紀》周刊的总編輯。他是在升任为書記处書記后随即出任这一职务的，这就意味着他的势力，或者还有党内溫和派的势力，正在日益增长。

印共在工会方面的活动則表明，印共对其他反对党采取了比較妥协的策略。1958 年初，由印共领导的全印工会大会和由社会党及其他一些左翼組織领导的各个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共同提出了一项“請願书”，并宣布 3 月 27 日为“全国团结日”以支援这项請願书；同时，印共同这些組織在印度全国許多大城市中共同举行了群众大会。^②但是，在印共与其他工会联合会进行合作的同时，他們还利用了这种善意，团结和扩充了全印工会大会。1957 年，全印工会大会在会员人数上大大超过了由社会党领导的印度劳工协会，而且大有迅速超过国大党所领导的印度全国工会大会之势。^③到 1958 年秋天，全印工会大会就自称是全国最大的工会联合会了。

① 同上，(May 11, 1958), p. 2.

② 同上，(March 27, 1958), p. 6.

③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July 8, 1958, p. 6.

在印共从妥协政策中所获得的一些其他明显的好处中，还有在选举方面所获得的几次重大的胜利。印共在統一馬哈拉施特拉协会中与各个馬哈拉施特拉組織結成了联盟，从而使一位共产党员，S.S. 米腊吉卡当选为孟买市长；因为根据一項早期的協議，該协会的正式市长候选人是由各成員党輪流提名的，而 1958 年正好輪到了共产党^①。在德里，印共与其他左派力量合作，使該党前中央委员会委員，阿魯那·阿薩夫·阿里当选为該市市长。

但是，衡量印共最近政策的主要尺度和該項政策所經受的主要考驗，却是在另一个地方，即喀拉拉邦。

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

在印共的特別代表大会上，喀拉拉邦代表团是人数最多的。对与会者和列席者來說，它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在會議的議程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有关南布迪里巴德政府政綱的报告和討論。据《新世紀》报道，在代表大会閉幕那天，当代表們在阿姆利則游行时，以南布迪里巴德所受到的欢迎最为热烈。能看到他，“似乎是那些佇候在烈日下的人們最大的光荣。”^②看来，在印度全国各地正像在阿姆利則一样，这种由于出任政府职务而带来的威望，对印共來說大概是有好处的。但是，喀拉拉邦政府的政績却带来了某些消极的影响。

南布迪里巴德在执政約一年后回顾那段政績时，极力想把他所领导的政府描述成是一个有威望的、但并不是革命性的政府。^③ 他

① *New Age* (《新世紀》), V (April 13, 1958), p. 2.

② 同上, (April 20, 1958) p. 1.

③ 南布迪里巴德: 《喀拉拉邦政府的一年》, 《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的胜利》, 世界知識社 1959 年版, 第 84—88 頁。欲詳喀拉拉邦的情况, 見馬歇尔·溫德米勒:

說，他的政府的政綱同印度任何其他邦政府沒有什麼區別，但在精神上却有所不同。他辯解說，譬如，它的土地關係法案是根據國大黨土地關係委員會和計劃委員會的土地改革小組所提出的土地改革建議而制訂的。他的言外之意就是，因此印共和國大黨的政策是一致的；喀拉拉邦的共產黨政府與眾不同的是，它有效地執行了這項政策。

南布迪里巴德政府的政綱清楚地反映出它的基本目的是要贏得威望。他說，共產黨政府開始“打破了”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障礙物”。它的目標是“要由一個統一戰綫來執政，假如你們喜歡的話，也可以叫它作聯合政府。這個統一戰綫包括我國公眾生活中那些接受社會主義作為目標的……一切政党和人士。”南布迪里巴德並不鼓吹建立一個由共產黨單獨執政的政府，他聲稱喀拉拉邦共產黨的過去是、現在還是建立一個“聯合政府”，這個聯合政府，除了印共之外，還包括人民社會黨、革命社會黨和左傾無黨派人士。

南布迪里巴德說，喀拉拉邦共產黨的基本目的，只是想表明，印共願意而且能夠在這樣的聯合政府中同其他政治集團進行合作。

喀拉拉邦共產黨政府的政綱之所以這樣穩健，很可能部分是由於對前途有些擔憂。在南布迪里巴德講這番話的時候，他正面臨

《印度的立憲共產主義》(Marshall Windmiller, "Constitutional Communism in India"), 載《太平洋季刊》(*Pacific Affairs*), XXXI (March, 1958) pp. 22—36; 賽約姆·布朗:《喀拉拉邦:印度熊走鋼索》(Seyom Brown, "Kerala: An Indian Bear Walks the Tightrope"), 載《報道者》(*The Reporter*), XIX (August 7, 1958), pp. 30—34; 阿瑟·邦訥:《自願選共產黨執政的地方》(Arthur Bonner, "Communist by Choice"), 載《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 (May 31, 1958) pp. 36 ff. 關於印共最近發展情況的材料, 本書作者援引的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駐印度通訊員邦訥先生的通訊。

着一次补缺选举，共产党如果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了，可能会促使该政府垮台。但是实际上，该政府的政绩早已在该邦引起了相当激烈的反对。尽管政府的土地改革措施，特别是由于政府的不以警察干预劳资纠纷或土地纠纷的政策，会博得工人阶级和农民较大的支持，但是，这些措施以及一些其他措施显然已经使资产阶级和地主分子，尤其是广大的天主教徒极为愤懑。此外，还谣传共产党政府贪污。据该邦反对派声称，司法部长和几名其他部的部长——他们本人都是地主——企图用将自己的地产委托给私人的手法，来逃避土地的重新分配，还说有些部长和他们的亲戚曾从政府购买大米或教科书的合同中攫取私利。^①

五月在堆维卓拉莫选区举行的喀拉拉邦补缺选举是对共产党政绩的一次严峻的考验。在准备竞选时，各主要反对党（国大党、人民社会党和穆斯林联盟）结成统一战线，并联合提出了一名候选人。革命社会党则支持一个无党派的候选人，希望他能吸引一部分左派的选票。大多数投票者都是种植园工人，他们可能是倾向于共产党政府的，但实际上，在五个种植园工人工会中，已有四个工会的领导人是支持主要反对党的候选人的。此外，大多数投票者属于泰米耳少数民族集团，而这个集团可能是反对任何喀拉拉邦政府的。

尽管存在着这些不利的条件，这次选举的结果还是共产党候选人洛萨玛·崩诺塞获得了胜利，他得到48.5%的选票。^②反对党虽然指控共产党在选举中舞弊，但是共产党政府至少总算获得了一个暂时的喘息机会。而且在印度国内可能有许多人认为这次

① B. K. Desai, "Kerala After One Year" (B. K. 德赛:《一年后的喀拉拉邦》), *Thought* (《思想》), X (April 19, 1958), pp. 5-7.

② *New Age* (《新世纪》), V (May 25, 1958), p. 1.

选举是一次严峻的信任投票。

然而，就印共的对内和对外关系而论，印共为了保持它在喀拉拉邦的地位，也曾付出了相当代价。印共中某些分子对于赢得威望这一目的已日益感到不满。据说 S. A. 丹吉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分子特别对喀拉拉邦政府力图吸引资本家向喀拉拉邦投资一事感到愤慨。当喀拉拉邦政府为了创办一座人造丝浆厂，同一名著名的印度“垄断资本家” G. D. 比拉进行谈判，准备签订一项条件特别优厚的协定时，据说在新德里印共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上，曾有人表示反对。^①

党外对喀拉拉邦政府的反对也变得更加强烈起来。尼赫鲁总理在 8 月发表了一项迄今为止最明确的反共声明。^② 而在喀拉拉邦本邦之内，反对党显然也已经采取了更激进的策略。这些政党在不久前已加紧了它们在学生和工人组织当中的活动，因而在 7、8 月间，喀拉拉邦各城镇发生了一系列群众示威和总罢工事件。有好几次，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或向群众开枪；因此有一些观察家认为，已经出现了一种内战一触即发的局面。最后，南布迪里巴德据说曾以“类似中国早期”的内战相威胁，而尼赫鲁据说曾谴责印共在喀拉拉邦“剥夺自由”。在现任的共产党议会党团领袖 S. A. 丹吉的同意下，国会曾就喀拉拉邦的局势进行了辩论。丹吉宣称，如果喀拉拉邦政府不能制止警察向示威者开枪，印共就要它总辞职。南布迪里巴德接着就谴责这次国会辩论，说它侵犯了印度宪法所规定的邦的权利。^③

^①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July 12, 1958, p. 7.

^② 该项声明原载于国大党刊物《经济评论》(*Economic Review*, August 22, 1958), 后转载于《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7, 1958, pp. 13 ff.)。

^③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July 31, 1958 p. 6;

这一次的危机总算过去了，但是，它进一步证实了，在印共内部以及在共产党的喀拉拉邦政府与国大党的中央政府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倾轧不和。尽管事实上在喀拉拉邦维持政权的代价已经过高，印共目前却依然尚未背离“和平”的道路，它期望这条道路会把它带到其他各邦的首府，而且最终会把它带到新德里。

August 22, 1958, p. 2; and September 4, 1958, p. 5.

传 略

一些印共领导人的传略材料

只有对一个政党的著名人物掌握精确的传略材料，才能对该党与其他政治运动以及与它所脱胎的那个社会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概念。遗憾的是，就印共领导人而论，这种材料并不多见，因之，有关这些人的政治经历只能是根据零散的材料加以综合而成的。

本篇所提供的材料，大部分是摘自一些印共报刊，这些报刊经常发表一些有关印共领导人的传略，特别是在他们即将担任公职的时候。有些材料可以和名人录（如《人民院議員人名录》）以及其他非印共的材料相对证。但大多数材料是无法对证的，尤其是本篇所列的那些人的出生日期、背景和早期经历。此外，由于这些传略和其他零散的片断材料两者之间往往有出入，因而无从核对全部的材料。所以，专门研究印共比较上层人物的情况的人士将会发现，本篇的传略材料是不够的。但是正由于存在着上述那些困难，所以不妨提供这份材料，以便能节省那些有志于核对并补充这些材料的人士的时间。

尽管本篇收集了大部分印共全国和省的高级领导人的传略，但熟悉印度政局的人还会注意到其中有某些遗漏。有些人未被列入，仅是因为作者手头没有材料。所有同路人一概未予列入。帕姆·杜德虽然是英国人，而且又不是印共党员，但是，因为他担任了印共顾问这一极为重要的角色，所以列入了。

注：其中有些人的补助材料见《后记》。

任何印共领导人如果有相当一贯的表现，只要引起了作者的注意，作者都注意到了。因此，某些印共领导人在本书传略里就被說成是“溫和派”、“左派”或“中間派”。不过，必須記住，在印共的文献里，是很少有这种区别的。它只是代表本书作者的看法。

阿提加利(博士)，甘加塔尔·M.(Adhikari, Gangadhar M.):

二十年代期間，在柏林大学就学，获工科博士学位。在柏林期間，結識了 M. N. 罗易。1928 年 12 月归国，帶回了共产国际推行新的左傾路綫的消息。1928 年 12 月，参加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共产党會議和工农党會議。1929 年被捕，經审讯后，与其他同密拉特謀叛案有株連的印共领导人一起入獄。1933 年夏获释，后往加尔各答，协助重建印度共产党。三十年代期間，在孟买积极从事工会工作，曾一度被当局軟禁在孟买省南部的比賈普尔小城里。四十年代期間，任印共机关周刊編輯，并写有許多小册子和文章。据說，印共四十年代在巴基斯坦問題上的立場，主要是由于他的推动。1943 至 1950 年，任印共政治局委員；这段时期包括 1948 至 1951 年兰納迪夫所领导的那个极左阶段在內。1943 至 1950 年，又自 1953 年至今，任印共中央委員會委員。

艾哈迈德，穆札法尔 (Ahmed, Muzaffar):

1893 年生于孟加拉南部一个貧穷的穆斯林农家。先在諾阿哈利上中学，1913 年入呼格利学院，后轉入加尔各答的班加帕希学院，在該校，他对孟加拉語文学发生了兴趣，写了许多文章，后因期中考试不及格而輟学。1920 至 1921 年，参加不合作运动和哈里发运动，此后不久，由于接触到一些从塔什干党校归国的印度留学生，对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其后成为孟加拉工农党中的

活跃人物，并主編該党刊物《群言》。1923年，因与康波尔謀叛案有关，被处以重罪，判四年徒刑，但于1925年因需出外就医获释。出獄后，立即重新投身共产党的活动；1929年因密拉特謀叛案再度被捕，被判有罪。此后或在獄中，或被軟禁在村中，直到1936年。同年，回到加尔各答再度投身农民运动、工会和党的工作。自1951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在1951至1953年期间曾任政治局委員。为印共在孟加拉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艾哈迈德(博士)，札伊努耳·阿卜丁(Ahmed, Zainul Abedin):

穆斯林；原在信德省(今属巴基斯坦)任教員。三十年代期间，积极从事国大党的政治活动；1936年，当选为国大党信德省委员会委員，1937年，当选为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員。在担任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政治經濟情报部成員时，曾发表許多关于經濟問題的調查报告。他是印共的組織工作者，专门在北方邦进行活动，曾长期担任北方邦委员会書記。他一向积极从事工会和农民运动，但有相当多的時間是在地下或獄中。1951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并于1953和1956年两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員。最近在党内爭論中采取左派立場。他的妻子是哈支腊赫·卑古莫，一名印共妇女运动領袖。

阿薩夫·阿里(夫人)，阿魯那(Asaf Ali, Aruna):

原名阿魯那·甘古黎，出身于孟加拉的一个印度教家庭。在拉合尔圣心修道院就学时，因为一心想做修女，她的家人不得不把她从該校轉送到奈尼-塔耳的一个新教学校。后因不願接受家人給她包办的婚事，遂前往加尔各答，在果卡雷女子学校任教。1928年，与穆罕默德·阿薩夫·阿里(已故)結婚；阿里是一个年輕的穆

斯林律师，后来曾任印度独立后第一任駐美大使。阿魯那本人在甘地进行制盐运动时期参加政治活动，很多年一直是国大党和国民大会社会党中的活跃人物。1942年，当国大党领导人因发起“滾出印度”运动而被捕时，她轉入地下，走遍印度各地，指导暴力反英活动。到1945年，由于她強調暴力，与国大党主要领导人有了分歧。甘地在就皇家印度海軍兵变問題上同她进行的一場公开論战中說，“阿魯那宁願在街垒上而不願在立宪陣綫上团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虽然她在策略概念上与共产党不謀而合，但在印共1942年反对“滾出印度”运动，“与英国人狼狽为奸”一事上，她却很久未能原諒印共。她說“他們只是一帮卖国賊”。

社会党于1948年脫离国大党以后，阿魯那仍然是社会党中的活跃人物，但是到了次年，就开始与社会党领导人有了分歧；1950年，被逐出該党全国执行委员会。1952年，她激烈反对社会党同农工人民党合并，并携其个人的党羽——左翼社会党人，参加印共。1953年，当选为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但在1956年落选。1954年，任全印工会大会副主席。1957年，退出印共；但于1958年在国大党和印共支持下当选为新德里市长。

阿什腊弗(博士)，K. M. (Ashraf K. M.):

穆斯林；获有伦敦大学博士学位。三十年代期間，是印度国大党中的活跃人物，1937年任該党政治經濟情报部負責人。他是1945年10月被开除出国大党全国委员会的八名共产党人之一。四十年代期間，在印共制定对穆斯林問題的政策上起过主要作用。

巴尔曼，达斯腊特·达勃(Barman, Dasrath Deb): 见达勃，达斯腊特(Deb, Dasrath)。

巴苏,約底(Basu, Jyoti):

三十年代期間,在英国讀書时开始与英共接触;1937年参加英共。是伦敦的印度同盟和印度海員俱乐部中的活跃人物。1940年归国后,参加印共,在印共孟加拉支部中很活跃。1944年,任孟加拉、阿薩姆鐵路員工工会書記。1946年,在孟加拉立法議會中,他击败了胡馬云·卡比尔,当选为代表鐵路員工的議員。曾任全印鐵路員工联合会副主席和孟加拉省工会联合会書記。1951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員會委員,曾于1951至1953年任政治局委員。多年来,一直任孟加拉省委員會書記。1957年,当选为西孟加拉邦立法議會議員。

波腊,帕尼(Bora, Phani):

由于在阿薩姆省搞学生运动参加了印共。印共阿薩姆省委員會書記,1953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員會委員。

查格腊瓦尔底(夫人),累努(Chakravarty, Renu):

1917年生于加尔各答,曾在加尔各答和剑桥大学求学,获有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在剑桥大学担任印度留学生联合会書記时对共产主义发生了兴趣,后在加尔各答大学任英語讲师,曾协助組織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是西孟加拉邦妇女自卫协会的創始人之一。1948年轉入地下达三年之久。她的丈夫是尼奇耳·查格腊瓦尔底(Nikhil Chakravarty),她同他是在英国相識的(查格腊瓦尔底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现为《新世紀》周刊編輯部的編輯)。她还是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国大党人B. C. 洛埃博士的侄女。1952年,当选为人民院西孟加拉邦議員,1957年再度当选。

錢德拉，罗米希(Chandra, Romesh):

約生于 1914 年，是一名經常与印共中央机关保持联系的新聞工作者。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全印和平理事会，现任該会 总書記。曾屢次以此身分出国参加国际共产党會議。1951 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基本上属于印共中間派。

札利，A. S. R. (Chari, A. S. R.):

自从辞去政府职务、参加 1930 至 1934 年的不合作运动时起，即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曾一度入獄，出獄后考中了律師，随即开始在孟买参加共产党活动。后因在几起罢工案中为印共领导人进行辯护而被捕入獄。1942 年获释后，即放弃律師业，成为一名专职的党务干部，主要为印共报刊和国外的共产主义出版物撰稿。在极左时期(1948—1951 年)，再度被监禁了两年半。后曾协助 D. N. 普里特为那些因在堆楞加那起义期間进行活动而被判处死刑的共产党人草拟辯护书。近年来，一直是法律界的印共外围組織中的活跃人物，曾为共产党人和其他因政治活动而触犯法律的人进行辯护。著有《苏联的法律和司法》(Law and Justice in the Soviet Union)，《安得拉邦反共派現形記》(Lid off Andhra Anti-Communism) 以及其他一些小册子和論文。

达摩达濫，K. (Damodaran, K):

印共馬拉巴尔委员会書記，1956 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一直是全印进步作家协会中的活跃人物。

丹吉，什利巴德·阿莫利德(Dange, Shripat Amrit):

生于 1899 年，在学生时代就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他在 1920

年写的小册子：《甘地和列宁》(Gandhi and Lenin) 受到了 M.N. 罗易和共产国际的賞識。在孟买的一个富有的面粉厂厂主的襄助和 M.N. 罗易的建議下，他曾协助組織馬克思主义研究小組，并协助出版馬克思主义小册子。是印共的創始人之一，曾主編印共的第一份主要报纸，在康波尔和密拉特两謀叛案中均为被告。他进行活动的主要中心一直是孟买的各行业工会。1945 年起，不是担任全印工会大会主席，就是担任該会总書記。现在还担任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他至少坐过十三年牢，后来又进行过几年地下活动。曾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共产党會議。他在印共党内一般被认为是左派，尽管在兰納迪夫-腊欧领导时期，他曾协助撤消左派的领导权，并且主张参加大选。1948 年，当选为孟买邦立法議會議員，1952 年竞选国会議員失敗，但于 1957 年当选为人民院議員，是印度全国唯一一个得票最多的候选人；现为共产党議會党团領袖。曾写过許多論工会和其他問題的小册子和文章。自印共成立以来，除 1950 至 1951 年外，一直担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1951 年起，任政治局委員，尽管由于忙于工会活动无暇在党中央工作。

达勃，达斯腊特(Deb, Dasrath)——即巴尔曼，达斯腊特·达勃(Dasrath Deb Barman)：

1920 年生于科韦(在特里普拉邦)的一个貧苦的农家。先在特里普拉、后在加尔各答大学受教育。在学生时代即对共产党发生了兴趣，当时他是特里普拉邦工会大会和其他地方性組織中的一名活跃人物。自 1948 年 7 月至 1952 年 5 月轉入地下，在这段时期，曾当选为人民院特里普拉邦东部选区議員。他曾担任印共特里普拉支部書記多年，1951 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他是

1955年8月訪蘇的九名農民領袖之一。1957年，再度當選為人民院議員。

堆什木克，蘇達莫(Deshmukh, Sudam):

印共中央邦省委員會書記；1953年當選為印共中央委員會委員，1956年再度當選。

杜德，腊札尼·帕姆(Dutt, Rajani Palme):

1896年生于英國劍橋，是一位印度醫生和一位瑞典作家的兒子；曾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就學，1914年，在該校參加了獨立工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應征入伍，因進行反戰活動而被監禁，并被開除軍籍。回牛津大學後，在1917年又因進行政治活動被開除。後獲准參加考試，結果名列前茅。1919年，開始在倫敦從事工人運動。1919至1922年，任當時與工黨有關的勞工研究部國際秘書。1920年8月，協助組織英國共產黨；1921年7月，開始出版他的理論刊物《勞工月刊》，此後一直擔任該刊主編。1922年，當選為英共中央委員會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從那時起，一直連任。在擔任倫敦印度同盟執行委員會委員時期，與V. K. 克里希那·梅農交往甚密；梅農在四十年代初期，曾經常為他所主編的《勞工月刊》撰稿。從印共成立以來，杜德一直是它在海外的主要顧問，印共極為重視他的見解。他的建議曾數次使印共改變策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36年的杜德-布萊德雷提綱。1946年，當他為倫敦《工人日報》採訪有關英國內閣代表團的新聞時，他第一次訪問了印度。他是一個多產作家，所著《今日印度》一書被認為是研究印度政治的共產黨人的基本讀物。一般說來，他對印度政治分析不像其他共產黨人著作那樣教條。大體說來，他一

向是反对左倾的，因为左倾曾不时使印共脱离了印度的重要民族领袖。

乔治，K.C (George, K.C.):

1903 年生于当时的一个土邦特拉凡哥尔的一个叙利亚基督徒家庭。曾先后在馬德拉斯和勒克瑙两大学就学，获有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法学学士学位。还在学生时代，就当选为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曾在特里凡得琅操律师业，1934 年，当选为特里凡得琅市政委员会委员。后以国民大会社会党党员身分参加印共，是喀拉拉邦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52 年，当选为联邦院议员，1954 年当选为特拉凡哥尔-柯欽邦立法议会議員。1957 年，当选为印共喀拉拉邦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 1957 年的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中，出任粮食、民用物资、森林部部长。

卡堆，薩季达南德·維什努(Ghate, Sachidanand Vishnu):

印共创始人之一。二十年代期间，在孟买积极从事工会运动。1929 年，因密拉特謀叛案被捕入狱。获释后，在馬德拉斯工作了四年。1940 至 1944 年再度坐牢，后在兰納迪夫-腊欧领导时期，又一次入狱。1943 至 1950 年，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53 年，任印共司庫；1956 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高士，阿約艾·古瑪尔(Ghosh, Ajoy Kumar):

生于 1909 年，获有阿拉哈巴德大学理学士学位。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在旁遮普进行恐怖活动，曾在拉合尔协助建立印度斯坦社会共和协会。1929 年，与帕加德·辛格同为第二次拉合尔謀叛案中的被告。三十年代初，开始在康波尔从事工会工

作，在該地結識了 S. G. 薩尔堆賽，向他学习了馬克思主义。1931 年被捕，恰好又同薩尔堆賽被监禁在一起；高士在他的影响下，到 1933 年获释时，已成为一个坚定的馬克思主义者。他在党内地位升进极快，到 1934 年左右，已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員。1947 年，他不同意 P. C. 約希的溫和政策，从而促使 B. T. 兰納迪夫上台，但后来他却成为促使兰納迪夫下台的那个集团的領袖。1951 年，任印共总書記，从那时起一直担任此职。他是印共理論刊物《新世紀》月刊的編輯。在印共党内发生危机时，曾多次去苏联“就医”。

高普兰，阿夷黎阿特·古堆利(Gopalan, Ayilliath Kutteri):

1909 年生于馬拉巴尔北部，1921 年，毕业于堆黎捷里的教会中学，后在几个中等学校教了八年书。二十年代末，对甘地的运动发生了兴趣，到 1935 年时，已因进行政治活动坐了三年半牢。1935 年，参加国民大会社会党，后被选为国大党喀拉拉邦委员会主席。1936 至 1939 年，任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員。1939 年，参加印共。1941 年被捕入獄，但六个月后就越獄了。1946 年再度入獄，至 1951 年始获释。1952 年当选为人民院議員，1957 年再度当选，他担任共产党議会党团領袖直到 1957 年在丹吉领导下改任副領袖为止。1952 至 1953 年間，他在苏联逗留了七个月，代表印共出席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并参加了斯大林的葬礼。1951 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一直对建立語言邦的运动特別积极。1956 年他因前往阿默达巴德参加古季腊特单独建邦运动，在該地被捕，此事曾哄动全国。同年，他当选为全印农民协会主席。

果巴蘭，K. P. R. (Gopalan, K. P. R.):

馬拉巴尔的农民运动組織者。因参加 1931 年的不合作运动，

与格利什那·比来和 A. K. 高普兰一同被监禁在卡那諾尔監獄，結果，他“放弃了原来的观点，接受了革命的道路”。但仍然是国大党中的活跃人物，曾任国大党喀拉拉邦委员会委員(1930—1940年)，并两度担任該委员会的書記(1935年，1940年)。1941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于1946年获释。他是1955年8月訪苏的九名农民領袖之一。

古普塔，普卑什(Gupta, Bhupesh):

1914年生于东孟加拉(今属巴基斯坦)的米門辛格。先后在加尔各答的苏格兰教会学院和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就学，获有伦敦大学法学士学位。三十年代期間，曾屡因进行所謂的恐怖活动而被捕。1933至1937年被拘禁，始終未受审訊，在此期間，他通过了文学士学位考試，同时轉而信仰共产主义。1941和1948年，为印共进行地下活动；1951年5月被捕，被拘禁了十一个月。1952年，当选为联邦院議員，1953和1956年，当选为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1956年8月，任《新世紀》周刊編輯。

哈支腊赫·卑古莫(Hajrah Begum)即 Z. A. 艾哈迈德夫人(Mrs. Z. A. Ahmed):

Z. A. 艾哈迈德的妻子，印共妇女运动的一名著名的領袖，为出席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952年)和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印度代表团成員。該团曾于1957年1月訪問埃及和苏丹。她經常为印共刊物撰写有关妇女运动的文章。1953年，竞选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失敗。

伊斯迈耳，穆罕默德(Ismail Mohammed):

約于 1912 年生于北方邦的烏那欧县,父母均为穆斯林。父亲是一个紡織工,在穆罕默德出生三个月后就去世了,留下他由一个在鉄路上工作的哥哥照顾。兄弟二人几經迁移,后来定居于加尔各答,穆罕默德进了当地一家发动机制造厂做徒工。1926 年,他参加政治活动,是哈里发运动和国大党中的活跃人物。1929 年,从事工会組織工作;从 1933 年电車职工罢工后,一再被捕。1934 年参加印共。1944 年,当选为加尔各答市政厅委員;1946 年,当选为印共孟加拉省委員会委員。除了一年間断外,一直連任此职。在 1948 至 1951 年极左傾阶段,任印共中央委員会委員。在 1957 年 1 月,任电車职工工会、汽車运输职工工会、紙烟业工人联合会和水果商工会主席;任全印汽車运输工人联合会副主席;公共汽車职工工会和西孟加拉汽車运输职工工会联合会总書記。同时又是全印工会大会工作委員会的委員。在 1957 年大选期間,与西孟加拉首席部长 B.C.洛埃竞选該邦立法議会議員,以数票之差而落选。

捷瓦南达莫, P. (Jeevanandam, P.):

三十年代期間,在馬德拉斯积极从事反婆罗門运动;后来参加了印共。1948 至 1951 年极左傾阶段,被关在維洛尔監獄;由于拒絕服从党的“絕食至死”的命令,被开除出党,但后来又恢复了党籍。1952 年,当选为馬德拉斯邦立法議会議員。

卓什, 索含·辛格 (Josh, Sohan Singh):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在旁遮普积极从事恐怖活动。1928 年,曾主持全印工农党第一次會議。1929 年,在密拉特謀叛案中被判有罪。曾任国大党全国委員会委員,是 1945 年被开除出国大党全国委員会的八名共产党人之一。1951 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員会委

員，但因年事已高，只能起元老政治家的作用。

約希，布濫·占德(Joshi Puran Chand)：

1907年生于北方邦的阿耳摩腊，父亲是小学校长。在阿拉哈巴德大学讀書时，即对共产主义发生了兴趣，但由于年少气盛、过分热情，迟迟未能入党。曾获有文学碩士和法学士学位。1928年，組織印共北方邦支部；1929年，在密拉特謀叛案中被判有罪，一直被监禁到1933年。他在獄中通过了律师考試。1935年，“以不属于任何宗派集团的青年同志的代表資格”，当选为印共总書記(见堆文与巴耳·格利什那合著：《同 R.帕姆·杜德同志的談話及在国外获得的印象》[Deven and Bal Krishna, *Talks with Comrade R. Palme Dutt and Other Impressions Gained Abroad* p.3])；他一直担任此职到1948年，在此期間，他显示了非凡的組織才能。

当印共于1948年采取极左路綫时，約希先被撤职，然后又被开除出党。此后数年中，由于党籍无法恢复，便在一些外围組織里，特別在和平运动中积极进行活动，从而得以和从前的同志們保持接触，同时也得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保持接触。在这段时期，他出版了一系列小册子和一种期刊，对印共当时的左傾领导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攻击，并且表现出他頗能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策的新的轉变。1951年，他被恢复了党籍，但在同年的印共代表大会上，在竞选中央委员会委員时落选。1952年12月，他出席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以后，曾訪問苏联。1956年，在印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員。

約希是一个有才能的理論家，毛澤东的崇拜者，对毛澤东的著作有精澁的研究，他是1956年9月出席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三名印共领导人之一。他一般被认为是印共党內的右派領袖。1958

年，任《新世紀》周刊的編輯。

卡拉那孙达腊莫，M. (Kalyanasundaram, M.):

原是一名鐵路職員，后来成为鐵路工会的組織者，还是紡織和烟草工人的組織者。1938年参加印共，但又是国大党中的活跃人物。他有相当時間是在地下和獄中度过的。1952年当选为馬德拉斯邦立法議會議員时，他正担任南印鐵路工会主席。曾任印共中央委員會委員三年，但在1953年印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在竞选中央委員會委員时落选。1957年，再度当选为馬德拉斯邦立法議會議員。

坎德加尔，拉克斯曼·R. (Khandkar, Laxman R.):

1953年10月当选为印共中央印度-博帕耳省委員會書記；同年12月又当选为印共中央委員會委員。1956年，在竞选中央委員會委員时落选。

格利什南，N. 加拉那 (Krishnan, N. Kalyana):

1940年因从事共产主义活动入獄，1942年获释后，在孟买印共領導机关做宣传工作。同时，他对加尔那达克、喀拉拉和馬德拉斯等邦的組織工作也很热心。1947年1月，在馬德拉斯的几名重要的共产党人被捕后，他接管了該邦党机关的工作。他被印共的許多上层領導人看作是机会主义者，现在他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印共报刊上。1943至1948年曾任中央委員會委員。

拉喜利，索莫那特 (Lahiri, Somnath):

加尔各答大学毕业，曾在該市积极从事工会运动。1943年，

当选为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1944年，当选为加尔各答市政厅委員，1946年，当选为制宪議会議員。印共于1948年采取极左路綫时，他被新领导人看作是右派。后来他参加了左派，据党内文件說，“他甚至比某些人更左”。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直到1951年。溫和派上台后，他被斥为机会主义者，在1951至1956年間，他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党的文献上。經過一段間断后，于1958年再度当选为印共西孟加拉省委员会委員。1957年，当选为西孟加拉邦立法議会共产党議員。

梅达,丁加尔 (Mehta, Dinkar):

十四岁时即投身政治活动，参加甘地的不合作运动，1928年，因参加巴尔多黎的不合作运动被捕。三十年代期間，是国大党中的活跃人物，曾任国民大会社会党的書記。1939年参加印共，是印共古季腊特支部創始人之一。1948年入獄，次年越獄，轉入地下，直至1951年始出面参加大选。后再度被捕，但被保释。1953至1956年，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

梅农,捷拉德·阿朱塔 (Menon, Chelat Achutha):

1913年生于喀拉拉邦特里丘尔的一家名門望族乃尔家庭。曾获法学士学位，并在特里丘尔操律师业。1935年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成为国大党干部。曾协助組織柯欽国大党，后任柯欽国大党書記。又任国大党喀拉拉邦委员会委員数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被捕，被拘禁三年。1942年参加印共，1948至1952年从事地下工作。在地下工作时期，曾当选为特拉凡哥尔-柯欽邦立法議会議員，但在1954年立法議会选举时落选。1953和1956年，两度当选为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1957年，任印共喀拉拉省委员会書記。

同年又被任命为喀拉拉邦第一届共产党政府财政部长。他曾用馬拉雅拉姆語写了許多作品。

米腊吉卡, S.S. (Mirajkar, S.S.):

孟买的一名工会領袖，印共的創始人之一。在密拉特謀叛案中被判有罪；坐了十年以上的牢。曾數度以印共候選人身分當選為孟買市政廳委員。自 1947 年或更早一些時候即擔任全印工會大會副主席。後曾一度擔任印共馬哈拉施特拉省委員會書記。近年來，是馬哈拉施特拉單獨建邦運動的領袖。1953 至 1956 年，任印共中央委員會委員，1956 年落選。1958 年任孟買市市長。

摩喜烏丁, 馬格東 (Mohiuddin, Maqdoom):

原為安得拉邦海得拉巴大學的一位講師。1942 年，成為印共專職幹部，在海得拉巴積極從事工會工作，特別是在鐵路員工中積極活動。後任海得拉巴邦鐵路員工工會副主席。1952 年競選人民院議員失敗。他是一個穆斯林，與其說他以政治工作聞名，莫如說他以烏爾都詩聞名。

穆克吉, 喜冷德腊·那特 (Mukerjee, Hirendra Nath):

生于 1907 年，在加尔各答、牛津和伦敦等大学就学。获有文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他是一个法学家和教育家，1934 至 1935 年，在安得拉大学任历史和政治学讲师，后在加尔各答的苏冷德腊那特学院任历史系主任。曾积极从事工会工作。1936 年，协助創立全印进步作家协会，1941 年，协助創立印苏友好协会。曾在其他外围群众組織中，包括印度人民戏剧协会和全印学生联合会在內，积极进行活动。1938 至 1939 年，任国大党孟加拉省委員會執

行委员会委員，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員和孟加拉国民大会社会党書記。1942年，是經英政府批准的訪苏友好代表团的一名成員。1947年，任印共孟加拉省委员会委員。他发表过許多用英語和孟加拉語写著的作品。1954年，他曾被人发现剽窃一位共产党同志的作品，他曾在印共的理論刊物《新世紀》月刊 (*New Age* [monthly] III, December, 1954 封底里頁) 上为此道歉。1952年，当选为人民院議員，1957年再度当选。曾任印共議會党团副領袖。

穆克吉，班基莫 (Mukherjee, Bankim):

二十年代期間，参加政治活动和工会运动；在孟加拉积极从事不合作运动和黄麻工人罢工运动。1936年参加印共，1937年当选为孟加拉邦立法議會會議員。曾任印共孟加拉省委员会委員，但从未担任过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他是1942年訪苏友好代表团的成員。一直致力农民工作。是全印农民协会的主席和总書記。1957年，当选为西孟加拉立法議會會議員。

乃尔，M. N. 果溫丹 (Nair, M. N. Govindan):

因受圣雄甘地人格的感召而参加了政治活动，曾在甘地的学园里度过一些时候，后来成为前特拉凡哥尔邦国大党組織和青年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他的妻子是堆瓦基·潘尼迦，是印度前駐中国、埃及和法国 (1957年) 大使 K. M. 潘尼迦的女儿。1953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

南比阿尔，K. 阿南丹 (Nambiar, K. Anandan):

1918年生于馬拉巴尔，在卡利卡特的馬拉巴尔基督教学院就学。1943年起，任南印鐵路工会总書記。1946至1952年，任馬德

拉斯邦立法議會議員，1952年当选为人民院議員。他是参加北京1952年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印度工会工作者之一。1954年，当选为全印工会大会司庫；1953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員會委員。

南布迪里巴德，埃拉莫古拉莫·瑪那·散加濫 (Nambudiripad, Elamkulam Mana Sankaran):

1909年生于馬拉巴尔的一家富有的婆罗門种姓南布迪里家庭，在特里丘尔讀大学时即开始参加政治活动。1932年輟学，投入不合作运动，为此曾被英国当局关进监牢。在獄中，他結識了格利什那·比来、A.K.高普兰和 K. P. R. 果巴蘭，轉而信仰了馬克思主义。国民大会社会党于1934年成立后，任該党的書記。同时还担任国大党喀拉拉邦委員會書記。1939年，以国大党候选人身分順利当选为馬德拉斯邦立法議會議員。同年，又担任国大党全国委員會委員。尽管他也許早就是一名共产党的秘密黨員，但直到1940年，才公开参加了印共，在他的帶領下，国民大会社会党的大多数喀拉拉邦成員也参加了印共。1947年，在被拘禁了一个短时期后轉入地下，在这段时期，他参加1952年选举落选。1943年，当选为印共中央委員會委員，他是唯一連任到现在的一名委員之一。1950年起，任政治局委員。他一般是属于中間派的。

南布迪里巴德写过許多文章和小册子，題材范围很广，但以論土地問題的为最多。他也是印共主要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之一。对中国表现了很大的兴趣，是1956年9月参加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三名印共領袖之一。1957年，共产党政府在喀拉拉邦成立后，他出任印度的第一任共产党首席部长。

巴德加尔，S. G. (Patkar, S.G):

出生于馬哈拉施特拉的一个貧苦的农家，十三岁时去孟买，在一家裁縫店里工作。在1927年抵制西蒙調查委员会运动期間，开始参加政治活动。在1928和1929年紡織工人罢工时期，曾积极从事工会运动。曾于1932和1934年领导紡織工人罢工。他积极从事国大党的工作，任国大党孟买省委员会委員七年，任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員六年。1940年，以共产党候选人身分当选为孟买市政厅委員，但不久以后，即被迫轉入地下。1937至1942年，任紡織工人工会書記，1942至1951年任总書記。1950年，因反对印共的极左路綫，被开除出党。后来恢复党籍，1953年，当选为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他一直担任此职到1956年。1957年，当选为孟买邦立法議会议員。

巴德乃格，古魯札濫 (Patnaik, Gurucharan):

烏德加耳(奧里薩邦)的共产党書記。1953年当选为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1956年再度当选。

崩尼阿，瑪基內尼·巴薩瓦 (Punniah, Makineni Basava):

生于安得拉邦貢土尔县的一个村庄里，先后在馬苏利帕塔姆的諾布尔学院和貢土尔的安得拉基督教学院就学。1937至1939年，任安得拉邦学生联合会总書記，1940至1942年，任印共貢土尔县委员会書記。1948至1951年，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又自1953年起，任中央委员会委員，直到现在。1950年，任政治局委員。印共大安得拉省委员会在1956年成立时，他是其書記处的十三名成員之一。1952年，当选为联邦院議員，但在1955年竞选安得拉邦議会议席时落选。

腊瑪木尔底，P. (Ramamurti P.):

馬德拉斯邦的著名的工会工作者，三十年代期間，是国大党和国民大会社会党中的活跃人物，曾任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員十一年。1936年，参加印共。1952年，当选为馬德拉斯邦立法議会议員，他在該邦立法議会中领导反对党，直到1957年竞选人民院議席落选时为止。他是印共的著名的政論家和理論家之一。四十年代期間，曾任印共泰米耳語的刊物《人民力量》的編輯，自《新世紀》这一全国性周刊于1953年創刊时起，即任該刊編輯，直到1956年。1951年，当选为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和政治局委員。此后一直連任。

兰納迪夫，帕耳占德腊·德利莫巴格 (Ranadive, Bhalchandra Trimbak):

1925至1927年在孟买大学領取奖学金，攻讀經濟学；以一篇論印度人口問題的論文，荣获文学碩士学位。此后不久即成为共产党员。在印共领导人因密拉特謀叛案而被监禁的时期，他在孟买党内一跃成为著名的极左派領袖。他批評号召采取溫和路綫的杜德-布莱德雷提綱，結果因进行宗派活动而一度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1942年，作为訪苏友好代表团的六名成員之一訪問苏联。1943年，当选为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和政治局委員。曾领导反对P. C. 約希的溫和政策的运动，1948年继約希任总書記。在他的领导下，印共采取了极左路綫，結果是印度遍地发生暴动，引起了政府的严厉鎮压。在他的策略遭到共产国际领导机构批判后，于1950年被撤职。有好几年他一直默默无聞，到1956年，当选为印共馬哈拉施特拉省委員会委員，并且是参加印共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員。他被

普遍认为是中央委员会中的左派领袖。

腊欧,占德腊·腊捷什瓦尔 (Rao, Chandra Rajeshwar):

安得拉邦的一名老练的共产党领袖,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农家。1949年,以毛泽东作为理论权威,率先反对 B. T. 兰纳迪夫的领导,终于继兰纳迪夫任印共总书记。但他继续推行极左策略,在1951年印共改变路线时,遂被撤职。1948至1951年,又自1953年至今,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55年,竞选安得拉邦立法议会議員落选。他被普遍认为是以农民为主的革命的鼓吹者,和暴动政策的倡导者。尽管自1953年以来即任印共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一直无暇在党中央工作,他愿意集中致力于安得拉邦的工作。印共大安得拉省委员会于1956年成立时,他当选为书记。

腊欧, D. 文加堆萨 (Rao, D. Venkatesa):

堆楞加那的一名共产党领导人,1953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印共大安得拉省委员会于1956年成立时,他是其书记处的十三名成员之一。

腊欧,摩都鲁·哈努曼塔 (Rao, Moturu Hanumantha):

安得拉邦的一名老练的共产党员。1953和1954年任安得拉邦立法议会議員,1955年再度竞选失败。1956年被选为印共大安得拉省委员会书记处的十三名成员之一。1953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

腊欧,南多利·勃腊萨达 (Rao, Nandoori Prasada):

安得拉邦农民领袖,曾任安得拉省农民协会总书记。全印农

民协会总書記，1953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員會委員。

雷迪，腊維·那腊延 (Reddy, Ravi Narayan):

堆楞加那的印共主要领导人；1952年，当选为人民院議員，是全印度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人。他的关于1948至1950年印共在堆楞加那武装起义时期所受的損失的报告曾促使印共撤除 B. T. 兰納迪夫的总書記职务，并修改党的路綫。1953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員會委員，自1956年大安得拉省委員會成立起，即担任其書記处書記。1957年，当选为安得拉邦立法議會會議員。

雷迪，T. 那基 (Reddy, T. Nagi):

1952年竞选馬德拉斯邦議會會議員时，击败了他的姻兄 N. 散捷瓦·雷迪；1953年安得拉邦脱离了馬德拉斯邦后，他成为第一届安得拉邦立法議會中的反对党領袖(散捷瓦·雷迪系国大党人，任副首席部长)。1956年印共大安得拉省委員會成立后，任該委員會書記处書記。1957年，当选为人民院議員。

雷迪，巴曇·耶拉 (Reddy, Baddam Yella):

堆楞加那的共产党领导人，曾任印共堆楞加那省委員會書記多年。印共大安得拉省委員會書記处的十三名成員之一。1952年，当选为人民院議員，1956年当选为印共中央委員會委員。

散格利达雅那，腊胡耳 (Sankrityayana, Rahul):

1926至1928年在錫兰任梵文与巴利文教授，曾遍游西藏和中国南部。1939年参加印共。1940年当选为全印农民大会主席，但后与印共其他领导人一同被关在德欧利拘留营里。1944年应

聘任列宁格勒科学院东方語文教授，他在該处一直工作到 1947 年，对苏联的亚洲部分做了广泛研究。1955 年 2 月《新世紀》宣布他已重新加入印共。他写过許多文章論述馬克思主义与东方宗教的相容性，特别是与佛教的相容性。

薩尔堆賽，S. G. (Sardesai, S. G.):

四十年代期間，在印度国大党中极为活跃。他是 1945 年被开除出国大党全国委员会的八名共产党人之一。他是孟买的著名的工会工作者，曾任紡織工会書記。1943 至 1950 年，又自 1953 年至今，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他积极参加解放果阿摆脱葡萄牙統治的运动。

森(博士)，腊嫩 (Sen, Ranen):

孟加拉的工会工作者，从学生时代起即在加尔各答积极从事政治活动。1930 年参加印共；1943 至 1948 年，又自 1951 年至今，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现任孟加拉省工会大会書記和全印工会大会副主席。他大部分時間致力于全印工会大会和印共工会小組委员会的工作。他的妻子原是妇女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但在 1948 至 1951 年印共的极左时期，被警察枪杀。

沙尔瑪，加腊南德 (Sharma, Karyanand):

1900 年生于比哈尔邦的芒吉尔县一家貧苦的农家。1920 年离开大学参加不合作运动，次年入獄。1922 年获释后，为国大党工作，替政治积极分子办学校和学园。三十年代期間，曾数次入獄，成为比哈尔的一名激进的农民領袖。像許多其他共产党人一样，他也是通过国民大会社会党从国大党参加印共的，是 1945 年

被开除出国大党全国委员会的八名共产党人之一。曾任比哈尔邦农民大会和全印农民大会的主席。1952年，为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1956年，当选为印共比哈尔省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和全国监察委员会委员。

沙尔玛,雅格·都德 (Sharma, Yag Dutt):

约生于1910年;在作学生领袖时参加了政治活动。三十年代期间,任全印学生联合会书记。1951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52年,曾以列席代表身分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沙尔玛,尤根达腊·那特 (Sharma, Yogendra Nath):

比哈尔邦农民大会总书记,1945年8月应邀访苏的九名全印农民大会领袖之一。1953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比哈尔省委员会书记。

辛格,巴巴·古鲁木克 (Singh, Baba Gurumukh):

1883年生于旁遮普邦卢迪阿纳县一个贫苦的农家。1914年在访问加利福尼亚后回国,后来被捕,并在拉合尔谋叛案中被判处徒刑,被监禁在安达曼群岛。1922年,在被解往大陆上某一监狱途中逃跑;经阿富汗,辗转逃到苏联。1932年,在潜返印度途中,被阿富汗政府逮捕,并被拘禁至1934年。他在回到苏联作短期逗留后,于1935年利用假护照首途返印。他在印度办了一家革命报纸,并经常与印共接触。1936年,再次被捕,先后被囚在安达曼群岛和大陆上直到1946年。几年以来一直担任全印农民大会司库,在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当中他一般被认为是一位政治

元老。

孙达腊雅,布札拉巴黎(Sundarayya, Puchalapalli):

1913年生于安得拉邦内洛尔县的一个富有的农家。在馬德拉斯和班加罗尔讀大学,但未待取得学位即輟学投身政治运动。三十年代期間,因受甘地的政治活动的感召,在农村里工作,协助組織不合作运动。1932年参加印共,但在国大党中依然很活跃。曾任国大党安得拉省委员会委員,并且是参加国大党1934年年会的代表。1938至1939年,任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員。他也是国民大会社会党中的活跃人物,最后,他帶領国民大会社会党安得拉支部全体成員参加了印共。1934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1953年起,任政治局委員。他一般被认为是一名激进的左派人物。1952年当选为联邦院議員;1955年当选为安得拉邦立法議会议員。曾任印共大安得拉省委员会書記处書記。1956年,他是参加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三名印共领导人之一。

苏尔吉德,哈利基閃·辛格(Surjeet, Harikishan Singh):

旁遮普的农民領袖,在1952年的补缺选举中,当选为旁遮普立法議会议員。曾任全印农民大会中央农民理事会委員。1953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員和政治局委員。据說他是印共党内主要的克什米尔政治問題权威。

托馬斯, T. V. (Thomas, T. V.):

1921年生于喀拉拉邦的一个基督教家庭。1938年做学生时即参加了民族运动。1940年,成为工会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当选为阿勒皮椰皮纖維厂工会主席。1943年参加印共。1946和

1948年两度被捕和被拘禁。1952年，在被拘禁期間，当选为特拉凡哥尔-柯欽邦立法議會議員。曾任特拉凡哥尔-柯欽邦运输工会主席。1954年，他曾在邦政府秘书厅門前絕食，以支持工人的要求。他曾担任阿勒皮市参議會議长，1952年共产党曾在这一机构中取得多数席位。1957年4月，任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运输、劳工、市政、体育及体协部长。5月，同喀拉拉邦內閣中的唯一一名妇女，稅务部长，K. R. 果利 (Gowri) 結婚。

烏帕达雅，N. L. (Upadhyaya, N. L.):

印共加尔那达克省委員會書記。1953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員會委員。

文加达腊曼，M. R. (Venkataraman, M. R.):

曾任印共泰米耳納德省委員會書記多年，1953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員會委員。

烏雅斯，哈利·格利什那 (Vyas, Hari Krishna):

1955年时，是拉賈斯坦邦立法議會中唯一的共产党議員。曾任印共拉賈斯坦省委員會委員，1953年起，任印共中央委員會委員。

优素福，S. S. (Yusuf, S. S.):

生于1911年，曾在德里、孟买、阿默达巴德和康波尔积极从事工会运动。他的主要活动中心一直是北方邦，曾任国大党北方邦委員會委員七年。曾在十四个不同的監獄里度过了十七年；在1930年系獄时期，他成为馬克思主义者。他在獄中至少两次絕

食。曾在全印工会大会担任高职，1952年，是参加北京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印度工会工作者之一。1955年，曾领导康波尔纺织工人罢工。1948至1950年，又从1951年至今，任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在早期是一个左派，但近来则属于温和派。

主要参考书目

下列书籍及文件仅限于作者认为对了解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特别重要者，因此未包括所有脚注中引用的材料。欲知有关这个问题或印度政府及政治一般情况的更全面的书目，可参考帕特里克·威尔逊编辑的一部不可或缺的书目：《1885—1955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府与政治：西文书目》(*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India and Pakistan 1885—1955: A Bibliography of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t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56. 356 pp.)。

有关印共的评论

Batliwala, Soli S. *Facts versus forgery*... Bombay, National Youth Publication, 1946. 33 pp.

索黎·S. 巴德黎瓦拉：《事实与伪造》

作者系一位变节的前中央委员。该书论述印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策，很重要，但未引证文件。

Goel, Sita Ram. *Netaji and the CPI*. Calcutta, Society for the Defence of Freedom in Asia, 1955. 72 pp.

息达·腊莫·果耳：《内达季与印度共产党》

一部论战材料，大量引用了现已很难获得的印共文件，可作为参考资料之用。

Hutchinson, Lester. *Conspiracy at Meerut*. London, G. Allen and Unwin, 1935. 190 pp.

累斯特·哈钦森：《密拉特阴谋》

一名被告对密拉特谋叛案的叙述。

Kautsky, John H. *Moscow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New York, The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 Technology and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56. 220 pp.
- 約翰·H.考茨基：《莫斯科与印度共产党》
深入研究了共产党有关印度問題的战后理論和印共与它所处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环境的关系。
- Limaye, Madhu. *Communist Party: Facts and Fiction*. Hyderabad (Deccan), Chetana Prakashan, 1951. 100 pp.
- 瑪士·黎瑪耶：《共产党：事实与捏造》
印共历史的概述，作者系印度社会党的一位領袖。
- Masani, Minocheher Rusto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A Short History*. London, Derek Verschoyle, 1954. 302 pp.
- 米諾捷黑尔·魯斯多莫·瑪薩尼：《印度共产党簡史》
該书系由一名印度著名反共政論家所写的第一本印共簡史。由于作者在三十年代同印共交往的亲身經歷和他自那时以来从該党内部获得的材料，使該书具有特別价值。
- Ranga, N. G. *Kisans and Communists*. Bombay, Pratibha Publications, 194-? 127 pp.
- N. G. 兰加：《农民与共产党》
有关印共在三十年代的农业政策与农村活动的重要論述。作者系著名的非共产党农民領袖。
- Roy, M. N. *Memoirs*. Published serially in *Radical Humanist* from February 1, 1953 to September 5, 1954.
- M. N. 罗易：《回忆录》1953年2月1日至1954年9月5日連載于《激进人道主义者》上。
尽管有許多疏漏和錯誤之处，仍不失为作者早期經歷的重要叙述。
- . *Our Differences*, Calcutta, Saraswaty Library, 1938. 184 pp.
- 同上作者：《我們的分歧》
本书提供了一些背景材料，說明 M. N. 罗易同共产国际分裂的原因。
- Spratt, Philip. *Blowing Up India*. Calcutta, Prachi Prakashan, 1955. 117 pp.
- 菲利普·斯普拉特：《炸毀印度》
一名由英共派往印度的最重要的組織者的回忆录。

Tagore, Saumyendranath.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India*. Calcutta. Red Front Press, 1944.

扫莫盈德腊那特·泰戈尔：《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

詳細論述了印度共产党在二十年代的活动。我們仅由斯坦福大学罗伯特·C. 諾思处借到了一份打字稿。

Tendulkar, Aji Ganpat. *Nation Betrayed? A Case Against Communists: their Own Evidence*. 2d ed. Bombay, Bombay Provincial Congress Committee, 1946. 25 pp.

阿夷·甘巴德·登都耳加尔：《这岂不是叛国嗎？对共产党的控訴：他們自己的証据》

一本論述民族主义者对印共战时政策的看法的代表作，大量引用了印共出版物中的材料。

Yajnik, Indulal. *Life of Ranchoddas Bhavan Lotvala*. Bombay, Atmaram Dixit, 1952. 87 pp.

因都拉耳·雅支尼格：《濫卓达斯·帕万·罗德瓦拉传》

关于印共在孟买初期活动的重要記述，主要叙述孟买的一位富有的面粉厂主向早期共产党人提供財政援助的情形。

政府文獻

Great Britain. *Communist Papers*. London, HMSO, 1926. 132 pp.
(Cmd. 2682; Parl. Pap. 1926; XXIII)

英国，《共产党文件》

1925年抄查英共各机构时所查获的文件的汇编。其中某些文件涉及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及英共对它的领导作用。

India. Home Department. *Communism in India, 1924—27*. 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1927, 415 pp.

印度內政部：《共产主义在印度，1924—1927年》

一份英方情报材料，載有共产党活动的詳情。系将凱氏报告(见下)加以归納而成，比凱氏报告更有条理。

India. Kaye, Sir Cecil. *Communism in India*.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1926. 154 pp.

印度，塞西耳·凱爵士：《共产主义在印度》

一份英方情报材料，詳細叙述了1920—1924年的情况。

India. *King-Emperor vs. Nalini Bhushan Das Gupta, Muhammad Shaukat Usmani, Muzaffar Ahmad, and Shripat Amrit Dange.* Allahabad,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ess, 1924? var. pag.

印度，《英王兼印度帝国皇帝控告那黎尼·普閃·达斯·古普塔、木哈瑪德·邵加德·烏斯瑪尼、穆札法尔·艾哈迈德、什利巴德·阿莫利德·丹吉安》

康波尔謀叛案証件汇编，其中包括印共同国外来往的大量信件。

India (Dominion).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Communist Violence in India.*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1949. 71 pp.

印度自治領，內政部：《印度共产党暴行》

政府发表的关于兰納迪夫领导时期的共产党阴谋和暴行的官方报告。

Meerut. District Court. *Meerut Communist Conspiracy Case: Magistrate's Order of Committal to Trial.* Meerut, Saraswati Press, 1929? 287 pp.

密拉特，地方法院：《密拉特共产党謀叛案：司法长官付审令》

密拉特謀叛案証据摘要。

Meerut. Sessions Court. *Judgment delivered by R.L. Yorke... in the Meerut Communist Conspiracy Case.* Simla,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1932—33. 2 vols. 676 pp.

密拉特，地方刑事法庭：《R. L. 約克等对密拉特共产党謀叛案所作之判决》

密拉特謀叛案証据摘要，很有用处。非常詳尽，但如果沒有已发表的載有該书所引文件全文的証据汇编，使用起来頗为不便。

Meerut. Sessions Court. *Proceedings of the Meerut Conspiracy Case...* Meerut, Saraswati Press, 1929. 11 vols.

密拉特，地方刑事法庭：《密拉特謀叛案审讯录》

印度政府判处印共謀叛罪时所引用的大部分文件、信件、文章及小册子，系供法庭使用而付印的。該书恐系有关1929年以前印度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材料汇编。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Washington, D. C., 1945. 73 pp.

美国，战略服务处，研究与分析部：《印度共产党》。

该书虽原系保密情报材料，但这项印共研究文件主要是根据公开材料写成的。它着重于该党在战时的工作，并附有一份颇有用途的传略。

印度共产党出版物

Adhikari, Gangadhar M. *Food for all*.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5? 32 pp.

甘加塔尔·M.阿提加利：《人人有饭吃》

为参加1945—1946年大选而写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小册子。

——. ed. *From Peace Front to People's War*. 2d enl. ed.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4. 444 pp.

同上作者编：《从和平阵线到人民战争》

1935—1943年印共及共产国际文件汇编，很有用处。

——. *Pakistan and Indian National Unity*. London, published by *Labour Monthly*, 1943. 32 pp.

同上作者：《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民族团结》

关于印共民族政策的基本论述。包括阿提加利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以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印度出版的原版本未找到。

——. *Pakistan and National Unity*, 2d rev. ed.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4. 54 pp.

同上作者：《巴基斯坦与民族团结》

该书修订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例子，说明如何篡改文件。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Communist Statement of Policy: For the Struggle for Full Independence and People's Democracy*.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7. 14 pp.

印度共产党：《共产党政策声明：为争取完全独立和人民民主而斗争》

1947年12月7—16日中央委员会决议。标志着正式采用“人民战争”的政策。

——.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43.*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 d. 12 pp.

同上：《印度共产党党章，1943年》

1943年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

——. *Constitution.* Bombay, V. M. Kaul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48. 15 pp.

同上：《党章》

(在經過重大修改后)由1948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

——.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Delhi, CPI, 1954. 20 pp.

同上：《印度共产党党章》(譯文見《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輯》，世界知識社1955年版，第49—66頁。——譯者)

經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修改的党章。

——.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Communist Party Resolution for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6. 16 pp.

同上：《独立宣言：共产党关于制宪議会的決議案》

包括P. C. 約希向英國內閣代表团提出的备忘录。

——. *Draft Programm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Bombay, CPI, 1951 (April). 16 pp.

同上：《印度共产党綱領草案》

其中第一次闡述了1951年以后所奉行的溫和政策(參見后列印共綱領)。

(譯文見《新华月报》1951年10月号，第1290—1293頁。——譯者)

——. *Election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Calcutta, Central Election Boar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1. 29 pp.

同上：《印度共产党竞选宣言》

1951—1952年大选期間印共关于政策的基本声明。(譯文見《新华月报》1951年10月号，第1294—1298頁。——譯者)

——. *For the Final Assault: Tasks of the Indian People in the Present Phase of Indian Revolution.* Bombay, CPI, 1946. 18 pp.

同上：《准备总攻击：印度人民在印度革命现阶段的任务》

即 1946 年印共中央委员会作出的激进的“八月决议”。

——. *Memorandum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to the States Reorganization Commission*. Delhi, CPI, 1954. 10 pp.

同上：《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省邦重划委员会的备忘录》

有关印共民族政策演变的重要文件。

——. *Political Thesis: Adopted at the Second Congress, Calcutta, February 28-March 6, 1948*. Bombay CPI, 1948. 95 pp.

同上：《政治提纲：1948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6 日在加尔各答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兰纳迪夫领导时期的政策的基本声明。

——. *Programm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Bombay, CPI, 1951 (Oct.). 20 pp.

同上：《印度共产党纲领》

1951 年以后奉行的温和政策的修正声明。

——. *Programm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Adopted by the Third Party Congress, Madurai, December 27, 1953 to January 4, 1954*. New Delhi, CPI, 1954. 20 pp.

同上：《印度共产党纲领：1953 年 12 月 27 日至 1954 年 1 月 4 日在马杜赖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

1951 年纲领的修正本。

——. *Resolut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Delhi, CPI, 1953. 55 pp.

同上：《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

1953 年 3 月通过的有关政策和组织问题的重要决议。

——. *Resolution on Party Organization*. Delhi, CPI, 1954. 32 pp.

同上：《组织决议》（译文见《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世界知识社 1955 年版，第 67—98 页。——译者）

1954 年 4 月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就印共活动和组织问题进行自我批评的重要报告。

——. *Soviet-German war: Statement of the Polit Bureau.* no place, no pub., 1941. 7 pp. (Mimeo).

同上：《苏德战争：政治局声明》

印共对苏联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反应。

——. *Statement of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Bombay, CPI, 1951 (May). 12 pp.

同上：《印度共产党政策声明》

第一次阐述了 1951 年以后奉行的温和政策，补充了同年发表的《纲领》。可同后来在 1951 年 11 月发表的修正本作比较。

Dutt, Rajani Palme. *India Today.* 2d rev. Indian ed.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9. 581 pp.

腊贾尼·帕姆·杜德：《今日印度》（世界知识社 1954 年中文版——译者）

广泛论述了共产党对印度的看法。作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发言人。为了适合新的政策路线，对该书不时加以修订。

——. *Modern India.*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7. 174 pp.

同上作者：《现代印度》

对该书的介绍见本书第五章中 R. 帕姆·杜德的《现代印度》一节。

——. *Situation in India: Answers to Five Vital Questions on India.* Bombay, R. Thapar, 1950. 7 pp.

同上作者：《印度的形势：对有关印度的五个重要问题的答复》

杜德指导印共的一个重要例证。

Ghosh, Ajoy. *On the Work of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Delhi,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4. 30 pp.

阿约艾·高士：《论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该党总书记对马杜赖大会通过的路线的说明。（这是高士发表在 1954 年 1 月 24 日《新世纪》周刊上的文章《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的单行本。世界知识社 1955 年版《印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第 137—160 页载有译自《新世纪》周刊的这篇文章的译文。但本书第十四章中所引刊载在同期《新世纪》上的这篇文章的几段文字，同上述译文有出入〔参见上述文件选辑第 147 页〕。据本书作者在第十四章注⑤（译本 386

頁注①)中称,这篇文章在印成单行本时,曾将这几段作了修改,疑系世界知識社在編譯上述文件选輯时据单行本作了相应修改。——譯者)

Gopalan, A.K. and Mukerjee, Hiren. *Communists in Parliament*. New Delhi,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7. 54 pp.

A.K.高普兰与喜冷·穆克吉:《共产党人在議會中的活动》

該书恰当地論述了共产党在中央議會中的活动。两位作者是共产党議會党团的正副領袖。

Joshi, Puran Chandra. *Communist Reply to Congress Working Committee's Charges*.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5. 2 vols.

布濫·占德腊·約希:《共产党人对国大党工作委員會指控的回答》

对印共被指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出卖民族利益一事所作的长篇辯駁。

——.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 Gandhi and P.C. Joshi*.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5. 63 pp.

同上作者:《M.甘地与P.C.約希之間的通信》

一部饒有趣味的通信集,說明了在共产党和国大党的关系中的各种政治及个人因素。

——. *For a Mass Policy*. Allahabad, Adhunik Pustak Bhandar (1951). 85 pp.

同上作者:《为实行一項群众政策而奋斗》

一份頗有启发性的派別活动文件,是約希在被开除后印发給党员和同情者的。

——. *For the Final Bid for Power! The Communist Plan Explained*.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6 ? 122 pp.

同上作者:《为最后取得政权而斗争:对共产党方案的說明》

1945—1946年大选期間对印共政策的全面說明。

附有党的竞选宣言。

——. *The Indian Communist Party; Its Policy and Work in the War of Liberation*. Introduction by Harry Pollitt.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42. 32 pp.

同上作者:《印度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政策和工作》,哈里·波立特作序

印共“人民战争”路线的基本说明和理论。英共出版的这一版本，系印度出版的原书的节本。原书部分载于阿提加利的《从和平阵线到人民战争》一书中。

——. *Problems of the Mass Movement*. Allahabad, Adhunik Pustak Bhandar, 1951? 85 pp.

同上作者：《群众运动问题》

约希被开除期间所写的另一批批评印共政策的文章。

——. *Views Under the Red Banner*. (Howrah, P. C. Joshi, 1950) 65 pp.

同上作者：《红旗下的〈观察〉杂志》

约希被开除期间抨击兰纳迪夫的一篇文章。《观察》是一种期刊，但只出了一期。该文的价值在于它透露了印共内部制订政策的情况。

Krishnan, N. K. (ed.) *Forgery versus Facts: Communist Party Exposes the Fifth Column*.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3. 51 pp.

N. K. 格利什南编：《伪造与事实：共产党揭露第五纵队》

“伪造”指印度反共分子散发的一份文件，该文件声称印共自己承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与政府暗中合作，这是印共对这种说法的回答。这本小册子还转载了上述文件。

——. *National Unity for the Defence of the Motherland*.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3. 72 pp.

同上作者编：《民族团结保卫祖国》

1942年9月及1943年2月印共中央委员会两次全会的各项决议。

Namboodiripad, E. M. S. *On Organization*. Delhi,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4. 96 pp.

E. M. S. 南布迪里巴德：《论组织工作》

1954年7月13—15日在德里中央党校所作的一系列演讲。

Ranadive, Bhalchandra Trimbak. *Jobs for All*.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5. 30 pp.

帕耳占德腊·德利莫巴格·兰纳迪夫：《人人有事作》

1945—1946年大选期间对印共经济政策的基本说明。

——. *On People's Democracy*. Bombay,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49 ? 12 pp.

同上作者：《論人民民主》

兰納迪夫理論路綫的基本論述。原載《共产主义者》月刊。

Roy, M.N. *The Future of Indian Politics*. London, R. Bishop (1926). 118 pp.

M. N. 罗易：《印度政治的未来》

对该书的介绍见本书第五章中 M. N. 罗易的《印度政治的未来》一节。

Thapar, Romesh, et al. *Nehru's Foreign Policy*. Bombay, Crossroads Publication, 1951. 28 pp.

塔巴尔·洛梅什等著：《尼赫鲁的外交政策》

该文很有趣地反映了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

Vasudeva Rao, Chalasani. *Bharatha Communist Party Nirmaana Charithrea*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Indian Communist Party). Vijayawada, Praja Sakti Press, 1943.

札拉薩尼·瓦苏堆瓦·腊欧：《印度共产党成立经过》

根据在党的训练营的演讲写成的一部半官方印共党史。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藏有根据泰卢固文原本译出的部分译文。

Workers' and Peasants' Party of Bengal. *A Call to Action*. Calcutta, Sri Gourganga Press, 1928. 58 pp.

孟加拉工农党：《行动的号召》

详细叙述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孟加拉邦的早期发展。

Zaheer, Sajjad. *A Case for Congress-League Unity*.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4. 45 pp.

薩札德·札喜尔：《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团结问题》

阐明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作者系党的穆斯林领导人。

印共党内文件

Chandra, Prabodh (pseud.). *On "A Note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our Party"* (PHQ Open Forum no. 12). No place, no pub., 1950.

勃腊波特·占德腊(笔名):《論〈关于我党当前情况的意見〉》(載《总部党組公开論壇》第12期)

出版年份誤印为1949年。詳細論述了印共如何被 B. T. 兰納迪夫所掌握以及后来又如何抛弃其极端左傾主义的經過。

Communist Conspiracy at Madurai. Bombay, Democratic Research Service, 1954. 159 pp.

《共产党在馬杜賴的陰謀》

这是由孟买的一个反共情报中心揭露发表的印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的汇编。

Communist Double Talk at Palghat. Bombay, Popular Book Depot for the Democratic Research Service, 1956.

《共产党在帕尔加特會議上的自相矛盾的論点》

有关印共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文献。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Letter of the new Central Committee (Reconstitut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Elected at the Second Party Congress) to All Party Members and Sympathisers*. No place, no pub., 1950. 18 pp.

印度共产党:《(經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出之中央委员会加以改組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及同情者书》

腊捷什瓦尔·腊欧所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在党内当权后所拟关于政策和組織問題的報告。

——. *Memorandum on Communist Policy and Plan of Work*. No place, no pub., 1942? 7 pp.

同上:《关于共产党的政策和工作計劃的备忘录》

关于党所提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同政府合作的計劃的說明。

——. *On Telengana*. Information document no. 7 (2). No place, no pub., 1950. 29 pp.

同上:《关于堆楞加那起义的報告》

作者系安得拉邦委员会委員,姓名不詳。該文件詳細敘述了堆楞加那武装起义的經過。

——. *Report on the Struggle in the Hill-border Regions of My-*

mensingh, Bengal. Information document, no 6 (1). No place, no pub., 1950. 14 pp. (Mimeo.)

同上：《关于孟加拉邦米門辛格县边境山区的斗争的报告》

有关印巴边界地区米門辛格县的革命活动的报告。

—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on P. C. Joshi's Appeal Against Expulsion, June, 5, 1950. No place, no pub., 1950. 5 pp.*

同上：《1950年6月5日中央委员会就P.C. 約希对开除他出党提出的申诉所作的决议》

详细解释了开除P.C. 約希出党的原因。

— *Tripura State People's Heroic Armed Resistance to Fascist Terror. Information document no. 5. No place, no pub., 1950. 10 pp.*

同上：《特里普拉邦人民武装抵抗法西斯恐怖的英勇斗争》

详细叙述了特里普拉邦的革命活动。

Dange, Shripad Amrit. *Some Notes on the Roots of Our Mistakes After Calcutta.* No place, no pub., April 20, 1950. 43 pp.

什利巴德·阿莫利德·丹吉：《关于加尔各答代表大会后我党的错误的根源的几点意见》

抨击党领导所奉行的左倾政策。

Deven and Bal Krishna. *Talks with Comrade R. Palme Dutt and Other Impressions Gained Abroad by Deven and Bal Krishna.* No place, no pub.,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51. 6 pp.

堆文与巴耳·格利什那：《堆文与巴耳·格利什那同R. 帕姆·杜德同志的谈话及在国外获得的印象》

反对分子所散发的文件，报道了杜德在伦敦向印共两名密使提出的建议。

Ghosh, Ajoy, S. A. Dange, and S. V. Ghate. *A Note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Our Party.* No place, no pub., 1950. var. pag.

阿約艾·高士，S. A. 丹吉与 S. V. 卡堆：《关于我党当前情况的意见》

一份派别活动的重要文件，有助于揭露左倾领导人所奉行的政策。

Indian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1930—1956. Bombay, Democratic Research Service and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7. 345 pp.

《1930—1956年印度共产党文件》

印共公开和秘密文件的汇编，很有价值。其中有些文件曾见于民主研究社的其他出版物中。

PHQ Unit's Covering Note to the Letter of the Political Committee of the CPGB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No place, no pub., December 6, 1950. 6 pp.

《总部党组附在英共政治委员会致印度共产党信上的附件》

这是印共的英国顾问所写的一封信，据传当时的印共领导曾扣压该函，不予发表。

Self-Critical Report of the Andhra Communist Committee. No place, no pub., 1952? var. pag.

《安得拉党委员会的检讨报告》

党内文件。对了解共产党在安得拉邦和堆楞加那所采取的政策和进行的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出版物

Dyakov, A. *Indiia vo vremia i posle vtoroi mirovoi voiny, 1939—1949* (India During an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9—1949). Moscow, 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 SSSR, 1952, 259 pp.

A. 季亚科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印度，1939—1949年》

作者系苏联在这方面著作最多的专家，书中全面论述了苏联对独立初期的印度的看法。

——“K voprosu o natsional'nom sostave naseleniia Indii” (On the Question of the National Composition of the People of India) in *Uchenye Zapiski Tikhookeanskogo Instituta, Tom I.* Moscow, 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 SSSR. 1947. pp. 223—330.

同上作者：《印度的民族构成问题》

最早说明苏联对印度民族问题的态度的文章。

——*Natsional'nyi vopros i angliiskii imperialism v Indii* (The

National Question and English Imperialism in India). Moscow,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 1948. 328 pp.

同上作者：《印度民族問題与英帝国主义》

全面論述了苏联对民族問題的态度。

Krizis kolonial'noi sistemy (Crisis of the Colonial System). Moscow, 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 SSSR. 1949. 289 pp.

《殖民体系的危机》

全面論述了苏联对南亚和东南亚的政策,其中有關於印度的一章。

Ming, Wang.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Colonial Countries*.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 1935. 64 pp.

王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

这是作者 1935 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殖民地政策的报告,經過增訂而成。其中包括对印度的重要看法。

Uchenye zapiski tikhookeanskogo instituta; Tom 2: Indiiskii sbornik (Scholarly Papers of the Pacific Institute; Vol. 2: Indian Collection). Moscow, 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 SSSR., 1949. Chapters 1, 2, 3.

《太平洋研究所学报》, 第 2 卷,《印度問題汇编》

1947 年 6 月在科学院會議上討論苏联对印政策时宣讀的研究报告的汇编。

Zhukov, E. M. "Obostrenie krizisa kolonial'noi sistemy" (The Sharpening of the Crisis of the Colonial System) in *Bolshevik*, December 15, 1947. pp. 51—65.

E. M. 茹科夫：《殖民体系危机的加剧》

关于 1948—1950 年苏联对南亚及东南亚的政策的基本說明。

譯名对照表

A

| | |
|--|--|
| Abbas, K. A. 阿巴斯, K. A. | 孟加拉佃农會議 |
| Abdullah, Sheik 阿卜杜拉, 謝克 | All-China Labor Federation 中华全 国总工会 |
| Acharya, M. P. T. 阿札腊, M. P. T. | All-India Association of Democratic Lawyers 全印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 |
| Adhikari, Dr. G. M. 阿提加利博士 | All-India Bank Employees' Associa- tion 全印銀行雇員联合会 |
| Advance Guard «前卫» | All-India Conference of Hindi Pro- gressive Writers 全印印地語进步作 家會議 |
| Aftab Ali 阿夫塔布-阿里 | All-India Conference of Urdu Pro- gressive Writers 全印烏尔都語进步 作家會議 |
| Agarwala, Seth T. Ramjush 阿加尔 瓦拉, 塞特·T. 腊莫朱什 | All-India Conference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Parties 全印工农政 党會議 |
| “agit-prop” 宣传鼓动 | All-India Congress for Peace 全印 爭取和平大会 |
| Ahmed Muzaffar 艾哈迈德, 穆札法尔 | All-India Congress Committee (AICC) 国大党全国委员会 |
| Ahmed, Z. A. 艾哈迈德, Z. A. | All-India Congress for Peace and Asian Solidarity 全印爭取和平和亚 洲团结大会 |
| Ahmednagar 阿赫梅德那加尔 | All-India Constituent Assembly 全 印制宪議會 |
| A. I. S. F. (Farooqui Group) 即 All-India Students' Federation 全印学生联合会(法魯奇集团)(縮写) | All-India Federation of Labor 全 印劳工联合会 |
| Aiyar, T. M. Krishnaswamy 艾雅 尔, T. M. 格利什那斯瓦米 | All-India Federation of Educatio- nal Workers' Association 全印教 育工作者联合会 |
| Ajmer-Merwara 阿季米尔-梅尔瓦腊 | All-India Friends of the Soviet Union (AIFSU) 印苏友好协会 |
| Ajmera, Jagdish 阿支梅腊, 札格底什 | |
| Akalis 阿加利党人 | |
| Aleem, Dr. Abdul 阿利姆博士, 阿卜 杜耳 | |
| Alexandrov, Dr. G. F. 亚历山德罗夫 博士, G. F. | |
| Alexeev; M. 阿列克謝耶夫, M. | |
| Ali, Mohamed 阿里, 穆罕默德 | |
| Ali, Sohrab 阿里, 索哈拉布 | |
| Ali, Syed Nausher 阿里, 赛义德·諾 舍尔 | |
| All-Bengal Tenants Conference 全 | |

- All-India Hind Mazdoor Sabha 印度劳工全国协会
- All-India Insurance Employees' Association 全印保险业雇员联合会
- All-India Khilafat Congress 全印哈里发大会
- All-India Kisan Sabha (AIKS) 全印农民协会
- All-India Peace Committee 全印和平委员会
- All-India Party Congress 印度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 All-India Peace Convention 全印和平大会
- All-India Peace Council (AIPO) 全印和平理事会
- All-India Port and Dock Workers' Federation 全印港口码头工人联合会
- All-India Progressive Writers' Association (AIPWA) 全印进步作家协会
- All-India Railway Federation (AIRF) 全印铁路员工联合会
- All-India Scientific Conference 全印科学会议
- All-India Seafarers' Federation 全印海员联合会
- All-India States Peoples' Conference 全印各邦人民会议
- All-India Students' Congress 全印学生大会
- All-India Students' Federation (AISF) 全印学生联合会
- All-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 (AITUC) 全印工会大会
- All-India Village Industries Association 全印农村工业协会
- All-Indian Petroleum Workers' Federation 全印石油工人联合会
- All-Indian Youth Congress 全印青年大会
- All-Union Society for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VOKS)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 Allahabad 阿拉哈巴德
- Allen 艾伦
- Allen, José 艾伦, 乔斯
- Allison, George 艾利逊, 乔治
- Alvarez, Peter 阿伐里斯, 彼得
- Alve, A. A. 阿耳威, A. A.
- American Communist Opposition 美共反对派
- Amrita Bazar Patrika 《甘露市场报》
- Anand, Krishna 阿南德, 格利什那
- Anand, Mulk Raj 阿南德, 木耳格·腊支
- Andaman Islands 安达曼群岛
- Andhra 安得拉邦
- Andhradesh 安得拉堆什
- Andra Mahasabha (AMS) 安得拉大会
- Anney 安訥西
- Annie Larsen “安妮·拉逊”号
- Ansari, Dr. M. A. 安萨利博士, M. A.
- Anti-Compromise Conference 反妥协会议
- Anti-Fascist Committee of Soviet Youth 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
- Anti-Fascist Writers' and Artists' Union 反法西斯文学艺术家联合会
- Anti-Imperialist People's Front 反帝人民战线
- Anti-War Day 反战日
- Anushilan Samiti 研究小组
- Arnot, R. Page 阿诺特, R. 佩季
- Aruna 《红色》周刊

Asaf Ali, Aruna 阿薩夫·阿里,阿魯那
 Ashleigh, Charles 艾希利,查尔斯
 Ashraf, Dr. K. M. 阿什腊弗博士, K. M.
 Asia 《亚細亞》
 Asian-African Trade Union Conference 亚非工会會議
 Asian and Pacific Peace Conference (Peking, 1952)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會議
 Asian Lawyers' Conference 亚洲法律工作者會議
 Asian Women's Conference 亚洲妇女會議
 Asian Writers' Conference 亚洲作家會議
 Assembly Letter 給議会的信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东方学协会
 Atal, Dr. Madanlal 阿达耳博士, 瑪丹拉耳
 Atlantic Charter 大西洋宪章
 Atma Sakti 《自力》
 August Resolution 八月決議
 Avadi Resolution 阿瓦底決議
 Avarin, V. Ia. 阿瓦林, V. Ia.
 Ayyangar, Ananthasayanam 阿延加尔,阿南塔薩雅南
 Azad, Abul Kalam 阿沙德,阿布勒·卡拉莫

B

Badhan, A. S. 巴檀, A. S.
 Bahadur Singh, Rana Jang 巴哈杜尔·辛格,拉那·真格
 Baildan 献牛运动
 Bakshi, M. S. 巴格希, M. S.

Bala Sanghams 儿童福利会
 Balabushevich 巴拉布謝維奇
 Baldwin, Stanley 鮑德溫, 斯丹萊
 Baliga, Dr. A. V. 巴梨加博士, A. V.
 Baltiisky, N. 巴尔迪斯基, N.
 Baluchis 俾路支
 Balwant Rajput College 巴耳万德·腊札布德学院
 Bandung 万隆
 Bannerjee, Satyapriya 班納吉,薩达勃利雅(又作 Bannerji)
 Bannerji, M. K. 班納季, M. K.
 Barbusse, Henri 巴比塞, 昂利
 Bareilly Jail 巴雷利监狱
 Barkatullah 巴尔加都拉
 Barman, Dasrath Deb 巴尔曼, 达斯腊特·德勃
 Bashyam, K. 巴夏莫, K.
 Basu, Hemanta Kumar 巴苏, 黑曼达·古瑪尔
 Basu, Jyoti 巴苏, 約底
 Baswan Singh 巴斯万·辛格
 Batliwala, Soli 巴德黎瓦拉, 索黎
 Beals, Carleton 比耳斯, 卡尔頓
 Bedi, B. P. L. 貝底, B. P. L.
 Bengal 孟加拉
 Bengal Friends of the Soviet Union 孟加拉印苏友好协会
 Bengal Trade Union Federation 孟加拉工会联合会
 Bergerhotta, J. P. 貝尔圭尔霍达, J. P.
 Beria, Lavrenti 貝利亚, 拉夫連季
 Berlin India Independence Committee 柏林印度独立委员会
 Bernal, J. D. 貝尔納, J. D.
 Bespalov, N. N. 別斯帕洛夫, N. N.

Bey, Khalil 貝, 卡黎耳
Bhakta, Satya 帕格达, 薩达
Bhalerao, Shanta 帕雷腊欧, 閃达
Bhalerao, Waman 帕雷腊欧, 瓦曼
Bharadwaj, R. D. 帕腊德瓦支, R. D.
Bhargava, Prem 帕尔加瓦, 勃累莫
Bhattacharya, Narendra Nath 帕达
札腊, 那冷德腊·那特 (即罗易, 馬納卜
德腊·納特)
Bhattacharya, Sushil 帕达札腊, 苏希
耳
Bhave, Vinoba 帕威, 維諾巴
Bhoodan Yagna movement 献田运
动
Bhopal 博帕耳
Bihar 比哈尔
Bindu 宾都族
Biswas, Baidyanath 比斯瓦斯, 拜达那
特
Blitz «閃电» 周报
Bolshevik «布尔什維克»
Bombay Chronicle «孟买紀事报»
Bombay Municipal Corporation 孟
买市政厅
Bombay textile workers' strike 孟买
紡織工人罢工
Bombay Textile Labor Union (BTLU)
孟买紡織工会
Bombay Youth Conference 孟买青年
会议
Bora, Phani 波腊, 帕尼
Borodin, Michael 鲍罗廷, 米哈伊尔
Bose, Arabind 鲍斯, 阿腊宾德
Bose, Arun 鲍斯, 阿淪
Bose, Dilip 鲍斯, 底黎勃
Bose, Mrinal Kanti 鲍斯, 莫利那耳·
甘底
Bose, P. 鲍斯, P.

Bose, P. O. 鲍斯, P. O.
Bose, Puspamoyee 鲍斯, 布斯巴摩伊
Bose, Rash Behari 鲍斯, 腊什·卑哈
利
Bose, S. M. 鲍斯, S. M.
Bose, Sarat Chandra 鲍斯, 薩腊德·
占德腊
Bose, Subhas Chandra 鲍斯, 苏帕
斯·占德腊
Bradley, Benjamin F. 布莱德雷, 本
杰明·F.
Brandler, Heinrich 布兰德勒, 海因
利希
Brelvi, Syed Abdulla 布累耳維, 赛
义德·阿卜杜拉
British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
partment (缩写 British CID) 英
国刑事調查处
British Intelligence 英国情报处
British Trade Union Congress 英国
职工大会
Bryushkov, Yuri 布留希科夫, 尤里
Bulganin-Khrushchov visit 布尔加
宁—赫魯晓夫的訪問
Byndor, G. S. 宾多尔, G. S.

C

Cabinet Mission Plan 英国内閣代表
团方案
Calcutta High Court Bar Associa-
tion 加尔各答高等法院律师协会
Campbell, Donald 坎貝尔, 当納德
Carranza, Venustiano 卡朗札, 韦努
斯提昂諾
Casadei, Guiseppe 卡薩德伊, 圭塞佩
Cawnpore Conspiracy Case 康波尔
謀叛案
CC Forum «党中央委员会論壇»

- Central Asiatic Bureau 中亚細亞局
 Central Legislative Assembly (India) 中央立法議會
 Chakraberty, Dr. Chandra 查格腊卑尔底博士, 占德腊
 Chakravarty, Ram 查格腊瓦尔底, 拉莫
 Chakravarty, Renu 查格腊瓦尔底, 累努
 Chakravarty, Tripurari 查格腊瓦尔底, 德利布腊利
 Chand, Anasuya Gyan 占德, 阿那苏雅·吉安
 Chand, Dr. Gyan 占德博士, 吉安
 Chand, Prem 占德, 勃累莫
 Chandar, Krishan 占达尔, 格利閃
 Chandra, Perrin 錢德拉, 比蘭(Chandra, Romesh 之妻)
 Chandra, Pritish 占德腊, 勃利底什
 Chandra, Romesh 錢德拉, 罗米希
 Chari, A. S. R. 札利, A. S. R.
 Chatterjee, Khemesh (Kamlesh?) 札德季, 奎梅什(加莫雷什?)
 Chatterjee, Ramananda 札德季, 腊瑪南达
 Chatterji, Makhanlal 札德季, 瑪坎拉耳
 Chattopadhyaya, Harindranath 札多巴塔雅, 哈蘭德腊那特
 Chattopadhyaya, Virendranath 札多巴塔雅, 維冷德腊那特
 Chaturvedi, Benarsidas 札都尔威底, 貝那尔息达斯
 Chaudhary, C. D. 乔塔里, C. D.
 Chauri Chaura 乔利乔腊
 Chettiar, Singaravelu 捷底阿尔, 辛加腊威卢
 Chettiar, V. Chakkarai 捷底阿尔, V. 札加賴
 Chicherin, B. V. 切契林, B. V.
 China Monthly Review 《密勒氏評論报》
 Chinese Writer's Union 中国作家协会
 Chitale, V. D. 季达雷, V. D.
 Chittagong Armory Raiders 吉大港軍械庫袭击者
 Citrine, Walter 西特林, 瓦尔特
 "Citizen's army" "国民軍"
 Civil disobedience 不合作运动
 Cohen, David 冠因, 戴維
 Coimbatore 科因巴托尔
 Colonial Commission 殖民地問題委员会
 Colonial Committee (or Department) of the CPGB 英国共产党殖民地問題委员会
 Colonial question 殖民地問題
 Cominform (欧洲) 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
 Comintern 共产国际
 Second Congress (Moscow, 1920) 第二次大会(莫斯科, 1920年)
 Central Asiatic Bureau 中亚局
 Third Congress (Moscow, 1921) 第三次大会(莫斯科, 1921年)
 Fourth Congress (Moscow and Petrograd, 1922) 第四次大会(莫斯科和彼得格勒, 1922年)
 Fifth Congress (Moscow, 1924) 第五次大会(莫斯科, 1924年)
 Sixth Congress (Moscow, 1925) 第六次大会(莫斯科, 1925年)
 Seventh Congress (Moscow, 1935) 第七次大会(莫斯科, 1935年)
 Colonial Bureau 殖民地局

| | |
|--|--|
| Indian Commission 印度問題委員會 | 产主义国会办事处 |
| Colonial Commission 殖民地問題委員會 | Communist Review 《共产主义評論》 |
| Comité Pro-Hindou 支持印度委員會 | Communist Violence in India 《共产党在印度的暴行》 |
| Communist 《共产主义者》 | Communist Youth Congress 青年国际代表大会 |
| “Communist Consolidation” “共产党人团结” | Communist Youth International 青年共产国际 |
|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CPI) 印度共产党 | community 教派 |
| Foreign Bureau 国外局 | Conference of Asian Countries 亚洲国家會議 |
| Central Executive 中央执行局 | Congress of Oppressed Nationalities (Brussels, 1927) 被压迫民族大会 (布鲁塞尔, 1927年) |
| Central Committee 中央委员会 |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for Peace at Vienna 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
| First Congress (Bombay, 1943) 第一次代表大会(孟买, 1943年) | Congress Party 国民大会党(国大党) |
| Second Congress (Calcutta, 1948) 第二次代表大会(加尔各答, 1948年) | Congress Socialist Party (CSP) 国民大会社会党 |
| Politbureau 政治局 | Congress Working Committee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 |
| Party Headquarters Unit 总部党組 | Constituent Assembly 制宪議會 |
| All-India Party Conference(1951) 印共全国會議(1951年) | Constitution of India Promulgated 已頒布的印度宪法 |
| plenum (1952) 全会(1952年) | “Coördinating Committee” “共同行动委员会” |
| Third Congress (Madurai, 1953—54) 第三次代表大会(馬杜賴, 1953—1954年) | Council of States Secretariat 联邦院秘书处 |
| Fourth Congress (Palghat, 1956) 第四次代表大会(帕尔加特, 1956年) | Coupland, Sir Reginald 庫普兰爵士, 雷金納德 |
| Fifth extraordinary Congress (Amritsar, 1958) 第五次特别代表大会(阿姆里察, 1958年) | “Course For the Cadres of the Shock Brigade” 《突击队員訓練教程》 |
| Control Commission 監察委員會 | Crab Patent Underdrain Tile Company 克萊布下水道瓦管专卖公司 |
| Communist Party of Soviet Union (CPSU), Twentieth Congress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 Cripps Mission 克里浦斯代表团 |
| communal agency 教派組織 | Crossroads 《十字路口》 |
| communalism 教派主义 | Current Affairs 《时事》 |
| Communist Parliamentary Office 共 | Curzon, Lord 寇松勋爵 |

D

Damodaran, K. 达摩达滥, K.
 Dange, Shripat Amrit 丹吉, 什利巴
 德·阿莫利德
 Das, Chira Ranjan 达斯, 季腊·滥占
 Das, Chitta Ranjan 达斯, 季达·滥
 占
 Das, Kedar 达斯, 圭达尔
 Das, P. R. 达斯, P. R.
 Datta, Bhupendranath 达达, 普奔德
 腊那特
 Dayal, Har 达雅耳, 哈尔
 Deb, Dasrath 达勃, 达斯腊特
 “decolonization” “非殖民地化”
 Dedijer, Vladimir 德迪耶尔, 弗拉基
 米尔
 Defence of India Act 印度国防法
 Delhi Book Center 德里书刊中心
 Delhi-Lahore Conspiracy Case 德
 里—拉合尔謀叛案
 Democratic Research Service (DRS)
 民主研究社
 Deoli Detention Camp 德奥利拘留营
 Deoli Thesis 德奥利提綱
 Desai, Dinkar 德赛, 丁加尔
 Deshabhimani 《爱国者报》
 Deshmukh, Sudam 堆什木克, 苏达莫
 Deshpande, S. V. 堆什班堆, S. V.
 Deutschland “德意志”号
 DeVega, Guillermo 德維加, 吉耶莫
 Dey, Bishnu 堆, 比什努
 Dhar, Nandlal 达尔, 南德拉尔
 Dhebar, U. N. 推巴尔, U. N.
 Dimitrov, Georgi 季米特洛夫, 格奥尔
 吉
 Din Mazur 《短工》
 Dorrit Press 多里特出版公司

“Dorsey” “多尔西”

Draft Platform of Action of the
 CP of India 《印度共产党行动綱領
 草案》
 “Draft Programme” 《綱領草案》
 Dreyfus trial 德雷福斯案
 Droz, Humbert 德罗士, 亨伯特
 Dulles, Allen 杜勒斯, 艾伦
 “Dutt-Bradley Thesis” 《杜德—布莱
 德雷提綱》
 Dutt, Clemens 杜德, 克莱門斯
 Dutt, Kalpana 杜德, 加耳巴那
 Dutt, Rajani Palme 杜德, 腊札尼·
 帕姆
 Dutta, Bhupendranath 杜达, 普奔德
 腊那特
 Dyakov, A. 季亚科夫, A.

E

Eastern Economist 《东方经济学家》
 ECCI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Economic Review 《经济評論》
 Edwards Mission College, Peshawar
 白沙瓦市爱德华兹传道会学院
 Ehrenburg, Ilya 爱伦堡, 伊里亚
 Einaudi, Mario 埃諾迪, 馬里奧
 El Heraldo de Mexico 《墨西哥先驅
 报》
 El Socialista 《社会主义者报》
 Elahi, Fazl 伊拉希, 法澤耳
 Elias, Mohamed 伊里亚斯, 穆罕默德
 Enver Pasha 恩維尔, 帕夏
 Ernakulam 埃納庫拉姆

F

Faizpur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国大党費茲浦尔會議
 Far Eastern Bulletin, The 《远东公

报》

Far Eastern Quarterly 《远东季刊》
Far Eastern Survey 《远东概览》
Faridi, A.J. 法利底, A.J.
Farooqi, M. 法鲁奇, M.
Fast, Howard 法斯特, 霍华德
Fazl-il-Ilahi 法泽耳-伊耳-伊拉希(即
伊拉希·法泽耳)
Fellow travelers 同路人
Federal Center 联邦中心
Felton, Monica 费尔顿, 蒙尼卡
Fighting Committee of the Com-
munist Union of the Pottery
Labourers 共产党制陶工会战斗委员
会
Fiji Islands 斐济群岛
Foward Bloc 前进集团
Friends of the Soviet Union 印苏友
好协会
Future of Indian Politics, The
《印度政治的未来》

G

Gadgil, N.V. 加德基耳, N.V.
Gale, Linn A.E. 盖尔, 林·A.E.
Gale's 《盖耳》杂志
Gana Sakti 《群力》
Ganacharya, Gulab Rao 加那札腊,
古拉勃·腊欧
Ganavani 《群言》周刊
Gandhi, Indira 甘地, 英迪拉
Gandhi, Manek 甘地, 玛内格
Gandhi, Mohandas Karamchand 甘
地, 摩含达斯·加腊莫占德
Garcia, V. 加西亚, V.
Gavankar, D.N. 加万加尔, D.N.
Gaya 加雅
Gegen den Strom 《逆流》

Genoa Conference 热那亚会议
George, K.C. 乔治, K.C.
Ghadr (Revolt) Party 卡德尔(起义)
党
Ghate Sachidanand Vishnu 卡堆,
萨季达南德·维什努
Ghose, Aurobindo 廓塞, 奥洛宾多
Ghosh, Ajoy 高士, 阿约艾
Ghosh, Nirmal 廓什, 尼尔玛耳
Ghoshal, Arvind 廓沙耳, 阿尔温德
GIP (Great Indian Peninsula) Rail-
waymen's Union 大印度半岛铁路
职工会
Girni Kamgar Mahamandel 纺织工
人大会
Girni Kamgar Union (GKU) 纺织
工人工会
Glading, Percy E. 格拉丁, 佩西·E.
Glitenkamp, Henry 格里敦坎普, 亨
利
Gofman, Yuri 郭夫曼, 尤利
Gold, Michael 戈尔德, 迈克尔(即格
兰尼契, 欧文)
Golden Rock 果耳登罗克
Gomulka 哥穆尔卡
Gopalan, Ayilliath Kutteri 高普兰,
阿夷黎阿特·古堆利
Gopalan, K.P.R. 果巴兰, K.P.R.
Goswami, G. 果斯瓦米, G.
Gour, Raj Bahdur 戈尔, 腊支·巴哈
都尔
Government of India's Intelligence
Bureau 印度政府情报局
Govindas 果温达斯族
Gramdan 献村运动
Granich Irwin 格兰尼契, 欧文
Gruzenberg, F. (Borodin, Michael)
格鲁岑堡, F.(即米哈伊尔·鲍罗廷)

Gujerathis 古季腊特族
 Gujerati-Marwari Group 古季腊特—
 馬尔瓦尔族財团
 Guntur 貢土尔
 Gupta, Bhupesh 古普塔, 普卑什
 Gupta, Indrajit 古普塔, 因德腊季德
 Gupta, Nalini 古普塔, 那黎尼
 Gupta, Nellie Sen 古普塔, 內黎·
 森
 Gupta, Sachin Sen 古普塔, 薩紧·森
 Gupta, Sarla 古普塔, 薩尔拉
 Gureev, Ivan 古列夫, 伊凡

H

Haidar Khan, Amir 海达尔·汗, 阿
 米尔
 Hajrah Begum 哈支腊赫·卑古莫夫
 人
 Haldulkar, R. K. 哈耳都耳加尔, R.
 K.
 Halim, Abdul 哈黎莫, 阿卜杜耳
 Hands Across the Himalayas 《越过
 喜馬拉雅山的手》
 hartals 罢市
 Hasan, S. D. 哈桑, S. D.
 Henrio, Robert 昂利奥, 罗貝
 Hessler, Gertrude 海斯勒, 格特魯德
 Hind Mazdoor Sabha (HMS) 印度劳
 工协会
 Hindi 印地語
 Hindi, A. K. (Tayab Shaikh) 辛底,
 A. K. (即达雅勃·賽克)
 Hindu Conspiracy Case 印度教徒謀
 叛案
 Hindu Mahasabha 印度教大会党
 Hindu-Muslim civil war 印度教徒
 和穆斯林的冲突
 Hindu, The 《印度教徒报》

Hindu Weekly Review, The 《印度
 教每周評論》
 Hindustan Socialist Republican As-
 sociation 印度斯坦社会共和协会
 Hindustan Times 《印度斯坦时报》
 Home Rule League 自治同盟
 Horniman, Guy 霍尼曼, 盖
 Huda, Shamsul 胡达, 向苏尔
 Hussain, Ghulam 侯赛因, 庫拉莫
 Hyat Khan, Sir Sikander 海特·汗,
 息甘堆尔爵士
 Hyderabad 海得拉巴

I

ILO conference (Geneva) 国际劳工
 組織會議(日内瓦)
 Independence Day Manifesto (1940)
 独立宣言(1940年)
 Independence for India League 爭
 取印度独立联盟
 Independent 《独立》
 India-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IOFA) 印中友好协会
 "India House" (Tashkent) "印度厅"
 (塔什干)
 India Independence Party 印度独立
 党
 India Today 《今日印度》
 Indian Bureau 印度局
 Indian 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 印度爭取文化自由委员会
 Indian Express 《印度快报》
 Indian Independence Committee 印
 度独立委员会(即柏林委员会)
 Indian Information 《印度新聞》
 Indi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
 印度輿論研究所
 Indian Literature 《印度文学》

- Indian Merchants' Chamber 印度商
会
-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印度国民
大会党
- Indian National Trade Union Con-
gress (INTUC) 印度全国工会大会
- Indian News and Information Bu-
reau 印度新聞局
- Indian People's Theater Association
(IPTA) 印度人民戏剧协会
- Indian Press Digest 《印度报刊文摘》
- Indian Science Congress 印度科学大
会
- Indian Statutory Commission 印度
特別調查委員會
- Indian Trade Union Federation
(ITUF) 印度工会联合会
- Indo-Soviet Cultural Society (ISCS)
印苏文化协会
- Indo-Soviet Festival and Conven-
tion 印苏友好周及印苏友好大会
- Indo-Soviet Journal 《印苏月刊》
- Induprakash 《印度之光》
- Inprecor 《国际新聞通訊》
- Inquilab (Revolution) 《革命》
-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亚洲研究
所
-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World Politics 世界經濟与政治研
究所
- Inter-Asian Conference 亚洲會議
- Interim Government (Nehru, 1946)
(1946年尼赫魯的) 过渡政府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moc-
ratic Lawyers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
协会
- International Brigade 国际纵队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wyers 国际法律工作者會議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IFTU) 国际工会联合会
-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of Jour-
nalists (Helsinki) 第三屆国际新聞
工作者大会(赫尔辛基)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
貨幣基金組織
-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国际新聞通訊》
-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
The 国际学生会議
-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 国
际学生联合会
- International Workers' Aid Society
国际工人援助会
- ISCUS 《印苏文化协会季刊》
- Ishimoto, Keikichi 石本敬吉
- Islam, Quazi Nazrul 伊斯拉莫, 夸
西·納茲魯耳
- Ismail, Mohammed 伊斯迈耳, 穆罕
默德
- Iyengar, A. S. K. 伊因加尔, A. S. K.
- Iyengar, O. K. 伊因加尔, O. K.
- Iyengar, S. Srinivasa 伊因加尔, S.
斯利尼瓦薩
- Iyer, V. H. Krishnan 伊耶尔, V. H.
格利什南
- Izvestia 《消息报》
- J
- Jadhav, Tulsidas 札塔烏, 都耳息达斯
- Jafri, Ali Sardar 札弗利, 阿里·薩尔
达尔
- Jagaran 《觉醒报》
- Jagtap, Baburao 札格达勃, 巴布腊欧
- Jamphekar, R. M. 札莫斐加尔, R. M.
- James, J. Langford 詹姆斯, J. 兰福德

Jan Sangh 人民同盟
 Jana Shakti 《人民力量》
 Janasakti 《人民力量》周刊
 Janata 《人民周刊》
 Janayuddha (People's War) 《人民战争》
 Jang-e-Azadi 《自由的战斗》
 Janyug (People's Age) 《人民世纪》
 Japeth, M. D. 札貝特, M. D.
 Jeevanandam, P. 捷瓦南达莫, P.
 Jeevandan 献身运动
 Jhabwala, S. H. 札勃瓦拉, S. H.
 Jharia 查利阿
 Jinnah, Mohammed Ali 真納, 穆罕默德·阿里
 Joglekar, K. N. 卓格雷加尔, K. N.
 Johnstone, J. W. 約翰斯頓, J. W.
 Joliot-Curie Frederic 約里奧-居里, 弗雷德里克
 Josh, Sohan Singh 卓什, 索含·辛格
 Joshi, N. M. 卓什, N. M.
 Joshi, Puran Chandra 約希, 布溢·占德腊
 Joshi, S. M. 卓什, S. M.
 Jugantar Party 划时代党
 Junankar, Dr. 瑜难迦博士

K

Kabadi, Sundar 卡巴底, 森达尔
 Kabal (Kabul?) Singh 卡巴耳 (加布耳?)·辛格
 Kabir, Humayun 卡比尔, 胡馬云
 Kabul, 喀布尔
 Kakkar, A. C. 卡卡尔, A. C.
 Kalappa, V. R. 卡拉巴, V. R.
 Kalelkar, Kakasahab 卡雷耳卡尔, 卡卡沙哈勃
 Kalighat Depot 加黎卡德仓库

Kalyanasundaram, M. 卡拉那孙达腊莫, M.
 Kamgar Kisan Party 工农党
 Kamma 金摩种姓
 Kandalkar 甘达耳加尔
 Kannada 甘那达族
 Kapoor, Prithvi Raj 卡波尔, 勃利特維·腊支
 Kar, S. N. 卡尔, S. N.
 Karanjia, R. K. 卡朗吉亚, R. K.
 Kardelj, Edvard 卡德尔, 爱德华
 Karnatikis 加尔那达克族
 Karnik, V. B. 卡尔尼格, V. B.
 Kashmir 克什米尔
 Katayama, Sen 片山潜
 Katju, K. N. 卡德朱, K. N.
 Kaul, V. M. 高耳, V. M.
 Kautsky, John H. 考茨基, 約翰·H.
 Kaverzneva, Olga 卡維茲涅娃, 奥尔加
 Kaye, Sir Cecil 凱爵士, 塞西耳
 Kazhagam, Dravida (南印) 达罗毘荼联盟
 Kazmi, F. A. 卡兹米, F. A.
 Kemal, Pasha Mustafa 基馬尔, 帕夏·穆斯塔发
 Kerala 喀拉拉邦
 Kerala Socialist Party 喀拉拉邦社会党
 Keraleeyan, K. A. 吉腊里延, K. A.
 Kerzhentsev 克尔任切夫
 Khan (of the Indian bureau) (印度局的) 汗
 Khan, Abdul Qadir 汗, 阿卜杜耳·夸底尔
 Khan, Gulam Mohamed 汗, 古拉莫·穆罕默德
 Khan, Juggan 汗, 朱甘

- Khan, Mirza Kuchuk 汗, 米尔札·古朱克
- Khan, Sir Muhammad Zafrulla 汗爵士, 穆罕默德·札弗鲁拉
- Khandkar, L. R. 坎德加尔, L. R.
- Khankoji 坎果季
- Khedgikar, R. A. 奎德基加尔, R. A.
- Khilafat 哈里发(哈里发反英运动)
- Kirti 《荣誉》
- Kisan Bulletin 《农民公报》
- Kisan Mazdoor Praja Party(KMPP) 农工人民党
- “Kisan Mazdoor Raj” “农工政权”
- Kitchlew, Dr. Saifuddin 克其鲁博士, 赛福丁
- Klugmann 克鲁格曼
- Kochariants 科查利安茨
- Kolarov, V. P. 科拉罗夫, 瓦西里·彼得罗夫
- Kondaiah, Bala 孔戴阿, 巴拉
- Koopdan 献井运动
- Kosambi, D. D. 高善必, D. D.
- Kovacs, Istvan 科瓦契, 伊斯特万
- Kovrigina, M. D. 科弗利金娜, M. D.
- Kranti 《革命》
- Kranti Kari 《革命者》
- Krestintern (共产国际的)农民国际
- Kripalani, Acharya, J. B. 格利巴拉尼, 阿札腊, J. B.
- Krishnagar 克里希纳加尔
- Krishnamurthi, S. 格利什那木尔提, S.
- Krishnan, N. K. 格利什南, N. K.
- Kulkarni, D. B. 古耳加尔尼, D. B.
- Kumaramangalam, Mohan 古玛腊曼加拉莫, 摩舍
- Kumarananda, S. 古玛腊南达, S.
- Kumarappa, Dr. J. C. 古玛腊巴博士, J. C.
- Kumbh Mela 甘婆庙会(每隔十二年在阿拉哈举行)
- Kunhambu, A. V. 昆罕布, A. V.
- Kurup, Sankara 古鲁勃, 闪加腊
- Kuusinen, Otto Vilhelm 库西宁, 奥托·威廉
- Kweit, William N. 克威特, 威廉·N.
- L**
- Labour Monthly 《劳工月刊》
- Labour Swaraj Party of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印度国民大会劳工自治党
- Laffitte, Jean 拉菲特, 让
- Lahiri, Somnath 拉希利, 索莫那特
- Lahore Conference 拉合尔会议
- Lajpat Rai, Lala 拉支巴德·腊伊, 拉拉
- Lal Communist Party(Punjab) (旁遮普邦) 红色共产党
- Lal, Mani 拉耳, 玛尼(即玛尼·拉耳·沙赫博士)
- Lal Nishan Group 红旗集团
- Lall, Chaman 拉耳, 札曼
- Langal (Plough) 《犁》
- Laski, Harold 拉斯基, 哈罗德
- Latifi, Daniel 拉地菲, 丹尼尔
-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反帝联盟
- Left Consolidation Committee 左翼团结委员会
- Lele, P. R. 列里, P. R.
- Lemin, I. 列明, I.
- Lenin-Day 列宁日
- Lenin Institute 列宁研究院
- Liberal Party 自由党

Limaye, Madhu 黎瑪耶, 瑪士
Linguistic entity 語言集團
linguistic-states problem 語言邦問題
Litvinov, Maxim 李維諾夫, 馬克辛
Lokare, S. G. 罗卡尔, S. G.
Lominadze 罗明那則
Lomba, Satish 罗莫巴, 薩底什
Lopez, Francisco Cervantes 洛佩斯,
弗朗西斯科·塞万提斯
Lotvala, Ranchoddas Bhavan 罗德
瓦拉, 蓋卓达斯·帕万
Lovestone, Jay 洛夫斯通, 賈埃
Lucknow Agreement 勒克瑙協議
Lucknow Students' Strike 勒克瑙学
生罢課
Luhani, G. A. K. 卢哈尼, G. A. K.
Luxemburg, Rosa 卢森堡, 罗莎
Lyallpuri, Jagjit Singh 拉耳布利, 札
格基德·辛格
Lynd, Henry G. 林德, 亨利·G.

M

MacDonald, Ramsey 麦克唐納, 腊姆
齐
MacManus, Arthur 麦克馬納斯, 阿瑟
Madhavanar, K. 瑪塔瓦那尔, K.
Madhya Bharat 中央印度
Madhya Pradesh 中央邦
Madras Conspiracy case 馬德拉斯謀
叛案
Madurai 馬杜賴
Maha Gujerat Parishad 大古季腊特
人民大会
Maharashtrians 馬哈拉施特拉族
Mahila Sanghams 《妇女会》
Mahmoud 馬赫茂德
Mahmud, Syed 馬赫茂德, 賽义德

Mahmuduzaffar, S. 馬赫茂都札法尔,
S.
Mahomed, Khushi 馬霍默德, 庫西
Mahtab, Harekrushna 瑪赫达勃, 哈
累格魯什那
Majid, Abdul 馬季德, 阿卜杜耳
Majumdar, Sukhendu 瑪琼达尔, 苏根
都
Malabar 馬拉巴尔
Malabar District Progressive
Writers' Conference 馬拉巴尔地区
进步作家會議
Malaviya, Chatur Narain 瑪拉維雅,
札都尔·那拉因
Malaviya, Madan Mohan 瑪拉維雅,
瑪檀·摩含
Malayalam 馬拉雅拉姆族
Malenkov, Georgi 馬林科夫, 格奥尔
基
Malik, Abdul 馬立克, 阿卜杜耳
Manuilski 曼努伊里斯基
Marathwada 瑪腊特瓦达
Maring 馬林(即斯尼弗力)
MARS. 西孟加拉妇女自卫协会(縮写)
Marx-Panthi 《馬克思追随者》
Marxist Miscellany 《馬克思主义杂
组》
Masani, Mino R. 瑪薩尼, 米諾·R.
Mascarene, Kumari Annie 瑪斯卡伦
尼, 古瑪利·安妮
Maslennikov 馬斯連尼科夫
Maslennikova, Leokadia 馬斯連尼科
娃, 列奧卡迪雅
Masool, Abdulla 馬索耳, 阿卜杜拉
Masses of India 《印度群众》
Matamat 《知識者》
Maverick “小牛号”
Maxwell, Sir Reginald 馬克斯威尔爵

- 士,雷金納德
- Mayekar, D.R. 瑪耶加爾, D.R.
- Mazdoor Kisan Party 工农党
- Mazumdar, Bikash 瑪仲達爾, 比加什
- Mazut 瑪祖德
- Meany, George 米尼, 乔治
- Mecca 麥加
- Meerut(Conspiracy Case) 密拉特(謀叛案)
- Meherally, Yusuff 梅里腊黎, 优素福
- Mehnat Kash 《劳动人民》
- Mehta, Arvind 梅達, 阿尔温德
- Mehta, Dinkar 梅達, 丁加爾
- Mehta, R. J. 梅達, R. J.
- Menon, Chelat Achutha 梅农, 捷拉德·阿朱塔
- Menon, K. A. Damodara 梅农, K. A. 达摩达腊
- Menon, Lakshmi 梅农, 拉格什米
- Menon, P. Balachandra 梅农, P. 巴拉占德腊
- Menon, V. K. Krishna 梅农, V. K. 克里希那
- Mif, Pavel 米夫, 巴维尔
- Mikhailov, Maxim 米哈依洛夫, 馬克辛
- Mirajkar, S. S. 米腊吉卡, S. S.
- Misra, Mahesh Dutt 米斯腊, 瑪黑什·都德
- Mitra, Jotin 米德腊, 卓丁
- Mohani, Maulana Hasrat 摩哈尼, 冒拉那·哈斯腊德
- Mohiuddin, Maqdoom 摩喜烏丁, 馬格东
- Montagu-Chelmsford reforms 蒙塔古一契尔姆斯福德改革方案
- Monthly Public Opinion Surveys 《每月輿論調查》
- Mookerjee, H. C. 莫克吉, H. C.
- Mooney trial 湯姆·蒙尼案
- More, S. S. 摩尔, S. S.
- Morones, Luis 摩罗内斯, 路易
- Mountbatten, Lord Louis 蒙巴頓勋爵, 路易斯
- Muhajirun 朝圣香客 (Muhajir 之多数)
- Mukerjee, Amiya 穆克吉, 阿米雅
- Mukerjee, Dr. Hiren 穆克吉博士, 喜冷
- Mukherjee, B. K. 穆克吉, B. K.
- Mukherjee, Bankim 穆克吉, 班基莫
- Mukherjee, Biswanath 穆克吉, 比斯瓦那特
- Mukherjee, Kumar 穆克吉, 古瑪尔
- Mukherji, Abani 穆克季, 阿巴尼
- Mukherji, Dhan Gopal 穆克季, 檀·果巴耳
- Mukherji, Shanta 穆克季, 閃达
- Mukherji, V. 穆克季, V.
- Mukherji, Vivekananda 穆克季, 維威加南达
- Muktiyuddha 《解放战争》
- Mundassery, Joseph 蒙多舍利, 約瑟夫
- Munnani 《蒙南尼》
- Münzenberg, Willi 明岑堡, 威利
- Murphy, J. T. 麦尔菲, J. T.
- Musafir, Giani Gurmukh Singh 木薩菲尔, 基阿尼·古尔木克·辛格
- Muslim League 穆斯林联盟
- Musso 木索
- Mymensingh (East Pakistan) 米門辛格(东巴基斯坦)

N

Naga 那加

- Nagpur 那格浦尔城
- Naidu, Lilamani 乃都, 黎拉瑪尼
- Naidu, Sarojini 乃都, 薩落季尼
- Nair, M. N. Govindan 乃尔, M. N. 果温丹
- Nalgonda and Warangal 那耳貢达及伏隆古尔
- Nambiar, K. Anandan 南比阿尔, K. 阿南丹
- Nambiar, Shuhasini 南比阿尔, 舒哈息尼
- Namboodiripad, Elamkulam Mana Sankaran 南布迪里巴德, 埃拉莫古拉莫·瑪那·散加濫
- Nandi, Dwijendra 南底, 德維真德腊
- Narayan (pseud.) 那腊延(假名)
- Narayan, Jaya Prakash (or. J. P.) 那腊延, 札雅·勃腊加什(或 J. P.)
- Nasim, Habib Ahmad 那西姆, 哈比勃·阿默德
- National Academy of Dance, Drama and Music 音乐、舞蹈、戏剧学会
- National Congress of Women 全国妇女大会
- 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ian Women (NFIW) 印度全国妇女联合会
- National Front «民族陣綫»
- National Peace Covention (Bangalore, 1957) 全国和平大会(班加罗尔, 1957年)
- National Relief Fund 全国救济基金会
- National Trade Union Federation (NTUF) 全国工会联合会
- 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 (NUS) 全国学生联合会
- Nava Yuga «新世紀»
- Navalokam «新世界报»
- Navasakti «新力量»周刊
- Navayugam «新世紀»
- Navi Dunia «新世界»周刊
- Naya Hindusthan «新印度斯坦»
- Naya Zamana «新世紀报»
- Nazi-Soviet Pact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 Nehru, Jawaharlal 尼赫鲁, 賈瓦哈拉尔
- Nehru, Motilal 尼赫鲁, 摩底拉耳
- Nehru, Rameshwari 尼赫鲁, 腊梅什·瓦利
- Nehru, Uma 尼赫鲁, 烏瑪
- Neumann, Heinz 奈依曼, 海因茲
- New Age (weekly and monthly) «新世紀»(周刊及月刊)
- Nikitin, Afanasy 尼基丁, 阿法那西
- Nimbkar, R. S. 宁勃加尔, R. S.
- Nordmann, Matre Joe 諾德曼, 馬特爾·乔埃
- Notes of the Month «每月評論»
- November-Resolution Day 十一月決議日
- O
- Obeidullah 欧倍都拉赫
- Ogale, Gangadhar J. 欧加雷, 甘加塔尔·J.
- “Operation Asylum” “收容所行动计划”
- “Operation Barbarossa” “紅胡子行动计划”
- Oriental Conference of the CPGB 英国共产党的东方会议
- Ostrovityanov 奥斯特罗維季揚諾夫
- P
- Pacific Affairs «太平洋季刊»

- Pacific Institute of 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苏联科学院太平洋研究所
- Padhye, Prabhakar 巴塔, 勃腊帕加尔
- Pak-Pact 美巴协定
- Palestine Day 巴勒斯坦日
- Pan Pacific Trade Union Secretariat (PPTUS) 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
- Pananjpe, R. M. 巴南支比, R. M.
- Panch Shila 潘查希拉(五项原则)
- Pandit, Vijayalakshmi 潘迪特, 维札雅拉格什米
- Panikkar, K. M. 潘尼迦, K. M.
- Pant, Govind Ballabh 潘特, 果温德·巴拉泊
- Parameswaran, V. 巴腊梅什瓦滥, V.
- Parliamentary 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the Hindi Language 印度国会議員发展印地語协会
- Parishad, Ram Rajya 太平社
- Particularism 地方主义
- Party Letter 《党内通信》
- Party News 《党内消息》
- Parulekar, S. V. 巴鲁雷加尔, S. V.
- Paschima Banga Mahila Atma Raksha Samity (West Bengal Women's Self-Defense Association, MARS) 西孟加拉妇女自卫协会
- Patel, Sardar Vallabhai 巴堆耳, 萨达尔·瓦拉帕伊
- Pathans 巴檀族
- Patil, K. R. 巴底耳, K. R.
- Patil, Nana 巴底耳, 那那
- Patil, S. K. 巴底耳, S. K.
- Patkar, S. G. 巴德加尔, S. G.
- Patna 帕特訥城
- Patnaik, Gurucharan 巴德乃格, 古鲁札滥
- Pavlovsky, E. N. 巴夫洛夫斯基, E. N.
- Payam-e-Mazdoor 《工人信使报》
- Peace 《和平》
- Peace Movement 和平运动
- Peasants' and Workers' Party 农工党
- People's Age 《人民世紀》
- "People's Democracy" "人民民主"
- People's Democratic Front 人民民主陣綫
- People's Educational Film Centre 人民教育电影中心
- "People's Food Committees" "人民粮食委员会"
- People's Herald 《人民先驅》
-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Ltd. (PPH) 人民出版社
- People's War 人民战争
- PEPSU (Punjab and East Patiala States Union) 旁遮普—东巴地阿拉联邦
- Perserikatan Perhimpunan Mahasiswa Indonesia (PPMI) 印度尼西亚大学生联合会
- Peshawar 白沙瓦市
- Peshawar Conspiracy Case 白沙瓦謀叛案
- Petrovsky 彼得罗夫斯基
- Phadke, N. V. 帕德基, N. V.
- Phillips, Charles Francis (Seaman, Frank) 菲立普斯, 查尔斯·弗兰西斯, (即西曼, 弗兰克)
- PHQ Open Forum 《总部党组公开论坛》
- Piatnitsky, Ossip 皮亚特尼茨基, 奥西普

- Pillai, Champakraman 比来,詹巴格
腊曼
- Pillai, P. Krishna 比来, P. 格利什那
- Pinto, F. M. 平多, F. M.
- Pinto, W. T. 平多, W. T.
- Plisetskaya, Maya 普利谢茨卡娅, 玛雅
- "Political Thesis" "政治提纲"
- Pollard, Graham 波拉德, 格雷姆
- Pollitt, Harry 波立特, 哈里
- Pondicherry 本地治里
- Post and Telegraph Association 邮电联合会
- Powell, J. B. 鲍威尔, J. B.
- Poznan-riots trial 波兹南骚乱案
- Prabhatam 《黎明》月刊
- Praja Socialist Party (PSP) 人民社会党
- Prajasakti 《人民力量》
- Prakash, Ch. Brahm 勃腊加什, Ch. 勃腊赫莫
- Pramanik, S. K. 勃腊玛尼格, S. K.
- Prasad, Nageshwar 勃腊萨德, 那吉什瓦尔
- Prasad, Rajendra 普拉沙德, 拉金德拉
- Pratap, Mahendra 勃腊达勃, 玛痕德腊
- Pravda 《真理报》
- Preet Lari 《可爱的花环》
- Preventive Detention Act 预防拘留法
- Princely states 土邦
- Pritt, D. N. 普里特, D. N.
- "Profintern" 工会国际 (即红色工会国际)
- Progressive Writers' Association 进步作家协会
- Protap, D. 勃洛达勃, D.
-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India" "印度临时政府"
- PSP. (Praja Socialist Party) 人民社会党
- Public Safety Bill (Act) 公共安全法案 (法)
- Punjab and East Patiala States Union (PEPSU) 旁遮普-东巴地阿拉联邦 (参见 PEPSU)
- Punjab Students' Conference 旁遮普学生会议
- Punniah, Makineni Basava 崩尼阿, 玛基内尼·巴萨瓦
- Q**
- "Quit India" resolution "滚出印度" 决议
- "Quit Kashmir" "滚出克什米尔"
- Qurban, Fazl-il-Ilahi. (Elahi) 古尔班, 法泽耳-伊耳-依拉希 (即伊拉希)
- R**
- Rab, Abdul 腊勃, 阿卜杜耳
- Radek, Karl 拉狄克, 卡尔
- Radical Humanist 《激进人道主义者》
- Raghavaiah, P. V. 腊格哈外阿, P. V.
- Rai. 腊伊 (Lajpat Rai, Lala) (即拉支巴德·腊伊, 拉拉)
- Railway Union 铁路员工工会
- Rajagopalachari, P. 腊札果巴拉札利, P.
- Rajamannar, P. V. 腊札曼那尔, P. V.
- Rajan, A. S. 腊占, A. S.
- Rajasthans 拉贾斯坦族
- Rajya Sabha 联邦院
- Ram Rajya Parishad 太平社

- Ramamurti, P. 腊玛木尔底, P.
 Ramani K. (Raman?) 腊玛尼(腊曼?), K.
 Ranadive, B. T. (Bhalchandra Trim-bak) 兰纳迪夫, B. T.
 Randeria, J. D. 兰堆利阿, J. D.
 Ranga, N. G. 兰加, N. G.
 Rao, K. Kaleswara 腊欧, K. 加雷斯
 瓦拉
 Rao, B. Narsing 腊欧, B. 那尔欣格
 Rao, B. Srinivasa 腊欧, B. 斯利尼瓦
 萨
 Rao, Chandra Rajeshwar 腊欧, 占德
 腊·腊捷什瓦尔
 Rao, D. Venkatesa 腊欧, D. 文加堆萨
 Rao, M. B. 腊欧, M. B.
 Rao, M. Chandrasekhara 腊欧, M.
 占德腊塞卡腊
 Rao, Moturu Hanumantha 腊欧, 摩
 都鲁·哈努曼塔
 Rao, Nandoori Prasada 腊欧, 南多
 利·勃腊萨达
 Rao, T. B. Vithal 腊欧, T. B. 维塔耳
 Rao, Dr. V. K. R. V. 腊欧博士, V. K.
 R. V.
 Rao, Y. M. 腊欧, Y. M.
 Rao, Y. V. Krishna 腊欧, Y. V. 格
 利什那
 Rasul, Mohamed Abdulla 腊苏耳, 穆
 罕默德, 阿卜杜拉
 Rayalaseema 腊雅拉西玛
 Raza(or Rasur) 腊查(或腊苏尔)
 Razakars 腊查加尔
 Red International of Labor Unions
 (RILU) 红色工会国际
 Red Trade Union Congress 红色工
 会大会
 Reddy, Baddam Yella 雷迪, 巴曼·
 耶拉
 Reddy, M. Govinda 雷迪, M. 果温达
 Reddy, Ravi Narayan 雷迪, 腊维·
 那腊延
 Reddy, T. Nagi 雷迪, T. 那基
 Regional fronts 地区阵线
 Reichstag fire trial 德国国会纵火案
 Reisner, I. M. 赖斯纳, I. M.
 Reuters News Agency 路透社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 革
 命社会党
 RIN (Royal Indian Navy) 皇家印
 度海軍
 Rizvi, Manzer 李兹维, 曼泽尔
 Robertson, Walter S. 罗伯逊, 华尔
 特·S.
 Robeson, Paul 罗伯逊, 保罗
 Robson, R. W. 罗布逊, R. W.
 Rostovsky 罗斯托夫斯基
 Roy, Amalendu 洛埃, 阿玛冷都
 Roy, B. C. 洛埃, B. C.
 Roy, Bimal 洛埃, 比玛耳
 Roy, Dilip 洛埃, 底黎勃
 Roy, Ivelyn 罗易, 伊夫林
 Roy, K. S. (West Bengal Minister)
 洛埃, K. S. (西孟加拉首席部长)
 Roy, Manabendra Nath (Bhattach-
 ariya, Narendra Nath) 罗易, 马纳
 卜德腊·纳特(原名: 帕达札腊, 那冷德
 腊·那特)
 Royal Air Force 皇家空軍
 Royal Indian Navy 皇家印度海軍
 Rubinstein, Modeste 鲁宾斯坦, 莫德
 斯特
 Ryan, Jack 瑞安, 贾克

S

Sabharwal, Pran 萨帕尔瓦耳, 普兰

- Sacco-Vanzetti trial 薩科一万澤第案
- Sadiq, G.M. 薩迪赫, G.M.
- Safarov, Georgi 薩法罗夫, 格奥尔基
- Sahai, Govind 薩海, 果温德
- Sahajanand (Saraswathi) 薩哈札南德
(即薩腊斯瓦提)
- Sahasrabudhe, D.H. 薩哈斯腊布推, D.
H.
- Saillant, Louis 賽揚, 路易
- Saklatvala Day 薩格拉德瓦拉日
- Saklatvala, Shapurji 薩格拉德瓦拉,
薩布尔季
- Sampattidan 献財运动
- Sampurnanand 薩莫布尔那南德
- Samyukta Maharashtra Samiti 馬哈
拉施特拉协会委员会
- Sangeet Natak Akadami 音乐舞蹈戏
剧学会
- Sankrityayana, Rahul 散格利达雅那,
腊胡耳
- Santi Devi (Roy, Evelyn) 散底·堆
維(即罗易, 伊夫林)
- Sapre, Ramachandra 薩勃累, 腊瑪占
德腊
- Sapru Commission 薩勃魯委员会
- Sarang(Serong?), Abdul Khadar 薩
濫(塞隆?), 阿卜杜耳·卡达尔
- Saraswathi, Swami Sahajananda 薩
腊斯瓦提, 斯瓦米·薩哈札南达
- Sardesai, S.G. 薩尔堆赛, S.G.
- Sarvodaya(Welfare of all) 全民福利
- Sarvodaya Sammelan 积极工作者会
議
- Sastry, G. V. Punnaiah 薩斯德利,
G.V. 崩乃阿
- Sathe, Anna Bhau 薩推, 安娜·包
- Saturday Evening Post 《星期六晚邮
报》
- Satyagraha 非暴力运动
- Savonarola 薩佛納罗拉
- Saxena, Shibani Lal 薩森那, 希班·拉
尔
- Sayeed, M. A. 賽义德, M. A.
- Schubin, P. 舒宾, P.
- Second World Congress 第二次世界
代表大会(指第三国际)
- Seaman, Frank (Phillips, Charles
Francis) 西曼, 弗兰克(即菲立普斯,
查尔斯·弗兰西斯)
- SEATO 东南亚条约組織
- Second Five Year Plan 第二个五年
計劃
- Sehrai, Abdul Kabir 塞赫賴, 阿卜杜
耳·加比尔
- Sen, A. 森, A.
- Sen, Bhowani 森, 坡瓦尼
- Sen, Niranjana 森, 尼濫占
- Sen, Ranen 森, 腊嫩
- Sen, S.C. 森, S.C.
- Sèvres, Treaty of 色佛尔条约
- Shafiq, Mohammed 沙菲赫, 穆罕默德
- Shah, O.G. 沙赫, O.G.
- Shah, K.T. 沙赫, K.T.
- Shah, Mahendra 沙赫, 瑪痕德腊
- Shah, Dr. Mani Lal 沙赫博士, 瑪
尼·拉耳
- Shah, Vinubhai G. 沙赫, 維努派·G.
- Shaikh, Tayabi 賽克, 达雅勃
- Sharkey, L.L. 夏基, L.L.
- Sharma, Karyanand 沙尔瑪, 加腊南
德
- Sharma, R.O.L. 沙尔瑪, R.O.L.
- Sharma, Dr. Ram Bilas 沙尔瑪博
士, 腊莫·比拉斯
- Sharma, Yag Dutt 沙尔瑪, 雅格·都
德

- Sharma, Yogendra Nath 沙尔瑪, 尤
根德腊·那特
- Shastri, Raja Ram 沙斯德利, 腊札·
腊莫
- Shepilov, Dimitri 謝皮洛夫, 季米特
里
- Sikhs 錫克教徒
- Simon Commission 西蒙委员会
- Sindhis 信德族
- Singaravelu, Chettiar 辛加腊威卢, 捷
底阿尔
- Singh, Dr. Anup 辛格博士, 阿努勃
- Singh, Baba Gurumukh 辛格, 巴巴·
古魯木克
- Singh, Bhagat 辛格, 帕加德
- Singh, Deep 辛格, 底勃
- Singh, Iqbal 辛格, 伊赫巴耳
- Singh, Prem Lal 辛格, 勃累莫·拉耳
- Singh, Raghbir 辛格, 腊克比尔
- Singh, Sardar Gurbax 辛格, 薩尔达
尔·古尔巴赫
- Singh, Sardar Prithvi 辛格, 薩尔达
尔·勃利特維
- Singh, Sardar Teja 辛格, 薩尔达尔·
堆札
- Singh, Thokchom Bira 辛格, 陀格卓
莫·比腊
- Singh, Virendra Bahadur 辛格, 維冷
德腊·巴哈都尔
- Sipassi, Mohammed 息巴息, 穆罕默
德
- "Small Bureau" (five-men) (五人)
"小型政治局"
- Smedley, Agnes 史沫特莱, 阿格納絲
- Sneevliet (alias Maring) 斯尼弗力
(别名: 馬林)
- Sobolev 索波列夫
- "El Socialista" 《社会主义者》(墨西
哥一小报)
- "Socialist" 《社会主义者》(丹吉主編的
英語周刊)
- Socialist Party 社会党(人民社会党
的支派)
- Socialist Party of India (SPI) 印
度社会党
- Socialist Trade Union Federation
社会党工会联合会
- Sokhey, Sir Sahib Singh 苏奎爵士,
薩喜勃·辛格
- Sokolnikov, M. 索科尔尼科夫, M.
- Somin, N. 索民, N.
- Sommers, Harry 薩默斯, 哈利
- Sosina, N. 索辛娜, N.
- South Indian Railway Labour Union
南印度铁路工会
- Southeast Asia Youth Conference
东南亚青年会议
- Sovetskoe Vostokovedenie 《苏联东方
学报》
-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 苏联科
学院
- Soviet Bhumi 《苏維埃国土》
- Soviet Encyclopedia, Large 苏联大
百科全书
- Soviet Press Translations 《苏联报
刊译丛》
- Soviet Russia 《苏俄报》
- Spratt, Philip 斯普拉特, 菲利普
- Sri Sri 室利室利(吉祥)
- Srinivasan, K. 斯利尼瓦散, K.
- Srivastava, K.G. 斯利瓦斯达瓦, K.
G.
- Stalin (and de-Stalinization) 斯大
林(和非斯大林化)
- Stalin Peace Prize 斯大林和平奖金
-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

"Statement of Policy" "政策声明"
 States' Reorganization Commission
 省邦重划委员会
 Statesman «政治家»
 Student, The (Organ of the All In-
 dian Students' Federation) «学生»
 (全印学生联合会刊物)
 Student Mirror «学生明鏡报»
 Sub-Caste 亚种姓
 Subcontinent 印度次大陆或次大陆
 Subhas Bose Day 苏帕斯·鮑斯日
 Subramaniam, K. 苏勃腊瑪尼阿莫,
 K.
 Sundaram, G. 孙陀兰, G.
 Sundarayya, Puchalapalli 孙达腊雅,
 布札拉巴黎
 Sunderlal, Pandit 森德拉尔, 潘迪特
 Sur, Sikander (Usmani, Shaukat)
 苏尔, 息甘堆尔(即邵加德·烏斯瑪尼)
 Surinder, Kaur 苏蘭堆尔, 高尔
 Surjeet, Harikishan Singh 苏尔吉德,
 哈利基閃·辛格
 Surkov, Alexey 苏尔科夫, 阿历克謝
 伊
 Swadhinata «自由报»
 Swaraj 自治
 Swaraj Party 自治党

T

Tagore, Rabindranath 泰戈尔, 腊宾
 德腊那特
 Tagore, Saumyendranath 泰戈尔, 扫
 莫盈德腊那特
 Talukdar, S.C. 达卢格达尔, S.C.
 Tamils 泰米耳族
 Tamilnad 泰米耳納德
 Tarachand 达腊占德
 Tashkent 塔什干

Tass 塔斯社
 Tata, J. D. R. 塔塔, J. D. R.
 Tebhaga 堆帕加
 Tej Bahadur Sapru Commission 堆
 支·巴哈都尔·薩勃魯委员会
 "technical apparatus" "技术机构"
 Telengana 堆楞加那
 Telugu 泰卢固族
 Tendulkar, D. G. 登都耳加尔, D. G.
 Thakkor, Jaswant 塔果尔, 札斯万德
 Thakur, Omkarnath 塔古尔, 欧莫加
 尔那特
 Thalheimer, August 塔尔海默, 奥古
 斯特
 Than Tun 丹东
 Thangamani, K. T. K. 檀加瑪尼, K.
 T. K.
 Thapar, Raj (Ramesh?) 塔巴尔, 腊支
 (洛梅什?)
 Thengdi, D. R. 滕格底, D. R.
 Thomas, T. V. 托馬斯, T. V.
 Thought «思想»
 Tikhonov, Nikolai 吉洪諾夫, 尼古萊
 Tilak, Bal Gangadhar 鉄拉克, 巴
 耳·甘加塔尔
 Times of India «印度时报»
 Tinnevelly conspiracy case 丁尼維
 利謀叛案
 Tirth, Swami Ramananda 底尔特,
 斯瓦米·腊瑪南达
 Tiwari, Sankar Dayal 底瓦利, 散加
 尔·达雅耳
 Toilers Party (Madras State) 劳工
 党(馬德拉斯邦)
 Trade Union International of Agri-
 cultural and Forestry Workers 农
 林业工人工会国际
 trade union movement 工会运动

Trade Union Record 《工会记录》
Travancore-Cochin 特拉凡哥尔—柯
欽邦
Travancore Defence Committee 特
拉凡哥尔保卫委员会
Treaty of Sèvres 色佛尔条约
Tribune, The 《论坛》
Tripuri (a) 特里普拉
Tripura Congress Session 国大党特
里普拉会议
Triyandrum 特里凡得琅
Trotsky, Leon 托洛茨基, 列昂
Turgunbaeva, Mukuram 都尔昆帕
瓦, 木古腊莫
Turkoman 土庫曼人

U

Ultraleftism “极左” 倾向
Union and Lenin Day Fund 工会和
列宁日基金
“United Democratic Opposition” “民
主联合反对派”
United National Front, The 《民族
统一战线》
United Front of Leftists 左派联合
阵线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United Provinces Student Federa-
tion 联合邦学生联合会
United Trade Union Congress
(UTUC) 统一工会大会
Unity 《团结》(印度人民戏剧协会出版
物)
University of Toilers 劳工大学
untouchables 不可接触者
Uphadayaya, N. J. 烏帕达雅雅, N. J.
Uphadhyaya, N. L. 烏帕达雅雅, N.
L.

Urban insurrection 城市起义
Urdu 烏尔都諾
Usmani, Shaukat 烏斯瑪尼, 邵加德

V

Vaidya, H. K. 瓦达, H. K.
Vaidya, Murarji 瓦达, 木腊尔季
Vaidya, P. B. 瓦达, P. B.
Vaisya 吠舍
Vakil, O. N. 瓦基尔, O. N.
Valia 瓦利亚
Vallathol, Mahakavi 瓦拉陀耳, 瑪哈
加維
Vanguard of Indian Independence,
The 《印度独立先锋》(又名《前卫》)
Varga, Eugene 瓦尔加, 尤金
Velayudham, M. P. T. 威拉俞塔莫,
M. P. T.
Venkataraman, M. R. 文加达腊曼,
M. R.
Venkataraman, S. 文加达腊曼, S.
Vidyarthi, Govind 維达尔提, 果温达
Vijayawada 維查雅瓦达
Vikramasingapuram 維格腊莫辛加普
腊莫
Violence and nonviolence 暴力与非
暴力
Vishal Andhra 《大安得拉》
Vishalandhra Mahasabha 大安得拉
大会
Vishwabharati 国际大学
Volgin, V. P. 伏尔金, V. P.
Volks-Recht 《民权报》
Voprocny Ekonomiki 《经济问题》
Vyas, Hari Krishna 烏雅斯, 哈
利·格利什那
Vyas, Ravi Shankar 烏雅斯, 腊維·
閃加尔

W

Wadia, B. P. 瓦底阿, B. P.
Waldorf-Astoria Conference 华道尔
夫—阿斯多利亞飯店會議
Warangal (See Nalgonda) 伏隆古尔
(參看那耳貢達)
Wardha 瓦尔达
Warerkar, Mama 瓦累加尔, 瑪瑪
Warlis 瓦尔黎族
Wavell, Lord 魏菲尔勋爵
Weiner, Myron 魏納, 迈龙
Women's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
Workers' and Peasants' Party
(WPP) 工农党
Workers' Publishing House 工人出
版社
World Congress of Intellectuals
(Breslau) 世界知識分子大会 (弗罗
茨瓦夫)
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世界工会联合会
World News and Views «世界新聞評
論»
World Peace Committee 世界和平理
事会常务委员会
World Peace Congress 世界保卫和平

大会

World Peace Council 世界和平理事
会
World Politics «世界政治»
World Politics and World Economics
«世界政治和世界經濟»
World Today «今日世界»

Y

Yajee, Sheelbhadra 雅吉, 西耳帕德
腊
Yajnik, Indulal 雅支尼克, 因都拉耳
Yershov, T. 叶尔紹夫, T.
Young Communist League 共产主义
青年联盟
Young League 青年联盟
Young Workers League 青年工人联
盟
Yusuf, S.S. 优素福, S.S.

Z

Zaheer, Sajjad 扎喜尔, 薩札德
Zhdanov, Andrei 日丹諾夫, 安德烈
Zhukov, E. M. 茹科夫, E. M.
Zimmermann 齐墨曼
Zinoviev, G. 季諾維也夫, G.
Zokovic, Radoven 索科維奇, 拉多文
Zurich 苏黎世